拉康研讨班 · 第五期

# 无意识的形成

##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1957—1958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五期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1957—1958）共28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Formations of the Unconsciou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 目录

第1课 · 1957年11月6日 .....6
第2课 · 1957年11月13日 .....38
第3课 · 1957年11月20日 .....71
第4课 · 1957年11月27日 .....103
第5课 · 1957年12月4日 .....135
第6课 · 1957年12月11日 .....164
第7课 · 1957年12月18日 .....194
第8课 · 1958年1月8日 .....234
第9课 · 1958年1月15日 .....262
第10课 · 1958年1月22日 .....291
第11课 · 1958年1月29日 .....322
第12课 · 1958年2月5日 .....350
第13课 · 1958年2月12日 .....381
第14课 · 1958年3月5日 .....432
第15课 · 1958年3月12日 .....508
第16课 · 1958年3月19日 .....568
第17课 · 1958年3月26日 .....607
第18课 · 1958年4月16日 .....636
第19课 · 1958年4月23日 .....663
第20课 · 1958年4月30日 .....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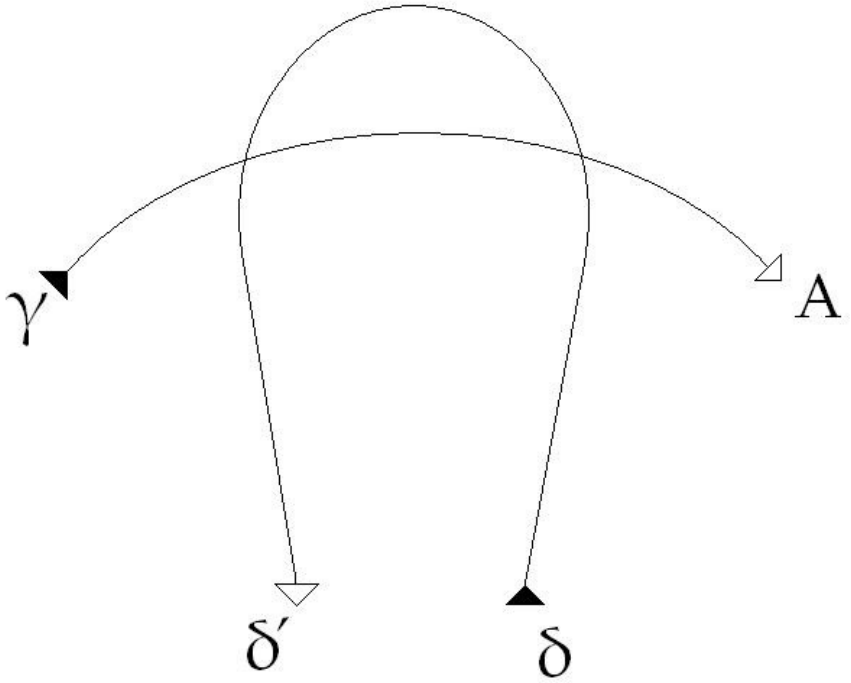
第21课 · 1958年5月7日 .....728
第22课 · 1958年5月14日 .....752
第23课 · 1958年5月21日 .....780
第24课 · 1958年6月4日 .....809
第25课 · 1958年6月11日 .....835
第26课 · 1958年6月18日 .....866
第27课 · 1958年6月25日 .....914
第28课 · 1958年7月2日 .....953

# 第1课 · 1957年11月6日

今年，我们把研讨班的主题定为无意识的形成。你们之中——我想是大多数人——昨晚参加了我们的学术会议，因而已经进入了同一调子。也就是说，你们知道，我们这次将直接提出的问题，涉及我们在过去几年课程中作为能指作用而阐发的东西，在无意识中发挥何种功能。

我希望，你们中有一些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抱负并不高——已经读过《精神分析》第 3 期上那篇由我以《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为题发表的文章。有勇气读过的人，将处在很合适、甚至比别人更合适的位置上，来跟随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况且，我的这个要求似乎并不过分：既然你们肯费心听我说话，也请费心读一读我写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我正是为你们而写。那些还没有读过的人，最好还是回头去读，尤其因为我会不断援引它。我不得不把已经说过的东西假定为已知。

最后，对于没有作过上述任何准备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将把自己限制在什么范围内；这也就是这堂导论课的内容。首先，我会以必然简短、必然有所点到为止的方式——因为我不可能从头再来——提醒你们几个标志性的点；它们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开启并预告了我将要谈的能指在无意识中的功能。随后，为了让那些被这番简短回顾弄得有些喘不过气的人歇一口气，我会向你们解释这个图式的意义；在今年此后全部理论经验中，我们都要回到它。




最后，我会取一个例子，也就是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注1]中使用的第一个例子；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伽利玛出版社，Folio 丛书，1992 年。

我并不是要用它作说明，而是要借它把问题带出来，因为诙谐只可能是具体而特殊的诙谐，不存在悬在抽象空间里的诙谐。我将由此开始向你们表明，为什么诙谐是进入我们的对象——也就是无意识的形成——的最佳入口。它不只是最佳入口；我甚至要说，它还是弗洛伊德本人向我们揭示无意识同能指及其技术之间关系时，最鲜明耀眼的形式。

所以，我先提醒你们——这就是我所说的三个部分；你们现在知道我会讲些什么，也就可以相应安排自己的脑力——我第一年的研讨班围绕弗洛伊德的《技术论文》展开，其核心是向你们引入象征功能的概念：唯有它能够说明所谓“意义中的决定作用”；我们必须把这项现实视为弗洛伊德经验的根本现实。

我提醒你们，在这里，意义中的决定作用无非是对理性的一种定义；而这项理性处在分析之所以可能的原则本身。正因为某种东西同类似言说的东西打了结，话语才可能把它解开。

围绕这一点，我曾向你们标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一边是这项言说，它由主体的存在充实；另一边是盘旋在人类行为之上的话语。这些行为本身之所以变得不可穿透，是因为人们想象它们的动机，把这些动机弄成非理性的；而它们之所以被“合理化”，恰恰只是在误认的自我视角中被合理化。

自我本身是象征关系的一项功能，并且能够在自身的稠密度和综合功能上受这项关系影响——这些综合功能同样都由幻象构成，却是令人着迷的幻象；我在第一年也曾提醒你们这一点。它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死亡在人的生物性在场中——对人而言原初就在场——打开了一道裂隙；这同我所谓“出生的未成熟性”有关。

这里就是象征入侵的冲击点，也是我们在第一期与第二期研讨班的接合处所抵达的位置。我再提醒你们：第二期研讨班凸显了来自无意识的重复坚持这一因素；我们把这项重复坚持等同于一条能指链的结构。

我曾试图让你们瞥见这一点，为此给出了一个模型，也就是所谓 α、β、γ、δ 的“句法”。你们手中有一篇关于它的论述[注2]；尽管它受到过一些批评……

> [注2] 《〈失窃的信〉研讨班》对应 1954—1955 年《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研讨班在 1955 年 4 月 26 日的一课。其改写稿标注写于 1956 年 5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刊于 1957 年《精神分析》第 2 期第 15—44 页，前有一篇《导言》（第 1—14 页）；后收入 1966 年瑟伊出版社《文集》第 11 页，而《导言》被移至第 44 页。

其中有些批评确有根据：有两处小缺漏，应当在以后再版时订正。

……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仍是对该句法主题的一份简要概述，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应当能为你们所用。

我甚至确信，它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好；几个月以后，乃至今年结束时，你们回头参照它，会比现在少遇到一些困难。我在这里提醒你们所谓 α、β、γ、δ 的“句法”究竟涉及什么，也回应某些人为缩小其作用范围所作的可嘉努力——无论如何，这给了他们一次亲自经受检验的机会。而我寻找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所以，他们最终无论在那里碰到什么死路，这项练习终究已经起了作用。我们还会在今年我将向他们展示的内容中，再次碰到这种体操。

我要请你们注意：正如那些费过这番力气的人向我指出、甚至写信告诉我的那样，α、β、γ、δ 每一项都带着一种根本歧义；但例子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项歧义中。借这些组合，我们也已经进入了当前所谓“群与集合”研究的思辨道路。它们的出发点，本质上奠立于这样一条原则：从复杂结构出发，而简单结构只作为特殊情形在其中出现。我不再提醒你们小写字母 α、β、γ、δ 是怎样生成的；但可以肯定，经过那些界

定它们的操作以后，我们抵达了某种非常简单的东西：每一个字母，都由两组对子各自两个项之间的关系来界定：

- 对称与不对称、不对称与对称这一对；
- 随后是相似与不相似、不相似与相似这一对。

因此，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由四个能指构成的最小群；它的性质是，每一项都可以依据它同另外三项的关系来分析。换句话说——顺便印证雅各布森的分析，也印证我最近见到他时他本人的说法——要使所谓语言学分析的最初、基本条件具备，至少需要这一组能指。你们将会看到，这项语言学分析同我们简称为“分析”的东西关系极为密切；仔细来看，两者甚至相互重合，在本质上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在第三期研讨班中，我们讨论了精神病，认为它奠立在一种原初的能指匮乏之上；我们还说明了，当实在界受生命性召唤牵引，前来填占这个能指匮乏的位置时，实在界会发生怎样的下陷。昨晚人们用 Verwerfung（拒斥）一词谈到这项匮乏；我承认，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困难。

正因如此，我们今年还要回到它。不过，我想，你们从精神病研讨班中至少已经理解：即便不是最后的动力，把大他者——把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还原为想象的小他者，以想象界替补象征界，至少也是其中的根本机制。你们甚至已经理解，当那场谵妄对话在某些时刻断裂时，实在界为何会产生彻底的陌异效果；唯有借这场对话，精神病主体才能在自身之中维持某种我们将称作主体的不及物性。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显得再自然不过：我们以不及物方式说“我思，故我

在”。然而，对精神病主体而言，困难恰恰来自下述二重性的还原——一边是大写 A 的大他者，另一边是小写 a 的小他者：

- 大他者是言说的场所和真理的保证者；
- 二元关系中的小他者则站在他面前，成为他自己的形象。

这项二重性的消失，恰恰使精神病主体如此难以维持在人类的实在中，也就是维持在一种象征性的实在中。最后我要提醒你们，在第三年，我曾借《阿达莉》第一场——不多不少，正是这一场——来说明我所谓对话的维度，也就是主体借以维持自身的维度。

如果有时间，我本来很愿意把那期研讨班重新整理成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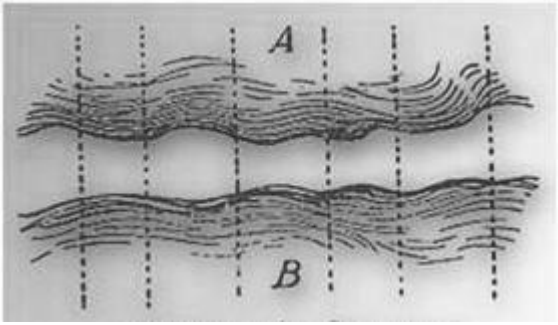
不过，我想你们没有忘记阿布内尔那段非同寻常的对话。他在这里作为假兄弟与双面间谍的原型登场，在第一次说出“是的，我来到他的圣殿”时，仿佛前来试探地形，并让某种诱惑的企图回响起来——请注意，这实在非同寻常！当然，我们后来给他戴上的那顶帽子，多少使我们忘记了这些回响。我当时曾向你们强调，大祭司怎样抛出了几个关键能指：

- “上帝在他的所有威胁中都始终忠实”；
- “上天的许诺”；
- “你为什么要放弃？”

“上天”一词以及另外几个恰到好处的词，最根本地说，无非是一些纯粹能指；我曾向你们强调它们绝对的空无。可以说，大祭司用它们把

对手串在了签子上，以至于从此只剩下一条可笑的蚯蚓；正如我当时告诉你们的，他回到队伍中，加入游行，又充当引诱阿达莉的诱饵。你们知道，她最终会在这场小游戏中丧命。

在这场戏剧对话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此显眼、如此可感；我当时围绕它谈到了费迪南·德·索绪尔那个著名图式：




能指与所指是两股平行的流——更确切地说，是一股双重流；索绪尔正是这样表示它们：两者彼此有别，而且注定不断地在对方之上滑动。

正是在这里，我为你们造出了软垫工手艺的意象，也就是绗缝点：一层织物总得在某个点同另一层织物钉合，我们才能至少知道这些滑动可能达到什么界限。绗缝点让两项之间的联结仍保留某种弹性。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在继续以前，我还要向你们提起第四期研讨班的功能。它以平行而对称的方式表明：正如约阿德与阿布内尔的对话最终所显示的，除非一个人以“言说”之名讲话，否则没有任何真正站得住的主体。你们没有忘记约阿德站在怎样的层面上说话：“看，这位上帝怎样借我的口回答

你。”在对大他者的指涉中，没有别的对象。这象征着一切有效言说中都存在的东西。

同样，在第四期研讨班中，我想向你们表明：除了转喻性的对象以外，并不存在对象；欲望的对象是他者欲望的对象，欲望始终是对另一物的欲望，严格说来，是对原初丧失的对象中所欠缺之物的欲望；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这个对象总是有待重新找到。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转喻性

同样，除非是隐喻性的，否则也不存在意义。意义只会从象征链中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替代中涌现。我刚才提到并请你们参照的《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一文，标记的正是这一点。［《精神分析》第 3 期，第 47—81 页；《文集》第 493 页。］

在下面分别表示隐喻与转喻的符号中，$S$ 在能指链的组合中同 $S_1$ 联结，整体又同 $S_2$ 发生关系；结果是，处于转喻功能中的 $S$，同意指中的 $s$ 处在某种转喻关系中：

$$f(S\ldots S_1)S_2 = S(-)s \qquad [转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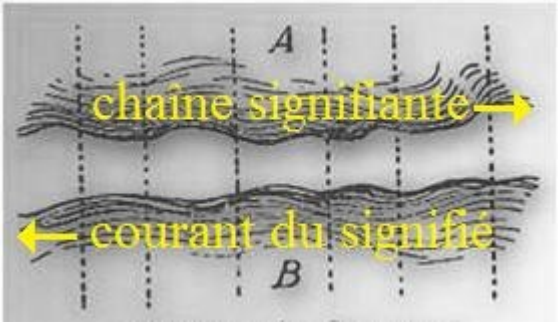
同样，在隐喻中，$S_1$ 相对于 $S_2$ 处在一种替代关系中；这里用大写 $S$ 与小写 $s_1$ 的关系来表示——这比转喻情形更容易说清——意义的涌现与创造功能：

$$f\left(\frac{S}{s_1}\right)S_2 = S(+)s \qquad [隐喻]$$

这就是我们目前抵达的位置。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年研究的对象。为了着手处理它，我先为你们构造了一个图式；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至少在今天，我们会用它调制出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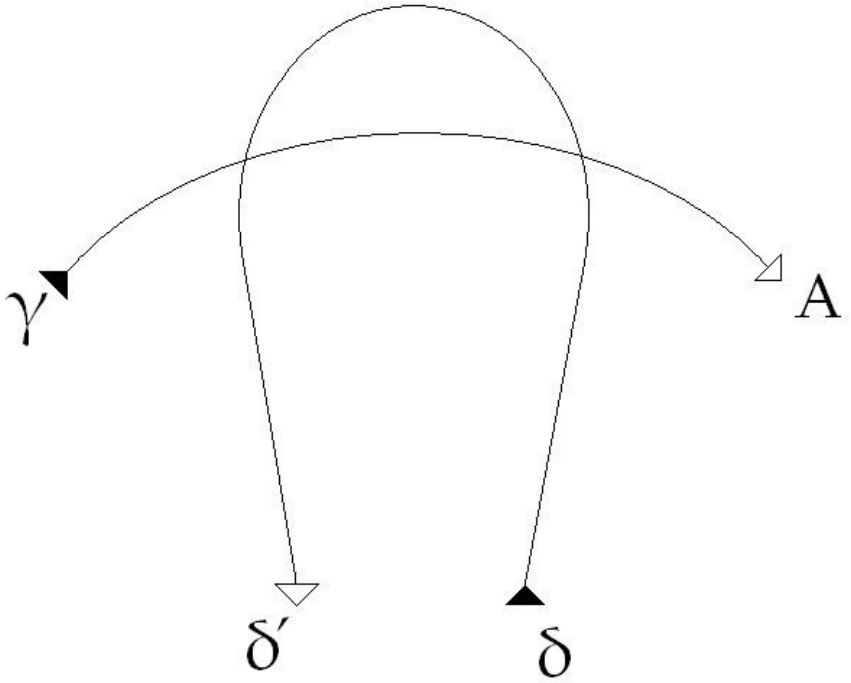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要找到一种办法，更近距离地接近能指链与所指链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借助绗缝点这个粗略意象。但显然，要让这个意象成立，我们还必须问：软垫工在哪里？他显然在某个地方。可如果把他放在这个图式上的某个位置，未免又太孩子气了。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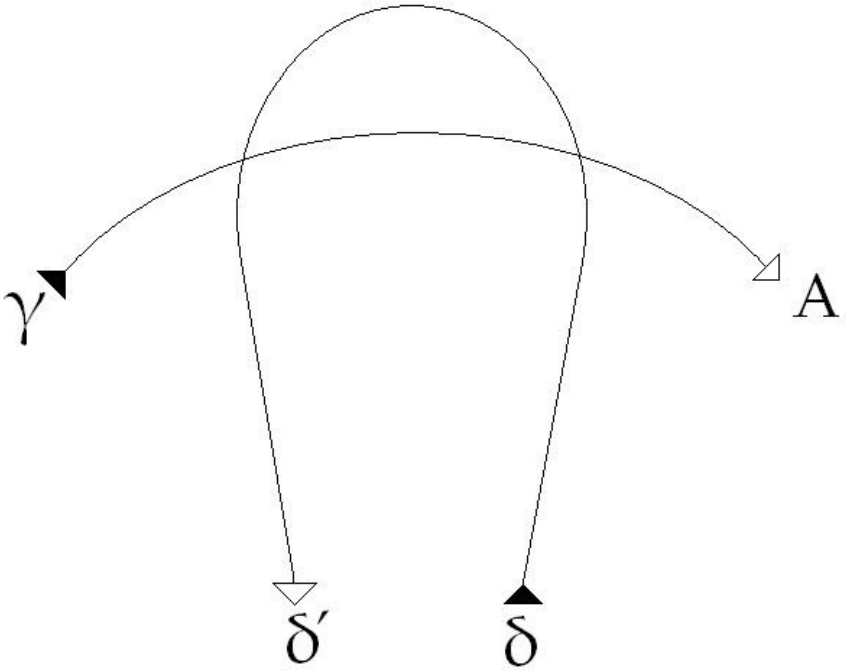

你们也许会想到：既然能指链同所指之流的关系，核心就在于某种相互滑动；既然尽管存在这项滑动，我们仍必须把握两股流在哪里发生联结、取得连贯；那么，只要确实有滑动，它就必然是一种相对滑动。每一方的位移都会使另一方发生位移；于是，我们或许应当在两条线反向交叉之处，参照某种理想的现在，找到一个典型图式。

你们看，我们可以围绕类似的东西来组织思考。




这个“现在”的概念将变得极为重要。不过，可以说，一段话语并不是罗素意义上的点状事件。话语有一点、有质料、有纹理；它不仅需要时间，在时间中有其维度和厚度，使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刹那的现在，而且我们的全部经验都表明了另一件事。我们已经说过的一切，以及此刻就能由经验当场呈现的一切，都给出了最可触的例子：如果我开始说一句话，你们只有等我说完，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因为按照句子的定义，我必须说出最后一个词，你们才会明白第一个词落在何处。这向我们显示了所谓能指的 nachträglich（事后性）作用，也就是我在分析经验本身的文本中不断告诉你们、并且在过去的历史中以无限更大尺度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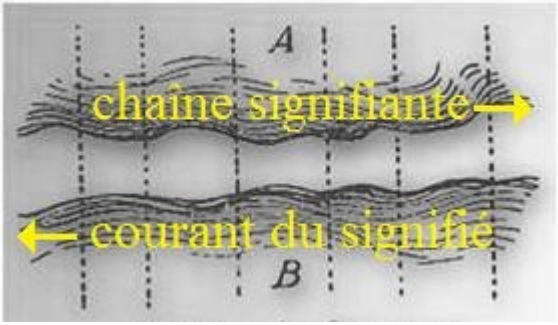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有一点很清楚——这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想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无论如何，我在《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一文中又作了十分确切的强调，暂时请你们回去参照它。我曾用一种拓扑隐喻来表达：不可能在同一个平面上表示能指、所指与主体。这并不神秘，也不晦暗；参照笛卡尔的 cogito，它可以得到非常简单的证明。我现在不再回头讲它，因为我们马上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遇到它。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要操作的两条线为何画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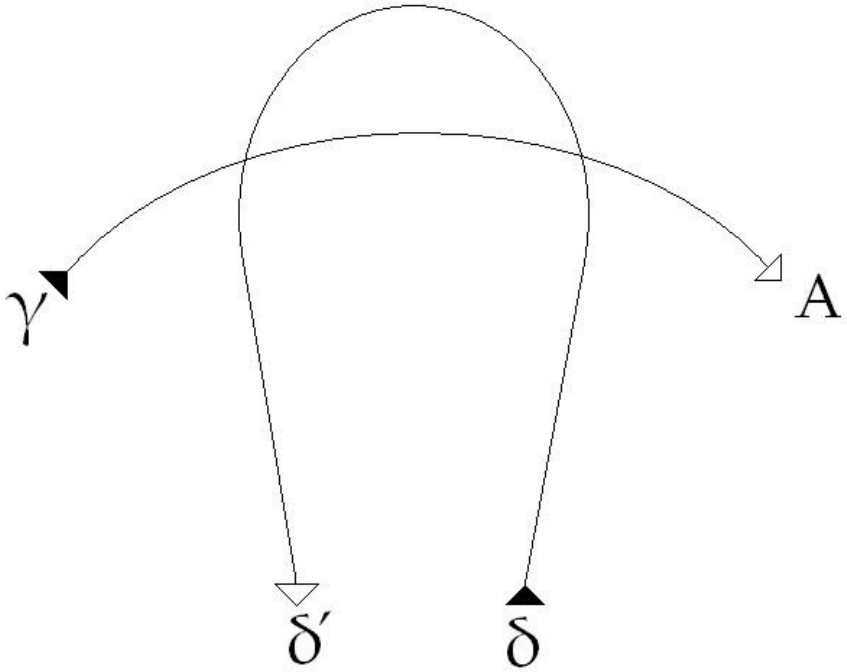

- 小圆帽表示一条路径的起点；
- 箭头的尖端表示它的终点。

你们认得出这里的第一条线，以及另一条线：后者两次穿过第一条线以后，钩在了它上面。

我只想指出，你们不能把这里两条线所表示的能指与所指［索绪尔图式］，同它们在这里所表示的东西［图中的 $\gamma \to A$ 与 $\delta \to \delta'$］混为一谈：




≠




两者略有不同，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原因。事实上，我们完全置身于能指层面。对所指产生的效应位于别处，并没有在这个图式中直接表现出来。

这里涉及的是我们可以在一列能指序列中把握的两种状态、两项功能。在第一条线［$\gamma \rightarrow A$］的第一个时刻，我们面对的是能指链：它

仍然完全可以受到隐喻与转喻所特有的能指性效应渗透。这意味着，能指效应可能在所有层面上得到实现，尤其一直抵达：

- 音位层面；
- 音系要素的层面；
- 构成双关语和文字游戏之基础的层面。

简言之，这就是能指中我们分析家必须不断与之周旋的那个某物。我想，除了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以外，你们都应当记得，文字游戏与双关语是怎样运作的。今天，我们正要从这里开始进入无意识的主题，也就是从诙谐与 Witz 入手。

另一条线［$\delta \rightarrow \delta'$］是理性话语的线。许多参照点和固定的事物已经整合进这番话语；严格说来，这些事物只能在所谓"能指的用法"层面上得到把握，也就是在话语的具体使用中构成固定点的东西。你们知道，这些固定点远远不会以单义方式一一对应某个事物。

没有一个义素只对应一个事物；它通常对应的是彼此很不相同的事物。我们在这里停留于义素层面，也就是由某种用法固定并界定的层面。

所以，另一条线［$\delta \rightarrow \delta'$］是日常、共同的通常话语之线，是话语代码所接纳的东西；我会把它称作我们共同现实的话语。它也是最少产生意义创造的层面，因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给定；大多数时候，这番话语只不过把所谓陈套观念作一番细细翻搅。著名的"空洞言说"正是在这一级出现；我关于言说与语言的功能的若干论述，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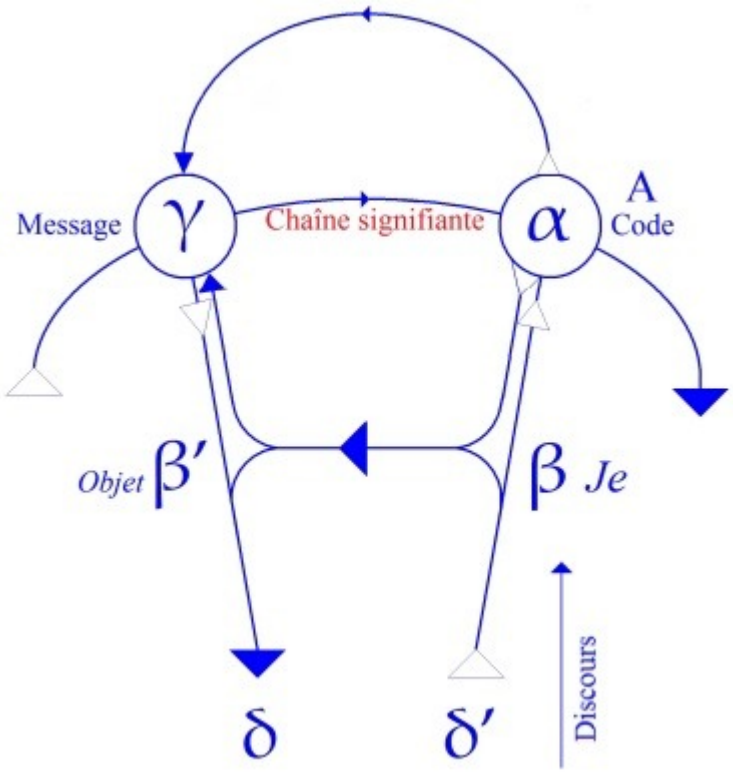
因此，你们看得很清楚：

- 这条线［$\delta \rightarrow \delta'$］是个体主体——说话并让人听见自己的那个人——的具体话语。这就是可以被录制到唱片上的话语。

- 另一条线［$\gamma \rightarrow A$］则是这一切所包含的分解、重新解释、回响以及隐喻与转喻效应的可能性。一条线朝着另一条线的反方向行进，原因很简单：它们彼此滑动；但一条线又切过另一条线，并在两个完全可以辨认的点上相交。

如果我们从话语［$\delta \rightarrow \delta'$］出发，那么从能指的角度看，话语第一次遇见另一条链——我们将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能指链［$\gamma \rightarrow A$］——的点，正是我刚才向你们解释的“用法之束”，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将称作“代码”的东西。要让人听懂这番话语，代码就必须存在于某处。这个代码显然位于这里的大写 $A$，也就是位于作为语言伙伴的大他者之中。这个大他者绝对必须存在；请你们顺便注意，我们完全不必用“集体意识”这个愚蠢而谵妄的名称来称呼它。

一个大他者就是一个大他者；只须有一个，就足以使一门语言活着。甚至只须这一个，大他者自身就可以同时充当第一时刻。只要还剩下一个人，并且他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说话，就足以让他自身存在；不仅会有一个大他者，甚至还会有两个他者——无论如何，会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门语言唯一的持有者时，他仍然可以继续用这门语言制造诙谐。




于是，第一次相遇［α］发生在我们称作“代码”的层面。另一处是第二次相遇［γ］：它闭合回路，严格说来构成意义，并且从它首先遇见的代码出发构成意义；这就是抵达点。你们看到两支箭头到达这里——今天我暂且不说，到达 γ 的第二支箭头究竟是哪一支。这个 γ 点，是话语同能指相接合的结果；能指在这里充当创造意义的支撑。这就是讯息。意义在这里出现；有待宣告的真理——如果确有真理的话——就在讯息中。

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任何真理得到宣告；原因很简单：话语 $[\delta \rightarrow \delta']$ 根本没有穿过能指链 $[\gamma \rightarrow A]$，而只是重复的呼噜声和话语磨坊的单纯运转。它在 $\beta$ 与 $\beta'$ 之间的某处短路而过；除了向你们示意“我是一个会说话的动物”以外，话语什么也没有说。这就是那些“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所构成的通常话语；人们借此确认，眼前面对的并不只是人天生所是的东西——一头猛兽。作为话语短路的最小结点，$\beta$ 与 $\beta'$ 这两个点很容易辨认：

- 一边正是我去年所说的转喻对象意义上的对象；
- 另一边是“我”，它在话语本身中标示说话者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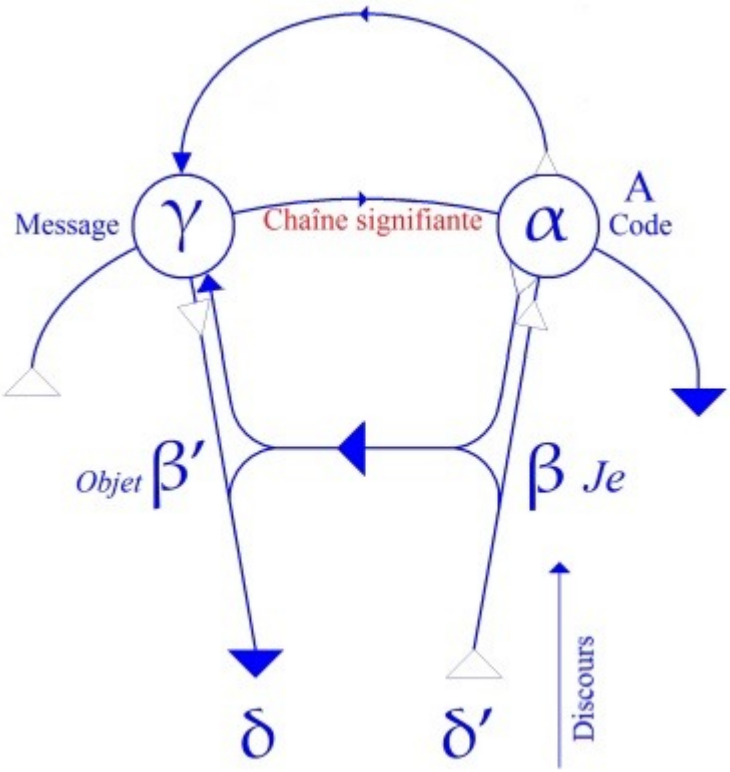
请仔细注意：在这个图式中，你们既能具体触到一种对语言经验来说完全而直接可及的真理，也能触到把两项联系起来又区分开来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分析经验与之相交，并显示下列两者之间至少在原则上存在区分：

- 这个“我”无非是话语链中说话者的位置，甚至根本不必由一个“我”来指明；
- 另一边则是讯息；要使这个东西存在，最低限度也绝对需要本图式所示的整套装置。

如果缺少这一整套复杂结构，就绝不可能仅仅从某个主体的存在中，以某种辐射状、同心圆式的方式发出任何讯息或言说。之所以不可能有言说，理由很充分：

- 言说首先以一条能指链的存在为前提；这条链的生成绝不是一件容易获得的事，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才抵达它；
- 它还以一张用法网络的存在为前提，换句话说，以一门语言的使用为前提。

此外，它还预设整套机制；这套机制使得无论你们说什么、想过还是没想过，无论你们怎样表述，只要进入话语磨坊的轮子，你们的话语总会比你们说出的东西说得更多。显然，单凭它是言说这一事实，它就以某个地方存在着真理层面这一参照项为基础——这里的真理有别于现实。这使新的意义可能涌现并被引入世界、引入现实；它确实引入的，不是已经在那里存在的意义，而是由真理使之涌现的意义。


Message
γ
Chaîne signifiante
α
A
Code
Objet β′
β Je
δ
δ′
Disc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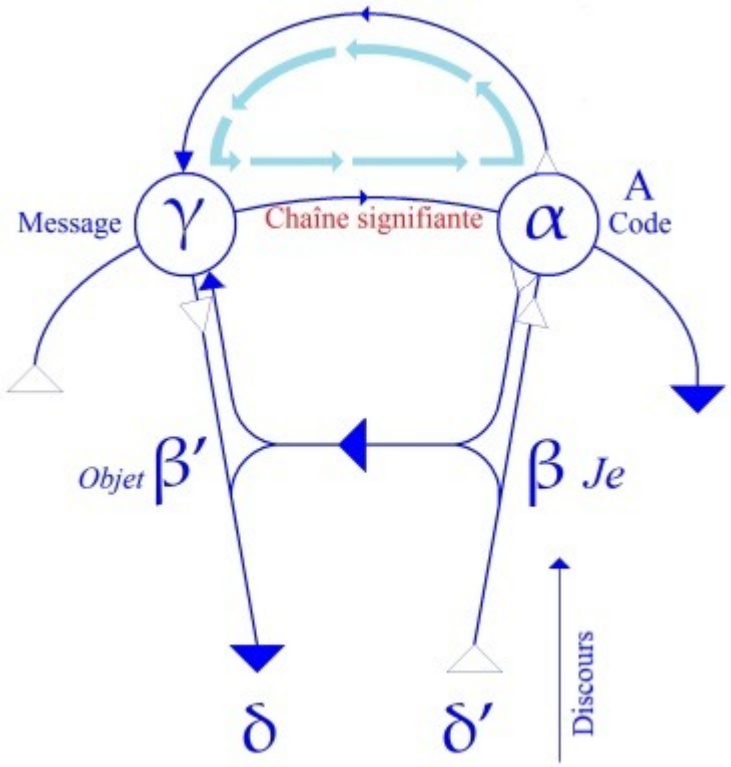
你们在这里看到两组从讯息与“我”各自辐射出去的不同方向——这就是图上那些小翼片的意义：

- 一条从“我”通向转喻对象［$\beta \rightarrow \beta'$］；
- 另一条通向大他者［$\beta \rightarrow \alpha$］；与之对称的，是讯息沿话语返回路径发出的两条线：
- 从讯息通向转喻对象的方向［$\gamma \rightarrow \beta'$］；
- 以及通向大他者的方向［$\gamma \rightarrow \alpha$］。

这些内容暂且请你们记下来。

你们会在图式上看到，下面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将对我们大有用处：

- 从“我”通向大他者的线［$\beta \rightarrow \alpha$］；
- 以及从“我”通向转喻对象的线［$\beta \rightarrow \beta'$］。你们还会看到另外两条极其令人着迷、充满意义的线对应什么；它们分别是：
- 从讯息返回代码的线［$\gamma \rightarrow \alpha$］。这条返回线确实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正如图式本身向你们显示的，就连一丝意义创造的希望都不会有；
- 正是在讯息与代码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也在代码返回讯息［$\alpha \rightarrow \gamma$］的过程中，诙谐把我们径直带入的那个根本维度才会运作。




我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若干课里停留于此，观察这里可能发生的一切极富启示、极具指示性的事情。这也会再次给我们机会，把握转喻对象所处的依赖关系——这个著名的对象从来都不是这个对象，而总是位于别处、总是另一件东西；我们去年已经开始处理它。现在，让我们进入这个 Witz。

Witz 是什么意思？人们把它译作 trait d'esprit（诙谐），也说 mot d'esprit（机智语）。我暂且略过自己为什么更喜欢 trait d'esprit 的理由。可是 Witz 毕竟也意为才智、精神。总之，“精神”一上来就以极端

歧义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归根到底，一则诙谐有时会成为某种贬抑的对象：它意味着轻浮、不严肃、幻想与任性。

而谈到“精神”，人们会停一下、再三斟酌，不会轻易用同一种方式说它。尽管如此，“精神”在“一个风趣、机敏的人”这个意义上，名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精神”概念的重心终究正落在这里。因此，我们必须保留它的全部歧义，一直到广义的“精神”——那个显然太常被用作可疑货物旗号的精神，也就是唯灵论的“精神”。

我们可以把这个“精神”集中到诙谐上，也就是集中到它里面看来最偶然、最易消逝、最容易遭受批评的东西上。精神分析的天性正是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不必惊讶：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严格说来，只有这里提到了别处被人以大写字母装饰的那个东西——“精神”。不过，“精神”一词两极之间的亲缘，仍始终引起各种分类争论。

说真的，给你们讲讲这些争论会很有趣。例如在英国传统中，Wit 这个词比德语 Witz、甚至比法语 esprit 更为明显地含混：人们争论什么是真正、本真的才智——简言之，什么是“好才智”；又争论什么是“坏才智”，也就是那些翻弄语言筋斗的人用来取悦世人的才智。怎样区分二者？

我们很应当回头看看批评家由此陷入的困难。到了十八世纪以后，这些争论仍在继续：从艾迪生、蒲柏等人，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在英国浪漫主义学派中，Wit 问题不能不处在最前景、列入议程；哈兹里特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也极有意义。还有一个我们以后会谈到的人——柯勒律治——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

关于德国传统，我也可以向你们讲同样的事。精神同文学基督教相接合并被推到前景，在德国经历了一条严格平行的发展道路；Witz 的根本问题位于整个德国浪漫主义思辨的核心。从历史角度看，也从分析所处的位置看，这个问题都将再次吸引我们的注意。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对 Witz 或 Wit 功能的批评在那些传统中推进得如此之远，而在法国却没有任何相应的东西。你们知道，在我们这里，唯一认真处理过它的人只是诗人；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不仅仍然鲜活，而且位于波德莱尔与马拉美作品的核心。

不过，即使在他们的随笔中，这个问题也始终只从批评角度出现，也就是只从对问题作思想表述的角度出现。决定性的一点在这里：无论你们读到什么关于 Witz 或 Wit 问题的文章，最终总会遇见极其明显的死路。只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今天无法把它们展开；以后我会回来谈。

我现在必须把话语的这一部分擦掉；而它恰好见证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构成了怎样一次跳跃、怎样一道截然的断裂、怎样一种成果与品质上的差异——以后我会向你们证明这一点。

弗洛伊德并没有作我刚才提到的那番考察，也就是考察整个欧洲传统怎样处理 Witz。我还略过了另一个主要传统——西班牙传统——因为它太重要，我们以后不能不大篇幅地回到它。弗洛伊德没有作过这番考察；他告诉了我们自己的来源，而且来源很清楚：三本相当明白、很好阅读的书，作者都是德国小型大学里那些厚道的教授。他们有时间安静思考，写出的东西一点也不迂腐。这三个人分别是库诺·费舍尔（K. Fischer）、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以及慕尼黑教授西奥多·李普斯（T. Lipps）。三本书中无疑以李普斯的著作最好；他走得很远，简直可以说已经真正伸出双臂，迎向弗洛伊德的研究。

只不过，如果李普斯没有那么关心自己所说 Witz 的体面，没有坚持把诙谐分成假的与真的，他无疑会走得更远。弗洛伊德恰恰完全没有保留这层顾虑。他素来不怕让自己同不体面的东西打交道，正因如此才看得清楚得多；也因为他看到了 Witz 与无意识之间的结构关系。

他在哪个层面看到了这些关系？只在可以称为形式的层面。我说"形式"，并不是指漂亮的外形，不是指那些圆润形状——人们试图用这一切把你们重新拖进最黑暗的蒙昧主义。我说的是文学理论等领域所理解的形式。还有一个我尚未向你们谈过的传统——也是因为以后我会经常回到它——即新近诞生的捷克传统，那个提出形式主义的团体；我们这里有人以为，这个指称只有一种含糊意义。

完全不是！只是你们的无知让你们这样以为。形式主义是一个含义极其精确的文学批评学派；站在"斯普特尼克"那一边的国家组织，已经迫害它一段时间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一开始就置身于这项形式主义的层面，也就是能指本身的一种结构理论的层面。结果毫无疑问，甚至完全令人信服：这是一把能够让我们走得远得多的钥匙。

我已经请你们偶尔读一读我的文章；既然今年我要向你们谈 Witz，那就更不必再特别要求你们至少去读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Der Witz und seine Beziehung zum Unbewußten）》[注3]了。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这在我看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当你们看到这本书的布局时，就会看出：弗洛伊德从机智语的技术出发，又始终回到这里；全书就奠立在机智语的技术上。这对他意味着什么？用通常的说法，就是语言技术；用我更确切的说法，就是能指技术。正因为他谈的是能指的技术，并且不断回到它，他才真正把问题梳理清楚。

他由此使不同层面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突然无比清楚地看见，必须懂得辨认和区分什么，才不会永远迷失在所指与思想之间那种毫无出路的混淆中。人突然看见：

- 例如，存在一个诙谐 / 才智的问题；
- 还存在一个滑稽的问题，而这不是同一件事；
- 同样，滑稽问题与笑的问题也不相同。

它们有时尽管会同时出现，甚至三者会纠缠在一起，却终究不是同一个问题。对弗洛伊德来说，诙谐 / 才智问题若要得到澄清，出发点就在能指技术。

我们将同他一起从这里出发。有一件非常奇特的事：这里发生在一个起初并未显明就是无意识层面的层面；然而，恰恰是从这里——而且由于 Witz 所涉及之物的本性中包含的深层理由——恰恰是在观看这里时，我们才会对并不完全在这里、而在旁边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看得最多。无意识恰恰只有在人把目光稍稍移向一旁时，才会照亮自身、交付自身。

你们在这里还会发现一种此后不断在 Witz 中遇见的东西；Witz 的本性就是这样：当你看向这里时，它让你能够看见它并不在的地方。

让我们跟随弗洛伊德，从能指技术的钥匙开始。弗洛伊德并没有为了寻找例子而大费周章：他给出的例子几乎全都取自自己的老师——库诺·费舍尔、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和西奥多·李普斯。这些例子在你们看来也许有些平凡，价值也参差不齐；所以，我刚才才告诉你们，我为什么看重那几位作者。

不过，还有另一个真正浸透了弗洛伊德的来源：海因里希·海涅。弗洛伊德的第一个例子就取自海涅；那句妙语盛开在希尔施·亚辛特（Hirsch Hyacinthe）的口中。这位汉堡的犹太彩票经纪人穷苦而饥瘦，海涅在《卢卡浴场》中重新遇见他。如果你们想围绕 Witz 作一番充实的阅读，就应当读《旅行图景》（Reisebilder）[注4]；它竟然没有成为一部经典，实在令人惊讶。

> [注4] 海因里希·海涅：《旅行图景》（Reisebilder），第 3 卷第 2 部分，第 8 章。

《旅行图景》意大利部分有一段写到《卢卡浴场》。海涅在那里同难以形容的希尔施·亚辛特交谈——关于这个人物的种种特性，我希望以后还有时间再说一些——并从他口中听到如下声明：他曾有幸为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号称“智者”的内森修治脚上的鸡眼；在那段时间里，他——希尔施·亚辛特——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

因为他削鸡眼时心想，“智者”内森正在盘算要派往各位国王那里的所有经纪人；如果他希尔施·亚辛特把脚上那块鸡眼削得稍微深了一

点，高处由此产生的恼怒，就会让内森也从国王们的皮上多削下一点。

就这样顺藤摸瓜，他又向我们谈起自己认识的另一位罗斯柴尔德，也就是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有一天，他报上自己是希尔施·亚辛特，却听见对方用一种温厚的口吻回答：

- “我也是彩票经纪人；我不愿意让同行进厨房。”

于是，希尔施·亚辛特高声说道：

- “他对待我的方式完全是 famillionnaire 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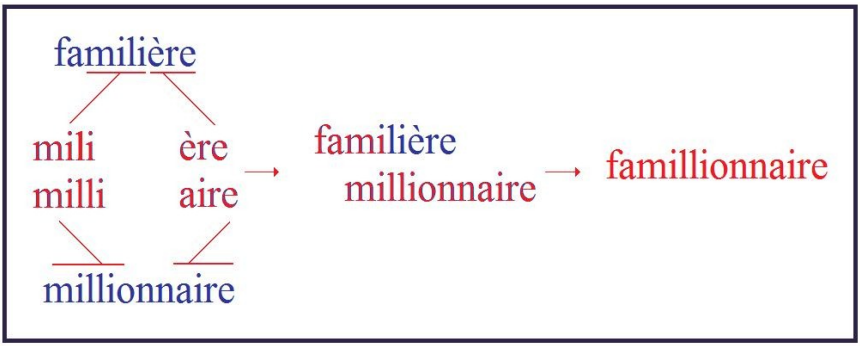
> [注] Famillionnaire 是海涅造出的压合词：法语转述把 familier（亲密、随和的）与 millionnaire（百万富翁）压合在一起。正文保留原词，以免抹去后文对音节重叠及凝缩机制的分析。

弗洛伊德就在这里停下来，随后补上一个极妙的问题：“这是什么？”是一个新词、一次口误，还是一则诙谐？它当然是一则诙谐；但仅仅因为我还能提出另外两个问题，我们就已经被引入了能指的歧义，也被引入了无意识。

弗洛伊德接着会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这里认出了凝缩机制；它在能指材料中取得物质形式，仿佛某台不知名的机器把两条能指链“冲压”到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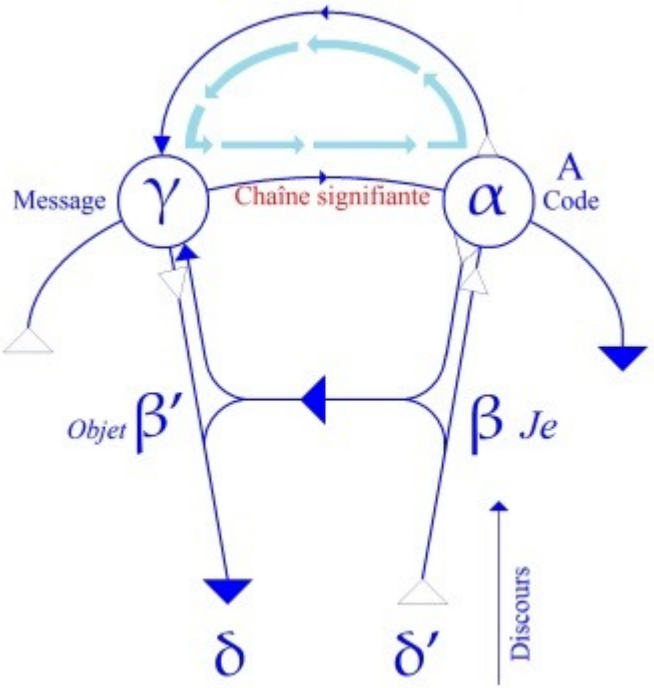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以一种完全亲密随和（familière）的方式对待我。”

然后，弗洛伊德在下面画出一个同样具有意指作用的图式：




……那里有“millionnaire”，于是：

- 两边都有“ère — aire”；
- 两边也都有“mili — milli”。两项发生凝缩，“famillionnaire”就在间隙中出现。让我们看看，这在图式上会呈现为什么。我不得不讲得稍快一些，但这里仍有一项东西必须标出来。




话语显然是从“我”出发、走向大他者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图示为在这里朝大他者行进。不过，更正确的看法是：无论我们怎样以为，一切话语都从大他者出发，前来映照在“我”上——因为“我”总得卷入其中——再迅速奔向讯息［$\alpha \rightarrow \beta \rightarrow \beta' \rightarrow \gamma$］。这只是为了在第二个时刻宣布对另一条根本话语链的召唤：“我同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在一起，非常亲密随和。”它在第二个时刻返回大他者。

然而，由于两边都包含“mil”与“aire”的神秘性质，另有某种东西相关地发生了。不要忘记，这两条线之所以有意义，只因为东西同时在两条线上流通。此时，有某种东西活动起来，那就是基本能指链本身的震动；在讯息刚开始成形的第一个时刻，它前来映照到转喻对象上，这

个对象就是“我的百万富翁”。因为对希尔施·亚辛特来说，问题正在于这项由“属于他”而得到图式化的转喻对象。

那是“他的百万富翁”，同时又不是“他的百万富翁”，因为倒不如说，是百万富翁占有着他；所以事情进行不下去。恰恰因为它进行不下去，这个百万富翁才在第二个时刻同另一项同时映照回来；“亲密随和的方式”已经抵达那里。

到第三个时刻，millionnaire 与 familière 在讯息处相遇并接合，构成famillionnaire。你们也许觉得，找出这一点实在太孩子气了——何况图式正是我画的。不过，等它以这种方式贯穿全年以后，你们或许会觉得这个图式还是有些用处。

它终究有一项意义：借助它向我们提出的拓扑要求，它让我们能够衡量自己在能指问题上的每一步。图式既然这样构成，无论你们怎样走过它，都会限制我们的全部步伐。我的意思是，每当一项操作需要走一步时，它都要求我们走的基本步骤不超过三步。你们会发现，起点处的小圆帽、箭头的尖端以及那些小翼片都指向这件事：带小翼片的线段必须始终处在第二个、中间的位置；其他线段则要么在开端，要么在终端。

因此，经过三个时刻，话语链与能指链抵达了同一个汇聚点，也就是讯息点。结果，希尔施·亚辛特先生受到了一种完全 famillionnaire 的对待。这项讯息完全不合常规，因为它没有被接收，并不在代码中。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原则上，讯息本来就应当同代码保持某种区分关系；但在这里，它显然是在能指层面本身违反了代码。这就把我们带到我为诙谐提出的定

义：问题在于这里发生了什么，发生之事具有什么本性。诙谐由此构成：在能指生产的某一层面形成的讯息，凭借它同代码的差异与区分，恰恰从这项区分和差异中取得讯息的价值。讯息就存在于它同代码的差异本身。

这项差异怎样得到认可？这就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这项差异由大他者认可为诙谐；这一步不可或缺，而且就在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关于诙谐的著作包含两项东西：一是把能指技术提升到前景；二是明确把大他者作为第三方来援引——我多年来一直向你们反复灌输这一点，而弗洛伊德尤其在全书第二部分明确阐述了它；不过从开头起，它就必然无时不在。例如，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诙谐与滑稽的一项区别，就在于滑稽是二元的。

正如我所说，滑稽属于二元关系；要有诙谐，却必须有作为第三方的大他者。事实上，无论这个第三方大他者是否由某个个体承载，它的认可都绝对不可或缺。大他者把球回传，也就是把它作为诙谐归入代码；大他者在代码中说："这是一则诙谐。"这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任何人这样做，就没有诙谐。换句话说，如果 famillionnaire 是一次口误，而且没有人注意到，它就不会构成诙谐；大他者必须把它编码为诙谐。

定义的第三个要素是：由于大他者的这项介入，代码中铭写了这则诙谐具有一项功能；这项功能同某种位于意义深处的东西有关——我并不说那就是一项真理。我会围绕这个例子向你们说明：我们并不是凭 famillionnaire 去巧妙暗示某种所谓百万富翁与寄生者的心理学。

当然，这一点极大增添了我们的乐趣，我们以后还会回来谈。不过，我今天先提出：如果我们要寻找诙谐，就应当同弗洛伊德一起寻找——弗洛伊德会沿着诙谐尖端所指的方向，尽可能把我们带远；因为这里确实有一个尖端，而且问题正出在这个尖端上。诙谐的本质同真理意义上的某种彻底根本之物有关，也就是我在《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一文中称作“真理的不在场证明维度”的东西；它本质上关乎真理。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想从哪个点——哪怕由此在自己身上造成某种精神复视——逼近“诙谐究竟是什么”，严格构成诙谐的东西，始终都在旁边作出指示，而且只有在人看向别处时才会被看见。

下次我们就从这里继续。我当然把你们留在某种悬而未决的东西、一个谜面前；但我想，我至少已经列出了那些基本项。以后我会向你们表明，我们必须回到这些项上。

# 第2课 · 1957年11月13日

让我们从上次停下来的地方继续，也就是希尔施·亚辛特在卢卡浴场遇见《旅行图景》的作者、并对他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时刻：

> “就像上帝必定会把一切好东西赐给我一样真，
> 我当时坐在那里，完全像一个平等的人，完全是
> famillionnairement（亲百万富翁式地）。”

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famillionnaire”这个词。归根到底，它后来颇为走红；人们之所以熟知它，正因为弗洛伊德把它当作出发点。所以我们从这里重新开始；我会首先尝试向你们表明，弗洛伊德怎样处理诙谐。这项分析对我们的问题很重要。

这个典型例子的意义，正在于它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可惜，这番证明竟然还有必要——向我们显示：在我们可以同弗洛伊德一起称作无意识机制的东西中，能指何等重要。确实令人十分惊讶：那些自身学科没有特别为此作准备的人——我是指神经学家——随着他们同失语症这个棘手主题较量，也就是同言说缺损较量，他们在所谓语言学训练方面日益取得显著进步；可是，全部技艺与技术都奠立在言说的使用上的精神分析家，迄今却丝毫没有留意这一点。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的，并不只是对语言学领域作某种人文主义式的援引，用以显示他的文化修养或阅读范围；那是一项完全内在、有机的援引。

我希望，从上次以后，你们中至少大多数人已经翻开过《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你们会发现，弗洛伊德对机智语的技术——作为语

言技术——的援引，始终是其论证围绕旋转的枢轴。诙谐中涌现出的意义与意指之所以在他看来值得同无意识并置，并不是因为别的东西——关于诙谐我要说的一切，我都会反复敲打这一点——而只奠立在它自身的快乐功能上；这项功能之所以始终围绕无意识旋转，完全是因为二者存在结构类比，而且这种类比只有在语言学层面才能设想。一边是诙谐中发生的事情——我是指诙谐的技术面、语言面；另一边则是弗洛伊德以不同名称发现的无意识自身机制，例如凝缩与移置。今天我只限于这两项。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希尔施·亚辛特对海因里希·海涅说话；也就是海涅虚构的人物希尔施·亚辛特，讲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开头就发生了某种东西——暂且只看我刚才截出的这个片段——而且非常鲜明；它仿佛把随后将要出现的东西抬起、放到托盘上并加以凸显：那就是对普遍见证者的这番祈请，以及主体同这位见证者、也就是上帝的个人关系：

> “就像上帝欠我一切好东西一样真……”

这句话的意义无疑十分显著；而现实可能显示出的欠缺，又使它带有反讽意味。接着，陈述由此展开：

> “……我坐在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身边，完全像一个平等的人……”

这里出现了对象：“完全”以及这个全体性。我们并不完全确定，这个全体是否真的闭合了；事实上，在许多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全体”概念用法的所有层面，我们都会重新遇见这一点。他在这里回到“完全”上，说：“完全……”就在此处发生了现象，发生了意外之物，发生

了“陈述的丑闻”：一项前所未有的讯息，一个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还无法命名的东西——“……famillionnaire”。

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一次失败行为还是一次成功行为，是一次失足还是一项诗性创造。我们会看到，它可能同时是这一切。不过，我们首先必须停留在这个现象严格的能指形成层面；随后，它会被重新纳入自身特有的能指功能——我马上会说明，上次也已经预告过——也就是作为一个“逃出代码的能指”。所谓代码，是此前在能指创造所指的功能中积累起来的一切能指形成。

这里出现了某种新东西；它可能同一门语言的进展及变化本身的动力打结。我们首先必须停留在它的形成过程上，也就是停留在它相对于能指形成机制所处的点上。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正当地继续考察随后将显现为这一现象的发生场所、伴随物，有时甚至是它的来源与召唤点的东西。

不过，根本现象就是这个结、这个新颖而悖论性的能指出现之点，也就是“famillionnaire”：

- 弗洛伊德从它出发；
- 又不断回到它；
- 请我们停下来考察它；
- 而且，你们将会看到，直到他对诙谐的思考终点，他都不断回到这个词，把它当作根本现象：它是规定机智语之特殊性的技术现象，并让我们能够辨认：
- 什么是核心现象；
- 它怎样在我们自己的层面——即同无意识的关系层面——向我们提供教导；
- 同时，它又怎样让我们以新视角照亮周围的一切：把它带向所谓 Tendenz——这部著作使用的正是 Tendenz（倾向）一词——的东西，以及滑稽与笑这些可能从它向外辐射的现象。

所以，让我们停留在这个“famillionnaire”上。处理它有好几种方式。这不只是图式的目的；这个图式之所以交给你们，正是为了让你们能在其中标出能指加工的不同层面。这里特意选择“加工”一词，因为弗洛伊德明确使用并特别援引了它。让我们停在这里；为了不让你们过于惊讶，先看清它朝哪个方向行进。当“famillionnaire”出现时，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说：

- 其中标示出某种东西，我们感到它是一项目标，朝着意义而去；
- 有某种东西试图从中涌现，带着反讽、甚至讽刺意味；
- 还有某种东西显得不那么明显，却可以说在现象的后续冲击中、在由此向世界传播的东西中展开。

那仿佛是一个对象的涌现；它更趋向滑稽、荒诞与无意义。这是作为对百万富翁的嘲弄的 famillionnaire；它趋向取得一个人物形象的形式。要向你们指出它实际上想在哪个方向上化身，并不需要做多少工作。

况且，弗洛伊德顺便告诉我们，海涅在另一处加倍使用这则诙谐，把百万富翁叫作“Millionnarr”；德语意思是“疯疯癫癫的百万富翁”。如果沿着我刚才所说把 famillionnaire 实体化的方向，我们也可以在法语中把它译成带连字符的“傻瓜—百万富翁”（fat-millionnaire）。

我讲这些，是为了让我们的切入方式不至于毫无人味。不过，不要再沿这里走得太远；说真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恰恰不应仓促迈出这类步子，也就是不要理解得太快，因为人一旦理解得太快，就会什么也理解不了。

这些仍没有解释刚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也没有说明它怎样连接到所谓“能指功能的一般经济”。在这里，我仍须坚持请你们全都读一读我在《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中写的内容，尤其是我在那里为两项功能给出的例子。我把它们称作“能指的根本功能”；可以说，能指的

犁铧正借这些功能在实在界中犁出所谓所指——它确实把所指召唤出来，使之涌现、对它进行操作并把它生成。这两项功能就是隐喻与转喻。

听说，对某些人来说，挡住他们进入这篇文章的是——姑且这样说——我的文体。我很遗憾。首先，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的文体就是这样。我请他们在这里努力一下。不过我只想补充：无论我个人给文章带来了什么缺陷，这项文体的困难中终究也有某种东西——或许他们可以隐约看见——必须同所处理的对象本身相应。

如果问题是以一种有效方式谈论能指对所指发挥的创造性功能，也就是说，不只是谈论言说，而是可以说要沿着言说本身的线索来谈，借此召唤出言说的这些功能，那么，今年后续的讲述或许会向你们显示：这里存在一些内在的文体要求，例如简洁、暗示，乃至尖锐的妙语。要进入这个场域，它们可能是根本而完全决定性的要素；因为它们不仅支配进入场域的通道，也支配其全部纹理。以后，我们会围绕某种文体回到这一点；无论它的名字可能显得多么含混，我们甚至不会犹豫直呼其名——矫饰主义。我会试着向你们表明，它背后不只有一项伟大传统，还有一项不可替代的功能。

这只是为了回到我的文章而插入的一段题外话。你们会在那里看到，我跟随别人——提出这一点的是罗曼·雅各布森——称作“语言的隐喻功能与转喻功能”的东西，同能指语域中一项非常简单的事实相连。正如过去几年我已经多次说过，能指的特征在于存在一条分节的链；我在那篇文章中还补充说，这条链倾向于形成封闭组合，也就是由一系列彼此套接的环组成链条，而这些链条本身又像环一样套入其他链

条。这个图式的总体形态也多少唤起了这件事，但没有直接把它呈现出来。

这些链条以双重维度存在，这意味着能指的分节或联结包含两个维度：

- 一个可以称为组合、连续性与链条接合的维度；
- 另一个则是链条每个要素始终包含的替代可能性。

第二项绝对根本的要素，正是弗洛伊德对能指与所指关系所作线性定义中遗漏的东西。换句话说，在一切语言行为中，历时维度都不可或缺；但每一个能指项所固有的永久替代可能性，又包含并召唤出一种共时性。

换句话说，就是我要向你们指出的两种关系：

- $f(S \ldots S_1)S_2 = S(-)s$：历时性——转喻；
- $f\left(\frac{S}{S_1}\right)S_2 = S(+)s$：共时性——隐喻。
- 前一项给出能指联结的组合关系；
- 后一项则给出一切能指分节中始终隐含的替代关系图像。

不需要非同寻常的直觉能力，也能看出：我们刚刚看到发生的事情，同弗洛伊德为“famillionnaire”的形成所画的图式，至少必定存在某种关系。也就是在两条不同的线上：

“……我坐在那里……以一种完全亲密随和的方式……”

下面则是：
“百万富翁”。

弗洛伊德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有某种东西落掉了、被省略了；在意义的分节中，有某种东西落掉了，却留下了“百万富翁”。某种事情把“familière”与“millionnaire”彼此压缩、冲压到一起，从而产生“famillionnaire”。因此，这里出现的是替代功能的某种特殊情形，而且被替代之物多少还留下了痕迹。可以说，凝缩就是替代功能层面可能发生之事的一种特殊形式。

从现在起，你们最好把我围绕一个隐喻所作的长篇阐述放在心里：那就是波阿斯的禾束——“他的禾束既不吝啬，也不怀恨……”我在那里表明：

- 正是“他的禾束”取代“波阿斯”一词，才构成了这里的隐喻；借这项隐喻，围绕波阿斯这个人物涌现出一种意义，即他即将成为父亲的意义。由此到来的东西，以及它可能向周围辐射并反照出来的一切，也都随之出现；不过——你们记得很清楚——它以一种难以置信、迟来、意外、天意般、神圣的方式到来；

- 正是这项隐喻，显示了一个新意义怎样围绕原本仿佛被排除、被拒斥在父亲身份之外的波阿斯人物出现；

- 同样，我们必须从一种根本的替代关系中，看见隐喻的创造动力、创造力量与生成力量——这里确实可以说“生成”。

这是一项完全普遍的功能；我甚至要说：

- 正是借此，借这项替代的可能性，我们才能设想意义世界本身怎样被生成；

- 一门语言赖以构成的全部历史，也就是它的种种功能变化，必须在这里而非别处得到把握；

- 如果我们有可能为一门语言怎样生成、出现提供某种模型或例子——在言说尚未出现以前，世界或许还是一个未构成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某种不可还原而原初的东西。它无疑是能指链的最低限度；至于这个最低限度究竟是多少，尽管确实值得讨论，我今天暂不坚持展开。

不过，我已经围绕这个最低限度［α、β、γ、δ］给了你们足够多的指示。因为正是通过隐喻，也就是在某个位置上进行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替代，不仅能指发展的可能性得到创造，总有新意义涌现的可能性也得到创造。这些新意义不断前来确认、复杂化并深化纯然不透明的实在界，赋予它纵深意义。我本想找一个例子来向你们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明意义演变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总会或多或少在其中重新找到替代机制。

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候，我等待偶然把例子送来。例子果然由身边某个人提供了：他在翻译时需要查字典，寻找法语 atterré 的意义；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个词。因为同他原先的想法相反，atterré 在最初以及许多用法中，并不是“被恐惧击中”（frappé de terreur），而是“被放倒在地”（mis à terre）。

在博叙埃那里，atterrer 的字面意思就是“放倒在地”；而在稍晚一点的其他文本中，我们看到某种恐惧的分量逐渐明确起来。至于我们，则会毫不犹豫地说：语言纯正论者让 atterré 一词的意义受到了混杂与偏转。

不过在这里，纯正论者完全错了；根本不存在任何混杂。即便我刚刚提醒了 atterré 的所谓词源意义以后，你们中某些人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 atterrer 显然无非是“转向土地”“使之触地”或“把它降到同土地一样低”，换句话说就是“使人沮丧、惊愕”，这个词的日常用法仍然包含着“恐惧”这一背景。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一个仅凭约定而同所谓原初意义具有某种关系的东西出发——因为 atterré 这个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绝对起源。就以 abattu（被击倒、沮丧）一词为例：它确实会唤起 atterré 在那个被称为纯粹的意义中所能唤起的东西。

Atterré 最初作为一个看起来不像隐喻的隐喻，替代了 abattu；之所以不像隐喻，是因为我们假定，两者原本都意为“摔到地上”或“摔向地面”。我要请你们注意的正是：atterré 之所以变得丰饶、生成一种新意义——也就是一个人被说成 atterré 时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以任何方式改变了 abattu 的意义。

事实上，这是一种新意义、一层新细微差别；它不同于 abattu，尽管带着恐惧，也不同于 terrorisé（受恐吓）。它是某种新东西：它把一层新的恐惧色彩引入 abattu 已经具有的心理意义与隐喻意义。因为从心理层面说，我们既不是字面意义上被“放倒在地”，也不是被“砍倒”；在词语出现以前，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说出的。而这些词都来自一个

隐喻：一棵树被砍倒时发生的事，或一名摔跤手被放倒在地、被 atterré 时发生的事——这是第二个隐喻。

但请注意，恐惧之所以被引入，根本不是因为——这正是事情有趣之处——atterré 中的“ter”原本就意味着“恐惧”。换句话说，隐喻并不是意义的注入；仿佛意义原本存放在某个地方的储藏库里，可以从那里注射进来——事情并非如此。

Atterré 一词带来这层意义，并不是凭它所具有的意指，而是凭它作为能指：它包含音素“ter”，而“terreur”（恐惧）中也有同一个音素。它正是沿能指路径、沿双关路径、沿同音关系的路径——也就是沿着最为无意义的东西——生成这层意义色彩，把这层恐惧色彩引入、注入 abattu 已经具有的隐喻意义。

换句话说，某种 $S/s$ 的关系——即能指在所指之上的关系——将在 $S/S'$、即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生成。

但二者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意义生成的作用，正是在能指同能指的关系中才得以发挥：某种东西把这里的能指同那里的能指联结起来，也就是 terre（土地）与 terreur（恐惧）之间纯粹能指性的、同音的关系。它使已经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意义受到恐惧色彩的细化。

这就为我们示范了隐喻层面发生的事情。我只想指出一条小径的开端，向你们表明这件事怎样连接到另一个将从无意识现象角度令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正常的意义创造现象，通过替代路径、通过支配语言演变与创造的隐喻路径发生；与此同时，这条路径也支配意义本身的创造与演变。我说的意义不只是被感知的意义，也是把主体纳入其中、从而丰富我们生活的意义。

我只请你们注意这一点：我已经指出，“ter”这个钩子的根本能指功能，必须被我们看作纯粹能指性的东西；不论我们看见与否，隐喻都运用着这座同音资源库。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马上把它把握得很清楚；但随着展开，你们会理解得更好。

这只是一条根本道路的开端。随着 atterré 这层意指色彩得到确认和构成——请注意——它也意味着对恐惧的某种支配与驯服。这项恐惧不只被命名，终究也被缓和了。为了让你们继续在头脑中保持 atterré 一词的歧义，这一点也正好使歧义得以保存。

毕竟，你们会告诉自己，atterré 确实同土地有关，恐惧并不完整；在你们看来毫无歧义的“被击倒、颓丧”意义仍占优势，恐惧只是一层细微色彩。总之，在这个场合，恐惧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换句话说，恰恰因为恐惧没有被正面注意，而是经由颓丧这一中介侧面被把握，所发生的事情才会被完全忘记；最终，正如我刚才提醒你们的，那个作为模型的词根本身完全退出了回路。也就是说，atterré 这层色彩一旦在用法中确立、成为意义及意义用法，能指虽然由此被呈现，却——让我们直说——严格意义上受到了压抑。

无论如何，一旦 atterré 一词以当前色彩确立了用法，除非诉诸字典或学术话语，那个模型就不再任你调用。对于 atterré 来说，terre、terra 仿佛受到了压抑。我在这里稍微走得太快了一点，因为你们还不太习惯这种思考方式；但我想，这可以免去我们以后再折回来。你们将会看到，我在这里只称为事情开端的东西，会在现象分析中得到何等充分的印证。

让我们回到“famillionnaire”，回到我们看见它形成的接合点或隐喻凝缩点。在这个层面上，先把它同语境分开——语境是：希尔施·亚辛特，也就是海涅的才智生成了它。以后，我们会在它的生成史中走得远得多，一直考察海涅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前缘。为确保不出错，我们甚至还得重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全部历史；不过，现在还没有走到那里。

眼下，我们只面对“famillionnaire”。让我们暂时把它孤立出来，把摄影机围绕这个词的视野尽可能收窄。毕竟，它本可以在海涅的想象以外诞生：

- 海涅或许并不是坐在白纸前、手中拿笔时才造出它；
- 或许是在我们以后会提到的某次巴黎夜间漫步中，它突然来到他那里；
- 它甚至很可能出现在疲倦的黄昏时刻；
- 总之，这个 famillionnaire 也可能是一次口误，而且这完全可以设想。

我已经讲过自己从一位患者口中采到的一次口误——我还有别的例子，但总要反复回到同一些东西上，直到把它们磨透，然后才换别的。那位患者躺在我的分析榻上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进行联想时，提起一段时光：当时，他同后来终于在“市长先生”面前正式娶过门的妻子，只是以“maritablement”的方式共同生活。

你们已经看见，这可以写成 maritalement（夫妻般地），意味着两人还没有结婚；它下面又有某种把已婚者与未婚者的处境完美接合起来的东西——misérablement（悲惨地）。二者构成“maritablement”。这没有被明说，却比明说好得多。你们在这里看到，讯息怎样超出了——我不愿说“信使”，因为真正说话的是借这个无辜者之口发言的众神信使——言说的承载者。

正如弗洛伊德会说，语境完全排除了我的患者在制造机智语的可能。事实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为它充当大写 A 的大他者，也就是听者——不仅专心，而且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听出了东西的听者——你们根本不会知道它。尽管如此，一旦被放到恰当的位置、也就是放入大他者之中，它就成了一则格外惊人而精彩的诙谐。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注1]中，弗洛伊德给了我们无数把诙谐同口误并置的例子；有时他还亲自强调这一点。他恰恰表明，有些东西同机智语如此接近，以至于他自己不得不说——而我们也不得不相信他的原话——语境排除了那位男患者或女患者把这项创造当作机智语制造出来的可能。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帕约出版社，2004年。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某处，弗洛伊德举过一个女人的例子。她谈到男人与女人各自的处境时说：

> “女人要想让男人感兴趣，就必须长得漂亮……”

她的话中暗含着：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禀赋。

“……可一个男人，只须五肢都挺直就够了。”［第 5 章，“口误”］

这类表达并不总能完整翻译；我常常不得不彻底移置，也就是在法语中重新创造那个词。这里几乎得用“全都硬挺挺的”这样的说法。法语 droit（直、挺）并不是常用的这种说法；它如此不常见，以至在德语中也同样并不寻常。

弗洛伊德不得不围绕“四肢”与“五肢”作一番解释，才说明这个说法怎样生成；然而，其中略带猥亵的倾向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无论在德语中，还是在译作“五肢挺直”的法语中，这句话都没有非常直接地命中目标；另一方面，他明确告诉我们，语境排除了这个女人表现得如此粗俗露骨的可能。它确实是一次口误；但你们看，它同一则机智语多么相像。

所以我们看到：

- 它可以是一则机智语；
- 可以是一次口误；我甚至还要再进一步说，
- 它也可能只是一句蠢话，一种语言上的天真。

毕竟，就我那位格外讨人喜欢的患者而言，即使我这样描述他的说法，“maritablement”对他也不真正是一次口误；这个词确确实实属于他的词汇，他根本不觉得自己说了什么异乎寻常的话。

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这样四处行走，有时还身居高位，却不断说出这类词。据说，有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每天能成公里地制造这种说法。例如，他会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给某些句子作结：

“事情就是这样，这是 signé qua non（签字不可少）的。”

这不是一次口误，只是一项无知与愚蠢的事实。我只是想向你们表明，我们必须在这类形成的层面稍作停留。既然我们已经谈到口误——它是这一切中最切近我们的东西——就让我们看看口误层面发生了什么。

正如我们谈过“maritablement”，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那项曾多次经过、并借以强调能指根本功能的口误；可以说，它是弗洛伊德理论根基上的那项原初口误。它开启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而且早先已经作为最初成果首先单独发表；这就是名字的遗忘。

乍看起来，遗忘同我刚才谈的那些事情并不相同。不过，如果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东西确有其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能指的机制与代谢确实处在无意识形成的原则和动力位置，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所有这些形成中重新找到它：外部看起来彼此有别的东西，必须在内部重新找到统一性。于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famillionnaire”，而恰好相反：我们面对的是某种欠缺的东西。

弗洛伊德对名字的遗忘——一个外国专名的遗忘——所作分析向我们表明什么？这里出现的只是若干开端；以后我会回到并展开它们。不过，我必须顺便向你们指出，弗洛伊德呈现的这个案例具有一项特殊性。

这个专名是一个外国名字。我们读《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就像读报纸一样；我们自以为已经知道得太多，因而认为没有必要停留在那些其实是弗洛伊德一步步迈出的地方。然而，他的每一步都值得保留，因为每一步都承载着教导，并且后果丰厚。

所以，我在这里请你们注意——因为以后还要回到这一点——当问题涉及一个名字、尤其一个专名时，我们处在讯息层面。以后我们还必须重新找出这项事实的作用。我不能把一切同时告诉你们，不像《今日精神分析》[注2]中的人那样博学，可以把一切同时说出来；

> [注2] 参见 S. Nacht、J. de Ajuriaguerra、J. G. Badaracco、M. Bouvet、R. Diatkine 等：《今日精神分析》，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

他们谈"我"与自我，仿佛那是毫无复杂性的东西，并且把一切混在一起。

重要的是，我们要停留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上。这个名字同时还是外国名字，这同它是专名并不是一回事。它之所以是外国名字，是因为它的构成要素对弗洛伊德的语言而言属于外语：Signor 并不是德语词。

弗洛伊德既然特别指出这一点，恰恰说明我们在这里进入了另一个维度，有别于专名本身的维度。可以说，专名绝不是谁"专有"的特殊名字；它没有祖国。专名都或多或少同某些卡巴拉式符号相连，而弗洛伊德向我们强调，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他把它单独放在一个开篇章节中，已经证明他认为这是自己正在处理的现实中一个格外敏感的点。

弗洛伊德还立刻凸显了另一件事，而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在这里停留。这正是他从名字遗忘入手处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时，在这类遗忘中认为引人注目的东西：

- 这项遗忘并不是绝对遗忘，不是一个洞或一道裂口；
- 另一些东西、另一些名字会前来占据它的位置。

一切科学的开端——惊讶——正从这里开始。人真正能够为之惊讶的，只能是自己已经开始稍稍接收到的东西；否则，人根本不会停下，因为什么也没有看见。弗洛伊德却因神经症患者的经验而早有准备：他在这里看见了某种东西，看出“替代发生了”这项事实值得停下来考察。

我在这里必须稍稍加快脚步，请你们注意这项名字遗忘分析的整套布局。我们也可以按 lapsus 一词“掉落”的意义，把这项名字的掉落称作一次口误 / 失落。

全部分析都围绕可以称为“转喻式近似”的东西组织起来。为什么？因为首先重新浮现的是替代名字：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博尔特拉菲奥（Boltraffio）。弗洛伊德怎样向我们表明，他以转喻方式理解这些名字？

我们将在这里把握它；我绕道分析一次遗忘，正是为了这一点。这些名字出现在被遗忘的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位置上，属于一种形成；但它同样不是替代形成，而是组合形成。

在弗洛伊德对这个案例所作的分析中，西尼奥雷利、博尔特拉菲奥与波提切利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可见的关系，只有完全依赖于这些能指现象的间接关系。

先来看弗洛伊德怎样说明波提切利；我暂且严格依照他的说法。必须说，这是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相关的形成与变形机制所作过的最清楚的演示之一，在清晰度上无可挑剔。只是为了把我的讲述说明白，我不得不以一种间接方式呈现它，先说：“以下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容。”

弗洛伊德的说法凭自身严密性而不可回避；无论如何，他说的属于如下秩序：

- 波提切利（BOTTICELLI）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的“SIGNOR”被遗忘以后，末尾一半“ELLI”作为不完整的残余保留下来；

- “Bo”则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e-Herzégovine）受到删截后的残余；与此同时，“Herr”遭到了压抑；

- 博尔特拉菲奥（Boltraffio）同样如此：对“Herr”的同一项压抑，使它把黑塞哥维那留下的“Bo”同特拉沃伊（Travoï）联结起来。特拉沃伊是这趟旅行先前刚经过的一个地点；弗洛伊德在那里得知，自己一位患者因性无能而自杀。

这也就是此前他同火车上那个人交谈时刚刚提到的同一项内容。火车行驶在拉古萨与黑塞哥维那之间；对方让他想起那些土耳其人、那些和善的穆斯林：医生如果没有成功治好他们，他们就会说：

“Herr！（先生！）我们知道您已经尽了全力；不过……”

这个“Herr”有自身的分量与显著重音，也就是某种处在可说之物极限上的东西；这个绝对的 “Herr” 就是死亡。正如拉罗什富科所说，死

亡“同太阳一样，不能被人直视”；事实上，弗洛伊德也同别人一样无法直视它。于是，死亡一方面通过下列东西向他呈现自身：

- 他的医生职能；
- 另一方面，还通过一项同样显然在场的联结。于是，它带上了完全个人性的重音。

在这里，文本毫无疑问地把死亡同某种紧密关乎性能力的东西联结起来。这项联结很可能并不只存在于对象中，也就是并不只存在于患者自杀向弗洛伊德呈现的东西中；它无疑走得更远。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找到的一切都只是对象的转喻废墟——它们围绕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一纯粹的能指组合展开。这是隐藏在前来运作的各个特殊要素之后、也隐藏在紧邻过去之后的那个对象的转喻废墟：绝对的“Herr”，即死亡。正因为这个绝对的 Herr 转往别处、被抹除、后退并遭到推拒，严格说来被 unterdrückt（压下），这里才出现了弗洛伊德以含混方式使用的两个词。

这个 unterdrückt，我已经替你们译作“落入底层 / 幕后”：在转喻对象层面，“Herr” 从这里溜走了；理由很充分——经过那些谈话，它有变得过度在场的危险。于是，我们以替代物（Ersatz）的形式重新找到转喻对象的碎片与废墟，也就是这个“Bo”；它前来同名字的另一片废墟——此刻受到压抑的“ELLI”——组合，并在另一个被给出的替代名字中出现。

这就是转喻层面留给我们的痕迹与指标；它让我们能够在话语中重新找到现象的链条，也就是在分析中所谓自由联想所处的点上，重新找到仍然能够被呈现的东西。自由联想使我们能够追踪无意识现象。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我们找到这些痕迹的地方，无论 SIGNORELLI 还是 “SIGNOR”，都从来不是破碎的转喻对象的碎片。它既然是转喻性的，就已经破碎了。语言秩序中发生的一切，总是已经完成。转喻对象之所以早已如此破碎，是因为它作为转喻对象，本来就只是自己所代表现实的一个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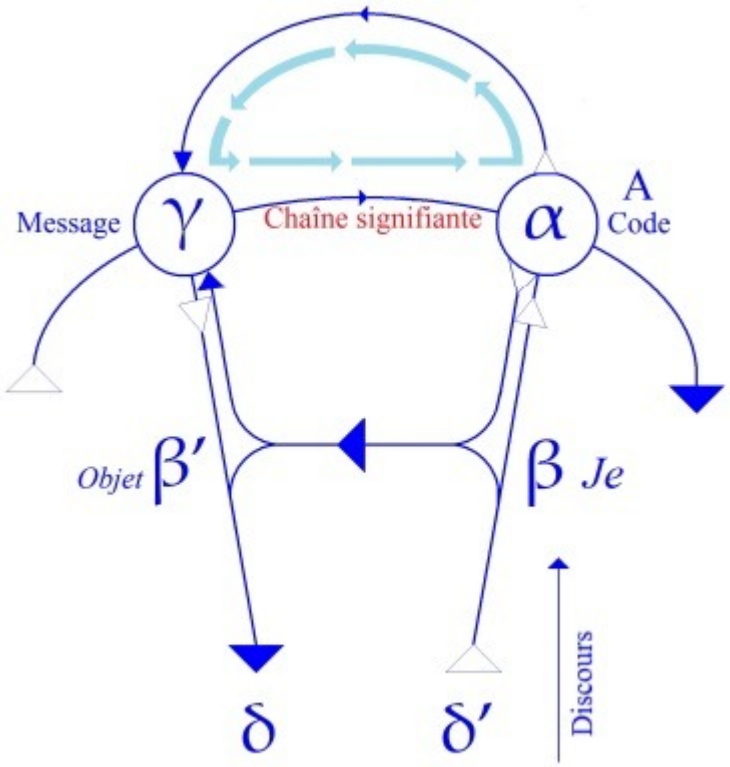
如果“SIGNOR”无法被召回，如果正是它使弗洛伊德找不到 SIGNORELLI 这个名字，那是因为它牵涉其中。它显然以间接方式牵涉其中：对弗洛伊德来说，“Herr” 曾在一个格外显著的时刻被实际说出，并能在那一刻承担“绝对 Herr”的功能，代表当时被 unterdrückt（压下）的死亡；而 “Herr” 又恰好可以直接译为 “SIGNOR”。

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替代层面，因为替代是隐喻行为得以建立的分节与能指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替代就是隐喻。我在所有这些道路上教你们作分节性的推进，恰恰不是为了让你们不断作出语言滥用。我说隐喻发生在替代层面，意思是：替代是能指分节的一种可能性；在替代可能发生的位置，隐喻以创造所指的功能发挥作用。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同样，转喻与组合也是两件不同的事。我顺便把这一点说清，因为所谓语言滥用正从这些不作区分之处潜入。用逻辑—数学术语说，它的典型特征是：当一个集合或子集只有一个元素时，不应把这个集合或子集同那个特殊元素混为一谈。这一点可以送给去年批评我那些 α、β、γ、δ 故事的人。

所以，让我们回到“SIGNOR”与“Herr”层面发生的事情：它就像一切翻译中发生的事情一样简单。这里的替代联结，是一种叫作“异名关系”的替代。在语言现象包含多个语言系统、因而必须作比较的条件下，把一个词翻成外语词，在替代行为层面就叫“异名替代”。你们会说，这项异名替代并不是隐喻。我同意；我只需要它是一项替代。

我只是在跟随你们阅读文本时不得不承认的东西。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从自己的知识中确切得出这一点：你们应当知道自己已经知道它。何况我并无创新；只要你们接受弗洛伊德的文本，就必须接受这一切。



凭这些，我已经足以告诉你们：

- 如果“HERR”从这边溜走［$\gamma \rightarrow \beta'$］；

- 那么箭头方向表明，“SIGNOR”从另一边溜走［$\gamma \rightarrow \alpha$］。

它不仅从这里溜走；在我以后回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承认，它从此在那里开始循环。也就是说，它像一只球一样在代码与讯息之间被来回传递，在某种东西中兜圈子。请回想，我过去曾让你们隐约看见：遗忘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析性回忆，可能同机器的存储器、同机器记忆中的东西具有极近亲缘——也就是“某样东西不断兜圈，直到重新出现”、直到人们需要它；它必须兜圈，才能构成记忆。

机器的存储器无法以别的方式实现。这一点非常奇特地应用在如下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把“SIGNOR”设想为在代码与讯息之间无限循环，直到它被重新找到，那么你们同时就会看见，我们能够在两者之间确立怎样一层细微差别：

- 一边是 unterdrückt（被压下）；

- 另一边是 Verdrängt（被压抑）。

这里的 unterdrückt 只须一次完成，而且发生在存在无法下降抵达的条件中，也就是发生在自身必死条件的层面。另一边显然涉及不同的事情：如果某项东西被维持在回路中，却在一段时间内无法重新进入，我们就必须同弗洛伊德一样承认，存在一股特殊力量把它容纳并保持在那里，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压抑（Verdrängung）。

不过，在指出我围绕这个确切而特殊的问题想走向何处以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尽管这里确实只有替代，也同样存在隐喻；每当发生替代，就会产生或诱发隐喻效应。

对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说“SIGNOR”与说“HERR”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甚至要进一步说：我们的双语患者，或仅仅懂得一门外语的患者，在某个时刻有话要说而改用另一门语言说出来，情形会完全不同。

请你们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总是方便得多。患者从一种语域切换到另一种，从来不会毫无理由。如果他真正通晓多种语言，这有一种意义；如果他不完全熟悉自己援引的语言，自然有另一种意义；如果他天生双语，也不会是同一种意义。但无论哪种情形，切换都有意义。无论如何，暂且说，在这里用“SIGNOR”替代“HERR”并不是隐喻，只是异名替代。

我再次谈到它，是为了告诉你们：在这个场合，“SIGNOR” 同它连接的其余语境恰成反差。这个语境就是 SIGNORELLI，也就是奥尔维耶托的壁画；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说，它从历史角度召唤出“末后之事”。这幅壁画恰恰是对死亡这一无法面对的现实所作最美的加工。

正是通过讲述关于最终归宿的一千则虚构——这里的“虚构”取其最真实的意义——我们才对死亡进行隐喻化、驯服它，并把这场同死亡的对峙纳入语言。因此很清楚，“SIGNOR”既然连接到 SIGNORELLI 的语境，就确实代表一项隐喻。于是，我们抵达了如下位置：我们正在接近某种东西，它让我们能够把 Witz 现象、在发生点上对

“famillionnaire” 的积极生产，与一次口误、一个洞的现象逐点重新套合，因为我们为它们找到了共同的拓扑位置。

我还可以另取一个例子，重新为你们作一遍演示；也可以给你们留一项作业，请你们参照弗洛伊德接着举出的例子：他的一位谈话者试图引用如下拉丁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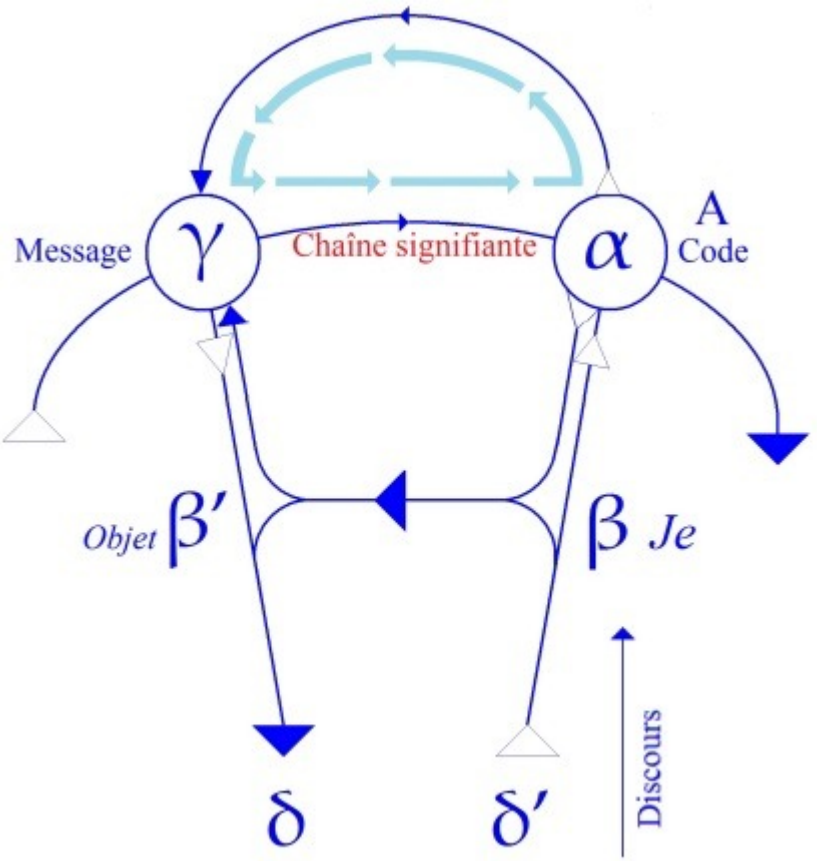
“Exoriare ex nostris ossibus ultor!”[注3]

> [注3] 完整诗句为“Exoriare 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愿有一位复仇者从我们的尸骨中兴起），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四第 625 行；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第 2 章引用。

这位谈话者稍稍重排了词序，因为完整句中的“ex”位于“nostris”与“ossibus”之间；同时，他漏掉了韵律上不可或缺的第二个词“aliquis”，所以始终无法让“aliquis”出现。只有把这个例子放回同一张格栅、同一副骨架，并看到它的两个层面，你们才能真正理解：

- 一个是组合层面，其中有一个特殊点，转喻对象本身就在这里产生；
- 另一个是替代层面，其中同样有一个特殊点：话语这条链与处在纯粹、基本状态的能指链在这里相遇，并构成讯息。

我们已经看到，“SIGNOR” 在讯息—代码回路［$\gamma \rightarrow \alpha$］中受到压抑；“HERR”则在话语层面被 unterdrückt（压下），因为先前的话语捕获了这个 “Herr”。让你们重新踏上失落能指踪迹的东西，就是对象的转喻废墟。




这就是弗洛伊德对名字遗忘例子的分析交给我们的东西。由此，我们对“famillionnaire”的理解会变得更清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famillionnaire”本身包含某种歧义，同症状的产生完全属于同一秩序。

如果它可以放回并叠合到一种语言症状——名字遗忘——的能指经济中所发生的事情上，我们就必须在它自身的层面找到某种补充，补足我刚才让你们听见的双重功能：

- 一是它朝向意义的目标功能；
- 二是它那项令人震动、令人不安的新词功能；它朝向某种可以称为“对象的溶解”的东西。此时，不再只是“他让我作为平等者坐在身边，以一种完全 famillionnaire 的方式”，而是有某种东西从中涌现出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那个 famillionnaire”。它成了一个幻想而可笑的人物，近似某种幻想诗歌的创造：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介于“fourmilionnaire”（蚁狮—百万富翁）与“千足虫”之间的东西，一种 Myrmeleon（蚁狮）或类似生物；它同时又是一类可想象的人形，在事物缝隙中穿行、生活和生长。

甚至不必走得那么远，这个词也可能进入语言，就像近来法语中一个“respectueuse”（恭顺女子）可以用来指一个妓女。这类创造具有自身价值，因为它把我们带入此前从未探索的东西；它们使某种可以称为“语言存在”的东西涌现。但“语言存在”同样就是一种存在本身，而且会越来越趋向化身。

在我看来，“famillionnaire”也确实发挥过、或已经发挥了足够多的作用，不只在诗人的想象中如此，在历史中也是如此。我无须向你们提示，许多东西甚至比这个 “famillionnaire” 更贴近我们。

纪德在《解缚的普罗米修斯》[注4]中，让整篇故事围绕一个并非真正神祇、而是机器和银行家的宙斯旋转；他把宙斯称作“Miglionnaire”——以后我会向你们说明，这个东西在弗洛伊德的机

智语创造中具有什么根本功能。人们不知道，纪德的“Miglionnaire”应当按意大利语还是法语发音；我认为应按意大利语发音。总之，如果我们俯身察看 “famillionnaire”，就会沿我向你们指出的方向看到某种东西；海涅的文本此刻尚未抵达这个方向，因为海涅根本没有让这个词取得名词状态下的自由与独立。刚才我把它译作“完全是 famillionnairement 地”，正是为了向你们指出，我们仍停留在副词层面。

> [注4] 安德烈·纪德：《解缚的普罗米修斯》，伽利玛出版社，Blanche 丛书，1925 年。

既然人甚至可以玩弄词语，围绕“存在的方式”（manière d’être）向语言提出要求，那么把这个说法从中切开，你们就会看见“存在的方式”同我刚才指出的方向——“一种存在”（une sorte d’être）——之间的差别。我们还没有走到后者，但你们可以看出二者彼此连续。海涅停留在“存在的方式”层面；他自己翻译这个词时也特意没有译成一种完全“famillionnaire” 的东西，而像我刚才一样译成“完全是 famillionnairement 地”。

这个“完全是 famillionnairement 地”承载着什么？即使我们完全没有抵达那种诗性存在，它仍承载着某种格外丰厚、群聚涌动的东西；它像转喻分解层面发生的事情一样繁衍不息。

海涅的这项创造值得被放回原文，也就是放回《卢卡浴场》的文本。希尔施·亚辛特同克里斯托福罗·迪·贡佩利诺男爵（Christophoro di Gumpelino）实际生活在一种熟稔关系中；男爵已经成为一位十分时髦的人物，对漂亮女士们大献各种殷勤。除此以外，还有希尔施·亚辛特紧跟在他身后那种神奇而惊人的熟稔。

这个人物充当寄生者、仆从、佣人和跑腿者的功能，突然向我们提示了“famillionnaire”的另一种可能分解。暂且不说这个词背后，海涅此时交给我们的那位漫画式银行家的生活中，女人发挥着怎样令人悲哀而心碎的功能；可以肯定，成功具有使人饥饿的一面。这里的饥饿已不再是 auri sacra fames（神圣的黄金饥渴）[注5]，而是这样一种饥饿：

> [注5] “auri sacra fames”，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三第 57 行；原注释义为“神圣的黄金渴望”。

要去满足某样直到他的人生升入最高圈层以前一直遭到拒绝的东西。

这会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画出“fat-millionnaire”（傻瓜—百万富翁）这个词的可能分解与意义。“fat-millionnaire”同时是希尔施·亚辛特与克里斯托福罗·迪·贡佩利诺侯爵，又远不止二者；因为它背后还有海涅一生中的全部关系，以及他同罗斯柴尔德家族那种格外“famillionnaire”的关系。

重要的是，你们要在这则机智语本身中看见隐喻创造的两个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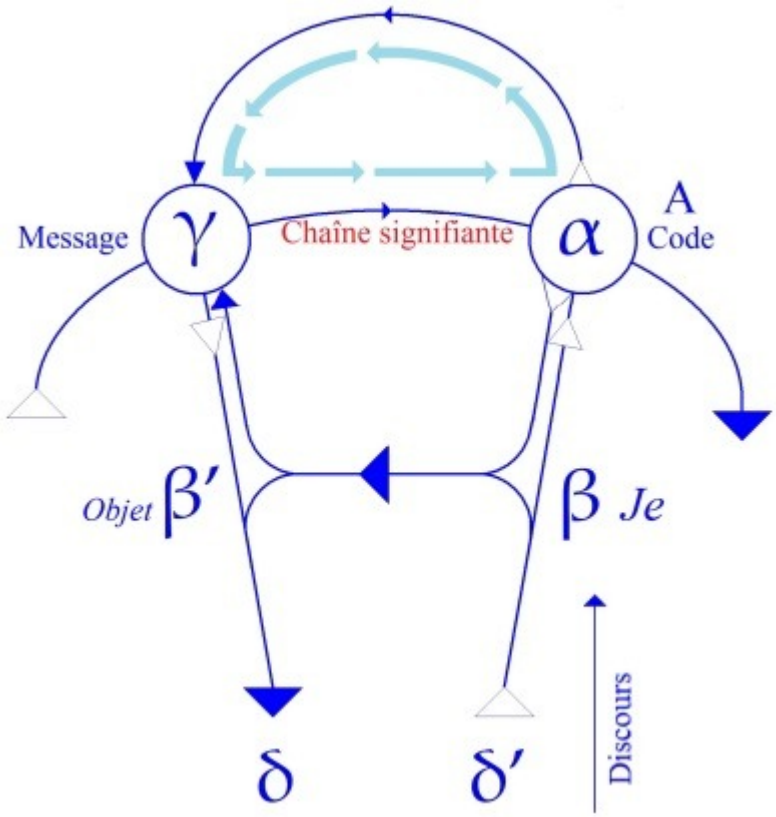
- 一个朝向意义：这个词携带意义、触动人心，具有丰富的心理意指；它当场命中目标，并凭自身才华把我们留在诗性创造的边缘；
- 另一个则像它的反面，不一定立刻被人注意：凭借可以在这里无限扩展的种种组合，这个词让某个对象周围在此场合繁生的全部需要群聚涌动起来。

我刚才提到 fames（饥饿）；这里还可以有 fama（名声），也就是追逼希尔施·亚辛特主人这个人物的显赫与声名需要；还可以有这项奴

仆式熟稔关系（familiarité）的根本卑劣（infamie）。在《卢卡浴场》那一幕中，它最终导致希尔施·亚辛特把自己秘制的一剂泻药交给主人；男爵终于收到心爱女士的字条，本来可以在另一种处境中达成最高愿望，却恰好在这一刻坠入腹绞痛的折磨。

可以说，这场庞大的滑稽戏给出了这项卑劣熟稔关系的“底层 / 幕后”。它真正赋予 “famillionnaire” 这项机智语形成以分量、意义、联结、正反两面、隐喻面与转喻面。然而，这仍不是它的本质；因为如今我们已经看到它的两面及其来龙去脉，而“famillionnaire”的意义创造还意味着一项废余以及某种受到压抑的东西。

这必然是海涅这一边的某种东西；它会像刚才的“SIGNOR”一样，开始在代码与讯息之间循环。




另一方面，在转喻性的东西［$\beta'$］这一边，还有全部这些意义的落屑：它们是围绕 famillionnaire 一词的创造产生的所有火花与飞溅，构成它的辐射与分量，也构成它对我们的文学价值。尽管如此，唯一重要的仍是现象中心，也就是能指创造层面发生的事情；使它成为一则诙谐的，正是这个中心，而不是周围产生的全部东西。

现象的重心功能、使它取得重音与分量的东西，必须在现象中心本身寻找，也就是：

- 一方面，在能指的接合层面；
- 另一方面，正如我已经指出，在大他者对这项创造本身所给予的认可层面。大他者把能指价值赋予这项能指创造本身，也就是相对于能指创造现象赋予它能指价值。

诙谐同单纯现象——例如同症状关系——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诙谐本身存在于向第二项功能的过渡之中。

不过，如果没有我今天刚向你们讲述的这一切——也就是在作为根本现象的能指接合层面发生的事情，以及这项接合因参与隐喻与转喻这些能指的根本维度而展开的东西——就不可能有任何认可，也不可能对诙谐作出任何其他区分。

例如：

- 不可能把它同滑稽区分开；
- 也不可能把它同玩笑区分开；
- 还不可能把它同单纯的笑现象区分开。

要理解作为能指现象的诙谐涉及什么，我们就必须在能指层面把它的各个侧面、特殊性、联结和来龙去脉孤立出来。

至于处在如此高级能指加工层面的 $S$，弗洛伊德竟停下来把它看作无意识形成的一个特殊例子——这同样吸引着我们。你们也应当开始隐约看出它的重要性：围绕这一点，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它怎样让我们能够严密推进到一个本身属于精神病理学的现象，也就是口误。

# 第3课 · 1957年11月20日

|----|

我们已经从诙谐这扇门走了进来。上次，我们开始分析其中的首要例子：弗洛伊德以“famillionnaire”这则机智语的形式把它嵌合起来，同时把它归给希尔施·亚辛特，也就是归给这项充满意义的诗性创造。

弗洛伊德在诗性创造的背景上选取自己的首要例子，绝非偶然；而我们自己也发现——这种事其实很常见——这个首要例子格外适合表现并证明我们想在这里证明的东西。

你们已经看到，这无疑把我们带到能指分节层面，去分析诙谐所涉及的心理现象。即使这项分析令你们感兴趣——我希望你们中大多数人如此——你们也很容易想象，它同样可能显得令人迷惑。

我的意思是，这个令人惊讶、使精神迷失的东西，恰恰也是我想同你们一起重新处理分析经验的关键；它涉及主体的位置，我甚至几乎要说，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主体的存在。曾有一个人围绕这一点向我提问；他绝不是不了解问题的人，也绝不是不了解我试图为此带来什么的人。他问我：

“可是，这样一来主体变成了什么？他在哪里？”

如果问题来自哲学家，回答就很容易；向我提问的恰好是一位哲学家，当时我正在哲学学会讲话。我本来很想回答，不过在这一点上，

我也很愿意把问题反过来交还给你们，说我正是要把发言权留给哲学家。毕竟，不能把全部工作都留给我一个人。

从弗洛伊德经验出发，主体概念的阐发无疑需要重新审订。如果其中必须有所改变，我们同样不应惊讶。换句话说，如果弗洛伊德带来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我们是否早就应当料到：人们——尤其精神分析家——反而会更加顽强地依附于某种主体概念？这个概念化身在一种把自我简单当作主体的思考方式中，不过是重新落入关于主体问题的“语法混淆”：它把自我等同于一种综合能力，而经验中绝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支撑这种能力。

甚至可以说，我们根本不必等到弗洛伊德经验，也不必诉诸它。只须真诚审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足以隐约看出，这项所谓的“综合能力”所遭遇的远不只是挫折；说真的，除了虚构以外，经验中再没有什么比下列事实更寻常：不只是我们动机的不连贯，甚至还有我们感到这些动机深深缺乏根据，感到它们从根本上异化。

如果弗洛伊德带给我们一个在彼岸运作的主体概念，向我们显示这个在我们之中如此难以把握的主体的动力与行动，那么有一件事原本早就应当吸引注意：这个主体把一种隐藏的统一、一种秘密的统一引入我们在最日常经验中看到的东西——我们相对于自身动机的深刻分裂、深刻碎裂与深刻异化；而这个主体竟是另一个主体。

它是否只是一种分身，一个某些人所谓“坏自我”的主体——尤其因为它确实暗藏许多惊人的倾向？或者它只是“另一个自我”？又或者，像人们还可能以为我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问题真是这样吗？

它是否只是一个替身，只是另一个可以被我们设想为同经验中的自我具有相同结构的东西？

这就是问题，也是我们今年为什么在“无意识的形成”这一标题与层面上处理它。这个已经在场的问题无疑提供了一项回答：它的结构并不相同。在这个经验自我之中，有某种具有自身法则的东西呈现出来。总之，这些形成有一套组织；它不只有一种风格，还有一种特殊结构。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的层面处理并拆解这项结构：

- 在症状层面；
- 在梦的层面；
- 在失败行为层面；
- 在诙谐层面。

他认出，这项结构是独一而同质的。弗洛伊德在诙谐层面向我们阐述的一切，其关键——我之所以选择它作为入口，原因正在这里——都奠立在这项根本论证上：把诙谐视为无意识的一项显现。

也就是说，诙谐按照我们在梦中发现的同样法则得到结构化与组织。弗洛伊德在诙谐结构中重新提起、逐一列举、明确阐述并辨认这些法则：

- 凝缩的法则；
- 移置的法则。

首先且根本地说，还有另一项东西附着其上：弗洛伊德也在其中辨认出我在文章末尾为翻译他而称作“对场景安排之要求的顾及”的东西，并把它作为第三项要素引入。不过，怎样命名并不重要；他的贡献之关键、分析之钥匙，在于辨认出共同的结构法则。正是由此，人们才认出一个过程——用他的话说——已经被吸入无意识。按照这些法则与类型得到结构化的东西，就是谈论无意识时所涉及的东西。

发生了什么？在我教给你们的层面上，我们如今——也就是弗洛伊德以后——已经能够认出一件事情；它如此令人惊讶，因此也格外具有证明力：这些法则、这项无意识结构、一个现象之所以被认作属于无意识形成的根据，同语言学分析让我们辨认出的、由能指组合生成意义的根本形成方式严格相同，彼此覆盖；我甚至还要说，它们完全而无遗漏地重合。

能指一词从语言学演进的某个时刻起取得完整意义；在那个时刻，能指要素的概念被孤立出来，而这在具体历史中又同“音位”概念的形成密切相连。当然，能指概念并不局限于音位；它使我们能够在某种基本语域上把握语言，并且可以得到双重定义：

- 一方面，它是一条历时的链；
- 另一方面，这条链内部始终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共时意义上的永久替代可能性。

在根本、基本层面把握能指功能，就是在这项功能中辨认出一种原初力量；我们恰好可以在这里定位：

- 某种叫作意义的东西怎样生成；
- 以及某种本身蕴含丰富心理学后果的东西。这项东西在弗洛伊德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那个语言学领域与分析自身领域的接合点上得到某种补充；我们甚至不必自行把道路和研究推进得更远，也不必把沟槽挖得更深。

问题在于向我们表明：这些“心理效应”与“意义生成效应”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恰好同弗洛伊德向我们显示的无意识形成重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握在所谓“人的位置”中一直受到省略的某种东西，确切说就是如下紧密关系：对人而言，存在着一些同生物性对象相比，在异质性、多样性与可变性上都真正令人惊讶的对象。

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我们本来可以期待有某种与人的存在相应的对象世界；然而，人类对象世界却呈现出某种独特事物：它具有特定风格，极端多样、过度丰茂，同时又无法被把握为生物性对象。在当前这个接合点上，这件事必须同语言现象对人的征服与下摄发生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联。

当然，人们并非从未看到这一点；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受到了遮蔽。之所以受遮蔽，是因为在话语、具体话语层面可以把握的东西，相对于这项意义生成总处在歧义位置。事实上，这门语言已经转向对象，而对象本身包含一些由语言自身的创造所赋予它们的东西。这早已可以成为整套传统、甚至一套哲学修辞的对象；后者在最一般的判断批判意义上提问：这门语言价值何在？这些连接同它们似

乎通向、甚至自称反映的连接——也就是实在界的连接——究竟有什么关系？

一项批判传统与哲学传统确实抵达了这里；我们可以把康德界定为它的尖端与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已经能够把康德的批判解释、思考为对一切实在最深刻的质疑，因为实在受到先验范畴——不仅感性论的范畴，也包括逻辑范畴——的支配。这构成一个枢轴点，人类思考从这里重新出发，去找回按那种方式尚未被察觉的东西：

- 先前，问题被放在话语、逻辑话语层面，放在某种意向圆环的句法同实在连接之间的对应层面；这个圆环在每一个句子中闭合；
- 如今，问题要从这部逻辑话语批判之书的下方与横向重新拾起；
- 要在言说始终可能生成新意义的这条创造性链中，重新把握言说的行动：最明显的是通过隐喻；转喻的路径则一直受到深刻遮蔽，直到非常晚近的时代才显现——到适当时候，我会向你们解释原因。

这段导论已经足够困难，所以我要回到“famillionnaire”的例子，努力把它补全。我们已经得出一个概念：在一段具有明确意图、主体把自己呈现为想要表达某样东西的话语过程中，会产生某种超出其意愿的东西；它以意外、悖论与丑闻的面貌呈现。

这项新形成所具有的特征，完全不是某种绊倒或失败行为的负面特征——尽管它本来可能如此；毕竟，我已经在单纯口误的秩序中向你们展示过一些等价物、一些同它格外相像的东西。恰恰相反，在这次意外发生的条件下，它得到记录并被提升为一个具有意指作用的现象：意义恰好在能指新形成层面得到生成。一些能指发生了某种塌缩；正

如弗洛伊德所说，它们彼此压缩、相互冲压，而这就创造出该项意指。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它的细微层次与谜——它出现在哪两项之间？一边是严格隐喻性的“存在方式”的召唤：

“他以一种完全 famillionnaire 的方式对待我。”

……也就是这项对“存在方式”的召唤；另一边则是这个“语言存在”。它几乎要取得一种奇特的生命，我已经试着用“famillionnaire”的幽灵在你们面前晃动过这种生命：

- “那个 famillionnaire”进入世界，代表某样极可能为我们取得现实与分量的东西；它的现实与分量甚至远比百万富翁那个较为褪色的形象更为恒定；

- 我也已经向你们表明，它在现实存在中包含何等赋予生命的东西，足以真正代表某个历史时代的特征人物。我还指出，发明它的不只海涅；我谈过纪德的《解缚的普罗米修斯》及其中的 Miglionnaire。

在纪德《解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创造上停留片刻，会很有意思。那部作品里的百万富翁是银行家宙斯，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人物的加工更令人惊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纪德作品留给我们的记忆中，它似乎被《帕吕德》不可思议的光辉遮住了；其实前者同后者构成某种对应与分身，两部作品涉及的是同一个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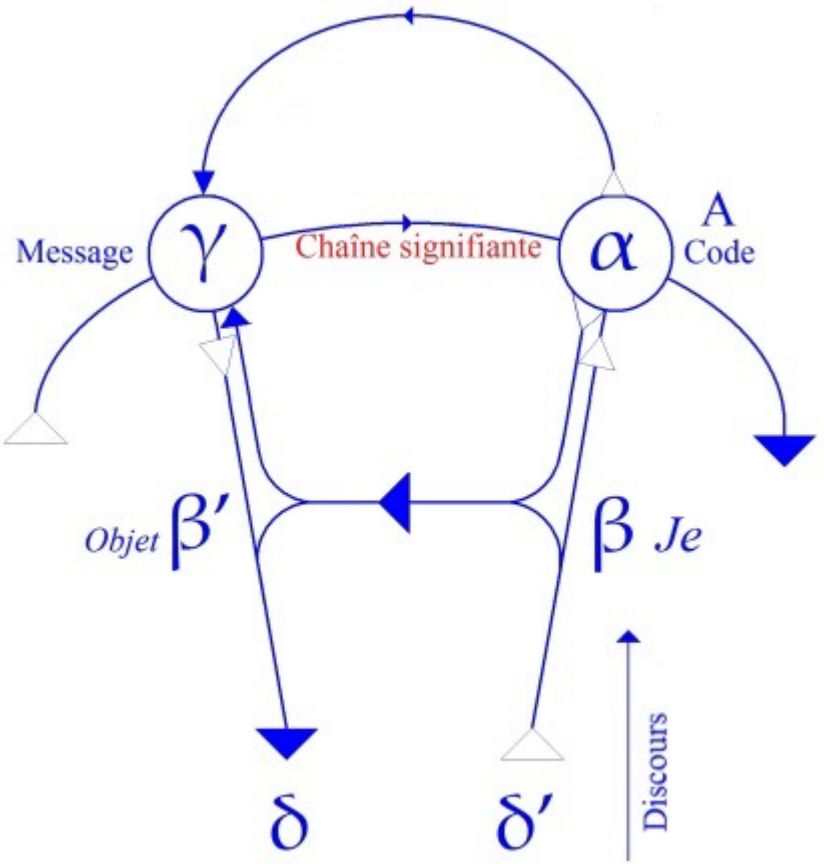
许多特征使二者相互重合。无论如何，那位百万富翁对同类采取一些奇特行为，因为我们正是从这里看见“无缘无故的行动”这个观念产生。

银行家宙斯无法同任何他者进行真正、本真的交换——可以说，他在这里被等同于绝对权力，等同于金钱中“纯能指”的一面；这甚至质疑一切可能的、有意义的交换能否存在。为了走出自己的孤独，他找不到别的办法，只能照纪德所写的那样行动：

- 他走到街上，一只手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五百法郎钞票——这在当时颇有分量；可以这样说，另一只手则拿着一记耳光；

- 他让信封掉在地上；某个好心为他捡起信封的人，会被他要求在信封上写一个名字。随后他给此人一记耳光——他毕竟是宙斯，这记耳光势大无比，把人打得头晕受伤——接着溜走，把信封内容寄给由刚才那个遭受粗暴对待的人写下名字的对象。

于是，他让自己处在一种没有亲自作出任何选择的姿态中；可以说，他用一项完全不归功于自身的赠礼，补偿一项无缘无故的恶行，因为选择根本不出自他。仿佛他的行动要恢复交换回路；可他自己无论如何、从任何角度都无法进入这个回路，只能以这种破门而入的方式参与，生成一项他丝毫不参与的债。小说后续情节都由此展开：两个人物再也无法接合彼此所欠的东西；一个几乎被弄瞎一只眼，另一个最终死去。这就是小说的全部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则极有教益、极有道德意味的故事，可以用在我们试图显示的层面上。




于是，海涅处在如下位置：他把这个人物创造为背景，却又在人物内部用“famillionnaire”这个能指使双重维度涌现：

- 隐喻创造；
- 以及一种新的转喻对象：“那个 famillionnaire”。总之，我们可以把它们的位置分别放在这里［$\gamma$ 处的隐喻创造］与这里［$\beta'$ 处的一种转喻对象］。

上次我向你们表明，为了设想名为“famillionnaire”的能指创造怎样存在，我们可以在这里［$\beta'$］重新找到一切通常由隐喻创造映照在对象上产生的碎片与废余——尽管注意力自然没有被吸引到这一边。也就是一切底层能指、一切可以把 “famillionnaire” 拆成的能指微粒：femme（女人）、fames（饥饿）、fama（名声）、infamie（卑劣），以及你们想要的一切，还有 famulus（仆从）——希尔施·亚辛特对他那位漫画式老板克里斯托福罗·迪·贡佩利诺来说，确实就是这一切。

每当我们面对一项作为这种形成的无意识形成时，都必须在这个位置［$\beta'$］系统寻找我所谓“对象的转喻废墟”。经验给出的理由十分清楚：当隐喻创造没有成功时，这些废墟自然显得格外重要。我的意思是，当隐喻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时——就像我向你们展示的名字遗忘案例——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遭到遗忘；为了重新找到隐喻层面那处凹陷、那个洞的痕迹，转喻废墟就在这里取得全部重要性。

在“Herr”一词消失的层面上，正是它得以孤立出来的整个转喻语境中的某样东西——也就是“Bosnie-**Herz**égovine”这一语境——让我们能够恢复它；

这一事实在这里取得了全部重要性。

不过，让我们回到“famillionnaire”。这个“famillionnaire”是在讯息层面产生的。

我已经请你们注意：我们必须在“famillionnaire”的层面找到一种转喻对应，呼应西尼奥雷利案例中在名字遗忘层面产生的悖论形成。名字

遗忘中“SIGNOR”被变走或消失的情形，也必须在诙谐层面找到某种对应。

我们上次就停在这里。既然诙谐性的隐喻在这里获得成功，我们应当怎样设想并思考“famillionnaire”层面发生的事情？必定有某样相应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标出“残余”，也就是“隐喻创造的废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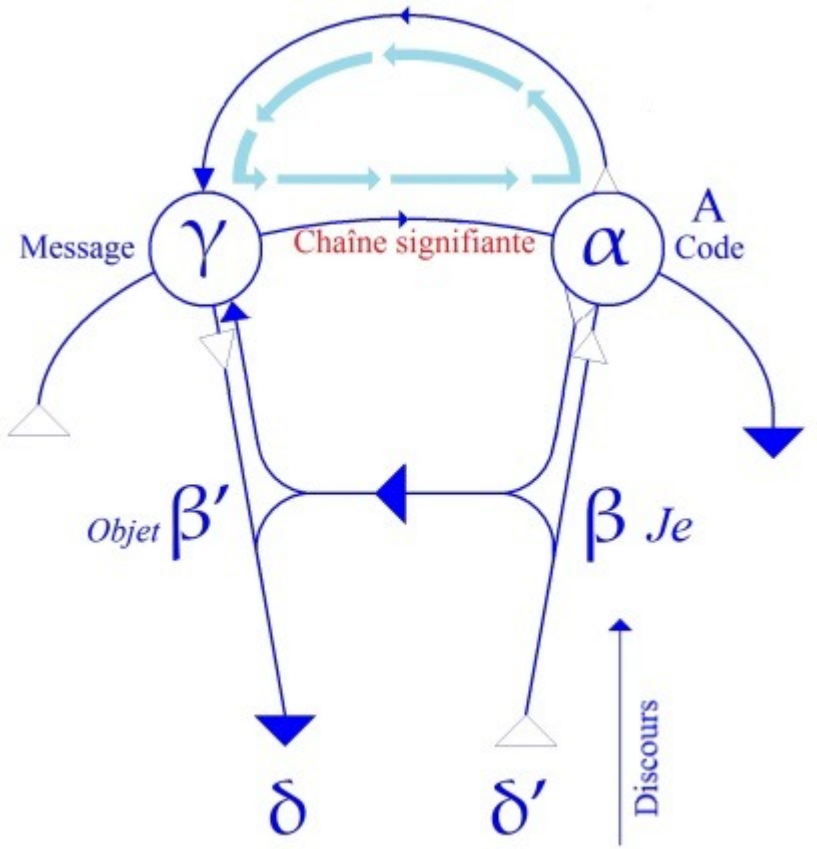
一个孩子会立刻说出来。只要我们不受实体化倾向迷惑——它总让我们把语言现象当成对象来操作——就会学着像数学家操作 $x$、$a$、$b$ 这些小符号一样，直接说出显而易见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去想它们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寻找的恰恰就是能指层面发生的事情。要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就不要去找它意味着什么。

非常清楚：

- 被抛出去的东西；
- 隐喻层面所欠缺的东西，即剩余；
- 退出的东西；
- 作为隐喻创造残余留下的东西；

……就是“familier”（熟悉、亲近的）一词。

既然“familier”没有出现，而“famillionnaire”来到它的位置，我们就必须认为 “familier” 已经去往某处，遭遇了我上次向你们指出的、留给 SIGNORELLI 中“SIGNOR”的同一种命运：它在无意识记忆中的某处继续自己的小小环形回路。


Message
γ
Chaîne signifiante
α
A
Code
Objet β′
β Je
δ
δ′
Discours

这个词就是“familier”。我们完全不会为此惊讶，理由很简单：在这个场合，“familier”恰好确实对应最通常意义上的压抑机制，也就是我们在某种东西上获得经验的那种压抑；这东西对应于：

- 一项过去的经验；
- 一项可以说是个人的经验；
- 一项早先的历史经验，它一直追溯到很远。到了那里，问题自然不再是希尔施·亚辛特本人的存在，而是其创造者海涅的存在。

如果“famillionnaire”在海涅的诗性创造中如此成功地绽放，我们无须知道他究竟在什么情形下找到它。或许是在约 1830 年间，他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见面以后，于一次注定孤独结束的巴黎夜间漫步中找到的；这位男爵把他作为平等者对待，而且方式完全是“famillionnaire”的。或许他当时就发明了它，而不是后来坐在桌边让它从笔下落出。不过，这无关紧要：他造出这样一项成功的创造，已经很好。

我在这里没有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在全书约三分之一处，分析完“famillionnaire”以后，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在所谓“诙谐的倾向”层面重新拾起这个例子；他在这项创造、这则诙谐的形成中辨认出某种东西，并把海涅的创造称为“巧妙的发明”。它在海涅过去的个人家庭关系中有对应物。这个“famillionnaire”对他实在很“熟悉”；因为在他虚构中所指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背后，还有另一个属于他家族的“famillionnaire”，也就是他的舅舅所罗门·海涅。

这个舅舅一生都在海涅的生活中扮演最压迫性的角色，对他极为恶劣。他不只拒绝给予海涅在任何具体层面都可能期待的东西；更进一步，他恰好处于“那个拒绝的人”的位置，在海涅生命中阻碍了其重大爱情的实现——海涅深爱自己的表妹，却恰恰无法同她结婚，根本原因完全是“famillionnaire”式的：舅舅是百万富翁，而他不是。

所以，海涅始终把实际上只是这个深受“百万性”标记的家庭死路之后果的事情视为背叛。可以说，这里同诙谐创造相关联的压抑中发挥主要能指功能的 “familier”，就是那个能指；在诗人、语言艺术家海涅的案例中，它向我们清楚显示，诙谐或诗性创造之下潜伏着个人意指。这项潜伏同词相连，而不是同海涅一生中持续积累的、关于不满以及他在面对一般女人时那种格外失衡位置的模糊意指相连。

如果这项东西在这里介入，就是通过“familier”这个能指本身。就所举的例子而言，除了显示意指同“familier”这个能指项本身的在场紧密相连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接近无意识的行动与作用。当然，这类观察也向我们表明：一旦走上把无意识中记录的一切经济都同能指组合相连的道路，它自然会把我们带得很远，带入一项并非 ad infinitum（无限延伸）、而是一直回溯到语言起源的回归。

我们必须认为，一切人类意指都曾在某个时刻由能指接合以隐喻方式生成。我必须说，这类思考绝非没有意义；考察能指的这段历史，我们总会学到许多东西。

我顺便作这项观察，只是因为此刻想到，可以借它说明如下辨认：在隐喻形成层面受到压抑的是 “famille”（家庭）一词。毕竟，除非读过弗洛伊德，或至少让自己在分析中思考的方式同阅读文本的方式之间

稍微保持一致，否则，人不会在“famillionnaire”这个词里想到“famille”。

我上次分析的“atterré”一词也是如此：

- “atterré”这项意义实现得越充分；
- 它越朝着 terreur（恐惧）的方向发展；
- terre（土地）就越受到回避；然而，在引入“atterré”这个隐喻词时，真正积极发挥作用的要素正是它。

同样，你们越朝“famillionnaire”的意义深入，越想到“那个famillionnaire”——也就是已经生成、甚至可以说已经变得超越的百万富翁，变成某种存在于现实存在之中的东西，而不再只是某类符号——作为创造“famillionnaire”时积极发挥作用的词项，“famille”本身就越趋向受压抑、被省略。

但如果你们像我一样，暂时重新在能指层面对“famille”这个词产生兴趣，也就是翻开利特雷词典——夏尔·沙塞先生[注1]告诉我们，马拉美的一切观念都从那里取来——就会看见另一件事。

> [注1] 夏尔·沙塞：《马拉美的钥匙》，欧比耶—蒙田出版社，1954 年。

最厉害的是，沙塞说得对；不过，他虽然在某个语境中说得对，也同自己的论敌一样被那个语境套住。他觉得自己撞开了一扇门；当然，他确实撞开了，因为那扇门原本没有打开。

如果人人都认真想过诗究竟是什么，发现马拉美必然对能指怀有强烈兴趣，实在不会有任何惊人之处。只不过，从来没有人真正处理过诗

究竟是什么：人们不是摇摆于某种关于比较的含糊泥泞理论，就是反过来援引某些不知所云的音乐术语，并借此解释马拉美那种所谓意义缺席，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 必定存在一种依据诗同能指的关系来界定诗的方式；
- 或许还存在一条稍微更严密的公式；一旦给出这条公式，马拉美最晦涩的十四行诗受到讨论，就远没有那么令人惊讶。

说到这里，我想将来不会有人发现，我的所有观念也都取自利特雷词典！

问题不在于我翻开了这本词典。不过，我确实翻开它，并且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也许有些人已经知道、但终究颇有意思的事：在 1881 年，法语“familial”（家庭的）还是一个新词。

我仔细查阅了几位后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可靠作者，由此把“familial”一词的出现定在 1865 年。这意味着，在那一年以前，法语中没有“familial” 这个形容词。为什么没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利特雷给它的定义归根到底是：同家庭有关，而且他说，是在政治科学层面有关。简言之，“familial” 远比其他语境更紧密地同“家庭津贴”之类的语境相连。

家庭在某个时刻被提取出来，人们才可能在一种引人关注的政治现实层面把它作为对象处理；确切说，这是因为家庭同主体不再处在完全相同的关系中，也不再发挥相同的结构化功能。在此以前，家庭一直以某种方式包含、嵌在主体话语的基础和根基本身之中，人们甚至不会想到把它孤立出来。只有当它被提升到一个抵抗性对象、一个需要

专门技术操作的对象的层面，“familial”这样一个同“famille”相应的简单形容词才会出现。

你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或许也会影响“famille”能指本身的用法。无论如何，这项观察还让我们看到：我刚才说海涅时代“famille”一词进入受压抑者回路，不能被认为同它在我们时代的作用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因为“familial”一词不只无法用于相同语境，甚至在海涅时代还不存在；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改变同“famille”一词相连的能指功能轴线。

这层细微差别在此不可忽略。正是由于一连串这样的忽略，我们才能想象自己像古代人的同时代人一样理解古代文本。然而，一切都预示着：对荷马作天真阅读，很可能同荷马的真实意义毫无对应；有人专门细致穷尽荷马词汇本身，试图大致恢复这些诗歌所涉及的意指维度，绝非毫无理由。

尽管如此，这些诗仍保留自己的意义；所谓荷马英雄的“精神世界”、即他们的意指世界，很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完全逃过我们，而且多少将永远逃过我们。正是在这里，能指同所指的距离让我们理解：诗的特征恰恰是一项格外精良的接合——一组能指让我们直到世纪末日仍能、甚至可能无限地赋予它们种种可信意义。［参见 1975—1976 年研讨班中乔伊斯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 “famillionnaire”。关于在自身语域与秩序中的诙谐创造现象，我想已经大致绕了一圈。这或许使我们能够更紧密地把握上周谈到的名字遗忘公式。

名字遗忘是什么？在这个场合，主体向大他者、向作为大他者的大他者本人提出了问题：“奥尔维耶托的壁画是谁画的？”可是，他什么也找不到。

我在这里请你们注意，我如此用心给出正确表述有何重要性。分析发现，他之所以无法唤起奥尔维耶托画家的名字，是因为“SIGNOR”缺失；你们可能由此以为，受到遗忘的是 “SIGNOR”。这并不正确。首先，他寻找的不是 “SIGNOR”，受到遗忘的是 SIGNORELLI；而“SIGNOR”是在找不到 SIGNORELLI 的位置所发生之事留下的、受到压抑的能指废余。

请仔细听清我这番话完全严密的性质。回忆起 SIGNORELLI 与回忆起“SIGNOR”绝不是同一件事。当你们把 SIGNORELLI 构成它所包含的统一体，也就是把它当作一位作者的专名、一个特殊名字的指称时，你们就不再想到“SIGNOR”。

“SIGNOR”之所以能从 SIGNORELLI 中被提取并孤立出来，是相对于隐喻自身的分解作用；也因为 SIGNORELLI 被卷入了一场最终导致名字遗忘的隐喻游戏，而分析让我们能够重构这场游戏。

分析让我们重构的，是“SIGNOR”与“Herr”在一项隐喻创造中的对应；这项创造瞄准“HERR”彼岸的意义，也就是“HERR”在弗洛伊德前往卡塔罗湾的小旅途中、同当时的旅伴交谈时取得的意义。“HERR”由此成为某种象征：弗洛伊德作为医生的掌控力在它面前失败；它是绝对主人，也就是他无法治愈的病痛，是那个尽管受到他照料仍然自杀的人；总而言之，是亲自威胁着弗洛伊德的死亡与无能。

SIGNORELLI 的这项碎裂在隐喻创造中发生，让我们确实作为要素重新找到的“SIGNOR”能够去往某处。不能说受到遗忘的是“SIGNOR”；受到遗忘的是 SIGNORELLI，而“SIGNOR”是我们在隐喻废余层面找到的东西，因为受压抑者就是这项能指废余。“SIGNOR”受到压抑，却没有被遗忘；它无须被遗忘，因为它在此以前并不存在。

它之所以如此容易碎裂并脱离 SIGNORELLI，是因为 SIGNORELLI 恰好属于一门对弗洛伊德而言的外语。只要你们有一些外语经验，就很容易亲自验证一个格外醒目的事实：人们远比在自己的语言中，更容易在外语中辨认出能指的构成要素。

开始学习一门语言时，你们会注意到词与词之间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关系，而这些在母语中会被完全略过。在自己的语言中，你们不会把词拆成词根与后缀来思考；学习外语时却会自然而然这样做。因此，外语词比母语中的任何词都更容易在自身要素和能指分解中被切碎并动用（原文在 usable / utilisable 之间有转录犹疑）[注]。

> [注] 此处转录写作 usable [utilisable ?]；译文保留“可磨损 / 可利用”的犹疑，不据上下文把它收束为单一词义。

这只是一个辅助过程的因素；同一过程也可以发生在母语词上。不过，弗洛伊德之所以从考察一个外语名字的遗忘开始，是因为它格外容易接近，也格外具有证明力。那么，在你们找不到 SIGNORELLI 这个名字的位置，究竟有什么？确切说，这意味着有人曾试图在这个位置作一项隐喻创造。名字遗忘——作为名字遗忘呈现的东西——正是在“famillionnaire”的位置得到判断的东西。假如海涅只是说：“他完全

把我当作平等者接待，完全……呃……呃……呃……”那就什么也不会出现。

这恰好就是弗洛伊德寻找 SIGNORELLI 这个名字时所处层面发生的事情：某种东西没有出来，没有得到创造；他却在那里寻找 SIGNORELLI，而且找错了地方。为什么？因为先前谈话使一项隐喻在他寻找 SIGNORELLI 的层面受到期待与召唤；它涉及某种注定要在弗洛伊德当时谈话的内容与他拒绝的东西——死亡——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东西。

当他的思想转向奥尔维耶托壁画时，涉及的正是这一点，也就是他本人所谓“末后之事”。可以说，末世论式的加工，是他处理自己思想中这个可憎、不可思的终点——这个他终究必须在其面前停下的东西——的唯一方式。死亡存在着：它限制他作为人的存在，也限制他作为医生的行动，还为他的全部思想设下一道绝对不可反驳的界限。

弗洛伊德拒绝一切末世论，除非以赞叹奥尔维耶托壁画的形式；正因为在把这些事情加工为“末后之事”的道路上，没有任何隐喻来到他那里，所以什么也没有出现。在他寻找壁画作者的位置——归根到底，问题正是作者，正是给作者命名——没有任何东西产生，因为没有任何隐喻成功；当时无法给 SIGNORELLI 提供任何等价物。SIGNORELLI 此刻取得了一项必然性，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单纯专名的能指形式受到召唤；它被要求像“atterré”中的词根“ter”那样进入游戏，也就是发生碎裂并受到省略。

“SIGNOR” 这个词项在某处存在，是弗洛伊德此刻召来帮助自己的失败隐喻之后果。因此，你们会看到我指出的、应当在转喻对象层面存

在的同样效应；这里的对象就是问题所涉、在“末后之事”上被表现并画出的对象。弗洛伊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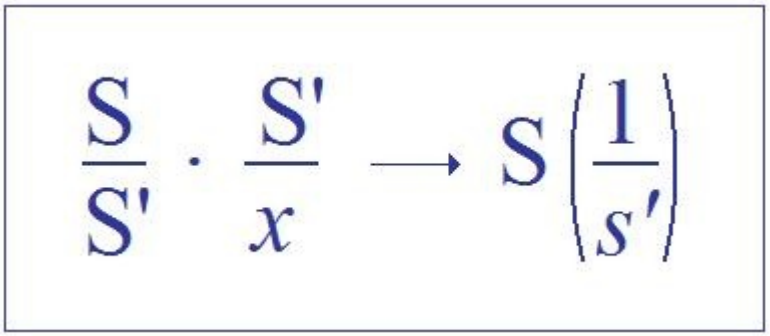
> “我不仅找不到 SIGNORELLI 这个名字，而且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清楚地记得、那样鲜明地看见奥尔维耶托壁画；而我，”他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想象的人。”

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够作出所有这些发现，很可能因为他对象征游戏远比对想象游戏更加开放、更易渗透。他本人也指出，记忆中的图像发生了强化：问题所涉对象、也就是画作，以更强烈的方式重新出现；甚至连 SIGNORELLI 本人的面孔都清晰呈现——他以那个时代画作中捐赠者、有时也是作者本人出现时的姿态画在其中。

SIGNORELLI 就在画中，而弗洛伊德把他看见了。因此，这并不是对对象的一种单纯、整体性的遗忘。恰恰相反，一些要素的复活与强化，同另一些要素、即象征层面能指要素的丧失之间存在关系。我们由此找到转喻对象层面所发生之事的标志，同时也可以把名字遗忘中发生的事情大致写成如下公式：

$$\frac{S(?)}{S'(\cancel{SIGNOR})} \cdot \frac{S'(\cancel{SIGNOR})}{s'(Herr)}$$

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隐喻公式：一个能指 $S$ 通过替代机制，取代另一个能指 $S'$：



能指 $S$ 对另一个能指 $S'$ 的这项替代产生什么后果？在 $S'$ 层面会发生意义变化：$S'$ 的意义——姑且写作 $s'$——变成我们称为小写 $s$ 的新意义；这个 $s$ 对应大写 $S$。

不过，说真的，为了不让歧义留在你们心中——你们可能以为这只涉及如下拓扑：小写 $s$ 是大写 $S$ 的意义，而 $S$ 必须先同 $S'$ 发生关系，小写 $s$ 才能仅仅以此身份产生我称作 $s''$ 的东西——我要强调：新意义的创造，才是隐喻的目的与运作。只要满足下列条件，隐喻就总是成功：

- 这项操作已经执行；
- 意义已经实现；
- 意义已经在主体中开始发挥作用；

……于是 $S$ 与 $S'$ 就像分数乘法公式中的同项一样，被约去并相互抵消。

“Atterré” 最终在实际使用中意指它对我们真正意指的东西——多少受到恐惧触动——时，就发生了这种约去。一边是 “atterré” 与 “abattu”：严格说来，两者差别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让前者替代后者；但充当中介的“ter”凭同音关系把恐惧带进来。于是，两处“ter”就可以约去。名字遗忘层面发生的现象属于同一秩序。

请你们理解，问题并不是 SIGNORELLI 这个名字的丧失，而是一个我在这里引入的 $x$；我们将学会认出并使用它。这个 $x$ 就是意义创造的召唤；以后，我们会在其他无意识形成的经济中重新找到它的位置。现在就告诉你们：它就是所谓“梦的欲望”层面发生的东西。我会说明我们怎样在那里重新找到它；而在这里，我们直接在弗洛伊德本应找到 SIGNORELLI 的位置看见了它。

他什么也找不到，并不只是因为 SIGNORELLI 消失了，而是因为在这个层面，他必须创造某种东西，来满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末后之事”。只要这个 $x$ 在场，某种隐喻形成就趋向产生。我们从这里看出这一点：“SIGNOR”一词出现在两个相对的能指项层面，两次取得 $S'$ 的价值；它正是以此身份作为“SIGNOR”遭到压抑。$x$ 的层面什么也没有产生，所以他找不到那个名字；而 “HERR” 则发挥自己所占位置的作用：

- 作为转喻对象；
- 作为一个无法命名的对象；
- 作为只能由它的某项连接来命名的对象。

死亡就是绝对的“HERR”。但当人谈论“HERR”时，并不是在谈死亡，因为人无法谈论死亡；死亡恰好既是界限，很可能也是一切言说由之出发的起源。

把诙谐的形成同这项无意识形成逐项比较并联系起来，就把我们带到这里。如今你们更清楚地看到，后一项形成只是表面上显得否定性；它并不否定。遗忘一个名字，不只是否定，而是一项欠缺——但我们总是太快把它说成那个名字的欠缺。

并不是因为名字没有被抓住，欠缺才存在。恰恰是这个名字的欠缺使主体寻找名字：在这个名字本应发挥功能、却因新意义受到要求而再也无法发挥原功能的位置，存在一项位置上的欠缺；它要求一项新的隐喻创造。正因如此，SIGNORELLI 没有被找到；反过来，那些碎片却在分析中应当找到它们的地方被找到，在那里发挥隐喻第二项的功能，也就是隐喻中受到省略之项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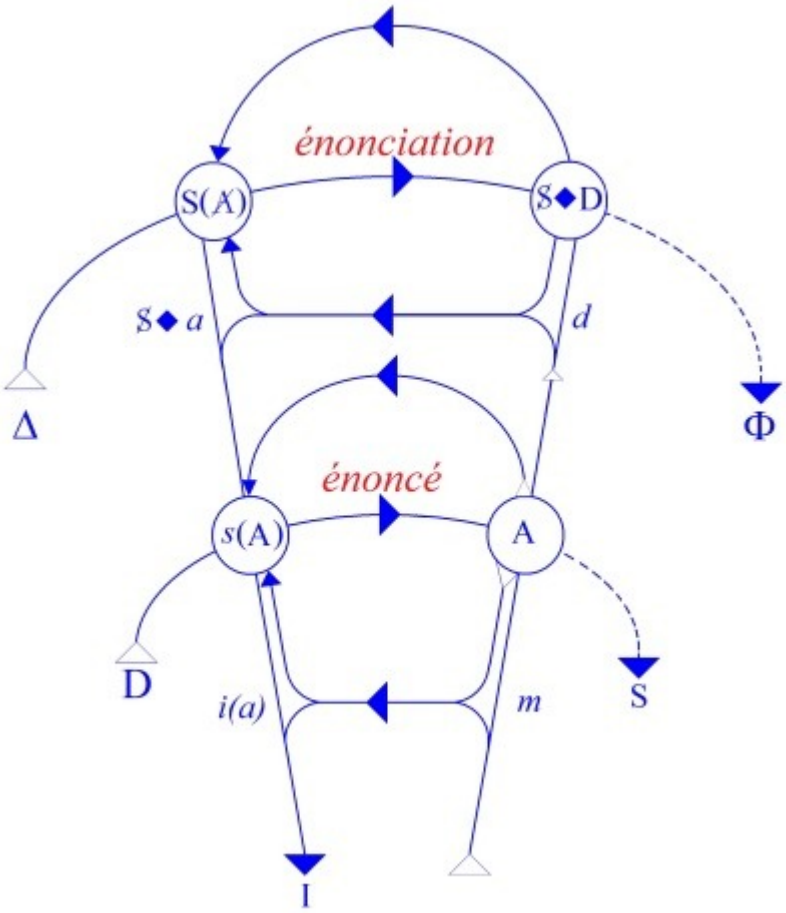
这些话在你们看来也许像“中文”一样难懂；不过，只要你们让自己跟随它显现的路径，这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在这个特殊案例里，它听起来像天书，后果却十分丰富：只要在需要记起时记得这一点，它就能照亮某项无意识形成的分析中发生的事情，让你们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说明它。反过来，如果省略并忽视这一层面，你们就会作出所谓实体化或极其粗糙、草率的认同；它们即使不直接制造错误，至少也会汇入并支撑语言认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在建构某种“软弱心理学”时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再次回到诙谐，看看应当怎样理解它。我要引入另一种区分，以某种方式回到我开头谈的主体问题。主体问题是什么意思？如果我

刚才所说为真，如果思想总是倾向于把主体还原为话语中把自己指称为主体的那一个，那么请你们注意，真正将它区分、孤立并对置起来的东西，可以由下列两项的对立来界定：

- 我称作“对现在的言说”的东西［陈述］；
- 与“言说行为的现在”［言说行为］。

这看起来像文字游戏，但根本不是文字游戏［它将对应图式以后出现的两个“层级”］：




“对现在的言说”意味着：话语中把自己说成“我”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这里”“现在”以及精神分析词汇中的另一些“禁忌词”同它列在一起——用于在话语中标示说话者的在场，但标示的是他此刻作为说话者的现实位置。

只须对语言作过最微小的尝试或拥有最少经验，就会看到：语言的现在，也就是此刻存在于话语中的东西，同由“我”在话语中标出的现在完全不同。话语的现在发生在讯息层面。

它可以在各种方式和语域中得到阅读，同话语中被指明为承载者之现在的那个现在，在原则上毫无关系。后者完全可变，而词语对它确实只具有指示词的价值。

“我”在这里并不比“这里”或“现在”更有价值。证据是：当你们对我说“这里或现在”、由作为谈话者的你们说出它时，你们谈的并不是同一个“这里或现在”，而是谈我正在说的那个“这里或现在”。无论如何，你们的“我”当然不是我的“我”。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词，用来把“我”固定在话语中的某处。不过，“话语的现在”本身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会立刻在自己所知最短的一则诙谐上给你们一个例子；它同时把我们引入隐喻以外的另一个维度。确实还存在另一个维度。

如果隐喻维度对应凝缩，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移置必定存在于某处：它就在转喻维度。我尚未处理它，是因为它远远更难把握；但恰好，这则诙谐特别有利于让我们感到它，我今天就要把它引入。

转喻维度进入诙谐时，涉及的是语境以及链上组合的用法，也就是横向组合。它因此把已经保存在所谓转喻宝库中的要素联结起来。一个词可以在两个不同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同其他词相连，并由此取得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当我们以某种方式重新拾起它时，严格说来，运作就在转喻方向展开。

下次，我会给你们另一个同样首要的例子；现在先把这则诙谐预告给你们，让你们在我讲解以前思考。海涅同诗人弗雷德里克·苏利耶（Frédéric Soulié）在一个客厅中；他们再次谈到当时一位颇有分量、浑身堆满黄金的人物——你们看，还是这种人物。那个人被许多人簇拥，苏利耶于是说：

- “你看，亲爱的朋友，对‘金牛犊’的崇拜还没有结束。”
- 海涅看了看那个人，回答：“哦……要说他是一头小牛，我觉得他已经过了年纪。”

这就是转喻式机智语的例子。下次我会坚持分析，把它逐层剥开。

它之所以是一则诙谐，只是因为 “小牛”一词被置入两个不同的转喻语境，并且仅以这种身份得到使用。给这则诙谐补出它的意思——这个人物是一头牲畜——其实没有为它的意指增添任何东西。这样说当然很好笑；但它之所以是诙谐，是因为从一句应答到另一句应答，“小牛”被放进并运用了两个不同语境。

如果你们还不信，下次我们会再回来谈。我现在要回到另一则诙谐，再次让你们感到：当我说诙谐在能指游戏的层面运作时，究竟涉及什么；而且，这可以在一种极短形式中得到证明。

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姑娘，我们可以赋予她一切真正良好教养的品质——也就是从不使用粗话，却知道粗话——第一次参加“惊喜舞会”。

一支跳得并不怎么样的舞结束时，一名轻佻小伙在一阵无聊与沉默以后对她说：

- “小姐，你看出来了吧，我是一位伯爵（comte）。”
- 她只是回答：“啊！Te……”[注]

> [注] 法语 comte（伯爵）读作 /kɔt̃/。姑娘把末尾的 te 单独抛回，因而让 comte 去掉 /t/ 后逼近 con（蠢人、混蛋）的读音；她没有把粗话完整说出，伯爵也可能毫无察觉。这个音位操作无法直接移植为中文同音笑话，正文保留法语音节。

这并不是我编的故事。我想，你们在那些专门小集子里读过它，也可能从作者本人嘴里听到过——必须说，他对这则创造颇为满意。无论如何，它具有格外典型的特征，因为你们在这里看见的，恰恰是我所谓“话语的现在”最本质的化身。

这里没有“我”，“我”没有给自己命名。单纯的感叹，是“言说行为的现在”同“对现在的言说”相对立时，最典型不过的例子。感叹正是“话语在场”的典型：发出话语的人完全抹去自己的现在；可以说，他的现在整个被召回到“话语的现在”中。

尽管如此，在这个创造层面，主体显示了自己的机敏应变；因为这类东西不是预谋出来的，它就这样突然到来，而人们正由此辨认一个人有才智。姑娘只对代码作了一项简单改动：把这个小小的 “te” 加进去；它从语境取得全部价值——如果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这位伯爵（comte）并不能令她满意（contente）。只不过，这位伯爵如果真像我所说那样不令人满意，也可能什么都没察觉。

这则机智语完全无缘无故。不过，你们在这里看到诙谐的基本机制：代码受到轻微违反，而这项违反本身被当作一种新价值，能够立即生成所需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在你们看来也许毫无疑问；但毕竟，那个有教养的姑娘并没有告诉她的伯爵，他就是从自己身上减去一个“te”以后剩下的东西；她没有说出任何这样的话。

有待创造的意义，恰好悬置在自我与大他者之间的某处。它只作出一项指示：至少眼下，某样东西仍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你们也看得很清楚，这段文本完全无法移植：如果那个人说自己是侯爵，这项创造就不可能发生。

按照上世纪曾给我们的父辈带来欢乐的古老公式，这一点当然很明显：有人问“Comment vas-tu ?”（你好吗？），回答却是“Et toile à matelas ?”（那床垫布呢？）[注]。最好不要改答 “Et toile à édredon ?”（那鸭绒被布呢？）。你们会说，那是一个以简单乐趣为乐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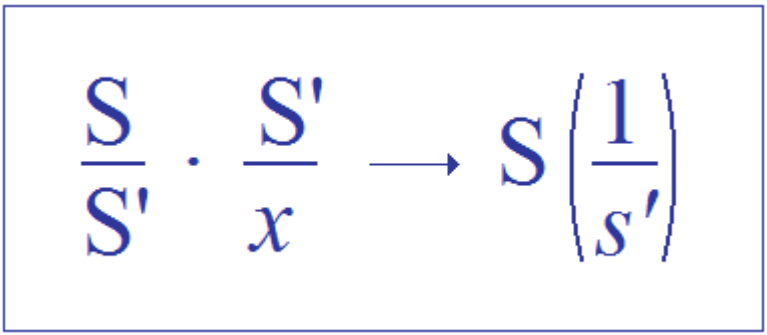
> [注] 这里利用 vas-tu / et toi 与 toile 一连串语音接合；替换最后的搭配词，便会破坏已经约定俗成的整条声音链。

你们在这里以最短形式把握了这个“Ah ! te…”，而且毫无疑问是音位形式，因为它是可以赋予一个音位的最短组合。至少必须有两项区别特征；音位的最短公式就是 “T、E”：一枚辅音依托一枚元音，或一枚元音依托一枚辅音；其中，辅音依托元音是经典公式。

这里正是辅音依托元音；这已经完全足以构成一项具有讯息价值的讯息，因为它以悖论方式援引词语的当前用法，并把大他者的思想导向

某样东西——本质上是对意义的瞬间把握。所谓有才智，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它还为你们开启了一切转喻赖以支撑的严格组合要素。

因为，即使我今天也大谈隐喻，那仍然是为了标出替代机制；它是一项四项机制，也就是我在《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所给公式中的四项：



你们会看到，在形式层面，它的操作有时格外奇特地就是智力的根本操作：用一个 $X$ 写出某项比例成立时的相关项。你们做智力测验时，所做的无非就是这种事。不过，这仍不足以粗暴地说，人凭智力同动物区分。人或许凭自己的智力同动物区分；但“他凭智力区分”这项事实中，能指公式的引入或许是根本而原初的。换句话说，为了表达得更准确，并把所谓人类智力是其“现实加 X”之来源的问题放回恰当位置，必须先问：“对什么的智力？”究竟有什么需要理解？面对实在界时，问题真的主要在于理解吗？

如果问题只是一种同实在界的关系，我们的话语就必定应当把它恢复为实在的存在，也就是严格说来不应抵达任何东西。话语通常确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抵达了另一种东西，如果人甚至可以谈论一段在某

种知识中达到终点的历史，那是因为话语已经给它带来根本转变。［参见黑格尔与“绝对知识”。］

问题正在这里，也许只是四个以特定方式联结起来、名为比例关系的小项。我们又一次倾向于把这些比例关系实体化，也就是相信自己在对象中抓取它们。可是，如果不借助自己的小能指把比例关系引进去，它们究竟在对象的什么地方？

无论如何，要使一切隐喻游戏成为可能，它必须奠立在某种能够进行替代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能指链：

- 能指链作为基础；
- 作为组合原则；
- 作为转喻的场所。

下次我们将尝试处理它。

# 第4课 · 1957年11月27日

|----|

上次我们停在这里：在诙谐分析的第一轮处理中，我已经向你们显示它在我所谓隐喻功能中的一个侧面、一种形式。现在，我们要看它的第二个侧面，也就是在转喻功能语域中引入的侧面。你们或许会惊讶于这种推进方式：从例子出发，依次展开各种功能关系；于是，至少乍看起来，这些关系同我们处理的对象并没有一般性的联系。

这是由所涉对象自身的一项必然性决定的；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显示其中可感的要素。可以说，就一切属于无意识秩序的东西而言，只要它由语言结构化，我们就会面对如下现象：让我们把握最有意义性质的，不只是在种属或特殊类别层面，还是在一个个特殊例子本身。

这里发生了对通常分析视角的某种倒转。我说“分析”，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分析，而是心智功能分析意义上的分析。可以说，这里存在某种可以称为抽象意义上“概念的失败”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必须通过不同于概念把握的另一种形式。

我有一次谈到矫饰主义，指的正是这一点。我会说，这个特征完全朝向我们的领域和我们正在穿行的地带：在这个领域，我们不得不借助concetto（巧思），而不是借助概念来推进。原因恰恰在于这些结构化运作所处的领域。“前逻辑”一词极易制造混淆；鉴于人们已经把它变成一种心理属性，我建议你们事先就把它从自己的范畴中删掉。这里

涉及的倒不如说是语言的结构属性；它们先于我们可能向语言提出的一切问题，先于我们追问语言交给我们的目标是否合法。

你们知道，这无非是哲学家焦虑追问的对象；由此，我们抵达了一种大致如下的折衷：即使语言向我们显示，我们几乎不能对它说得更多，只能说它是“语言存在”，但只要沿着这一目标，就会为我们实现一个“对我们而言”，它的名字叫作客观性。

这无疑是以很快的方式替你们概括了从形式逻辑

走向先验逻辑[注1]的全部历程。不过，我只是想定位并立刻告诉你们：我们置身于另一个领域。弗洛伊德谈到无意识时，并不只是告诉我们它以某种方式得到结构化；他以既是话语又是语言性的方式告诉我们，因为他提出的无意识组合与分节法则，恰好反映并重合于话语最根本的一些组合规律。

> [注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

另一方面，在无意识的这种分节方式中，有种种同样牵涉我们日常话语的要素仿佛缺失了。谈到梦时，弗洛伊德会说因果联结与否定不在其中；紧接着，他又会回过头来，向我们表明否定仍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得到表达。

我们正尝试回到这个已经探索的领域——弗洛伊德已经围住、界定、划清甚至犁过它——以更贴近地表述，甚至进一步说，形式化我们刚才所谓语言的原初结构法则。弗洛伊德经验至少带给我们一件事：这

些结构法则决定着我们内在某样东西取得所谓所指的位置；这个东西超出我们对自己的概念性掌握，可以说，是我们自身最深层的图像：

- 我们能够形成的关于自己的观念；
- 我们借以支撑自己的观念；
- 我们勉强攀附的观念；有时，我们还过早地急于给它安排一个命运；
- 也就是人的综合与总体性这些词项。

不要忘记，弗洛伊德经验恰恰对所有这些词项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弗洛伊德教给我们一件必须重新署名写在卷首的事情：欲望的结构化同需要的结构化之间存在距离、甚至裂隙。即使弗洛伊德经验最终援引一套需要的元心理学，这一点也绝非不言自明；相对于最初证据，它甚至可以以完全意外的方式得到表述。

弗洛伊德建立并界定的经验，迫使我们沿着一条包含许多迂回的道路行进；它向我们表明：

- 欲望结构在何种程度上由需要以外的东西决定；
- 需要怎样只能以经过折射、折断、碎裂与结构化的形式抵达我们；对它进行这些操作的，恰恰是所谓凝缩与移置等机制。它们在精神生活的不同形式与表现中得到映照，又预设各种中介与其他机制。我们会在其中辨认出若干法则；今年研讨班结束时，我们将抵达并把它们称作能指法则。

这些法则在这里居于支配地位；而在诙谐中，我们学到它们的某种用法：“精神游戏？”——这里引入“精神”一词本身，就要求加上这个问号。

- 什么是精神 / 才智？
- 什么是 ingenium？
- 既然我援引了 concetto，西班牙语的 ingenio 又是什么？
- 这里介入的那个难以名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不同于判断功能。

只有当我们继续考察严格意义上的操作，并在这些操作层面澄清如下问题，才能为它定位：这里涉及什么？这些操作是什么？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什么？

我们已经在诙谐同口误的歧义上，看到某种来自根本歧义、甚至构成诙谐本身的东西。同一项产物可以依不同情形转向一种心理意外、一次口误——若无弗洛伊德分析，我们面对它会茫然不解；它也可以反过来由大他者以某种听取方式重新拾起并承担，在自身能指价值的层面得到认可。悖论、丑闻式的新词“famillionnaire”在这里取得的，正是这样一项特有能指功能：它指示的并非单纯这个或那个东西，而是某项失败关系的彼岸。这个彼岸不只同主体与百万富翁保护者之间关系的死路相连，还同这里得到意指的一项根本事实相连：在人际关系

中，总有某种东西引入一种根本死路；归根到底，任何欲望都无法被大他者接收、承认，除非借助种种中介：

- 它们使欲望折射；
- 把欲望变成并非其本来所是的东西；
- 把欲望变成交换对象；总而言之，
- 它们从开端、从根源上就让要求过程服从一种拒绝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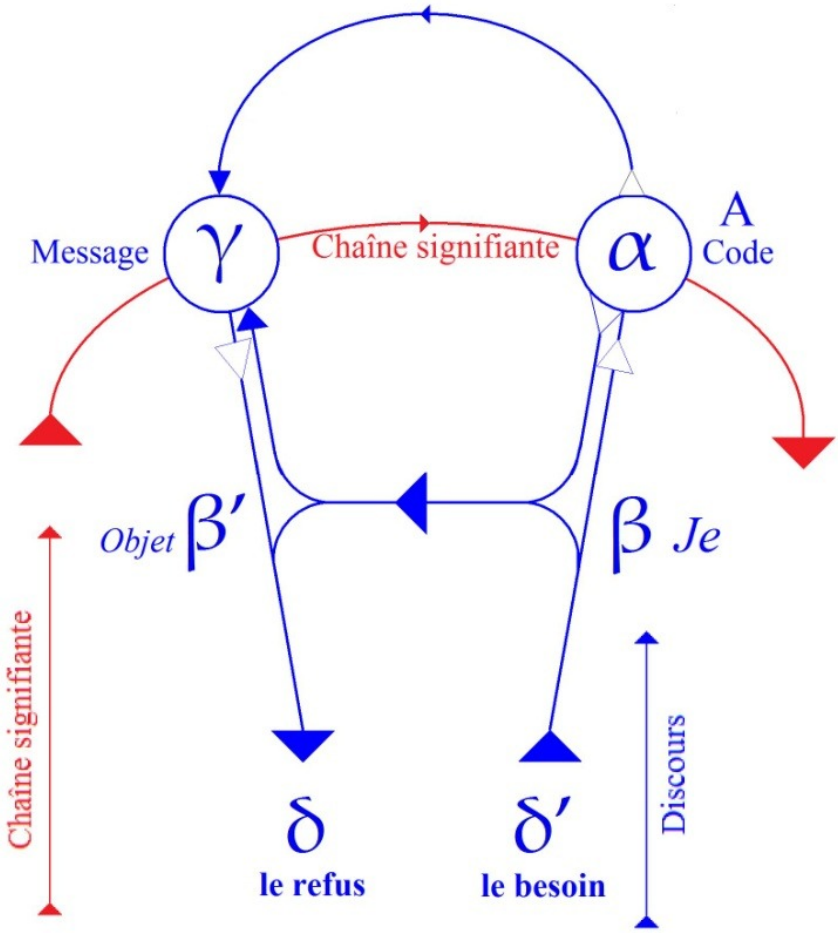
我来解释。既然我们正在谈诙谐，为了引入“要求怎样被翻译成某种能够产生效力之物”这个问题真正所在的层面，我容许自己用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即使称不上机智，其视角和语域也绝不应局限于痉挛式的轻笑。

这就是你们无疑全都知道的故事，所谓受虐者与施虐者的故事：

- 前者对后者说：“伤害我吧！”后者严厉地回答：
- “不！”

我看见这没有让你们发笑。没关系，终究还是有几个人在笑。况且，这个故事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让你们笑。我只请你们注意，它向我们提示了某种东西；这件事展开在一个已经毫无机智可言的层面，确切说就是：还有谁能比受虐者与施虐者更容易相互理解？没错，但这个故事向你们表明，条件是他们不要说话。施虐者回答“不”，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他作为施虐者的德性：只要开口说话，只要他作出回答，就不得不在言说层面回答。

所以，正因为我们已经过渡到言说层面，那项只要保持沉默本应抵达最深默契的东西，才恰好抵达我刚才所谓“拒绝的辩证法”。只要某样东西通过言说路径显现，这项拒绝的辩证法就必须在其要求本质中得到维持。



换句话说，你们可以看到，它就在这里显现；我不会说它在话语的圆环中，而是在道岔分流的接点上。主体从这里发出某样自身闭合的东西——一个分节句子、话语的一只环。

如果我们把需要放在 $\delta'$ 这个点上，那么由于大他者的某种必然性，需要会遇见我们暂且称作拒绝的回答。它揭示回路两项之间的根本对称：闭合的环与敞开的环。主体若想直接从自身需要沿这条路径走向欲望对象，那么在这里呈现为要求的东西，最终会抵达那个“不！”。

这无疑值得我们更贴近地进入；目前，它只以某种悖论呈现，而图式仅仅帮助我们给它定位。我们也正是在这里重新拾起关于诙谐不同阶段的命题链。今天，我引入了我们所谓诙谐的一项转喻表现；我已经立刻以如下形式把它的观念与例子固定给你们。你们可以看见，它同“famillionnaire”的故事何等不同。

这就是海涅同大致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弗雷德里克·苏利耶之间的对话。它记载在库诺·费舍尔当时颇为知名的书中[注2]：

[注2] 库诺·费舍尔：《论诙谐》（Über den Witz），海德堡，第 2 版。

“你看……”

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对年长自己不多、而且深受自己仰慕的海涅说：

“你看，十九世纪多么崇拜金牛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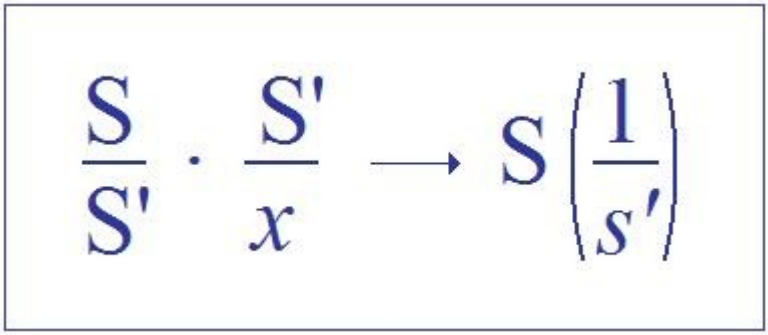
他说的是围绕一位老先生聚起的人群；那位先生身上无疑确实满载着金融权力的一切反光。海涅用轻蔑的目光看了看别人指给他的对象，回答：

“没错，可要说这一位是头小牛，我看他已经过了年纪。”

这则机智语意味着什么？它的趣味与动力在哪里？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把机智语放在如下层面：我们要在诙谐实际所在之处，也就是在它的文本中寻找它。人们曾把“心理学假设”的一切彼岸都归给弗洛伊德；但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总是恰恰从相反一端、从能指的物质性出发，把能指作为一个自行存在的材料来处理。对这一点最明显的示范，恰恰就在他对诙谐的分析中。他每次不只从技术出发，还把自己交给这些技术要素，从中寻找动力。他立刻做什么？做他所谓“还原尝试”。

在“famillionnaire”这则诙谐上，他向我们表明：只要把它翻译成可以称为展开的意义，一切诙谐效果都会消散。由此可以说，他显示诙谐存在于隐喻所特有的根本歧义关系中：




也就是说，一个能指被替代到链上潜伏的另一个能指位置时取得的功能，正是问题所在；所涉之物存在于这种位置相似或同时性上的歧义关系中。如果我们把它分解并按顺序读出，也就是改说“同百万富翁所

能达到的那种亲密程度一样亲密”，诙谐的一切就会消失。弗洛伊德正是这样从诙谐的一项隐喻表现处理它。

现在，他遇见了某种可以预感到有所不同的东西；不过有一瞬间——弗洛伊德不会替我们省略自己接近现象时所走的弯路——他犹豫着把这一新品种叫作思想诙谐［Gedankenwitz］，并把它同词语诙谐［Wortwitz］对置。

但他很快发现，这项区分完全不够。这里无疑应当信赖所谓“形式”，具体说，就是能指分节。于是，他再次尝试对例子作技术还原，让例子回答它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回答那个由主体认可所赋予、因而仍可争议的形式：“这是一则诙谐。”

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遇到另一种东西。起初，在他看来，其中必定仍有某种属于隐喻秩序的东西。我再说一次：他让我们跟随自己思想的全部接近路径。所以，他暂时停在前件，也就是同海涅说话的人——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带来的东西上。况且，他这里只是跟随库诺·费舍尔，后者确实停在这一层面。

“金牛犊”中无疑有某种隐喻性东西；“金牛犊”具有一种双重价值：

- 一方面，它是钻营的象征；
- 另一方面，它是金钱权力统治的象征。

这是否意味着，那位先生之所以受到所有人的致敬，无疑只因他有钱？我们是否在这里找到了某种还原并消除诙谐动力的东西？弗洛伊德很快看出，这完全是虚假的解释。不过，要找到这个例子的丰富性，确实值得更细致地观察。

可以肯定，在“金牛犊”被引入游戏的第一批材料中，已经包含某种质料。即使不从各个角度深究一个无疑属于隐喻的词项怎样建立其语言用法，也必须看到：“金牛犊”本身同能指与意象的关系有最紧密的联系；偶像崇拜者正是安置在这一侧。归根到底，相对于一种要求承认“我是我所是者”——也就是犹太人的上帝——的视角，有一项格外严格的东西拒绝一切把意象化的实体设为能指之起源、设为卓越命名的做法。当然，我们在这里已经远远超出把偶像崇拜单纯当作崇拜一尊雕像。

偶像崇拜同样在寻找自己的彼岸；而正因为寻找这个根本彼岸的方式在某种视角中遭到拒绝，“金牛犊”才取得自身价值。它又只是通过某种已经发生的滑动，才获得隐喻用法。

宗教视角可以把偶像崇拜中的东西称作“位置回退”，也就是以想象界替代象征界；它在这里又继而取得隐喻价值，用来表达另一件同样可在能指层面得到援引的东西——别人早在我以前称作“黄金的恋物价值”的东西。这也让我们触到某种能指接合。

我在这里提到它并非偶然，因为我们马上就会被带去触及这项恋物功能。它只有在转喻维度中才可以设想和援引。于是，围绕“金牛犊”，我们已经面对一个载满象征—想象功能全部纠葛与缠结的东西。

那么，诙谐究竟是否就在这里——因为弗洛伊德在此指出，它根本不处在这个位置？他觉察到，诙谐是在亨利·海涅的回击中。海涅的回击恰恰在于：可以说，它取消、颠覆了“金牛犊”作为隐喻表达时赖以维持自身的一切参照，从而把它变成另一种东西；这个东西纯粹而直接地指称那个人，使他骤然被归还给自身的品质。而且，这并非偶

然：从某个时刻起，他无疑配得上成为一头按磅计价的牛犊——容我这样说。

这头牛犊突然被照它本来的样子来对待：一个活物；说到底，是一个人。在金钱统治所建立的市场上，这个人在这里被还原为他自己，被当作牲畜出售，成为一颗牛犊头。针对这颗头，人们说：毫无疑问，他已经超出了利特雷给出的定义界限——牛犊应当处在出生后的第一年。我甚至相信，屠宰业的严格主义者还会把牛犊定义为尚未停止吮吸母乳者；据说，只有法国遵守这种严格标准。

“就一头牛犊而言，他已经过龄了！”

这里的牛犊并不是牛犊，而是一头年纪稍大的牛犊；无论有没有“金牛犊”的背景，都根本无法把它还原掉——它仍然是一道机智之笔。因此，弗洛伊德在这里把握到不可分析者同可分析者之间的差别，可两者仍然都是机智之笔。这意味着什么？只能意味着：诙谐经验指向我们正在试图贴近的某种东西的两个不同维度。

弗洛伊德自己告诉我们，有某种东西以一种近似偷换、戏法、思想缺失的样子出现；它是一整类不同诙谐所共有的特征。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一个词用在同它原先被带给我们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同一特征还出现在另一个故事里：拿破仑三世登上王位时大规模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有人就此造出一句关于“鹰的第一次飞翔 / 盗窃”的话：“这是鹰的第一次 vol。”人人都为这个歧义欣喜。不必多作强调：这里同样谈不上思想的诙谐，确实是一种词语的诙谐；不过，它同当前例子完全属于同一类别——表面上，一个词被取作另一种意义。

顺便探究这类话语的底层关系，也是颇有趣的。因为这句话以法语流传下来，弗洛伊德特意向不懂法语的人强调 vol 的歧义：

- 一是作为鸟类运动方式、即飞翔行动的 vol；
- 二是意为窃取、攫夺和侵犯财产的 vol。

> ……在这里最好提醒一点：弗洛伊德略去的——我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是其中一个意义在历史上借自另一个意义。约在十三或十四世纪，正是从猎鹰“攫走”鹌鹑这一 vol 用法，volerie 一词才转而用于指称违犯财产基本法则之一的那种过错，也就是盗窃。

这在法语中并非偶然。我不是说所有语言里都发生过同样的事；不过，拉丁语中已经发生过：volare 从同一源头取得了相同意义。这顺便显示出某种同我们当前行进之处也并非毫无关系的东西，即我所谓言说中必须最终表现对言说本身、或者说对契约的侵犯时所采用的“委婉表达方式”。在这个例子里，vol 一词借自一个全然不同的语域并非无缘无故：它来自一种同我们严格地、法律上称作盗窃之物并不相干的攫夺语域。

不过先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我在此引入“转喻性”一词的理由。我认为，要定义以下东西，就应越过意义本身这些飘忽不定的歧义，去寻找另一种参照：

- 机智之笔所处的第二个语域；
- 以及将使我们能够把它的动力和机制同第一种诙谐统一起来、找到共同因素与共同动力的那个他物。弗洛伊德的一切都向我们指明了道路，尽管他当然没有把公式彻底完成。

如果我们不去尽量利用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东西，我又何必向你们谈弗洛伊德？应当由我们再往前推进一点；我的意思是，给出这项必要的形式化，再由经验告诉我们：

- 这种形式化是否适合；
- 它是否相符；
- 现象是否确实朝这个方向组织起来。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后果丰富的问题。因为对我们全部的处理方式——取其最广义，也就是不仅指治疗，还指对无意识诸种方式的构想——而言，存在某种结构，并且这项结构就是能指结构；它重新截取、切分并把自身网格强加于构成人类需要的一切，这终究是一件绝对决定性、绝对根本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在转喻脚下看到了它。我已经多次引入这种转喻，尤其是在题为《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的那篇文章中。

我特意在普通层面给过你们一个例子，它或许会唤起你们中学时代的语法记忆……在那种多少贬低了昆体良的视角中，转喻曾经就是这样被称呼的——显然，修辞格研究从来不至于让你们窒息；直到现在，人们始终不太重视它。就我们目前对话语形式的构想而言，我举的转喻例子是用“三十面帆”代替“三十艘船”。我当时指出，这“三十面帆”绝不只是人们对此所说的“以部分代整体”，也就是对实在的参照；因为帆当然远不止三十面，船很少只有一面帆。不过这里有一个文学背景：你们知道，《熙德》的一段独白中可以找到这“三十面帆”。眼下这只是留给将来的一项参照或预告。

现在，这“三十面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处置：要么帆是三十面，而船不是三十艘；要么船是三十艘，而帆就不止三十面。然而，它所说的确实是三十艘船。我指出，应当在所涉关系的逐词对应中寻找所谓转喻功能的方向；但我这样做，无疑还只是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某个问题性侧面。

不过，我们应当更深入地触及它同隐喻之间的差别，因为你们终究可以对我说：这就是隐喻。它为什么不是隐喻？问题正在这里。

况且，已有一段时间，我不时听说，你们中有些人在日常生活的转角处突然遇见某种东西，随后完全不知道该把它归入隐喻还是转喻。这有时在他们的机体中引起极其过度的紊乱，甚至造成过于剧烈的摇摆；可以说，这种左舷的隐喻与右舷的转喻已经让某些人感到眩晕。

因此，让我们试着更贴近问题所在。毕竟，也有人就波阿斯对我说，“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很可能是一项转喻。我相信自己已在文章里充分表明这“禾捆”是什么，以及它远不只是波阿斯财产中的一个要素：它恰恰作为对父亲的替代，使诗的精神中潜藏的整个生物学繁衍维度涌现出来。地平线上——甚至不只在地平线上，而是在穹苍中——还会升起天上镰刀的锐利线条，唤起阉割的背景，这并非毫无缘故。

那么，让我们回到“三十面帆”，并最终问一问——以便在此把事情一次说清——我所谓转喻功能或转喻参照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尽管仍留下若干谜题：隐喻的结构动力本质上就在替代中，就在赋予能指 S 的那项功能中；这个能指在一条能指链上替代另一个能指。

转喻则是这样一回事：一个同样记作 S 的能指，由于在能指链的邻接关系中同另一个能指发生关系，而取得某项功能：

$f(S\cdots S_1)\ S_2 = S\ (-)\ s$

赋予这面“帆”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在一条能指链之中、而不是在一次能指替代中同船发生关系。这样，我就以最清楚的方式转移了意义。

所以才需要这些外观上形式化的表述，尽管这些公式当然可能使你们提出更多要求。最近有人提醒我，我曾经说过：为了你们的使用，为了圈定我们论题中的事物，我试图锻造“一套橡皮逻辑”。这话确实是我说的。这里所涉的确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一种拓扑式结构化；它有时必然留下豁口，因为它是由歧义构成的。

不过请允许我顺带告诉你们：我们无法逃开这一点。如果我们真能把这种拓扑式结构化推进得足够远，我们仍逃不过一项剩余的附加要求——假如你们在这里的理想是某种单义的形式化。因为在我们试图界定的语言结构层面，某些歧义不可还原。

也请允许我顺带指出，“元语言”概念往往以极不恰当的方式使用，因为这种用法没有认识到：

- 要么元语言具有这样的形式要求，以至于它把结构化现象整个挪离了本应所在的位置；
- 要么元语言本身必须保留语言的歧义。换句话说，“不存在元语言”；存在的是形式化：或在逻辑层面，或在我试图为你们析出的、具有自主性的能指结构层面。

“不存在元语言”，指的是不存在例如对语言现象的完全数学化，恰恰因为这里不可能越过作为语言原初结构而给定的东西来作形式化。尽管如此，这种形式化不仅可以要求，而且是必要的。比如，它在这里就是必要的，因为你们终究应当看到，“一个能指替代另一个能指”这一概念意味着：

- 这是一种发生在某个东西内部的替代，而那个东西的位置必须已经得到界定；
- 这是一项位置性的替代。

而位置本身要求有能指链，也就是一项组合性的序列。我并不是说它要求这条链的全部特征；我的意思是，这个组合序列具有一些要素，例如我会称作非传递性、交替与重复的要素。如果我们进入能指链构成的这个最小原初层面，就会被带得远离今天的主题。

这里有一些最低要求；我并不声称自己迄今已经把它们完全穷尽。不过，我终究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东西，让你们得以进行某种思考；并且，我们可以从这个领域中例子的特殊性出发——出于无疑绝对根本的理由，我们必须从中汲取全部教益。

我们将再次这样行进，并从这个例子注意到：即便这听起来像一场文字游戏，这些“帆”由于此刻所发挥的功能——

- 在向我们指明什么的同时，也同样把它向我们遮蔽起来；
- 这些“帆”在这里并未携同自己作为帆的全部权利、并未全帆驶入我们对它们的用法中。

这些“帆”几乎没有松弛。这些“帆”是某种在作用范围与符号方面受到削减的东西；我们不仅可以在“三十面帆”中找到它，也可以在“有三十个灵魂的村庄”中找到它。在后一例子里，你们很快就会看见：

- 这些灵魂在这里只是它们所代表之物的影子；
- 它们甚至比“居民”这个会暗示过强在场的词更轻；
- 按照一部著名小说的标题，这些灵魂也完全可能是死魂灵；甚至与其说是存在者，不如说是不在那里的灵魂。

同样，“三十户炉火”也是这个词的一种用法，并且无疑表现出意义的某种降格或最小化。我的意思是，这些“炉火”同样可能是熄灭了的火；关于它们，你们当然会说“无火不生烟”，而这些火被用于以转喻方式说出它们前来替补的东西，也并非毫无理由。你们无疑会说，为了作出区分，我到头来在这里求助的还是一项意义参照。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要请你们注意：

- 我的出发点是：转喻是根本结构，在其中才可能产生那个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也就是隐喻；
- 即使某种具有转喻起源的东西被放在替代位置上——“三十面帆”就是如此——它在性质上仍不同于隐喻。总而言之，若没有转喻，就不会有隐喻。

我的意思是：隐喻现象所发生的场所与位置，正是相对于一条链并在这条链中得到界定的；就此而言，这条链处在某种滑动或歧义中。

“若没有转喻，就不会有隐喻”在我耳边形成一句回声；这绝非偶然，因为它同我能够放进于比老爹口中的那种感叹、喜剧性的呼告有最大关系：

> “若没有转喻，就不会有隐喻。”同样：“波兰万岁，因为没有波兰——于比老爹也这样说——就不会有波兰人！”

这为什么是一道机智之笔？它恰好切中我们的主题。它是一道机智之笔，而且之所以好笑，正因为它作为这样一句话参照着转喻功能本身。如果以为这里的可笑之处涉及例如波兰人在波兰那些众所周知的不幸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那就走错路了。假如我说下面这句话，同样好笑：

> “先生，法国万岁，因为没有法国就不会有法国人！” 同样，假如我说：“基督教万岁，因为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基督徒！甚至基督万岁！”

它总是同样好笑，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原因。我要向你们强调：

- 这里的转喻维度绝不可能被认错；
- 在屈折语言中，对后缀、词缀或词尾的任何派生关系用法，严格说来都是为了意指目的而使用链的维度。

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词……我甚至要说，全部参照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比如失语症患者的经验恰恰向我们表明，存在两种失语症；而当我们处在所谓邻接障碍、也就是链的障碍层面时，主体最难区分的恰恰是这些关系：“善举”这个词同“行善的”、同“行善”以及同“善行”

之间的关系。某种东西正是在另一个、即转喻维度中发生。恰恰是这道闪光，使我们在此把这项参照不仅看作某种滑稽东西，甚至看作颇为闹剧性的东西。

我要请你们注意，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专注于所谓“能指链的属性”，并把握我用“能指链的效应”所要指称的东西——我已经试图寻找几个参照词，让你们在我们即将能够做到之处把握它。这是一项内在于能指链作为能指链之本性的根本效应，关系到所谓意义。

不要忘记，去年我正是借助一种类比参照，把任何一种欲望的恋物式移置之本质安置、指明和定位下来……这个参照可能让你们觉得是隐喻性的，但我曾充分强调它并不是隐喻，必须严格依照转喻链的字面来理解；

- 换句话说，就是把欲望固定在某处：在其自然对象之前、之后或旁边；无论如何，都在这个对象的门口；

- 换句话说，也就是建立那个绝对根本、可称为人类欲望之彻底倒错的现象。

这里，我想指出另一个维度，也就是我会在转喻链中称作“意义的滑动”的东西。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它同某种技巧、用法和文学程序之间的关系；人们通常以“现实主义”这个词来指称后者。

在这个领域里，未必有人想到可以从事各种实验。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拿起一部现实主义时期的小说重读，以便看看哪些特征能使你们把握某种独特东西；它对意义维度的参照，可以同能指链本身的转喻用法联系起来。我从现实主义时期的小说中随意挑了一部，也就是莫

泊桑的《漂亮朋友》。首先，它读起来非常愉快，你们不妨读一次。进入作品之后，我颇为惊讶地在这类小说中准确找到了我在这里试图用“滑动”指称的东西。

> “女掌柜找还了他那枚五法郎银币的零钱之后，乔治·杜洛瓦走出餐馆。 他天生仪表堂堂，又摆着一副退伍士官的架势，于是挺直腰身，以军人惯常的动作捻了捻胡子，朝那些迟迟未散的食客飞快地环视一周——那是漂亮小伙子的目光，像撒网般四下铺开。”

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它看似平淡无奇；但随后，它从一个时刻走向另一个时刻、从一次相遇走向另一次相遇，你们会以最清楚、最明显的方式见证这种滑动。

如果我们俯瞰小说的整个进程，就会看见某种东西：一个相当简单的人物——小说开头时，他已经沦落到那枚五法郎银币就是身上最后的钱，只剩下极直接的需要，即对爱情与饥饿的当下忧虑——逐渐被接连而来的机缘攫住。这些机缘有好有坏，但通常都是好的，因为他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运气很好。他被卷入一个由各种系统、交换表现以及这些原初给定之物的转喻性颠覆构成的圈子；这些东西一旦得到满足，就在一连串处境中对他异化了。

其中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重新找到自己或停驻下来；它把他从一次成功推向另一次成功，直至他自身人格几乎完全异化。若看细节，这一切又像什么都没有；我的意思是，叙述总力求绝不越出事件接连发生的范围，并以尽可能具体的词语把它们记下。

小说家每时每刻都向我们展示一种复视：它不断地不仅把小说的主体，而且把他周围的一切，都置于相对于对象——哪怕最直接的对象

——的双重位置上。我举餐馆里这顿饭为例；它开始成为这个人物走向发迹的最初时刻之一：

> “端上来的奥斯坦德牡蛎小巧肥嫩，像贝壳里的一双双小耳朵，在舌与上颚之间融化，如同咸味糖果。汤后端来一条粉红如少女肌肤的鳟鱼……宾客们开始交谈。 这正是机敏暗示的时刻，是词语像掀起裙子一样揭开帷幕的时刻，是语言诡计、巧妙而掩饰着的大胆，是一切无耻虚伪的时刻；语句用遮掩的措辞展示赤裸的图像，把无法说出的一切化作快速的景象送入眼中和心里，并让上流社会的人得以享有一种微妙而神秘的爱，一种思想间不洁的接触：他们同时唤起拥抱中一切隐秘、羞耻而渴求之物，这种唤起像拥抱一样令人不安且充满感官刺激。烤肉端上来了，是几只鹧鸪……”

我要请你们注意，这道烤肉、几只鹧鸪、禽肉冻以及其余一切：

> “他们把这一切都吃了，却既没尝出味道，也没有察觉；他们一心只顾自己说的话，浸在爱欲的浴池中。”

这个不断出现的托辞使你们到头来不知道桌上摆着的究竟是少女的肉体还是鳟鱼——而且问题处在所谓现实主义描写的视角中。它不仅无须对任何意义作深渊式的参照——无须任何形式的“超意义”，不论诗意的、道德的还是其他的——而且依我看，足以照亮我所指出的事情：凡旨在带出现实的话语，都不得不维持在意义不断滑动的视角中。这恰恰构成它的长处，也恰恰说明不存在文学现实主义：因为话语努力通过陈述来贴近现实，最终只成功显示出，话语的引入给这个现实增添了怎样的紊乱与倒错。

如果这里仍有某种东西让你们觉得过于印象主义，我还想在你们面前试验另一种东西。你们看，我们试图维持的层面，并不是话语为实在担保、只是声称标记实在并紧随其后的层面，而是一种“编年者”［annalyste，有两个 n］的功能。

看看这会产生什么。我选了一位无疑颇有才华的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这里没有时间向你们介绍他。我选的是他为《晨报》撰写的一组《三行新闻》。它们被结集出版无疑并非偶然，其中必定显出某

种特别的才华。让我们试着看看这是什么。我们可以先从这些三行新闻里随意选取几条，之后或许再看更有意指性的：

- “三位虔诚女士因为朝宪兵扔了几块石头……被图朗-孔布堡的法官处以罚款。”
- “圣但尼岛的小学教师保罗敲响召集学生返校的钟声……”
- “在克利希，一个衣着考究的青年扑到一辆胶轮马车下；安然无恙后，他又扑到一辆卡车下，被碾碎了。”
- “一名年轻女子坐在舒瓦西勒鲁瓦的地上。失忆症只准她说出一个可供辨认身份的词：模特。”
- “那具六十岁老人的尸体……在阿尔克伊的一棵树上摇摆，身挂标牌：年纪太大，无法工作。”
- “关于吕扎尔什谜案，勒皮的预审法官讯问了那名女囚……但她疯了。”
- “凡尔登-舍维尼的芒然跟在一具棺材后面。那天他没能走到墓园，死亡在途中袭击了他。”
- “那名男仆……趁主人不在，把一个风趣女人安置在讷伊的主人家中，随后带走一切，唯独留下了她。”
- “两名女骗子佯装在这笔积蓄中寻找稀有钱币，拿走了一千法郎的普通钱。伊夫里，某小姐……”

- “海滩……菲尼斯泰尔，两名女泳客溺水。一名男泳客纵身相救，结果艾蒂安先生不得不救起三个人。”

是什么令人发笑？这些事实真正以一种不带人格的严谨得到标记；我要说，全部技艺只在于把它们极度压缩，以尽可能少的词说出。如果其中有某种喜剧性——比如取这一页最上方的例子——当我们听到下面这句话时，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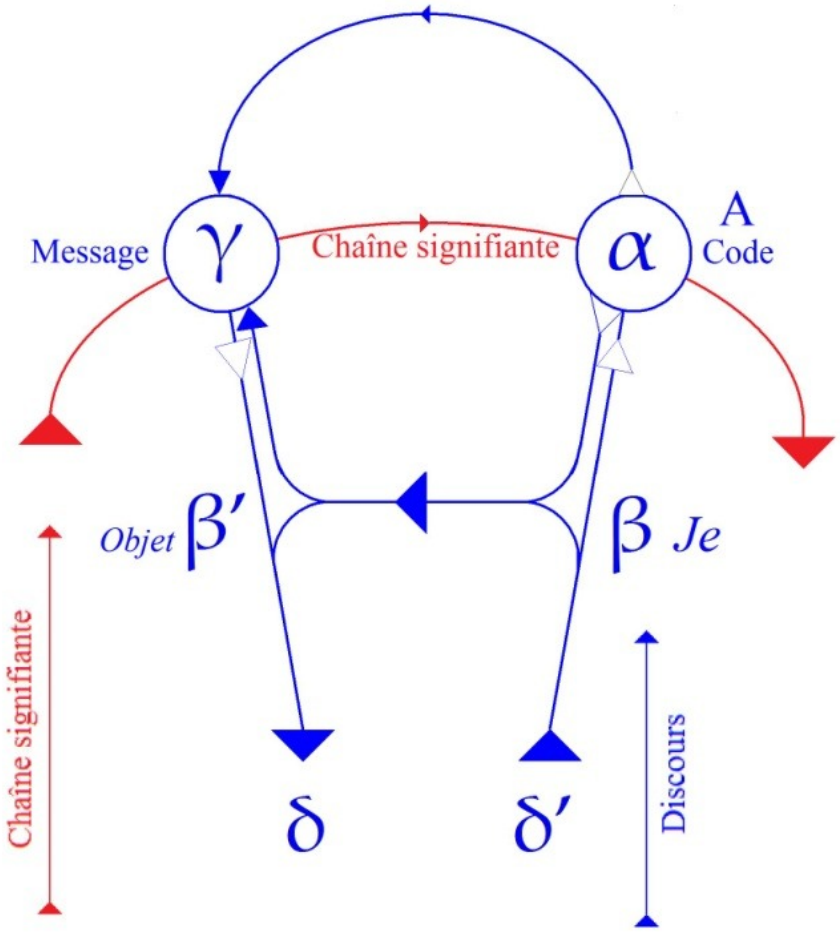
- “凡尔登-舍维尼的芒然跟在一具棺材后面。那天他没能走到墓园，死亡在途中袭击了他。”

这同我们所有人走向墓园的路程绝无关系，无论我们以何种不同方式走完它。这里完全不存在类似的东西；我甚至要说，如果事情被讲得更长，也就是让这一切淹没在滔滔话流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会显现。

我在这里所谓“意义的滑动”，就是某种使我们在严格接收到这个句子时，逐字说来没有一刻知道该停在哪里、该把重心和平衡点安放何处的东西。《三行新闻》的全部写作艺术正在这里。这恰恰是我会称作它们的偏心化之处。其中没有任何寓意：凡可能带有示范性质的东西都被仔细抹去；这在此可以称为该文体的“超脱艺术”。

尽管如此，所讲的终究确实是某种东西，是一连串事件。我甚至要说，这正是其另一项长处：它给出极为严格的坐标。因此，我所瞄准、试图让你们感受到的，确实就是这种东西：话语在其水平维度、在其链的维度上，严格说来是一个“滑冰场”。意义的滑动就发生在这块冰面上；研究这块场地，同研究冰上的“滑行图形”同样有用。滑动抵达边缘时只留下一条无疑轻微、细小的带子；它小到可能显得等于

零，但无论如何，它在机智之笔的秩序中显现并宣告自身，成为我们可以称作一个嘲弄性、贬抑性、扰乱性的维度。




“鹰的 vol”这类机智之笔的风格就位于这个维度：它出现在话语同能指链相遇之处；对“famillionnaire”而言，这个位置在 γ 点的会合处，而这里的相遇只是发生得稍远一些。

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在这里带来某种显然朝“我”而去的东西，因为所采取的视角就是亨利·海涅，就是诙谐；他召唤海涅作证。机智之笔起初总有这样一项视角，这样一声对作为核验场所的大他者的呼唤：

“正如……那样真实——希尔施·雅辛特开头说——正如上帝欠我一切幸福那样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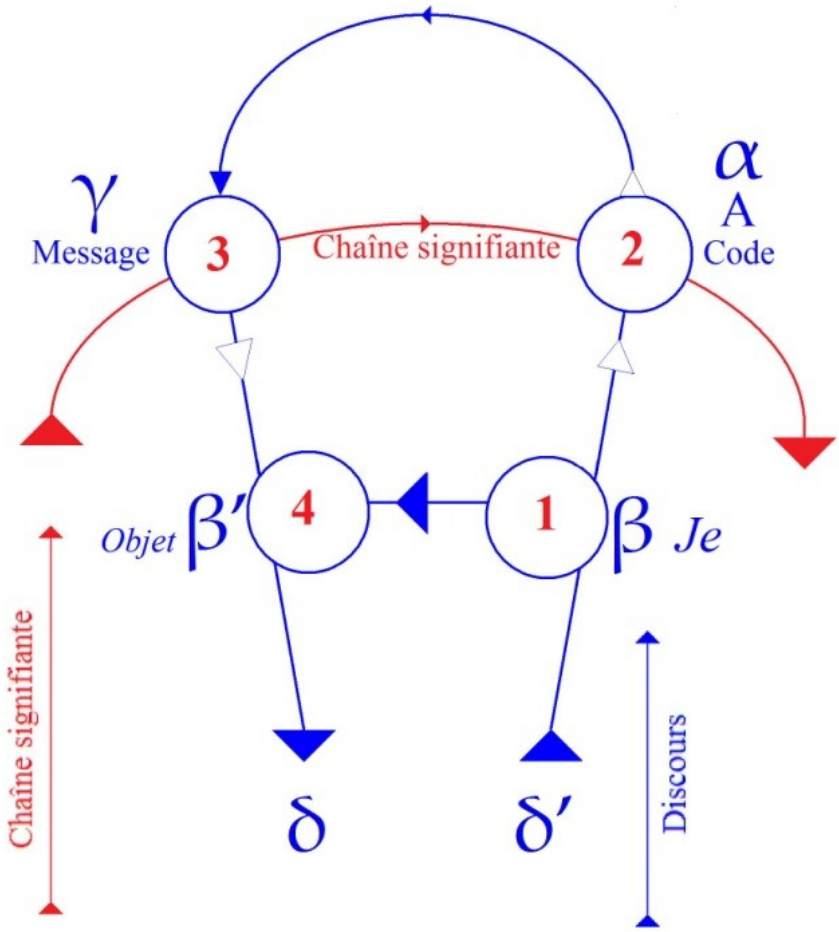
而且，这里对上帝的指涉也可能是反讽性的。这项指涉在此是根本性的。

苏利耶召唤声望远胜于自己的亨利·海涅——我不在这里向你们讲弗雷德里克·苏利耶的生平，不过《拉鲁斯》为他写的条目很有意思。苏利耶对海涅说：

> “亲爱的老师，您难道没看见——大意如此——看到这个十九世纪……不是很有趣吗？

这里是对亨利·海涅之“我”的呼唤、召唤，是把它拉向一边；海涅的“我”是这件事情中在场的枢轴点。

> ……看到这个十九世纪仍在崇拜金牛犊？”




于是，我们先经过这里［2 → 1］，随后又围绕金牛犊，在用法与转喻的场所回到这里［1→ 2］。因为归根到底，这个“金牛犊”是一项隐喻，但它已经磨损，已经进入语言。刚才，我们顺带展示了它的来源、起源与生产方式；不过它终究是一句陈词滥调。它沿经典的 α → γ 路径，把自身的陈词滥调发送到这里［2→ 3］，也就是讯息的场所。

这里［3］有两个人物；而你们很清楚，这两个人物也完全可以只是同一个人，因为只要存在言说的维度，大他者就在每一个人那里。

而且，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如果苏利耶心中不是已经有某种东西，使他归根到底把这个人物称为“金牛犊”，这句话也不会出现。这个用法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再通行，不过我在利特雷词典中找到了它：利特雷告诉我们，一个浑身金钱、因而成为普遍赞叹对象的先生就叫“金牛犊”。这毫无歧义，在德语中也一样。

就在这时，也就是这里［$3_{\rightarrow}2$］，γ 与 α 之间发生了讯息向代码的返回；换句话说，在能指链的线上，并且可以说以转喻方式，这个［牛犊］词项被［海涅］重新拾起，但不在它原先被发送的层面上。它以一种无疑让如下意义充分显现的方式被重新拾起：

- 意义的坠落；
- 意义的削减；
- 意义的贬值。

总而言之，这正是问题所在，也是今天这堂课结束时我想引入的东西：严格说来，转喻正是我们必须安置人类语言中某种原初事物的场所。这个事物是原初而且根本的；我们将在这里从同它相反的方向，取其意义维度。也就是说，在这些已经由语言构成的多种对象中——每个人的需要及其矛盾构成的磁场在其中引入——除了我刚才引入的回答，还有另一种东西；它或许会显得悖论，那就是价值的维度。

严格说来，相对于价值维度，意义具有自身的维度。价值维度立足并强制显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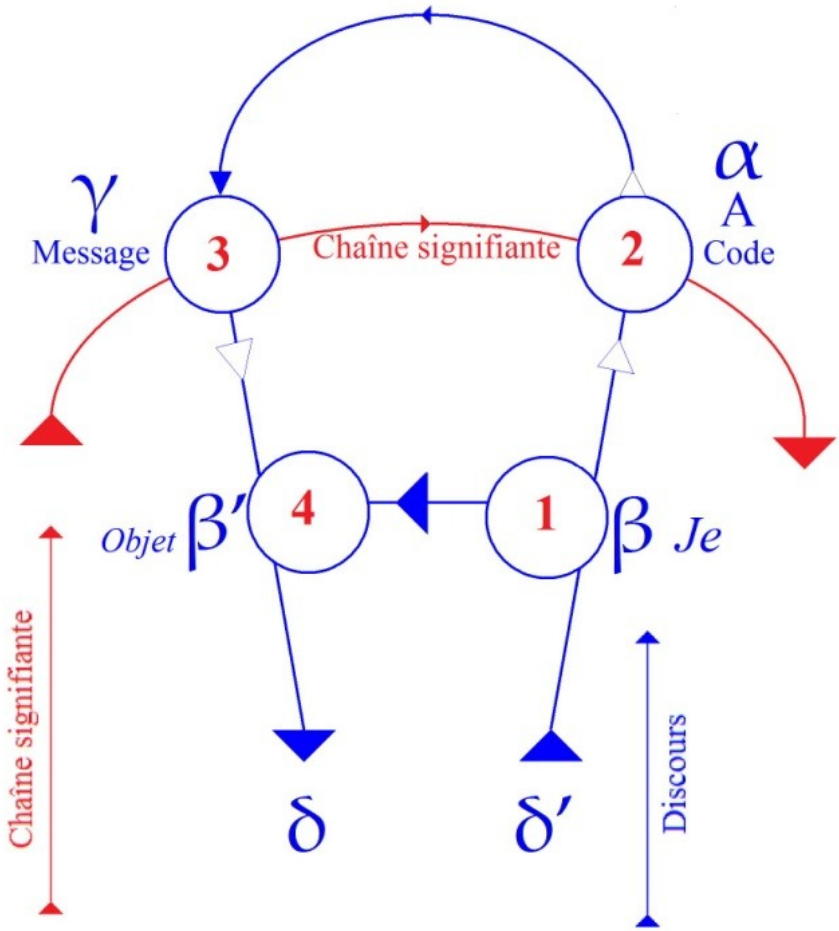
- 一种对比；
- 另一个侧面；
- 另一个语域。

如果你们中有人颇为熟悉——我不说整部《资本论》，谁读过整部《资本论》！——但至少熟悉大家通常都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请翻到马克思论述所谓“商品价值的特殊形式”理论的那一页……在一则注释里，马克思显露为镜像阶段的先驱。

在那一页，马克思提出一项评论；在那部惊人的《第一卷》中，这类评论俯拾皆是。它难得地向我们显示一个人展开了有明确分节的哲学

话语。马克思提出：在研究任何价值的数量关系以前，应当先确立以下几点：

- 若不首先建立这种根本等价关系，任何东西都无法成立；所涉的不只是若干码麻布同一定数量衣服之间的数量相等；
- 某种东西已经必须在麻布—衣服的等价中得到结构化，即衣服能够代表麻布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在这里并不是作为一件你能穿在身上的衣服而起作用；
- 分析一开始就必然包含这样一个事实：衣服可以成为麻布价值的能指；
- 换句话说，所谓价值的等价关系，严格取决于两个词项中的一方或双方放弃其意义中同样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γ
Message
3
Chaîne signifiante
2
α
A
Code
Objet β′
4
1
β Je
Chaîne signifiante
δ
δ′
Discours

转喻线［3 → 2］的意义效应就位于这个维度中。这将使我们随后找到：

- 在隐喻与转喻两个语域中，把意义效应投入运作有什么作用；
- 由于意义效应在两者中共同投入运作，它们怎样同一个根本的维度、视角发生关系；正是这个维度使我们能够抵达无意识的层面。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以这个问题为中心，明确求助于大他者的维度；大他者是这项运作的场所、接收者与必要枢轴点。

这是我们下次要做的事。

# 第5课 · 1957年12月4日

弗洛伊德进入《诙谐及其同无意识的关系》的综合部分——也就是第二部分——之后，提出了快乐起源的问题：诙谐所激起的快乐来自哪里？

我提醒那些自以为可以免读的人：你们至少读过一遍《诙谐》正文，这一点越来越必要。这是你们了解这部著作的唯一方法——除非由我亲自把它读给你们听，不过我想你们不会喜欢那样。

我会在这里摘取若干片段，不过这会明显降低注意力的强度。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看出：我带给你们、或者说将要试着带给你们的公式，常常严格沿着——我是说紧贴着——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前进。

弗洛伊德提出这些问题时，走的往往是一条曲折道路；他援引各种接受程度不一的心理学主题和其他主题。除了那些充当他参照的主题以外，他使用这些通行主题的方式所隐含指向的对象，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充当他参照的，是他同读者共有的东西。而他使用它们的方式显现出一个在他以前从未得到提示的维度——只有从未翻开过这部书的人，才会觉察不到这一点。

这个维度恰恰就是能指的作用。我想直接切入今天的问题：弗洛伊德问，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快乐的来源是什么？”他这样说。按照一种如今过于流行、某些人在描述它时会采用的语言，这种快乐的来源本质上应当从它的形式方面去寻找。

幸运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这样表述的；他的表述还要更精确：

“诙谐中的快乐来源——他甚至这样说——就只是玩笑。”

这才是快乐的真正来源。当然，我们在运用诙谐的过程中享受到的快乐，却集中在别处。我们难道没有觉察到这项来源的方向，以及贯穿他全部分析的一种歧义吗？这种歧义内在于诙谐的运作本身，使我们觉察不到快乐从何而来，以至于必须凭借他的全部分析努力，才向我们显示出来。这是一项绝对根本的要素、步骤。

依照一套越接近全书末尾就显得越鲜明的参照系统，他把这项快乐来源同儿童活动的游戏时期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同最初的词语游戏有关；这归根到底直接把我们带回语言作为纯粹能指的习得。严格说来，正是言语游戏，是一种我们几乎可以称为纯粹发出——甚至不只是几乎，而是纯粹发出言语形式——的活动，带来了原初而根本的快乐。

那么，诙谐中的主要快乐动力，是否就只在于回到对能指本身的一种运用，回到批判与理性进行控制之前的时期？随着教育和对现实的各种学习，批判与理性会逐渐迫使主体对能指的这种使用施加控制。这项差异就是诙谐所产生快乐的主要动力吗？

如果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东西可以归结于此，事情当然显得非常简单。可他远不止于此。他告诉我们，快乐的来源在那里，同时也向我们显示这种快乐在哪条道路上被使用：可以说，它服务于一项解放这些古老通路的运作……这些通路仍以潜在可能的方式存在，仍在那里，可以说还支撑着某种东西……而从这些通路经过，就赋予它们一

项特权，使其相对于那些随着主体走向成年、在主体思想控制中被推至前台的通路占据优势。

使这些通路重新获得特权，会让我们立刻进入……正是在这里，他此前对诙谐动力和机制所作的全部分析开始起作用……进入那些作为无意识本身之道路的结构性通路。

换句话说，诙谐的两个侧面——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一方面是：

- 对能指的这种运用及其自由；它把能指根本歧义的一切可能性推至最高点。说到底，它还把能指相对于意义的原初性质、它相对于意义的根本多价性、它对意义的创造功能，以及它给意义带来的任意性色彩推至最高点。这是诙谐的一个侧面。

- 另一个侧面则是：这种运用本身把我们引入、引向并唤起一切属于无意识秩序的东西。

在弗洛伊德看来，下面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表明这一点：诙谐所揭示的结构，即它的构成与结晶的运作方式，无非就是他本人在最初把握无意识时发现的那些结构，也就是：

- 在梦的层面；

- 在失误行为——或者说成功行为，随你们怎样理解——的层面；

- 乃至在症状的层面。

我们试图给这一点一个更紧凑、更精确的公式。既然我们在隐喻与转喻的形式和条目下，重新找到了它们最普遍的形式……这些形式对于

任何语言运用都是等价的，同时也构成我们将在无意识中重新找到的结构性东西……那么，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结构中突出的凝缩、移置和其他机制，可以说就只是这些最普遍形式的应用。

无意识与某种东西之间的共同尺度……我们赋予后者，并不只是循着心理习惯的道路，而是通过它同欲望的关系中真正具有动力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无意识同言说结构之间的共同尺度——言说结构受能指法则支配——正是我们试图越来越贴近的东西。我们借助弗洛伊德关于诙谐的著作，试图给它举例，使它成为范例。今天，我们要试着更仔细地看它。

如果我们强调所谓“能指法则的自主性”，如果我们说，相对于意义的创造机制，这些法则居于首位，这当然并不免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仅应当怎样构想意义的出现；而且——套用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提出得颇为笨拙的一个公式——我们还会说“意义的意义”，尽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意义。

可是，当我们谈论意义时，究竟想说什么？弗洛伊德在论述快乐机制的这一章里也提到了它，不断援引它；他还谈到人们论诙谐时经常使用的公式：“无意义中的意义”。很久以前，作者们就这样说了；这个公式可以说同时陈述了快乐表面上的两个侧面：诙谐最初以无意义击中我们，另一方面又通过某种隐秘意义的出现吸引并奖赏我们——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这种意义始终难以界定。它就在这项无意义之中，或者出现在无意义打开的通道里；后者会在那一刻使我们头晕目眩、瞠目结舌。

这或许更接近机制，而弗洛伊德无疑也更接近于赋予它较多属性：也就是说，无意义的作用是在那里暂时欺骗我们，持续得足够久，好让一项意义……一项此前未被察觉、但也会迅速掠过而消失的闪电般意义；它同那阵令我们在无意义前短暂停驻的惊愕具有相同性质……通过对诙谐的把握击中我们。

事实上，如果更仔细地看，就会发现弗洛伊德甚至拒绝了无意义这个说法。今天我也想让我们停留在这里，因为这些近似说法的特点，正是让人停在某些无疑有其外观、也有其心理诱惑力的公式上，从而避开最后的词项、避开正在运作的机制之最后动力；不过严格说来，这些公式并不合适。

我建议从某种东西出发，不再求助于儿童。我们当然知道，儿童确实能从这些言语游戏中取得某种快乐，也确实可以援引这种东西，为诙谐机制的一种心理发生赋予意义和分量。但如果你们对这件事的思考，不只是满足于一种已经确立的惯例——也就是援引这种遥远的原初游戏活动；毕竟，人们可以把一切恩惠都赋予它——它或许也不应让我们如此满足，因为儿童参与诙谐快乐的程度非常有限；这种快乐是否应当通过求助于幻想而得到穷尽解释，根本并不确定。

但我想抵达某种能在能指的这种用法同所谓满足或快乐之间打成结的东西。这里，我要重新回到那个看似基本的参照：如果我们求助于儿童，终究不应忘记，能指起初是为了服务于某种东西，是为了表达一项要求。那么，让我们暂时停在要求的动力上。需要中的某种东西借助一个能指通过，并被传达给大他者。这就是要求。上次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项参照值得我们试着探究其中的各个时刻。人们对这些时刻探究得如此之少，以至于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

一位极具代表性的精神分析等级体系人物［鲁道夫·勒文施泰因？］为此写了整整一篇约十二页的文章，惊叹于他所谓 wording 的种种优点。这个英语词相当于我们在法语中比较笨拙地称作“转为言语”或“言语化”的东西。它在英语中显然比在法语中优雅。

他曾对一位患者作出干预，对她说了一句大意是“您有些异乎寻常、甚至很强烈的 demands［要求］”的话；患者对此格外抵触……而英语中的语气比法语甚至更为强烈……她简直像受到指控或告发一样大为震动。他惊叹的是：稍后再次使用同一个词项时，他改用了 needs，也就是“需要”，便发现她变得十分顺从，愿意接受他的解释。这位作者把自己的发现装配成形的方式，清楚显示出：wording 的艺术在精神分析内部——至少在分析界的某个圈子里——仍处于原始状态。

因为事实上，一切都在这里：要求本身同大他者如此密切相关，以至于一旦由大他者来指控它，大他者就立刻处在指控主体本人、把主体推开的姿态中；相反，通过唤起需要，他确认了这个需要，承担并认可它，把它带向自己，已经开始承认它。这是一项根本满足。

要求的机制当然……以及大他者就其本性而言同它对立这个事实；或者还可以说，要求本性上就要求别人同它对立，才能作为要求得到维持……恰恰同把语言引入沟通相联系，并且每时每刻都由大他者接近要求的方式显示出来。

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语言维度到来，是为了重塑需要系统，同时也把它倾入无限的能指复合体。正是在这个限度内，要求就其本性而言，本质上把自己设定为可以漫无边际。儿童会“要月亮”并非毫无缘故。

他们之所以“要月亮”，是因为借助能指系统表达的需要，就其本性而言会“要月亮”。

况且，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把月亮许给他们。而且，我们也已经接近得到它了！归根到底，我们还没有得到月亮。可最要紧的是注意并突出下面一点：在这项要求满足某种需要的过程里，纯粹而直接地发生了什么？我们回应要求，把近人向我们要求的东西给他。可是，他必须钻过怎样的老鼠洞？他的诉求必须削减到什么地步，他又必须把自己削减成什么样子，要求才会获得批准？

需要赤裸地显现时，这个现象已经充分突出了这一点。我甚至要说，为了把它作为需要来接近，我们必须越过主体，参照某个难以名状的大他者：

- 对践行基督教慈善的人而言，它名叫基督，基督认同于穷人；
- 但即便对其他人、对欲望之人、对莫里哀笔下的唐璜而言也是如此：他当然把乞丐所要求的东西给了他；而他补上一句“为了对人类的爱”也并非毫无缘故。

要求的回答、对要求的允诺，归根到底被呈送给一个越过你面前那个人的大他者。而“蛋黄酱三文鱼”的故事——弗洛伊德围绕它来转动其诙谐分析的故事之一——是这里最漂亮的例证。

一个乞求者为了应付某些债务和到期款，需要一笔钱；有人给了他钱，却发现这份慷慨的受益者把钱用在别处，并没有用于那种仿佛已经符合某个同样有限的心灵的用途，于是十分愤慨。

这是一则真正的滑稽故事。第二天，他在一家餐厅找到那个人，看到他正在享用被视为奢侈消费标志的“蛋黄酱三文鱼”，便用讲述这个故事时会有的一点维也纳口音对他说：

> “怎么回事！我给你钱是为了这个吗？为了让你吃蛋黄酱三文鱼！”

另一个人于是进入诙谐，回答说：

> “可这样我就不明白了！ 没钱时，我吃不起蛋黄酱三文鱼。 有钱时，我也不能吃！ 那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吃蛋黄酱三文鱼？”

任何诙谐例子，都因它在其中移动的领域本身而具有更强的意指性；它的特殊性看似只是故事中无法普遍化的某种特别东西，却使例子更加意味深长。正是通过这项特殊性，我们抵达自己所处领域最鲜活的动力。这个故事同任何其他故事一样切题：它们总是把我们放进问题的核心，放进能指与欲望的关系，并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欲望在穿过能指通路时，重音发生深刻改变，遭到颠覆，自身也变得暧昧。

让我们充分听懂这一切的意思。任何满足总是以某个语域之名得到准许；这个语域引入的大他者，位于提出要求的人之彼岸。恰恰是这一点，深刻地扭曲了要求以及回应要求的系统。

- “给赤身者衣服。”
- “给饥饿者食物。”
- “探望病人。”

> ……我不必向你们重述七件、八件还是九件慈悲善工。但它们的措辞本身颇为醒目："给赤身者衣服"。如果要求必须在最直接的锋刃上得到维持，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不是让赤身的男人或女人"穿上衣服"——我的意思是穿克里斯汀·迪奥的衣服？这种事偶尔确实发生，不过通常是因为人们首先亲手脱掉了他们的衣服。

同样，"给饥饿者食物"：为什么不"让他们吃喝到撑"？人们不这样做，因为这会伤害他们；他们习惯了节制，不应打扰他们。

至于"探望病人"，我要提醒你们萨沙·吉特里的一句俏皮话：

> "拜访总会使人高兴。不是你到达时，就是至少在你离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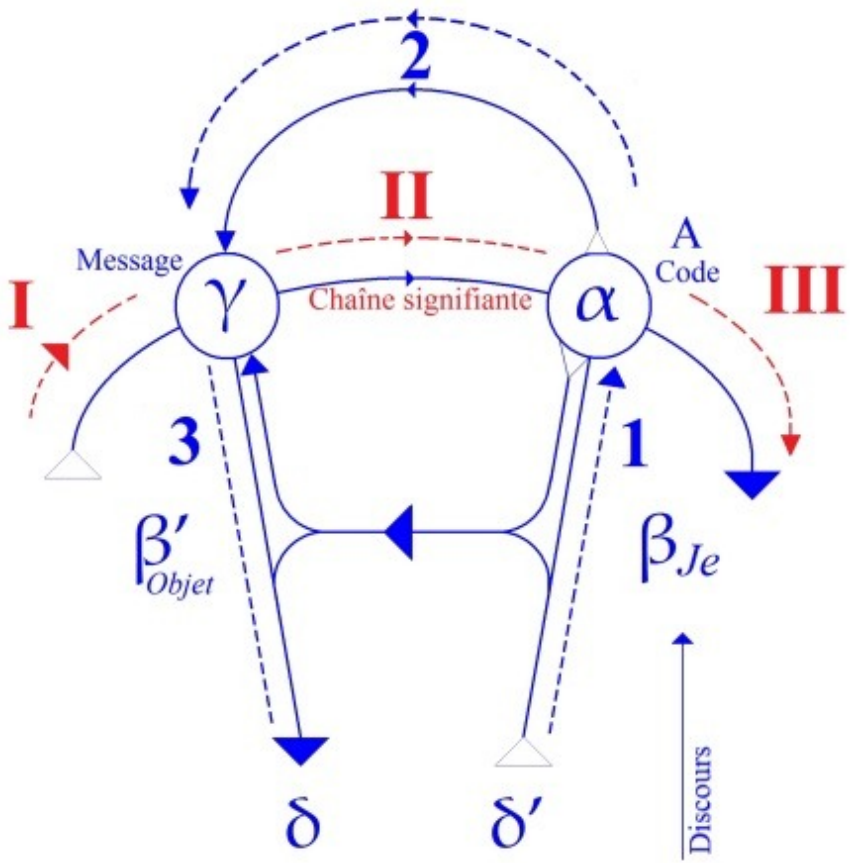
要求的主题关系处在今天论题的核心。那么，让我们试着把那个停顿时刻发生的事情图式化。可以说，它通过一条独特的、"刺刀形"的道路，把要求的传达同要求得以接近的位置错开。

为了使用这个小图式，我请你们参照的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神话性却又深刻真实的东西。方式如下：让我们假定一件必定在某处存在的事——哪怕只存在于我们的图式里——也就是一项顺利通过的要求，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在这里。

如果弗洛伊德在我们对人的思考中引入了一个新维度，那并不是因为——我不会说某种东西终究成功通过——而是因为这个注定要通过的东西、这个本应通过的欲望，在某处留下的并不只是痕迹，还留下一个不断坚持的回路。

因此，让我们在图式上从某种代表顺利通过的要求的东西出发。既然涉及童年，我们完全可以把顺利通过的要求安置在那里。这个儿童表达着某种东西；对他而言，这还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分节，不过他从这项分节中获得快乐——弗洛伊德所参照的正是它。

他发出自己的要求。我们说，它从某一点出发——幸好这时它还没有进入运作——有某种东西从我们称为 Δ 或大写 D 的点画出：要求［demande］。这向我们描述了什么？它描述需要的功能：某种东西得到表达，从主体出发，终结主体的需要线。




恰恰是它决定了我们在这里析出为“话语”之物的曲线；而这通过动员某种先已存在的东西完成。我并没有发明“话语”这条线：它把当时还非常有限的能指储备投入运作，因为与此相关，它表达出某种东西。

请这样看：如果你们想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升——

- 年幼主体发出呼唤时的意向［$1_{\rightarrow}\,2_{\rightarrow}\,3$］，无论你们把它设想得多么混乱；

- 以及能指［$I_{\rightarrow}\,II_{\rightarrow}\,III$］，无论你们把它在这项努力、这声呼唤中被动员起来时的用法设想得多么杂乱，它都会同时向前推进。这个过程有一种我已经向你们标明的增长方向；它有助于理解句子的追溯性效应——句子恰好在第二时刻结束之处闭合。

请注意，这两条线尚未交叉；换句话说，说出某种东西的人，总是既比他自以为说出的更多，也比它更少。这里对儿童最初摸索着使用语言这一特点的参照，得到了充分应用。换句话说，如果那项将在此称作要求的东西在两条线上平行地完成，它仍要到第二时刻末尾，能指才会在某个东西上闭合；这个东西以无论多么近似的方式完成了要求的意义，从而构成讯息。严格说来，这也是大他者——让我们称之为“母亲”，好让我们偶尔承认存在好母亲——所唤起的东西，并同讯息的完成并存。两者同时相互规定：

- 一方作为讯息；

- 另一方作为大他者。

在这条双重曲线的第三时刻，我们会看到某种东西在这里完成，也看到另一个东西在此完成。对于后者，我们至少会以假设方式指出应当怎样命名并定位它们，将它们放进要求的这种结构化中。我们试图把这项结构化安置在最底层，作为能指最初在表达欲望时得到运用的基础。

至少暂时而言，我请你们接受一项参照，把它当作我们随后将试图展开之物最有用的参照：在第三时刻，有一个理想情形，要求可以说恰好遇见了延续它的东西，也就是那个围绕其讯息重新拾起它的大他者。

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里考虑的东西不能完全同满足混为一谈。因为当需要显现时，任何能指的介入与运用本身都包含某种改变需要的东西；凭借能指的补充，它已经带来最低限度的转变——总而言之，就是最低限度的隐喻。这使得到意指的东西越过了赤裸的需要，受到能指用法的重塑。总而言之，某种东西从这里开始发挥作用、介入并进入所指的创造：它不是对需要纯粹而简单的翻译，而是对需要的重新拾取、再次承担与重塑，创造出一个不同于需要的欲望——也就是需要再加上一个能指。

正如列宁所说：

“社会主义大概是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不过完善的共同体还要再加上电气化。”

这里，在需要的表达中“再加上”了能指。而在另一边、也就是第三时刻，无疑有某种东西同这场奇迹般的出现相对应。我们把它假定为奇迹般、完全令人满足的：大他者使这里创造出的某种东西得到满足。

这里通常抵达的，正是弗洛伊德向我们呈现的运用能指的快乐；总而言之，是在这个理想的成功情形中运用能指链本身的快乐，也就是大他者来到这里、恰好延续能指运作的情形。

延续能指本身之努力的，是它在这里化解为一项专有、真正的快乐，即使用能指的快乐。你们可以在这几条界线中看到这一点。请你们暂时把它作为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假设来接受；这项假设将一直潜藏在我们对通常情形、对能指的实际运作中所发生之事的一切构想之下。

在要求的用法中，底下将由一项原初参照支撑：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完全成功、最初成功、神话性的成功，或者能指运作的原初古老形式。要求本身这样完整地、成功地通过并进入实在；由于它同时创造了讯息与大他者，最终抵达：

- 一方面，由使用能指本身所引入的这种对所指的重整；
- 另一方面，把能指的运作直接延续为一项真正的快乐。

两者彼此平衡：

- 一方面，确实存在我们同弗洛伊德一起在言语游戏本身最初起源处重新找到的这种运作；它是一种随时准备涌现的快乐。
- 另一方面，我们马上会看到，为了同它对立而发生的一切，始终把这项出现的新事物遮蔽得多么严密。它不只出现在对要求的回答中，而且出现在言语要求本身：某种东西在那里出现，使需要复杂化，改变需要，把它安置在我们从此将称作欲望的层面。

欲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由相对于一切纯粹而简单的需要之想象性方向的根本错位来界定。欲望自身把需要引入另一种秩序，也就是象征秩序，连同象征秩序可能在这里带来的一切扰动。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某种东西围绕这项最初神话涌现。我请你们参照它，因为在下面全部论述中，我们必须以它为依托；否则，弗洛伊德关于诙谐之专有快乐机制所表达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可理解。

我要强调，由于能指的引入而在所指中出现的这项新事物，就是我们随处重新找到的某种东西：在无意识的各种显现中，弗洛伊德每逢转折都把它强调为一个根本维度。

弗洛伊德有时告诉我们，在无意识的形成层面，有某种名叫惊奇的东西向我们显现。我们不应把它看作这项发现中的偶然事件，而应把它看作其本质的根本维度。惊奇现象中有某种原初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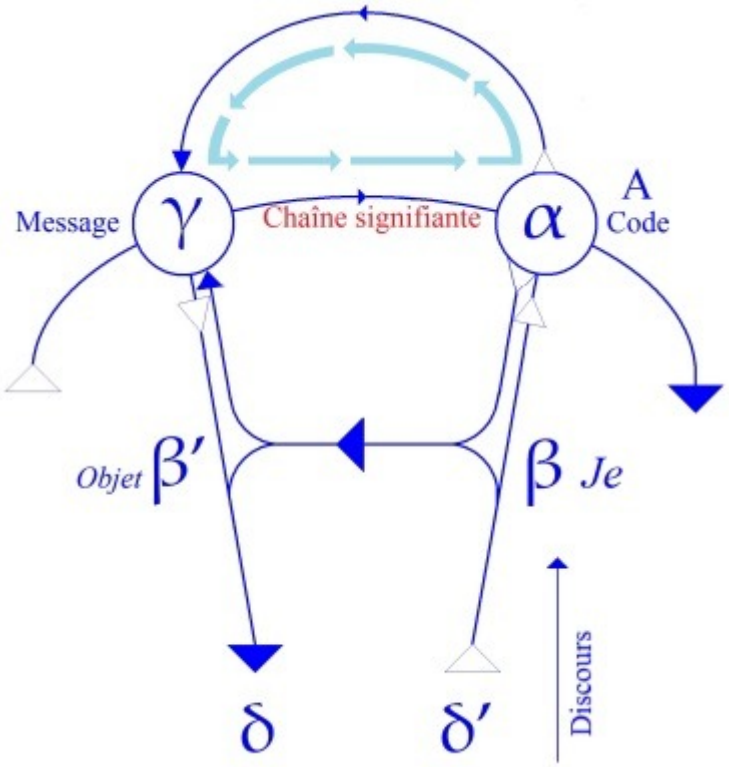
- 它可以产生在一项无意识形成内部，因为这项形成本身以其出人意料的性质震动主体；
- 也可以在你们向主体揭示它时，使主体产生这种惊奇感。

弗洛伊德在各处都指出这一点：

- 或在《梦的解析》中；
- 或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
- 又或者在《诙谐……》文本的每个时刻。

惊奇这个维度本身，同欲望在已经进入无意识时所处的状况具有共同本质。它是欲望作为欲望而携带的、属于其自身的涌现条件；欲望正是凭借这项条件，才有可能进入无意识，因为并非所有欲望都能进入无意识。

只有那些已经得到象征化的欲望才能进入无意识；进入之后，它们能够以自身的象征形式保存下来，以那种弗洛伊德在《诙谐》中再次举例说明的不可毁灭的痕迹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欲望不会磨损，也不具有任何不满足所特有的无常；相反，它们由这项象征结构支撑，而后者把它们维持在能指循环的某个层面。我已经指出，在这幅图式中，它应当位于讯息与大他者之间的回路：



也就是说，它占据一项功能、一个位置。根据它发生的具体情形与影响，我们必须循着同样的道路，构想无意识旋转的回路：它总是在那里，随时准备重新出现。这发生在隐喻的作用中：

- 某种东西从某些独特回路出发，撞进转喻的通行、平常而公认的回路；正是在这个限度内，新意义才会涌现；
- 最后，在机智之笔中，讯息与大他者之间这次回球公开发生，从而产生机智之笔的独有效应。

现在，让我们进入更多细节，试着把握并构想它。

如果我们不再处在这项原初层面、不再处在要求以其固有形式初次建立的神话层面，事情怎样发生？让我们回到这个绝对根本的主题。机智故事里到处都只有这一件事：只有乞求者得到别人给予的某些东西：

- 或者，别人给予他们没有要求的东西；
- 或者，别人把他们要求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却另作他用；
- 或者，他们以一种格外无礼的方式对待给予者；可以说，在乞求者同被乞求者的关系中再现了忘恩负义这个受祝福的维度。

否则，答应任何要求都会真正令人难以忍受。请注意，正如我们的朋友曼诺尼在一部优秀著作中极为中肯地指出的，对要求作出答应的正常机制，就是激起不断更新的要求。因为归根到底，当要求遇见听者、遇见它所面向的耳朵时，它究竟是什么？

这里，让我们稍微作一点词源学考察。尽管我们所应参照的根本维度不一定存在于能指的用法中，一点词源学仍然足以照亮我们。这个要求在具体实践、用法和词项运用中，带有如此鲜明的强求色彩……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比其他语言更明显，但其他语言中也一样……它最初是 demandare，也就是把自己托付出去；在一个共有语域与语言的层面上，就是把全部自我、把自身全部需要交付给另一个人。

要求的能指材料无疑借自这里，但实际提出要求的行动又给它强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重音。

然而，随着语言演变，你们看见这些被隐喻性使用的材料来自何处；这足以向我们说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著名依赖情结。在曼诺尼所说的意义上，它产生一种效应：一旦提出要求的人能够认为对方确实答应了自己的某项要求，就真的再也没有界限；他能够、应当，而且自然会把自身全部需要托付给对方。

我刚才唤起的忘恩负义之好处，会让事情终止，终止那个本来无法停下来的东西。不过，乞求者也从经验中养成习惯，不会这样赤裸地提出要求。要求丝毫没有信赖可言；他太清楚自己在对方心里会遇见什么，因此会把要求伪装起来。也就是说，他以另一件东西的名义，要求自己需要的东西；有时，他也确实需要那件东西，但它更容易被接受为提出要求的托辞。

必要时，如果他没有那件东西，就干脆把它发明出来。尤其是，他在表达要求时会顾及大他者的系统，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系统：

- 他会以某种方式对慈善女干事说话；
- 以另一种方式对银行家说话——这些人物在故事里显出的轮廓都十分有趣；
- 以另一种方式对媒人说话；
- 又以另一种方式对这个人或那个人说话。

也就是说，他的欲望不仅会被能指系统捕获并重塑，而且会被在大他者中建立、设置的能指系统捕获并重塑；换句话说，要依照大他者的代码。因此，简单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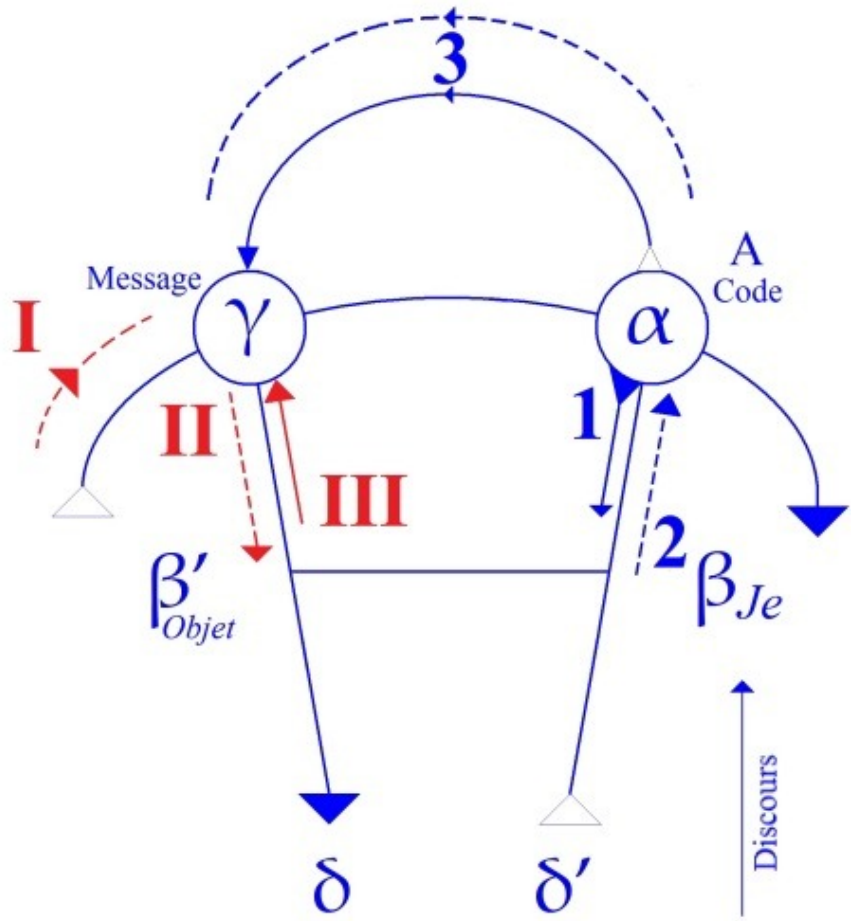
- 他的要求将从大他者出发，开始形成［1］；
- 首先反映［2］到某种早已在他的话语中转为主动状态的东西上，也就是此处或彼处发出要求的那个“我”上；
- 再把它反映到大他者上，沿这条回路行进，最终完成为讯息［3］。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呼唤、意向，是次级需要的回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尚不太需要赋予它过多理性重音，只须说它受到大他者系统的控制；这个系

统当然已经包含各种因素，而我们只是在这个场合才有理由把它们称作理性的。

让我们这样说：即使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是理性的，它们的结构也并不因此必然是实际理性的。按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三个时刻，能指链上发生了什么？



某种东西再次动员全部装置、全部配置、全部材料，首先抵达这里的某样东西；不过，它并不立刻通向大他者，而来到这里并反映［γ ⟶ β’ ⟶ γ］于一个东西上。这个东西在第二时刻对应着对大他者的呼唤，也就是这个对象，因为：

- 它是大他者可以接受的对象；
- 它是大他者愿意欲求的对象；
- 它是转喻对象。

要求反映在这个对象上，并在第三时刻汇聚到讯息；于是，我们在这里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第一次神话性表现要求及其成功时，三个时刻结束处达到的那种幸福满足状态；那里有出人意料的新颖事物，也有自身即令人满足的快乐……我们停在了一项讯息上。它自身带有一种歧义特征，因为它是某种从出发之初就已经异化的表达所形成的会合……这项表达从大他者出发，并从这一侧抵达某种可以说是大他者之欲望的东西，因为呼唤正是从大他者本身被唤起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在自身的能指装置中……引入各种“约定俗成的”要素。严格说来，它们就是我们将称作对象的“共同性”或真正的移置的东西，因为对象受到大他者世界的深刻重塑。

我们已经看到，第三时刻箭头的两个终点之间的不协调如此醒目，以至于它本身就可能通过两条道路，抵达我们所谓的口误、言语踉跄。这里形成的未必是一个单义的意指；它远非单义，语言中根本的发错牌与误认特征反而构成其根本维度。诙谐将在这项讯息形成的歧义上运作；诙谐能够以各种名义从这一点出发形成。

今天，我还不会勾勒这项讯息可以被重新拾起的各种形式。讯息依其根本歧义、依其结构性歧义形成之后，会受到某种处理；根据弗洛伊德所说，这项处理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恢复那条理想进程：一方面抵达新颖事物所带来的惊奇，另一方面抵达能指游戏的快乐。这就是诙谐的目标。

诙谐的目标，是重新向我们唤起一个维度：欲望即使不能追回已经发生的东西，至少也会指出自己一路上失去的一切，也就是：

- 一方面，它以废料形式留在转喻链层面的东西；
- 另一方面，它未能在隐喻层面充分实现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称作自然隐喻，即欲望在主体中形成之后，纯粹、直接而理想地过渡到重新拾起并接受欲望的大他者那里。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更为演进的阶段；这里已经有两样东西介入主体的心理：

- 一方面是“我”；
- 另一方面是受到深刻改造的对象，即转喻对象。

  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自然”隐喻，而是隐喻的日常运作——不论它成功还是失败——它就在这项讯息的歧义中运作；如今的问题是，是否要在仍处于自然状态的条件中为它安排一种命运。

这项欲望的一整个部分，将继续以能指废料的形式在无意识中循环。在机智之笔的情形下，通过某种强行突破……

- 一种幸福的阴影；
- 一场惊人的、完全由能指运载的成功；
- 古老满足的反光……

  某种东西将顺利通过；它产生的效应，极其准确地再现了要求得到满足时的最初快乐，同时又抵达一项独特的新颖事物。

这就是机智之笔凭其本质所实现的东西。它怎样实现？我们迄今看到了什么？我们归根到底说的是：这幅图式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某种东西；它既是这条能指链第一条曲线的完成，也延续了从意向性需要进入话语的东西。怎样延续？通过机智之笔。

但机智之笔怎样见诸天日？这里，我们重新遇见意义与无意义的维度；不过，我认为必须更仔细地贴近它们。如果我上次给你们的转喻功能指示瞄准了某种东西，那么严格说来，它就是能指链展开过程中发生的均等化、平整化与等价化，也就是同意义削减相伴的种种抹除。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意义。某种东西……单凭我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参照，就可以看出：我们让两个需要对象投入运作，使其中一者成为另一者的价值尺度，这会从它身上抹去恰恰属于需要秩序的东西，并由此把它引入价值秩序……从意义角度看，借助一个同样带有歧义的新词，可以把它称作“去意义”［dé-sens］。今天，我们只把它称作“少量

意义”［peu de sens］。你们一旦掌握这把钥匙，就会看见转喻链、这项“少量意义”的意指。绝大多数诙谐恰恰都在它上面游戏。

诙谐必须突出并带出的，不是无意义的特征。我们这里并不处在那些高贵灵魂的诙谐中；这些灵魂刚刚走出自己的大荒漠，便向我们揭示普遍荒诞的伟大奥秘。“美丽灵魂”的话语即使没有成功提升我们情感的高贵性，

近日却提升了其作家身份的尊贵性[注1]；尽管如此，这种关于无意义的话语，仍是我们听过的最空洞的话语。

> [注1] 此处指阿尔贝·加缪；他于 1957 年刚获得诺贝尔奖，并著有小说《局外人》。

这里绝不是在作无意义的游戏；每当歧义被引入时，情况都是如此：

- 无论是那则牛犊故事——上次我自己也拿这头牛犊取乐，几乎替亨利·海涅作出回答；让我们说，到了人们谈论它的那个日期，这头牛犊终究已经不怎么值钱了；

- 还是你们在文字游戏中找到的一切，特别是所谓思想文字游戏……都在于利用词语支撑完整意义时的单薄性来游戏。

正是这项少量意义本身被重新拾起；某种东西由此通过，把这项讯息还原到它实际的作用范围。讯息既是任何要求表达的成功，也是其失败和必然力量；它来到这里，围绕这项少量意义询问大他者。大他者的维度至关重要。

因此，弗洛伊德把诙谐、机智之笔的本性停驻在某种完全原初的东西上：不存在孤立的机智之笔，机智之笔总同某种东西相连。即便是我

们亲手锻造、发明了它——假如确实是我们发明机智之笔，而不是它发明了我们——我们也会感到需要把它交给大他者；大他者负责认证它。

这个大他者是谁？为什么需要这个大他者？这种对大他者的需要是什么？

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足够时间界定它，赋予它结构与界限。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只说一点：在机智之笔中传达给大他者的东西，主要已经以一种格外狡猾的方式进行游戏；我们应当始终让其特征保持在眼前。

问题始终不在于激起某种“根本荒诞”的悲怆呼告。刚才援引这个时代一颗伟大“软脑袋”的作品时，我已经提到它。问题在于提示这项“少量意义”的维度：

- 可以说，询问价值本身；
- 可以说，要求价值实现其价值维度；
- 要求它把自己揭示为真正的价值。请充分注意，这是语言的一项计谋，因为它越把自己揭示为真正的价值，就越显示自己由我所谓“少量意义”支撑。

它只能朝“少量意义”的方向回答；机智之笔的专有讯息本性正在这里。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在讯息层面同大他者一起重新走上转喻这条中断的道路，并把这个问题带给它：“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只有越过这一点，机智之笔才会完成：大他者领会了这一击，回应机智之笔，把它认证为机智之笔。也就是说，大他者在这个“少量意义”问题的载体本身中，感知到那里有一项意义要求；这要求唤起某种越过未完成之物的意义。那项未完成之物在这一切中滞留途中，带有大他者的标记；大他者尤其以自身的深刻歧义标记任何欲望的表达，严格地把它同能指本身的必然性与歧义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同名异义——请理解为同音——联系起来。

大他者回应这一点时，也就是在从 A 通向讯息的上层回路上，它认证了什么？我们会说，它认证了其中的无意义。这里我还要坚持一点：我不认为应当保留“无意义”这个词；它只有从理性、批判的视角来看才有意义，而这恰好是在这条回路中被避开的东西。

我向你们提出“意义之步 / 没有意义”［pas de sens］这个公式[注]。这里的 pas 就像“螺纹的螺距”［pas de vis］、“四人舞步”［pas de quatre］、“苏兹山口”［pas de Suze］和“加来海峡”［Pas-de-Calais］中的 pas。严格说来，这个“意义之步”正是在隐喻中实现的，因为在隐喻中，主体的意向、主体的需要……

> [注] 法语 pas de sens 通常可读作“没有意义”；拉康又把 pas 当作名词“步、步幅、间距或山口”，使它同时成为通向意义的一“步”。译文保留两层读法。

- 越过转喻性用法；
- 越过在共同尺度、在通行价值中得到满足的东西……

恰恰引入这个“意义之步”。它在一个要素原本所在的位置重新拾起它，以另一个——我几乎要说随便哪一个——要素替代它；相对于

任何得到表达的欲望，它总会引入这个需要之彼岸，而这正是隐喻的起源。

机智之笔在这里做了什么？它所指示的无非就是这个维度本身：

- 严格说来，是作为这样一个“步”的“步”；
- 可以说，是处在自身力量中的“步”；
- 是被抽空了任何需要的“步”……

它在这里终究会表达：在机智之笔中，某种潜藏于我的欲望中的东西能够显现；它当然也可能在大他者那里找到回声，但并非必然如此。重要的是，这项“意义之步”的维度被重新拾起并得到认证。一项移置与此相对应。

新颖事物同“意义之步”一起产生，并不是在对象彼岸；对于两个主体而言，它们同时产生在：

- 说话的人；
- 以及那个对大他者说话、把它作为机智之笔传达给大他者的人。

它走完了转喻维度的这一段，使“少量意义”本身得到接收。大他者认证了“意义之步”，主体的快乐由此完成。

正因为他成功用自己的机智之笔使大他者感到惊奇，他才收获了快乐。这个快乐正是我刚才向你们唤起的神话性、古老、幼儿、原初主体从第一次使用能指时得到的那项原始快乐。我就让你们停在这条进路上。希望它没有让你们觉得过于人为或卖弄学问。对于那些因为这

种小小的空中飞人练习而头疼的人，我表示歉意；不过，我仍认为它是必要的。

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你们的心智能够把握这些东西；但我也不认为，你们投身的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及其他研究，已经把我所谓的你们的常识掺假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不能只凭简单的提示就让你们跟上这些道路。

尽管如此，我的教学法则也使得我们在这里以某种方式区分机智之笔中主体性进展的这些阶段与根本时刻，并非不合时宜。

主体性——这就是我现在抵达的词。因为直到目前，而且今天仍然如此，当我同你们一起处理能指的各种行程时，这一切中间始终缺少某种东西——这种缺少并非毫无缘故，你们会看到。今天在这一切中出现的，只是一些几乎缺席的主体，一些供能指来回击球的支架，这绝非偶然。

然而，对机智之笔这个维度而言，还有什么比主体性更根本？我说主体性，是因为机智之笔的对象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把握。甚至它越过自己所表达的东西而指称的事物，以及它那种根本暗指、内在暗指的特征，在这里都没有暗指任何东西，除了“意义之步”的必然性。

可是，在对象完全缺席的地方，终究仍有某种东西支撑机智之笔：它是体验中体验得最深的东西、承担中承担得最充分的东西；严格说来，正是这个东西使诙谐如此主观。正如弗洛伊德在某处所说，这种根本的主体制约性——决定性的话就在这里，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

“只有……才是机智之笔……

他以一种几乎在任何文学作者那里都找不到的公式之锐利这样说；我从未见过别人笔下有这样的句子：

“只有我自己承认为机智之笔的东西，才是机智之笔。”

可是我仍然需要大他者，因为他接下来的整章……也就是紧随我今天所谈的快乐机制之后、由他称作“诙谐的动机，诙谐所突出的社会倾向”的那一章。人们把它译成法语“推动因素”［mobiles］；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法语要把 motif 译成 mobile……其根本参照正是这个大他者。

没有这个大他者，就没有机智之笔的快乐；而且大他者也作为主体存在。若没有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所谓机智之笔的第一人称，即创造它的人，同那个他认为绝对必须把它传达给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快乐就不存在。这提示了大他者的秩序。现在就把话说到底：严格说来，这个大他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如此鲜明地把握它的特征……在这个层面上，正是我所谓大写 A 的大他者。

我希望下次向你们显示这一点。

# 第6课 · 1957年12月11日

今天，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上次，我们把问题停在机智之笔中主体的功能上。

我想，不能因为我们在这里使用“主体”这个词，它在你们那里就变成一块让人擦脚的垫子。使用“主体”一词，通常会在那些首先看重客观性的人那里激起强烈而非常个人化、有时甚至情绪化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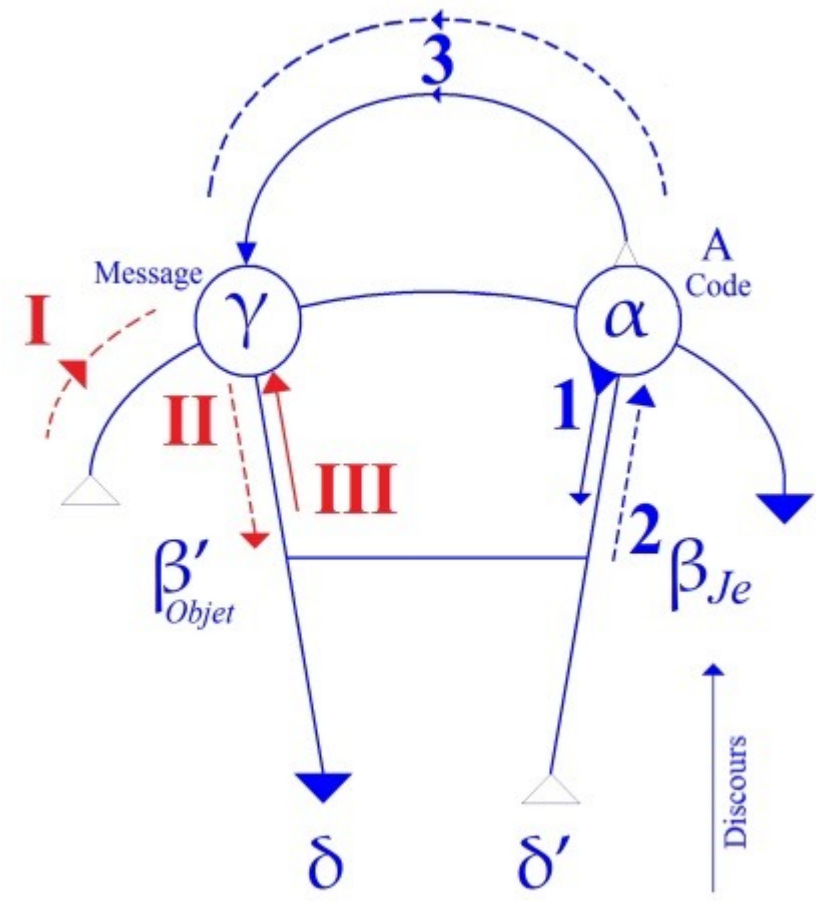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抵达位于这里、由我们称作 A 的这种会合点……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代码场所的大他者，由机智语构成的讯息抵达这里……在我们的图式中，可以在这个层面沿一条从讯息到大他者的道路跨过去；这条道路就是能指链的单纯接续，因为它是话语层面所发生之事的基础。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在句子的文本中，显现出某种根本的东西；它从中散发出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少量意义”。

大他者对句子“少量意义”的认可——它总在机智之笔中或多或少地显现——就是我们上次指出的东西，不过当时没有停留。我们只说：从大他者那里，这里所传送的东西经过双重作用再次发出，返回讯息层面，从而认可讯息，构成机智之笔。这是因为大他者接收到以“少量意义”呈现的东西，并把它转化成我们以一种双关、歧义方式称作“意义之步 / 没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借此强调的不是意义缺席，也不是无意义，而是洞察意义如何显示自身程序的一“步”：意义始终带有怎样的隐喻性与暗指性；需要一

旦穿过由能指存在所引入的要求辩证法，就可以说再也无法同自身会合。

语言中的一切，都是通过一连串类似于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步伐来运行的；它趋向重新创造完整意义、别处的意义，却始终无法抵达这个意义。



这就是上次讲授最后十五分钟里我们抵达的图式。听说那段话有些“疲惫”，有人这样告诉我。还有人说，我的句子没有结束。不过，重读文本时，我并没有发现它们缺头少尾。正因为我试图一步一步把自己推进某种难以传达的东西，这些踉跄才必然发生。如果今天再次发生，我向你们道歉。

我们现在必须追问这个大他者的功能，说到底，就是追问这个大他者的本质：它在我们称作“意义之步”的跨越中是什么？我们已经充分指出，这个“意义之步”可以说是部分地重新获得那种理想的充盈：要求纯粹、直接地得到实现。我们的辩证法正是从那里出发的。

这个“意义之步”通过怎样的嬗变、实体转化——可以说，一种微妙的圣餐运作——才能被大他者承担？这个大他者是谁？

总而言之，弗洛伊德本人谈论诙谐时所强调的问题性，已经向我们充分指明这一点。他有一种让问题悬置的力量。不可否认，我越是阅读——我也从不克制自己——历代为了贴近诙谐这个神秘问题而作的各种尝试，就越发现：无论求助于哪一位作者，甚至追溯至那个丰产时期、浪漫主义时期，都没有任何作者哪怕只是集合起这个问题最初的物质要素。

比如弗洛伊德在这里停留的下面这件事，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 一方面，他以自己那种权威语调说——这同科学话语惯常的羞怯、脸红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只有我承认为诙谐的东西才是诙

谐。”他称之为“诙谐不可还原的主体制约性”；而且弗洛伊德本人说，这里的主体正是说话的人。

- 另一方面，他突出指出：一旦拥有某种严格属于诙谐秩序的东西，我便只急于做一件事。我只有把诙谐、把故事拿到大他者那里进行某种检验——不仅如此，还必须以某种方式传达它的语境——才能充分收获其中的快乐。

要让这项视角显现并不困难。它像一场镜子游戏：当我讲述一个故事时，如果我确实寻求在大他者的同意中找到自己快乐的完成、停驻与一致，那么地平线上仍然保留着一件事——这个大他者接着也会讲述这个故事，把它传给另一些人，如此继续下去。

这仿佛是链条的两端：

> “只有我自己感到是诙谐的东西才是诙谐。”但另一方面：“仅有我自己在这一点上的同意并不足够；　机智之笔的快乐必须在大他者那里并通过大他者完成。”

让我们说“诙谐必须得到传达”——前提是我们非常留意自己的说法，不在这个词中看见任何可能隐含的简化；也就是说，我们让“传达”这个词保持一处敞口，尚且不知道会有什么前来填补。

因此，在弗洛伊德的观察中，我们面对着某种自己已经熟悉的根本东西，也就是“这个大他者是什么”的问题；大他者可以说是主体的相关项。这里，这种相关性在一项要求、在一种铭刻于现象之中的真实需要中得到确认。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主体同大他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形

式。自从我们在这里坚持指出，思考必然会以何种方式向我们提出主体性这个词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它。

我曾提到某种反对意见。它可能来自受过某种学科训练的心灵：他们以精神分析把自己呈现为科学为借口，要求我们只谈论可以客观化的东西，也就是经验能够就此达成一致的东西；并且认为只要一谈主体，它便成了主观的、不科学的东西。这会把某种确实在一定层面属于主体概念的东西牵涉进来，也就是：

- 某种处在对象这一侧的东西，可以说给对象安上一项支撑；
- 还有某种对象彼岸、对象背后的东西，向我们呈现为一种不可知的实体；
- 简言之，是某种抗拒客观化的东西；可以说，你们的教育和心理学训练已经为反对它提供了全部武器。

当然，这还会通向一些更加庸俗的反对方式。我的意思是，把“主观”这个词等同于情感对另一个人之经验造成的扭曲效应；况且，这种看法仍会引入某种透明幻象，把主观奠定在意识对自身的那种内在性中。人们过于迅速地信赖这项内在性，并以为笛卡尔的我思主题可以归结于此。

简言之，这是一整片灌木丛，只是挡在我们同经验中投入运作的主体性之间。在我们分析家的经验中，主体性无法消除；它所循的方式与道路，完全不同于人们可能设置障碍的那条道路。

对分析家、对沿某种“对话”道路前进的人而言，主体性就是他面对这样一个大他者时，必须纳入自己计算的东西：这个大他者能够把他的错误纳入自己的计算，而不是让人有意把错误本身诱发出来。这是我向你们提出的一个公式，当然是可以感受到的。只要稍微援引棋局，甚至猜单双游戏，就足以保证这一点。

让我们说，按这种方式设定词项，主体性会从二元状态涌现，或者看似涌现——我已经在别处强调过这一切，不必在这里重述——也就是一旦有斗争，或者斗争中的伪装、阵势，主体性便会出现。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投入运作的，无疑还可以说只是它的反映。我曾用一些东西说明这一点，想来不必再重述：动物之间的斗争中相互接近以及威吓性勃起的现象，甚至两性求偶中的展示。

我们无疑在其中看到一种自然的接合：互相接近的行为必须汇聚到拥抱之中；在运动层面、所谓“行为主义”层面，它表现为动物仿佛正在跳舞的格外醒目景象。

这也使这个例子中的主体间性概念留有某种歧义。相互吸引可以被构想为只受本能过程中某个可单独析出的循环调节；在欲求阶段之后，这个循环让真正受到追求的本能目标得以完成。我们可以把它还原为一种先天机制、一种先天接替机制；不再提出这项想象性捕获的功能问题，它最终便消失在一切生命目的论的普遍晦暗中。可以说，它曾从两个主体的对立中短暂涌现，但在客观化的努力下又能再次消散、抹去。

可是，一旦我们把一条能指链以任何形式造成的任何阻力引入问题，事情就完全不同。能指链本身在这里引入一项根本的异质性，请听作

ἑτερογενής，并把重音放在 ἕτερος［hétéros］上。原文说它在希腊语中意为“受启发的”［？］、在拉丁语中的本义则是“剩余”“残余”[注]。只要我们让能指投入运作，只要一方借助一条能指链向另一方说话并同其发生关系，就会出现一项剩余。

> [注] 此处转录文本的希腊语、拉丁语释义本身带有问号，且词源关系存疑；译文保留其论述方向，不据此校正原讲辞。

于是，另一种秩序的主体性建立起来。它以真理的场所本身为参照，使我的行为不再只是欺骗性的，而成为挑衅性的；其中包含 A，也就是说，即便为了谎言也必须诉诸真理的这个 A。它甚至能够把真理本身变成某种看似不属于真理语域的东西。

请记住这个例子：

“你明明真的要去克拉科夫，为什么还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

这甚至可以使真理本身成为谎言的需要。不仅如此，它还会让我摊牌时诚信的判定取决于大他者，也就是把我置于大他者的评判之下：我明明正在向他展示自己的牌，他却以为自己识破了我的把戏；吹嘘与欺骗之间的辨别，由此任凭大他者的不诚信摆布。这些根本维度不过是日常经验中的简单经验。

然而，即便它们编织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仍倾向于删略并回避它们。为什么？因为在分析经验和弗洛伊德立场向我们显示能指的异质维度自行运作以前，在我们触及、实现这项异质维度以前，我们始终能够“相信”，也必然不断“相信”；整个弗洛伊德思想都浸透了这种信念，而它建立在某种标示能指功能异质性的东西上，也就是主体同大他者在主体说话时所具有的根本关系。

直到弗洛伊德，这项关系始终被一个事实遮蔽：可以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主体按照自己的良心——无论好坏——说话。这意味着，我们以为主体说话时总有某种意指的意向。

无论是谎言还是真诚，背后都有意向，这并不重要；可是这项意向微不足道。即使它被认为已经失败——我的意思是，主体以为自己在向我陈述意向，却说出了真理；或者主体甚至在努力坦白时仍欺骗自己——在这项情形中，意向迄今仍同意识维度混为一谈，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意识内在于主体作为意指而必须说出的东西。迄今人们认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主体总要说出一项意指；因此，意识维度似乎内在于它。［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对弗洛伊德无意识主题的种种阻碍和反对，最终动力始终在这里。我们怎样构想弗洛伊德向我们呈现的 Traumgedanken［梦思］？对于普通把握与直觉而言，它们归根到底表现为“不是思想的思想”。因此，必须在思想这个主题的层面真正进行一次“解除驱魔”。

笛卡尔我思的主题当然保有全部力量；不过，可以说，它的危害在于人们总是把它扭曲。我的意思是，“我思故我在”很难在其动力的尖端得到把握；况且，它或许本身只是一道机智之笔。不过让它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还没到揭示哲学同机智之笔关系的时候。笛卡尔的我思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中被体验为“我如我所思”，而不是“我思故我在”；当然，这还预设了背后有一句“我像呼吸一样思考：自然而然”。

只要稍微反思一下周围人的心智活动由什么支撑——既然我们是学者，就说那些投身伟大科学工作的人吧——我们很快就能形成这样的

认识：这个“思想体”全体中平均实际运作的思想，无疑不会比任何一位在最直接生存需要中辛勤劳动的女管家那里多出多少。

“思想”这个词和维度本身，同被运载的话语有多重要绝无关系。不仅如此，一项话语越是连贯而坚实，它就越容易容纳各种形式的缺席——这里所谓缺席，是相对于一种能够合理界定的问题而言，也就是主体向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提出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们再次面对以下事实：

- 有一个主体在我们之中思考，依照严格说来同能指链组织法则完全相同的法则思考；
- 这个在我们之中名叫无意识的“运作中的能指”，被弗洛伊德明确地这样指称；他如此突出它的独特性，把它同倾向的一切游戏分开，以至于反复以无数形式告诉我们：所涉的是“另一个心理场景”。

《梦的解析》中每时每刻都重复这个词；事实上，弗洛伊德是从费希纳那里借来的。我曾强调费希纳语境的特殊性：它远不能被还原为对心理—物理平行论的观察，甚至也不能还原为费希纳根据自己所断言的意识领域之存在而作的那些奇特外推。弗洛伊德深入阅读费希纳，并从中借来“另一个心理场景”一词；在他那里，这始终同无意识法则相对于一切可归入前意识领域——也就是可理解者、意指的领域——的严格异质性相关联。

我们今天必须提出问题的，正是这个由弗洛伊德重新找到的大他者。谈论机智之笔时，他也把它称作“心理场景的参照”；围绕诙谐的道路与程序本身，弗洛伊德不断把我们带回这个大他者。

“对我们而言——他说——如果没有某种惊奇，这道机智语就不可能涌现。”

而德文说得更加醒目[注1]：

> [注1] 弗洛伊德：《诙谐及其同无意识的关系》，第五部分“诙谐的动机。诙谐作为社会过程”：“其次，我们由此理解诙谐的一项特性：只有当它对听者而言是新鲜的、以惊奇之姿迎面而来时，才能向听者发挥完整效力。”

- 某种东西可以说使主体同句子的直接内容疏远；
- 某种东西有时借助表面的无意义呈现；这个无意义是相对于意指来听取的，以至于人们会暂时说“我不明白”“我迷失方向了”；
- 主体对自身所承担之物的赞同发生中断：“可以说，这个句子没有真正的内容。”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是诙谐自然准备过程的第一阶段。恰恰在它内部，某种东西将会发生；对主体而言，它会构成一种快乐生成器、一种“快乐发生器”，而这正是诙谐的特征。

这个层面发生了什么？主体中受到召唤的，可以说是哪一种大他者秩序？既然主体之中有某种直接东西通过诙谐而被绕过，那么这种转弯运动的技术必定会向我们说明：主体中的哪种大他者方式受到瞄准、必须被触及。我们今天将停在这里。为了引入它——迄今我几乎只援引弗洛伊德本人讲述的故事——我现在要用一个同样没有经过特别挑选的故事来引入。

我决定今年在你们面前处理 Witz 或 Wit 的问题时，先作了一项小调查。我从询问一位诗人开始并不奇怪；这位诗人以一种格外独特的方

式，把某种特别善舞的才智维度引入散文，有时也引入更具诗意的形式。这种才智可以说栖居在他的作品里；当他偶尔谈论数学时——因为他也是数学家——他也让它投入游戏。总而言之，我指的是雷蒙·格诺。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初次交谈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事情总会严丝合缝地来到你面前，这并不只发生在分析经验里。我曾花整整一年向你们谈马的能指功能［参见 1956—57 年研讨班《客体关系》对小汉斯恐惧症的讨论］；如今，在机智之笔中，这匹马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重新进入我们的注意领域。

格诺讲给我的故事，你们并不知道。他恰好把它当作所谓“长篇机智故事”的例子，同“短故事”对立。这已经构成一项初步分类。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它制约着让·保罗·里希特在某处所谓诙谐的身体与灵魂；与此相对，可以摆上哈姆雷特独白中的句子：如果简洁由诙谐挥洒出来，它也不过是诙谐的身体与装饰。两个说法都对，因为两位作者都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你们马上会看到，“长故事”这个词是否适合格诺的故事，因为机智之笔会在某处通过。故事如下。可以说，这是一则关于考试、毕业会考的故事：有一位考生，也有一位考官。

- “请谈一谈——考官说——马伦哥战役。”

考生停顿片刻，神情若有所思：

- “马伦哥战役？死人！太可怕了……伤员！真是惨不忍睹……”
- “可是——考官说——您不能告诉我有关这场战役更具体的一点东西吗？”

考生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 “一匹用后腿站立、正在嘶鸣的马……”

考官颇为惊讶，想再试探他一下，于是说：

- “先生，既然如此，请您谈谈丰特努瓦战役好吗？”
- “丰特努瓦战役？到处都是死人！伤员多得数不清。太恐怖了……”

考官来了兴趣，说：

- “可是先生，您能告诉我关于丰特努瓦战役更具体的一点线索吗？”
- “哦！——考生说——一匹用后腿站立、正在嘶鸣的马。”

为了变换策略，考官让考生谈谈特拉法加海战。他回答：

- “死人！尸横遍野……伤员！成百上千。”
- “可是先生，您就不能告诉我这场战役更具体的一点东西吗？”
- “一匹马……”
- “对不起，先生！我必须提醒您，特拉法加是一场海战。”
- “吁！吁！——考生说——小马儿，退后！”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分解机智之笔中的问题。我认为，严格说来，这个故事全部的机智特征都在其尖峰处。如果故事只由两个对话者彼此对抗的这种游戏或比试构成，它

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收尾和完成。不论你们把它延伸到多远，效应都会立刻产生。

我们会因这个故事的滑稽性而笑。它确实滑稽；不过，我甚至不想深入这种滑稽，因为人们已经围绕滑稽说过太多夸张而且尤其晦涩的话——自从柏格森先生写了一本关于笑的书以后；对这本书，我们只能说它还算可读。

滑稽由什么构成？眼下我们只说，滑稽同一种二元处境相联系。正因为考生站在考官面前，这场双方武器显然根本不同的比试才会继续；某种东西由此产生，趋向在我们这里激起所谓“强烈的乐趣”。严格说来，使我们发笑的是主体的无知吗？我并不确定。

他提出了人们关于战役所能说出的这些基本真理——至少在参加历史考试时，人们永远不会说它们——这件事显然值得稍作停留。不过我们甚至无法进入其中，因为事实上，那会把我们带向滑稽本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机会进入它；除非为了补充考察弗洛伊德的著作，因为它的确以论滑稽的一章收尾。令人吃惊的是，弗洛伊德在那里突然比自己通常的敏锐低了一百英尺。我们宁可问：为什么弗洛伊德同那些最糟糕、只围绕最基本滑稽和滑稽概念打转的作者一样，可以说拒绝了它？这无疑会帮助我们更加宽容自己的精神分析家同事；他们也毫无滑稽感，仿佛这项感觉被职业实践排除在外。

因此，只要我们参与到一种强烈的滑稽效应中，所涉的似乎更多是关于战争的准备；最后一击必须落在它上面，而这才是这个故事严格说来具有机智的地方。

请你们充分注意：即便你们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构成故事机智的东西不那么敏感，机智仍然被藏在、栖居在一个点上：

- 也就是这次突然越出图纸界限；
- 也就是当考生做出某种严格说来几乎难以置信的事情时——假如我们曾有一瞬沿着把这个故事放进某种实际经历的现实中的路线行进。

对于主体而言，这一切仿佛突然铺展开来，借助缰绳在这幅意象上伸展；这幅意象在这里几乎取得了全部近乎恐惧症性的价值。无论如何，我们仿佛在一道闪光中看到，这个时刻同人们讲述的各种儿童经验具有相同性质。这些经验使从恐惧症到我们极难进入的想象生活中的各种过度，成为同一件事。

毕竟，我们经常在主体一生的病史中看到人们讲述：那匹大马——同一匹从挂毯上走下来、直立着的马——严格地闯入一间宿舍，主体同五十名伙伴正待在那里。马的能指幻想这样突然涌现，使这个故事成为一则——随你们怎么称呼——诙谐有趣或诗意的故事；无论如何，它在这里当然配得上机智这个称号。

如果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你们在这件事上拥有最高裁决权，那么人们立刻就可以把它称作滑稽故事。它的内容汇聚到某种同无意识现象层面已确认、已定位的形式有亲缘关系的东西，这从此并不会令我们惊讶。况且，这正是故事的价值所在：它的这个侧面如此清楚。

但这就足以使它成为一道机智之笔吗？这里可以说已经分解出两个时刻，我将称之为：它的准备与最后的尖峰。我们就停在这里吗？在所

谓弗洛伊德式分析的层面，我们可以停在这里。我不认为其他任何故事会更难揭示现象的这两个时刻、两个侧面；不过在这里，它们格外分明。

归根到底，我认为，使这件事不仅具有诗意或诙谐有趣的特征，而且严格地具有机智特征的，是某种恰好沿着逆向或追溯性道路前进的东西；在我们的图式中，这条道路由“意义之步”标示。

不论这个故事的尖峰多么飘忽、难以把握，它终究朝某种东西而去。

把它明确说出来无疑有些勉强，不过为了显示其方向，我们终究必须这样做。主体带着某种东西不断回到这个特殊点；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不再是机智，而是幽默——也就是那匹用后腿站立、正在嘶鸣的马。可故事真正的妙处或许确实就在这里！

事实上，在我们的经验、训练与文化已经吸收的全部历史中，这确实是最根本的意象。我们在博物馆里走不过三步，看见战役画，就必定会看到这匹用后腿站立、正在嘶鸣的马。

你们知道，自从马颇为辉煌地进入战争史以来，有人站立在马背上、或者骑乘人们表现为用后腿站立并嘶鸣的这种动物，确实标记了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在当时，这确实带来了……也就是在埃赫诺斯二期与埃赫诺斯三期［？］之间的某个时刻，当阿开亚人骑马到来时……一项巨大进步。相对于让马拉战车的人，这些人突然取得了非凡的战术优势。直到 1914 年战争，马才消失在其他使它实际上无法继续使用的工具后面。

因此，从阿开亚时代到 1914 年战争，马的确是这种名叫战争的人际关系或人际贸易中绝对根本的东西。

在某些我们恰可称作“战役史”的历史构想中，马还是核心意象。如今这个时期已经终结，我们相当容易把它看作一种现象：随着历史推进，其中的能指性质逐渐沉淀澄清。归根到底，整部历史被归结为这个在历史光照下显得琐屑的意象；而意义的指示也意味着，人终究不必如此为战役而烦恼——不必为马里尼昂或丰特努瓦，或许倒有更多理由为特拉法加烦恼一点。

这一切当然都不在故事里。问题不在于借此教给我们某种关于历史教学的智慧；故事指向、朝着某处而去，却不进行教导。它指出，这次的“意义之步”朝着什么方向：朝着价值的削减，朝着对某种迷人之物的解除驱魔。这个故事朝哪个方向行动？又朝哪个方向满足我们、给我们快乐？

这恰好涉及能指引入我们的意指时所占的余地。它使我们在某一点上仍是意指的奴仆；在这条能指链为我们维系着的东西之外，终究还有某种东西从我们那里逃脱。那个东西也完全可以在故事一开始就说出来：“死人！伤员！”这种反复吟唱本身竟能使我们发笑，已经充分表明：只要我们通过某种严格意义上的能指偏向进入现实，通向现实的道路便遭到怎样的拒绝。

这个故事在这里仅仅应当作为我们的路标。弗洛伊德强调，只要涉及诙谐的传达和它能够带来的满足，就总有三个人投入运作。滑稽可以满足于一场两人游戏，诙谐中却有三个人。

相关知识卡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这个大他者，也就是第二个人，处在不同的位置：

- 有时，他在这里是故事里的第二个人；我们不知道，也根本无须知道，他究竟是考生还是考官。

- 当我把故事讲给你们时，他也就是你们。也就是说，在故事的第一部分，你们让自己多少受到一点摆布；我的意思是，你们被引向一个要求你们作出不同共感的方向，要么站在考生一边，要么站在考官一边。他们以某种方式使你们着迷，或者使你们相对于某种东西采取反对态度。你们会看到，这个故事在这里并不那么寻求我们的反对，只是让我们在这场游戏中受到某种捕获：考生一开始便同考官交锋，而考官将要出其不意地难住考生。

当然，在其他倾向性更鲜明的故事中，在那些粗俗或性的故事中，这一点以另一种方式初步显现。

你们会看到：

- 问题并不那么在于把你们心中朝某个方向产生的抵抗或反感转移开；

- 反而在于开始让它行动起来。

事实上，故事远不会熄灭你们心中可能提出的反对……一个好故事如果将要变得粗俗，一开头就会有东西向你们指出我们将进入这个领域……此时，你们准备着要么同意，要么抵抗；不过，你们心中无疑有某种东西在二元层面形成对立，让自己被那种预告故事语域与秩序的威望和展示侧面捕获。

尽管如此，某种意外的东西将会出现，而且当然始终出现在语言层面。在这个故事里，严格说来，文字游戏的侧面被推进得远得多；它在这里几乎分解到使我们看见：

- 一方面有一个纯粹能指，在这里就是马；
-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能指游戏要素，只不过它以一种在这里更难重新找到的陈套意象形式出现……

  可是，这个故事中显然没有别的东西。

恰恰在彼岸，某种使你们感到惊奇的东西将成为根本歧义。故事通过一种能指支撑从一个意义过渡到另一个意义……我先前给出的例子已经足以指出这一点……这个洞会使传达给你们的东西抵达以诙谐击中你们的阶段。而且，击中你们的位置始终不同于最初以某种方式吸引、欺骗你们的注意、同意或反对的位置。

不论产生的是哪些效应：

- 无意义效应；
- 滑稽效应；
- 或参与某种性刺激之物的粗俗效应……

  让我们说，它们始终都只是一项准备。可以说，沟通中想象性的、反映性的、严格说来引发共感的东西，以及让主体作为第二个人的一项特定倾向投入运作的东西，都可以分配到两个对立角色中。

这只是故事的支撑与准备。同样，吸引主体注意的一切、在意识层面唤醒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基础，旨在让某种东西转到另一个层面。严格说来，这个层面本身始终表现得或多或少令人费解——总而言之，令人惊奇；正因如此，我们才在无意识层面处在这个另一层面上。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既然所涉始终是纯粹同语言机制本身相联系的某种东西，我们似乎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 大他者在那里寻找并被寻找；
- 大他者在那里得到会合；
- 大他者在那里受到瞄准；
- 大他者在那里被机智之笔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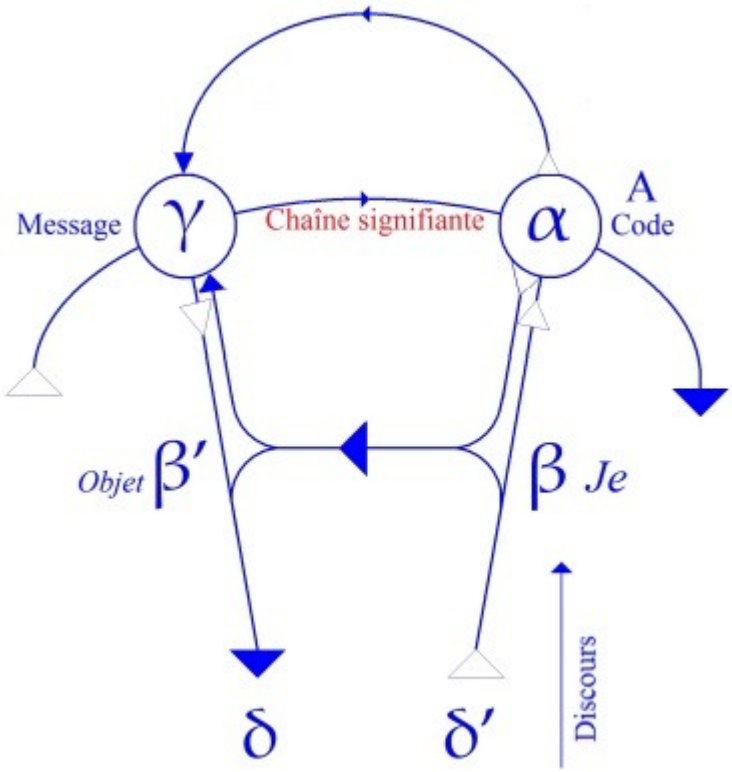
……我们怎样界定这个大他者？

毕竟，如果我们在这幅图式前停一会儿，就能用它说出一些基本真理和非常简单的事情。即便把它当作一张网格或经纬，其中主要应当定

位能指要素本身，这幅图式也不会包含一切。当我们取出诙谐可以归类的各种方式或形式时，便会被带向以下分类：

- 文字游戏；
- 严格意义上的谐音双关；
- 通过意义转换或移置形成的文字游戏；
- 通过意义转换或移置形成的机智之笔；
- 通过所谓词中的微小改动形成的机智之笔；这项改动足以照亮某种东西并使一个意外维度涌现。

总之，不论引入哪些分类要素，我们都同弗洛伊德一起趋向于把它们还原为铭刻在能指语域中的词项。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归根到底，位于 α［大他者］或 γ［讯息］某处的一台机器……例如从两边获得尺度，得以分解我们最初例子中形成 famillionnaire 一词的各条通路；或者在另一个“金牛犊”例子中，分解从“金牛犊”过渡到屠宰用牛犊的过程……只要我们把它设想得足够复杂，能够完整穷尽地分析能指要素，它是否就可以认证、批准所涉之物，并领会这一击，说出“这是一道机智之笔”？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看，讯息相对于代码的等式恰好适当，足以使我们至少处在某种名叫机智之笔的东西可能具有的界限之内。

这个想象当然只是以纯粹幽默的方式提出。显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意味着什么？只要说我们面前必须有一个人，是否就够了？当然，这看起来不言自明，我们也会很满意。如果这样说，它大体上同经验相符；可是，“无意识”一词及其谜题对我们而言已经存在，所以“人”恰恰就是我们必须分解的那类回答。我们先说，自己面前必须有一个实在的主体。

这表明，既然机智之笔的作用栖居在这个意义方向上，而意义——我们已经指出并确认——只能相对于一个能指同一项需要的相互作用来构想，那么对一台机器而言，缺少需要这个维度，就是阻止它以任何方式批准诙谐的反对与障碍。因此，我们清楚看到问题位于何处；可是，我们能否因此说，这个实在的某人必须同我们拥有同质的需要？

我们的进路一开始并不必然指出这一点，因为机智之笔根本不会在任何地方指称这项需要。机智之笔所指称、所朝向的，恰好是需要同某种在特定话语中投入运作的东西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它使我们同一系列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需要的无限反应保持距离。这就是第一个定义。

这个主体必须是实在的主体。上帝、动物还是人？总而言之，我们并不知道。我这句话如此真实，以至于人类民间传说中那些并非毫无缘故存在的超自然故事，丝毫没有排除人们同“仙女”或“魔鬼”作诙谐的可能。人们把这种存在设定为在其实在中具有同规定人类需要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关系。

你们当然会对我说，这些或多或少言语化的思想存在者，终究多少都由人类意象编织而成。我不否认！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处在两个词项之间：

- 首先，我们面对的必须是实在主体，也就是一个活物；
- 另一方面，它必须是一个听得懂语言的活物；不仅如此，还必须拥有一套言语交换中的用法、运用、惯用语与词项储备。否则，我们当然根本无法借助语言同它沟通。

机智之笔向我们提示并使我们触及的是什么？

正是处在人类经济中的意象：它们处于彼此脱离连接的状态，拥有表面的自由，使彼此间的一切聚合、交换、凝缩、移置以及杂耍成为可能。我们看到，它们位于如此多种显现的原则上；这些显现既构成人类世界相对于生物实在的丰富性，也构成其异质性。在分析视角中，我们经常把这种人类世界当作参照系统。

意象的这项自由中有某种东西……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原初的，也就是说，由人同周围环境相互关系中的某种最初损伤所制约……我们曾试图在出生的未成熟状态中指称这项东西：人正是通过另一个人的意象，才找到自身最基本运动的统一，这构成一项根本关系。

无论它从这里还是从别处出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意象……它们在人类秩序、人类物种中处在特有的无政府状态……受到能指操纵的驱动、捕获与使用；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会进入机智之笔中投入运作的东西。

机智之笔中投入运作的，是这些已经成为能指要素的意象。它们或多或少常用，也或多或少在我所谓转喻宝库中得到批准；人们设定大他

者知道它们可能形成的多种组合，而这些组合已经在意指方面受到彻底缩减、删略，甚至可以说净化。

相关知识卡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所涉的是语言中已经以某种方式堆叠、压缩起来的全部隐喻意涵。这是语言所承载的一切创造意指的时刻，不过处在未激活、潜伏的状态。受到寻找的正是它。

在机智之笔中，我召唤的正是它；我试图在大他者中唤醒它，可以说把它的支撑托付给大他者。总而言之，我只在如下限度内向他讲话：我在自己的机智之笔中投入运作的东西，被我设定为已经安放在他那里——他拥有这座转喻宝库。

相关知识卡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让我们取弗洛伊德的一则例子。维也纳社交界有一位著名的“机智之人”，他谈到一个糟糕作家；后者用自己关于拿破仑及其后代的作品淹没维也纳各家报纸。弗洛伊德所说的这个人物有一项外貌特点：头发是红色。我们可以把那个德语词译成法语，说这个人物既满口蠢话又是红发：法译本把他译成一个在拿破仑后裔故事中没完没了拖长篇幅的“絮叨红毛”。

弗洛伊德停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两个层面上的分解。构成这个故事妙处的一方面，是对贯穿整份报纸的“红线”的参照。

这本身是一个诗意隐喻。你们知道，歌德借用了这种红线：在帆船海军大量使用绳索的时代，大英君主船只的每一段绳索——即便被偷走，尤其是被偷走以后——都可以凭借这条红线辨认出来。由于这条红线，某类材料绝对会被认证为属于某个所有者。

对德语主体来说，这个隐喻也比对我们更加著名。不过我想，你们中有相当多人至少通过这项引文，已经听到——或许自己并不知道——歌德《亲和力》中的那段话。因此，你们会明白问题所在：这句多少带有时代风格的回击，就安放在这条红线同那个满口淡话、絮叨不休的红发人物之间的游戏中。

在某个时刻、某种语境中，它会使人大笑；而这恰恰是我想抵达之处。在一种无论正确与否都可称为“文化性”的语境中，一件东西会被当作成功的尖峰、一道机智之笔。弗洛伊德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机智之笔的掩护下，某种东西得到了满足，也就是主体的攻击性倾向；否则，它不会显现。如果没有机智之笔的掩护，他不会允许自己这样粗俗地谈论一位文学同行。

相关知识卡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不过，直接说出一句侮辱，同在这个语域中表达自己，显然有巨大差别。在这个语域中表达，就是向大他者求助于各种被设定为属于其日常用法、属于其最通行代码的东西。我借用维也纳社会史上一个特殊时刻的例子，特意就是为了让你们看见这个视角。

正因为这条红线是人人都可以立刻接近的东西……我甚至要说，它以某种方式讨好每个人心中作为共同符号而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获得承认的欲望；人人都知道问题所在……所以，唤起这条红线，还会朝诙谐的方向指示另一件东西。它质疑的不只是这个人物，还有一种非常特殊而且极为可疑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这样界定：那些写随笔、或者从某种轶事角度处理历史的人，也习惯于把某种显得过分明显的东

西放在作品底层作为主题——作者的不足、其范畴的贫乏，乃至其笔力的疲惫。

简言之，就是历史边缘的某种创作风格，恰恰是这种塞满杂志的作品。它在这道诙谐中得到足够鲜明的刻画和指示，向我们显示出同样的方向与意义特征。这个方向并没有完成自己的终点，却恰恰是诙谐瞄准的东西，并赋予诙谐以作用范围和价值。

因此，现在我们能够说：同活物必须是实在活物这一事实相对，这个大他者本质上是一个象征场所；它恰恰是这些句子的宝库，甚至是这些“通行观念”的宝库。没有它们，机智之笔就无法取得价值与作用范围。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不过请注意，受到瞄准的同时并不是大他者自身，尽管大他者恰恰作为意指受到强调。反而有某种东西发生在这座共同范畴宝库的层面；我们可以称这座共同宝库具有“抽象”特征。我确切指的是其中的传达要素：那里有某种以一定方式超越个体的东西。它通过一种绝不令人向往的共同性，同自文化起源以来便把我们所面向之物奇特的不死特征分离出来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能指歧义层面瞄准主体时，面向的正是这个东西。它真正构成另一个词项、另一个极点；“大他者是谁”这个问题就安置在这两极之间。

这个大他者当然必须：

- 是实在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物；不过我所激起的终究不是他的肉体；

- 另一方面，在我为了触及他、在引起我的快乐同时也引起他的快乐而参照的东西中，又有某种近乎“匿名”的东西。

在这两者——这个实在与这个象征——之间，哪一项动力、哪一项大他者功能严格地投入了运作？已有足够理由让我们说，这个大他者正是作为能指场所的大他者。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可是，我从这个能指场所中只让一项意义方向、一个“意义之步”涌现；真正而且最终有效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我们无疑可以说，机智之笔在这里表现得像一家西班牙客栈。更确切地说——在那种客栈里，客人必须自带食物，却能找到酒——这里的情况反过来：必须由我带来言说之酒，因为即使我以多少带点闹剧和滑稽的方式把对手“消费”掉，我也无法在那里找到这种酒。

然而，这种言说之酒始终在场，始终存在于我所说的一切之中。我的意思是，只要我说话，机智之笔通常就弥漫在我正在讲述的一切里；而我必然同时在转喻与隐喻这两个语域中说话。“少量意义”与“意义之步”不断彼此交错，就像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某处提到的上千只梭子那样，交叉又分开。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转喻性

我要说，通常这种言说之酒都流进沙中。“少量意义”与“意义之步”在我同大他者之间围绕机智之笔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共融；那里发生的确实近似一场共融……无疑，就我们的对立而言，它比其他任何共融都更为特别地使人获得人性；不过，它之所以使人获得人性，恰恰因为我们双方都从一个极为非人的层面出发……我正是在这场共融中指示大他者。

我要告诉你们：我格外需要他的协作，因为他本身就是盛放它的器皿，或者说圣杯。恰恰因为这只圣杯是空的——我的意思是，我在他那里并不面向任何得到具体规定、会在那一刻把我们联合在任一共融中的东西，不面向任何欲望或判断的一致——它才纯粹是一种形式。这项形式由什么构成？由围绕机智之笔始终涉及、而在弗洛伊德那里名叫抑制的东西构成。

我在准备自己的机智之笔时，会唤起某种趋向于把大他者凝固在特定方向上的东西，这并非毫无缘故。相对于某种更深的东西，它还只是一层外壳；而那种更深的东西恰好同这套转喻储备相联系。没有它，我在这个秩序中绝对无法向大他者传达任何东西。

换句话说，为了让我的机智之笔使大他者发笑，他必须……正如柏格森在某处所说——这也是《笑》中唯一说得好的东西……同我“属于一个教区”。这是什么意思？“教区”一词本身将会极大帮助我们推进对问题的理解。

相关知识卡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paroisse［教区］一词的起源。这件事很奇特：自从词源学家着手研究以来，他们始终无法知道，某个最初是 παροικια

［paroïkia］的东西……也就是不属于这所家园的人；我是说不属于尘世家园、来自另一个世界、扎根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明确说就是基督徒，因为这个词随基督教而出现……究竟怎样奇迹般地被另一个词项“隐喻化”。后者把自己的能指要素铭刻在一个 χ［chi］中；它还见于意大利语 parrocchia。这个词就是希腊语 πάροχος［parokhos］，意为供给者、管事；帝国官员知道，应当向他求取一名帝国官员可能欲求的几乎一切，而在罗马和平那些受祝福的时代，这种欲求可以走得很远。

于是，我们来到这个含混的“属于教区”一词所指示的层面。它清楚凸显出机智之笔发挥作用的领域限制。你们很清楚，并非所有机智之笔都能随时随地造成相同效应；同刚才“考生的故事”相比，“红线”只在你们这里产生了微弱效应。

就你们在这里作为听众的构成而言，毕业会考或任何考试这类如此“属于同一教区”的东西，自然非常适合成为所要运载之物——也就是一项意义方向——的容器。无疑，因为它没有抵达任何意义，这项方向只是在任何已经实现的意义同我可以称作理想的完整意义之间始终保留的距离。

我要再加上一则文字游戏。大他者在机智之笔层面构成自身的方式，就是我们从弗洛伊德的用法中熟悉的东西；他把它称作审查，而审查作用于意义。

大他者把自己构成为一张过滤网，对能够得到接收或单纯得到听取的东西施加秩序与阻碍。有些东西无法被听见，或者通常永远不再被听

见；诙谐却试图让它们在某处作为回声得到听取。为了使它们成为回声，诙谐恰好把造成阻碍的东西当作某种反射性的凹面来使用。

相关知识卡 诙谐作为社会过程：第三方与大他者

我刚才已经抵达这个隐喻：其内部有某种东西进行抵抗，而它完全由主体中的一连串想象性结晶构成。

看到事情发生在这个层面，我们并不惊讶。把事情直呼其名：小他者参与了机智之笔的可能性；

不过，正是在主体的抵抗内部……这一次，我反而试图激起这项抵抗；这对我们极有启发……某种回响得远为深广的东西会得到听取，使机智之笔直接在无意识中产生共鸣。

# 第7课 · 1957年12月18日

上次，我向你们谈了圣杯。你们就是这只圣杯。我通过各种方式唤醒你们的矛盾，使你们凝固起来，以便可以说，让你们在诙谐中认证我传给你们的讯息；而这项讯息的根本恰恰在于它自身的缺陷。

即便理解得最好的东西，也始终应当稍作回顾；所以，我将试着把上次所说的内容以某种方式具体画在黑板上。上次我谈的是大他者，是那个神圣的大他者；在 Witz 的传达中，它归根到底会以某种方式前来补充、填满那个构成欲望之不可解决性的东西、那个豁口。

以某种方式，Witz 把自身的享乐归还给本质上无法满足的要求；它采取惊奇与快乐这两个其实相同的侧面：惊奇的快乐和快乐的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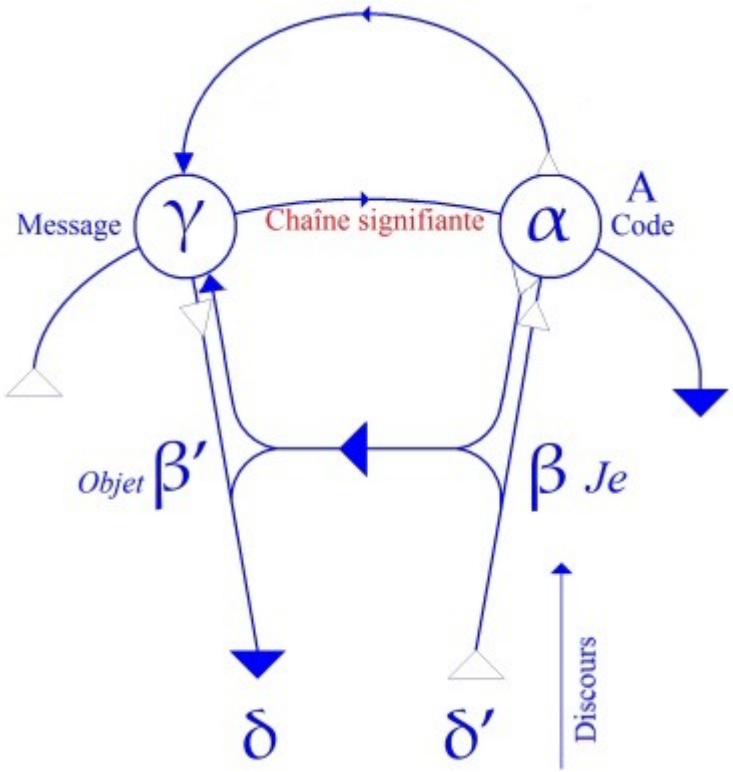
上次，我坚持讲了这项程序：

- 使大他者固定不动［准备］；
- 形成我所谓“空圣杯”的东西。

  在弗洛伊德那里，它由他所谓诙谐的“门面”来表现：

- 某种东西以某种方式把大他者的注意力从诙谐将要通过的道路上转移开；
- 某种东西归根到底恰好把抑制固定在某处，从而在别处为机智言说将要经过的道路留出自由。

因此，事情大致可以这样图式化。言说的道路在这里画出，凝缩成一项传给大他者的讯息；这项讯息的踉跄、豁口与缺陷由大他者认证为诙谐。不过，它由此主要被归还给主体本人，并为主体构成诙谐之专有欲望不可缺少的补充。下面就是我们通常使用的图式：




这里是大他者，γ 点是讯息，这里是“我”，这里是转喻对象。

可是，如果大他者对我们不可或缺……这些当然都是已经越过的点，我们假定你们已经知道……如果大他者对于话语形成闭合不可或缺，也就是话语以一项能够至少在象征上满足要求本身根本不可解决之性

质的讯息抵达时；如果这条回路因而就是大他者对一项暗指的认证，而这项暗指归根到底指向以下事实：

- 人一旦进入象征世界，要求中的任何东西都只能通过一连串无限的“意义之步”才能抵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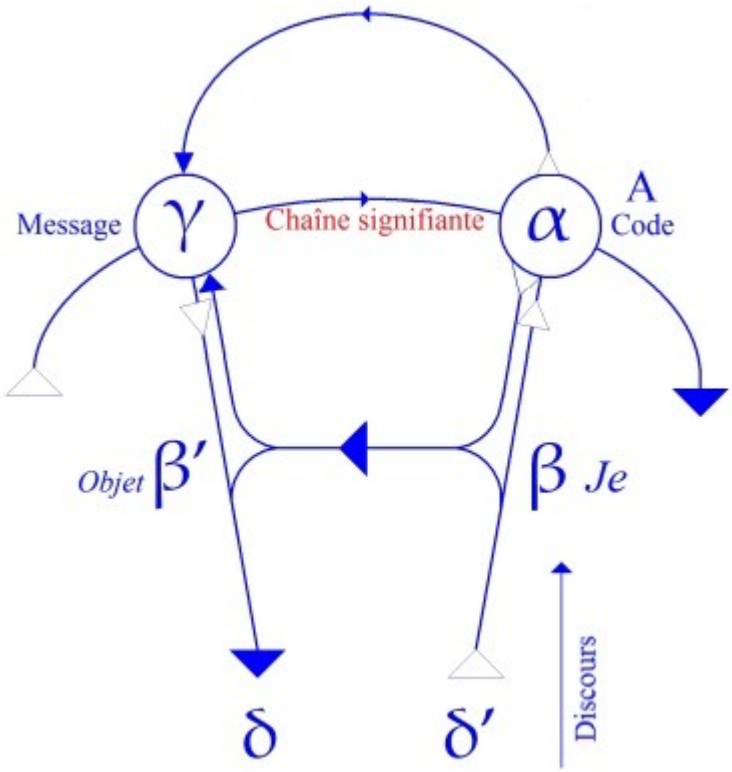
- 人成了追逐另一只乌龟的新阿喀琉斯；欲望被语言机制捕获以后，他便注定要进行这场永远无法满足的无限接近。这同某种我们姑且称作话语性的东西被整合进欲望机制本身有关；

……所以，如果这个大他者对于最后一步——那个构成瞬间时刻、在象征上令人满足的最后一步，即诙谐顺利通过的时刻——至关重要，我们仍应记得，这个大他者本身也存在。它以我们所谓主体的方式存在；而主体像雪貂一样在某处四处穿行。

不要以为主体处在需要的出发点；需要还不是主体。主体在哪里？今天我们或许会说得更多。

主体就是整个系统，也或许是某种在系统中完成的东西。大他者也一样，以相同方式构成；正因如此，大他者才能接替我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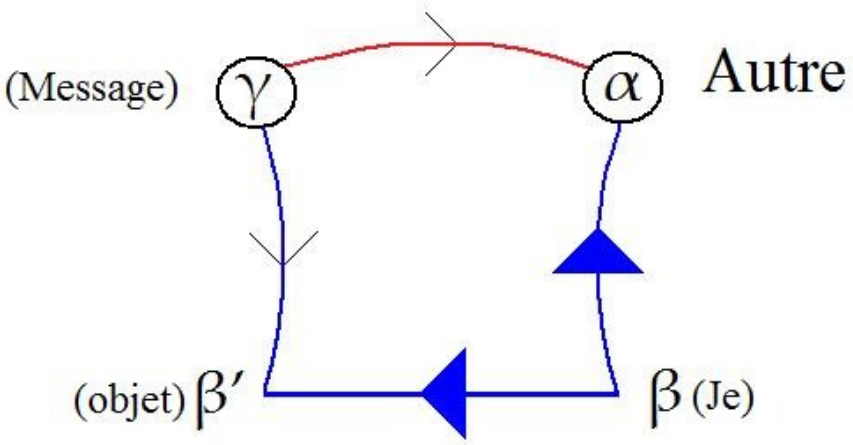
我将遇到一些特殊条件；如果我的图式真有用处，它就必须能够表现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正是我们上次所说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标出这些线段上的向量或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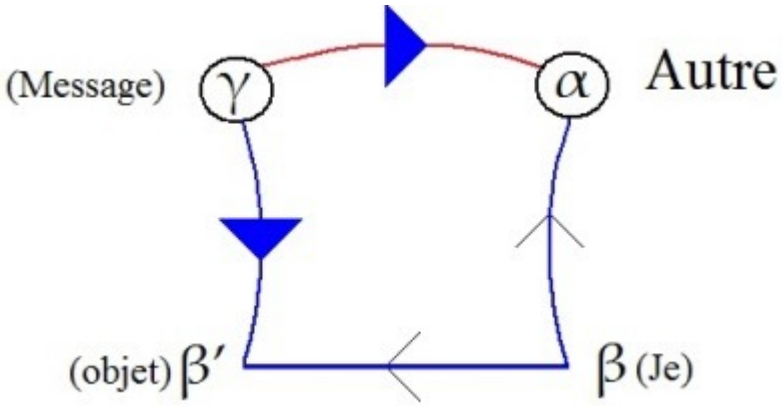
从“我”出发：

- 通向对象［β ⁀› β’］；
- 通向大他者［β ⁀› 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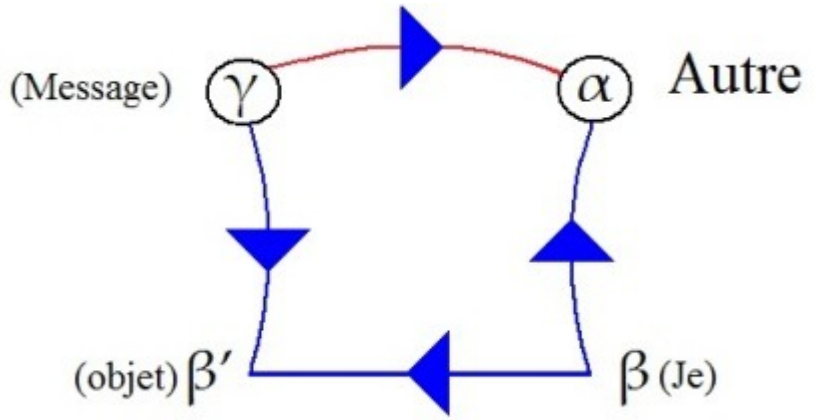

从讯息出发：

- 通向大他者［γ → α］；
- 通向对象［γ → 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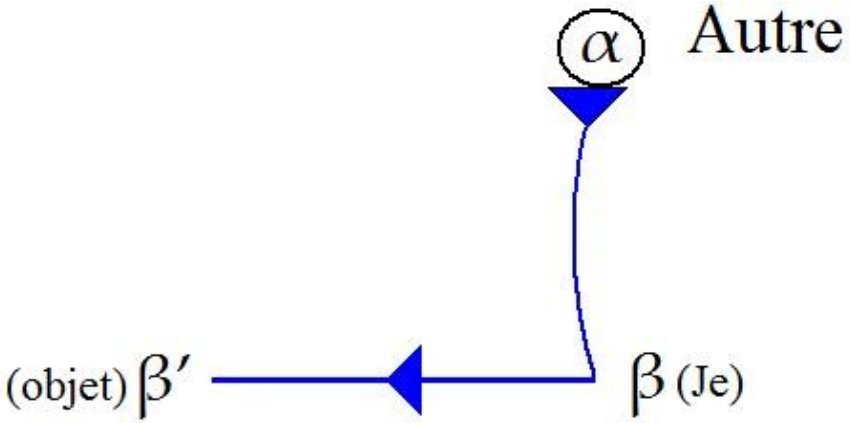


因为以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非常强的对称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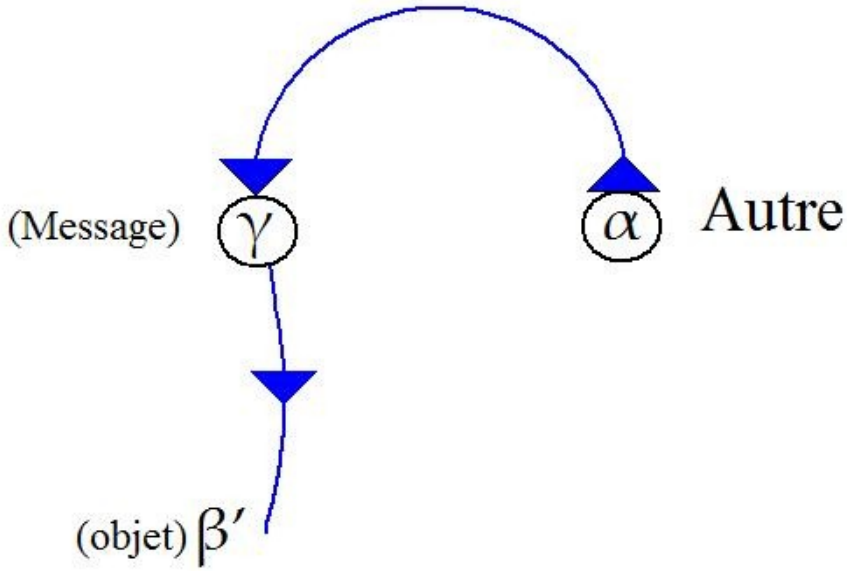
- 这项讯息［$\gamma \rightarrow \alpha$］；
- 这个“我”［$\beta \rightarrow \beta'$］。




而同一项［对称关系］还以离心方式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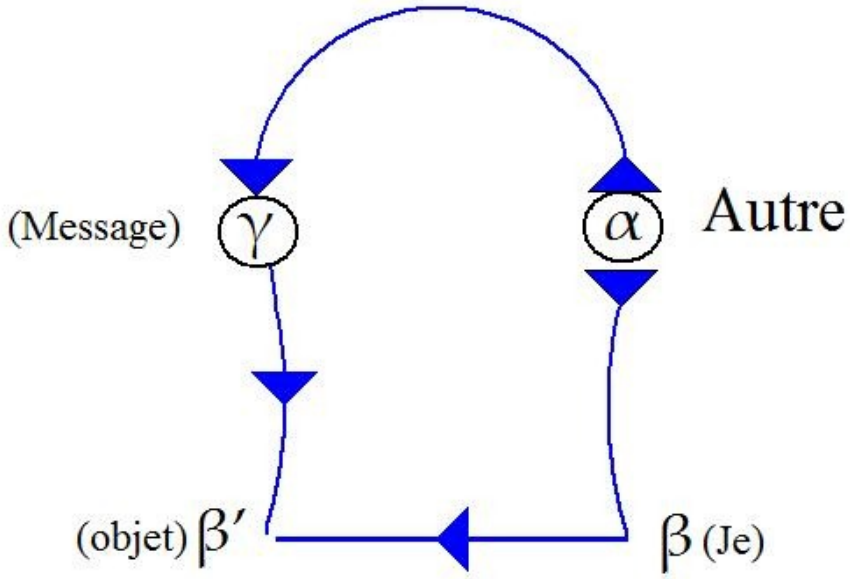


也以向心方式存在：




存在于以下两者之间：

- 大他者本身，作为转喻宝库的场所；
- 以及这个转喻对象本身，因为它是在转喻系统之中构成的。




我上次解释过，在所谓诙谐的准备中，我做了什么？这种准备有时以根本不作准备为最佳，不过，作些准备显然也不坏。我们只须回想我不作准备时发生了什么：有时，你们面对像我有一天讲过的“Ah！te……”这么简单的东西，也会“干瞪眼”［参见11月20日课］；这似乎使有些人迷惑不解。

如果我先围绕“小伯爵”与“教养良好的少女”彼此的态度作一番“准备”，你们或许会受到足够挑逗，于是“Ah！te……”在当时便更容易越过某种东西。你们投入了太多注意，因此有些人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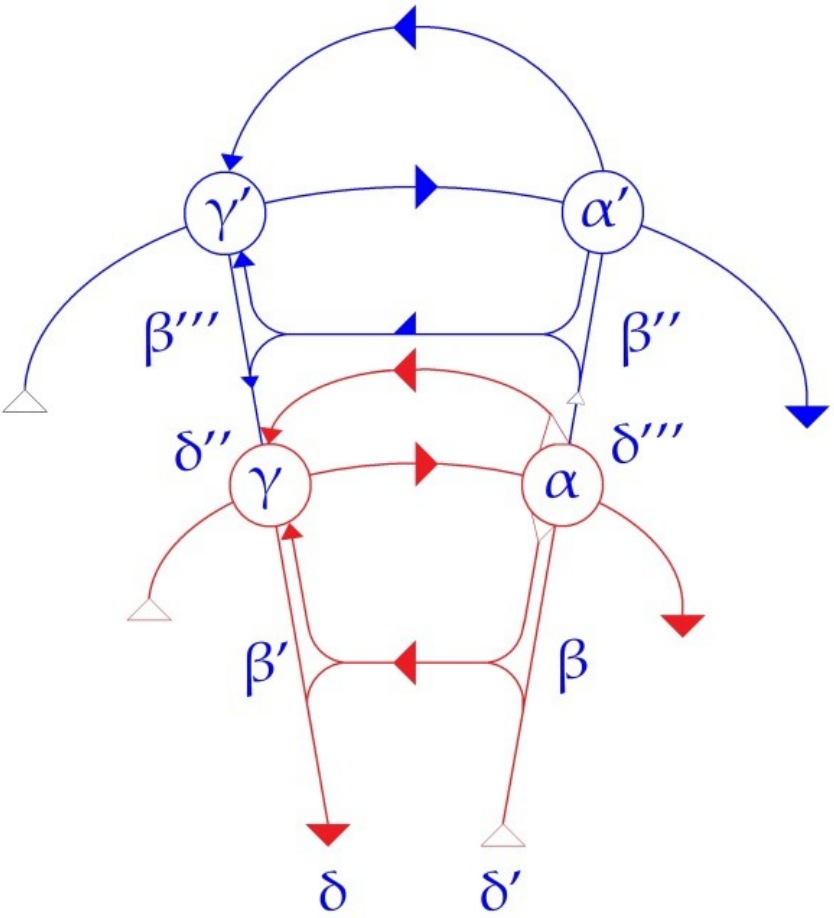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上次那匹马的故事更容易使你们放声大笑，因为它包含一段很长的“准备”。你们正为考生的言论而兴高采烈；在你们看来，其中带着一种栖居于无知深处的强烈傲慢。于是，你们已经充分准备好，看见那匹飞奔而入、结束故事并真正赋予它妙处的马。

我以这项“准备”在大他者那里产生的，无疑就是弗洛伊德所谓Hemmung、即抑制：它只是这项对立，是二元关系的根本基础；我可以在你们面前把任何对象作为反对意见来同你们对置。这很自然：你们把自己置于承受其撞击、靠近和压力的状态。某种通常称为防御［这里是抑制］的东西组织起来；它是最基本的力量。各种前奏中所涉的正是它，而前奏完全可以用上千种方式构成。

有时，“无意义”扮演这项前奏的角色；它是一种挑衅，把心智的目光吸引到某个方向。这是一枚诱饵，一场斗牛：有时是“滑稽”，有时是“淫秽”。事实上，问题在于使大他者适应某种东西：可以说，使大他者沿着同我的话语转喻相反的方向固定下来，因为大他者自身正围绕某个转喻对象展开话语。以某种方式，我们会说：随便哪个对象都行。它根本不必同我自己的抑制有最小关系。无关紧要！只要当时有某个对象占据大他者，任何东西都可以。这就是我上次通过所谓“想象性凝固”向你们解释的东西；它是诙谐得以通过的最初位置。

总而言之，你们所看见的，就是大他者层面的对应项……我们在这里把它当作主体；因此，我给你们画出另一套系统，并用蓝色标明……它对应于我们通常称作 β ⎯→ β’ 的线，即“我”同转喻对象的关系。我们把前者称作第一主体；而为了在这里标示两套系统的叠加，又画出另一主体相对于第一主体系统的关系。

因此你们看到，为了从大他者向认证诙谐本身的讯息交棒，这根接力棒必须在大他者自己的能指系统中得到接取。也就是说，可以说，问题被送回给他：大他者本人在其系统中把讯息认证为诙谐。


γ′
α′
β‴
β″
δ″
δ‴
γ
α
β′
β
δ
δ′

换句话说，我的 γ ⟶ α 预设自己同 γ’⟶ α’ 之间已经铭刻了充分的平行关系；图式上表现的恰恰就是这一点。这项内在于诙谐的必然性，赋予它一种理论上会无限再现的视角：

- 好故事生来就是为了讲给别人听；
- 只有讲出来、让别人发笑以后，它才完整；
- 就连讲述它的快乐，也包含别人接下来可以再拿它到另一些人那里检验这个事实。

为了给机智言说留出通道，我必须在大他者那里唤起怎样的转喻性捕获；这同诙谐的通过没有必然关系。可是，能指链必须怎样在大他者那里组织起来——这里从 δ’’’ 走向 δ’’，如同那边从 δ’ 走向 δ——却必然存在一项关系；这幅图式已经把它表现得足够清楚。我上次以“大他者必须属于同一教区”表达的，正是这一点。

他不能只是大体上听懂法语——当然，如果我用法语作诙谐，这已经是属于同一教区的第一种方式。为了让这个或那个诙谐顺利通过并成功，他还必须参与许多其他被设定为已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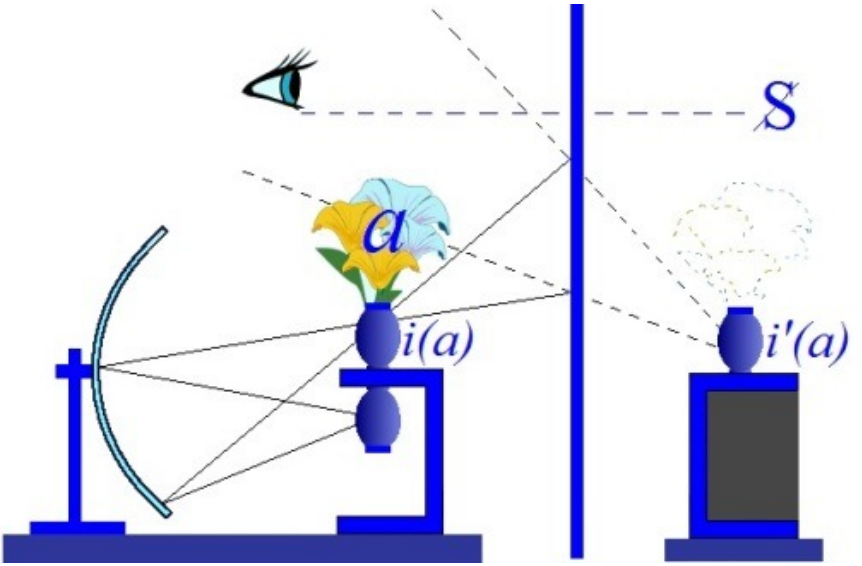
因此，两项条件归根到底在图式上得到表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写：这里的 β’’⟶ β’’’ 表示在大他者那里激起的某种抑制。我在这里画一个由两支方向相反的小箭头组成的符号；它们大小相等而方向同我的转喻相反，也就是同 γ ⟶ α 相反。

相比之下，γ ⟶ α 与 γ’ ⟶ α’ 之间存在某种平行关系。这可以这样表达：γ ⟶ α 能够得到认证。我们通过在 γ’ ⟶ α’ 中把一种“粗糙诙

谐”[？]放进括号来表达这一点；也就是说，大他者把它本身认证为讯息，并认证为诙谐。

这至少有助于固定观念，使你们把我要说的东西视觉化——视觉化毕竟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心智器官之一。上次，我谈到诙谐成功所需的两项主体条件：它对想象的小他者有所要求，以便象征的大他者能在想象小他者所呈现的这只“杯子”内部听见它。图式使这一点变得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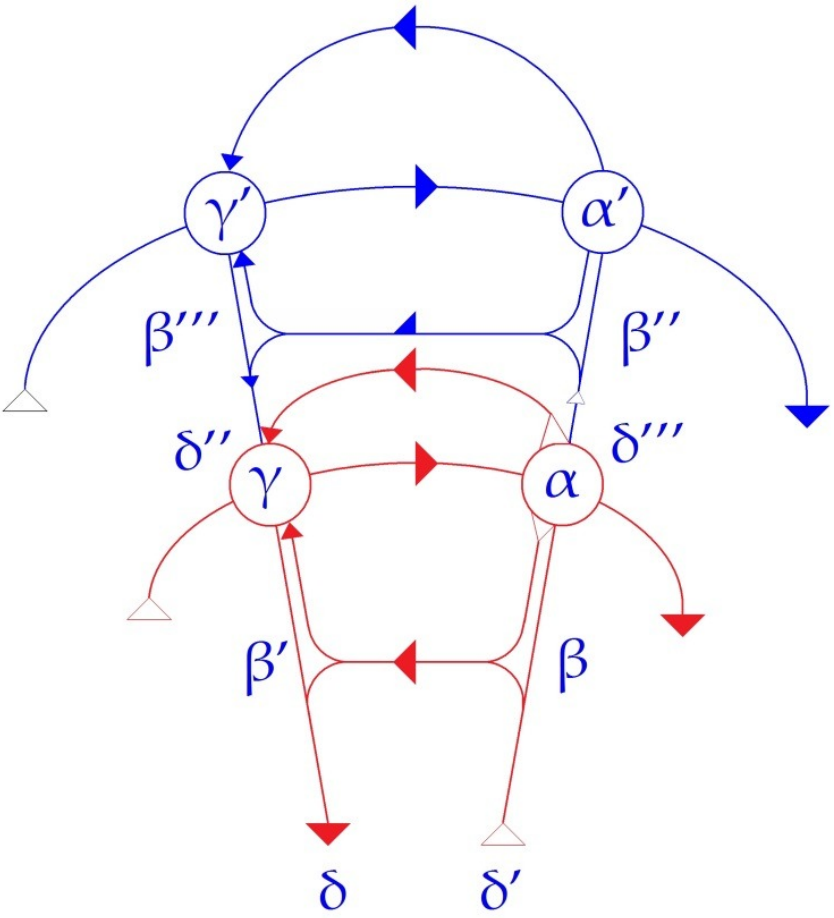
我把一项联想留给机敏的心灵：奇怪的是，我过去曾在一个隐喻中说过某种相关的东西；当时我使用了几乎相同的形式图式，必定有自己的理由。那是我围绕自恋使用“凹面镜”意象的时候。当时，我主要处理的是想象性意象，以及想象性统一借助某种形式倾向所造成的有机反射而出现的条件……我们不进入这种对照；它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勉强的，不过或许有些启发性。



现在，我们还要再使用一下这幅图式。因为不论这样回顾上次所说之话的意义多么有趣，如果不能把我们带得更远，内容就未免太少。我希望你们至少有一次清楚看见：我们从年初以来使用的最初图式，因为我们把大他者作为主体的公式展开，而转变成眼下这样。我们有：

- 主体的 $\gamma _\rightarrow \alpha$；
- 这里的 $\beta _\rightarrow \beta'$［同转喻对象的关系］。

在它们彼岸，这项 $\beta'' _\rightarrow \beta'''$ 配置重新出现，使大他者同样拥有同转喻对象的关系；于是，在下一个层级上，$\gamma _\rightarrow \alpha$ 的必然性再现，并在这里变成 $\gamma' _\rightarrow \alpha'$，如此无限继续。




最后一环主要承载着需要向某种无限延宕的满足返回；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走完大他者的整条回路，才能回到主体那里，抵达这里的终点。稍后，我们还要重新使用这幅图式。

眼下，让我们停在一个特殊情形上。弗洛伊德给出对诙谐机制的分析之后——我所说的只是对它的评注——立刻就考察这个情形。他谈到所谓“诙谐的社会动机”，随后转向滑稽的问题。今天，我们将试着处

理它，但不会穷尽它，因为弗洛伊德明确说，他只从诙谐角度处理这个问题；否则，这个领域无限宽广，至少从他的经验出发，他甚至无法考虑进入其中。

非常醒目的是：弗洛伊德开始分析滑稽时，以自己一贯的定向与触摸之准确，把滑稽中最接近诙谐的东西放在首位，并明确这样呈现给我们。乍看之下，它可能显得离机智最远；这个东西恰恰就是天真。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天真由某种建立在无知之上的东西实现；他很自然地举出取自儿童的例子。我想自己已经在这里向你们提过这一幕：儿童为成年人排演了一出非常漂亮的小短剧，内容是一对夫妻分开；丈夫外出谋生，若干年后回来，确实已经成功致富，妻子迎接他时说：

“你看，我表现得棒极了；你不在时，我也没闲着。”

随后，她拉开帷幕，露出一排十个娃娃。这始终是一出小木偶戏。不过，儿童自然感到惊讶，或许只是在吃惊——他们在这里知道的或许比人们以为的更多——但无论如何，他们对前来观看短剧的成年人突然爆发出的笑声感到惊讶。

这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呈现的滑稽事、好故事或“天真诙谐”的类型。他还以一个在技术上更接近我们所谓语言程序的形式来呈现它：一个小女孩为肚子有点痛的弟弟提出一种 Bubizin[注1]。

> [注1] 参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同无意识的关系》，法译本第 161 页。

小女孩听说自己要吃一种 Medizin［药］；而 Mädi 在德语中意为“小女孩”，Bubi 意为“小男孩”。她以为，既然小女孩要吃 Mädi-zin，小男孩自然也应当有 Bubi-zin。

［“一个三岁半的小女孩警告弟弟：‘你呀，别吃这么多这种食物，否则你会生病，就得吃 Bubizin。’“Bubizin？’母亲问，‘那是什么？’“我生病时——孩子为自己辩解——不是也必须吃 Medizin 吗？’孩子认为，医生开的药如果给小女孩［Mädi］吃，就叫 Mädi-zin；由此推断，给小男孩［Bubi］吃，就应叫 Bubi-zin。它的构造正像一道运用同音技术的文字诙谐，也完全可能作为真正的诙谐发生；若真如此，我们只会有几分不情愿地报以微笑。但作为天真例子，它显得格外出色，使我们放声大笑。”——《诙谐……》，第七部分“诙谐与滑稽的种类”］

这里又有一件东西：只要掌握钥匙，也就是听懂德语，它就能轻易变成“滑稽故事”，或者在机智层面得到呈现。事实上，援引儿童当然并非不合时宜；可是，我们甚至不会说这里的特点是无知。弗洛伊德非常具体地把这某种东西界定为一项特点；它在诙谐机制中可以轻易起替补作用。归根到底，这是因为：“其中有某种东西——他说——使我们愉快。”它恰好发挥着同我刚才所谓“吸引”或“转喻性捕获”相同的作用：我们感到所谈论、正在说话的那个人根本没有抑制。

正是另一个人那里这种抑制的缺席，使我们能够让另一个人——我们把故事讲给他、而他本人已经被这项抑制缺席吸引——接收到诙谐的根本，也就是它唤起的彼岸。在儿童这里，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形中，这个彼岸主要不在于他们的滑稽，而在于唤起童年时期：那时，同语言的关系如此贴近，以至于它直接向我们唤起语言同欲望的关系；后者正是诙谐的专有满足。

我们再取一个来自成年人的例子，我想自己以前已经引过。我的一位患者并不以通常所谓脑回路格外发达见长。他讲述一则这类有些悲伤的故事——这种事相当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他解释说，自己约了一个在漫游中遇见的年轻女人；那个女人只是像他经常遇到的那样，让他“白等了一场”。他在故事结尾说：

“我又一次充分明白，她是一个 femme de non-recevoir［不予接纳的女人］。[注]”

> [注] 患者把固定法律用语 fin de non-recevoir（不予受理、断然拒绝）中的 fin 换成近音的 femme（女人）；他本人并未有意作诙谐。

他并不是在作诙谐，只说出了一句非常天真的话；可是它确有自己的辛辣特征，在我们这里满足了某种远远越过对这个失望人物之滑稽把握的东西。后者即使偶尔在我们这里唤起一项优越感——这完全值得怀疑——在这个调子中也无疑远为次要。通过说“这个调子”，我是在暗指一个常被提出、被推到前台并自称是滑稽机制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感觉自己优于另一个人的机制。

这种说法完全可以批判。尽管确实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心灵——李普斯——试图从这个方向勾勒滑稽机制，但说这就是滑稽的根本快乐，完全可以反驳。在这个例子里，若有谁保有全部优越性，正是我们这位人物：他从中找到材料，为自己的失望提供理由；而这场失望根本无法损伤他不可动摇的自信。因此，如果这个故事勾勒出任何优越感，那倒更像一种诱骗：有片刻，一切都让你们进入这幅幻景；你们相对于欲望或失望的文本，用某种方式把他、或者把讲故事的人安置在其中。可是，真正发生的东西要远远越过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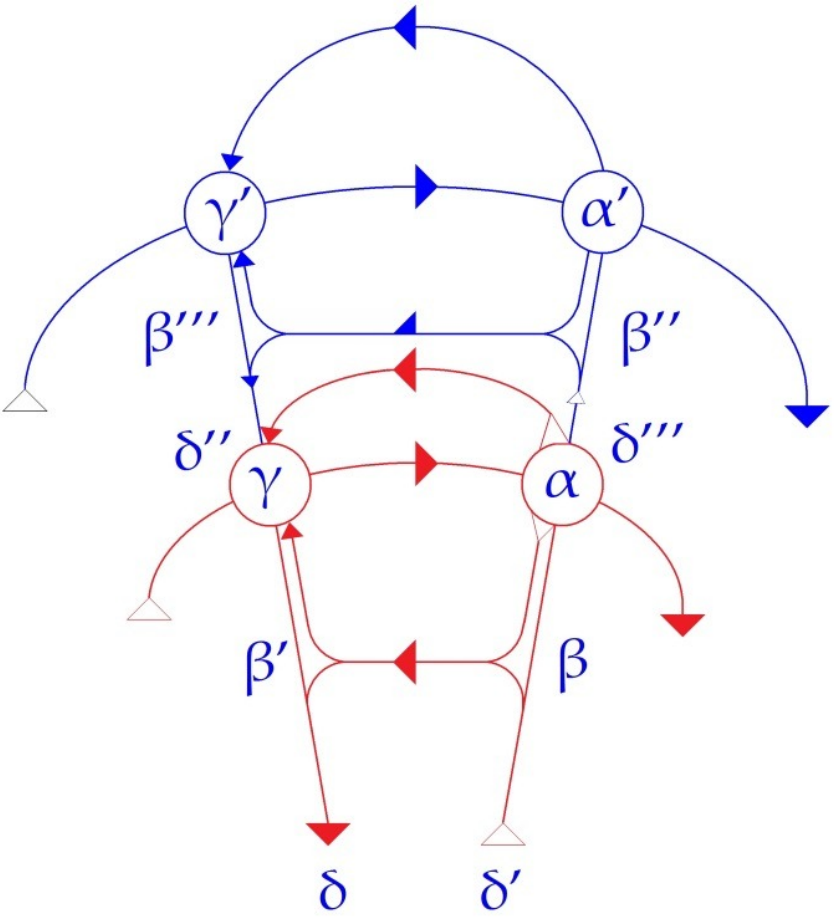
恰恰在“不予接纳的女人”这个词项背后，某种东西勾勒出来：任何接近本身都具有根本令人失望的特征；这远远越过某一次具体接近是否得到满足。

换句话说，这里同样使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说出这个天真词语的主体从失望中找到的满足：他以为自己用一句通行惯用语、一项为此类场合预制的转喻，已经充分解释了失望。

换句话说，他从高顶礼帽里找到一只毛绒兔子……他以为这是能够提供有效解释的活兔子，但它事实上彻头彻尾是想象性的；

……这只兔子构成失望本身。每当他接近自身幻景的对象时，都随时准备看见失望再次发生；而他仍然不可动摇、一以贯之，丝毫不受影响。

因此，你们在这里看到，归根到底，无知者或天真者的机智之笔——为了形成我的诙谐，这一次它可以说始终完整地存在于大他者层面。我不再需要在大他者那里激起任何构成这只坚固杯子的东西；它已经完全由另一个人给予我。我把他提升到滑稽故事的尊严，从他口中收集那个珍贵词语；对它的传达将构成一道诙谐。可以说，我通过自己的故事把这个词语提升到主导词的尊严。其机制归根到底在于：天真诙谐的全部辩证法都维持在图式的蓝色部分：




普通形式的诙谐要顺利通过并在这里得到接收，必须在大他者那里、在想象秩序中激起某种东西；而天真者的天真、无知乃至自负，已经以某种方式完整构成了它。

今天，只须处理它，让第三方——我把它作为天真之物传达给的大他者——对它进行认证，就能把它提升到诙谐的等级和名义。

不过当然，通过把想象的小他者本身提升出来，分析他的转喻，分析他在语言中找到的纯粹满足——这种满足甚至使他觉察不到自己的欲望受到多么深的欺骗——我们便被引入滑稽本身的维度，并不得不提出相关问题。弗洛伊德正因此把天真安置在诙谐与滑稽的接合处。

到了这里，我们的困难还远未结束。事实上，人们围绕滑稽这个主题引入了不少思考和理论，而它们全都或多或少令人不满。追问这些理论为何令人不满、为何又会得到提出，当然绝不是空问题。我们无疑必须跨过这些理论曾经采取的各种形式，再回头处理它们。可是，把它们一一拼读，把它们相加，

排列其先后并讲述所谓历史，我认为不会把我们带到任何根本东西的踪迹上。

无论如何，让我们说，只要人们试图仅仅在心理学层面处理滑稽问题——我还不是说要

解决它——这个问题每次都会被回避。在心理学层面，显然很容易把“诙谐”与“滑稽”一同放入可笑者、或者激起笑的事物这一范畴。

当然，你们不会觉察不到：迄今为止，我虽然通过你们用轻声发笑或至少用微笑作出裁决，来判断诙谐得到的欢迎与承受程度，却始终没有处理笑的问题。

笑的问题远未解决。当然，人人都乐于把笑当作“机智”与“滑稽”中所发生之事的一项根本特征；可是，一旦要把笑变成

某种动力，解释笑在这里可以说具有的表现性特征，甚至只是要标示这个现象可能对应于哪一种情绪，人们就开始进入一些通常极其麻烦的东西。至于笑是不是人类所特有，可以这样说，尽管并非绝对确定。

我的意思是，即使有些人显然试图接近，以某种类比、隐喻方式擦过笑同相应把握之间的某项关系，我们能说的最好情况也不过如此：那些提出最站得住脚、最谨慎说法的人，几乎只是在笑的现象本身中记下某种与此类似的东西，也就是它可能在某处留下怎样的振荡痕迹。笑是一种带有特定振荡的痉挛性运动；而相应的心智振荡，例如康德所说，发生于以下过渡：

- 从某种张力，过渡到它化为乌有；
- 在被唤起的张力同它面对虚无时的突然坠落之间振荡；本来，人们设定某种东西应当在张力唤起后抵抗它，如今却只剩下缺席。

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位心理学家莱昂·迪蒙那里，我们又看到一个例子：一个概念突然过渡到它的反面。迪马在论心理学的文章中提到这一点[注2]。

> [注2] 乔治·迪马：《笑的心理学与生理学》，《正常与病理心理学杂志》，1921年。

这是一篇非常迪马式的文章，十分精细、微妙；这位快乐的人没有为它费太多力气，但它很值得读，因为即使毫不费力，他仍然带来了非常漂亮的要素。

简言之，笑本身当然远远越出机智与滑稽的问题。人们经常提醒我们，笑中还有例如笑的单纯传染、对笑的笑，以及同“不该笑”这个事实相联系的笑。儿童在某些情形下的狂笑不止，也确实值得注意。

还有焦虑的笑，甚至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时的笑；受害者突然感到自己受到某种远远超出预期界限的东西威胁时，那种尴尬的笑；还有绝望的笑。

甚至还有突然获知丧讯时的笑。

我们要处理笑的所有这些形式吗？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既然我的目标不是为你们建立一种笑的理论，我这里只想点明：无论如何，最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莫过于柏格森的理论——机械性的东西在生命和谐这种神话中涌现；

在这套神话中，某种东西被赋予所谓永恒新颖性，而生命冲动不断创造——此处让我们以特别图式化、格外凝缩的方式来复述它。

在这段论笑的话语中，柏格森已经充分显示、凸显出严格意义上的［……］特征。

他说，机械性同生命性相对时，有一项特征是重复；仿佛生命没有向我们呈现任何重复现象，仿佛我们不是每天以同样方式小便，不是每天以同样方式入睡，仿佛每次做爱时人们都会重新发明爱情！

这种用机械性本身作解释的方式，确实有某种不可思议之处；它在整部书中把自己显示为一项机械解释。我的意思是，解释本身重新落入

一种可悲的刻板，彻底漏掉现象中的根本之物。如果机械性真是笑的起源，我们会走到哪里？

克莱斯特[注3]那些关于木偶的精妙评论又应当安置在哪里？它们完全反对机械性具有这种所谓可笑、堕落特征的主张。因为他极其精细地强调：这些小机器真正实现的是一种优雅的理想；

> [注3]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论木偶戏》，Sillage 出版社，2010 年。

它们只是由几根细线牵动，却凭自身实现一种运动轨迹的优雅；这种优雅同其曲线重心的恒定性相联系。只要木偶制作得稍微好些——我是说严格遵循人体关节特征提供的范例——归根到底，克莱斯特强调，任何舞者的优雅都无法达到一个木偶能够实现的程度；

只需熟练地牵动它即可。

我们暂且把柏格森的理论放在一边，只指出：它能够怎样彻底忽略人们对笑的机制所作的最初、最基本把握。我的意思是，在笑同机智或滑稽这样复杂的关系牵涉进来以前，它就已经触及一切模仿、复演、替身现象、面具；如果看得更仔细，它不仅涉及面具现象，也涉及揭下面具，并且依照一些值得停留的时刻发生。

你蒙着面具走近一个孩子：他紧张而尴尬地笑。再靠近一点：某种作为焦虑表现的东西开始出现。

你摘下面具：孩子笑了。但如果那张面具底下还有另一张面具，他根本不会笑。

我只想借此指出：这至少需要一项只能是实验性的研究；不过，只有当我们开始对研究应当朝哪个方向进行形成一定认识时，它才能成为实验性研究。无论如何，在这个现象中——也在我本可以用来支持自己主张的其他现象中，不过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强调它们——一切都向我们显示：

笑的现象同人身上的想象界功能之间，存在一种极为强烈、紧密的关系，特别是意象的捕获性。它的捕获越出与之相应的本能机制——无论是斗争还是展示，是求偶展示还是战斗展示——并在人身上给它们增添一项额外重音，使另一个人的意象同我刚才所谈的张力形成极深的联系。

受到注意的对象总会唤起这项张力；这种注意在于：

- 把对象安置在同欲望或敌意相隔一定距离的位置；
- 联系于人身上构成自我形成之基础和根基的某种东西；
- 联系于这样一项歧义：自我的统一位于自身之外；人相对于自己的同类挺立，并找到那种作为自恋存在之防御统一。

笑的现象必须安置在这个领域。为了向你们指出我的意思，我要说：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发生那些特别关注笑的作者认为偶尔、瞬间引发笑的张力坠落。

如果某个人只是摔倒在地，就使我们发笑，那是由于：

- 那幅或多或少紧绷、或多或少浮夸的意象——此前我们甚至不太留意它；
- 那些身姿与威望现象——它们可以说是我们切身经验中的通行货币，普遍到我们甚至觉察不到它们的凸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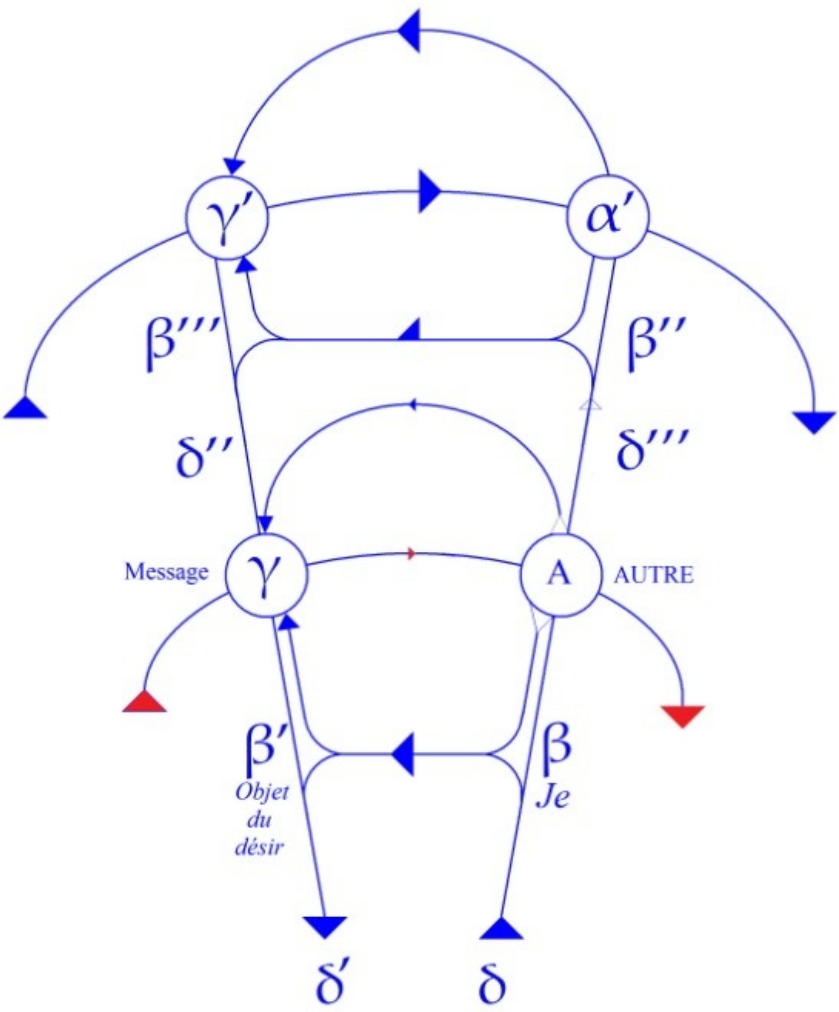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正因为想象人物仍在我们的想象中继续着多少有些装腔作势的步伐，

而支撑他的实在之物却已经栽倒、摊在地上，

笑才在这个限度内爆发：它总是经由某种意象的释放而发生。请从这个词的两个歧义方向理解这项释放：

- 某种东西从意象的强制中释放出来；
- 同时，意象也独自出去游荡。

一只被砍掉脑袋、却仍在院子里走上几步的鸭子，确有某种滑稽性。这也属于同一秩序；正因如此，滑稽会在某处同可笑者建立联系，也就是在“我 $\rightharpoonup$ 对象”的方向层面：$\beta \rightharpoonup \beta'$，或 $\beta'' \rightharpoonup \beta'''$。




可以肯定，正因为想象界在某处牵涉到同象征界的这项关系，我们才会在一个更高层面重新找到笑；这个层面比全部快乐现象更令我们关切，也就是笑在标示、伴随滑稽时的层面。

为了在今天引入滑稽概念，我想从一个例子出发。在“金牛犊”故事中，苏利耶用“金牛犊”谈论银行家时，亨利·海涅作出回击；苏利耶的这句话本来正是为了找到机智性的传达。它几乎已经是一道诙谐，至少是一项隐喻；亨利·海涅则回应：

“就一头牛犊而言，我觉得他已经稍微过龄了。”

请注意，如果亨利·海涅完全照字面说出这句话，那只意味着他什么也没有听懂；他就像我刚才那个无知者，像说“不予接纳的女人”的人。海涅的反击会以某种方式具有滑稽性；而这正构成这道诙谐的底层。它也多少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这句话多少把苏利耶赶回自己的园子，使他局促不安，容我这样说。

苏利耶终究没有说出那么好笑的东西；亨利·海涅胜他一筹，显示事情还能以另一种方式安排，竖起一个不同于第一头牛犊的转喻对象，

从而进入并在滑稽对立的层面上游戏。归根到底，滑稽对立同一个事实相联系：我们不可能不先察觉一项绝对根本的差异。

这就是：如果我们在机智之笔中，借一道特征、一个词或一次交锋，把握到处于飘忽状态的滑稽，它终究会远远越出那里；我的意思是，它会牵涉到

不只是纯粹而简单的相遇——诙谐在一道闪光中即可通过，不需要长久的拥抱。

我向你们所有人说话，不论你们现在的位置如何，也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甚至不知道你们是谁。但要让我们之间形成滑稽关系，就必须有某种东西使我们每个人在彼此之间受到远为个人化的牵涉。

因此你们看到，苏利耶同亨利·海涅的关系中已经勾勒出某种涉及诱惑机制的东西。苏利耶一侧毕竟有某种东西受到海涅回答的轻微排斥。简言之，为了能够谈滑稽关系，我们必须把要求同其满足的关系不再安置在一个瞬间时刻，而是安置在某种赋予它稳定性、恒定性以及同某个特定他者发生关系之道路的东西中。

因为我们曾在诙谐的底层关系中分析要求的这项根本结构：要求受到另一个人重新拾起，并且本质上必须无法满足。然而，这终究还有

一个解决办法，也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所有人类从生命开端直至存在终结都在寻找的东西。既然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大他者，解决办法就是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大他者。这就叫作爱。在欲望的这项辩证法中，问题在于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大他者。

我过去向你们提到的充实言说领域，在这幅图式上由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条件来指称和界定；在这些条件中，某种等价于

欲望满足的东西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而这也表明欲望恰恰只能在言说的彼岸得到满足。

它就是把“大他者”同这个“我”、同其“转喻对象”以及同“讯息”连接起来的纽带。这就是某种充实言说必须维持自身的区域与表面；也就是说，构成这种充实言说的根本而特有的讯息——

我曾用“你是我的主人”或“你是我的妻子”来为你们描绘它——实际上可以这样勾勒：你，你这个他者，是［est］我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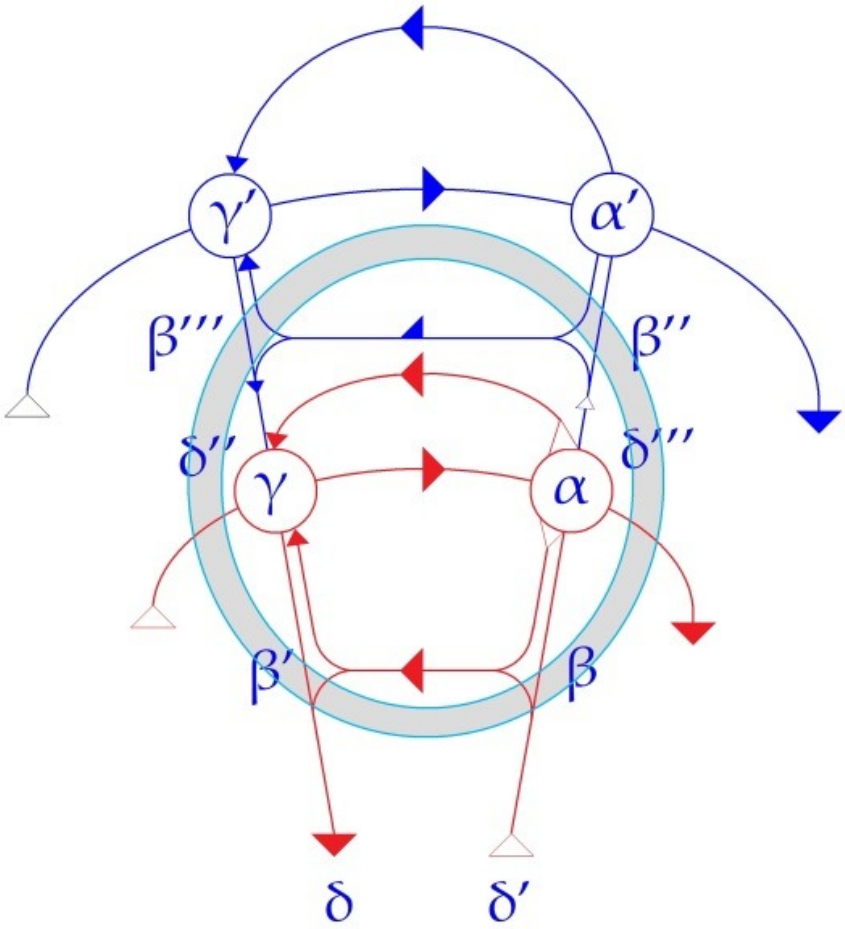
我曾告诉你们，男人正是以这种形式提供充实言说的例子；他在其中作为主体作出承诺，把自己奠定为对方的丈夫，并以这种形式向她宣告，对她说：“你是我的妻子。”我也曾向你们显示这句“你是我的妻子”具有怎样奇特的悖论性。

因为一切都依赖于某种必须闭合回路的东西［参见“爱总是相互的”］。

这是因为它所包含的转喻——从大他者过渡到由句子构成的这个独一“对象”——终究要求转喻得到接收，随后有某种东西从 γ 走向 α；也就是说，问题中的“你”不能只是回答：“不，完全不是！”

即便她不回答“不，完全不是！”，更常发生的仍是另一件事。恰恰因为这里没有诙谐那样机敏的准备，能使 β’’’ → β’’ 这条线同转喻 γ → α 混合，也就是说，两条线仍然完全独立；问题中的主体确实保有自己的转喻对象系统。

我们会看到 β → β’ → β’’’ → β’’ →……这个“圆”中建立起一项矛盾：




……也就是人们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主意；这句奠基性言说会撞上我所谓的问题。既然这里有一个正方形，所涉就不是化圆为方，

而是彼此确实不同的“转喻成圆问题”——哪怕在最理想的婚姻结合中也是如此：

“有美满的婚姻，却没有令人陶醉的婚姻。”拉罗什富科这样说。

大他者与爱的问题正处在滑稽的中心。要认识它，首先应当记得：如果想了解滑稽，例如读一些喜剧或许并非坏事。

喜剧有自己的历史；它甚至有一个受到大量研究的起源，而喜剧的起源同一种我们可以称作“本我”与语言之关系的东西形成最紧密的联系。

我们有时谈到的“本我”是什么？它当然不只是原初而根本的需要，不只是处于作为有机体之个体化根部的需要。这个“本我”只有

在欲望于语言网络中得到全部加工的彼岸才能把握。这个“本我”归根到底只在极限上实现。

这里，人类欲望并没有首先被捕获在这个使它无限延期的语言系统中：“本我”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构成自身并得到命名。可是，在语言的全部加工彼岸，它仍然表现着这项最初需要的实现、表现着它的形式；至少在人那里，这项需要甚至没有任何认识自身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动物的“本我”是什么，也几乎不可能有朝一日知道；但我们确实知道，人的“本我”完全卷入语言的这项辩证法：正是它运载并保存倾向的最初存在。

喜剧从哪里产生？人们告诉我们：从那场宴饮中产生。归根到底，人在一种狂欢中说“是”——

让这个词保有全部含混——而这顿饭本身由献给诸神、也就是献给语言中不死者的祭品构成。归根到底，欲望在语言中的全部加工过程都会归结为——

并汇聚于——一场宴席的享用；经历全部迂回以后，最终仍是为了回到享乐，而且回到最基本的享乐。喜剧正是由此进入那种可以同黑格尔一起称作“宗教的审美侧面”的东西[注4]。

> [注4] 参见黑格尔：《美学》，导论，第一章第一节第 3 段：“艺术，或者至少艺术的最高使命，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为过去之物……”

古代喜剧向我们显示什么？

你们应当偶尔稍微翻一翻阿里斯托芬。那里始终是“本我”为自己重新取得利益、为语言最基本的用法穿上靴子的时刻。诚然，在《云》中，阿里斯托芬嘲弄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尤其是苏格拉底。他以什么形式向我们显示这一点？他向我们显示：全部这套漂亮辩证法，将服务于一名老人使用各种花招来满足自己的愿望——逃避债主，想办法让别人给自己钱；或者同样服务于一个年轻人——逃避承诺与一切义务，嘲弄长辈，等等。

需要以其最基本形式返回；最初进入语言辩证法的东西，尤其是全部性需要以及一般而言所有隐秘需要，涌到前台——这就是你们看见阿里斯托芬舞台上在最前方发生的事情，而且走得很远。我尤其建议你们留意有关女人的剧作，留意那种向整个过程底层的基本需要性质返回的方式。

女人在这里特别被赋予什么角色？喜剧代表一场想象性共融的时刻；阿里斯托芬正是通过她们作为中介，邀请我们

察觉某种只能追溯性地察觉的东西：国家和城邦之所以存在，

- 是为了让人从中获利；
- 是为了让一场事实上无人相信的极乐盛宴在 ἀγορά［agora，广场］上设立；
- 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重新为一些常识感到惊讶；这些常识受到城邦邪恶竞争的阻碍，而城邦受一项辩证过程的各种拉扯所支配；
- 是为了让人通过女人——只有她们真正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回到常识；当然，这一切都采取最为奔放的形式。

它之所以辛辣，只因为向我们揭示了某些意象的暴烈。这也让我们相当能够想象一个世界：那里的女人或许并不完全像那些为我们塑造文雅古代的作者所使我们想象的样子。

依我看，古代的女人——我说的是实在的女人，不是米洛的维纳斯——应当有很多体毛，而且气味不会好闻；如果我们相信文本对

剃刀功能和某些香水所作的强调，情况就是如此。

无论如何，在这个阿里斯托芬式的黄昏中，尤其在那场女人大起义的剧作中，有一些非常漂亮、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只须看其中一幅：

一群女人不仅全都装扮成男人，还在全能的一侧给自己系上胡子——问题只在于究竟是哪一种胡子；其中一个女人站在同伴面前，突然笑起来，对她们说：

“太滑稽了，简直像一群长着胡子的烤墨鱼在开会！”[注5]

> [注5] 阿里斯托芬：《公民大会妇女》，第 126—127 行。

这幅昏暗景象似乎也很能向我们提示古代社会各种关系的整个底层。

这种喜剧将向哪里演进？向新喜剧演进。新喜剧是什么？它向我们显示，人们通常以最入迷、最固执的方式同某个转喻对象纠缠在一起。那里汇集着各种类型的人物。纵欲者，以及后来在意大利喜剧中再次出现的同类人物，都由同某个对象的一项特定关系界定。从米南德［公元前 343 → 前 292］直到今天，整个新喜剧都围绕他们转动，并围绕某种取代性欲爆发的东西转动——也就是爱。这里，爱被明确这样命名；我们会称之为天真的爱、纯真的爱。它通常把两个相当平庸的年轻人结合起来，构成情节的枢轴。

我说枢轴，正因为爱发挥的就是这项作用：它本身并不滑稽，却是整个处境的滑稽围绕旋转的轴，直到一个可以非常清楚地用

浪漫主义的出现来标记的时期。今天我们暂时把浪漫主义放在一边。

爱是一种滑稽的情感。喜剧的顶峰完全可以定位和界定：严格意义上的喜剧——也就是我在你们面前提出的意义——在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中抵达顶峰；它可以说是某次过渡的铰链：

- 从以自身占有语言的形式呈现自身与语言的关系；
- 过渡到引入人同语言之关系本身的辩证法；这项引入以盲目而封闭的形式发生。

浪漫主义在这里非常重要，因为浪漫主义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了对能指本身之辩证法的一次混乱引入；归根到底，精神分析正是这项辩证法的明确分节形式。不过，在所谓古典喜剧的路线上，顶峰出现在我所说的那部喜剧中，也就是莫里哀的《太太学堂》。它以绝对图式化的方式提出问题：所涉确实是爱，但爱在这里作为满足的工具。莫里哀提出问题的方式，为问题赋予一张网格，其清澈程度完全可以同欧几里得定理相比。

一位名叫阿尔诺尔夫的先生登场。为了让事情严密，他甚至不必是一个只有一项观念的人——他碰巧如此，当然更好；就像转喻在机智之笔中服务于吸引我们那样——从一开场，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所谓执念是不要“戴绿帽”。

这是他的主要激情；它同任何其他激情一样，所有激情彼此等价，也同样具有转喻性。喜剧的原则就是把激情设定成这样：让注意集中在一个完全相信自身转喻对象的“自身”上。况且，说他相信对象，绝不意味着他同对象绑定，因为喜剧还有一个特征：不论是谁，滑稽主体的“自身”总会从中绝对完好地走出来。喜剧期间发生的一切，都像水从鸭毛上流过一样从他身上流过——不论他在喜剧中抵达怎样的狂烈顶点。

《太太学堂》以阿尔诺尔夫一声“唉！”结束；可天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

我想在这里向你们简要回顾问题所在。

因此，阿尔诺尔夫这样谈到一个小女孩：

“我从她温柔沉静的神态认出了她。我从她四岁时就爱她。”[注6]

> [注6]　莫里哀：《太太学堂》，第一幕第一场：“她在其他孩子中温柔沉静的神态，使我从她四岁时就对她生出爱意。”

因此，他选定了自己的小女人，而且早已说出“你是我的妻子”。看到这位亲爱的天使将要被人夺走时，他之所以如此激动，正是因为这句话。依他目前所处的位置，他说：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他已经在社会上把她设立为妻子，并对她说：“你是我的妻子。”他优雅地解决了问题。他的伙伴克里萨尔德说，这个人“很有见识”。这句话在某处出现；而他的确见识太多，以至于形成了如下方案：他不必是我们一开始谈过的偏执狂人物。拿走他的偏执，他就是一个教育家。

一直以来，老人都忙于教育少女，甚至为此提出原则。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非常称心的原则：他亲口说，自己安排各种照管，让她保持在一种完全愚笨的状态。

> “你简直无法相信——他对朋友说——这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前几天，她竟然问我，孩子是不是从耳朵里造出来的。”

这本来应该在他的同一只耳朵里放进一只跳蚤，令他警觉；因为，如果这个女孩对事情有一种更健康的生理构想，她的危险性或许还会小些。“你是我的妻子”是一句充实言说，也是这项转喻。他让小阿涅丝阅读的一切——也就是婚姻义务——都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

“她完全是个傻瓜”，他说；而且像所有教育家一样，他以为能够在此基础上保证自己构造的稳固。故事的全部展开向我们显示什么？它可以叫作《机智怎样来到少女身上》。机智以何种方式来到少女身上？阿涅丝这个人物的特殊性

似乎给心理学家和批评家提出了一个真正谜题：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色情狂、一个卖弄风情者，还是这个那个？

完全不是！她是一个被教会说话、能够作分节表达的存在。她抓住那个其实同样非常平庸的小伙子贺拉斯所说的话。当贺拉斯进入问题以后，在主要一幕里，阿尔诺尔夫扬言要扯掉她一半头发，她平静地回答：

“贺拉斯只消说两句话，做得就比您更多。”

她为整部戏不断标示的东西作出标点：阿涅丝遇到这个人物时所获得的，恰恰就是“他说的话机智、温柔，听来令人陶醉”。至于他说了什么，她完全无法告诉我们，也无法告诉自己；但她正是被言说捕获的——也就是被某种打破整个习得言说、教育性言说系统的东西捕获；

这种无知正是莫里哀已经直接联系于以下事实的维度之一：

对她而言，恰恰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这套言说系统之外。

当阿尔诺尔夫向她解释，对方亲吻了她的手和胳膊时，她问：“还有别的吗？”她非常感兴趣。这个阿涅丝是一位“理性女神”。因此，当阿尔诺尔夫试图责备她忘恩负义、

缺少义务感并背叛自己时，“推理”“强词夺理的女人”这些词才在某一时刻使他窒息。她切中要害地回答：

“可我欠您什么？如果您只是把我变得愚蠢，我会偿还您的花费！”

“强词夺理者”与“强词夺理的女人”这两个词于是来到阿尔诺尔夫口中。

换句话说，开头时，我们看见一个推理者面对一个天真少女；而滑稽动力在于：机智一旦来到少女身上，我们便看到强词夺理的女人涌现，站在那个反而变成天真者的人物面前。因为这时，他以毫无歧义的词语说自己爱她，以各种方式向她这样说；他说到最后，表白的顶点大意是：

“你想做什么，就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拥有贺拉斯。”

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甚至推翻自己系统的原则。归根到底，他宁可还是“戴绿帽”——而整件事中他的主要出发点本来就是避免这一点——也不愿失去爱的对象。爱——正是在这里，我说古典喜剧抵达顶峰——爱在此……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如今已经无法再感知这一点， 因为各种浪漫主义言辞把它窒息了…… 爱是一项根本上滑稽的动力。

恰恰因此，阿尔诺尔夫才是一个真正的爱人；同那位不断摇摆的贺拉斯相比，他的爱远为真实。爱之所以滑稽，恰恰因为最为真实的爱在这里宣告并显现自己。

我们如今不再那么容易构想这一点，是因为围绕“爱”一词发生了整个视角转变。事实如此：这部戏越多得到上演，阿尔诺尔夫就越按照阿尔诺尔夫的调子得到扮演，观众也就越变得软弱，对自己说：

“莫里哀如此高贵深刻；人们笑过以后，应当为此落泪……”

也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整个视角转变，使人们几乎不再认为滑稽同爱本身真实而绝对压倒一切的表达相容。这就是故事的图式。我仍必须补上闭合故事的东西。故事之所以闭合，要归功于第三个人物、也就是贺拉斯的愚蠢。他有时表现得完全像个呆子，甚至把自己刚刚带走的姑娘重新交到她合法监护人的手中；直到那时，他仍未能辨认出这个人就是令阿涅丝遭受暴政的嫉妒者，而他恰恰把秘密托付给此人。

这无关紧要；这个人物完全是次要的。他为何存在？为了让问题以如下方式得到设定：阿尔诺尔夫每时每刻、每小时、每分钟都被告知现实中发生的一切：

- 由他的情敌本人告诉他；
- 另一方面，他的被监护人阿涅丝本人也同样完全真诚地告诉他，因为她没有向他隐瞒任何事情。

实际上，她确如他所愿，完全愚笨——但只是在她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隐藏这个意义上。她说出一切，而且说得最为切中要害。然而，从她进入言说世界那一刻起，无论教育性塑造的力量多大，这个世界都已经敞开——她的欲望在彼岸。她的欲望不只是处在贺拉斯一侧——我们毫不怀疑，她将来会让他遭受阿尔诺尔夫如此恐惧的全部命运；而是因为她身处言说领域，所以知道自己的欲望在这项言说的彼岸。

她被词语迷住，被机智迷住。

正因为某种东西处在别人试图强加给她的这种当下转喻之彼岸，

她才得以逃脱；尽管始终向阿尔诺尔夫说真话，她所做的一切却完全等同于欺骗他。贺拉斯本人也察觉到这一点；他讲述陶罐与石头的故事——女孩从窗口向他扔下自己的小石头，并对他说：

“走开吧，我不想再听您的言辞，这就是我的回答。”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说：“这就是我扔给您的石头。”但石头同时还运载着一封短信。

正如贺拉斯极其准确地强调的，对一个迄今被有意维持在极端无知中的女孩而言，这项歧义找得相当不错。它开启了这些双重意义，开启了人们今后能够对它抱有最高期待的全部游戏。

这就是今天我想让你们停留的点。自身本性上处在欲望被语言捕获的彼岸。同大他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欲望的道路必然经过大他者；这里的大他者不是独一对象，而是语言的应答者，

并且凭自身把欲望置于其全部辩证法之下。

# 第8课 · 1958年1月8日

我感觉上个季度——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回响——多少让你们有些喘不过气。我当时没有察觉，否则就不会这样做。我还感觉自己有所重复、原地踏步。不过，这或许并没有

阻止某些我希望让你们听见的东西滞留途中。或许值得稍微回头，也就是看一看我今年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围绕机智之笔，我析出了一幅特定图式——它的用途或许不会立刻向你们显现。我试图向你们显示的是它的统一：

- 事情怎样彼此嵌合；
- 它们怎样同前一幅图式啮合。

归根到底，所涉的是你们应当从我的教学中感知为一项常量的东西。不过，这项常量不应只是地平线上的一面小旗，让你们用来定向。你们必须明白它把你们带往何处、通过怎样的迂回把你们带去。这项常量就是我认为对于理解

弗洛伊德中的东西绝对根本的一项观察：首先是我们已经说过的语言的重要性，随后是言说的重要性。我们越接近自己的对象，就越能察觉能指在欲望经济中的重要性有何不同——或者还可以说，在所指的形成与赋形中有何不同。

昨晚，你们听到潘科夫女士在科学讨论会上带来的有趣内容时，应当已经察觉这一点。恰好，美国也有人关心

我在这里向你们解释的同一件事。他们试图把沟通这个事实、以及有时所谓讯息的东西，作为判定这些心理紊乱、这些经济紊乱时的根本要素引入。

你们听见潘科夫女士谈到一位绝非初出茅庐的人，

也就是人类学家与民族志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他带来了某种东西，

使我们围绕治疗作用思考得稍微远过鼻尖。

他试图把某种在母亲与儿童之间建立的东西，表达为精神病性紊乱发生的根本原则。它不只是张力、扣留、防御、认可、挫折这些效应——我说的是人际关系的基本意义——仿佛那是

发生在一根橡皮筋两端的东西。

他试图从一开始就引入沟通概念；沟通并不只以接触、关系、周围环境为中心，而以一项意指为中心。他把沟通安置在一开始便不协调、撕裂儿童同母亲之关系的根部。当他把沟通以一种“双重关系”[double bind，双重束缚]呈现这个事实，指称并标示为这项关系中根本的不协调要素时，情况正是如此。

正如潘科夫女士昨晚非常准确地对你们说的，儿童从母亲行为中解读出一项讯息，而同一项讯息中有两个彼此未得到界定的要素。这里并

不只是说，其中一项表现为主体针对另一项意义所作的防御；那才是我们关于防御机制层面所发生之事的通常概念。

分析时，你们可以说："主体说出某种东西，是为了误认他内部某处还有意指存在。"他向自己宣告，同时也向你们亮出旁边的底牌。这里并非如此。所涉的是某种关系到大他者的东西；大他者以这样的方式接收它：如果在一个点上回答，便知道自己会因此在另一个点上陷入困境。

正如潘科夫女士昨晚告诉我们的：

- 如果我回应母亲向我作出的爱的宣告，就会激起她的退缩；
- 如果我不把它听作爱的宣告，也就是不回应她，就会失去她。

因此你们看到，我们已经被引入双重意义的辩证法，因为它已经牵涉一项第三要素。

这里不是一项意义藏在另一项背后……仿佛彼岸有某种意义，因为更加真实而享有特权……而是同一次发出中可以说有两项同时存在的讯息、两个意指；它们在主体中创造一个使其陷入死路的位置。这向你们证明，即便美国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就完全充分了吗？昨晚，潘科夫女士非常准确地强调这项尝试多么"贴着地面"、多么经验性。

当然，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如果美国没有同时在所谓"博弈策略"层面进行非常重要的研究，他们甚至不会想到

把这一点引入分析。分析在这里终究是在重构某种被设定为最初已经发生的东西；它决定主体相对于讯息对主体的构成性而言，处在这个深刻撕裂、失衡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不包含讯息对主体具有构成性这个事实，就很难看出人们怎样能把如此巨大的效应赋予这项原初双重关系。于是，问题在于：当沟通未能对主体起构成作用时，它处在怎样的情形，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我们必须寻找另一项路标。迄今为止，当你们阅读并听取贝特森先生的意思时，会看到一切归根到底都以双重讯息为中心；这无疑如此，但它以作为双重意指的双重讯息为中心。系统恰恰在这里出错。究竟错在哪里？恰恰在于：只有这种构想与呈现事物的方式，才会忽视能指在意指中所具有的构成性。

昨晚，我顺手记下一句话——现在找不到了——它取自潘科夫女士自己的发言，大意如下：

“不存在——她说——一项能够把言说奠定为行动的言说。”

这恰好处在我现在接近之物的道路上：这些言说中必须有一项“把言说奠定为主体中的行动”。她正是沿这个方向表达自己的要求与对系统不足的感受。潘科夫女士借此表达了一项使整个系统稳定下来的要求：言说内部某处必须有某种把言说奠定为真实之物的东西。

因此，她在这个方向上求助于人格视角。这就是她昨晚提出的东西；它至少有一项优点：见证某种要求。这项要求对应于系统中使我们不确定、无法进行充分推演和构造的东西。

我完全不认为可以这样表达。就这种人格主义参照而言，我认为它在心理学上有根据，只限于一个意义：在意指造成的这条死路中——人们设定，当主体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这条死路会激起主体的深刻困惑——我们无法不预感到，这项缺损的根部必定有某种东西。

它不只是这些意指死路所留下、捕获并印上的经验，而且还是奠定意指本身的某种东西之缺失；这个东西就是能指。

还有更进一步的东西，也恰恰是我今天要处理的东西，即某种

不只是以人格、以潘科夫女士昨晚所谓“把言说奠定为行动”的东西为基础，而是把自己设定为赋予法则权威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所谓法则，恰恰是严格在能指层面作出分节的东西，也就是法则的文本。说必须有一个人格在那里，可以说用来支撑言说的真实性，同说存在某种赋予法则文本以权威的东西，并不相同。

因为赋予法则文本以权威的这种东西，只须自身存在于能指层面就已经足够；它就是父之名——我所谓的父之名——也就是象征之父。这是某种持续存在于能指层面的东西；在作为法则所在地的大他者中，它代表大他者内部的这个大他者——这项支撑法则、颁布法则的能指。

弗洛伊德思想所必需的神话——俄狄浦斯神话——表达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请仔细看看：他之所以必须亲自以这种神话形式提供

法则的起源，是因为要让某种东西使法则奠定在父亲之中，就必须发生弑父。两件事紧密相连；也就是说，父亲作为颁布法则者，就是死去的父亲，也就是父亲的象征。死去的父亲就是父之名，它在这里构造于连续体之上。

这一点绝对根本。这里，我要提醒你们原因。两年前，我向你们讲授精神病[注1]的一切围绕什么展开？围绕某种我称作 Verwerfung［拒斥］的东西。我试图使你们感到，它不同于 Verdrängung［压抑］；后者意味着能指链不论你们是否知道，都继续在大他者中展开、组织起来，

> [注1] 1955—56 年研讨班《精神病的弗洛伊德结构》，亦即《精神病》，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 年。

而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根本发现。

不过我曾告诉你们，Verwerfung 不只是在你们所能接近的范围彼岸，也就是说，不只是作为被压抑者与能指的大他者中的东西。后者才是 Verdrängung，才是能指链。证据在于：你们不赋予它最小的意指，它仍继续作用；你们并不知道它是能指链，它仍决定着最微小的意指。

我也曾告诉你们，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东西属于 Verwerfung。能指链中可能缺少一项能指或一个字母；它在排印中始终空缺……因为所涉的是排印空间。能指空间、无意识空间都是排印空间。

我们必须试着把排印空间界定为某种由一条线、由一格格小方块构成的东西。排印空间有自己的拓扑法则……这条能指链中缺少某种东西。

你们必须理解，我刚才谈到的这项特殊能指——父之名——的缺失有何重要。它恰好奠定“存在法则”这件事，也就是在某种能指秩序中存在分节——例如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法则，或禁止母亲的法则。这个能指意味着：

能指存在于这项能指内部。这就是父之名。如你们所见，它在大他者内部是一项根本能指。

我曾试图围绕它向你们集中说明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主体必须怎样补偿父之名这项根本能指的缺失。我还围绕它组织了自己所谓精神病中发生的全部连锁反应或溃散。我现在应当做什么？

应当立刻进入对我围绕施雷伯院长讲过之事的回顾吗？还是应当更精确地向你们显示我所表达、刚才只是宣告的东西？也就是在今年的图式层面详细显示应当怎样表达相关关系……令我极为惊讶的是，并非人人都对这幅图式感兴趣，不过仍有一些人感兴趣……尝试在今年的图式层面向你们表达我刚才试图指出的东西？不要忘记，这幅图式是为了向你们表现某种配得上“技术”之名的东西所发生的层面，也就是诙谐的技术。它是一种特殊、非常奇异的东西，因为主体显然可能以世上最无意的方式制造它。

正如我向你们显示的，诙谐有时只是口误的反面；经验还显示，许多诙谐正以这种方式产生：人们事后才觉察自己刚刚颇有机智。它自行发出。起初，在某些情形下，它甚至可能恰好被当作相反的东西——天真的标志。

上次，我曾提到天真诙谐。上个季度，我正是围绕这种诙谐及其结果——那项属于它的特殊满足——试图为你们组织这幅图式，以便定位我们怎样能够构想它所给予的特殊满足之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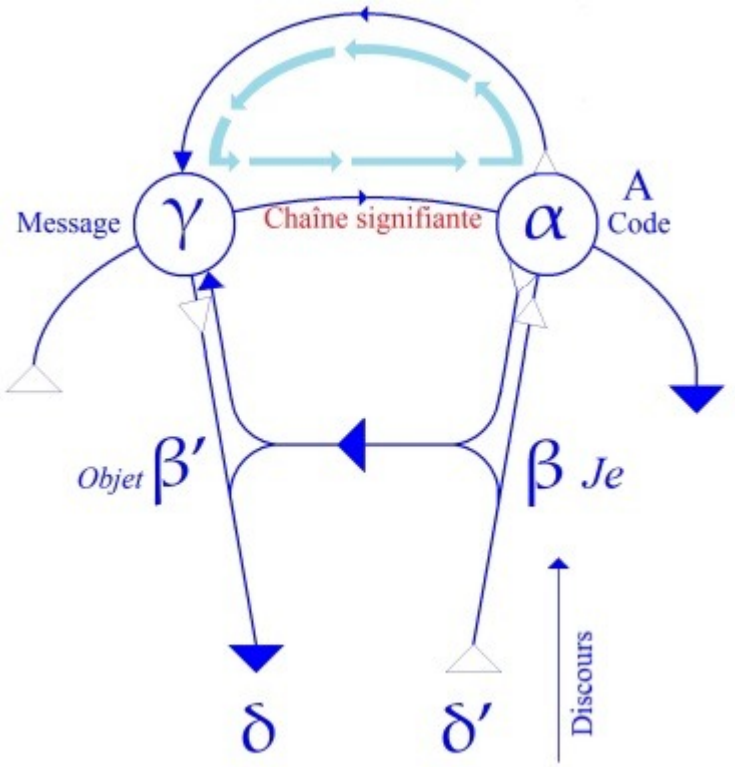
这只把我们带回从 ego［自我］出发的要求辩证法。请记住那幅我可以称作原初象征理想的图式；在要求得到满足的时刻，这项理想完全不存在。要求满足由两件事的同时性来表现：意向显现为讯息；同时，这项讯息本身抵达大他者——我的意思是，能指抵达大他者，因为这条链就是能指链。

它就此察看以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完全同一、同时并精确叠合的关系：

- ego 的意向所作的显现；
- 以及能指本身在大他者中得到批准这个事实；某种东西正处在言说满足的可能性本身之根部。

因此，我们假定——这就是我所谓理想的原初时刻——：

- 如果这个时刻存在，就必定由这种同时性构成，由显现的欲望与运载并包含它的能指之间精确的共同延展性构成；
- 如果这个时刻存在，那么后续——也就是这里将继讯息而来的某种东西——将继讯息通过大他者而来，并对应于大他者和主体中为了产生满足而必需、而且已经实现的东西。




这恰恰是让你们理解“它永远不会发生”所必需的出发点。能指的本性与效应，使抵达这里［γ］的东西表现为所指；也就是说，它由欲望在通过能指时所经历的转变与折射构成。

为什么？这两条线之所以交叉，就是为了让你们感到这个事实：欲望表达自身并经过能指，也就是说，它横穿能指线。欲望同能指线交叉时，在这个层面遇见什么？

它遇见大他者——稍后我们必须回来，看看这幅图式中的大他者是什么。它遇见大他者；我没有说作为人格的大他者，而是说作为能指宝

库、作为代码所在地的大他者。换句话说，欲望正是在那里经由能指发生折射。

因此，欲望以所指抵达，已经不同于出发时的自身。正因如此，不是说“您的女儿哑了”，而是说您的欲望总被戴绿帽。因为在这个间隔中，问题向你们显示：戴绿帽的倒不如说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受到了背叛，因为你们的欲望同能指上了床。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不知道还应当怎样把事情表达得更好，才能让你们明白。这同一个事实有关：欲望作为这个根本 ego 某一时刻的散发与尖端，单凭它必须走这条道路，就发生变化。这就是图式的意义；它让你们把这个概念视觉化：穿过能指链本身，就会在欲望辩证法中引入这项根本改变。

于是十分清楚，欲望能否满足，完全取决于这一点［A］发生什么。这个点首先被界定为代码的场所，是某种根本东西；它从一开始、自起源时，单凭自身的能指结构，就在欲望越过能指时给它带来这项根本改变。其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这里，因为那里不只有代码，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现在处在最根本的层面，不过那里当然还有法则、禁令、超我等等。

可是，为了理解这些不同层面怎样建立，必须明白：只要你们向某个人说话，就有一个大他者；对方身上有一个作为代码主体的大他者。即使在这个最根本层面，我们也已经服从这项欲望被戴绿帽的辩证法。

因此，一切显然都取决于这个交叉点、这个越过层面发生的事情。人类欲望的一切可能满足，都会取决于以下两者的一致：

- 能指系统，因为它在主体的言说中得到分节——拉帕利斯先生也会这样告诉你们；
- 能指系统，因为它安放在代码中，也就是处在作为代码场所和所在地的大他者层面。

一个小孩子听到这些都会信服；我并不声称刚才的解释让我们向前多走了一步。不过，我们仍必须把它表达出来。

正是在这里，我们将接近我希望在这幅图式同刚才宣告的东西之间为你们建立的接合；后者关系到父之名这个重要问题的根本之处。你们会看见那个必须完成才能抵达的跳跃得到准备、

得到勾勒，却不是被产生，尤其不是自行产生。

因为一切都发生在非连续层面：能指的特性恰恰就是非连续的。

诙谐的技术通过经验带给我们什么？我曾试图以各种方式使你们感到它。这是一种不包含任何直接的特殊满足，却由如下事情构成的东西：有某种东西发生在大他者中，它等价于、表现并象征着

一切满足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恰恰在你们所说的话彼岸，你们得到听取；因为无论如何，你们所说的话都不能真正使你们得到听取。机智之笔本身在隐喻维度中展开；也就是说，当你们试图借助能指来意指某种东西时，恰恰在能指彼岸，你们无论如何都始终意指着另一件东西。

你们在某种将表现为能指踉跄的东西中，只因一件事而得到满足：大他者从这项标记认出了那个彼岸维度；问题中的东西必须在那里得到意指，而你们无法把它本身意指出来。机智之笔向我们揭示的就是这个维度；它十分重要。为了认识诙谐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构造这幅图式；它借此把该维度奠定在经验中。也就是说，某种东西弥补了借能指道路传达欲望的失败，甚至给我们带来一种幸福；它在诙谐中这样实现：大他者批准一项

发生踉跄、已经失败的讯息；而且恰恰通过这项踉跄，认出真欲望所处的彼岸维度，也就是那个由于能指而未能得到意指的东西。

你们看到，大他者的维度稍稍扩展了：

- 因为它在这里不再只是代码所在地；
- 它在这里作为主体介入，把一项讯息批准进代码，使代码变得复杂；也就是说，它已经处在构成法则本身者的层面，因为它能把这道特征、这项讯息作为补充添加进去，换句话说，由它自身指示讯息彼岸。

正因如此，今年开始讨论无意识的形成时，我首先向你们谈机智之笔。

让我们在一种不像诙谐那么特殊的情形中，更仔细地考察这个大他者。我们试图在其维度中发现这样一项能指的必然性：它奠定能指，也就是说，它是建立法则或代码之合法性的能指。

为了重新拾起欲望辩证法：当我们向另一个人讲话时，不会始终通过诙谐表达自己。如果能做到，我们以某种方式会更加幸福。在我向你们发出的这段短暂话语期间，我正试图这样做。我并不总能成功。是你们的错还是我的错，从这个观点看完全无法区分。

不过，回到我向另一个人说话时所发生之事的实在地面，有一个维度使我们能够以最基本方式把它奠定在欲望同大他者的这项能指接合的层面。法语中有一个绝对奇妙的词，它容许人们制造种种歧义和无数谐音双关；若不是极为克制地使用，我本人都会为在这里使用它们而脸红。

我一说出这个词，你们就会立刻想起我所指的是哪类唤起。这个词是“你”［tu］。这个“你”在我多次所谓的充实言说中绝对根本，也就是言说在历史中奠定某种东西时——“你是我的主人”或“你是我的妻子”中的“你”。这个“你”是呼唤大他者的能指。围绕下面这项距离，我已经向你们显示如何使用这个大他者……我向那些愿意跟随我全部精神病研讨班链条的人再次提醒这一点：

- 从“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你是那个将跟随我的你］”；
- 到“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你是那个将跟随我的人］”。

换句话说，我当时已经试图为你们接近、训练你们把握的，恰恰就是我现在要提到、而且当时已经命名的东西。

这两个词项及其差异中都有一项呼唤……不过一者比另一者包含得更多；甚至一个完全包含，另一个则完全不包含。

“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中有某种“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所没有的东西；它名叫召唤。如果我说“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我就召唤你，把某种身份授予你，

授予你成为将跟随我的人；我在你心中激起一声“是……”，它说：

- “［是］我属于你”；
- “［是］我把自己奉献给你”；
- “［是］我就是将跟随你的人”。

可是，如果我说“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就完全没有做同一件事。我在宣布、确认、客观化，有时甚至在推开。它可以意味着：“你就是那个总跟着我的人，我已经受够了。”这句话以最通常、最合乎其后果的方式说出时，甚至就是一项拒绝。

召唤当然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我使自己的欲望依赖于你的存在；无论这项欲望是什么，我都无条件地呼唤你的存在进入欲望的道路。召唤过程的意思就是我诉诸声音，也就是诉诸支撑言说的东西：不是诉诸言说，而是诉诸恰好运载言说的主体。正因如此，在这个层面，我处在刚才谈论潘科夫女士时所谓的人格主义层面。

这正是人格主义者整日没完没了向你们重复“你、你、你……”的原因。

比如马丁·布伯先生——潘科夫女士顺带提到了他的名字——确实是这个语域中的显赫名字。当然，这里存在一项根本的现象学层面，我们不可能不经过它。

不过，我们也不应只向它的幻象让步，也就是俯身叩拜；因为我们确实会在这里遇见危险：这种人格主义态度相当容易落入神秘主义的叩拜。

为什么不呢？我们不拒绝任何人采取任何态度，只要求拥有理解它们的权利。况且，人格主义一侧并不拒绝这项权利；拒绝它的是科学主义一侧。因为只要你们开始把一种真实性附加于神秘主义者所说之话的主体结构，科学主义者就认为你们也陷入可笑的纵容。然而在我看来，不论哪一种主体结构，只要我们能够跟随它所表达的东西，从主体分析的观点看，就严格同其他任何一种等价。

也就是说，只有布隆代尔先生（那位精神病学家）那种愚蠢的白痴，才能以另一个人亲身经历的所谓“不可言说的病态意识”为名，拿它来反对

某种并非表现为“不可言说”、而是已经得到分节表达的东西。必须拒绝这项反对；它以一项混淆为名，而混淆来自相信得到分节表达的东西恰恰就是彼岸之物。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是彼岸之物使它得到分节表达。

换句话说，围绕这个主体——无论妄想者还是神秘主义者——没有必要谈论“不可言说”。我们处在主体结构层面；这里有某种本身不可能以不同于眼下方式呈现的东西，因此它在自身可信度层面以全部价值呈现。

如果妄想者或神秘主义者那里存在“不可言说”，按照定义，他就不会谈论它，因为它“不可言说”！所以，我们不应依据他无法谈论的东西，来评判他表达的内容，也就是他的言说。

如果可以假设存在“不可言说”——我们很乐意这样假设——那么我们也永远不会以“不可言说”为名，拒绝把握任一言说中所显示的结构，无论这项言说是什么。

我们可能在其中迷路，这时便放弃。不过，如果没有迷路，就应当照原样接受它所显示、揭示的秩序。我们通常会发现，照原样接受它，并在拥有正确路标的条件下，试着表达它设定的秩序，会产生远为丰富的成果。这正是我们在这里努力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从“它［主体的言说］本质上是为了表现所指而形成”这个观念出发，就会立刻被淹没，因为我们会重新落入先前的对立：我们并不知道所指。

问题中的“你”是我们召唤的对象；召唤它时，那种个人的主体不可穿透性当然仍会受到牵涉，可是我们并不试图在这个层面

触及它。我们试图给予它一切召唤中所涉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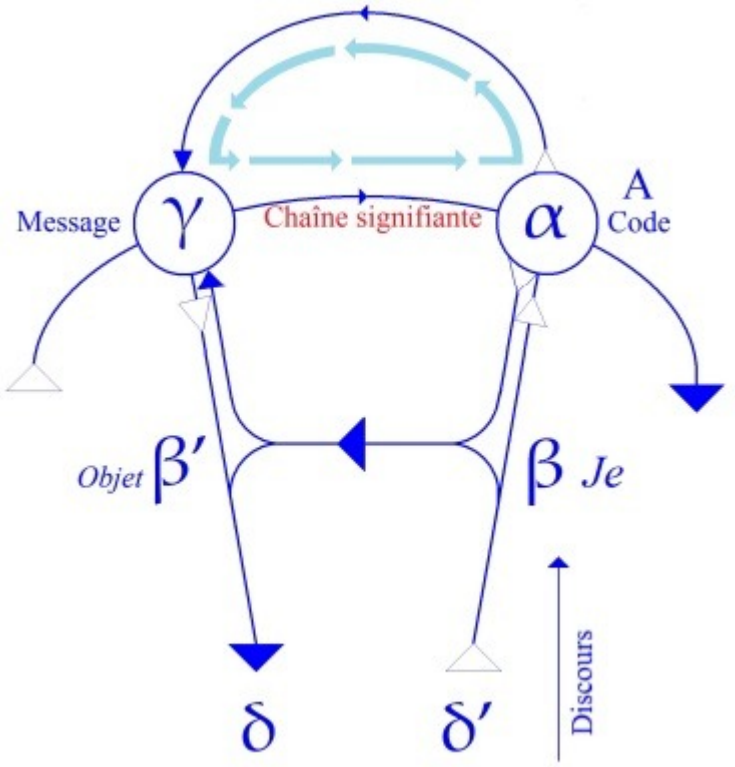
“召唤”一词有一种历史用法；它指古人在某种仪式中做的事情。

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比我们更有智慧，并在战斗前举行这种仪式。仪式在于做必要之事——他们大概知道该怎么做——把对方的神祇拉到自己一边。

“召唤”所指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我现在把你们带回的根本关系——这项呼唤的第二个必要阶段——也正在这里。为了使欲望与要求得到满足，只对它说“你、你、你……”、取得某种心悸式参与并不够。问题恰恰在于赋予它我们欲求它拥有的同一种声音，唤起这道恰好在机智之笔中在场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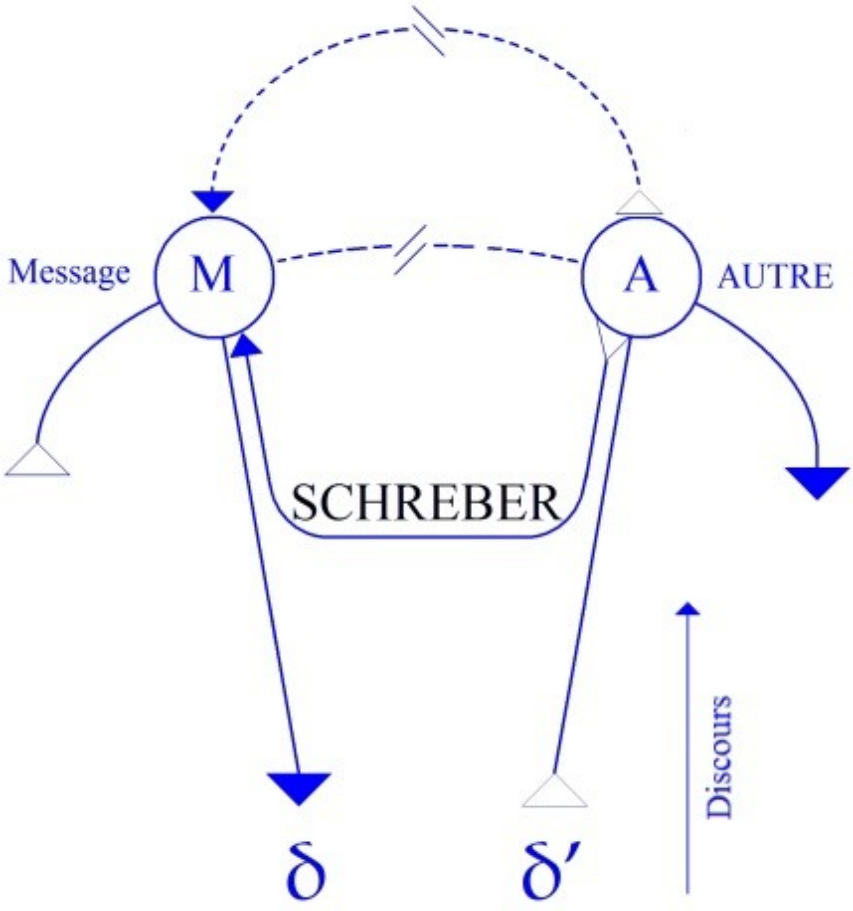
至少使它作为诙谐自身的维度在场。

机智之笔是一项未能完成召唤之壮举、之奇迹的挑衅。召唤位于言说层面，因为问题在于这道声音按照我们的欲望作出分节。于是，我们在这个层面重新发现：要求的一切满足既然依赖大他者，就会悬置于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从讯息到代码、再从代码到讯息的旋转往返；通过这项往返，我的讯息能够由大他者在代码中得到认证。




我们回到前一个点，也就是今年我们共同关注机智之笔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只顺带向你们指出：如果当时已经有了这幅图式——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时不仅能够把它给你们，而且能够同你们一起锻造出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同一时刻共同抵达同一道机智之笔——我本可以用它向你们描绘施雷伯院长身上根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成了自己声音的猎物、绝对依赖于声音的主体。如果你们仔细观察我身后的图式：



再简单假定：凡在大他者中能够以任何方式对应于我所谓父之名层面的东西，都已经遭到 verworfen［拒斥］。父之名体现、具体规定并特殊化——我不知道……特殊化什么？——我刚才为你们画出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在大他者中表现大他者本身，因为它赋予法则作用范围。

如果你们假定它缺席——这正是我给出的 Verwerfung 定义——也就是父之名缺席，就会发现我在这里框出的两条联系［虚线］，即讯息通向代码再返回［M $\underset{\rightarrow}{\ }$ A］以及代码通向讯息再返回［A $\underset{\rightarrow}{\ }$ M］，因此受到摧毁而不再可能。借此，你们可以在图式上安置两种根本的声音现象；它们前来替代这项缺陷、这项缺失，

因为它恰恰曾在某一时刻受到唤起。

这里就是使主体突然陷入精神病的倾覆点、转折点——眼下我把“怎样”“何时”与“为什么”放在一边。事情就发生在某种东西造成的凹陷与空洞里：恰恰是那个在某一时刻于“你是”与父之名层面受到呼唤的东西……父之名能够认证讯息，并充当保证；

……而它缺席以后，便发生你们在图式上看到的东西：某种东西作为自主者产生；由于这个事实，法则本身表现为自主的。

那一年，我从自己在一次病人展示中告诉你们的一句话出发，开始关于精神病的讲授[注2]；

> [注2] 1955—56 年研讨班《精神病》，1955 年 12 月 7 日课。

在那里，我们非常清楚地把握到一个时刻：患者低声含混地说出“我刚从猪肉铺回来”之后，随着一连串主体不再能够承担的同位成分，句子

如何以“母猪”这个词发生倾覆。这个词在彼岸不再能由主体整合；它凭自身运动、凭自身的能指惯性倾覆到另一边，从大他者中的回击那里被拉出。

这纯粹只是基本现象学。问题在于看见为什么——况且，人们终究也可以不作这种解释——讯息与大他者之间所发生之事受到排除，会产生施雷伯的两大类声音与幻觉。一类就是大他者层面在这里发出基础语言的能指。

也就是说，这些能指本身表现为代码中破碎而独特的要素，只能相对于彼此得到分节。因为这门基础语言组织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它用自身的能指网络逐字覆盖整个世界；除了一切都指向完整的根本意指，再没有任何其他稳妥确定的东西。每个词都有自身的分量、重音与能指重量。主体让它们相对于彼此作出分节。每当它们被孤立时，意指自身的谜样维度就极为醒目，因为这项意指远不如它所包含的确定性那么显而易见。换句话说，可以说，大他者只在代码彼岸发出东西，完全不可能把任何从这边［M］——也就是主体表达自身讯息的位置——而来的东西整合进去。

另一方面，尤其只要你们在这里重新放上几支小箭头，就会有某种东西前来；它绝不会是对讯息的认证，也就是说，不会是作为代码支撑的大他者返回讯息，以某种意向把它整合、认证进代码；不过，它当然也会

从大他者而来，就像所有讯息一样。因为讯息只能从大他者出发；即便它从我们这里出发，也是作为大他者的反映，因为它由一门属于大他者的语言构成。

因此，这项讯息将在这里从大他者出发，离开这项路标，并作出这类表达：

- “而现在，我想给您……”；
- “明确说，我为自己想要这个……”；
- “而现在，这终究应当……”

这一切缺少什么？

- 在“基础语言”层面表达的主要思想；
- 声音本身知道整套理论；
- 声音本身还说：“我们缺少反思。”

这意味着，另一类讯息确实从大他者出发。严格说来，这是一项本身不可能得到认证的讯息；这项讯息还表现为

能指纯粹而破碎的维度：

- 某种东西只在自身彼岸包含其意指；
- 某种东西无法通过“你”参与这项认证，因此它呈现出来的唯一目标，就是把“你”——意指在其中得到认证的位置——呈现为缺席；当然，主体仍努力补全这项意指。

因此，他给出句子的补语。声音说：“我现在不想……”补语位于别处。在别处，有话说他施雷伯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妓女、eine Hure。

并非一切都被说出。讯息在这里始终断裂，因为它恰恰根本无法通过声音；只有作为中断的讯息，它才能抵达讯息层面。

我想自己已经充分指出，在作为能指安放场所和宝库的大他者中，展开并强制显现的根本维度包含如下要求——为了让大他者充分发挥自身的大他者功能：能指通过时，其中必须有一项表现作为大他者之他者的能指。为什么？我的意思是，恰恰因为他者在自身彼岸同样拥有这个大他者，它才能够奠定法则。

不过，这当然是属于能指秩序的维度；它体现在一些会或不会承担这项权威的人身上。

然而，例如有时这些人缺位、出现父亲功能的不足——譬如父亲太愚蠢——本身并不是最根本的事情。根本的是主体必须从某个方面取得父之名的维度。

当然，传记中实际发生、而你们也可以注意到的是：父亲经常围着妻子的围裙，在厨房里洗碗。这完全不足以决定精神分裂症。

我要为你们摆出一幅小图式，借此引入下次的内容。它将使我们能够接合父之名与实在父亲这项可能显得略为经院式的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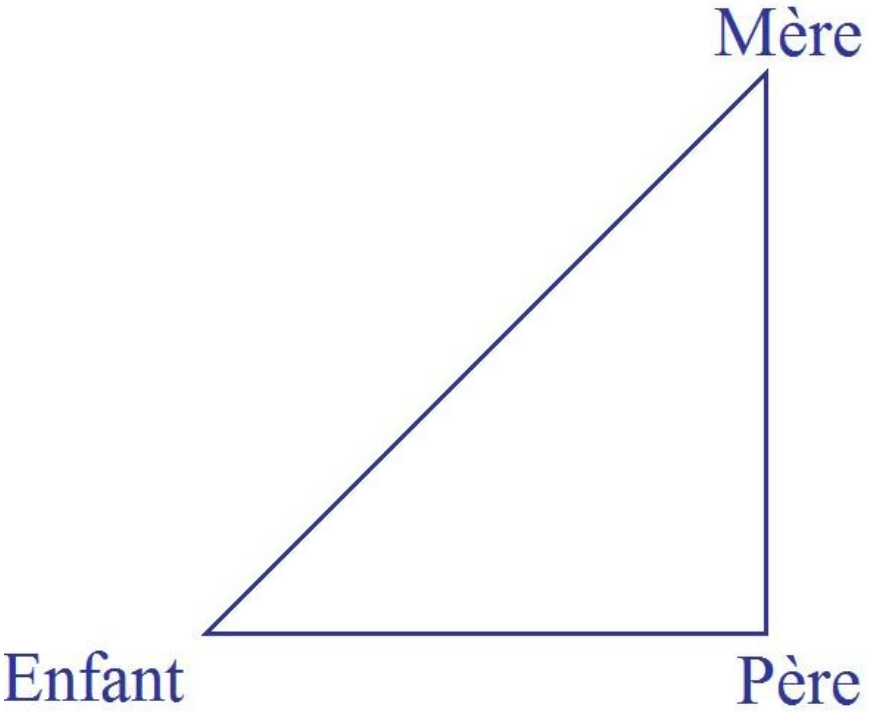
- 父之名有时可能缺失；
- 但父亲看起来并不那么需要实际在那里，父之名也可以不缺失。

因此，我将引入下堂课的对象，也就是我从今天起命名为父亲隐喻的东西。当然，一个名字始终只是同其他能指一样的一项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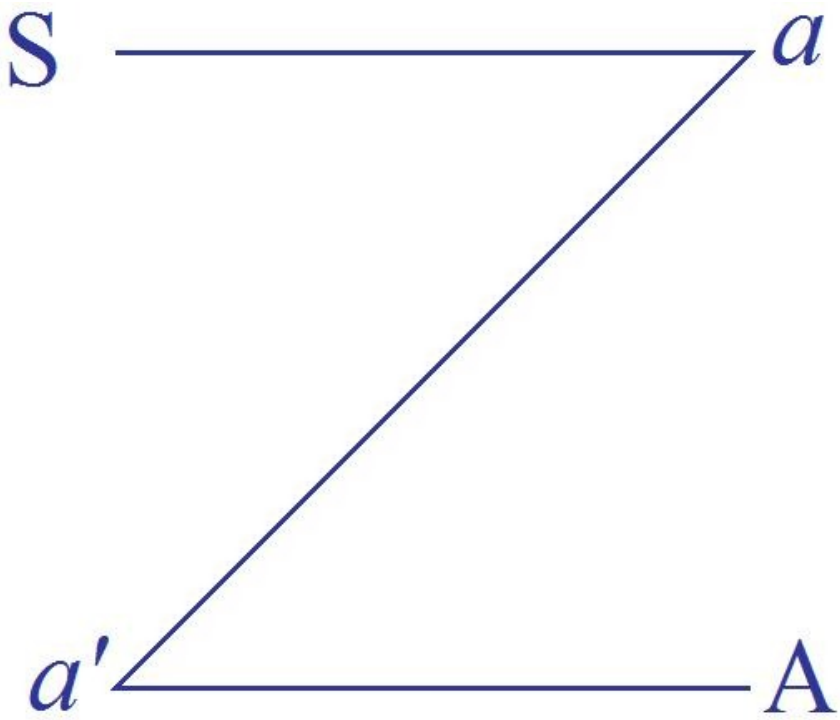
拥有它非常重要，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人就能接近它，正如人不能因此接近我刚才谈到的、原则上被戴绿帽的欲望满足。

因此，在行动中——潘科夫女士昨晚谈到的著名言说行动——我刚才所说的唤起，将在我们称作隐喻性的维度中具体地、心理地实现。换句话说，必须拥有父之名，但还必须知道怎样使用它。正是在这里，整件事的命运和出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周围实际发生的言说，尤其是童年时期的言说。

我今天向你们宣告的父亲隐喻之本质——下次我们会作更长的讨论——由一个三角形构成：



而且，我们还有这幅图式：




在 S 中实现的一切，都取决于 A 中设定了哪些能指。如果 A 确实是能指场所，就必须带有这项根本能指的某种反映；我在这里以这条之字形向你们表现它。别处，在我的《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一文中[注3]，我曾把它称作“L 图式”。

[注3]　雅克 · 拉康：《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载《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年。关于“L 图式”，参见《失窃的信》，《文集》第 53 页；或《论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文集》第 531 页（图式见第 548 页）。

其中至少必须有某种东西彼此区分，从而至少区分这四个基本点。我们已经有三个点，由俄狄浦斯情结作为能指时的三个主体词项给出，分别位于三角形的各个顶点。

下次，我将回到这里。眼下，为了稍微激起你们的

胃口，我只请你们暂时接受自己的说法。

第四个词项确实就是 S。不过，由于它就是主体，而且主体——我不仅向你们承认这一点，

而且这正是我们的出发点——确实不可言说地愚蠢：

- 它在俄狄浦斯三角的三个顶点中没有自己的能指；
- 它位于外部；
- 它依赖牌局中将要发生的事情；
- 它是牌局中的“死家 / 明手”。

正因为牌局以这种方式得到结构化——我的意思是，它不只作为一次特殊牌局进行，而且作为一场建立规则的牌局进行——

主体才会发现自己依赖于三个分别名叫自我理想、超我与现实的极点。

不过，为了理解从第一个三元组到另一个三元组的转变，必须看到：不论主体多么是“死家”，既然存在主体，它仍要在这局牌里自行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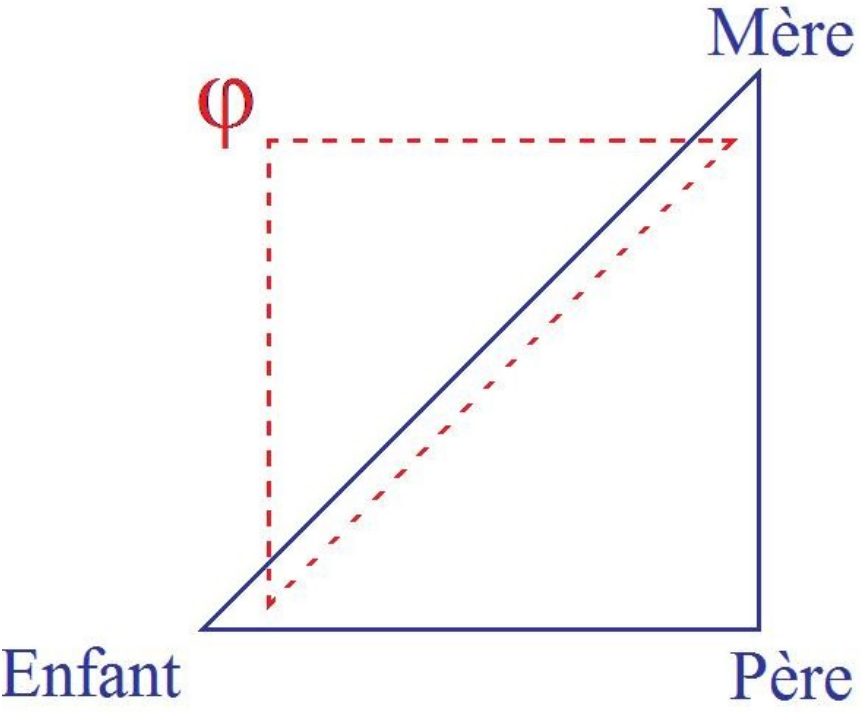
费用。也就是说，在它所在的这个未构成点上，它必须参与牌局；即使不是拿钱参与——它或许还没有钱——也至少要拿以下东西参与：

- 它的皮肤；
- 它的意象；
- 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
- 它的想象性结构。

第四个词项 S 将在某种与三元组中的俄狄浦斯能指对立的东西中表现自己；为了彼此贴合，这个东西也必须是三元的。当然，意象的库存与行囊中——翻开荣格先生及其学派的书就会知道——意象多得没完没了；它们到处萌芽疯长：蛇、龙、舌头、燃烧的眼睛、绿色植物、花盆、女门房，这一切都是意象，真正都十分根本，无疑塞满了意指。不过，如果你们只在这个层面闲逛，就严格地无法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只能提着自己的小灯，在原初原型的茂密森林里迷路。

要理解其中的东西，必须知道：就我们关心的主体间辩证法而言，

有三个意象得到选择。我为了在这一切中担当向导，略为用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已经有某种绝对准备就绪的东西。它不仅已经准备好对应“母亲—父亲—儿童”三角形的底边，甚至可以同底边混合：这就是碎片化身体同身体完整意象之统一功能的关系——而碎片化身体同时还被我们刚才谈到的许多意象包围；换句话说，也就是自我同镜像的关系。




这已经给出想象三角形的底边。另一个点——我们恰好将在那里看见父亲隐喻的效应——我在去年关于《客体关系》的研讨班中已经告诉过你们；而现在，你们会看见它在今年进入的《无意识的形成》中取得自身位置。我想，只要看到它作为第三项同母亲和儿童一起出现在这里，你们就已经认出这个点。不过，你们看到它处在另一项关系中；去年我根本没有对你们遮蔽这项关系，因为我们正是以它收尾——即同父之名的关系，也就是在小汉斯那里使马的幻想诞生的东西。

最后，我来命名这个第三点；我想，你们全都已经把它放在嘴边：它无非就是阳具。正因如此，阳具在弗洛伊德经济中占据如此核心的对象位置。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向我们显示，今日精神分析正在越来越远离它；

恰恰是这项阳具——主体在想象上认同的根本功能——受到彻底删略，被还原为部分对象概念；而在弗洛伊德经济中，这绝不是它的原初功能。这项阳具还会把我们带回某种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的东西——至少根据上次讲授结束时我听到的反应是如此——也就是喜剧。

今天，我让你们停在这个主题上。最后，我只想向你们显示这篇复杂论述——我试图借它汇聚我们说过的一切——朝着哪个方向，

沿着哪条道路，彼此连接并维系成整体。

# 第9课 · 1958年1月15日

我曾宣布，今天要谈一个例外地被我赋予标题的东西，也就是父亲隐喻。不久以前，有人——我想，他或许有点担忧我会把事情

引向何处——问我：

> “今年剩下的时间，您打算向我们谈什么？”我回答：“我打算处理一些结构问题。”

这样，我就没有把自己置于险境。不过，今年围绕

无意识的形成，我确实准备向你们谈这件事，也就是结构问题。简单地把事情直呼其名：这些问题试图把各种东西安放到位；你们每天都在谈这些东西，也每天在其中纠缠不清，到头来甚至不再为此感到不安。

因此，父亲隐喻将关系到对父亲功能的考察——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用人们所谓人际关系的词语来谈——也关系到你们每天都会遇见的各种复杂情况。我的意思是：你们怎样使用它，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来使用；谈论它如此之久，它甚至已经取得某种熟悉形态。问题恰恰在于知道，你们是否以一套足够连贯的话语形式谈论它。

这项父亲功能在精神分析史中占有位置，甚至占据相当广阔的位置。不用说，它处在俄狄浦斯问题的核心。因此，在精神分析史中，你们会看到它围绕俄狄浦斯情结被赋予的位置而呈现。弗洛伊德从一开始

就引入了它。俄狄浦斯情结随《梦的解析》出现[注1]。起初，无意识在那里首先并且最重要地揭示出俄狄浦斯情结。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PUF，1926、1967、2000 年版。

无意识揭示的重要性在于儿童期遗忘；它涉及什么？

涉及儿童对母亲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受到压抑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它们不只受到制止，人们还忘记了这些欲望是原初的——不仅忘记它们是原初的，也忘记它们始终还在那里。不要忘记，精神分析正是从这里出发；临床引入的一系列问题也围绕它得到提出。

我曾试图为你们整理精神分析史上围绕俄狄浦斯提出的若干问题方向。第一个方向标志着一个日期：最初，俄狄浦斯情结被提升为神经症中的根本之物；弗洛伊德的著作通过把俄狄浦斯情结变成普遍的东西，鲜明显示出作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不仅存在于神经症患者，也存在于正常人。理由很充分：如果俄狄浦斯情结在神经症中出了岔子，正因为它对一项正常化功能至关重要；引发神经症的是俄狄浦斯中的一次事故。因此，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史上围绕俄狄浦斯情结的一极集中于第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没有俄狄浦斯的神经症？

有些观察似乎确实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俄狄浦斯冲突与戏剧没有发挥根本作用。例如，儿童同母亲的排他性关系在分析中表现为经验迫使人们接受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些主体可能呈现出一种根本找不到俄狄浦斯的神经症。“没有俄狄浦斯的神经症”[ ] [注2]，

> [注2] 夏尔·奥迪耶：《一种没有俄狄浦斯情结的神经症？》，《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6 卷第 3/4 期，1933 年，第 298—343 页。

就是夏尔·奥迪耶一篇文章的标题。

你们知道，在历史上，“没有俄狄浦斯的神经症”这个概念，主要同围绕所谓母性超我提出的问题相关：超我是否只有父性起源？弗洛伊德提出“没有俄狄浦斯的神经症”这个问题时，已经这样表达问题。人们问：在父性超我背后，是否还存在这个在神经症中比父性超我要求更多、更压迫、更具破坏性、更坚持不懈的母性超我？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展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此形成的另一个中心，是俄狄浦斯的中心；我的意思是，例外情形以及父性超我同母性超我的关系。当时有一个开放问题：我们病理学的一整个领域——

归我们管辖、交给我们治疗和照料的病理学——

是否可以不管一个主体那里存在还是缺少俄狄浦斯情结，而被归入我们所谓前俄狄浦斯领域。

如果存在俄狄浦斯，如果它被视为表现一个阶段，如果主体演进在某个根本时刻达到成熟，俄狄浦斯便始终在那里。弗洛伊德自己在著作的最初时期、《梦的解析》出版五年后，很快提出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从

《性学三论》中返回的一切[注3]——足以使我们听见，俄狄浦斯之前发生的事情同样重要。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理论三篇》（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1905 年。

当然，在弗洛伊德那里，它的重要性只在于通过俄狄浦斯取得重要性。不过，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始终没有突出事后作用、俄狄浦斯的 Nachträglichkeit［事后性］概念——你们知道，我在这里一直颇为坚持地吸引你们注意它。

某种东西似乎逃出了那种要求思想遵循时间先后的思维方式。既然有些事情存在于俄狄浦斯以前，而且我们的领域有些部分专门涉及主体发展领域中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前俄狄浦斯阶段本身及其关系便引出一个问题。它们同什么的关系？你们知道：

- 一方面是倒错。

可以说，这是关于倒错概念的一种原初状态，一块某些人任其荒芜的土地。谢天谢地，我们如今已经不完全停在那里；不过曾经有一段时期——起初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那只是对问题的近似，如今则不那么正当——人们主要把倒错看作这样一种东西：它的病因、原因被明确归入前俄狄浦斯领域。倒错正是从某种异常固着中取得条件与根源。

况且，正因如此，倒错只不过是“反转的神经症”；或者更准确地说——神经症本身没有反转，神经症仍然潜伏——神经症中已经反转的东西，会在倒错中见诸天日：无意识在那里公然敞开；倒错中的东西没有受到压抑，因为它没有经过俄狄浦斯。如今，已经没有人再停留

于这种构想。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更加进步；不过我要向你们标出：前俄狄浦斯领域的问题周围安置着：

- 一方面，倒错的问题；
- 另一方面，精神病的问题。

如今，所有这些事情都能从不同方面得到照亮。眼下，问题只是为你们定位：围绕俄狄浦斯的问题可以在怎样的区域、怎样的关注角度中得到提出。

无论在倒错还是在精神病中，所涉始终是想象性功能与想象性关系。即使没有专门接触我们在这里对它们的处理，任何人

都会看出所涉的是想象性关系，恰恰因为无论在倒错还是在精神病中——当然是从不同角度——所涉及的尤其都是意象：

- 一种更多或更少属于内部言语、由更多或更少听觉化的话语造成的侵入［精神病中］，是一回事；
- 某个意象在倒错中拥塞而寄生的特征，则是另一回事。

不过，在两种情形中，确实都是现实领域通过意象而受到深刻扰乱的病理显现。精神分析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因此，

它同俄狄浦斯本身存在某种关系，因为经验、对连贯性的关切，以及理论制造并站立起来的方式，都特别把它放在前俄狄浦斯领域。

正因如此，归根到底，现实领域在某些情形中因想象界的侵入而受到扰乱，甚至受到深刻扰乱……这里，“想象界”似乎比“幻想”一词更有用，因为后者不适合同时谈论精神病和倒错……你们看到，分析在探索前俄狄浦斯领域的方向上形成了一整条路线；甚至有人说，弗洛伊德以后全部根本进展都发生在这个方向。

我要向你们指出，这个悖论——也就是我们今天处理之物的根本悖论特征——由梅兰妮·克莱因女士的著作来作证。在一部作品中，如同在任何言语产物中，都有两个层面：

- 有她说出的东西，即她在自身话语中表达的东西；
- 还有她想说的东西，因为当我们把“想”与“说”从意义上分开，那里便有她的意向。

此外，按照我试图在这里让人听见事情的方式，如果我们不知道她有时在彼岸多说了那么一点，似乎就不成其为分析家。

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进路通常正在这里：看见她在自己想说的东西彼岸说出了什么。梅兰妮·克莱因的著作说出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有时，单看文本，它们也包含内在矛盾，并因此可能成为某些既有批评的对象。

此外，还有她无意说出却实际说出的东西。其中最醒目的事情之一是：这位女人为我们带来了如此深刻、如此富有启发的洞见，不只涉及前俄狄浦斯时期发生的事情，而且涉及她检查、分析的儿童——按照理论的初步近似，这些儿童处在被设定为前俄狄浦斯的阶段。就她在这些儿童那里处理的主题而言，俄狄浦斯当然已经在她接近他们的

时刻之后；因为她往往在他们生命史上刚刚“进入言语”或“言语以前”、几乎就在言说出现时——总之，刚出现不久——处理他们。然而，格外醒目的是：她越往所谓前俄狄浦斯历史深处回溯，就越总是、不断在那里看见俄狄浦斯式祈求的持续在场。

如果你们阅读她那篇恰好涉及俄狄浦斯的文章[注4]，就会惊讶地发现：她不仅承认，而且通过来自儿童绘画的明确经验证据向我们显示这一点；

> [注4] 梅兰妮·克莱因：《早期焦虑照亮下的俄狄浦斯情结》（1945），载《精神分析论文集》，Payot，1968 年；英文原文为 “The Œ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载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1921—1945。

这些证据极其宝贵。恰恰在所谓坏对象形成阶段，母亲身体的内部——据她所说，它似乎在儿童最初客体关系的演进中扮演主导角色——成为儿童全部关注的中心；甚至还处在所谓“偏执阶段”之前，也就是同母亲身体作为整体出现相联系的明确阶段之前。克莱因恰恰以绘画、言说以及对儿童该阶段心理的整个重构为依据，向我们证明：坏对象已经在这项更早阶段中存在于母亲体内。你们知道，其中有所有竞争者，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兄弟姐妹的身体；尤其还有父亲，以其阴茎的形式得到表现。

当我们讨论想象性功能同儿童最初阶段中可能与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功能、一般精神病功能以及俄狄浦斯相联系的关系时，这确实值得停留。奇怪的是，梅兰妮·克莱因女士最初探索前俄狄浦斯状态的意向，竟抵达如下矛盾：她回溯得越远，就越处在想象层面，也越确认父亲这个第三词项出现得很早——如果我们只保留俄狄浦斯的历史

性概念，这种早熟将极难解释——而且从儿童的最初想象阶段就已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她的作品说得比她想说的更多。

因此，围绕俄狄浦斯的关注演进，已经界定出两个词项、两极：

- 首先，如我们所说，是关于超我和没有俄狄浦斯的神经症的问题；
- 随后，是把俄狄浦斯问题集中于现实领域中发生的习得——更准确地说是各种扰乱。

第三个时刻同样值得评论，并将开启下一章：俄狄浦斯情结同某种并不相同的东西——人们所谓的生殖器化——之间的关系。在如此众多探索、问题和讨论之中，请不要忘记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点在历史中几乎退居次要位置，却始终隐含于一切临床中：

俄狄浦斯情结具有一项规范功能，不仅涉及主体的道德结构及其关系，也涉及主体对自身性别的承担。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在分析中——你们知道——始终保有某种歧义。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生殖器功能，而这项功能显然经历一种成熟，

一种成熟本身。

在分析的最初阶段，它被视作根本的东西，也就是第一次成熟上升；后者严格说来具有器质性，发生于童年。人们曾试图为第一次性冲动寻找器质——我是说解剖学——支撑，例如把它放在精子形成时睾丸层面发生的双重推动中。第一次性冲动同人类物种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怎样联系，始终是一项被大量晦暗笼罩的种系发生问题，以至于

如今已经没有人敢围绕它写文章。不过，它毕竟曾存在于精神分析史中。

因此，“生殖器化”的问题是双重的：

- 一方面，它包含演进与成熟；
- 另一方面，它包含某种在俄狄浦斯中实现的东西，也就是主体对自身性别的承担。把事情直呼其名：男人承担男性类型，女人承担某种女性类型，承认自己是女人，并认同于自己的女性功能。

  男性化与女性化就是主要构成俄狄浦斯功能的两个词项。我要说，我们在这里正处于俄狄浦斯直接同自我理想功能相联系的层面。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意义。

这就是你们可以用来归类围绕俄狄浦斯、同时也围绕父亲功能发生的全部讨论的三章；两者是同一件事。问题不容置疑：

- 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俄狄浦斯；
- 反过来说，谈论俄狄浦斯就是把父亲功能作为根本之物引入。

所以，给做笔记的人一句总结：从俄狄浦斯情结演进的历史问题看，一切都围绕三章展开：

- 同超我的关系；
- 同现实的关系；
- 同自我理想的关系。

自我理想在每种情况下都承载已经得到承担的生殖器化，因为它成为自我理想的一项要素。

以现实为标题的一章，包含俄狄浦斯同那些会使

现实关系发生剧变的病症之关系：倒错与精神病。

现在，让我们试着再往前走一点。第三章围绕俄狄浦斯功能怎样直接影响对性别的承担展开；很清楚，我们将从这里进入整个尚未得到充分阐明的阉割情结问题。

无论如何，精神分析史已经为所有人充分突出这些大体、整体关系。因此，人们会问：

- 那么，父亲呢？
-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做什么？
- 父亲究竟怎样牵涉其中？

这涉及对每个主体的实在观察。父亲缺席或在场、父亲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你们知道，绝不是受到遮蔽的问题。最近，我们甚至看到“父亲功能不足”一词出现；这并非处理一个微不足道的主题。

至于人们对此说过什么、是否站得住脚，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论是否使用“父亲功能不足”这个名称，它可以说都是一个当前议题，尤其发生在精神分析越来越“环境主义化”——人们很优雅地这样说——的演进中。

也就是说，所涉是什么？当然，谢天谢地，并非所有分析家都会落入这种偏差！如果你们向许多分析家提供这样一条有趣的传记资料：“可是，父母关系不好，婚姻不和，这就解释了一切！”他们会回答你们——甚至包括那些我们并不始终赞同的人——：“那又怎样！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我们不应预期任何特殊效应。”

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不过，围绕父亲进行研究时，人们究竟关心什么？当人们想谈父亲功能不足时，材料可以说会聚集在传记性语域：

- 父亲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
- 他是否远行、是否缺席？
- 他是否经常回来？

这些问题表现父亲的缺席：例如，没有父亲时，俄狄浦斯能否正常构成？这些问题本身当然十分有趣。不仅如此，最初的悖论恰恰由此引入，而正是它们使人们提出

后续问题。人们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即使父亲不在那里，俄狄浦斯也完全可能构成。

最初，在可怕父亲的意象被视作致病要素的年代，人们总以为，所有戏剧都是由父亲某种过度——可以说是父亲过度在场——产生。可是在神经症中，人们很快发现：当父亲太和善时，情况甚至更严重！

人们缓慢地经过这些学派。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我首先向你们大致说明问题如今走到哪里；也正是在其中，我将试着稍微整理秩序，看看悖论在哪里。

如今，我们走到了另一端，开始追问“父亲功能不足”：有所谓软弱的父亲、顺从的父亲、被压服的父亲、被妻子阉割的父亲，以及残疾、失明、瘸腿的父亲，随你们怎样列举。我们终究应当试着察觉这种处境显露出什么。我们试图找到一些使自己得以前进的最低限度公式。首先是父亲具体在场或缺席的问题。

如果我们恰好把自己放在这些研究所处的层面，也就是现实层面——

作为一种所谓环境要素，这被称作环境——我们可以说：

即使父亲不在那里，他也完全可能、可以构想、实际发生，并由经验触及地在那里。就父亲功能而言，这已经应当促使我们在处理纯粹而简单的环境主义观点时保持某种谨慎。

完全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在两个意义上正常：

- 一方面，作为起正常化作用者而正常；
- 另一方面，也作为使人偏离正常者而正常；我的意思是，例如凭其致神经症效应而正常——

  即使在父亲不在那里、也就是儿童独自被留给母亲的情形中，也能以同其他情形完全同质的方式建立。这是首先应当吸引我们注意的事情。

关于不足，我只想请你们注意：当父亲有所不足时，人们既然谈不足，就永远不知道他在哪方面不足。因为：

- 如果有人在某些情形中说父亲太和善，这似乎意味着他必须凶狠！
- 另一方面，父亲显然可能过于凶狠这个事实，又意味着他偶尔和善一些或许更好！

归根到底，人们早已绕完这个小圈。人们开始预见，父亲功能不足的问题不能直接处理为相关主体、儿童本人的问题；正如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只有把父亲看作家庭中根本的三元组成员，也就是看他怎样在家庭中占据自身位置，人们才能开始围绕这项不足说出稍微更有效的东西。不过，人们仍未能把它们表达得更好。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展开，不过我们去年已经围绕小汉斯谈过它：只从环境主义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确切说明一个远非有所不足的人物究竟在哪方面存在不足。

我们可以再往前走，因为这个人物在家庭中远非有所不足：

- 他在那里，待在妻子身边；
- 他扮演自己的角色，参与讨论；
- 妻子多少会把他噎回去，不过他毕竟非常照顾孩子；
- 他并不缺席，而且如此不缺席，以至于甚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分析。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人们能够期待一位父亲采取的最佳观点。

我想，我们即将抵达而且还会回到父亲功能不足的问题。不过，我们在这里进入一个如此流动的世界，必须试着作出区分，才能看见研究错在哪里。研究的错误不在于它找到的东西，而在于它寻找的东西。我认为，定向的错误就是混淆了两个彼此相关却不能混为一谈的东西：作为规范者的父亲，同作为正常者的父亲。

当然，当父亲自身不正常时，他可能起到使人偏离规范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把问题推回父亲的神经症或精神病结构层面。因此，正常父亲的问题是一回事，他在家庭中的正常位置则是另一回事；而后者还不能同其规范作用的精确定义混为一谈——这是我向你们提出的第三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谈论父亲在家庭中的不足，不等于谈论父亲在情结中的不足。为了谈论他在情结中的不足，必须引入一个不同于所谓现实主义维度的维度；后者由他在家庭中在场的性格学、传记或其他方式界定。我们下一步将朝这个方向走。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些观察与回顾；它们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引入父亲角色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在父亲于情结中的位置上找到前进方向、正确表达问题的方向，就让我们询问情结，

并从开头、从最基本的 b.a.-ba 开始回顾。

我在开始时向你们说过：可怕的父亲。然而，这幅意象仍概括了某种复杂得多的东西，正如其名字所指出的。父亲在多个层面介入。首先，他禁止母亲。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与原则；父亲在那里同原初法则——乱伦禁令——联系在一起。人们提醒我们，父亲负责表现这项禁令。如果儿童放任自己的扩张、表现与倾向，父亲有时必须

直接显示禁令。不过，他在远远越出这个层面的地方发挥作用：正是通过他的全部在场、通过他在无意识中的效应，父亲实施对母亲的这项禁止。

你们正等着我说“以阉割相威胁”。确实如此；必须这样说，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诚然，阉割明显进入一项作用，而且这项作用将越来越受到确认。阉割同法则的联系至关重要；不过，让我们看看它怎样在临床上向我们呈现，看看俄狄浦斯情结最初怎样呈现给我们。我必须提醒你们，因为这应当在你们那里唤起各种文本记忆。

让我们先看男孩：儿童同父亲的关系受到阉割恐惧支配，这一点已经确定。阉割恐惧是什么？我们怎样、从哪一端接近它？

首先，在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经验中，它以什么形式出现？以回击形式出现。

我的意思是，它处在攻击性关系内部。攻击从儿童、男孩出发，因为他的优先对象——母亲——受到禁止；攻击转向父亲。儿童因此处在想象层面、二元关系中，并想象性地向父亲投射

相当于甚至强化于自身的攻击意向；不过，这些意向仍从他自己的攻击倾向出发。简言之，面对父亲的恐惧显然是离心的；我的意思是，它的中心位于主体。这既符合经验，也符合精神分析史。

经验很快教给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衡量俄狄浦斯中面对父亲之恐惧的影响。因此，阉割：

- 一方面，同乱伦禁令的象征性分节形成深刻联系；
- 另一方面，它在我们的全部经验中处在前台；对其优先对象——也就是神经症患者——当然更是如此。它是在想象层面显现的东西，其出发点并非命令类型，不像《摩奴法典》所说：“同母亲同床的人，应当割下自己的生殖器，拿在——右手还是左手，我记不太清了——手里，径直向西走去，直到死亡降临。”

这才是法则。可是，我们的神经症患者并没有以这种方式特别听到这项法则；通常，它反而被留在阴影中。况且，还有其他办法从中走出来，不过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说明。因此，神经症的体现方式同主体的想象性攻击有关：这项阉割威胁就是回击。既然朱庇特完全能够阉割克洛诺斯，我们的小朱庇特们就害怕克洛诺斯亲自抢先动手。

此外，一开始考察俄狄浦斯情结——我是说它在经验、理论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表达、呈现的方式——还给我们带来另一件事：反向俄狄浦斯这个微妙问题。

我不知道这对你们而言是否不言自明；不过，阅读弗洛伊德或随便哪位作者的任何文章：每当涉及俄狄浦斯问题，人们总会惊讶于反向俄狄浦斯功能所发挥的极为流动、细腻而令人困惑的作用。反向俄狄浦斯从不缺席于俄狄浦斯功能；我的意思是，对父亲的爱这一成分无法删略。恰恰是它让俄狄浦斯情结结束，使其衰退。而这一切发生在爱与认同仍然高度歧义的辩证法中；也就是说，认同扎根于爱，同时又

并不是同一件事。两者并不相同，可是这两个词项彼此紧密联系，绝对无法分离。

请阅读弗洛伊德[注5]关于情结的衰退所写的文章，看看他对作为解决办法的最终认同作出的解释：正因为父亲受到爱，主体才认同于他，并找到俄狄浦斯的解决与终点：

> [注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Der Untergang des Ödipuskomplexes”），载《性生活》，1924 年，PUF，1968 年。

- 一方面，在遗忘性压抑的这项构成中；
- 另一方面，在主体内部取得这个理想词项，凭借它成为父亲。

> 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我并不是说从此立刻——成为一个小男性；可以说，他已经把证书装进口袋，把事情留作储备。时机到来时，如果事情顺利——如果小猪没有把他吃掉——到了青春期，他的阴茎已经准备好，连同证书一起：“爸爸在那里，是为了在正确日期把它授予我。”如果神经症爆发，事情就不会这样发生，因为那张证书上恰好有某种不合规定的东西。

不过，反向俄狄浦斯也没有那么简单：严格意义上的倒置位置可能通过这条道路、通过爱的道路产生。也就是说，同一条道路有时不把有益的认同给予主体，反而在无意识层面给予他一个扎实的被动位置。它同样会在正确日期重新出现，也就是把主体放进一种角平分线、夹逼恐慌［squeeze-panic］中；他发现自己被一个自行找到而且非常有利的位置捕获：

这个父亲令人畏惧，禁止了那么多东西，但在其他地方又很和善；要得到他的青睐，就应当把自己放在正确位置，也就是使父亲爱自己。不过，使父亲爱自己显然在于首先进入女人的行列；而主体仍保有一点男性自尊……这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解释的事情：使父亲爱自己包含阉割危险，

由此形成这项无意识同性恋；它把主体置于一个根本冲突的位置，

产生多重回响，也就是：

- 一方面，相对于父亲的同性恋位置始终返回；
- 另一方面，它又受到悬置，也就是由于其中包含阉割威胁而受到压抑。

这一切并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我们试图做的是接近某种使我们能够以更严密方式构想它的东西；这样，随后面对每一项观察和每个具体病例，我们就能更好、更严密地提出问题。

所以，总结一下。同刚才一样，总结将引入一些区分；我认为，它们是在尚未妥善定位之点上集中问题的前奏。刚才，我们已经接近这一点：问题没有围绕自我理想得到提出。这里，也让我们试着还原刚刚回顾并处理的内容。我向你们提出：从现在起，说父亲在这里毕竟处于妨碍者的位置，应该不算走得太远。他不只凭自身分量造成拥塞，而且因为实施禁止而成为妨碍者。

他禁止什么？让我们重新拾起并作出区分。首先，他禁止驱力的实在满足。如果必须让生殖器驱力的出现投入运作，就不要把它放在这

里，因为它显然更早介入。不过，围绕一项事实，某种东西也明显得到了分节：当小孩子的阴茎开始显示我们所谓的意向时，父亲禁止他使用阴茎。这就是父亲的禁止同实在驱力的关系。

我们立刻在这个层面作一项评论：为什么是父亲？经验表明，母亲同样会这样做。请记住小汉斯的观察。母亲对他说："把它收起来，不许这样。"而且，大多数时候正是母亲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我们就叫医生来把它割掉。"

所以，请清楚标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父亲在实在驱力层面实施禁止时，并没有那么根本。现在，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去年的表格——你们看，它最终总会派上用场——让我们重新拾起我带给你们的三层表格：阉割、挫折、剥夺。

| 施事者 | 欠缺 | 对象 |
| --- | --- | --- |
| 实在父亲 | 象征性阉割 | 想象阳具 |
| 象征母亲 | 想象性挫折 | 实在乳房 |
| 想象父亲 | 实在剥夺 | 象征阳具 |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所涉是什么？我要吸引你们注意：所涉的是父亲的实在介入。它关系到什么？一项想象威胁。因为人们真的把它割掉毕竟十分罕见。因此，我们确实找到了阉割威胁层面发生的事情。

我要请你们注意，阉割是一项象征行动；其施事者是某个实在人物，即对他说“我们会把它割掉”的父亲或母亲；而其对象则是想象对象。如果儿童感到自己被割了，那是因为他在想象。

现在，请你们注意，这是一项悖论。因为你们可以对我说：

“这才严格是阉割层面，而您却说父亲没有那么有用。”

这确实就是我要说的。没错！

另一方面，父亲禁止什么？正是我们的出发点：母亲作为对象属于他，不属于儿童。至少在一个阶段，男孩和女孩同父亲的竞争都在这个层面建立；单凭它就会产生攻击。

因为父亲确确实实使儿童在母亲那里遭受挫折。这是另一个阶段，或者说另一个层次：请注意，在这里，父亲是作为权利持有者而不是作为实在人物介入的。也就是说，即使他不在场，比如只是给母亲打来电话，结果也一样。此处介入挫折的是作为象征的父亲；挫折是一项想象行动，却涉及一个彻底实在的对象——儿童有所需要的母亲。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随后，还有第三个词项介入俄狄浦斯情结的这番分节：父亲使自己成为一个比母亲更受偏爱的对象。你们绝对不得不把这个维度引入终结功能，也就是最终形成自我理想的功能。正因为父亲——无论凭借力量还是凭借软弱——成为一个比母亲更值得偏爱的对象，终结性的认同才得以建立。

反向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功能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建立起来。我还要说得更进一步：情结对男孩和女孩产生不同效果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甚至正是以此为中心。很明显，在这个层面，对女孩而言事情顺理成章；所以人们才说，“阉割情结”的功能对于男孩和女孩并不对称：

- 对女孩而言，这个问题在进入情结时具有重要性，而在结束时则促成解决，因为父亲作为阳具的持有者，不难使自己比母亲更受偏爱。

- 对男孩而言则是另一回事。你们看到，裂口总是留在这里。

也就是说，为了使自己比母亲更受偏爱——俄狄浦斯情结正由此找到出口——我们又面对建立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同一困难。于是，在我们看来，对男孩而言，俄狄浦斯情结无论如何都必定是最缺乏规范化作用的东西；然而，它偏偏又被设定为最具规范化作用，因为据说男孩最终正是通过对父亲的这项认同来承担男性气质。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这个本质上实施禁止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在这里导向第三个层面的明确结论？也就是说，当理想认同产生、父亲成为自我理想时，某种东西便随之发生。

那是什么东西？无论如何，它对男孩和女孩都趋向同一结果……不过对女孩而言，承认自己没有阳具是件好事；对男孩而言，这却会是一个彻底灾难性的出口，而且有时确实如此。换言之，我们视为俄狄浦斯之规范化出口的那个时刻，是在这样一个点上、这样一种关系中产生的：I $\underset{\rightarrow}{\ }$ R $\underset{\rightarrow}{\ }$ S［施事者 I（想象界：父亲），欠缺 R（实在界：剥夺），对象 S（象征界：阳具）］。

| 施事者 | 欠缺 | 对象 |
| --- | --- | --- |
| 实在父亲 | 象征性阉割 | 想象阳具 |
| 象征父亲 | 想象性挫折 | 实在母亲 |
| 想象父亲 | 实在剥夺 | 象征阳具 |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也就是说，儿童承认自己没有选择；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他并没有真正选择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在理想认同的层面，也就是父亲使自己比母亲更受偏爱的层面——这是关键之点，

也是俄狄浦斯的出口——所发生的事情照字面说必定会导向剥夺，尽管这一切

对于女性而言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完全具有使其合乎规范的作用。

尽管作为俄狄浦斯的出口，这在女性那里从来没有彻底实现，因为她始终还留有一点余味——即所谓的阴茎嫉羡（Penisneid）——这恰恰证明它运转得并不真正严丝合缝。但是，如果依照这个图式，在它应当奏效的情形中，男孩反而应当总是遭到阉割。所以，我们的解释里有某种地方出了问题，缺少了某个环节。

现在让我们试着引入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如下：我不是说父亲在家庭中如何……在家庭里，他想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可以是一个影子，可以是一个银行家，可以是他应当成为的一切。他可能是，也可能不

是；这有时极为重要，却也完全可能无关紧要。整个问题在于：他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是什么。

那么，父亲不是一个实在对象。即使他必须作为实在对象介入，以便让阉割取得实体，他也不是一个实在对象。那么他是什么？他也不只是那个理想对象，因为从这个对象一侧只能发生意外。可是，俄狄浦斯情结毕竟不只是一场灾难，因为它是我们同所谓文化之关系的根基与基础。

你们自然会对我说："父亲就是象征之父，您已经说过了。"然而，如果我今天带来的只是这番重复……我已经说得够多，不至于今天还只把它再端给你们。今天我要带给你们的东西，也正是能让象征之父这个概念再精确一点的东西，就是：父亲是一个隐喻。

一个隐喻是什么？让我们立刻把它写到黑板上，这样便能纠正表格所带来的棘手后果。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一个隐喻就是一个能指来到另一个能指的位置上。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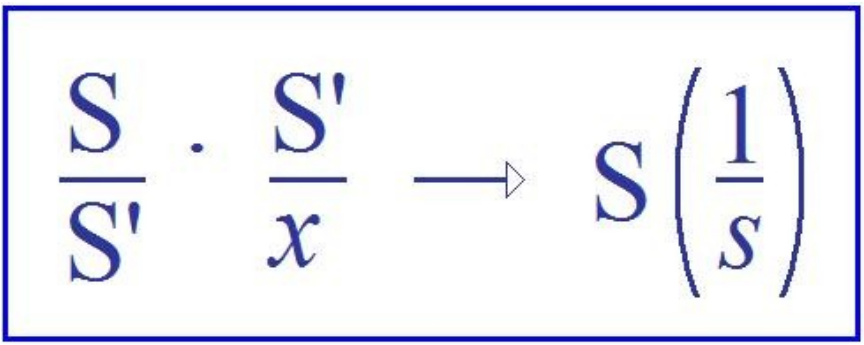
"父亲，在俄狄浦斯情结中……

即便这会让某些人听得目瞪口呆，我说得十分确切：

……父亲就是一个替代另一个能指的能指。"

这就是父亲介入俄狄浦斯情结时的动力所在，也是其唯一根本的动力。如果你们不在这个层面寻找父亲功能的缺失，就不可能在别处找到它。父亲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功能，就是成为一个替代某个能指的能指；也就是说，替代被引入象征化的第一个能指——母亲的能指。

父亲依照我曾向你们解释过的隐喻公式来到母亲的位置上：S 来到 S′ 的位置；S′ 是已经同某个 x 联系起来的母亲，而这个 x 就是儿童与母亲之关系中的某个所指：



正是这个母亲走了又来，因为我这个小小存在已经被卷入象征界。正因为我已经学会象征化，人们才可以说她走、她来。否则，我只是感觉到她或感觉不到她。总之，世界随着她的到来而变化，也可能随之消失。

问题是：所指在哪里？“她到底想要什么？我倒希望她想要的是我，但很明显，她想要的不只是我；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纠缠她。”纠缠她的东西就是这个 x，就是所指。总而言之，为了概括我去年的研讨班，问题不在对象关系中；把这件事放在对象关系的中心，纯属愚蠢。儿童自己才是部分对象。

正因为儿童首先是部分对象，他才会被引向这个问题：“她来来去去，到底是什么意思？”母亲这些来去的所指，就是阳具。儿童一旦明白这

一点，凭借或多或少的机敏与运气，可能很早便设法让自己成为阳具。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然而，想象道路不是正常道路；也正因如此，它会造成所谓固着。它之所以不正常，还因为——正如我将向你们说明的——它从来不是纯粹的，也从不完全可达；它始终留下一些近似而不可测、甚至具有二元关系性质的东西，而这造成了倒错的全部多形性。

但是，通过象征道路，也就是通过隐喻道路……我先把它提出，随后再向你们解释如何发生；因为我们无法走得更快。不过，既然今天的谈话大致到了结尾，我就立刻把将要为我们引路的图式摆出来：正因为父亲作为能指替代母亲，隐喻的通常结果才会产生，

也就是黑板公式中表达的结果。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已经以透明的形式向你们呈现了解答；

因为我呈现给你们的是它的最终项、它的结果，以便向你们指出我们要去哪里。

现在我们将看到如何抵达那里，以及抵达那里有什么用，也就是它能解决的一切。那么，我们有两种选择：

- 或者我就此把你们留下，让你们手里只拿着这个未经展开的断言：我把父亲的介入规定为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替代——并声称由

此一切都能得到解决；你们将会看到，俄狄浦斯种种僵局的整个问题都被照亮；

- 或者我先给你们作一点点解释。

我先把这件事引进来，向你们作一个评论；我希望它至少能给你们这周的梦留下一点材料。因为下次为了向你们讲隐喻及其效果，我必须告诉你们，或者提醒你们，它位于何处——也就是无意识之中。

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件确实非常惊人的事：无意识竟然没有更早被发现。当然，它自始至终都在那里，而且现在仍在那里。

人们必须先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才知道这个场所存在。

不过，我只想给你们一点示范：你们将以——我希望——我言说的使徒这种身份走向世界，可以怎样向那些从未听说过无意识的人引入无意识问题。你们可以对他们说：

“多么令人惊讶：自世界成为世界以来，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人竟然从未想到过——

至少在古典时期没有想到过；如今我们稍稍分散开来了，不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把这个根本维度提出来，也就是我曾以我们所谓‘别的东西’之名向你们谈过的维度！”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对别的东西的欲望——人们多少应当感觉到，它经常就在那里。它或许不是你们眼下感到的那种欲望，即宁可去吃根香肠也不愿听我讲话；但无论如何，不管所涉何事，所涉的都是对别

的东西的欲望本身。然而，这个维度并不只是简单地呈现在欲望中。我只想提醒你们，它也呈现在许多其他恒常、持久的状态中。

例如，守望。所谓守望（veille）。人们对它想得不够。守望，你们会问……

守望什么？你们知道，守望就是弗洛伊德在《施雷伯主席》[注6]中所做的事情。

> [注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一例自传所述偏执狂病例的精神分析评论——施雷伯主席》（“Psychoanalytische Bemerkungen zu einem autobiographisch beschriebenen Fall von Paranoia”），载《五个精神分析案例》，PUF，1970 年。

这种事情恰好向我们揭示，弗洛伊德在多大程度上生活于这个“别的东西”之中：如果你们回头查过原文，他在那里向我们谈到天亮以前。我曾向你们讲过白昼、傍晚的宁静，以及另外一些多少传到你们耳中的小东西；这一切完全围绕这个提示：天亮以前，严格说来，将要出现的真是太阳吗？

潜伏着的是别的东西：人们等待的是守望的时刻。然后还有禁闭。它同样是一个完全根本的维度：一个人一到某个地方——原始森林也好，沙漠也好——首先便会把自己关起来。必要时，正如人们所说，

哪怕他只有两扇窗，也会把它们随身带去，好在两扇窗之间制造穿堂风。

这种禁闭也是一个完全根本的维度：问题在于建立一个内部。而且它不只涉及内部与外部的概念，还涉及他者的概念——作为他者的东西，也就是那个不属于我们严密封闭、安稳栖身之处的东西。我还要

进一步说：如果你们把这种所谓禁闭现象学探索得更深一点，就会发现，把恐惧的功能局限于所谓同实在危险的关系有多么荒谬。恐惧与安全感的紧密联系，本应由恐惧症的现象学最清楚地显示给你们。

你们会发现，在恐惧症主体那里，焦虑出现的时刻恰恰是他察觉自己失去恐惧之时，也就是你们开始稍稍替他解除恐惧症的时候。就在这时，他会对自己说：

“哎呀！这下不对了，我再也不知道哪些地方必须停下。失去恐惧，我也就失去了安全。”

总之，就是我去年谈小汉斯时所说的一切。

有一个时刻，我确信你们想得不够；因为你们就像生活在故乡的空气里一样生活于其中。它叫作无聊。你们也许从未认真想过，无聊是多么典型的一种东西，甚至能够得到最清楚的表述：人们想要别的东西。

人倒也愿意吃屎（m……），但别总是同一种。这些都只是种种托词，是已经得到表述、

已经象征化的托词；它们指向同别的东西的这项根本关系。我想就此结束。

你们也许会以为，我突然落入浪漫主义与莫名惆怅之中了。你们看：欲望、禁闭、守望——说到这里，我差点还要加上祈祷！为什么不呢？无聊会走到哪里，又会滑向哪里？

并非如此。我要吸引你们注意的是“别的东西”在这些不同表现中的在场；因为——请仔细想想——这些表现都已被制度化。

你们可以给所有人类形成物作一番分类：无论人们走到哪里，这些形成物都把他们安置下来。人们所谓的集体形成物，可以按照它们为同别的东西之关系的这些不同样态提供何种满足来分类。

人一到某个地方，就会干蠢事——也就是说，让真正的欲望在那里出现。他一到某个地方，就会等待某种东西：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未来世界。

他待在那里，守望着，等待革命；但尤其是——尤其从他到达某处起——极为重要的是，他的一切活动都要渗出无聊。换言之，一项活动只有在构成它的东西——通常也就是规律性——变得彻底无聊时，才开始成为严肃的活动。

特别是，请想一想你们的分析实践里有多少东西，恰恰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其中感到无聊而安排的。一切都在这里。至少很大一部分规定——所谓“分析家应当遵守的技术规则”——归根结底无非是给这项活动提供一切保证，使它获得所谓职业标准。

如果你们深入察看，就会发现：这些规则正是通过在核心处创造、维持并保有无聊的功能来发挥作用。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引言，严格来说还没有把你们带进我下次要讲的内容。

下次我会重新拾起这些问题，恰恰向你们说明：正是在大他者本身的层面，能指的辩证法才得以定位；它又如何从那里触及父之名本身的功能、作用、确切压力与诱发效果。

# 第10课 · 1958年1月22日

我们将继续考察我们称为父亲隐喻的东西。

我们已经走到这样一点：我断言，只有在我们于此突显为隐喻结构的这个结构中，才存在清楚分节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动力——即阉割情结——的一切可能性。

有些人也许会惊讶，我们这么晚才来分节一个在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如此核心的问题。对此，我们要回答：如果没有先在种种领域——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领域——向你们证明分析中惯用的那些表述何其不足，尤其如果没有向你们说明如何能够给出更令人满意的表述，

以便开始分节这些问题——首先让你们习惯例如用主体这样的词项来思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什么是一个主体？当你们说“主体”时，它是否干脆就同你们面前的现实混为一体？还是说，从你们让他开口说话的那一刻起，这就必然牵涉别的东西？我的意思是：

- 言说是否只是像一种散发物一样漂浮在他上方的东西？
- 还是说，言说凭自身展开、凭自身强加了一个结构——我曾长篇评论并让你们逐渐熟悉的那个结构？它告诉我们：只要有言说的主体，就绝不可能把他作为言说者同一个他者的关系问题简单化为二元关系。

总有一个第三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大他者；它构成主体作为言说者的位置，也同样构成你们所分析的主体的位置。这不只是额外的理论需要；在理解你们所面对的效果位于何处时，它还能带来种种便利。我指的是：当你们在患者、在主体那里遇到要求、欲望、幻想——它们并非同一回事——以及某种归根结底看似最不确定、最难把握和界定的东西，即一项现实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随着我们现在继续向前，为了解释如下问题，我们将有机会看到这一点：

所谓父亲隐喻，就是在儿童与母亲之间已由一种原初象征化所构成的东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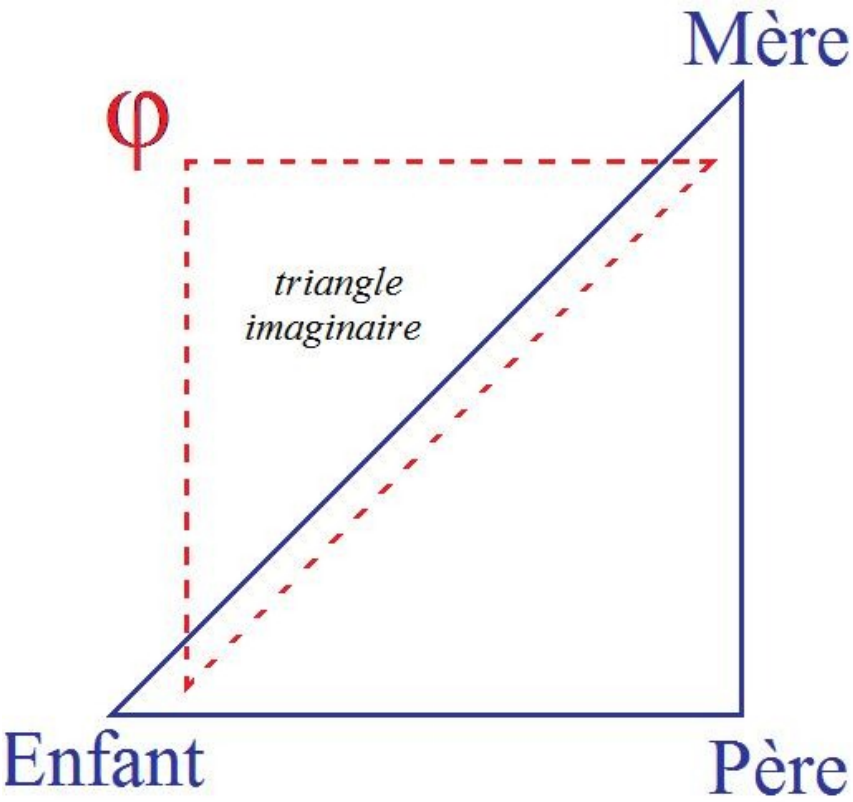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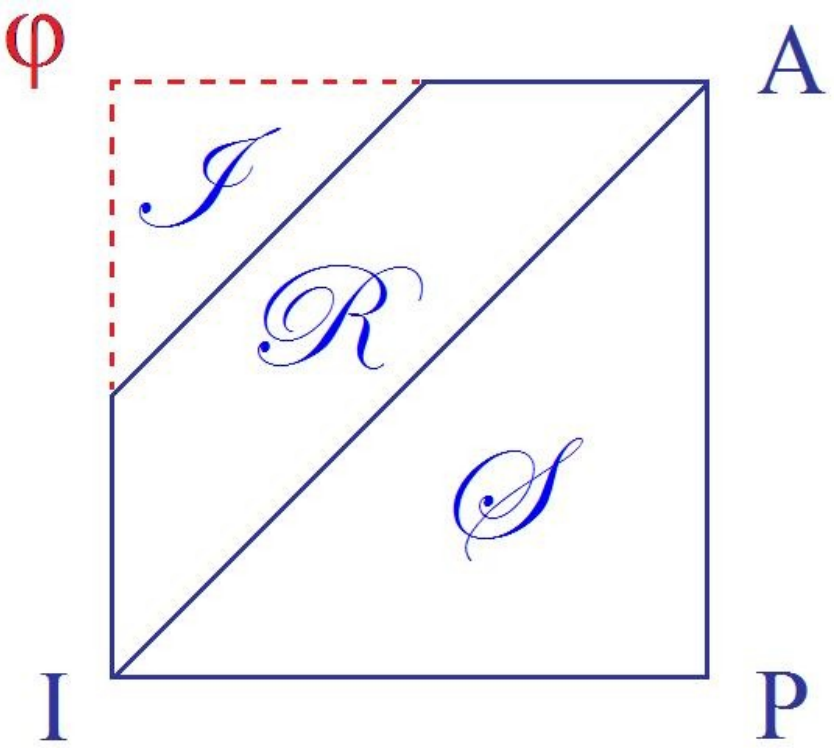
严格说来，父亲作为象征、作为能指，替代了母亲的位置。我们将看到这个“替代位置”是什么意思；它构成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进展的枢轴点、动力神经，或者说其要害。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请记住，所涉正是这件事。

让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我在你们面前提出的关于儿童与母亲之关系的那些词项。


Mère
φ
triangle
imaginaire
Enfant
Père




不过，首先也让我们回想：面对这个想象三角——去年我曾教你们如何在

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中运用它——承认“儿童、父亲、母亲”这个三角为根本性的，无疑带进了某种实在的东西；但它已经在实在界中——我是说，作为已设立的东西——放置了一项象征关系，即“儿童、父亲、母亲”的关系。若可以这样说，这是客观地放置的——为了让你们明白：因为我们能够把它当作对象来观看。

最初的现实关系在母亲与儿童之间勾勒出来。儿童正是在那里经验到自己同活生生环境接触的最初现实。这个三角之所以具有现实，只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客观地勾勒情境时，把父亲纳入其中。对儿童而言，父亲尚未进入其中；但对我们而言，父亲却在，他是实在的。

不过不要忘记：对我们而言，他之所以是实在的，只因为制度赋予他——我甚至不说父亲的角色和功能，这并非社会学问题——他的父之名。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承认例如这一点：父亲是生育的真正施事者；

这绝不是一项经验真理。因为在分析家们还讨论严肃事情的年代，有人曾指出：在某些原始部落里，人们把生育归因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眼泉水、一块石头，或是在僻静处遇见一个精灵。

对此，琼斯先生作出过一个其实十分切中肯綮的评论：任何有智力的存在——而我们假定每个人至少拥有这种智力的最低限度——都不可能不知道这项经验真理。很明显，除去例外——而且是极其例外的例外——女人若未发生性交，就不会生育，并且还必须在一个十分精确的期限内。然而，琼斯先生作出这个——我再说一遍，格外切中肯綮的——评论时，恰恰漏掉了问题中一切重要的东西。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完全清楚女人只有发生性交才能生育，而是他们以一个能指确认：同她发生性交的那个人就是“父亲”。

否则，按照象征秩序、能指的本性所构成的方式，完全没有什么能阻止如下情况：在象征系统中，负责生育的东西依旧被维持为同随便什么东西相等——正如我们刚才说的，一块石头、一眼泉水，或是在僻静处遇见一个精灵。

父亲作为象征的位置，并不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性交”与“分娩”这些不同事件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先后衔接。父之名本身的位置——即把父亲限定为生育者——是一件位于

象征层面的事情。它可以依照文化形式而获得不同联系；因为这里所涉并不依赖文化形式，而是能指链本身的一项必然性。

一旦你们设立一个象征秩序，就会有某种东西回应或不回应由父之名界定的这项功能；而在这项功能内部，你们会填入依情形而不同的意指。不过，它们绝不依赖任何其他必然性，只依赖父之名在能指链中占据的父亲功能之必然性。我想，我已经在这一点上强调得够多了。

因此，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为象征三角的东西：一旦有一条能指链，一旦有一项言说的分节，它便被设立在实在界中。我说，这个象征三元组同我们去年在这里以想象三元组形式引入的三元组之间存在关系。后者关乎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儿童依赖母亲的欲望，依赖把母亲本身作出的最初象征化，而不依赖别的东西：

- 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在欲望上的实际依赖，同这项依赖的纯粹生活体验分离开来；

- 也就是说，通过这项象征化，某种东西被设立起来，并在最初、原始的层面得到主体化。

这项主体化只在于把母亲设定为这个原初存在：她可以在那里，也可以不在那里。

因此，对这个存在的欲望——她的欲望——至关重要。这使得主体所欲望的不只是对她的照料、接触乃至在场的追求，而是对她的欲望的追求。

在这项最初的象征化中，儿童的欲望得到确认，并由此启动后来象征化的一切复杂情形：它是对母亲欲望的欲望。因此，一个维度随之开启：母亲本身作为生活于象征世界、生活于一个象征在场的世界、一个言说的世界中的存在，客观上还欲望什么别的东西。哪怕她只十分局部地生活于其中；哪怕像有时那样，她自己是一个无法适应象征世界，或拒绝了其中某些成分的存在，她仍然从这项原初象征化出发，向儿童开启这个维度：即使在想象层面，母亲还可能欲望其他什么。

我上次谈到的那种对别的东西的欲望，由此以仍然混沌而完全潜在的方式进入。不过，它并不是一种实体化的形式，不像我们在上次研讨班中那样能够在其全部普遍性中认出它；相反，它以具体形式出现：在她那里存在对别的东西的欲望，不只是去满足我这个刚开始因生命而搏动的存在之欲望。沿着这条道路，既有通达，也有无法通达。

如何设想：在这种镜映关系中，最初的存在从他者初露的动作中读出或预先捕捉自身欲望的满足；在这种意象

对意象的二元适应——一切动物间关系都会如此——之中，主体欲望的别的东西又如何能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如在镜中被读出？

当然，这既难以设想，也极难实现；因为在被称为倒错的那个原始层面发生某种分流时，全部戏剧恰恰就在这里。它很难实现，是说它以有缺陷的方式实现，但它毕竟还是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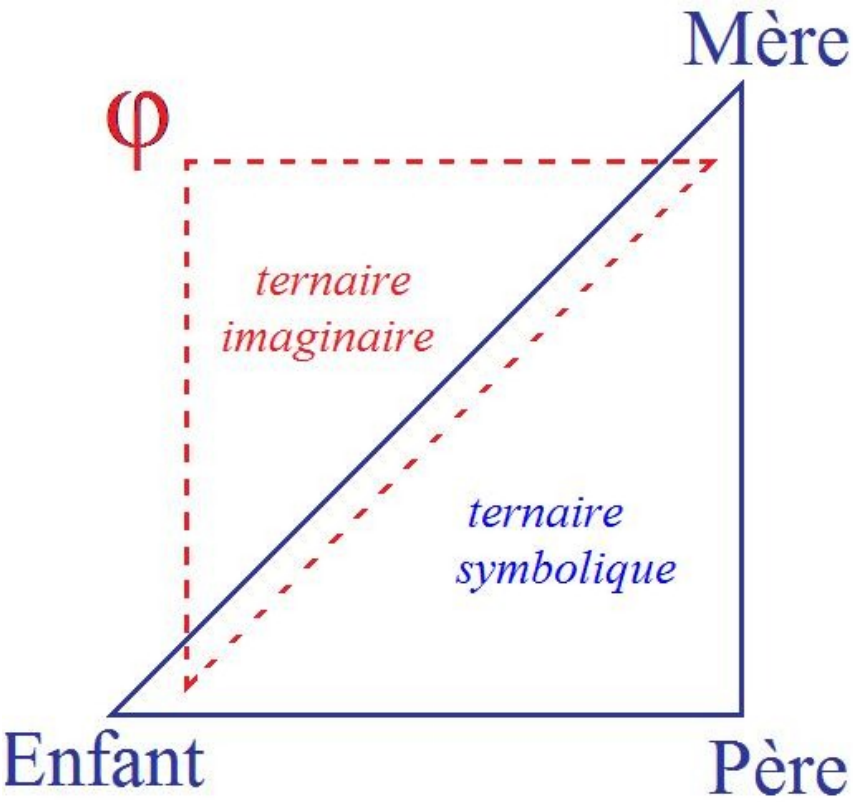
它当然不能没有某种超出象征化本身所能构成之物的东西介入……单凭这个“走了又来”的母亲之原初象征化还不够——她不在时，人们呼唤她；她在场时，人们又把她推开，以便能够再次呼唤她。还必须有某种更多的东西。

这个更多的东西，恰恰是她背后存在的整个象征秩序；她依赖于它，而它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达作为她欲望之对象的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已经被象征系统所设立的必然性如此专门化、如此标记，以至于若不考虑它的优先地位，便完全无法设想。它叫作阳具；去年，我让我们关于对象关系的全部辩证法都围绕这个阳具旋转。

为什么？如果不是某种东西使这个受优待的对象必然在那里、处于那个位置，并使它在象征秩序中获得特权，那又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想更详细地进入这一点，并将看到事情如何发生。它并不只依靠一种简单的对称关系，即这幅图中说明的关系：

这幅图显示：

- 这里，［φ］阳具处在想象三元组的顶点；
- 同样，这里“父亲”处在象征三元组的顶点。




……我们要看，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项联系，以及为什么我已经能够向你们提出：这项联系属于隐喻秩序。这恰恰把我们带进俄狄浦斯情结的辩证法。我们能够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把握它；我是说，尝试逐步将它分节出来。弗洛伊德这样做了，后来其他人也这样做了；其中并不总是完全清楚，也不总是得到清楚的象征化。我要努力为你们把它推进得更远，

这不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智，而是因为：

- 如果我们逐步分节这项发生过程，说明父亲能指在象征界中的位置奠定了阳具在想象层面的位置；
- 如果阳具作为占优的特权对象在想象层面得到构成，需要一、二、三个阶段，或者说几个逻辑时刻；
- 如果这些时刻得到清楚区分，而这种区分又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定位、更好地询问患者、更好地考察临床意义并掌握治疗的进行；

……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有了正当理由。

而且，考虑到我们恰恰在临床、问诊、检查与治疗操作中遭遇的困难，这些努力在当下、甚至预先便已得到正当化。请观察作为母亲欲望的这个大他者欲望，它包含一个彼岸。我们说，为了抵达这个彼岸——哪怕只是抵达母亲的这个彼岸，即母亲欲望本身——一项中介也是必需的；这项中介恰恰由父亲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提供。

与其自己武断地推进，不如问问这个问题在具体情形中如何向我们提出。我们看到，在非常不同的状态中，存在一些情形、案例，也存在一些阶段，在其中儿童认同于阳具。

这就是我们去年走过的整条道路所考察的对象。我们把恋物癖展示为一种典范性倒错：儿童注意到母亲欲望彼岸的这个对象所具有的优先地位与卓越价值，并通过对母亲的想象性认同，同它建立了某种关系。

我们也看到并指出，在其他倒错形式中，尤其在异装症中，儿童会从相反的位置承担同母亲之想象关系的困难；

也就是说，据说他把自己认同于有阳具的母亲。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严格说来，他认同于阳具，因为这个阳具藏在母亲的衣服下面。我提醒你们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只要阳具还是母亲欲望的对象，儿童同阳具的这项关系就至关重要。经验同样向我们证明，这个成分在儿童同父母这对伴侣的关系中发挥着根本而主动的作用。

上次，我们已在理论层面回顾过这一点：谈到同所谓反向俄狄浦斯相对的俄狄浦斯情结之衰退时，弗洛伊德向我们强调了这样的情形：儿童为了认同于母亲——我是说，在他认同于母亲的限度内——采取了这个既意指深长又仿佛前景可期的位置，却害怕其后果；如果他是男孩，就害怕由此造成对其男性器官的剥夺。这条提示的道路还能走得更远。经验向我们证明：父亲被视为使母亲失去这个对象——确切地说，使她失去其欲望的阳具对象——时，不只在倒错中，而是在一切神经症中，乃至在俄狄浦斯情结最顺畅、最正常的全部进程中，都发挥着完全根本的作用。

你们会在分析经验中发现：主体在童年某一时刻曾就这一点采取某种立场，即就父亲在“母亲没有阳具”这件事中的作用采取立场。这个时刻从不会被略去。上次的回顾把俄狄浦斯结局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留在这个时刻，

使它悬置在父亲所施加的阉割、挫折与剥夺三个层面周围。

那是第三个层面。它一方面向我们提出问题，因为我们最难在那里理解任何东西；但另一方面，据说俄狄浦斯的全部关键都在那里，即它的出口，也就是儿童最终对父亲的认同。

在这个层面，父亲最终使某个人失去她并不拥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使她失去某种只有在你们令它作为象征进入存在之后才存在的东西。很明显，父亲并不是以某种母亲没有的东西来阉割母亲。要设定她没有它，所涉之物就必须已经作为象征被投射到象征层面。

不过，这确实是一项剥夺；而一切实在剥夺都要求把那个显明地遭到剥夺的东西加以象征化。因此，在俄狄浦斯演变的某一时刻，正是在母亲所遭受的剥夺层面，一个问题向主体提出：他是否接受、记录并亲自象征化母亲被证明是其对象的这项实在剥夺，是否使它成为能指性的。儿童主体会或不会承担这项剥夺，会接受或拒绝它。

这一点至关重要。每当你们的经验把你们带到我们正在尝试界定为俄狄浦斯中枢纽的某一点时，你们都会在各个岔路口重新遇见它。既然这个词刚刚来到我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枢纽点。我并不执着于这个名称；我的意思是，它远不等同于我们正在寻找其关键的那个时刻——俄狄浦斯的衰退、它在主体那里产生的结果与果实。

然而，有一个时刻，父亲开始发挥剥夺母亲的功能；也就是说，在母亲同她欲望对象的这项关系背后，他作为某种可以说实施“阉割”的东西显出轮廓。不过我只给这个词加上引号，因为在这里遭到阉割的不是主体，而是母亲。这一点并不十分新颖；新颖之处在于把它精确标出，把你们的目光引向它，因为我们可以从这里理解此前发生之事——对此我们已经稍有认识——以及随后将发生之事。

经验——无论如何，请不要怀疑；每当你们有机会看到它时，都可以核查并证实——证明：如果主体没有跨过这个枢纽点，也就是说，没有接受父亲在母亲那里实施的这项阳具剥夺，那么通常就会观察到……我强调“通常”二字，因为这里所涉不只是一般的相关性，而是奠基于结构的相关性。

……儿童会在同等程度上为自己维持某种形式的认同：

- 认同于母亲的这个对象；
- 认同于从一开始我就向你们呈现的这个对象——借用刚刚浮现的词，可以说是一个竞争对象。无论如何，不论所涉是恐惧症、神经症还是倒错，你们总会触及这里的一项联系。

这是一个参照点。也许没有比它更好的词，能让你们围绕下面这个要在具体案例中提出的问题，把观察材料组织起来：

- 同母亲、父亲和阳具之关系的何种特殊构型，使儿童不接受母亲被父亲剥夺某个作为她欲望对象的东西？
- 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情形中，必须指出：同这项关系相关，儿童自己维持着对阳具的认同？

当然，这里存在不同程度。这项关系在神经症或精神病中，同在倒错中并不相同。不过你们看到，这个构型是枢纽性的。在这个层面，问题是：

“成为还是不成为——‘To be or not to be’——阳具？”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在想象层面，对主体而言，所涉是成为或不成为阳具；而必须跨过的阶段如下：主体会在某一时刻作出“选择”。当我说“选择”时，也请把这个词放进引号；因为主体在这里既主动也被动，理由很简单：拉动象征界线索的人不是他；这个句子在他之前已经开始了，确切地说，是由他的父母开始的。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我将引导你们考察他的父母各自同这个已经开始的句子之关系，以及父母彼此相对的某种位置应当如何支撑这个句子。不过，既然总得有一种表达，就让我们说：这里以某种中性形式存在一个二择一：“成为或不成为这个阳具”。

你们很容易感觉到，要仅仅理解“成为或不成为这个阳具”同另一个在某一时刻必然要被等候并被找到、但完全不同的问题——像人们借用另一句文学引文所说的，“拥有还是没有”，换言之，拥有还是没有阴茎——之间所涉的关系，就必须跨出巨大一步。两者不是一回事；从一个到另一个，必定有某种东西已经被跨过。不要忘记：阉割情结所涉及的，正是这件从未得到分节、几乎完全神秘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因为我们知道，下面两项事实取决于阉割情结：

- 一方面，男孩成为男人；
- 另一方面，女孩成为女人。

然而，“拥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哪怕对于最终有权拥有它的人，即男人——也是通过所谓阉割情结来解决的。因此，

这假定：为了拥有它，必定有一个时刻，他没有拥有过它。也就是说，如果“为了拥有它，首先必须先设定可能没有它”这件事没有被推到前台；如果遭到阉割的可能性对于承担拥有阳具这一事实并非根本性的，人们就不会称它为“阉割情结”。这就是必须跨出的一步。正是在这里，父亲必须于某一时刻有效、实在、实际地介入。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因为你们看到，直到现在——我的话语线索本身也显示了这一点——我始终可以只从主体出发来谈这些事情：他接受或不接受。只要他不接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这都会把他带向成为［母亲的］阳具。可是现在，为了迈出下一步，让父亲实际介入至关重要。

我不是说他此前没有实际介入，而是说直到现在，我的话语还可以把他留在次要位置，甚至可以不考虑他。然而，从现在开始，既然所涉是拥有还是没有，

我们就不得不把“他”算进来。首先，我向你们强调，这个“他”必须

在主体之外被构成为象征。因为，如果他没有在主体之外被构成为象征，任何人都无法作为披戴这个象征的人物实际介入。

不过，在下一阶段，他将作为披戴这个象征的实在人物实际介入。我们上次曾以不同阶段谈到实在父亲，后者能够承载一项禁止；这些阶段正是位于实在父亲的这个动因之中。我们已经指出：例如要禁止性本能的最初表现——当它在主体那里开始初次成熟，主体初次动用自己的工具，甚至把它展示给母亲、向她提议

让这工具为她效劳时——我们完全不需要父亲。

我甚至还要就此多说一点：通常发生的事情……它仍然十分接近想象性认同，也就是说，主体向母亲展示自己，向她献上提议……大多数时候，正如我们去年谈小汉斯时看到的，事情发生在比较与想象性贬低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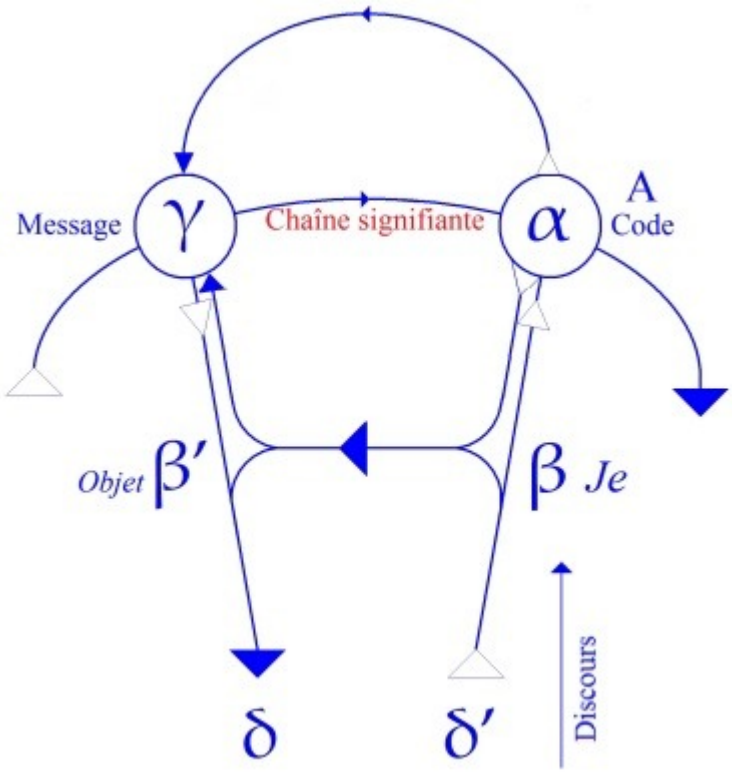
母亲已经足以向儿童表明，他献给她的东西多么不够；她也足以禁止他使用这件新工具。父亲确实会作为法则的承载者、作为禁止母亲这个对象的人介入。

我们知道，这一点十分根本，但它完全处在问题同儿童实际发生作用的方式之外。我们知道，父亲功能——父之名——同乱伦禁令相联系；然而，从没有人想到把“父亲实际颁布乱伦禁令”这件事放在阉割情结的前台。有时人们会这么说，但可以说，这项法则从不由父亲作为‘教座之上’的立法者来分节。父亲阻挡在儿童与母亲之间，是法则的承载者；可以说，他在

法理上如此，但在事实上却以另一种方式介入。我要说，他介入功能的欠缺也以另一种方式显现。

这正是我们要紧紧把握的东西。换言之，父亲在文化上作为法则承载者、作为被父亲能指所投注的人，以一种更具体、可以说更分阶段的方式介入俄狄浦斯情结；现在要加以分节、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节的，正是这种方式。第一学期我向你们评论过的那个小图式，曾让某些人显得极度厌倦；可是到这里，它似乎并没有完全无用。

看来，它毕竟还能派上用场。




我要提醒你们始终必须返回的一点：正因为意向——我是指在主体那里转变为要求的欲望——穿过某种早已构成的东西，所以事情才会发生。这个意向所指向的，确切地说，就是它的对象、它的原初对象：母亲；而欲望在那里是某种得到分节的东西。可以说，主体的全部进展、他进入这个世界的全部过程——这个尘世并不只是一个能够满足需要的世界，而是一个言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就在于：他把每

个人的欲望都置于大他者欲望的法则之下；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并且只在如下限度内：

- 他或顺利或不顺利地跨过能指链的这条线；它潜伏在那里，却已经发挥构造作用；

- 年幼主体的要求，来自他对最初大他者之关系的第一次检验；这个最初大他者就是已经被他象征化的母亲。

正因为他已经把她象征化，所以他才以一种或许仍然或多或少带着啼哭、却已经得到分节的方式向她发出要求；因为这项最初的象征化同最初的分节相联系。因此，正因为这个意向、这个要求穿过了能指链，它才能在母亲对象那里申明自己。在这一限度内，儿童凭借最初的象征化本身把母亲构成为主体，于是完全服从我们只能预先称作法则的东西。不过这只是一个隐喻；我的意思是，要让“法则”一词在我使用它的时刻取得真实位置，就必须展开这个词中包含的隐喻。母亲的法则，当然就是母亲是一个言说存在这个事实；这一点足以使我有理由说“母亲的法则”。

然而，这项法则可以说是一项不受控制的法则。至少对主体而言，它也只是“存在法则”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欲望中的某种东西完全依赖某种无疑已经得到分节的东西，而后者本身就属于法则的秩序。

不过，这项法则整个地存在于承载它的主体那里，即存在于母亲的善意或恶意、好母亲或坏母亲那里。这使我向你们提出一个新词项；你们会看到，它并没有那么新，只需稍稍推进，就会让它重新找到某种并非偶然由语言发现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原则是：如果没有一个奠定主体的能指，就没有主体。既然由能指对子——最初的主体与母亲——所构成的这些最初象征化已经发生，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相对于儿童生命之初的“现实还是非现实”“自体性欲还是非自体性欲”等词项，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旦你们相对于这个主体——儿童，要求从他那里发出，欲望在他那里形成——来提出问题，事情就会得到非同寻常的澄清。整个分析就是欲望的辩证法。儿童开始勾勒自己，把自己勾勒为一个“受制主体”（assujet）。他是“受制主体”，因为他最初经验并感到自己深深服从于他所依赖者的任性，即使这种任性已经得到分节。

我向你们提出的东西，是我们的全部经验所要求的。例如，举我脑中最先浮现的例子：去年你们看到，小汉斯为自己的俄狄浦斯找到一个如此非典型的出口……也就是说，他恰恰没有找到我们现在试图标出的出口，只找到一个替补。他需要这匹无所不能的马，来担当他在跨越时刻所欠缺的一切；这个跨越时刻，严格说来就是把象征界作为俄狄浦斯情结来承担的阶段，而今天我正要把你们引向那里。

……因此，他用这匹马作替补。马既是父亲、阳具、小妹妹，也可以是随便什么；不过它本质上恰恰对应于我现在将向你们展示的东西。

请记住他如何从中走出来，以及最后那个梦如何把它象征化。他在父亲的位置上呼唤的，是一个名叫水管工的想象而全能的存在。这名水管工在那里，恰恰是为了使某种东西摆脱受制。因为小汉斯的焦虑本质上——我曾对你们说过——正是这种受制的焦虑：从某一时刻起，他照字面意识到，如果这样受制，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会把自己带到哪里。

你们还记得那个图式，那辆驶离的马车所构成的图式；它体现了他恐惧的中心。恰恰从这一时刻起，小汉斯在生活中建立起若干恐惧中心；而恢复他的安全感，正是围绕这些恐惧中心发生的。

恐惧——即某种源于实在界的东西——是确保儿童安全的一项成分。正是凭借这些恐惧，他才给大他者、给这项令人焦虑的受制划定界限。他意识到，外部领域、另一个层面有所欠缺，而为了不让他只是一个受制主体，某种东西必须在那里出现。我们正走到这里。

因此，这里需要指出：他向之发出要求的大他者——确切地说就是母亲——同父亲具有某种关系。这一点人人都说，人人都曾说过。每个人都注意到，许多事情取决于母亲同父亲的这些关系；经验向我们证明，父亲有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无须提醒你们，上次我曾谈过用人际关系词汇具体标出的父亲功能欠缺的所有形式。

经验确实强迫我们承认这一点。然而，没有任何表述充分分节出：所涉并不主要是母亲同父亲的关系——至少不是那种含混意义上的关系，仿佛两人之间发生某种声望竞争，再共同汇聚到儿童主体身上。这个汇聚图式无疑并非错误；两个动因的双重性远不只是可以有，而是必不可少，

否则就不可能恰好形成这个三元组。不过，这还不够。

所有人都承认，两者之间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我们由此来到所谓爱与尊重的纽带，来到母亲的位置。

然后我们又落回环境社会学分析的窠臼；有些人会围绕它来运转对小汉斯案例的全部分析，例如母亲对父亲是否足够友善、足够有感情等等，却没有分节根本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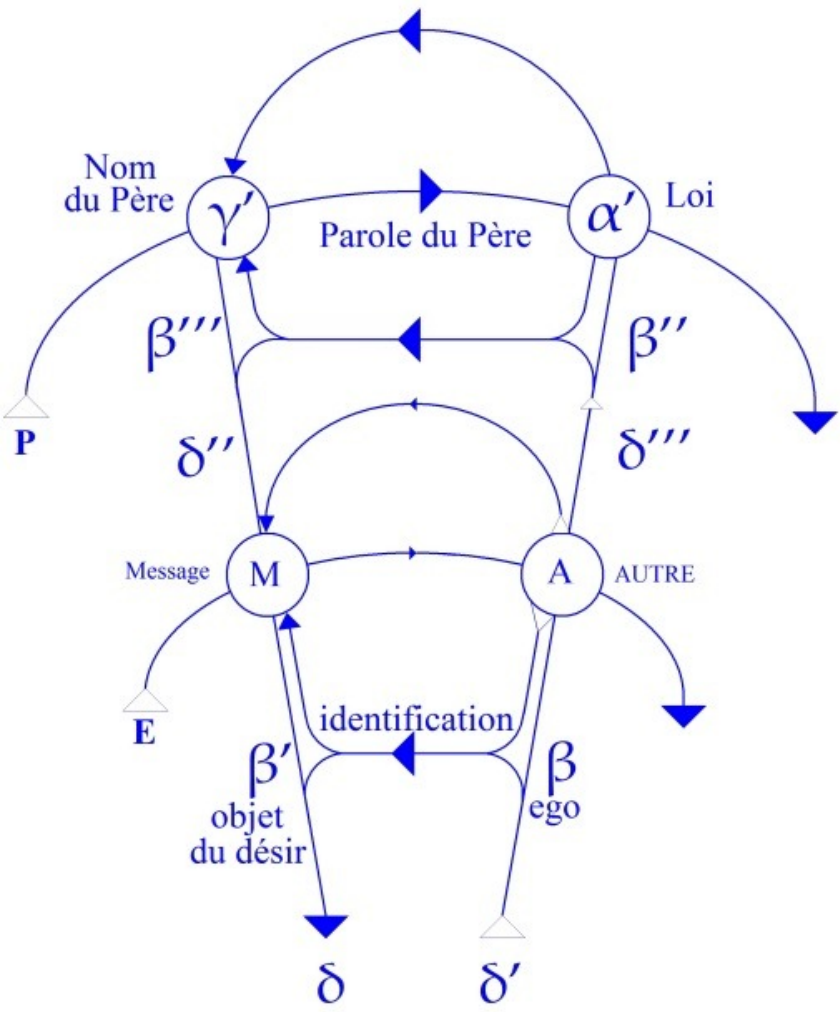
所涉并不主要是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私人关系，也不是两人是否各自具有足够分量。

严格说来，所涉是一个必须作为如此得到经历的时刻；它不只关系到母亲这个人同父亲这个人的关系，而是关系到母亲同父亲言说的关系，关系到父亲所说的东西并非完全等于什么也没有的限度。这里涉及如下功能：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1. 父之名作为父亲的唯一能指介入；
2. 父亲得到分节的言说介入；
3. 法则介入，而父亲同它存在或亲或疏的关系。

……这一点也极为重要。




换言之，母亲在一种关系中把父亲奠定为某种东西的中介；这个东西超出她自己的法则与任性，干脆就是法则本身。因此，父亲作为父之

名，正如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发展向我们宣告并突显的那样，同法则的这项言说行为紧密相连。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这才是根本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被儿童接受或不被接受为那个剥夺者——

即剥夺或不剥夺母亲的欲望对象的人。换言之，为了理解俄狄浦斯情结，我们必须考察三个时刻；我将试着借助第一学期的小图表，为你们把它们图式化。

第一个时刻。

儿童所寻求的是——作为对欲望的欲望——能够满足母亲的欲望；也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母亲欲望的对象”。只要他引入自己的要求，这里就会产生某种果实、某种结果；在通往它的道路上，出现一个对应于 ego、即自我的点。这个自我在这里是他的另一个 ego、他的另一个自我，是他认同的东西；他会试图成为这个别的东西，也就是能够满足母亲的对象。

只要他的小腹下面开始有什么动静，他就会开始把它展示给母亲，

以便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能力做点什么”；随之当然会有种种失望。他寻找它，也找到了它。

当母亲受到儿童要求的询问时，她自己同样也是某种追寻自身欲望的东西；这个欲望的构成成分就位于这条道路的某处。在第一个时刻、

第一个阶段，所涉如下：主体像在镜中一样，认同于母亲欲望的对象。

可以说，这是原始阳具阶段。在那里，父亲隐喻自在地发挥作用，因为象征、话语与法则的存在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阳具的优先地位；但儿童只抓住其结果。请允许我说得快一点并使用形象的措辞：为了取悦母亲，成为阳具既必要也充分；许多事情从某种意义上停在这个阶段。只要讯息在这里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一定数量的障碍与扰乱便可能以此为基础，其中包括我们限定为倒错性的那些认同。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第二个时刻。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在想象层面，父亲确实作为母亲的剥夺者介入。也就是说，这里作为要求向小他者发出的东西，被移送到一个更高的法庭——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并按其应有的方式得到转递。因为我们向小他者询问的东西，只要贯穿了他，总会在他那里遇见这个小他者的大他者，即他自己的法则。

正是在这个层面，某件事发生了：返回儿童的东西，干脆就是父亲的法则；主体在想象上把它设想为剥夺母亲。可以说，这是一个枢纽性的否定阶段：某种东西借此使主体脱离自己的认同，同时又把他系于法则的首次显现——母亲在这件事情上是依赖的。她依赖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再只是她欲望的对象，而是另一个人拥有或没有的对象。

母亲被移送到一项不属于她的法则那里；与此同时，在现实中，她的欲望对象由她所移送到其法则之下的同一个大他者全权拥有。这两件事之间的紧密联系，就是俄狄浦斯关系的关键；它也使母亲的这项关

系如此根本、如此具有决定性。我要请你们把它单独分离出来：这不是她同父亲的关系，而是她同父亲言说的关系。请回想去年的小汉斯：

- 父亲再和善不过；
- 他再在场不过；
- 他再聪明不过；
- 他对汉斯再友好不过。

他看来一点也不蠢。他把小汉斯带到弗洛伊德那里；在当时，这毕竟表明他很有开明精神。可是父亲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有一件事再清楚不过：无论父母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父亲所说的话在母亲那里就像吹了一声口哨，什么也没有留下。

请注意，相对于小汉斯，母亲一方面实施禁止；也就是说，她发挥本可归于父亲的阉割作用——不过是在实在层面。她对他说："别用这个，真恶心！"但这丝毫不妨碍她在实际层面完全允许小汉斯进入自己的亲密空间；也就是说，她准许并鼓励他维持想象对象的这个功能，而小汉斯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为她提供了最大的服务。他确确实实为她体现了她的阳具，而小汉斯本身被维持在受制主体的位置。他受到支配；这就是他的焦虑与恐惧症的全部根源。

父亲的位置之所以已经受到质疑，根本上正因为使母亲服从法则的不是他的言说，问题由此被引入。不过还不止如此：在小汉斯的案例中，现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第三个时刻——看来同样缺席；

而这个第三个时刻至关重要。因此，去年我向你们强调，小汉斯走出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是一个走样的出口。尽管他凭借恐惧症从中走了出来，他的爱情生活却会完全带上某种风格，带上我曾向你们指出其延伸的那种想象风格——

我是在谈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案例时指出的[注1]。

> [注1] 参见 1956—1957 年研讨班《对象关系》最后一课。

这个第三阶段如下；它同第二阶段一样重要，因为走出

俄狄浦斯情结取决于它。父亲曾表明他给予某种东西——只在他是法则承载者的限度内如此——这意味着：主体无论是否处在父亲位置，能否拥有这个阳具，取决于父亲。第二个时刻里，父亲作为法则的支撑者所许诺的东西，必须在这个阶段兑现；只有跨过这一阶段，事情才能完成。因为他拥有它，所以可以给予或拒绝；但他确实拥有阳具这一点，必须在某一时刻拿出证明。正因为他在第三个时刻作为拥有阳具的人——而不是作为阳具本身——介入，某件事才得以发生：阳具的动因重新确立为母亲所欲望的对象，不再只是父亲能够剥夺的对象。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全能的父亲是实施剥夺的父亲。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直到某一时期恰恰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人们认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一切破坏都取决于父亲的全能时，他们只想到这个时刻；只不过没有强调，在这里施行的阉割

是对母亲的剥夺，而不是对儿童的剥夺。

第三个时刻如下：因为父亲能够把母亲欲望的东西给予她，而他之所以能够给予，是因为他拥有它……确切地说，强力这一事实——按这个词的生殖意义，即父亲是一个有性能力的父亲——在这里介入。……在这个第三个时刻，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可以说在实在层面得到恢复：作为他者的父亲，同母亲的自我及其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得到恢复。处在较低层面、处在要求者位置的儿童，可以认同于某种东西；这项认同能够朝向那个通过三个时刻在此实现的父亲动因：

1. 它首先采取一种被遮蔽的形式：父亲尚未显现，却已存在于世间现实——即世界——中。因为象征法则统治着世界，阳具问题已经在某个别处提出；它在母亲那里，而儿童必须在那里辨认它。

1. 它继而采取父亲实施剥夺之在场的形式：父亲是支撑法则的人。这不再以被遮蔽的方式发生，而是通过母亲得到中介；正是母亲把他设定为向自己制定法则的人。

1. 最后，父亲得到揭示：他被揭示为拥有它的人。如果对父亲的认同发生在这个第三个时刻——即父亲作为拥有它的人介入的时刻——那么主体就能以有利方式走出俄狄浦斯情结。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这项认同叫作“自我理想”；它在象征三角中来到儿童所在的那个极点。后来将成为现实的一切，都开始在母亲极点构成；后来将成为超我的一切，则开始在父亲层面构成。

父亲在第三个时刻作为实在父亲、作为有性能力的父亲介入；这个时刻继母亲所受的剥夺或阉割之后——母亲在主体层面被想象为处在她

自身的想象性依赖位置。正因为父亲在第三个时刻作为那个拥有它的人介入，他才作为自我理想被主体内化。可以说，不要忘记，俄狄浦斯情结就在此时衰退。

相关知识卡 成为阳具与拥有阳具

这是什么意思？它并不意味着儿童此时会开始运用自己的全部性能力；你们很清楚，恰恰相反，他根本不运用它们。走出俄狄浦斯情结意味着：表面看来，可以说他已经丧失了对那些开始觉醒之功能的使用权。然而，如果弗洛伊德所分节的一切有其意义，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将来使用它们的一切凭证装进口袋。

父亲隐喻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恰恰是我们对一个隐喻可以期待的作用：它最终设立某种属于能指秩序、在那里留作储备的东西；其意指将在以后展开。儿童已经拥有成为男人的一切权利。到了青春期，如果他的这些权利受到质疑，那是因为对父亲意象的这项隐喻性认同——它经由三个时刻才构成——有某种东西没有彻底完成。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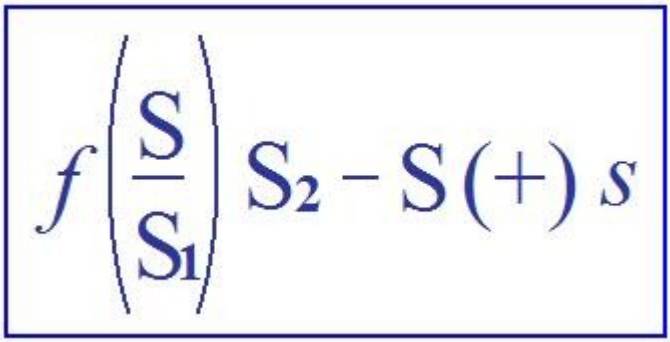
借此机会，我要向你们指出：这意味着，一个男人在具有男性气质的限度内，总在不同程度上是他自身的隐喻。这甚至给“男性气质”一词蒙上一层必须予以考虑的滑稽阴影。我还要向你们指出，众所周知，女性走出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不同。因为对她而言，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请阅读他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的文章——这第三个阶段要简单得多：她无须进行这项认同，也无须保留这份男性气质的凭证。

她知道它在哪里，也知道应当到哪里取得它：到父亲那一侧，到拥有它的人那里。这也向你们表明，所谓女性气质、真正的女性气质为何总还多少带有一种托词的维度。

真正的女人总有某种稍稍迷失方向的东西。我只是向你们作出这个提示，以便让你们把握这项发展所在的具体维度。

让我们回到原处并作结。为了说明我使用隐喻一词的理由，你们很容易感觉到，今天所给出的还只是一幅图表。

我们将返回每一个阶段，看看各自连接着什么。请清楚注意，这里所涉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恰恰同语言研究中那个便于把握、十分常见的所谓隐喻是同一回事。因为依照我给你们的公式，隐喻：




无非意味着如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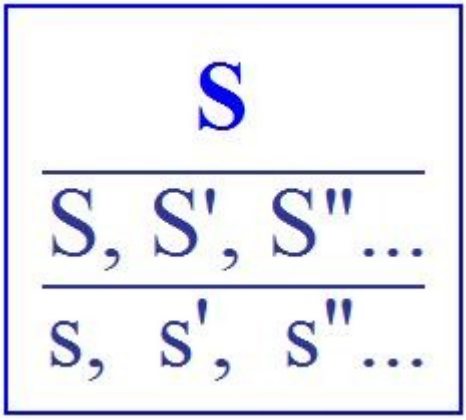



S、S′ 与 S″ 是能指，构成两条链；相对于不断流通的所有游移所指 s、s′ 、s″ ……它们始终在滑动。我所说的钉合，或者说绗缝点，只是一件神话性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把一个意指钉在一个能指上。不过，人们能够做的，是把一个能指钉在另一个能指上，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在这种情况下，总会产生某种新东西，有时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出人意料：即一项新意指的涌现。父亲处在能指中——处在大他者中——时，他就是这样一个能指：它只表征能指链联结本身的存在；可以说，它位于能指链上方，处在隐喻位置。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只要母亲把父亲立为凭借其在场来确认法则场所本身存在的人——只有在她这样做的限度内……这便给它得以实现的方式与手段留下极大余地，因此也能同种种情形相容……只有在这个限度内，主体才能跨过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三个时刻，也就是认同阶段；在那里，所涉是：

- 对男孩而言，认同于作为阴茎拥有者的父亲；
- 对女孩而言，承认男人是拥有它的人。

下次我们再看后续。

# 第11课 · 1958年1月29日

我正在向你们讲父亲隐喻。我希望你们已经注意到，我讲的是阉割情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谈父亲隐喻，并不意味着我在谈俄狄浦斯。

如果以俄狄浦斯为中心，就会牵涉数量极多的问题；我不可能同时说完一切。

我带给你们的图式——尤其上次那个图式——构成我试图以俄狄浦斯情结的三个时刻为题让你们理解的东西。我一直向你们强调：它是在主体的历险之外构成的；问题在于主体必须如何把自己引入这个在别处已经构成的东西。心理学家也许会出于不同名目对它感兴趣；他们把个体关系投射到所谓人与人之间、心理之间或社会场域，或者投射到群体张力中。如果他们有能力，也可以试着把它写入自己的图式。

社会学家也是一样。我已经作出足够提示，可以说：即便对他们而言，也必须考虑别的东西，尤其要考虑那些使我们在这件事上拥有共同尺度的结构关系。

理由很简单：即使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社会存在，它的最终根源也不可能从社会上得到正当化；我的意思是，它无法奠基于任何社会目的。

至于我们，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考察主体必须如何把自己引入俄狄浦斯情结的这项关系。并不是我发现、发明或率先提出学说说，主体进入其中时，男性性器官会发挥首要作用；它是同这整个事件秩序有关的一切之中心、枢轴与对象。必须承认，这个被称为阉割情结的事件秩

序十分混乱，辨析得很差。然而在观察或其他地方，人们仍继续提到它，而且采用的表述只令人惊讶一件事：听者或读者居然没有感到更多不满。我试图在这番堪称精神分析式的雷霆宣告中，给你们一个不至于模糊的字母；我的意思是，通过概念区分阉割情结所涉的不同层面。

这个阉割情结既会在我称作原初的一种倒错层面被引入，

即在想象层面被引入；也会在另一种倒错中被引入——今天我们也许会稍多谈一点——那就是同俄狄浦斯情结的完成有着如此密切联系的同性恋。为了努力看清楚，我还是会重新拾起上次向你们分节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其中心是男性性器官在其中发挥的特殊对象功能所关联的现象。

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走过这些步骤，把它们照亮；也会借此按照先前的预告，努力向你们说明：它如何至少给同性恋等众所周知却定位不当的现象带来一些启明。必须从这些直接提炼自经验精髓的图式出发。只要你们尝试划分不同时刻，它们未必就是年代学时刻；但仍必须诉诸年代学，因为年代学时刻本身也只能依照

某种先后顺序展开。因此，我曾告诉你们，在第一个时刻存在儿童的关系；它并非如人们所说的“同母亲”的关系，而是同母亲欲望的关系。

对欲望的欲望——我曾有机会注意到，这并不是一个如此常见的表述；有些人不太容易适应这样的概念：下面两件事并不相同：

- 欲望某种东西；
- 欲望主体的欲望。

当然，必须理解：对这个欲望的欲望确实意味着人们面对某种东西；第一个原初对象实际上就是母亲。我的意思是，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她构成，使她的欲望确实能够成为另一个欲望，确切地说，成为儿童欲望中的另一个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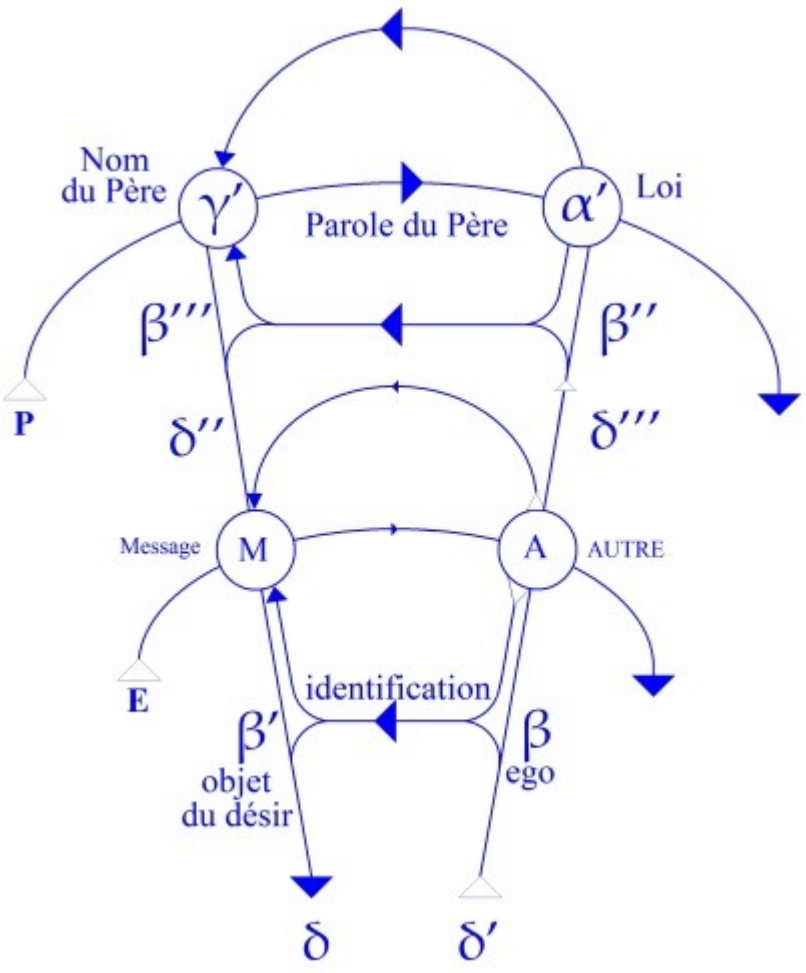
在这第一个阶段的辩证法中，儿童处于何处？你们看到，他格外孤立，除了已经被他构成为大他者的这个他者之欲望外一无所有；这个他者可以在场，也可以缺席。

今天，让我们紧紧把握它同这里所涉之物、同被引入的母亲欲望之对象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归根结底，必须跨过的是我们将称为 D 的某种东西，即母亲的欲望。我们要看，儿童所欲望的这个欲望——暂且称为 D——如何能够同母亲层面构成得远为复杂精细的某种东西会合。

母亲在存在中比作为她欲望对象的儿童稍微走得更远。我们已经设定：作为整个主体辩证法的枢轴，这个对象就是阳具，即被母亲欲望的阳具。这也意味着，从母亲同阳具之关系的结构来看，存在不同状态；因为这个阳具对母亲而言是一个同她的主体构造中原初作用相连的对象，而它在作为对象时可能处于不同状态——这甚至将构成后续的一切复杂情形。

不过眼下，让我们满足于这样把握它。我们认为，只有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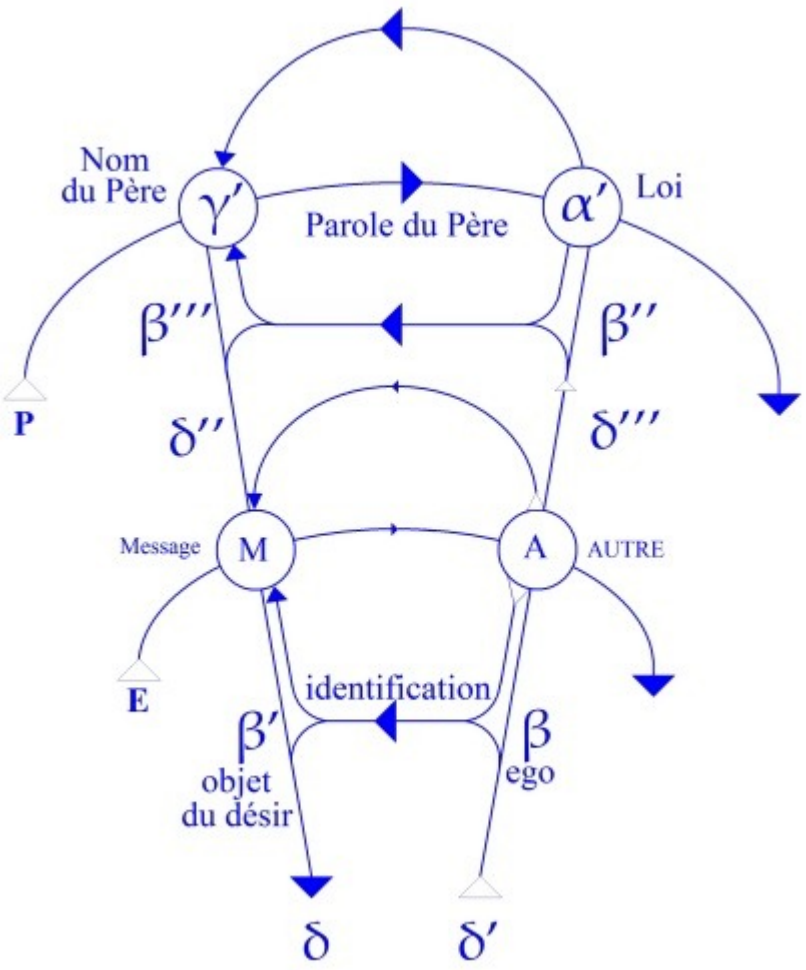
与能指流通出发，才能给全部分析现象引入秩序，即正确而正常的视角。我们始终拥有稳定可靠的参照，因为它们是结构参照，同所谓能指构造的道路相联系。正是它们为我们引路。因此，我们在这里无须再为这个阳具对母亲——某个特定案例里的实际母亲——究竟是什么而烦恼；其中也许确有某些东西，我们以后会谈。现在只需信赖惯常的小图式：阳具位于这里［β′］，它是一个转喻对象。




在能指中，我们可以满足于这样给它定位。它之所以根本上是一个转喻对象，是因为由于能指链的存在，它无论如何都会像传递游戏中的小物件一样，在所指中到处流通。它在所指中，是能指存在所产生的结果。经验向我们表明，这个所指对主体取得了一项主要作用，某种意义上成了普遍对象。

令人惊讶之处就在这里；它也让那些希望性对象的情形完全对称的人感到震惊：男人必须发现自己的工具，随后经过一系列历险去调整它的使用；他们于是希望女人也同样如此，即让阴茎嫉羡成为整个辩证法的中心。事实并非如此，而这正是分析所发现的。我们同样可以说，这确实给出最好的确认：存在一个人的场域，也就是分析的场域。它不只是发现一种或多或少严格、总体上同解剖结构——即个体的实在存在——重叠的本能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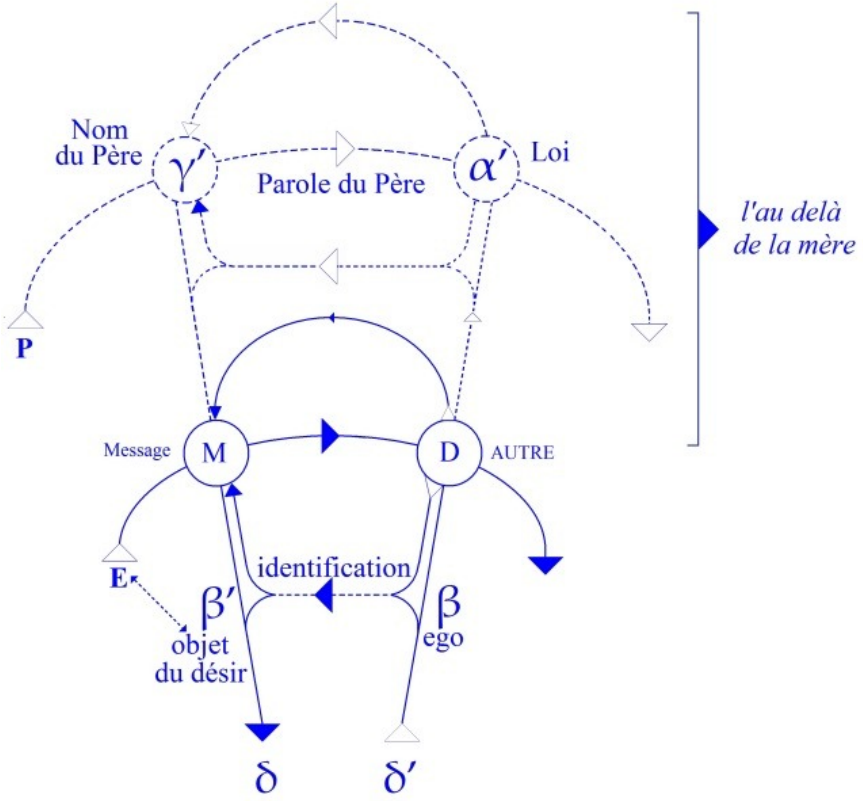
儿童欲望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如何设想他能在这件事上得到满足？显然，唯一办法就是来到她欲望之对象的位置［β′］。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是儿童［E］；我们曾多次用这个图式来呈现他：他的要求同某种东西发生关系，而这个东西不只在他内部；在其最初作用中，它首先根本上是一场遭遇，即能指分节本身的存在［A］。




这里［β］尚且空无一物，至少原则上如此。我的意思是：作为“我”的主体构成——我说的是话语中的“我”——尚且完全不一定得到分化；不过，从最初的能指调节起，它已经被包含在内。“我”无须在话语中明确指称自身，也能够成为这番话语的支撑者。

在一句感叹、一道“过来！”的命令、一声“您！”的呼唤中，都有一个潜伏的“我”。它处于潜伏状态；我们将在这里［β ⁀ β′］只用虚线来表达，就像转喻对象对儿童而言尚未构成一样。

这里［D］是人们所等待的母亲欲望；那里［M］则是儿童的呼唤同母亲作为大他者的存在相遇后将产生的结果，即一项讯息。




很明显，为了让儿童最终同母亲欲望的对象重合——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个层面把它呈现为他能够立即触及的某种东西［β′］——而那个母

亲的彼岸则用虚线表示，不过理由不同：因为它对儿童完全不可接近——

下面两项条件既必要又充分：

- 儿童话语中的这个“我”来到这里，在母亲这个大他者的层面构成；
- 母亲的这个“我”成为儿童的大他者；而母亲在自己分节其欲望对象时于此流通的东西，来到这里，对儿童履行其讯息功能。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

- 儿童暂时放弃任何属于自己言说的东西——这并不困难，因为此时他自己的言说还在形成；
- 总而言之，儿童在这里［M］以一项讯息的形式收到母亲欲望未经加工的原始讯息；相对于母亲所说的话，他在这里［$E_{\rightarrow}\beta'$］、在转喻层面，毫无保留地收到自己对母亲对象的认同。［你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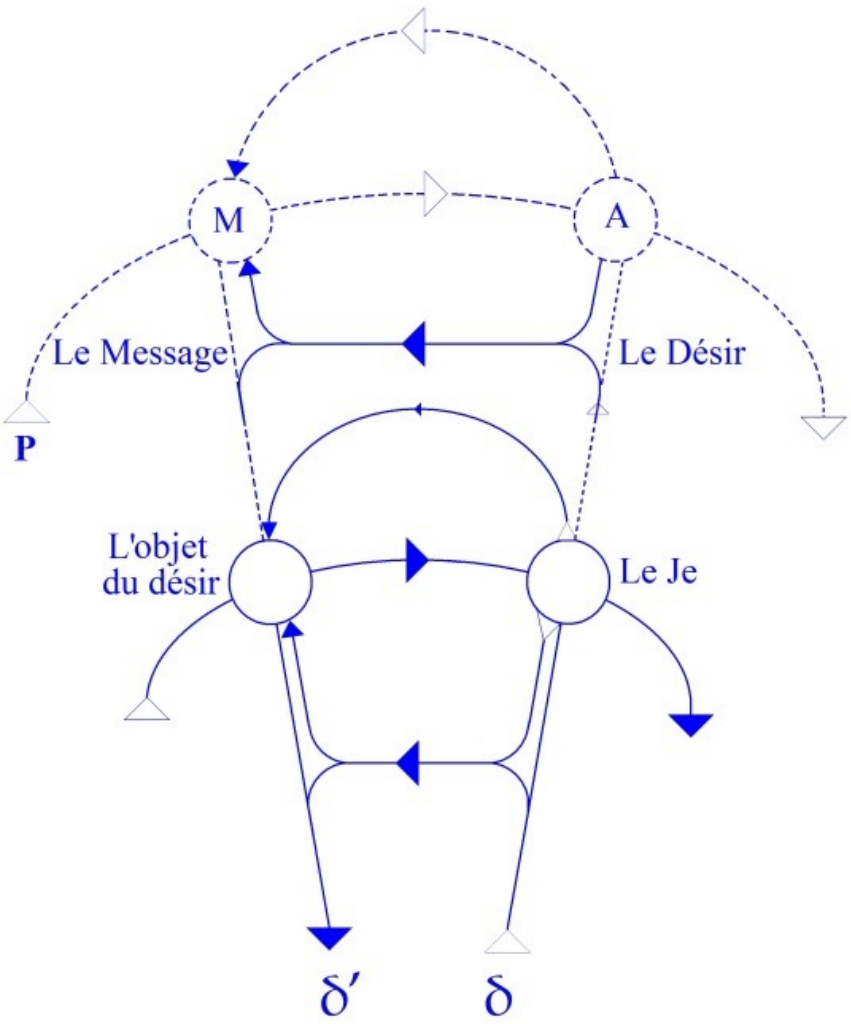
这番表述极为理论化；可是，如果一开始没有把握它，便完全无法设想随后必须发生的事情：母亲的这个彼岸开始发挥作用并得到引入；它由母亲同另一番话语的关系构成，而这里的另一番话语应当就是父亲的话语。

因此，儿童首先承担母亲的欲望；他必须承担它，但另一方面只是在这番话语的现实中，以某种未经加工的方式承担。也正因此，一种可能性向他开放：他自己可以来到母亲转喻的位置，也就是成为我上次所称的她的“受制主体”。

你们已经看到，这以何种移置为基础：它恰恰位于人们在这里称作原初认同的东西中；后者由这样一种交换构成：

- 主体的“我”来到母亲作为大他者的位置；
- 与此同时，母亲的“我”成为他自己的大他者。

这恰恰就是我们图式的“小梯子向上升一级”中发生的事情；这项上移刚刚在第二个时刻实现：




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心点、枢轴点、中介点——更准确地说，父亲作为由母亲中介者显现的时刻——恰恰是他现在作为禁止者让人感受到的时刻。我说他在这里“得到中介”：因为他将作为禁止者显现。在哪里？在母亲的话语中。

请注意，刚才在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阶段中，人们以未经加工的状态把握了母亲的这番话语；而在这里，说父亲“得到中介”，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引入母亲这个主体本身如何处置父亲的言说。

它意味着，父亲的这番言说实际介入了以母亲话语形式产生的结果。因此，父亲在这个时刻不像第一阶段那样受到遮蔽，却也没有得到完全揭示；这里使用“得到中介”一词，正是这个意思。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他于此［M］作为给母亲的讯息介入。“他”在这里拥有发言权；而他说的是一项禁止，是一个在这里［讯息］得到传递的“不许……”，传递到儿童从母亲那里接收预期讯息的层面。

这是一项关于讯息的讯息；而这种特殊形式的关于讯息的讯息……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语言学家并没有把它本身区分出来；由此可见，我们同语言学家接合起来确有益处。

……关于讯息的讯息，就是禁止的讯息。它不只是早早对儿童说：“你不许同母亲上床。”它也对母亲说：“你不许重新吞回……”——所谓母性本能的一切著名形式都在这里遇到障碍——“你不许把自己的产物重新吞回去。”

人人都知道，在某些动物那里，也许在人类那里更是如此，母性本能的原始形式表现为：把从另一端出来的东西，用我们文雅的说法，经由口腔重新吞回。所涉恰恰就是这件事。

这项禁止本身来到这里［M］；同样，我们可以说，某种东西在这里［A］显现，正是作为大他者的父亲。原则上，一个最终具有救助作用

的潜能、潜在可能性便由此存在：儿童因此受到根本质疑，他的受制主体位置遭到震动。

换言之，正因为：

- 母亲欲望的对象受到父亲禁令的质疑；
- 父亲禁令阻止这个圆环完全闭合在儿童身上，即阻止他干脆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

  ……整个本来应当停在这里的过程——即同大他者的象征关系——才显示出儿童同母亲的关系中早已隐含的三重性：因为他欲望的不是母亲，而是她的欲望。这里已经有了这种三元性；它已经是一项象征关系。

然而，一旦它的第一次闭合、第一次成功——也就是找到母亲欲望的对象——由于父亲禁令而彻底逃脱，对这个欲望的欲望所包含的一切便重新受到质疑；

儿童对母亲欲望的欲望之欲望也因此扑了空。

这第二个阶段不像第一个阶段那样主要由潜在可能性构成；它完全可以被感知和察觉，但可以说，本质上是瞬间的、过渡性的。尽管如此，它仍至关重要，因为归根结底，正是它构成了俄狄浦斯情结之所谓剥夺时刻的核心。

儿童与母亲本可以满足于这个理想位置、满足于他作为母亲转喻对象的这项功能；正因为儿童为了自身最大的好处而被从这里赶了出来，第三项关系、下一个富有成果的阶段才得以建立，他也在其中成为别

的东西。他成为我上次向你们谈到的那个别的东西：它包含对父亲的认同，以及日后拥有父亲所拥有之物的潜在资格。

上次我之所以迅速勾勒俄狄浦斯的三个时刻，就是为了今天不必从头再来；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今天有充分时间逐步重新拾起它。让我们在这里停留片刻，随后就会谈到同性恋。这几乎是一段插话，却仍然很重要。父亲此时介入俄狄浦斯辩证法的方式极其值得考察，因为正是在这里……你们可以在我为下一期《精神分析》所写的最新文章[注1]里看得更清楚；它概括了我们讨论精神病的弗洛伊德式结构那一年我讲过的内容。那篇文章的发表层级不允许我给出这个图式，因为它需要太多解释。不过，等你们读到那篇文章——希望不会等太久——就可以返回自己的笔记，重看我现在将向你们展示的东西。它在于：只要父之名——父亲作为象征功能，父亲在这里讯息与代码、代码与讯息之间发生之事的层面——恰恰遭到拒斥（Verworfen，forclos），那么我以虚线表示的东西也根本不存在，即父亲作为法则介入的道路不存在。父亲的介入只会采取简单、粗粝的形式：在母亲给儿童的讯息之上，成为“不许……”的讯息；同时也作为一种处在母亲彼岸的代码来源，以同样未经加工的形式出现。

> [注1] 雅克·拉康：《关于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先决问题》，载《精神分析》第 4 期，PUF，1959 年，第 1—50 页。

在这个能指传导图式上，你们能够清楚感知并准确定位一件事：当主体在一个根本的生命转折处受到召唤，必须让父之名在它的位置作出回应时——而它无法回应，因为从未到达那里——施雷伯主席恰恰看到另一个结构在那里涌现。这个结构通过父亲在母亲彼岸大规模、实在的介入而实现，却绝不由父亲作为法则创制者来支撑；正因如此，施雷伯主席在其精神病富有生成力的重大节点听见了——

听见什么？确切地说，是两种根本类型的幻觉；当然，它们从未

在经典教科书中作为如此被单独区分出来。

若想对幻觉有所理解，与其阅读所有研究幻觉问题的最佳精神病学作者，不如阅读施雷伯主席这样一位精神病主体那部无疑杰出而非同寻常的著作。那些作者口袋里早已装好哲学课堂学来的著名学校式阶梯：感觉、知觉、没有对象的知觉，以及其他种种废话。

施雷伯主席自己却把两类东西区分得十分清楚：

- 一类是用“基本语言”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使用“基本语言”时，其特点就在于：它们通过这番言说本身把代码教给主体。也就是说，他以基本语言收到的一切讯息，同时都由一些词语构成；这些词无论是不是新造词——它们以自己的方式确实如此——都在向主体传授它们在一套新代码中的所是；这套代码照字面向他复述一个新世界、一个能指宇宙。换言之，有一系列幻觉是关于新代码的讯息。因此，某种东西呈现为来自大他者——这再彻底不过地具有幻觉性质——并采取关于代码的讯息形式；而这套代码本身就在大他者中构成。

- 另一方面，还有另一种讯息；它们本质上呈现为被中断的讯息。你们还记得那些句子碎片：“他确切地必须……”“现在我要……”等等。

它们可谓命令的开头；更准确地说，在某些情形中甚至是真正原则的开头：“开始一件事，就要把它完成……”诸如此类。总之，这些讯息本质上作为纯粹的讯息、命令或被中断的命令呈现，作为作用于主体

的纯粹诱发力呈现；它们也可以在讯息［M］与代码［A］这两个彼此分离的侧面得到准确定位。当某种从一开始就被废除、从未以任何方式整合进主体生活的东西缺席时，父亲的话语便分解为这两端。这个缺失的东西恰恰使父亲话语取得连贯性并作出自身确认：父亲说完之后，话语回到自身，把自己确认为法则。

下一个阶段在正常条件下假定父亲能够开始发挥作用。上次我们已经说过所涉是什么：父亲会因为拥有它而介入并给予那个在阳具剥夺中受到牵涉的东西。它作为俄狄浦斯演变、俄狄浦斯三个时刻的中心词项介入。父亲会实际作为一项赠予行动显现；它不再出现于母亲的行动中、不再仍有一半受到遮蔽，而是出现于话语中。

母亲自己——只要父亲的讯息成为母亲的讯息——就成为一项允许和授权的讯息，并将产生某种东西。你们很容易看到，上次的图式无非意味着：只要父亲的这项讯息本身得到体现，它就能使图式向上升一级；也就是说，主体能够从父亲的讯息那里收到他曾试图从母亲的讯息那里收到的东西。

不过在这里，事情经由父亲给予母亲的赠予或许可来实现。也就是说，他最终拥有的东西——而这确实由俄狄浦斯衰退阶段实现——就是如下许可：日后可以拥有一根阴茎。正如我们上次说的，这确实是“把凭证装进口袋”。也可以借用一段有趣的历史引文：一位丈夫想确保妻子对自己忠贞，于是给了她一份书面证明，说她对他忠贞。随后，她走遍各处说道：

“啊，拉沙特尔拿到的这张漂亮凭证！”

那么，这个拉沙特尔（La Châtre）同我们遭“阉割”的小家伙（châtré）确实属于同一种秩序[注]：到了俄狄浦斯末尾，他们也拿到这张漂亮凭证。它绝不是无足轻重，因为日后他们能否安稳地承担——在最顺利的情形中——拥有一根阴茎，换言之，成为某个同父亲一样的人，正是以这张漂亮凭证为基础。

> [注] La Châtre 与 châtré（遭阉割的）发音相近；“le beau billet qu’a La Châtre”既指拉沙特尔手里的漂亮书面凭证，也以反讽方式指一张并不能保证现实的“好凭证”。

可是，这正处在一个归根结底十分歧义的阶段。你们看到，它的两个侧面始终可能彼此翻转；我刚才谈到的两个时刻之间的关系，带有某种抽象、

却又具有辩证法性质的东西：一个时刻里，父亲作为禁止者与剥夺者介入；另一个时刻里，他则作为许可者与赠予者介入——不过，他是在

母亲层面作出赠予。

还可能发生其他事情。要看清这些可能性，现在必须把自己放到母亲层面。在母亲层面，我们必须重新提出阳具对象、想象对象本身具有中心地位这一悖论。母亲是一名女性；我们假定她已经充分发展出自己女性吞噬能力的全部潜能。对于阳具这项想象功能，人们提出的异议——而且十分合理——就是母亲，就是如下说法：

“可是，阳具不只是这个漂亮的想象对象；她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把它吞下去了。”

换言之，阳具在母亲层面不只是一个阳具对象。它同样完全可以是某种已经在本能层面履行功能、作为本能的正常工具发挥作用的东西。换言之，母亲会把它视作一个“内投物”（injet）——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它不只意味着她把阳具放进自己那里，也意味着人们把阳具放进她那里；而这个“in-”还标示此对象在本能层面同其功能的关系。

这是一个具有本能功能的对象。人必须穿过整片能指森林才能抵达这些在本能上有效而原始的对象；正因如此，我们才要面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整个辩证法。不过——毕竟如此，谢天谢地！——他有时还是能够抵达。否则，由于抵达实在对象太过困难，事情早就因无人再战而断绝了。这是母亲一侧的可能性之一。

为了从这里作出区分，我们必须努力考察其他可能性：母亲同阳具的关系中存在某种对她而言最为切身的东西——如同对每个人类主体一样——它对她意味着什么。在“内投物”功能旁边，我们很容易区分“附加物”（adjet）功能；也就是说，在我们已经抵达的层面，某种东西在想象上属于她或不属于她，她被赋予或没有被赋予欲望它本身的许可。也就是说，在想象层面，这个东西被给予或没有被给予她，它对她有所欠缺；于是，它介入为：

- 一项欠缺；
- 某种她曾被剥夺的东西；
- 这项阴茎嫉羡的对象，即那种始终被感受到的剥夺——我们知道它在女性心理学中的影响；或者相反，它作为从其所在之处终究被给予她的某种东西介入。

你们很容易看到，这是另一个功能，是另一回事……尽管它可能同这里所涉的原始“内投物”功能混合；后者可以独自以一种可以说高度象征的方式被纳入考虑。……只要女性本身：

- 一方面，为了进入象征辩证法并最终整合进人类家庭，必须面对由此包含的一切困难；

- 另一方面，又完全确定地拥有通向某种原始而本能之物的一切道路；后者使她同那个不再是其欲望对象、而是其需要对象的东西建立直接关系。

既然这一点已经得到充分澄清，现在来谈同性恋者。人们谈论同性恋者，治疗同性恋者，却治不好同性恋者。最惊人的是：尽管他们绝对可以治愈，人们却治不好他们。因为观察以最清楚的方式显示出一件事：所谓男性同性恋，严格说来是一种对象倒置；它在一个完整、已经完成的俄狄浦斯层面获得其动机与结构。

也就是说，它处在一个已经抵达我们刚才所说第三阶段的俄狄浦斯层面；更准确地说，某种东西在实现第三阶段的同时，对它作出相当显著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说，男性同性恋者——另一种情形也一样，不过今天为了清楚，我们只限于男性——已经充分实现了他的俄狄浦斯。你们会对我说：“我们很清楚：他以倒置形式实现了它。”

如果这样说已经让你们满足，那么尽管停在那里；我不强迫你们跟随我。不过我认为，我们有权提出比“您女儿之所以哑，是因为俄狄浦斯倒置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在临床向我们显示的同性恋结构本身中

寻找：我们是否能更好地理解，这项俄狄浦斯完成究竟位于哪个精确之点，从而理解：

- 他的位置及其全部特征；
- 他为何极其坚持这个位置。只要有人给同性恋者稍稍提供一条偏转的道路与便利，他就极其坚持自己的同性恋位置；他同女性对象的关系远未废除，反而得到极为深刻的构造。

所涉恰恰是这个位置何以难以撼动；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分析通常会在这个位置遭到揭露之后失败。这并非因为他的位置内部存在某种不可能性，而是因为要走过使这个位置对他变得根本上珍贵而首要的种种迂回道路，需要满足各种条件。我认为，只有这种构想与这种把问题图式化的方式，才能把它们标出来。我们可以在同性恋者身上看到一定数量的特征。

人们首先说：他同母亲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关系。按照大多数案例，人们这样描述母亲：她在父母这对伴侣中发挥指导性、显要的功能；她比父亲更多照料儿童——这已经是另一回事；据说她以一种非常阉割性的方式照料儿童，极其细致、无微不至，却也持续得过久地操持他的教育。

人们似乎没有怀疑，这一切并不都指向同一方向。还需要补上几个小环节，才会认为：例如，这种高度阉割性的介入会在儿童那里产生对对象的这种过度估价——尤其是它在同性恋者那里采取的一般形式——即任何可能引起他兴趣的伴侣都不得缺少这个对象。

我不想让你们苦等，也不想显得在让你们猜谜。我认为，同性恋问题的关键如下：同性恋者作为同性恋者——包括其一切细微差别——赋予阴茎对象这种占优价值，把它变成性伴侣绝对必须具有的特征，是因为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母亲——按照我教给你们的区分——向父亲制定法则。

我曾对你们说，父亲之所以介入欲望辩证法——介入俄狄浦斯——是因为父亲向母亲制定法则。在这里，某种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东西总能概括如下：到了一个决定性时刻，向父亲制定法则的恰好是母亲。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会看到，它十分确切地意味着：在父亲介入之后，主体同母亲欲望之对象的关系本应经历解体阶段；也就是说，他认同于阳具的可能性本应成为彻底过去，并由父亲实施禁止的介入从根部切断。可就在此时，他却在母亲的结构中找到强化、支撑，找到使这场危机没有发生的某种东西。

也就是说，到了理想时刻、那个母亲本应被视为遭到剥夺这个“附加物”的辩证法时刻——主体在这一侧本应照字面不再知道该求助于谁——他却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安全保障。

这个位置维持得十分牢固，因为他体验到：事实上，母亲才是情境的关键；她不会让自己遭到剥夺或夺去占有。换言之，父亲尽管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出于某种原因，这对他们毫无影响。这并不意味着父亲没有开始发挥作用。

很久以前，弗洛伊德就已经说过——请你们参阅《性学三论》：

“并不罕见……”

当他说“并不罕见”时，并非随口为之。他不是因为态度软弱才说“并不罕见”，而是因为经常见到。让我们重新读一遍：

> “一种常见情形——它是可能性之一——是：一个禁止过度的父亲倒下，从而决定了倒置。”

其中包含两个时刻：既有禁止，也有这项禁止的失败。换言之，最终在那里制定法则的是母亲。这也解释了：在另一些完全不同的案例中，这名实施禁止之父亲的标记被打破，结果却完全相同；尤其当父亲过分爱母亲，

当他的爱使他显得过度依赖母亲时，结果完全相同。

我不是说结果总是相同，而是说在某些案例中相同。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区分父亲过度爱母亲何时产生不同于同性恋的结果。我只是顺带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绝没有躲进先天构成的解释，因为还需要建立种种差别；例如，它也可能产生强迫性神经症类型的效果，我们会在别的场合看到。不过眼下，我只想把可能造成同一效果的不同原因归在一起。也就是说，在父亲过分爱母亲的案例中，他实际上同样处于母亲向其制定法则的位置。

还有另一些案例……采取这个视角的益处，就在于看到它如何汇集不同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主体向你们作证：父亲始终像一个十分遥远的人物，他的讯息只能以母亲为中介传来。主体就是这样作证的。

可是，分析实际上表明，父亲远非缺席。尤其在同性恋者的分析文本中，人们十分经常看到一种同母亲的紧张关系，其中充满各式指责、抱怨与所谓攻击性表现；而在它背后，父亲作为竞争者的在场却会以最清楚的方式显现。这个竞争不是反向俄狄浦斯意义上的，而恰恰属于正常俄狄浦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满足于说：针对父亲的攻击性被转移到母亲身上。

这毕竟算不上十分清楚，不过至少有一个好处：说出的东西多少符合事实。必须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亲实际对儿童构成威胁的关键位置上，儿童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不过请注意，在这个图式上，这个解决办法看来同由两个三角的对应与相似所表示的认同是同一个：儿童认为，要维持住自己的方式——而且这是有效的方式，因为母亲不会让自己遭到动摇——就是认同于母亲。

他恰恰会处在如此界定的母亲位置，并由此发现自己：

- 一方面，他指向的伴侣成为父亲人物的替代者。同性恋者的幻想与梦经常显示：他同伴侣的关系在于解除对方的武装、压服对方；在某些同性恋者那里甚至十分清楚，他要让这个父亲替代人物无法在一个或多个女人那里显示自身价值；

- 另一方面，同性恋者要求在伴侣身上遇见阴茎器官的这个面向，恰恰对应于如下情形：在原初位置，即向父亲制定法则的母亲所占据的位置，受到质疑——并非得到解决，而是受到质疑——的恰恰是：父亲到底真正拥有它，还是没有它。

同性恋者向伴侣要求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它先于一切其他东西，而且相对于其他东西取得优先地位。无论随后要拿它怎么办，首先都必须表明自己拥有它。

我还要更进一步，在这里向你们指出：父亲过度爱母亲对儿童所具有的依赖价值，恰恰在于下面这句话。我曾特意为你们选出它；你们应该还记得，也希望确实记得："爱总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不是给予自己拥有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不再重述给你们这个公式的理由；不过请确信这一点，并把它当作一个关键公式、一小段扶手。只要用手碰着它，它就会把你们引到正确楼层——即使你们什么也不懂，而且你们什么也不懂反而好得多。

爱，就是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予某个人——至于对方拥有还是没有所涉之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反过来，赠予当然同样是给予，但它给予的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区别就在这里。无论如何，只要父亲对母亲表现得真正充满爱，他就会受到怀疑，被怀疑没有它。机制正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发挥作用。因此，我才向你们作出这个评论：真理从来不会因为尚未得到分节就彻底晦暗或无人知晓；至少，人们已经预感到它们。

我不知道你们在多大程度上注意到：分析家从不处理这个灼热主题，尽管父亲是否爱母亲，至少同母亲是否爱父亲一样值得关注。

人们总从这个方向提出问题：儿童有一位阳具性的、实施阉割的母亲，或者随便你们怎样说；她对父亲采取权威态度，缺少爱、尊重等等。可是，十分奇怪的是，我们从不强调父亲同母亲的关系。这恰恰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应当怎样看待它；归根结底，它看来无法让我们就这个问题说出任何足够规范化的东西。因此，至少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把问题的这个面向搁置一旁。

我很可能还要返回这一点。

还有另一个后果。一件同样非常经常出现、也是同性恋者分析中数一数二的悖论之事，乍看似乎同他们要求伴侣拥有阴茎相矛盾。非常清楚的是，有一件事让他们怕得要命；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害怕看见女性器官，因为那会向他们提示阉割的观念。这也许是真的，但并非人们所想的方式。女性器官让他们止步，恰恰因为它被假定——在许多案例中都会遇见——已经吞入父亲的阳具；他们在插入中畏惧的，正是同这个阳具相遇。

有些梦——我会向你们引述一些，它们既清楚记录在文献中，也见于我的实践——最清楚地显示：当人们走到能够分节主体同女性的关系究竟如何的转折点时，一旦可能同女性阴道相遇，浮现出来的

恰恰是一个作为如此展开的阳具。它代表主体面前那个不可克服的东西：主体不仅必须停下，还会在那里遭遇一切恐惧。它让阴道的危险取得完全不同的意义，不再只是人们归入有齿阴道标题之下的意义——后者也确实存在，但［……］相较于阴道包含敌对的阳具、父亲的阳具这一点，情况不同。这个阳具既是幻想性的，又在场并被母亲吸收；母亲自己掌握它的真正强力，而它恰恰位于女性器官之中。这

已足以分节同性恋者同这些不同词项之间关系的全部复杂性，而这些词项可以说［……］。

可以说，这恰恰是一个稳定的情境，绝非二元情境；它十分安全，是一个三足支撑的情境。可是，人们始终只从二元关系的角度去设想并支撑它。因此，在同性恋者位置的迷宫中——也因此由于分析家的过错——这个情境从未得到彻底澄清。

换言之，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情境当然同母亲有着最紧密的关系，但它之所以重要，只是相对于父亲而言；本应作为法则讯息的东西，在这里恰恰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它是否被吞入，最终都掌握在母亲手中；母亲握有其钥匙。不过，你们看到，这比“母亲拥有阳具、同性恋者认同于母亲”这种总体、粗大的观念复杂得多。

她根本不只是一个拥有或没有“附加物”的东西，而是掌握着这个特殊情境钥匙的人；这个情境位于俄狄浦斯的出口，也就是最终判定两者中谁拥有强力的那一点。这里所说的不是随便哪种强力，而确切是爱的强力。按照我在此向你们呈现的俄狄浦斯构造之复杂纽带，你们可以理解：同法则强力的这项关系如何在隐喻层面同幻想对象——阳具——的关系相呼应；在某个时刻，主体本身必须认同于这个对象。

下次我将继续讨论一项在这里作为小附录自然出现的内容，即评论人们所谓“阳具的被动状态”——这个词来自勒文斯坦——它被用来解释某些性能力障碍。它同这里衔接得太自然，我不能不讲。

随后，我会更一般地重新考察：贯穿同一个对象的这些不同变形，

——从一开始它作为母亲的想象对象所发挥的功能，直到主体承担它的时刻——我们如何能够初步勾勒它介入之不同形式的最终分类。

这就是我们下次，也就是下个月 5 日要做的事情。

再下次是 12 日；此后我会离开你们十五天。届时我们将就主体同阳具的关系作结。这也许不会如此直接地引起你们的兴趣，不过我非常重视它。上个学期结束时，我向你们讲了喜剧；当我说喜剧的要害在于主体重新把

整个辩证法事件拿回自己手中，并说道：

“说到底，这整个戏剧性事件、悲剧、父母之间的冲突，都抵不过爱情。现在让我们取乐吧，投入狂欢，让这一切冲突结束。”

毕竟，这一切都是为人、为主体而做的。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些人竟因此感到震惊。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是黑格尔说的。

相反，我能够带来的新东西，在我看来比种种精神现象学所能阐发的一切更具证明力：沿着这条道路，人们会发现我们正在提出的观点得到一项令人惊讶的确认，即对阳具的想象性认同对于主体及其发展具有关键性质。

因此，我同你们约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天，向你们说明：

- 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
- 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证明力；
- 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震撼；

……从而为喜剧的功能提供一把钥匙、一个单一词项和一种一义解释。

这个阳具是主体在想象上认同于的根本功能；然而，它却遭到彻底略去，被化约为部分对象概念——这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配置中绝不是它的原初功能。这个阳具将同时把我们带回某种未获充分理解的东西——至少我从上次话语结束后的反应中听来如此——也就是喜剧。

今天，我就把你们留在这个主题上。结束前，我只是想向你们展示：我试图借以汇拢我们所说一切的这番复杂话语，朝哪个方向、沿哪条道路彼此衔接并维系在一起。

# 第12课 · 1958年2月5日

象征化令世人牵挂。1956 年五、六月间，查尔斯·赖克罗夫发表了一篇题为《象征主义及其同初级与次级过程的关系》的文章[注1]；他试图为

> [注1] 查尔斯·赖克罗夫：《象征主义及其同初级与次级过程的关系》（“Symbol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es”），1956 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37—146 页；另见同文收入《想象与现实》，伦敦 Hogarth Press，1968 年。

我们当前所处的象征主义分析阶段赋予一种当代意义。

你们当中能够阅读英文的人，读一读这样的文章显然会有所收获，因为它会向你们显示：

在分析中应当赋予“象征主义”一词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始终带来哪些困难。我说的不只是这个词，而是它的用法，以及人们对象征主义过程形成的观念。

诚然，自 1911 年琼斯先生就此完成第一项重要的整体研究以来，这个问题经历了不同阶段，也遇到并仍在遇到极大困难。当前关于这个主题得到最充分分节的立场，来自

梅兰妮·克莱因夫人关于《象征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的思考。这同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内容有最密切的关系；我想努力让你们感觉到，我正试图让你们理解的视角何其重要，因为它能够给一些晦暗方向带来一点澄明。

我不知道今天应当从哪一头讲起；关于呈现这些事情的方式，我没有拟定计划。既然我曾向你们预告，这算是倒数第三次课，而下次研讨班将十分确切地以阳具与喜剧为中心，那么今天我只想

标出一个暂停点，向你们展示几个重要方向：本学期之初我围绕阉割情结所阐述的东西，允许我们在哪些方向上放置问号。因此，我会按照论题来到面前的次序一一拾起。今天谈这个主题时，我们无法总给一个首先应视为交叉点的东西强加严格秩序。

你们刚才在查尔斯·赖克罗夫的标题中看到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出现。我从未在你们面前谈过它们；甚至不久前，有些人还为此感到诧异。他们在某个词汇定义中遇见初级与次级过程，不免略感惊讶。

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可追溯到《梦的解析》的年代。它们虽不完全相同，却覆盖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这组对立概念。我曾不止一次在你们面前提到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总是为了让你们注意：如果不把二者相互关联，不感到它们的联系与对立共同构成各自的位置，人们对它们的使用就是不完整的。

我想立刻触及刚才评论的要害：作为初级过程之原则要素的快乐原则概念，一旦被孤立把握，便会导向如下结论。查尔斯·赖克罗夫认为，界定初级过程应当由此出发。

他认为必须排除初级过程的一切结构特征，把那些构造性成分之一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放到次要位置——也就是凝缩、移置等等，弗洛伊德界定无意识时开始处理的一切。他从弗洛伊德围绕《梦的解析》最终发展这套理论时所带来的东西出发，从根本上刻画初级过程：快乐原则本质上由如下事实构成——存在一种机制；无论你们

从历史阶段角度来理解，还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底层基础、一种其他东西必须在其上发展的根基，即某种心理底座与深处，甚至从一种逻辑关系来理解，事情在起源上和原则上都必须由此出发。

可以说，在人类主体那里——看来显然不可能涉及别的东西，不过这一点界定得不太清楚——面对驱力刺激，始终存在一种潜在可能性；它仿佛构成主体相对于世界之位置的原则，即趋向欲望的幻觉性满足。

我想，这不会让你们惊讶。所有作者都大量援引如下观点：由于某项原始经验，并依照反射模型，主体的每一项内部刺激都会有某种东西与之对应……在本能循环、欲求的运动——即使它不协调——以及随后的寻找、随后在现实中定位满足需要之物等东西作出回应以前，已经满足过欲望、带来过满足之物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会率先回应。

……满足就这样干脆地趋向于在幻觉层面重复自身。

这个观念已经几乎同我们的分析构想合为一体；必要时，每当我们谈论快乐原则，几乎都会含蓄地使用它。你们不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非同寻常，值得得到澄清吗？毕竟，如果心理过程循环的本性就是自行创造满足，那么我可以问：人们为什么没有得到满足？当然，因为需要仍在坚持；

幻想性满足无法填满一切需要。不过我们太清楚了：在性秩序中，如果所涉是驱力需要，至少在所有案例里，幻想都极有能力应对需要。

饥饿则是另一回事。毕竟，地平线上已经显现：这里最终所涉的，或许正是性对象极可能具有的幻觉性质。这个构想确实存在，而且从某

种意义上得到如下可能性的支持：至少在性满足层面，人可以凭借它维持自身。

这个观念如此深刻地渗入全部分析思想，以至于需要同其满足的这项关系……也就是被视为对主体生命起源具有决定作用的最初、原初奖赏或满足，以及挫折——即主体同母亲的关系——

……走到了前台。随着精神分析越来越关注主体发展的原始阶段，即儿童同母亲的关系，它便越来越深入一套关于需要及其满足的辩证法。由此，人们抵达某种东西；我想向你们标出它何其意指深长，同时又何其必然。

在我眼下所指的克莱因视角中，主体对现实的一切学习仿佛从根本上由最初对象的构成来准备并支撑；而这些对象本质上具有幻觉性与幻想性，被归为好对象与坏对象。它们固定一种最初、彻底原初的关系，并将为主体后续生活提供其同现实发生关系的主要类型。最终，主体世界就被构成为：主体同一些只反映其根本驱力的对象之间有着一种根本上非现实的关系。例如，一切会围绕主体的根本攻击性得到组织，形成一系列

主体需要的投射。

克莱因学派使用的这个幻想（phantasy）世界具有根本地位；在它的表面，通过一系列或顺利或不顺利的经验——最好足够顺利——

经验世界才会允许人们合理辨别：这些对象中有哪些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以客观界定为回应某种现实；而非现实的经纬仍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绝对根本。可以说，这种构造确实可以称为主体的精神病式构

造。于是，在这个视角中，正常主体就是一场发展顺利的精神病，一场幸运地同经验协调起来的精神病。这并不是我的重构。

我现在将谈到的作者温尼科特先生，在他围绕分析治疗中使用退行所写的一篇文本里，严格按照这种方式表述：

精神病同对世界的正常关系在根本上具有同质性；这一点在那里得到了毫无保留的确认。不过，这并不妨碍

这个视角产生极大困难。哪怕只是理解下面这个问题也十分困难：既然幻想只是现实世界的底层经纬，那么在一个已经成年、其现实世界已完成并成功构成的主体那里，由主体作为幻想来辨认的幻想功能究竟是什么？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克莱因派——也就是每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克莱因派的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目前几乎每一位分析家都面对它，因为他们越来越把主体同世界的关系完全登记为一系列对世界的学习，

而这些学习以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挫折经验为基础。

请你们参阅温尼科特先生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26 卷、题为《原始情绪发展》的文章[注2]，看看他如何尝试说明

> [注2] 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原始情绪发展》（“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1945 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26 卷，第 137—143 页；法译本收入《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Payot，1969 年（或 P.B. Payot，第 33 页），题为《原初情感发展》。

幻想世界的涌现，如何构想这个由主体有意识地经历、且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平衡其现实的世界。

从他的文本本身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查阅——他依靠一项评论；你们将看到，这项评论如此导向一个十分奇特的悖论，足以让人感到它确有必要。从儿童同母亲对象的原初关系——它既是满足对象，也是其不满足对象——出发，现实原则、换言之对现实的承认随之涌现。可是，人们完全看不出成年形式的幻想世界如何能由此产生，除非借助温尼科特先生想到的一个理论装置。它确实让理论能够相当连贯地发展，但我只想让你们注意其中的悖论。

情况如下：他指出，如果根本上存在对需要的幻觉性满足，那么正是这项满足同母亲带给儿童之物的不一致，开启了一道裂口；儿童可以在这道裂口中以某种方式初次承认对象——这个对象不顾种种表象，可以说，最终带来失望。

那么，为了解释某种东西如何产生——对现代精神分析家而言，幻想与想象世界的一切都被概括在那里，即英语所谓的 playing、游戏——

他指出：假设母亲对象到来的时机恰好准确无误；儿童刚刚开始作出反应，要获得乳房，母亲就把乳房带给他。

温尼科特先生在这里恰当地停下，并提出如下问题：在这些条件下，什么能让儿童区分幻觉、对其欲望的幻觉性满足与现实？

换言之，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严格地抵达如下等式：在起源处，幻觉同完整欲望绝对无法区分。你们不觉得，这种混淆的悖论无论如何都相当醒目吗？

在一种严格把初级过程刻画为自然地以幻觉方式得到满足的视角中，我们最终得到：

- 可以说，现实越令人满足，就越少构成一项现实的检验；
- 儿童全能思想的起源，本质上以现实中一切顺利成功之事为基础。

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但请承认，它本身呈现出某种悖论面貌。为了解释主体发展的一个枢轴点，不得不诉诸如此悖谬的东西，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思考乃至质疑。我立刻转向这个构想的对立面，看看在它面前还能提出什么。我想你们不会忽略，这个构想已经十分悖谬——而且毫不遮掩地悖谬——所以必然还会有一些后果。

它确实有各式后果。去年，当我提到

温尼科特先生的同一篇文章时，已经向你们指出：在其随后的人类学中，这无非使他把几乎所有所谓自由思辨都归入同幻想性思想面向相同的秩序。去年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幻想生活在这里同一切其实经过高度思辨性阐发的东西完全同化，也就是同几乎所有所谓信念同化，无论它们属于政治、宗教还是其他领域。

这确实是一种被嵌入盎格鲁—撒克逊式幽默、相互尊重、宽容而又退避的视角。存在一系列事情，人们只加着引号来谈，或者在有教养的人之间绝口不谈；然而，这些事情多少仍十分重要，

因为它们属于内在话语，而后者远远不能被化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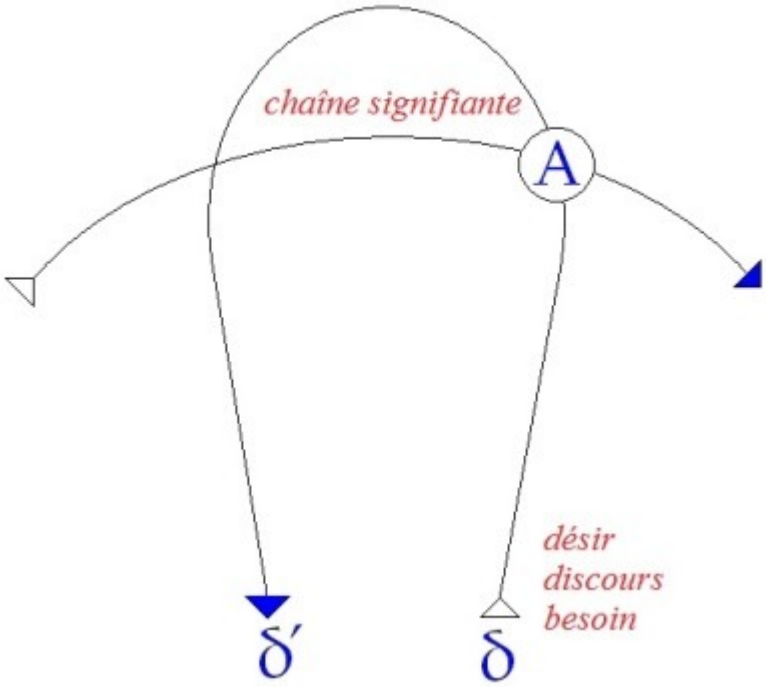
不过，让我们搁下这件事的最终结论。我只想向你们说明，另一种构想可以在它面前提出什么。首先，在幻觉层面产生的东西是否真的可

以干脆称为满足？也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中，我们仿佛能够体现这项基本论题：主体的原初需要在初级过程层面得到幻觉性满足；但这真是满足吗？

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几次引入问题。人们说：“看看梦。”而且总是诉诸儿童的梦。弗洛伊德自己沿着他探索的视角为我们指路，即向我们指出欲望在梦中的根本性质。于是，他干脆以儿童的梦为例，把它当作幻觉性满足的典型。

人人都知道，这扇门一经打开，事情便进展得很快。精神病学家早已试图理解主体在欲望中同现实的关系何以遭到扰乱；例如，他们把它同梦的类似结构联系起来。我们在此引入的视角，还不允许我们对此作出根本修改。

到了我们目前这一步，并且面对如下构想造成的僵局与困难——主体同世界的纯粹想象关系是他同现实之关系发展的原则——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把另一项观点同它对置。我曾在这个还会不断使用的小图式中向你们指出它的位置。这里，我再以最简单形式重新画出图式，并且——哪怕显得稍有重复——提醒你们所涉是什么。这里的某种东西可以称为需要，但我从一开始就称它为欲望，因为不存在需要的原初、纯粹状态；需要从起源处便在欲望层面获得动机，也就是在人那里注定要同能指建立某种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欲望意向［话语］穿过某种对主体而言作为能指链提出的东西：

- 要么能指链已经在主体性中强加了自己的必然性；
- 要么在最初，他只以下述形式遇见它：能指链已经在母亲那里构成，并通过母亲向他强加其必然性与屏障。

你们知道，他首先在这里以大他者形式遇见能指链；而它最终以

讯息形式抵达这道屏障。当然，我们在这个图式中只是看见投射，也要看快乐原则位于何处。也就是说，在某些案例、某些影响下，某种

东西以梦的形式呈现原始特征。姑且说，这是最原始、甚至最混乱的梦；我们也能在狗身上看到：一只狗有时在睡眠中动着爪子，因此它必定在做梦，也许正在获得欲望的某种幻觉性满足。

我们如何能够构想它们？同样，如何能够给它们定位，尤其在人那里？我向你们提出下面这项观点，好让它至少作为一个可能项存在于你们心中；在适当的时候，你们会注意到，它能够得到更令人满意的应用：对需要的幻觉性回应，并不是一项由需要的紧迫要求启动的回路在末端涌现出一个幻想现实。

- 它是在这项紧迫要求的末端出现某种东西；需要开始在主体那里激发一种朝向某种东西的运动，而后者确实必须为主体标出一些轮廓；

- 它是在末端出现某种东西。它当然并非同需要、同所谓对象没有关系；但我甚至要说，从起源处起，它同这个对象的关系就使它值得被称为一个能指。我的意思是，它同这个对象的缺席具有根本关系，并且已经带有符号之离散成分的性质。

当弗洛伊德分节这个机制、分节无意识结构的诞生时，自己也不能采用别的办法……请查阅我已经引述过的致弗利斯第 52 封信；在那里，他开始形成一种能够确切说明初级过程的心理装置模型。……他不得不承认：在起源处，以幻觉方式回应

需要显现的这种记忆铭刻，无非就是一个符号。

也就是说，这个符号不仅仅由本能理论所说的那种同意象的关系来刻画，也不属于那类足以唤醒需要、却不能满足需要的诱饵[注]；它是某种作为意象已经同其他能指处在一定关系中的东西：

> [注] Staferla 转录在这里把“本能理论中的意象关系”和“诱饵”连在一个句法不稳的长句中；米勒编订本将其断成两句，明确区分：符号不仅仅由它同意象的关系来刻画，也不属于只能唤醒需要而不能满足需要的诱饵。两版均作 instincts，故译“本能”，与 pulsion（驱力）区分。

- 例如同那个直接同它对立、意指其缺席的能指相联系；

- 同某种已经组织为能指的东西相联系。它已经在严格意义上的根本关系——象征关系——中得到构造；这项关系显现于一场在场与缺席、缺席与在场相接合的游戏，而游戏本身通常同一项声音分节相联系，后者已经构成能指离散成分的出现。

事实上，我们在经验中遇见的东西，乃至在最简单的儿童梦中产生的东西，并不是一项满足。即便只是单纯的饥饿、饥饿的需要，呈现出来的某种东西已经具有一种可以说过度、越轨的特征。

恰恰就是已经被禁止给儿童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笔下小安娜的梦：“樱桃、草莓、覆盆子、布丁……”这一切都已经进入严格的能指特征，因为它们已经是受到禁止的东西；它们不只回应需要，不只是满足饥饿的需要。它们以宴席形式出现，越过满足需要之自然对象的界限。无论你们在哪个层面把握作为幻觉性满足呈现的东西，这项完全根本的特征都会重现。

反过来，你们也可以从另一端把握事情。当你们面对妄想时，在弗洛伊德以前，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们也许一度会试图寻找某种同主

体之欲望相对应的东西；通过一些侧面的洞见与闪现，你们确实能够在那里找到仿佛表征欲望满足的某种东西。可是，妄想一切现象中最引人注目、最粗大、最具侵入性的主要现象，显然绝不是同某种满足欲望的白日梦有关的随便一个现象或事物。

它是某种像言语幻觉一样确定的东西。先于一切其他问题……

- 在弄清这项言语幻觉发生于哪个层面以前；
- 在弄清主体那里是否存在某种以内在反射形式出现的精神运动性幻觉以前——确认这一点极为重要；
- 在弄清是否存在投射或其他东西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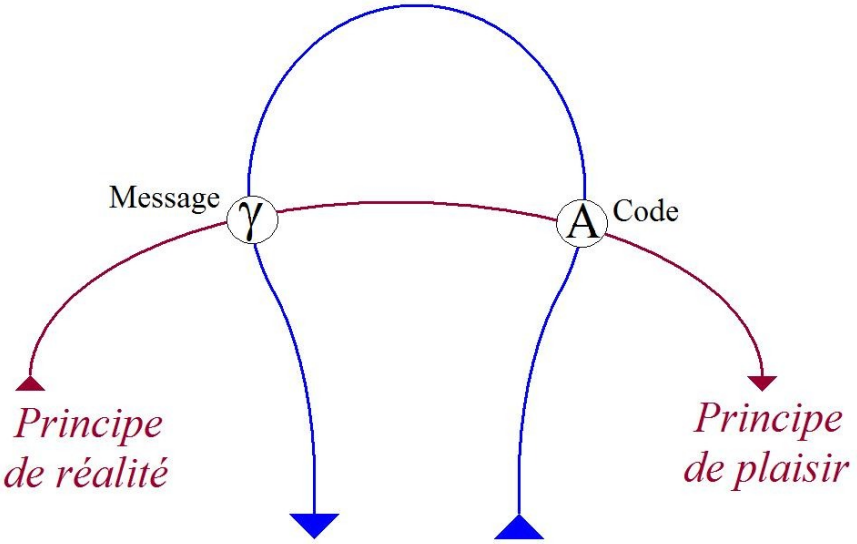
……我们难道不是一开始就能看见：在作为幻觉呈现之物的构造中，首先占据主导、

甚至应当充当首要分类成分的，是如下事实：

- 它具有能指中的结构；
- 它是在能指层面得到构造的现象；
- 如果不看见首先必须为这项现象带来的界定就是“它是能指现象”，哪怕片刻也无法思考这些幻觉本身的组织。

因此，有一件事必须始终提醒我们：如果确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刻画所谓快乐原则——即欲望根本上非现实的满足——

那么，欲望的幻觉性满足之所以存在，其区别与特征就在于：它具有绝对的原初性，在能指领域中提出自身，并且意味着大他者的某个场所。后者未必是某个他人，却是大他者的一定场所，因为能指动因的位置使它成为必需。你们会注意到，在这样一个视角、即这个小图式的视角中：




我们由此看见，某种东西在回路最终的外部部分——即图式的右侧——开始发挥作用。这里的需要以某种能指链末端或尾部的形式显现；当然，它只在极限处存在。可是，每当某种东西抵达图式的这个层面，你们总会在那里认出同它相连的快乐特征。

如果诙谐最终通向一项快乐，那恰恰因为诙谐要求某种东西在大他者层面实现；它有一个趋向某种意义彼岸的潜在终点，却又在自身中包含某种满足。因此，如果快乐原则在回路的这个外部部分以某种方式得到图式化，那么现实原则同样就在这个部分。

只要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是人类主体，就无法以其他方式构想它。人类主体在次级过程层面必须进入现实原则；而能指在其链条起源处，作为一种原初现实实际进入人类实在。在这个限度内，人们不可能以其他方式把握或界定现实原则。

有语言存在，有东西在世界中说话。因此，一整套事物与对象得到意指；若不是能指开始发挥作用，若世界中没有能指，它们绝不会被如此意指。主体进入任何现实，都绝不能被设想为对随便哪种东西——一次挫折、一处不一致、一次碰撞、一次灼伤，

或者任何你们想得到的东西——作出简单直接的经验。人并不是一步一步拼读一个环境世界（Umwelt），不是如此直接地、可以说摸索着去探索它；只不过对动物而言，本能会来帮忙，谢天谢地！因为如果动物必须重新构造世界，耗尽一生也不够。

那么，人拥有的本能远没有如此适应环境，为什么偏要认为他能像徒手摸索一样经验世界？存在能指这一事实绝对根本，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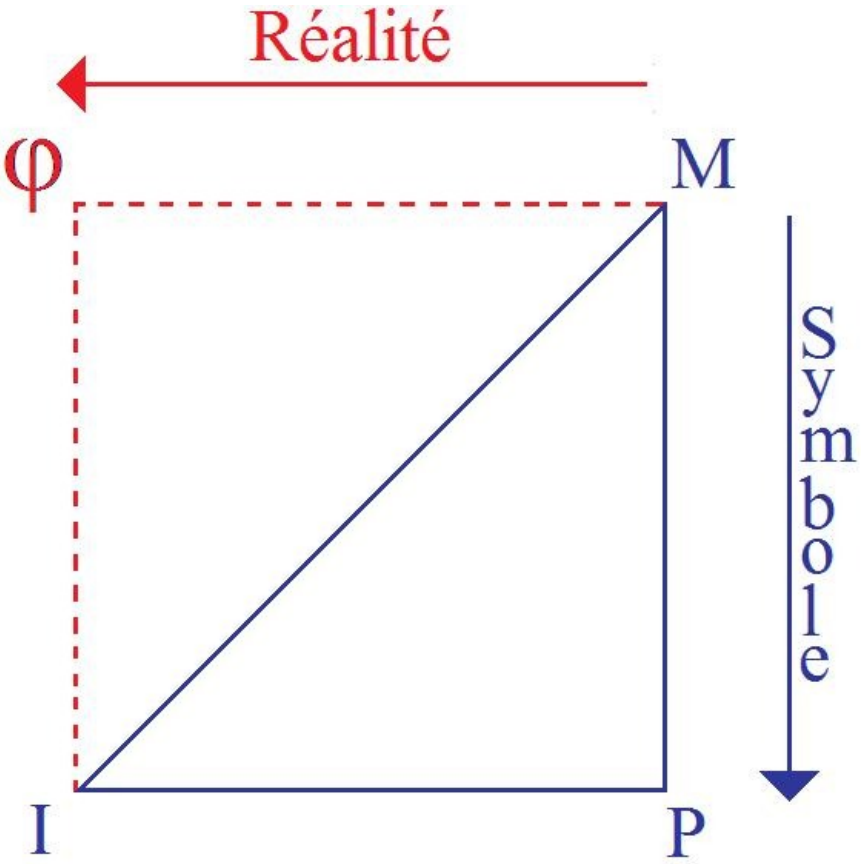
他经验现实的主要中介；在这个层面说出它，甚至几乎已变成一句陈词滥调和蠢话。

不过，能指确实通过声音介入。儿童接受的教育、成人言说教给他的东西，当然清楚显示了这一点；但弗洛伊德在这项经验要素上开拓出的重要余地如下：在语言学习尚未于运动层面、听觉层面得到精细发展以前，甚至在儿童能够理解人们向他讲什么以前，已经有某种东西存在……从一开始，从他同对象的最初关系起，从他同作为原初对象、作为其在世界中最初生存与维持所依赖之物的母亲对象之最初关系起……这个对象本身已经作为如此被引入象征化过程，并且在极早

阶段便发挥把能指之存在引入世界的作用。请牢牢记住：只要儿童开始能够对立两个音位，它们就已经是两个语词；再加上说出它们的人和它们所指向的人——即对象、即母亲——这四个成分便足以潜在包含能指组织将从中涌现的全部组合规则[注3]。

> [注3] 拉康曾多次回到这一点：四个成分——这里是两个音位，加上作为能指的儿童与大他者——足以奠定一门语言的全部组合规则。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中的 α、β、γ、δ。

现在，我将转向一幅新的小图式；它先前其实已经在这里初步勾勒。它会向你们展示由此产生的后果，同时让你们回想我在上节课中试图让你们感受到的东西。




我们曾说，原初存在的是儿童同母亲的关系；最初的现实关系确实沿这条轴［I ⁀→ M］构成。我的意思是，如果只让现实的构成取决于儿童的欲望同对象——它满足或不满足他的欲望——之关系，那么这种现实就无法推导出来；在经验中，人们只能借助不断的障眼法将它重构。

在某些早发精神病案例中，也许可以在极限处找到某种与此对应的东西；然而，每当人们引入这项辩证法，最终总是回到儿童发展的所谓抑郁阶段。实际上，由于这项辩证法包含

一种远为复杂的后续发展，所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起源处的关系并不只是儿童欲望同满足或不满足它的对象之关系；由于最初象征化给予的一点最低限度的厚度与非现实性，儿童已经得到一个

可以说呈三角形的定位：它不是相对于将给他的需要带来满足之物，而是相对于他面前母亲主体的欲望。

事情正是如此；而且只有在某种东西已经于这里所表示的维度中启动时——用数学分析的话说，就是沿“纵坐标轴”——我们才拥有象征维度。由此可以设想，只要儿童必须相对于这两个极点给自己定位，他就会开始采取位置。梅兰妮·克莱因夫人恰恰围绕这一点摸索，却无法给出公式：儿童确实围绕母亲的双重极点——她称之为好母亲与坏母亲——开始采取自己的位置。

他首先定位的不是对象，而是自己；随后，他会把自己放在这里的种种位置上，试图抵达母亲欲望的对象，试图亲自回应母亲的欲望。这才是根本成分，而这件事可能持续极长时间。事实上，从这时起便不再有任何可能的辩证法。我们必须在此引入如下事实：只把儿童同母亲的关系本身纳入考虑完全不可能；首先，因为既不可能思考这项关系而又从中什么也不推出。

按照经验，同样不可能设想儿童处在例如克莱因派分析家向我们呈现的这个歧义世界中：那里只存在母亲的现实。于是，他们得以说儿童的原始世界一方面悬系于这个对象，另一方面又完全是自体性欲的；

儿童不愿在内部与外部之间作出任何区分，因为他同这个对象联系得如此紧密，照字面同它形成一个封闭圆环。

事实上，人人都知道——只需看看小孩子怎样生活——小孩子根本不是自体性欲的。他通常像一切幼小动物一样对现实中的各式其他东西感兴趣；而且归根结底，他是一种比其他幼小动物格外聪明的动物。当然，他不会对随便什么都有兴趣，但其中有一样我们赋予一定重要性；既然这里的横坐标轴是现实轴，它恰恰在这个现实的极限处呈现。它不是一个幻想，而是一项知觉。

我要搁下克莱因理论中的这个巨大问题。我的意思是：克莱因是一个天才女人，因此什么都可以原谅她；但对她那些在心理学上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尤其苏珊·艾萨克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这却不可原谅。追随梅兰妮·克莱因夫人以后，她竟然分节出这样一种知觉理论：人们完全无法把知觉同这个词在分析意义上的内摄区分开来！

我无法顺带向你们指出克莱因体系的一切僵局；我试图给你们一个模型，使你们能够更清楚地分节正在发生的事情。镜像阶段发生什么？主体在那里遇见某种严格说来既是现实、又不是现实的东西，即一个虚拟意象。它在主体的一定结晶中发挥完全决定性的作用；我把这个结晶称为原型（Urbild），并把它同儿童与母亲之间发生的关系平行放置。大体而言，所涉确实如此：儿童在那里取得一项支点；它处于现实极限，可以说以知觉方式向他呈现。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称为一个意象——按照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意象在现实中是一种具有捕获力的信号；它从现实中分离出来，吸引并捕获主体的一部分力比多、某种本能。由此，世界中确实存在若干

参照、若干可被感知的点，生物围绕它们大致组织自己的行为。归根结底，对人类而言，这看来是唯一留存的参照。它在这里发挥作用，而且恰恰因为它严格说来具有诱骗性与幻觉性才发挥作用。它由此帮助一种活动；而对主体而言，这种活动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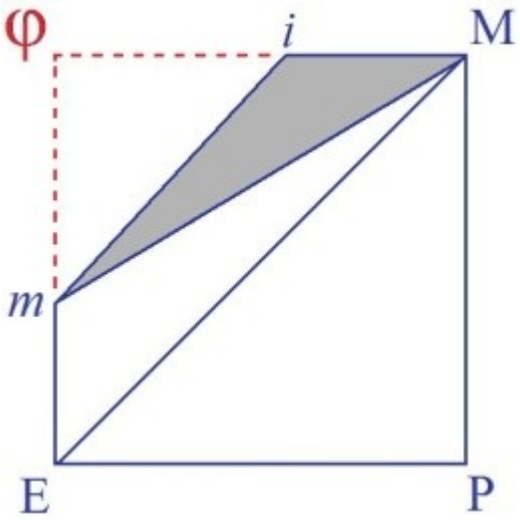
因为他必须满足他者的欲望——把欺骗他者欲望本身作为目标。

现在，儿童将要构成自己［……］。儿童面对镜子时的全部欢欣活动，都在于他此时把自己赢取为某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他相对于它既定位自己的运动，也定位那些陪伴他站在镜前之人的意象。某种特殊经验在现实中向他开启这项可能性；正是围绕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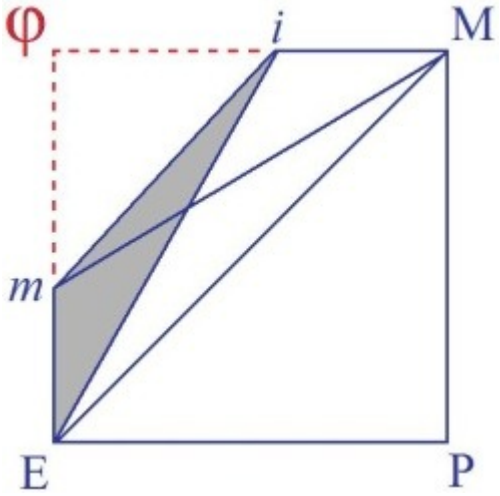
儿童才可能赢取某种东西；这个经验拥有虚拟现实的特权，它尚未实现，却又作为如此得到把握。人类现实的一切可能性将照字面围绕这个东西构造。

作为儿童为了满足母亲欲望而必须认同于的想象对象，阳具此刻尚且不能被放到自己的位置。不过，自我在某个参照点上的这项结晶，极大地丰富了这种定位的可能性；它开启了想象界的一切可能性。归根结底，我们见证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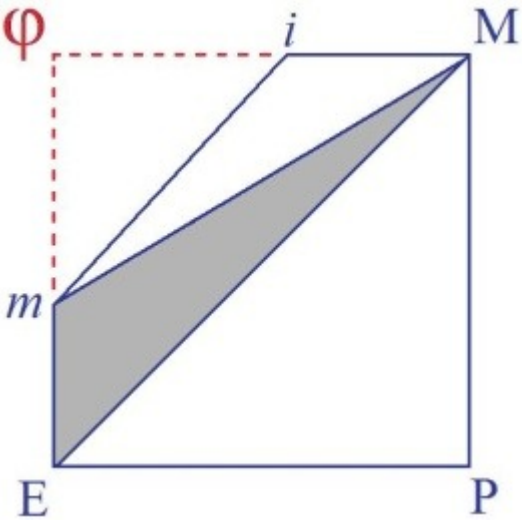
我们见证一场双重运动：现实经验以身体意象［i］形式引入一个幻觉性、诱骗性的成分，作为主体相对于现实给自己定位的根本基础；在这项经验为儿童提供的整个空间、余地之中，他的最初自我认同又有可能朝相反方向进入另一个场域。后者同由 m i M 三角构成的场域同构而反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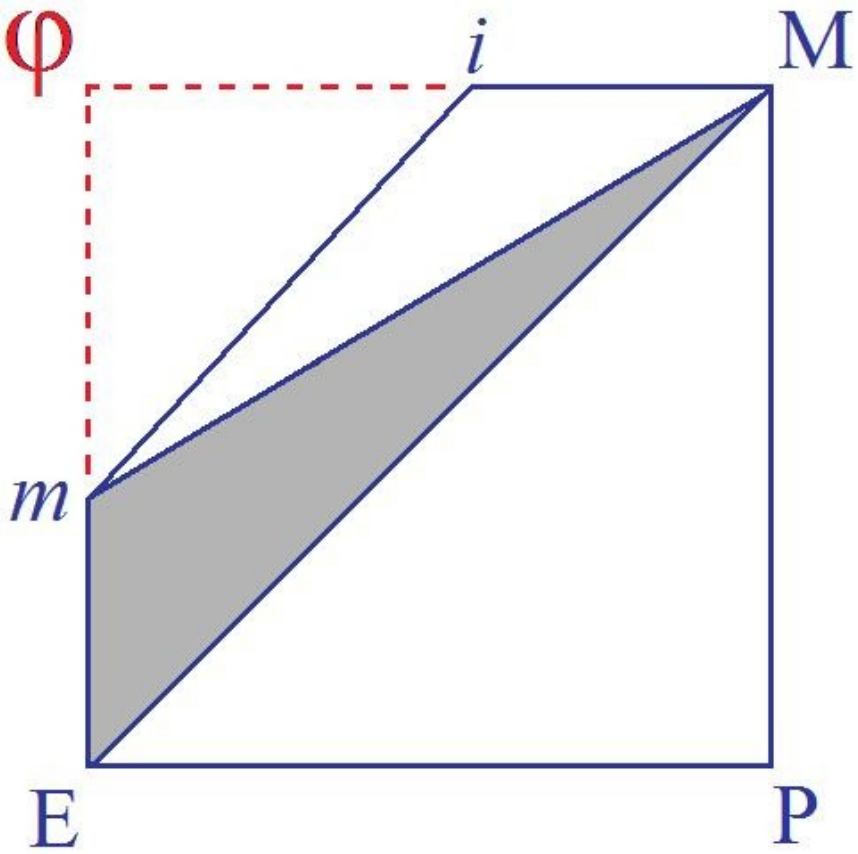

也就是这个 m i E 三角；E 是必须认同自身、界定自身、赢取自身并使自身主体化的主体：




以及母亲的极点 M E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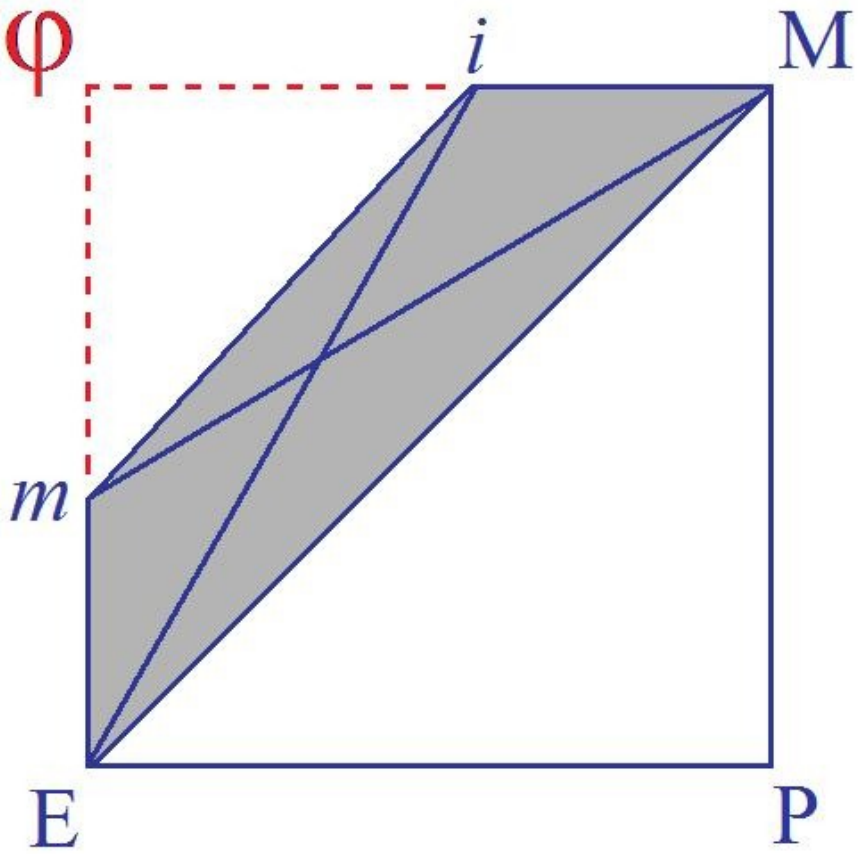



那么，这个三角是什么?




这个场域是什么？这条从自我的原型出发，使儿童得以

赢取自身、认同自身并取得进展的道路，又应当如何界定？它由什么构成？严格说来，它由如下关系构成：自我的这个原型，即儿童在自身经验中初次赢取或掌握自己——从他把必须相对于其定位的实在极点一分为二之时起——使他进入这个梯形 E m i M：




因为他认同于现实中成倍增加的能指成分。我的意思是，通过所有这些接连发生的认同，他自己成为并承担一系列能指的功能与角色——请把它们理解为象形文字、类型、形式与呈现方式。它们将以若干参照点来标点他的现实，使它从此成为一个遍布能指的现实。

换言之，这里将构成界限的，是那个被称为自我理想的形成——你们会看到，我这样给它定位为什么重要。它是主体从想象定位出发，朝象征界方向前进时所认同的东西。这个想象定位以某种方式由主体对

其自身与身体的本能关系预先塑造；而主体将投入一系列能指性认同，

朝向那个作为如此得到界定、同想象界相对立的方向，也就是把想象之物用作能指。

被称为自我理想的这项认同发生在父亲层面。为什么？恰恰因为相较于同母亲的关系，父亲层面同想象关系有更大的距离。

这些小图式一个搭在另一个上面，就像一群小舞者彼此叠起，一个人的双腿落在另一个人的肩上；所涉确实就是这样一回事。这个小脚手架的第三项——父亲——通过实施禁止来介入；也就是说，他使那个恰恰作为

母亲欲望对象的东西上升到严格的象征地位：它不仅是一个想象对象，而且还遭到摧毁与禁止。

父亲作为实在人物、作为“我”介入并发挥这项功能；正因如此，这个“我”将成为格外具有能指性的某种东西，并能够构成最终认同的核心。后者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后、最高成果，使所谓自我理想的形成同父亲相联系。自我理想同母亲欲望对象之间的对立，在这个图式上得到如下表达：

如果主体对阳具——作为母亲欲望对象——的潜在而理想的认同位于同母亲之关系的第一个三角顶点，那么它只是潜在地位于那里：既始终可能，

又始终受到威胁。

它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至于在某一时刻必须被纯粹的象征原则介入所摧毁。这个原则由父之名代表；它以被遮蔽的在场状态存在，却又会揭开遮蔽。它并非逐渐揭开，而是首先通过一项决定性的介入揭开，因为它是实施禁止的成分。

主体这种摸索性的寻找本来应当导向某种东西，而且在一些案例中确实导向它……也就是主体同母亲的排他关系。它并非简单直接的依赖，而是在各式倒错中通过同阳具的某种根本关系显现：主体以不同形式承担阳具——

- 要么把它变成自己的恋物；
- 要么使我们来到所谓同母亲之倒错关系的原始根源层面。

主体从自我出发进行这项认同；他在某一阶段确实可能作出靠近运动，使自己的自我认同于阳具。但正是在这一限度内，他从根本上被带向另一个方向，

也就是构成某种关系。这项关系由这里表达的端点标出，并且同自身身体的意象、即同纯粹的想象界、也就是同母亲具有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他的自我作为实在词项，不仅能够认出自己，而且在认出自己后，能够在同母亲的关系中把自己变成能指成分，而不再只是想象成分。于是，弗洛伊德在自我理论中以最坚实方式分节的这些接连发生的认同便得以产生。其自我理论的对象，正是向我们说明：自我由一系列认同构成——请参阅图式——即一系列对某个超出直接对象之对象的认同；这个对象就是处在母亲彼岸的父亲。

这个图式必须保留下来，因为它还向你们证明：为了让这件事正确、完整并朝恰当方向发生，它的方向、直线性与意外，同父亲在儿童同母亲之关系的辩证法中越来越强的在场之间必须具有一定关系。这个图式包含一场双重摆动：一方面，人类主体抵达现实的某个界限，并以身体意象的虚拟形式赢得现实；与此相应，另一方面，主体把能指的非现实成分引入经验场域，并由此把经验场域扩大到人类主体所具有的尺度。

这个图式始终有用。如果不参照它，你们会不断滑进一系列混淆：照字面把膀胱当作灯笼，把理想化当作认同，把幻觉当作意象；还有各式远非等价的东西。日后我们必须参照这个图式，重新讨论它们。

例如，我们对妄想现象的构想，显然很容易由这个图式所放置、突显并显现的结构标出。因为我们总会在妄想中看到某种确实配得上退行一词的东西；不过，它绝不是某种先前状态的重演——这样理解实在太过滥用。

例如，认为儿童生活在一个妄想世界中——克莱因式构想看来暗含了这一点——并把它同妄想现象混淆，是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之一。理由很简单：尽管克莱因理论表述的前提要求存在这个精神病阶段，我们却没有在儿童那里获得任何代表某种过渡性精神病状态的经验。

相反，图式能够用两条箭头所描述运动的反向运动，清楚说明一种结构性而非发生学的退行：在对象世界中发生身体意象的侵入——我说的是施雷伯类型的妄想，这一点在那里十分明显；反过来，能指的一切现象在这里围绕自我汇集，以至于

可以说，主体作为自我不再由任何东西支撑，只由能指性言语幻觉构成的这张连续经纬支撑。它此时形成一种退回其世界与现实发生之初始位置的运动。

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定位我们围绕对象所提问题的意义。对我们分析家而言，对象问题根本上如下……因为我们不断经验它；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处理它：

……幻觉对象的来源与发生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是否只需参照想象界范畴，就能对作为幻觉性对象的这个对象形成充分构想。

我的回答是：不能，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幻觉对象……自从有进行思考的人，有哲学家试图表达人人都经历的经验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它太久了。……人人都知道，人们很早以前便谈论幻觉对象；它就是摩耶之幕。

因此，所谓性需要显然会实现一些超出主体内部任何东西的目标。人们没有等到弗洛伊德：叔本华先生以及他以前许多人，早已从中看见自然的诡计——主体以为自己拥抱某个女人，其实只是服从物种的必然性。

对象从根本上具有想象性质这一面向——尤其当它是性需要的对象时——早已得到承认；可是，它丝毫没有推动我们处理那个尽管如此仍属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同一种需要——据说它由自然中粗略、表面看来凭借诱饵性质实现的东西构成，即主体只对同类雌性的意象敏感，大体如此——为什么这一点没有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对男人而言，一

只小小的女鞋恰恰可以在他身上激起据说注定用于物种繁衍的能量？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而且只有当你们注意到，作为幻觉性对象的所涉对象在主体那里发挥功能，不是作为意象——无论你们设想它多么具有诱骗性，多么天然地组织成一件诱饵——而是作为能指链中的能指成分时，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我还会返回这一点。

今天，我们来到也许格外抽象的一课之结尾；我恳请你们

原谅。不过，如果不设立这些词项，我们永远无法理解：

- 什么在这里，什么在那里；
- 我说了什么，又没有说什么；
- 我说哪些东西是为了反驳他人，以及他人天真地说了哪些东西，却没有意识到自身矛盾。

我们必须经过这一步，考察这个或那个对象——无论是不是恋物——所发挥的功能，乃至一种倒错的任何工具配置。要满足于受虐狂或施虐狂这样的词，人实在不知道把脑袋放到了哪里；当然，它们会带来关于阶段、本能的各式精彩思考，例如为了最终抵达生殖器拥抱这个简单目标，某种具有攻击性的运动需要如何成为必需。

可是，为什么在施虐狂与受虐狂中，遭到鞭打——实践施虐狂和受虐狂还有其他办法——确切地说，用细杖或类似东西挨打，会发挥根本作用？如果贬低这件特殊工具在人的性欲中的重要性，

即人们通常以或多或少省略、象征化或一般化方式称作鞭子的东西，那毕竟值得人们作些思考。

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未来世界；在那里，生殖

本能的一切都组织得极为完善［“1984”］[注]，人们挑选出注定提供最佳生殖材料的人以后，干脆把小胎儿装进瓶里。一切都十分美好，世界也变得格外令人满足，以至于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出于个人偏好，

> [注] 原转录在方括号中写作“1984”；但赫胥黎笔下以瓶装胚胎组织繁殖的未来世界出自《美丽新世界》，《1984》则为乔治·奥威尔所作。译文保留转录文本，并在此标明作品归属。

宣称这个世界从根本上令人无聊。

我们不对此表态。不过，有趣的是：一位从事这种未来预想的作者——就这些预想而言，我们不赋予它们任何重要性——却借助一个表现出挨鞭需要的姑娘，使他与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重新诞生。毫无疑问，在他看来，这里有某种同世界的人性特征紧密相连的东西。

我只想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想指出：一位小说家、而且无疑拥有性生活经验的人能够把握的东西，也应当让我们这些分析家停下脚步。举例说，分析中的倒错史曾经历一个整体转折：人们摆脱了“倒错只是驱力干脆涌现，因而是神经症的反面”这个观念；但为此，人们一直等到指挥发出信号——也就是弗洛伊德写下《一个孩子挨打》的时刻。

正是围绕这项绝对崇高的研究——因为后来所说的一切，显然只是它所包含之物的零钱——正是围绕这项对鞭打幻想的分析，弗洛伊德才

在那一刻真正让倒错进入其真正的分析辩证法。倒错在那里显现为：它不是一项简单驱力的表现，而是系于一个同神经症一样微妙、复杂、富含妥协而又歧义重重的辩证法语境。

从这里出发，倒错不再被归入我们诸倾向的某个本能类别；相反，某种东西会在倒错的细节、材料以及——让我们说出这个词——能指中准确分节它。况且，每当你们面对一项倒错，如果没有看见倒错根本上系于某种虚构经纬——而这张经纬本质上能够转化、修改、发展与丰富——就会以某种方式误认眼前之物。

这甚至就是倒错的全部历史。另一方面，在某些案例中——我是说临床与经验上——倒错同恐惧症的出现、消失及全部补偿运动紧密相连；后者显然显示出正面与反面这两个词，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意义：两套得到分节的系统彼此组合、互相补偿并交替出现。这同样促使我们在完全不同于简单倾向的领域中分节驱力。我特别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倒错本身的成分与材料所回应的能指重音，因为眼下所涉正是意指对象问题的实质。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有一个对象——毫无疑问始终支配主体后续生活的原初对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还拥有一些发挥结晶作用的想象成分，尤其是身体装置的全部材料：

肢体、主体对掌控自己肢体的参照，以及总体意象。

可是，对象被卷入能指功能。于是，在由一条能指链之存在所构成的关系中——正如我们用一系列 S、S′ 、S″ ……来象征它——其下方又有一系列意指；上方链条沿某个方向推进时，意指中或其下方的某种东西便朝相反方向推进。它是一项始终滑动、奔逸并逃脱的意指。由

于能指存在，人同任何意指的根本关系最终都指向一种特殊类型的对象。




我把这个对象称为转喻对象。我告诉你们，主体之所以同它建立关系，其原则在于：主体不是在想象上彻底认同于对象的某项或某项功能——仿佛它回应某种所谓部分倾向——而是有某种东西使某个极点必然存在于那里、存在于某处。

也就是说，想象界中有某种东西表征那个始终逃脱之物，即由于能指存在，对象在想象界中沿某股逃逸流运动所诱发的东西。这个对象有一个名字；它是全部倒错、神经症辩证法，乃至干脆是一切主体发展的枢轴与中心。它叫作阳具；这就是我下次必须为你们说明的东西。

# 第13课 · 1958年2月12日

［黑板上列出三篇文章的书目信息］

欧内斯特·琼斯：

- 《阳具期》（“The Phallic Phas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4 卷，1933 年；收入《精神分析论文集》，Baillière-Tindall and Cox，1950 年，第 452—484 页。

- 《阳具期》（“Die phallische Phas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19 卷，1933 年；法译《阳具期》，载《精神分析》第 7 期，1964 年，第 271—312 页；或以《阳具阶段》为题收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Payot，巴黎，1969 年。

汉斯·萨克斯：

- 《论倒错的发生》（“Zur Genese der Perversionen”），《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9 卷，1923 年。

奥托·兰克：

- 《倒错与神经症》（“Perversion und Neuros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8 卷第 4 期，1922 年，第 397—420 页。

英译《倒错与神经症》（“Perversion and Neurosis”），《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4 卷，1923 年。

这同弗洛伊德最初那篇文章有关；在《一个孩子挨打》[注1]以后，分析思想围绕神经症的理论发展正是从那里展开。这篇文章标志着弗洛伊德给出的信号：他自己的思想发生转向或向前迈出一步，同时也开启了后来关于倒错研究的一切。如果仔细察看当时发生的事情，你们会看到，能够给出的最佳表述只能依靠我试图在这里向你们展示的那个领域；它在症状形成中具有根本动因，即能指概念的介入。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挨打——对性倒错发生之认识的一项贡献》（“Ein Kind wird geschlage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Entstehung sexueller Perversionen”），《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5 卷，1919 年；法译收入《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巴黎，PUF，第 12 版，2002 年。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

自弗洛伊德指出这一点以后，事情便十分清楚：在倒错中，本能、驱力绝对没有任何资格被提升或宣称为比在神经症中更赤裸。汉斯·萨克斯那篇论倒错发生的文章十分出色；它要说明的是：无论所谓倒错形成采取何种形式，都具有同神经症完全相同的妥协、略去结构，以及被压抑者与被压抑者回返的辩证法。

这就是文章的要害；作者给出了完全令人信服的例子。在倒错中，始终有某种东西是主体不愿承认的——而这个“愿”在我们的语言中包含如下意义：

某种东西可以被设想为已经在那里得到分节，却不只受到主体的根本误认，还由于根本的分节理由而遭到压抑。分析机制的动力正在这里：如果主体承认它，就会同时被迫承认一系列其他东西，而那些东西对他严格说来无法忍受。

这就是压抑的手段；只有当压抑同一条得到分节的能指链相联系时，才能构想它。每当神经症中出现压抑，都是因为主体不愿承认某种会使另一件事成为必需的东西……“使其成为必需”这个词始终包含一项能指分节成分；若不放在某种话语连贯性中，就完全无法构想它［……］。

倒错完全一样。这正是 1923 年在弗洛伊德那篇文章之后，所有精神分析家都注意到的事情：如果仔细察看，倒错本质上包含完全相同的略去机制；它略去某种对自身具有根本性、属于主体同若干根本词项之关系的东西。这些词项正是我们在神经症分析中找到的根本词项，也就是俄狄浦斯词项。

如果其中毕竟存在某种差别，这个差别就值得得到极其严密的把握。它绝不能满足于如下粗略对立：

- 在神经症中，驱力遭到回避；
- 在倒错中，驱力赤裸地承认自己。

驱力确实显现，却始终只部分地显现。它显现于某种相对于

本能十分醒目的东西中——它像一个脱离出来的成分，严格说来是一个符号；甚至让我们说，是本能的一个能指。因此，上次临别时，我特别强调了例如

一整套所谓倒错幻想中的工具成分。眼下，让我们先限于这些幻想，

因为应当从具体事物出发，而不是从我们对所谓攻击性张力的“本能经济”——无论有无攻击性——及其反射、返回与折射所形成的某种一般观念出发。

这些观念并不总能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某些成分取得优先地位，不仅真正涌现，而且严格说来从倒错所采取的占优、坚持、主导形式中孤立出来；

倒错在幻想形式中如此显现，也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包含想象性满足。

为什么这些成分拥有特权位置？上次我谈过鞋，也谈过鞭子；我们无法把它们干脆归结为某种从

单纯的本能生物经济中涌现的东西。只要靠近倒错生活经验的现实，就会看见：这些孤立、工具性成分取得占优地位，而且形式明显具有过强的象征性，不可能只是受到误认的本能；它们贯穿主体生命转变始终保持恒常，也由此显示倒错的演变。

一个词项的这项恒常性——它始终重新出现，汉斯·萨克斯同样强调这一点——足以让我们再次突出如下必要性：必须承认倒错中这个能指成分是一个最终、不可化约的成分；我们必须看它在主体经济中的位置，同时仍须把它视为原初而根本的成分。

弗洛伊德从八名患者中分离出一个幻想——六名女孩和两名男孩，其神经症形式颇有差别；其中并非全是神经症，不过从统计上占了很大部分。他系统而极为细致地研究这个幻想，逐步追踪它，其审慎态度恰恰使弗洛伊德亲自从事的研究卓然有别。贯穿这些彼此十分不同的主体，他考察某个幻想在不同阶段——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阶段

——如何发生经济转变；这个幻想就是“一个孩子挨打”。弗洛伊德由此开始充分分节后来在其思想中发展为倒错研究特有时刻的东西。我要强调，这将越来越向我们显示：严格说来作为如此的能指游戏，在这项经济中何其重要。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

顺带一提，我只能指出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的一篇、他最后的文章之一——

《分析中的构造》[注2]——显示了如下概念的中心重要性：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分析中的构造》，载《结果、观念、问题》第二卷，PUF，1985 年，第 269 页；德文题为“Konstruktionen in der Analyse”（1937），英译“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主体同能指的关系绝对根本，只有凭借它，才能构想我们可以汇集的一切——这确实是弗洛伊德最后写下的文章之一——即分析中作为如此的回忆机制最终代表什么；而这个机制本质上同能指链相联系。

这一点在该文中得到充分证实。我们拥有的弗洛伊德最后一篇文章，在《论文集》中译作《自我的分裂》；我把它译成《分析症状机制中自我的分割或碎裂》。可以说，弗洛伊德就停在这篇未完成的文章上，笔从手中落下；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作品。它把自我的经济同某种可以说具有倒错性质的承认辩证法紧密联系——主体在那里面对某个主题；又把自我功能与作为如此的想象关系不可分割地打成一个结，后者关乎主体同现实的关系，并被能指机制利用和整合。

现在，让我们把握《一个孩子挨打》这个幻想。弗洛伊德停下来考察它意味着什么；主体的力比多满足即使没有全部，至少也有重要部分

仿佛被它吸收。他强调：自己在女性主体那里见到这种幻想的绝大多数案例，在男性主体那里较少；所涉不是随便哪种施虐或倒错幻想，而是最终达到并固定于如下形式的幻想，

主体起初极不情愿地说出它的主题。

主体甚至在传达这个主题时，似乎便有相当重的罪疚附着其上。一旦他揭示并给出它，便无法以任何不同方式来分节，只能说："一个孩子挨打。""有人打"意味着：对主体而言，打人的不是他；他在那里观看。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

弗洛伊德首先分析这件事在女孩想象中的发生方式，即那些向他揭示过它的女性主体。这里有一个人物；从整体特征来看，

他可以被视为"拥有权威的人物"这一系列的一员。他不是父亲；有时是一名教师、一名全能人物、一个国王或暴君。有时，故事色彩极强：

我们认出的不是父亲，而是某种对我们而言与父亲等价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给它定位；这甚至使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在幻想的完成形式中，

不满足于它同父亲的某种对应，不把它同父亲混为一谈，而把它放在父亲彼岸的某一点，放在我们小心地同实在父亲之影响区分开的父之名范畴中。

这里涉及若干儿童，一个群体或一群人，而且总是男孩。这会提出不少问题！问题当然多到我今天根本不可能全部覆盖。我只请你们参阅弗洛伊德本人这篇文章［……］，它曾刊于旧版《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 6 卷第 3—4 期。

最后遭到殴打的总是男孩，也就是同幻想主体性别相反的主体。人们可以对此作无穷思辨，试图从一开始就把它同两性竞争等主题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将在文章末尾处理这一点，以说明某些理论深刻不相容时所提出的表面理由，

例如阿德勒的理论如何解释这样的结果。

我们当然不会从这里切入，因为弗洛伊德的论证已经十分充分，而且这并非我们根本的兴趣所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弗洛伊德处理问题的方式。他给出分析结果，并为了呈现方便，先谈女孩身上发生的事情，从而不必不断开启女孩如何、男孩又如何的双重道路与二择一。

随后，他再谈男孩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对此掌握的材料也更少。他告诉我们什么？他确认了一些恒常项，并把它们报告给我们。在他看来，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幻想的变形……

我的意思是，分析研究使人能够赋予这个幻想的转变及其先行条件；总而言之，就是幻想的历史与底层条件。……他在那里辨认出若干状态，其中有些东西变化，有些东西保持恒常。

问题在于从中获得启示，看看这项细致研究的结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带着同样的精确、坚持、反复与不断处理材料的印记，直到真

正分离出他眼中不可化约的分节点；这正是弗洛伊德几乎所有著作的独特之处。

我们尤其能在《五大精神分析案例》中看到这一点，也能在那部令人赞叹的《狼人》中看到：他不断返回同一主题，严格寻找主体历史中原初链条的象征起源与实在起源各自占据的部分。这里完全一样，他为我们分离出三个阶段、三个时刻。他告诉我们，在女孩那里，人们总会在这种情形中找到第一个阶段：分析到某一时刻，遭到殴打的儿童会在一切案例中揭示其存在与真实面目——那是一个同胞，即兄弟或姐妹。因此，父亲打的是小弟弟或小妹妹。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意指十分清楚地位于两个层面。

他问，这个幻想的意指是什么？十分醒目的是，弗洛伊德此时写下如下断言：我们无法说这里所涉究竟是性欲之物还是施虐之物。他说——并像往常一样引入文学参照，即《麦克白》中一名女巫对班柯的回答[注3]——这个东西由性欲与施虐后来都会从中产生的同一种材料构成。

> [注3] 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一幕第三场。第一女巫："比麦克白卑微，却也更伟大。"第二女巫："没有他幸运，却远比他幸运。"第三女巫："你虽不是国王，却会生下国王。"

我们恰恰来到弗洛伊德在不久后发表的《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中所界定的东西：它真正联系着这个第一阶段，迫使我们设想在某处存在某个点……我们目前的位置绝对要求如此；这是 1923 年，也就是《超越快乐原则》以后。……我们必须认为，在原初状态中，至少对一个重要部分而言，存在

本能融合，即力比多本能、生命本能同死亡本能的结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融合属于原始状态；由此，本能演变便被设想为包含或早或晚的本能去融合。

主体演变中的某些占优情形或停滞，被归因于本能去融合过早，例如死亡本能过早孤立出来。

可是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强调：这个原始幻想的意指位于古老层面。正因为父亲一侧——幻想没有更高、更早的古老阶段——拒绝并否认这个儿童……也就是幻想中遭父亲虐待的小弟弟或小妹妹……正因为爱的关系遭到揭除，儿童受到羞辱，这个主体才在其主体存在本身上成为幻想瞄准的对象。他之所以遭受虐待，是因为这些虐待否认他作为主体的地位，

把他作为欲望存在的生存化为乌有，把他化约为某种趋向于把他作为主体废除的东西。

这就是原始幻想的意义：我父亲不爱他。让主体感到快乐的，正是另一个人不被爱；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在严格的象征关系中得到确立。父亲的介入正是通过这条动力、这条偏转道路

取得对主体最初、最根本的价值；后续一切都将取决于它。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第二个时刻……

考察它并不比第一个时刻的分节次要。第一个时刻在分析中重新找到，而另一个时刻——他说——从不会在那里出现……

……必须得到重构。

我要强调并请你们停留的，是弗洛伊德推论与断言的惊人分量，因为这才重要。我们不能只是任其引导、或多或少蒙着双眼追随他；必须看见他所说之话的幅度：第二个时刻必须得到重构。眼下，先不要停下来判断这是否合法。

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是看见弗洛伊德做了什么、要求我们做什么；他的整个构造正因此才能继续。第二个时刻如下：这个幻想诞生于一种三角关系。我再说一遍，必须把它视为古老而原始的关系；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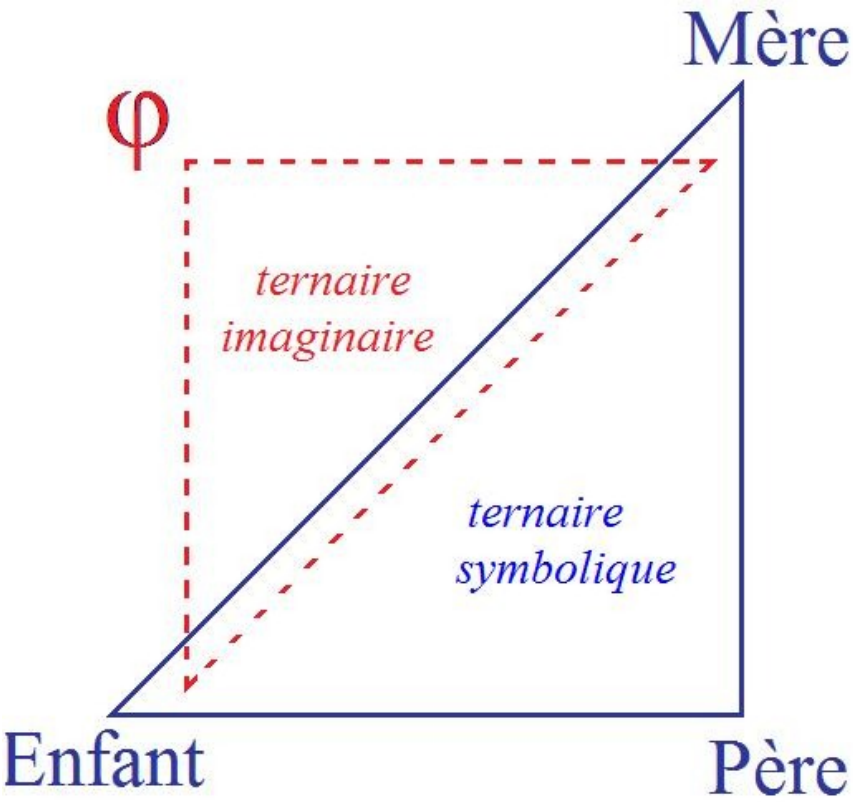
它不是主体、母亲和儿童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体、作为弟弟或妹妹的儿童以及父亲之间的关系。我们尚在俄狄浦斯以前，父亲却已经在那里。

第二个时刻同作为如此的俄狄浦斯关系相联系——这里我说的是小女孩——也具有小女孩同父亲之特权关系的意义。遭到殴打的是她自己；分析材料围绕这一点汇聚，迫使人们重构幻想的这个状态。不过，弗洛伊德说，这个幻想从未在记忆中出现。相反，小女孩欲望成为父亲欲望对象的时期包含罪疚；弗洛伊德承认，这项俄狄浦斯欲望怀着罪疚回返，可能迫使她在这个只能被重构的幻想中，把自己变成惩罚对象。

弗洛伊德在这里也谈到退行。也就是说，因为这项讯息无法在主体记忆中重新找到，因为它遭到压抑，一项在此被他称为退行的相关机制，可能使主体诉诸这项较早关系，在一个从未公开显现的幻想中表达自己当时同父亲的关系；这项关系坦率地具有力比多性质，已经依照俄狄浦斯模式得到构造。

到了第三个时刻，走出俄狄浦斯以后，只会留下这个一般图式；其中发生了双重的新转变：父亲形象被越过、移置并转化为一般的打人者形象——能够殴打、处在殴打位置上的全能专制人物；主体自己则由这些成倍增加的儿童来呈现。他们甚至不再同主体属于相同性别，而是形成一系列中性的儿童。

某种东西可以说在幻想的这个最终形式中得到维持、固定与记忆；它后来将始终被主体投注以如下属性：构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意象，主体严格意义上能够经验到的生殖器满足将在它上面找到依托与支撑。这毕竟值得我们停下思考。那么，在图式中，我试图教给你们初步用法的那些词项能够表征什么？




我重新拾起想象三角与象征三角。儿童同母亲之关系的全部最初象征化辩证法，就可被意指、也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而言，是由如下关系构成的。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事情：母亲确实能够作为乳房的承载者出现，并给儿童带来某些直接满足。

可是，如果只有这一点，主体同母亲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发展或辩证法，整座建筑也不会有任何开口。后来，主体同母亲的关系不只是满足或挫折的关系：

- 它由发现母亲欲望的对象构成；这一点对一切理解都至关重要，我后面说的一切都会证明它。

- 它首先由承认母亲的欲望是什么构成。

正因为如此，一个问题贯穿全部分析史的理论与实践：在构成母亲欲望对象的事物中，为什么这个特权位置……也就是从必须在人类历险中构成自身的主体、从我们谈到的这个小孩子出发而呈现的所指世界，以及他必须作出的发现……为什么在那些对母亲意指其欲望的东西中，阳具会发挥享有特权的功能？

当你们阅读琼斯关于阳具期的文章，会看到弗洛伊德的这个断言造成何等深不可测的困难：对两个性别而言，都存在一个绝对独创、根本而同其性发展紧密相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任何一方而言，他者作为欲望之他者的主题都同拥有阳具绝对相连。几乎所有围绕弗洛伊德的人都无法照字面在某个领域中理解这一点；可是事实迫使他们在分节主体历史所发生的某些东西时仍把它塞进去，因此他们费尽扭转之能事。

他们没有理解，弗洛伊德在那里设立的是一个枢轴能指；主体必须赢取自身、赢取其本有存在的整个辩证法都围绕它旋转。正因为没有理解这里所涉是一个能指，而不是别的东西，评论者们才筋疲力尽地试图重新找到……

以无数痕迹的形式；这些痕迹当然对应于他们彼此不同的经验……

……某种与它等价的东西，即主体在某处以相信阳具的形式抵御的现实。他们当然由此汇集一大堆十分有效的事实，却始终只把它们变成一个案例或一条特殊道路；这仍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享有特权的特殊成分，会被选作防御的中心与枢轴。

如果你们仔细阅读琼斯如何说明相信阳具在男孩发展中的功能，就会发现他处理的尤其是同性恋者层面的发展；它远非一般发展。这里所涉的，正是最一般的形式；只有赋予阳具如下功能，才能设想这个最一般形式……请允许我给出一个在你们看来也许十分大胆的表述。不过，如果你们愿意暂时

以紧缩形式承认它，把它用于操作，我们就不必反复返回。我曾告诉你们：

在能指系统内部，父之名以某种方式发挥整个能指系统的功能；它意指并授权能指系统存在，使它成为法则。

我要告诉你们：在能指系统中，当主体必须把所指本身——在能指同所指的对立中——加以象征化时，阳具经常开始发挥作用；

我的意思是，把意指象征化。对主体重要的东西、他欲望的东西、作为被欲望之物的欲望、主体所欲望之物——当神经症或倒错主体必须把它象征化时——归根结底照字面要借助阳具。

一般所指的能指，就是阳具。

这一点至关重要：

- 如果从这里出发，你们会理解许多东西；
- 如果不从这里出发，你们理解的东西会少得多，而且将被迫作出极大迂回，才能理解格外简单的事情。

主体初次面对母亲欲望时，这个阳具从一开始便作为如此开始发挥作用。它受到遮蔽，而且将永世受到遮蔽，理由很简单：它是能指同所指关系中的最终能指。归根结底，它几乎没有机会以不同于其能指本性的方式揭示自身；也就是说，它永远只真正作为能指揭示自己所意指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来到如下问题：请想想在弗洛伊德恰恰考察、而我们至今没有考察的案例中会发生什么。如果有某种比任何想象之物都更难分节、更难象征化的东西介入这个位置——即在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的这个第一阶段中，一个实在主体介入——会发生什么？

此时，母亲的欲望不再只是神秘寻找的对象；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在这场寻找中勾勒阳具这个符号，随后当然要让这个阳具投入象征界之舞，也就是让它成为阉割的确切对象，再以另一种形式返还给自己，从而使它成为一开始所谈的那种东西。它确实如此；但我们现在处在最初，处在主体面对母亲欲望所在之想象位置的时刻，而这个位置已经被占据。

我们无法同时谈论一切；而且幸好我们没有立刻想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它在触发神经症时具有决定性作用……只要稍有分析经验，就知道弟弟或妹妹的出现对任何神经症的演变都真正构成一个交叉

点。……可是，如果首先停在那里，这对我们的思想恰好会产生它在神经症主体那里造成的同样效果：一旦立即停在这项现实关系上，我们就会彻底看不见这项关系的功能。

也就是说，这项关系来到本来要求完全不同发展——即象征化发展——的位置上，使它复杂化并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因此，同弟弟、妹妹或任何竞争者的这项关系才取得决定性价值。那么，在这里这个同所谓受虐幻想相联系的幻想性解决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曾分节其本性的东西：这个主体在象征层面遭到废除。

儿童在这个特殊案例中找到鞭打幻想，是因为对方什么也不是，是某种被拒绝作为主体来考虑的东西；正是在这个名义上，并且只要儿童

在这个层面成功找到问题的这项解决。

我们只需限于事情如此发生的案例，并理解在那里发生什么。这里确实涉及一项象征行动，而弗洛伊德强调得十分清楚：发生在这个儿童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主体自己身上——他以为自己在家庭中算个人物。弗洛伊德说，只需一个耳光，就常常足以把他从全能之巅打落。

这确实是一项象征行动。我要说，幻想中开始发挥作用的形式本身——鞭子、细杖——带着某种东西的特征与本性；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它在象征层面由一道划线表达，由某种划掉主体的东西表达。

在成为任何其他东西以前，它是一种［……］，随便哪种［……］，或某种可以归因于

主体同受苦者之某种身体关系的东西。在一切以前，是某种把他划去、把他横杠起来、把他废除的东西；一个能指之物介入了。

这一点如此真实，以至于儿童后来实际遇见殴打行动时——这一切都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我正逐行跟随——也就是在学校看见一个儿童当面挨打时，弗洛伊德只是依据那些同一主体的经验；他正是从他们那里提取这个幻想的历史——

儿童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我的意思是，这会在他身上激发某种被法译本错译为“想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厌恶，一种把头转开。

［“一个孩子挨打”这个幻想表象一贯受到高度快乐投注，并最终导向一项令人愉悦的自体性欲满足行为；因此，人们或许会期待，在学校观看另一个儿童挨打，同样会成为类似享受的来源。然而，事实从来不是这样。旁观儿童亲历学校中的真实殴打场景时，会产生一种奇特而激动、或许混杂的感受，其中拒斥占据很大部分。］

主体被迫忍受这场景，却同它毫无关系，并同它保持距离。面对真实的鞭打场景时，主体远未参与实际发生之事。幻想中也一样——弗洛伊德谈到并十分精确地指出：幻想本身的快乐显然同其不严肃、无实际效力的性质相联系；可以说，它不损害主体的实在或身体完整性。从起源处起，受到性欲化的恰恰就是它作为如此的象征性质。

第二个时刻——这对评价我上次引入的图式很重要——如下：这个幻想在第二个时刻将取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而这恰恰是谜，是整个谜。

这是受虐狂的本质。它在于这个幻想本身的意义发生变化：曾被用来否认爱的某种东西，为什么恰恰会成为用来意指爱的东西？

当所涉是主体自己时，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僵局。我不是说它容易被把握为已经得到解释、得到展开的东西。首先必须坚守事实——事情就是如此——随后努力理解它为什么可能如此。

换言之，为什么这个根本能指一经引入，便分成两种东西：

- 一项讯息："挨打的儿童"。主体收到消息：小竞争者是一个挨打的儿童，也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是、谁都可以坐到他身上的东西；
- 此外，还有一个必须作为如此单独分离的能指，即：人们用什么东西来做这件事。

在现存主体那里，受虐幻想实际存在的根本特征，并不是什么重构出来的本能演变理想模型。根本特征是鞭子的存在；这本身值得我们注意，并使我们把它视为一个能指——在我们那一系列象形文字中，它理应拥有特权位置。首先，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们观察象形文字，就会看到它确实拥有特权位置；自古以来，握鞭子的人就是指导者、统治者（governator）、主人。

所涉正是这一点；不能忽视它存在，而且我们面对的就是它。到了第二个时刻，它同样在双重性中显现讯息——不过，是一项没有抵达主体的"我父亲打我"的讯息。弗洛伊德此时的话应当这样理解：那项曾在某一时刻意指——

"竞争者不存在，他什么也不是。"

——的讯息，如今又意指：

“你存在，而且你甚至受到爱。”

它此时就是这样发挥讯息作用；姑且说，它采取退行或压抑形式，不过这无关紧要。它毕竟充当讯息，却是一项没有抵达的讯息。我们应当停留在这个谜样时刻，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这是受虐狂的全部本质。

从弗洛伊德开始着手、从根本上攻克作为如此的受虐狂问题——也就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从他追问受虐狂的根本价值之时起，这个被他当作根本反对者和敌人而遭遇的受虐狂，就迫使他以不同词项来设定它。弗洛伊德写作《超越快乐原则》三年后说，受虐狂的全部本质就在这里；这绝非偶然。

这值得我们停下来。即使要逐步推进，也必须先看见悖论，看清它在哪里。我们在此拥有那项没有抵达主体位置的讯息；反过来，唯一作为符号留下的，是能指材料——鞭子这个对象留下来了。

它作为符号一直留到最后；而且由于始终作为符号留下，它成为主体同他者欲望之关系的枢轴，我甚至几乎要说成为其模型。因为最终留下的幻想——此时主体无限增殖，充分表明它具有一般性——意味着如下关系：我同他者、众他者、众小他者、同小写 a 的关系，只要是一项力比多关系，就同这件事相联系：作为如此的人类都处于鞭笞之下；对人类而言，进入欲望世界，首先就是承受来自某种存在于彼岸之物的作用。我们是否把它称为父亲已不再重要；随便怎样称呼，它就是法则。这向我们显示：在一个无疑通过特殊道路进入此事的特定

主体那里，某条演变线如何得到界定；最终幻想的功能就是显现主体同能指的根本关系。

现在，让我们再向前一步，回想弗洛伊德围绕受虐狂带给我们的东西。请回想《超越快乐原则》为弗洛伊德思想演变引入的新东西是什么。它本质上以如下评论为基础：如果考察主体对某种治疗性、规范性、正常化介入的抵抗或惰性方式，我们便不得不把快乐原则绝对地分节为一切生命之物返回无生命状态的倾向。力比多演变的最终动力，就是返回石头的静止。

弗洛伊德带来的正是这一点；而它在此前一直让力比多概念支配自身思想的人那里造成最大震动。按照我刚才的表述，它既显得悖谬地新颖，甚至令人震惊；不过，它也只像是

人们曾作为快乐原则之法则本身给出的东西的一种扩展：快乐的特征是张力回归零点。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彻底地回归零点。不过，你们同时可以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表述作为快乐的最终原则。

可是，为了作出区分，我们仍不得不称它为超越快乐原则。

这是弗洛伊德一生及其人格中最奇特的问题之一。他同女性的关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返回；对于围绕自己的女性群体——那些延续或协助其思想的女性——所给出的［意见、建议或提示？］，他有一种相当可叹的接受倾向。这个群体其实十分符合他自身的生活：生活中极少有女性，或主动剥夺自己与女性的关系。

人们几乎只知道弗洛伊德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他的妻子，以及生活在这对夫妻阴影中的那位妻妹［明娜·伯奈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其他爱情关系留下痕迹。可是，只要芭芭拉·洛这样的人提出一个——请允许我说——如此不甚合适的词，即“涅槃原则”，弗洛伊德就会予以认可。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涅槃同返回无生命自然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粗略，

而弗洛伊德满足于此，我们也不妨如此。如果涅槃原则是生命演变本身的规则与法则——弗洛伊德承认这一点——那么某处就必须存在一个装置，使人至少有时感到快乐的不是快乐的下降，而恰恰是快乐的上升。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他正是在这里作出表述。他说：“我们完全无法说出为什么。”它应当类似一种暂时的节律，一种词项之间的协调。他让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出现在地平线上；如果这种解释能够给出，当然不会含混，但无论如何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总而言之，它更朝向

音乐、天体和声与搏动的方向。

无论如何必须注意：一旦我们承认快乐原则就是返回死亡，那么我们具体面对的实际快乐便要求另一类解释。这种解释只能诉诸生命中的某种装置：可以说，它让主体相信自己待在那里确实是为了快乐。由此，我们又回到最平常的哲学论题：摩耶之幕之所以让我们活着，只因为它欺骗我们。

随后，在此彼岸，主体为了抵达这项或这些快乐，还可能借助现实原则作出各式迂回。这就是超越快乐原则；为了修改并说明所谓负性治疗反应的存在，弗洛伊德需要的绝不少于这一整套东西。

相关知识卡 负性治疗反应

不过，我们仍须在这里稍停片刻。毕竟，负性治疗反应并不发生在主体某种无张力反应的层面；它通过各式格外麻烦、碍事而又得到分节的东西表现，通过主体给我们和其周围人制造的种种危机表现。

相关知识卡 负性治疗反应

换言之，就存在者所遭遇的命运而言，这个过程看来仍是其中得到最佳安排的一种。终结俄狄浦斯戏剧的是某种得到分节的东西。我要说，当俄狄浦斯最终把它分节为其悲剧的终点与结局、向我们给出全部悲剧历险最终达到顶峰的意义时，这件事远没有废除他，反而使他永恒化。理由很简单：如果俄狄浦斯无法最终说出它，他就不会成为那个至高英雄；而恰恰

因为他最终把它分节出来，才成为这个英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他使自己长存。

在弗洛伊德通过超越快乐原则向我们发现的东西中，也许确实存在趋向静止与永恒死亡的这个最终项。不过我要提醒你们——这就是我第二年研讨班的全部意义——我们之所以面对它，是因为它让自己得到

承认：它在我们面对的最终抵抗中得到分节，而这些主体或多或少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曾是不被欲望的儿童：

- 表现在那股不可抵抗的自杀倾向中；
- 表现在负性治疗反应完全特殊的性质中。

恰恰随着那些本应使他们更接近自身主体历史的东西得到越来越清楚的分节，他们也越来越拒绝加入游戏；他们照字面想退出。他们不接受自己的所是，不要这条能指链——母亲当初只是勉强允许他们进入其中。

相关知识卡 负性治疗反应

不过，对我们分析家而言，这个东西只以它在

其他地方完全相同的方式存在：它不只是获得承认的欲望，还是对一项欲望的承认[注]——某种得到分节的东西。能指是其根本维度。主体越借助能指确认自己想要退出，就越重新进入并整合进这条能指链，越把自己变成能指链的一个符号。如果他废除自己，他会前所未有地

成为符号，理由很简单：主体恰恰从死亡之时起，才成为他人永恒的符号；自杀者尤其如此。因此，自杀同时具有：

> [注] désir de reconnaissance 是“获得承认的欲望”，而 reconnaissance d’un désir 是“对一项欲望的承认”。原文在这里正面并列两种属格关系，后者又由“某种得到分节的东西”加以限定；二者不能都压缩成含混的“承认欲望”。

相关知识卡 获得承认的欲望与对一项欲望的承认 · 负性治疗反应

- 一种“恐怖之美”，使人类如此严厉地谴责它；
- 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美；自杀流行在经验中是再确凿、再真实不过的东西。

因此，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再次把重音放在获得承认的欲望本身上；它构成我们同主体之关系的根底。归根结底，弗洛伊德所谓超越快乐原则中是否还有别的东西，也就是主体同能指链的这项根本关系？因为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按照我们目前的认识，诉诸无生命自然的一种所谓惰性，来给我们提供生命所欲趋向之物的模型；可是，把它当作生命欲趋向之物的模型——这一点应当让我们略微发笑——把它当作回归虚无的模型，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确定。

相关知识卡 获得承认的欲望与对一项欲望的承认

况且，弗洛伊德自己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里重新提到自己的《超越快乐原则》时，也在一小段括语中向我们指出这一点；请你们找出那段话。无生命自然被设想为返回

最低张力层级与静止的东西。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对此已经稍有所知：那幅所谓图景把某种已经升起并成为生命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没有什么向我们表明其中不会仍然有所运动。我没有凭空引出或

外推位于根底的这项存在之痛；弗洛伊德把它标示为必须视为塔纳托斯（Θάνατος）同厄洛斯（Ἔρως）之结合的最后残余。

毫无疑问，塔纳托斯通过主体对周围事物的运动性攻击获得释放。自然在那里，但仍有某种东西牢固系于其内部；这项存在之痛在弗洛伊德看来真正具有根本性质，同生命存在本身相联系。按照我们对自然所知的一切，没有什么证明这项存在之痛会止于生物；自然的发酵、腐败、沸腾、运动乃至爆炸，远远超出我们此前的想象。不过，主体被要求在能指中构成自身，有时又拒绝如此并说："不，我不做这条链的一个成分。"——主体同能指的这项关系，反而是我们亲手触及的东西，而且确实就是根底。但这里的根底、反面，恰好就是正面。

因为，每当主体以某种方式拒绝偿还一笔并非自己订下的债时，他在做什么？

他无非使这笔债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通过接连拒绝让这条债务之链重新弹起，他总会更加系于这条能指链。弗洛伊德向我们显示，无意识以症状性重演形式显现的一切，其最终作用正是通过永远必须重复同一项拒绝来发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要理解能指一经引入后其价值何以从根本上具有双重性，所需绝不少于这一切。

我的意思是，主体自身如何能够感到自己作为欲望受到影响。毕竟，在这里是他，不是大他者，不是拿着鞭子的大他者；主体遭到废除，但"他"在接触想象的、当然也具有能指性的鞭子时，感到自己作为欲望受到某种东西的排斥，而后者又通过亵渎他来确认并赋予他价值。受虐幻想中始终有这种贬损、这种亵渎的面向，同时又标示承认的维

度。同受禁主体、同父亲主体的这种关系，恰恰构成主体幻想中遭误认部分的根底。

请注意，能指一经引入，便拥有这个根本的双向面向。而主体之所以更易抵达这里，还因为一项我为了照顾你们的小脑袋，至今没有在图式中纳入考虑或投入运作的东西。上次，当我引入平行线 $i \underset{\rightarrow}{} m$ 时，产生了骇人的复杂情形；这条线表示在某一时刻存在

身体自身的意象以及主体的自我。

可是，我们显然不能误认这一点。这个竞争者当然不是干脆在三角关系中作为母亲的根本障碍介入。《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那段文字告诉我们：幼小婴儿看见乳兄在母亲乳房前，会泛起一种致命的苍白。

这里确实有某种对主体而言根本、真正致命的东西；这段文字表达得十分清楚。不过，还存在对他者的认同这个词项。换言之，主体同他者的任何意象相联系的根本歧义性质，自然地构成了主体的入口。它把主体引入

竞争者的位置；后来，同一项讯息会抵达他这个此刻处在那里的人那里，而且只因为它是一项讯息，就取得完全相反的意义。

我们随后会看到如下关系，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所涉是什么：只要这项关系的一部分同作为如此的主体自我建立联系，后续幻想便能取得自身的组织与结构。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他者绝非偶然地位于这个维度——即从原始母亲对象到主体意象之间，现实得以构成的一整套中介范围——因为他们是意指性对象、即鞭子的支撑者。

此时，幻想在其意指中——我是说，幻想作为挨打的儿童——成为同大他者的关系。主体要受到这个大他者的爱，而自己归根结底没有作为如此得到承认。这项关系位于象征维度中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某处，而且幻想实际上确实在两者之间摆动。

今天，我让你们走过一条不比上次轻松的道路。请等到以后我能够继续说明，再检验它的价值与有效性。为了用一点提示性的音符结束，并把这些词项引向应用，我要向你们指出：在分析中，人们通常认为男人同女人、尤其女人同男人的关系包含女性一方的某种受虐狂。这是典型的视角错误之一；我们总被某种滑移带进经验的混淆或窠臼。

受虐者在同伴侣的关系中表现出某些典型女性位置的符号或幻想，并不反过来证明女性同男性的关系是一项受虐关系。我的意思是，把女人同男人的关系设想为某个挨打之人的关系，也许确实是男性主体的视角——只要他对女性位置感兴趣。

但是，男性主体从某些视角——无论来自自身还是临床经验——觉察到采取女性位置同某种或多或少涉及主体位置之能指的东西相联系，并不证明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根本而构成性的女性位置。

我顺带作出这项评论：围绕所谓女性受虐狂——弗洛伊德自己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中以此词引入——作出类似修正极为重要。我完全没来得及触及本来要向你们谈的阳具同喜剧的关系，对此很遗憾；我会留到下次见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挨打》］

（对性倒错发生之认识的一项贡献）

（1919）

一

因癔症或强迫性神经症而寻求分析治疗的人，承认自己有“一个孩子挨打”这个幻想表象的频率高得令人惊讶。它很可能更常见于另一些人，只是他们没有因显性疾病而被迫决定接受治疗。

这个幻想同快乐感相连，因此已无数次得到重演，或至今仍不断重演。在想象情境达到顶点时，几乎总会出现一项带来快乐的手淫满足——因而发生在生殖器上；最初是主体有意为之，后来即使主体不愿意，它也同样取得强迫性质。

主体只会迟疑地承认这个幻想，对它最初出现的记忆并不确定；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分析治疗时，会遭遇毫不含混的抵抗。相较于传达性生活中其他类似的早期记忆，羞耻与罪疚感也许会在这里更强烈地被激起。

最终可以确认，这类最初幻想在极早时期已经受到培养：必定早于入学，早在五六岁时。如果儿童在学校目睹其他儿童被教师殴打，这项经验就会重新唤起已经沉睡的幻想，强化仍然存在的幻想，并以明显方式修改其内容。从那以后，挨打的是“数量不定的许多”儿童。学校的影响如此明显，以至于相关患者起初很容易把鞭打幻想完全归因于六岁以后学龄期的这些印象。然而，这种解释从来无法维持；幻想早在此前已经存在。

到了更高年级，殴打儿童的场景消失，阅读很快产生重要性，并且绰绰有余地替代了它的影响。在我的患者所处环境中，他们几乎总从同

一批青少年可以接触的书里，为鞭打幻想取得新刺激：所谓《粉红文库》《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等。儿童自己的幻想活动开始同这些文学作品竞争，发明出丰富的情境与制度：儿童因顽劣和不守规矩而挨打，或以其他方式受到惩罚和管教。

“一个孩子挨打”这个幻想表象一贯受到强烈快乐投注，并最终导向一项带来快乐的自体性欲满足行为；因此，人们或许会期待，在学校观看另一个儿童挨打，同样会成为类似享受的来源。然而，事实从来不是这样。旁观儿童亲历学校中的真实殴打场景时，会产生一种奇特而激动、很可能混杂的感受，其中拒斥占据很大部分。在一些案例中，真实经历殴打场景甚至被感受为无法忍受。况且，即便后来那些精心编织的幻想，也始终保留一个条件：受罚儿童不得受到严重伤害。

必须提出如下问题：鞭打幻想的意指，同真实体罚在儿童家庭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关系？由于材料具有单向性，最直接的假设——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无法得到证明。为这些分析提供材料的人，童年时极少挨打；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是靠棍棒教育长大。当然，每个儿童毕竟都曾在某个时刻感受到父母或教育者占优的身体力量；儿童之间的打斗从未在任何儿童房里缺席，这一点无须特别强调。

研究希望对那些没有明显指向学校印象或阅读场景的早期简单幻想了解更多。挨打的儿童是谁？是幻想者本人，还是陌生儿童？总是同一个儿童，还是每次随意换成另一个？谁在打这个儿童？一个成人吗？若是成人，又是谁？还是儿童幻想自己打另一个儿童？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澄清性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胆怯的答话：“我已经什么也不知道了；一个孩子挨打。”

询问挨打儿童的性别会取得更多结果，却仍未带来理解。有时回答是："始终只是男孩"，或者"只是女孩"；更多时候则说："我不知道"或"没有区别"。提问者想找的东西——幻想者的性别同挨打儿童性别之间的恒常关系——从未出现。偶尔，幻想内容中还会显出一个颇有特征的细节："小孩子的光屁股挨打。"

在这些条件下，人们甚至暂时无法判断：附着于鞭打幻想的快乐，应当称为施虐性的还是受虐性的。

二

依照我们迄今的认识，对这样一种也许因偶然诱因在幼儿期涌现、随后被保留下来服务于自体性欲满足的幻想，只能作如下理解：这里涉及倒错的一项原初特征。性功能的某个组成成分在发展中走到了其他成分前面，过早取得独立、形成固着，因而脱离后续发展过程；这也由此证明主体具有一种特殊的异常构成。我们知道，这种幼儿倒错不一定终生保留；它后来仍可能遭到压抑，被反向形成替代，或通过升华发生转变。（不过，升华也许源于另一种特殊过程，而这个过程会受到压抑阻碍。）如果这些过程没有发生，倒错便会保留在成人生活中；每当我们在成人那里发现一种性偏离——倒错、恋物癖或倒置——就有充分理由期待通过病史研究，揭示童年时期这类造成固着的事件。早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比奈等观察者已经能够把成年期奇特的性偏离追溯到五六岁这些童年岁月中的印象。当然，人们在这里碰到理解的界限，因为这些造成固着的印象并不具有任何创伤力量；它们大多平淡无奇，对其他个体也并不激动人心。人们无法说明为什么性努力恰恰固着于它们。不过，可以认为它们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为那个过早成熟、随时准备跃出的性组成成分提供了一个偶然的依附

契机；而且，人们本来就必须预料，因果联结之链会在某处暂时终止。先天构成恰好看来满足了作为这样一个终止点的一切要求。

如果过早脱离出来的性组成成分是施虐性的，那么根据在其他地方获得的洞见，我们会预期：它后来遭到压抑，将由此形成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不能说研究结果同这项预期相矛盾。这篇短文以六个案例——四名女性、两名男性——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其中有强迫性神经症案例，一例极其严重、摧毁生活，一例中度且十分容易受到治疗影响；还有第三例至少表现出若干明确的强迫性神经症特征。当然，第四例是伴有疼痛与抑制的纯粹癔症；第五例只是因为生活中优柔寡断而寻求分析，粗略的临床诊断根本不会给它分类，或者只会以“精神衰弱”打发。人们不应对这项统计感到失望：第一，我们知道，并非每项倾向都必然进一步发展为疾病；第二，说明已经存在的东西应当足够，我们通常可以免于同时解释为什么某种东西没有形成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洞见只允许我们把对鞭打幻想的理解推进到这里，无法更远。当然，当分析医生不得不承认这些幻想通常游离于神经症的其他内容、在其结构中找不到恰当位置时，会隐约感觉问题并未就此解决。不过，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人们通常乐于忽略这种印象。

三

严格说来——而且为什么不尽可能严格？——只有成功解除遗忘的分析工作，才配得到正确精神分析的承认；这项遗忘遮蔽了成人对其童年生活最初时期——大约两岁到五岁——的认识。在分析家之间，对这一点再怎样大声说、再怎样反复说也不过分。忽略这项告诫的动机当然可以理解：人们想用更短时间与更少努力取得有用成果。然而目

前，理论认识对我们每个人仍远比治疗成功重要；忽视童年分析的人必定会陷入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强调最早经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低估后来经验的影响；不过，后来生活的印象已经在分析中借患者之口说得足够响亮，童年的权利却必须先由医生代为发声。

从两岁到四五岁的童年时期，是先天力比多因素初次被经验唤醒，并同某些情结相联系的时期。这里讨论的鞭打幻想，只在这段时期末尾或结束以后出现。因此，它们很可能拥有一段前史，经历过某种发展，对应的是最终结果，而不是最初表现。

分析证实了这项猜测。持续应用分析表明，鞭打幻想拥有绝不简单的发展史；在此过程中，它的大多数方面不止一次发生变化：同幻想者的关系、对象、内容与意指。

为了更容易追踪鞭打幻想中的这些转变，我现在允许自己把描述限于女性主体；无论如何，她们在我的材料中占多数（四比二）。男性的鞭打幻想还连接着另一个主题，我想在这篇短文中将它搁置。我会努力避免超出呈现平均情形所不可免的图式化。日后观察即使显示出更丰富多样的关系，我仍确信自己把握了一个典型而且并不罕见的事件。

女孩鞭打幻想的第一阶段必定属于十分早的童年。其中一些方面奇特地无法确定，仿佛无关紧要。患者第一次传达时给出的贫乏信息——“一个孩子挨打”——对这个幻想而言看来是恰当的。然而，另一些方面能够得到确定，而且始终指向同一意义。挨打的儿童从来不是幻想者，而总是另一个儿童；如果有同胞，大多就是弟弟或妹妹。由于这既可能是兄弟，也可能是姐妹，幻想者与挨打儿童的性别之间便

无法形成恒常关系。因此，幻想必定不是受虐性的；人们也许想称它为施虐性的，却不能忽略：进行幻想的儿童自己也从来不是打人者。实际打人的人物起初并不清楚；只能确定他不是另一个儿童，而是成人。这名不确定的成人后来被清楚无误地辨认为（女孩的）父亲。

因此，“父亲打这个儿童”这句话完整再现鞭打幻想的第一阶段。如果改说“父亲打我所憎恨的儿童”，我就提前泄露了许多以后才会显示的内容。况且，人们也许会犹豫：是否已经可以把后来鞭打幻想的这个前阶段称为“幻想”？它也许更像对目睹过之事的记忆，或者不同场合出现的愿望；不过，这些疑问并不重要。

从第一阶段到下一阶段之间发生了巨大转变。打人者虽然仍是父亲，但挨打的儿童已经换了，始终变成幻想儿童自己；幻想受到强烈快乐投注，并且填入一个意指深远的内容，我们以后会讨论它如何派生。现在它的文字表达是：“我被父亲打。”它无疑具有受虐性质。

第二阶段是一切阶段中最重要、后果最深远的。不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从未拥有实在存在：它在任何案例中都不被回忆，从未进入意识。它是分析的构造，却不因此少一分必然性。

第三阶段又同第一阶段相似，采取患者传达中那个熟悉的文字表达。打人者从来不是父亲；他要么像第一阶段一样保持不确定，要么典型地由父亲替代者（教师）占据。幻想儿童本人不再出现于鞭打幻想。面对追问，患者只会说：“我大概在旁边看。”挨打的不再是一个儿童，而通常是许多儿童。在女孩的幻想中，绝大多数时候挨打的是男孩，而且不是她认识的具体个人。最初简单而单调的挨打情境，可以经历最丰富的变动与修饰；殴打本身也可以由其他形式的惩罚和羞辱

替代。不过，即使这个阶段最简单的幻想，也通过如下根本特征同第一阶段区别开来，并同中间阶段建立关系：幻想现在承载一股强烈而毫不含混的性兴奋，并由此带来手淫满足。可谜恰恰在这里：陌生、未知男孩挨打这个如今具有施虐形式的幻想，究竟通过什么道路成为小女孩力比多努力从此持久拥有之物？

我们也不隐瞒：直到现在，鞭打幻想三个阶段之间的联系与先后次序，同它的其他一切独特性质一样，仍完全无法理解。

## 四

如果分析进入鞭打幻想所定位并从中得到回忆的早期岁月，就会看到儿童卷入其父母情结的激动之中。

小女孩充满柔情地固着于父亲，而父亲很可能已竭尽所能赢得她的爱；与此同时，她播下了仇恨母亲并同其竞争的种子。这种态度同一股温柔依恋之流并存，日后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楚地进入意识，也可能推动她形成对母亲过度强烈的反应性爱恋。然而，鞭打幻想并不连接母女关系。儿童房里还有其他儿童，只大或小几岁；人们出于各种理由不喜欢他们，主要因为必须同他们分享父母的爱，于是会以这些年龄的情感生活所特有的全部狂野能量把他们推开。如果对方是年幼同胞——我的四个案例中有三个如此——人们不只憎恨，还会鄙视他；却又不得不眼看着他吸引那份柔情，而盲目的父母总为最年幼者备好这份柔情。儿童很快明白，即使不太疼，挨打也意味着爱遭拒绝与一种羞辱。许多以为自己稳坐于父母不可动摇之爱王座上的儿童，只挨一下便会从想象全能的一切天堂跌落。因此，

无论是否真看见父亲打过这个可恨的儿童，想象父亲打他都会带来愉悦。它意味着："父亲不爱另一个儿童，他只爱我。"

这就是鞭打幻想第一阶段的内容与意义。幻想显然满足儿童的嫉妒，同他的爱情生活相联系，同时也受到其自我利益的有力支撑。因此，能否称它为纯粹"性欲性的"仍有疑问；人们也不敢称它"施虐性的"。我们知道，越接近起源，我们惯于据以区分的所有特征就越趋于模糊。也许可以仿照三位命运女神对班柯的许诺来说：它不确定是否具有性欲性质，本身也不是施虐性的，却是后来两者都将从中形成的材料。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假定，这个幻想的第一阶段已经服务于某种兴奋，后者学会借助生殖器在手淫行为中释放。

在乱伦爱恋这种过早的对象选择中，儿童性生活显然达到了生殖器组织阶段。这在男孩那里更容易证明，但在小女孩那里同样不容怀疑。某种对日后最终、正常性目标的预感支配着儿童的力比多努力；人们完全可以惊讶它来自何处，却也可以把它当作生殖器已经开始在兴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证据。男孩从不会缺少同母亲生一个孩子的愿望，女孩始终会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的愿望，尽管他们完全无法弄清通过什么道路可以实现这些愿望。儿童似乎确信生殖器同它有关，尽管其沉思活动可能会在其他关系中寻找父母之间所假定亲密关系的本质，例如同床、一起排尿等；相较于同生殖器有关的晦暗之物，这些内容更容易由词语表象来把握。

然而，早开的花朵终有遭霜冻伤的时候；这些乱伦爱恋无一能够逃过压抑的命运。它们有时因为可被确认的外部诱因而遭到压抑：一次造成失望的事件、意外的伤害、一个不受欢迎的新同胞出生并被体验为背叛等等；有时没有这些诱因，只是从内部发生，也许仅仅因为长久

渴望的满足始终没有到来。显然，诱因并不是起作用的原因；这些爱恋关系注定要在某个时刻消亡，而我们无法说出原因。最可能的是，它们之所以消逝，只因为自身时间已经过去；儿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被迫重演人类历史中对乱伦对象选择的压抑，就像此前曾被迫作出这种对象选择一样。（参见俄狄浦斯神话中的命运。）乱伦爱恋冲动作为心理结果无意识地存在，却不再被新阶段的意识接纳；其中已经进入意识的部分则再度被排除。随着这个压抑过程，一项来源同样不明的罪疚感出现；不过它毫无疑问同那些乱伦愿望相连，并因后者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而获得理由。［脚注：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1924）中的后续讨论。］

乱伦爱恋时期的幻想曾说："他（父亲）只爱我，不爱另一个儿童，因为他打那个儿童。"罪疚感找不到比颠倒这场胜利更严厉的惩罚："不，他不爱你，因为他打你。"于是，第二阶段中自己被父亲打的幻想，成为罪疚感的直接表达；对父亲的爱现在服从于它。因此，幻想变成受虐性的。据我所知，事情总是如此：每次都是罪疚感把施虐狂转变为受虐狂。不过，这当然不是受虐狂的全部内容。罪疚感不可能独占整个场域；爱恋冲动也必定占有一份。请记住，这些儿童的施虐组成成分由于先天构成的理由过早、孤立地显现；我们无须放弃这个视角。恰恰是这些儿童，格外容易退回性生活的前生殖器、施虐—肛门组织。刚刚达到的生殖器组织遭到压抑时，后果不只是乱伦爱恋的一切心理表征成为或保持无意识；另一个后果是，生殖器组织本身也经历退行性降格。"父亲爱我"原本采取生殖器意义；通过退行，它转变成"父亲打我（我被父亲打）"。这项挨打现在是罪疚感同情欲的会合；它不仅是对遭禁止之生殖器关系的惩罚，也是它的退行性替代。

它从后一来源取得力比多兴奋，而这股兴奋从此附着于挨打，并在手淫行为中得到释放。只有这才是受虐狂的本质。

第二阶段中自己被父亲打的幻想，通常保持无意识，这很可能由于压抑强度。我无法说明，为什么六个案例中的一个男性案例却有意识地记得它。这个如今已经成年的男人清楚记得，自己曾把被母亲殴打的表象用于手淫目的；不过他很快就用同学的母亲或其他在某些方面同她相似的女性替代自己的母亲。不要忘记，男孩的乱伦幻想转变成对应的受虐幻想时，比女孩的情形多发生一次颠倒，即主动性由被动性替代。增加的这层扭曲，也许保护幻想免于作为压抑成果而保持无意识。于是，对罪疚感而言，退行已经可以替代压抑；在女性案例中，也许本身要求更高的罪疚感，只有通过二者共同作用才能得到安抚。

我的四个女性案例中有两个，在受虐性鞭打幻想上方发展出一座精巧的白日梦上层建筑；它对当事人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其功能是让她们即使放弃手淫行为，也能获得兴奋得到满足的感觉。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只要自己的自我经过轻微伪装而无法辨认，被父亲打这个内容便可以再次冒险进入意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总是被父亲打，后来则只是受罚、受辱等等。

不过我要重申，幻想通常保持无意识，必须到分析中才得到重构。这也许证明那些患者的记忆是对的：他们说自己的手淫早于——即将讨论的——第三阶段鞭打幻想出现；后者只在后来，例如受到学校场景影响才加入。每当我们相信这些说法，便总倾向于假定：手淫最初受到无意识幻想支配，后来这些幻想才由有意识幻想替代。

我们由此把熟悉的第三阶段鞭打幻想——幻想的最终形式——理解为这种替代：进行幻想的儿童至多还作为旁观者出现，父亲则以教师或其他上级的形象得到保留。这个现在又同第一阶段相似的幻想，看来再次转为施虐性的。仿佛在“父亲打另一个儿童，他只爱我”这句话中，第二部分遭到压抑后，重音退回第一部分。然而，只有幻想的形式是施虐性的；从中获得的满足却是受虐性的。其意指在于：它承接了被压抑部分的力比多投注，同时也承接附着于其内容的罪疚感。所有那些被教师殴打、数量众多而身份不明的儿童，都只是幻想者本人的替代。

在这里，服务于幻想的人物还首次表现出某种性别恒常性。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的幻想，挨打儿童几乎始终都是男孩。这个特征显然不能用可能存在的两性竞争来解释，否则男孩的幻想中更应当是女孩挨打；它也同第一阶段那个被憎恨儿童的性别无关，而是指向女孩那里一项使问题复杂化的过程。当她们离开对父亲那项具有生殖器意义的乱伦爱恋时，通常很容易同自己的女性角色决裂，重新激活“男性气质情结”（范·奥菲森），从此只想成为男孩。因此，代表她们的挨打儿童也都是男孩。在两个白日梦案例中——其中一个几乎上升到文学作品的层次——主人公始终只是年轻男性；这些创作中甚至完全没有女性，许多年后女性才以次要角色进入。

## 五

我希望自己已经足够详细地呈现了分析经验；只请读者考虑一点：经常提到的六个案例并未穷尽我的材料。我同其他分析家一样，还拥有数量更多、研究没有如此充分的案例。这些观察可以在几个方向上得

到利用：澄清倒错的一般发生，尤其是受虐狂的发生；并评价性别差异在神经症动力中发挥的作用。

这项讨论最醒目的结果涉及倒错的形成。把某项性组成成分因先天构成而得到强化或过早成熟推到前台的观点并未受到动摇，但它还没有说出一切。倒错不再孤立于儿童性生活之外，而是被纳入我们熟知的典型——即使不说正常——发展过程的关联中。它同儿童的乱伦对象爱恋、同其俄狄浦斯情结发生关系；它首先在这个情结的基础上涌现，情结崩解以后，它又往往独自作为情结的残余留下，继承情结的力比多负荷，并承载附着其上的罪疚感。异常的性构成最终通过如下事实显示了自身力量：它把俄狄浦斯情结推向一个特殊方向，迫使它留下一个不寻常的残余现象。

众所周知，儿童倒错可能成为发展出同一方向、持续终生之倒错的基础，后者吞噬一个人的全部性生活；它也可能中断并留在正常性发展背后，却始终会从后者那里抽走一定能量。前一种情形在分析出现以前已经得到认识；不过，通过对这些发展成熟的倒错作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鸿沟几乎被填满。人们经常发现，这些倒错主体通常在青春期也曾开始尝试正常性活动；可是，这种尝试力量不够，遇见最初那些从不会缺席的障碍便被放弃，于是主体最终退回幼儿固着。

当然，弄清是否可以一般性地断言儿童倒错由俄狄浦斯情结产生十分重要。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还无法决定，但它并非不可能。回想从成人倒错者那里获得的病史，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倒错者、恋物者等等的决定性印象或“最初经验”，几乎从不被定位在六岁以前。可是到了这个时期，俄狄浦斯情结的统治已经结束；被回忆、却以如此神秘方式发挥作用的经验，完全可能代表其遗产。在分析把光照进第

一个“致病”印象以前的时期之前，这项经验同已经遭压抑之情结的关系必定保持晦暗。由此可见，例如仅仅根据某人报告自己从八岁或六岁起就只对同性产生爱慕，便断言其同性恋与生俱来，价值何其有限。

不过，如果倒错普遍都能从俄狄浦斯情结派生出来，我们对这个情结的评价便获得新的支持。我们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真正的核心，在其中达到顶峰的幼儿性欲是神经症的真正条件；它在无意识中留下的东西，则构成成人后来罹患神经症的倾向。那么，鞭打幻想与其他类似的倒错固着，也只会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沉积物，仿佛过程结束后留下的疤痕；正如声名狼藉的“自卑”对应一处自恋疤痕。在这个观点上，我必须毫无保留地赞同马尔奇诺夫斯基；不久前，他在《自卑感的情欲来源》（1918）中恰当地提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神经症主体这种渺小妄想也只是局部的，完全可以同来自其他来源的自我高估并存。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本身的起源，关于在人类很可能独有的命运——性生活必须开始两次，第一次像其他生物一样始于幼儿期，随后经过漫长中断，在青春期再次开始——以及同其“古老遗产”有关的一切，我已在别处说明，这里不再进入。

关于受虐狂的发生，对鞭打幻想的讨论只提供了少量贡献。首先看来得到证实的是：受虐狂并非原初驱力表现，而是由施虐狂转向自身、也就是从对象退行到自我而产生。（参见《驱力及其命运》。）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存在目标被动的驱力，尤其在女性那里；然而，被动性还不是受虐狂的全部，它还包含不快性质，而这在驱力得到满足时如此令人陌生。施虐狂向受虐狂的转变，看来通过参与压抑行动的罪疚感所施加的影响发生。因此，压抑在这里表现出三重效果：它使生殖器组织的成果成为无意识；迫使这个组织本身退行到较早的施虐—

肛门阶段；并把其施虐狂转变为被动的、某种意义上重新具有自恋性质的受虐狂。三个效果中的第二个，由这些案例中必须假定的生殖器组织之薄弱而成为可能；第三个则成为必需，因为罪疚感对施虐狂的反感，同它对以生殖器方式理解的乱伦对象选择一样强烈。分析同样没有告诉我们罪疚感本身来自何处。它看来是儿童进入新阶段时带来的；如果此后持续存在，便对应一种类似于自卑感的疤痕形成。按照我们目前仍不确定的自我结构定位，我们会把它归于某个动因：它作为批判性良知同自我的其他部分对立，在梦中产生西尔伯勒所谓功能现象，并在被关注妄想中脱离自我。

顺带一提，我们也应注意：这里讨论的幼儿倒错分析，有助于解决一个古老谜题；当然，它始终更折磨分析之外的人，而非分析家自己。可是不久前，甚至布洛伊勒也承认一件事奇怪而无法解释：神经症主体把手淫变成其罪疚感的中心。我们一直假定，这项罪疚感指向的是幼儿手淫，而不是青春期手淫；其绝大部分不应联系手淫行为本身，而应联系作为其基础的幻想——即使幻想是无意识的，也就是来自俄狄浦斯情结。

我已经说明，鞭打幻想第三个、表面具有施虐性质的阶段，如何作为推动手淫之兴奋的承载者取得重要性，又通常激发哪些有时延续同一方向、有时以补偿方式加以废除的幻想活动。然而，第二个无意识而受虐的阶段——自己被父亲打的幻想——远为重要。它不仅通过替代它的幻想为中介继续发挥作用；还可以证明有一些人格效果直接派生自其无意识形式。自身携带这类幻想的人，会对能够被他们列入父亲系列的人产生特殊的敏感与易怒；他们很容易感到被这些人伤害，并由此令“被父亲打”这个幻想情境在自身痛苦与损害中实现。如果有一

天能够证明，同一幻想构成偏执型好诉讼妄想的基础，我不会感到惊讶。

## 六

如果我没有除少数关系外，把幼儿鞭打幻想的描述限于女性主体的情形，叙述必定会完全失去条理。现在简要重述结果：小女孩的鞭打幻想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和最后阶段能够得到有意识回忆，中间阶段保持无意识。两个有意识阶段看似施虐性的，中间的无意识阶段则无疑具有受虐性质；其内容是被父亲打，力比多负荷与罪疚感附着其上。前两个幻想中，挨打儿童始终是另一个人；中间阶段只有本人；第三个有意识阶段，挨打的绝大多数是男孩。从一开始，打人者就是父亲，后来则是父亲系列中的替代者。中间阶段的无意识幻想原本具有生殖器意义，经由压抑与退行，从希望受到父亲爱恋的乱伦愿望产生。一个表面联系不甚紧密的后果是：女孩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改变自己的性别，在幻想中把自己变成男孩。

也许只因为材料不利，我对男孩鞭打幻想的认识没有走得这么远。可以理解，我曾期待男孩与女孩的情形完全对应，只需在幻想中用母亲替代父亲。这项期待看来也得到证实，因为男孩那个被视为对应形式的幻想，内容就是被母亲（后来被一个替代人物）打。不过，这个幻想保留本人作为对象，同女孩的第二阶段不同，它能够进入意识。可是，如果因此更愿意把它等同于女孩的第三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新差别：男孩本人没有被数量众多、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替代，更没有被许多女孩替代。因此，完全平行的预期并不正确。

我的男性材料只包含少数具有幼儿鞭打幻想、性活动没有其他严重损害的案例；相反，更多人必须按性倒错意义称为真正的受虐者。他们要么只通过伴有受虐幻想的手淫取得性满足；要么成功把受虐狂同生殖器活动联结起来，使自己在受虐安排与对应条件下实现勃起和射精，或能够完成正常性交。此外，还有一个较少见的情形：一名受虐者在倒错行为中受到强烈得无法忍受的强迫表象干扰。得到满足的倒错者很少有理由寻求分析；不过，上述三组受虐者可能产生强烈动机，把他们带到分析家那里。受虐性手淫者最终尝试同女人性交时，发现自己完全阳痿；至今借助受虐表象或安排完成性交的人，也可能突然发现这项让自己感到方便的联盟失效，因为生殖器不再对受虐刺激作出反应。我们惯于自信地向前来治疗的心理性阳痿者保证能够恢复；可是，只要尚不知道障碍的动力，就应当对这个预后更加谨慎。如果分析向我们揭示，“纯粹心理性”阳痿的原因是一项精致而且也许早已根深蒂固的受虐态度，那会是一个糟糕的意外。

在这些受虐男性那里，我们会有一个发现；它提醒我们暂时不要继续追踪同女性情形的类比，而要独立判断事实。原来，无论在受虐幻想还是实现幻想的安排中，他们总是把自己置于女人角色；也就是说，他们的受虐狂同一种女性态度重合。从幻想细节很容易证明这一点；许多患者自己也知道，并把它当作主体确信来表达。即使受虐场景带着游戏性的装扮，仍维持一个顽劣男孩、侍童或学徒应当受罚的虚构，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但是，无论在幻想还是安排中，实施惩罚的人每次都是女人。这已经足够令人困惑；人们还想知道，幼儿鞭打幻想的受虐狂是否已经以这种女性态度为基础。［脚注：更多内容参见《受虐狂的经济问题》（1924）。］

因此，让我们搁下难以澄清的成人受虐狂关系，转向男性的幼儿鞭打幻想。在这里，对最早童年的分析再次让我们作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那个有意识或能够进入意识、内容为被母亲打的幻想并非原初。它有一个通常保持无意识的前阶段，内容是："我被父亲打。"因此，这个前阶段确实对应女孩幻想的第二阶段。那个熟悉而有意识的"我被母亲打"幻想，则处在女孩第三阶段的位置；正如已经提到的，那里身份不明的男孩是挨打对象。我无法在男孩那里证明一个同女孩第一阶段相对应、具有施虐性质的前阶段；不过，我不想在这里作出最终否定，因为我完全看见更复杂类型的可能性。

男性幻想中的挨打——请允许我暂且如此称呼，希望不会引起误解——同样是通过退行而降格的、生殖器意义上的受到爱恋。因此，男性的无意识幻想最初并不像我们刚才暂时设定的那样是"我被父亲打"，而是："我受到父亲的爱。"它通过熟知的过程转变为有意识幻想："我被母亲打。"因此，男孩的鞭打幻想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真正源于对父亲的女性态度。它同女性幻想（即女孩的幻想）一样对应俄狄浦斯情结；只不过，我们预期的两者平行必须让位于另一种共同性：在两个案例中，鞭打幻想都派生自同父亲的乱伦纽带。

为了清楚起见，我在这里补上两个性别的鞭打幻想之间其他相同与不同之处。女孩的无意识受虐幻想从正常俄狄浦斯位置出发；男孩的则从倒置位置出发，把父亲当作爱恋对象。女孩的幻想有一个前阶段（第一阶段），在那里，殴打以无差别意义出现并指向一个受到嫉妒与憎恨的人；男孩没有这两项，但更幸运的观察也许能够消除这个差别。当转入替代性的有意识幻想时，女孩保留父亲人物，因而保留打人者的性别；但她改变挨打的人及其性别，于是最后是一个男人殴打男孩。男孩相反，他改变打人者的人物与性别，以母亲替代父亲，却

保留自己本人；因此最终打人者同挨打者性别不同。女孩那里原本受虐（被动）的情境通过压抑转变为施虐情境，其性特征变得十分模糊；男孩那里则保持受虐性，而且由于打人者与挨打者的性别差异，同最初那个具有生殖器意义的幻想保留更多相似。男孩通过压抑并重新加工无意识幻想，逃离自己的同性恋；其后来有意识幻想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以一种没有同性恋对象选择的女性态度为内容。女孩在同一个过程中则完全逃离爱情生活的要求；她在幻想中把自己变成男人，却没有亲自采取男性主动位置，只作为旁观者观看一项替代性行为的行动。

我们有理由假定，对最初无意识幻想的压抑没有改变太多。凡是为意识所压抑并替代的东西，都继续在无意识中保存并发挥作用。退行到性组织较早阶段的效果则不同；我们可以认为，它也会改变无意识中的关系。因此，压抑以后，两个性别的无意识中留下的虽然不是受到父亲爱恋的（被动）幻想，却是被他殴打的受虐幻想。还有迹象表明，压抑只是非常不完整地实现了自己的意图。男孩原本想逃离同性恋对象选择，又没有改变自身性别；可是在有意识幻想中，他仍感到自己是女人，并赋予打他的女人以男性属性与特征。女孩则放弃了自身性别，总体上完成了更彻底的压抑工作；但她仍未摆脱父亲，不敢亲自打人；而且因为自己已经变成男孩，便主要让男孩挨打。

我知道，两个性别的鞭打幻想在行为上的上述差别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不过，我不尝试通过追踪它们对其他因素的依赖来解开这些复杂情形，因为我自己也不认为观察材料已经穷尽。就现有材料而言，我想用它检验两种彼此对立的理论；两者都讨论压抑同性质特征的关系，并各自按照自己的意义把这项关系描述得极为密切。我先说明：我始终认为两者都不正确而且会误导。

第一种理论没有署名；许多年前，一位当时同我友好的同事向我提出它。其宏大简洁如此诱人，人们只能惊讶地问：为什么此后文献中只有零星提示代表它？它以人类个体的双性构成为依据，断言每个人的性别特征斗争都是压抑动机。在一个人那里发展得更强、占据主导的性别，会把较弱性别的心理表征压入无意识。因此，每个人的无意识核心、被压抑之物，就是其内部存在的异性部分。只有当我们让一个人的性别由其生殖器发育决定时，这才可能具有可把握的意义；否则，一个人较强的性别就不确定，而我们会冒险从研究结果中重新推导本应用来指导研究的东西。简而言之：男人的无意识被压抑之物可归结为女性驱力冲动；女人则相反。

第二种理论出现得较晚；它同第一种理论一致，同样把两种性别的斗争说成压抑的决定因素。除此以外，它必须同前者对立；其支撑也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社会学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的“男性抗议”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抗拒留在低劣的“女性路线”上，并朝唯一令人满足的男性路线推进。阿德勒从这项男性抗议一般地解释人格形成与神经症形成。遗憾的是，阿德勒没有清楚区分两项必定应当分开的过程，也根本没有充分评价压抑事实；因此，尝试把男性抗议学说应用于压抑，很容易造成误解。我认为，这项尝试必然得出：男性抗议、离开女性路线的愿望，在所有案例中都是压抑动机。因此，实施压抑的始终是一项男性驱力冲动，被压抑的则始终是女性驱力冲动。不过，症状同样会是女性冲动的结果；因为我们不能放弃症状的这个性质：它是被压抑之物的替代，尽管遭到压抑仍强行实现自身。

现在，让我们用这里研究的鞭打幻想，检验这两种可以说都把压抑过程性别化的理论。对男孩而言，最初幻想“我被父亲打”对应一种女性态度，因而是其异性构成的表现。如果它遭到压抑，第一种理论看来

应当正确，因为它设定了异性之物同被压抑之物重合的规则。当然，压抑后显现的有意识幻想仍然呈现女性态度——只不过这次指向母亲——不太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决定近在眼前，我们不必停留于怀疑。女孩最初的幻想“我被父亲打（也就是受到爱恋）”，作为一种女性态度，无疑对应她们占主导、显现的性别；因此按照这套理论，它本应逃过压抑，无须成为无意识。事实上，它仍成为无意识，并由一个否认显现性别特征的有意识幻想替代。因此，这套理论对理解鞭打幻想毫无用处，并被它反驳。人们也许会反对说，正是女性化的男孩与男性化的女孩拥有这些鞭打幻想并经历这些命运；或者，男孩的一项女性特征与女孩的一项男性特征应当对此负责——对男孩而言负责被动幻想的形成，对女孩而言负责它遭到压抑。我们很可能同意这种看法；但它所断言的显现性别特征同被指定遭到压抑之物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仍然同样无法维持。归根结底，我们只看见：男性与女性个体那里都会出现男性与女性驱力冲动，它们同样都可能通过压抑成为无意识。

男性抗议理论面对鞭打幻想的检验，看来要好得多。对男孩和女孩而言，鞭打幻想都对应一种女性态度，即停留在女性路线上；两个性别都急于通过压抑幻想来摆脱这项态度。不过，男性抗议看来只在女孩那里获得完全成功；这里甚至构成男性抗议发挥作用的理想例子。在男孩那里，成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女性路线没有放弃，男孩在有意识的受虐幻想中当然没有处在“上位”。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个幻想视为男性抗议失败所形成的症状，就符合从理论推导出的预期。可是，女孩由压抑产生的幻想同样具有症状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又让我们为难。既然男性抗议在这里充分实现意图，症状形成的条件本应消失。

在由这个困难推测男性抗议的全部视角都不适合神经症与倒错问题、应用于它们也毫无成果以前，让我们先把目光从被动鞭打幻想转向幼儿性生活中其他同样遭到压抑的驱力表现。没有人能够怀疑：有些愿望与幻想从一开始就遵循男性路线，是男性驱力冲动的表达，例如施虐冲动，或男孩从正常俄狄浦斯情结出发对母亲产生的欲求。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也会遭到压抑。如果男性抗议能够很好解释被动、后来具有受虐性质之幻想所受的压抑，它就会因此完全无法解释相反的主动幻想案例。也就是说，男性抗议学说同压抑事实本身无法相容。只有那些准备抛弃自布洛伊尔第一次宣泄治疗以来、并由此取得的一切心理学成果的人，才可能期待男性抗议原则在说明神经症与倒错时获得重要性。

以观察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坚持认为，压抑动机不应当被性别化。人的古老遗产构成心理无意识的核心；当发展推进到后来阶段时，其中一切作为无用、同新事物不相容并对其有害而应被留下的东西，都会遭到压抑。对于一组驱力，这项选择比另一组更成功。后一组即性驱力；由于人们已经多次指出的特殊关系，它们能够挫败压抑的意图，迫使主体通过令人不安的替代形成来表征它们。因此，遭到压抑的幼儿性欲是症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其内容的根本部分——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我希望这篇短文已经唤起如下预期：幼儿与成人的性偏离也从同一情结分叉而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1939）］

有一瞬间，我处在一个有趣位置：不知道自己想传达的东西会被视为早已熟知、不言而喻，还是完全新颖、令人陌生。不过，我更倾向于后者。我终于注意到：几十年后成为分析患者的那个人，其年幼自我

在某些困境中曾以奇特方式行事。可以一般而不甚确定地说，这发生在心理创伤的影响下；不过，我宁愿突出一个界限清楚的特殊案例，它当然无法覆盖一切可能原因。儿童的自我当时服务于一项强大的驱力要求，并习惯于满足它；突然，一项经验使他受到惊吓，并告诉他继续这种满足会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实在危险。现在，他必须决定：要么承认实在危险，向它屈服并放弃驱力满足；要么否认现实，让自己相信没有理由害怕，从而继续维持满足。因此，这是一场驱力要求同现实反对之间的冲突。然而，儿童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同时选择两者——这等于同一回事。他以两个彼此对立、却都有效并发挥作用的反应来回应冲突。一方面，他借助某些机制拒绝现实，不接受任何禁止；另一方面，他在同一个瞬间承认现实危险，把对它的恐惧作为痛苦症状承担，并在以后试图防御这项恐惧。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困难解决办法。冲突双方都得到自身份额：驱力可以保留满足，现实也得到应有的尊重。不过众所周知，只有死亡是免费的。这项成功以自我出现一道裂口为代价；裂口从此再也不会愈合，反而会随着时间扩大。面对冲突的两个相反反应，作为自我分裂的核心一直存在。整个过程在我们看来如此奇怪，是因为我们把自我过程的综合视为不言自明；但显然，我们在这里错了。自我极其重要的综合功能拥有特殊条件，也会遭遇一整套障碍。

如果把一个具体病例史的材料填入这项图式化呈现，只会有所裨益。一名男孩在三四岁时由于一个年龄较大女孩的诱惑，看见了女性生殖器。这段关系中断以后，他把由此获得的性刺激延续为频繁的手淫；不过很快就被严厉的保姆抓住，并受到阉割威胁，而威胁的执行照例被归到父亲身上。在这个案例中，造成巨大惊恐效果的条件已经具备。单独的阉割威胁未必造成多大印象；儿童不相信它，也很难想象

同这个受到如此高估的身体部分分离是可能的。看见女性生殖器时，儿童本来可以确信这项可能性；不过当时，他没有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对它的厌恶太强，也没有任何动机迫使他如此。相反，一旦产生任何不安，人们都会用一种说法加以安抚：那里欠缺的东西以后会长出来，她——也就是她的阴茎——以后会长出来。充分观察过小男孩的人，也许记得他们看见小妹妹的生殖器时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当两个要素相遇时，情况便不同。威胁唤醒了对那个曾被视为无害之知觉的记忆，并在其中找到令人恐惧的证实。男孩现在仿佛理解了女孩的生殖器为什么没有显示阴茎，也不再敢怀疑自己的生殖器可能遭遇同样命运；从此必须相信阉割危险的现实。阉割惊恐通常、也就是被视为正常的后果，是男孩向威胁让步——立刻或经过较长斗争，完全或至少部分服从，例如不再用手触摸生殖器——也就是完全或部分放弃驱力满足。不过，我们已经准备好看到患者知道另一种自救办法。他为女性欠缺的阴茎创造一个替代物、一件恋物。由此，他固然否认了现实，却拯救自己的阴茎。如果他无须承认女人已经失去阴茎，自己受到的威胁便失去可信度；于是他也无须害怕自己的阴茎，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手淫。患者的这项行动让我们看到对现实的背离，也就是一种我们很愿意只保留给精神病的过程。它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不过，我们仍要暂缓判断，因为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差别。男孩没有干脆反驳知觉，没有在本来看不见阴茎的地方幻觉出一根阴茎；他只作出价值移置，把阴茎的意指转移到另一个身体部分，而退行机制以一种这里不宜说明的方式帮助了他。当然，这项移置只涉及女人的身体；他自身的阴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种可以说狡黠地处理现实的方式，决定了男孩的实际行为。他继续手淫，仿佛这不会给阴茎造成危险；可与此同时，他形成一个症状，

完全同其表面勇敢或若无其事相矛盾，并证明他确实承认这项危险。人们曾威胁说父亲会阉割他；紧接着，就在创造恋物的同时，他对受到父亲惩罚产生一股强烈恐惧。这项恐惧长期纠缠他，他只有耗费男性气质的全部力量才能克服并过度补偿。对父亲的这项恐惧同样不谈阉割；借助退行到口腔阶段，它表现为害怕被父亲吞食。这里不可能不想起希腊神话的一段原始材料：年老的父神克洛诺斯吞食自己的孩子，也想吞食最年幼的儿子宙斯；宙斯因母亲的计谋得救，后来阉割父亲。不过，回到我们的案例，还要补充：他形成了另一个虽然轻微、却一直保留至今的症状——两只小脚趾对触碰产生焦虑性的敏感。仿佛在不断来回摆动的阉割否认与承认之间，仍必须出现一个更清楚的表达……

# 第14课 · 1958年3月5日

诸位朋友，为了接续中断了三周的讲述，我要从昨晚被恰当地重新提起的一点出发：我们的讲述必须是一种科学的讲述。话虽如此，一旦涉及我们的对象，要达到这个目标，道路显然并不那么容易。昨晚我只是指出了这样一个时刻的独创性：在对人的现象的考察中，整个弗洛伊德学科把一种被称为欲望的特权要素置于前景，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停顿。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弗洛伊德以前，这个要素本身始终遭到缩减，并且总是从某个方面被过早略去。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在弗洛伊德以前，对人类经济的一切研究或多或少都从道德、从伦理的关切出发；也就是说，与其说它要研究欲望，不如说它一开始就要缩减和规训欲望。而精神分析处理的是广义上的欲望之效应——欲望不是诸多效应中的一个——我们面对的正是欲望之效应。这就是我在这里努力向你们反复提示的一切的意义：在人类欲望的这些现象中显现出来的，是欲望在根本上的某种俯冲，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颠覆”；它由一种特定关系造成，也就是欲望同能指的关系。

今天我不打算又一次只向你们复述这一点，尽管我们还得回来并从这里重新出发；我要向你们说明，在一种严密的视角中——也就是坚持人的欲望之条件的独创性的视角——那个对人来说的某种东西意味着什么。你们在运用欲望概念时，总或多或少会把它包含在内，而它却值得同欲望区分开来。我还要更进一步说：

只有从我们已经充分领会以下一点的时刻起，它才可能开始得到分节：

- 欲望是在何等复杂性中构成的这一观念；
- 以及我所说的这个观念——它将是今天讲述的另一极——叫作享乐。

让我们简短回顾一下欲望在能指中的这种偏移—异化本身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将试着由此抵达这样一个词项：人类主体在自己的世界中把握那些强加给他的条件，仿佛这些条件就是为他而设，并从中得到满足；在这一视角中，这个事实究竟由什么构成。

我现在先向你们点明：这将把我们引向——我希望今天能够抵达——我年初从俏皮话的视角出发时已经提示过的东西，也就是喜剧的性质。

让我们简短回顾如下几点：

- 欲望本质上安置在同能指链的一种关系中；
- 在人类主体的演化中，欲望首先作为要求而提出，并把自身提出来；
- 弗洛伊德所谓的挫折是 Versagung，即拒绝，更确切说，是撤回承诺。

相关知识卡 Ablehnung、Verwerfung 与 Versagung

无论我们同克莱因学派一起在发生史上追溯得多远——这种探索当然是一种进步，它把神经症主体演化中的大多数问题带回所谓

“口腔—施虐的”满足——请你们只须注意：这种满足是在幻想中实现的，而且从一开始便是

对幻想中那种满足的报复。

有人告诉我们：一切都从幼儿对母亲身体的咬噬需要开始，这种需要有时带有攻击性。但我们毕竟不要忘记，这一切从来不是真实的咬噬，而是幻想；若不向我们表明，对反咬的恐惧正是这里所要讨论、所要证明之物的关键，这整套推导甚至不能让我们前进一步。

昨晚，我同你们中的一位交谈；他继苏珊·艾萨克斯[注1]之后，试图重新提出幻想一词的一些有效定义。他非常恰当地告诉我：若要纯粹根据主体之间的想象关系作出任何推导，他感到完全无从下手。

> [注1] 苏珊·艾萨克斯：《论幻想的性质与功能》（“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29 卷；后收入梅兰妮·克莱因、保拉·海曼、苏珊·艾萨克斯与琼·里维埃合著《精神分析的新发展》，伦敦，Hogarth Press，1952 年。

如果我们看不到无意识幻想从一开始就受能指的条件支配并由其结构化，就绝不可能有效地区分无意识幻想与想象游戏这种形式创造。

原初的好客体与坏客体——整个分析推导由之重新建立的那些原始客体——构成一种组合库；其中勾勒出若干系列的替代物，它们从一开始便注定彼此等价：乳汁、乳房后来分别变成精液、阴茎。可以说，客体从一开始便被能指化了。同最原初的客体——母亲客体——的关系中发生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在符号上运作；为了形象地说明我们的

意思，可以把它称作“大他者欲望的货币”。［参见 1957 年 11 月 20 日课程：转喻客体的碎片。］

上一次，在以必要的细致程度察看弗洛伊德视为决定性的那部作品［《一个孩子挨打》］时，我向你们强调：它标志着分析家真正而切实理解倒错问题的开创性一步。

这一步是真正理解倒错问题的起点。

所以，我们上次所做的事情应当使你们看到：在这些符号本身内部还可以发生一种区分。所有这些符号都更为复杂；更准确地说，符号的总体不能化约为我已向你们指出过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凭证、某种信用价值：拥有这个或那个。

它们并不纯粹只是表象价值，不只是一种我们刚才所说的“交换货币”，也不只是作为既成之物的符号。在这些符号中，有些是构成性的符号；我的意思是，正是借助它们，价值的创造才得到保证：每时每刻卷入这一经济的某种真实之物，都被那一道杠划中，从而成为符号。

这道杠［参见一元特征、einziger Zug］，上次体现为鞭子或任何打击之物的那一根棍状符号。正是借助它，连一种不愉快的效应也变成区别，并建立了那种关系本身；也正是借助它，要求得以被承认为要求。最初用来取消兄弟这一竞争性现实的东西，后来转而成为主体自身得到区分的手段：主体本人因此被承认为某种既可能得到承认，也可能被抛入虚无的东西。它从一开始便呈现为一个表面，后来一切可能被给予之物都可以书写在其上；可以说，它像一张开出的空白支票，一切赠予都有可能填写其上。

你们很清楚：既然一切赠予都有可能，那就甚至不再涉及什么能够或不能够被给予。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正是我曾告诉你们的那种爱的关系；主体在其中本质上给予的，是他所没有的东西。进入爱的秩序的一切可能性，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都预设了主体的这个根本符号——主体能够被取消，也能够作为这样的主体得到承认。

在这段间歇里，我请你们做一些阅读。我希望你们已经读了；我的意思是，你们至少稍微研究了欧内斯特·琼斯的《阳具期》和《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由于今天必须推进，我只想就一个界定得十分清楚的例子向你们点出一点：我在翻阅为琼斯五十岁生日所作的纪念文字时重新发现了它；那恰好是《阳具期》走到英国精神分析家兴趣中心的时期。

这个例子位于那一讨论的一个十分局部的点上。

在那一期杂志中，我又一次饶有兴趣地重读了琼·里维埃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0 卷的文章《女性气质作为假面》[注2]。她继续分析一个特定病例；

> [注2] 琼·里维埃：《女性气质作为假面》（“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0 卷，1929 年；法译《女性气质作为假面》，载《精神分析》第 7 期，第 257—270 页，亦收入《女性气质：假面》，Seuil，Champ Freudien，1994 年。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承担女性气质的情形。琼·里维埃把它置于通向女性气质的不同分支与可能路径之中，指出这个病例表现出一种格外显著、表面上绝对完整的女性气质承担；而这个主体生活中其他一切，似乎都在承担全部男性功能——在当时，这一点远比今天更突出。

换言之，这是一个拥有完全独立、成熟而自由的职业生活的人；

可与此同时——我再说一次，这在当时比今天更显眼——她又在所有层面上以一种相应而极致的方式，承担那些可以称作她的“女性功能”。这种承担不仅见于作为女主人、在同丈夫的关系中所履行的外表上、公开的功能；她处处显示出那些在我们的社会状态中被单义地视为女性职责之社会特征的优越品质；

而且尤其见于另一个层面，特别是在性层面：她同男人的关系，也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享乐，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然而，这项分析在表面上完全满足的女性位置之下，凸显出某种极为隐蔽、却构成其基础的东西。毫无疑问，人们之所以会发现它，是因为那个原则上完全令人满意的状态表面出现了一点点——但极其细微——的不协调。这一隐蔽之物值得展示，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的经验对 Penisneid、

即对阴茎的要求，在女性性欲发展的许多障碍中赋予了何等重要的重音。

这里隐藏的却恰恰相反：正是人们所谓的阳具。今天我无法为你们重述这个女人的全部故事，那不是我们的对象；但支撑着表面上盛放于

这种幸福力比多中的根本满足，来自她隐秘地满足于自己凌驾于父母人物之上。这正是琼·里维埃女士使用的词；她认为，这构成了此处一种现象的根源——承担女性气质在性欲发展中本来并不稳固得无须注意，而本例却呈现得格外完整。

性高潮本身之所以令人满足，也以此为来源。证据在于：当分析侦测到主体人格中这个隐蔽的弹簧以后，哪怕只是暂时的，也足以深刻扰乱主体已经获得或呈现出的那种完成、成熟而幸福的关系，甚至令性行为的这一幸福结局暂时消失。

琼·里维埃女士强调，我们面对的是如下情形：主体需要避开男人们的报复，因为她暗中从大他者那里夺走了其力量的源泉和象征本身。随着分析逐渐推进，这一点愈发明显地支配并引导着她同两性人物的关系，也赋予这种关系以意义。

为了避免她所针对的男人施加惩罚、施加报复，主体便采取一种极其精细的节奏；分析越推进，这一点越清楚，但在分析开始时那些细小的异常特征中就已可察觉。总之，每当主体显露出自己以阳具方式构成的力量，她便立刻展开一连串行动：或是诱惑，甚至是牺牲性的程序——为别人做一切；而且表面上采用女性奉献的最高形式，仿佛在说：“可是你们看，我并没有这个阳具；我是女人，是纯粹的女人……”尤其是在随后立即面对男人的行动中，她用这种方式遮掩自己。例如，在那些显示她具有卓越能力的职业活动之后，她会突然借一种闪避，摆出过分谦逊、甚至对自己工作质量感到焦虑的姿态；实际上，她是在玩弄琼·里维埃女士所谓“一整套卖弄风情的游戏”。这时，这套游戏的作用与其说是安抚那些人，不如说是在她心中欺骗那

些很可能会因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而受到冒犯的人；这种东西本质而根本地呈现为：

- 攻击；
- 对优越地位本身的需要与享乐；
- 以及一种深深以她先同母亲、继而同父亲竞争的全部历史为结构的东西。

简言之，面对这样一个看似悖论性的例子，我们清楚看到，在分析中、在理解一种主体结构时，所涉及的总是某种向我们显示主体卷入一场承认过程的东西。

但承认什么？我们要清楚理解：既然主体并未意识到这种承认的需要，就必须在某处安置一切承认关系所必需的那个大他者，把它置于一种具有如下性质的他异性之中——这是我们迄今、也是弗洛伊德以前从未认识过的性质：

- 它使大他者成为纯粹的能指场所，存在由此同它自身的实存相分裂；
- 它使人类主体的命运从根本上系于主体同这个符号的关系：主体是这个符号所造就的东西，成为各种激情的客体；这些激情在这一过程本身中把死亡呈现出来。正因为主体同这个符号相连，他才同自身充分分离，以至能同自己的实存建立这种看来在造物中独一无二的关系。这就是分析中所谓受虐狂的最后形式：主体借此把握实存之痛，把握那种从一开始就把主体构成为实存的分裂。

为什么？因为在别处，他的存在必须在符号中得到表象，而符号本身又处在第三个场所。

从无意识层面开始，正是这一点把主体结构在这种自我分解之中；没有这种分解，我们便完全无法有效奠定所谓无意识。

随便取一个梦，你们就会看到——只要正确分析它并参照

《梦的解析》——无意识并不化身在梦中呈现为得到分节的能指之物里，即使第一层释读已经完成。弗洛伊德屡次回到这一点并强调："有些梦，"他说，"是虚伪的。"可它们仍然表象一个欲望，哪怕只是欺骗分析家的欲望。请回想我曾向你们强调的《女性同性恋病例分析》中那段充分分节的论述。［参见《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心理发生》，收入《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

然而，这种无意识话语本身——它还不是无意识的最后一句话——由无意识真正的最后动力所支撑；它只能被分节为主体的获得承认的欲望，哪怕是通过一种已经在逃逸于意识的机制层面得到分节的谎言；

在这里，正是这种获得承认的欲望支撑着谎言本身；从一种错误视角看，这个谎言可能呈现为

无意识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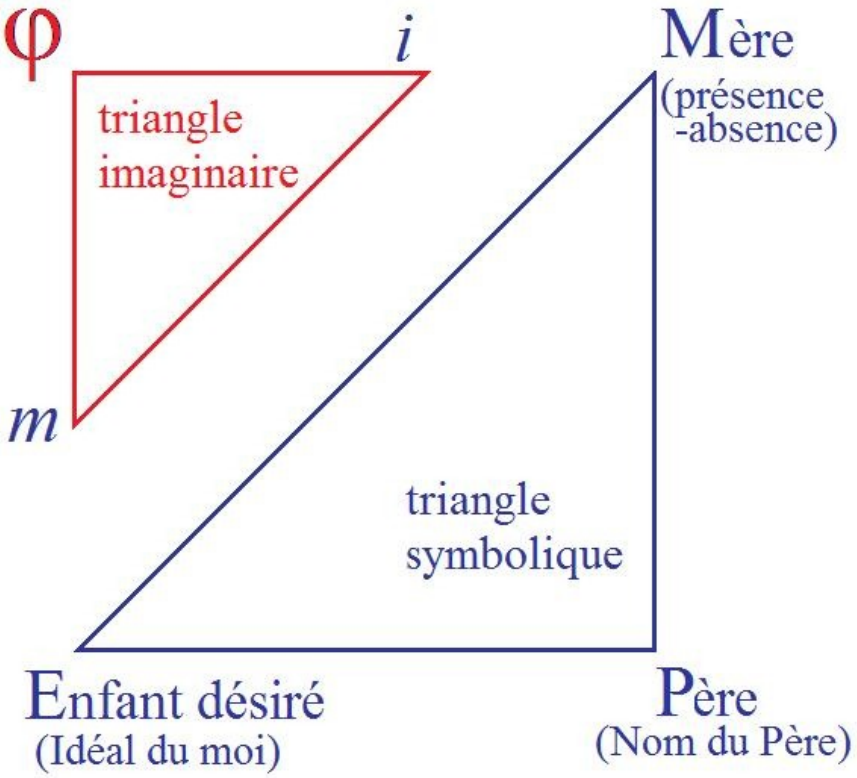
这向你们说明了如下必要性的意义与钥匙：在分析经验交给我们的完整主体性现象的一切分析之初，我们必须提出这个图式；我正试图围绕它推进对无意识形成之经验的真正探究。这个图式就是我最近以如下形式向你们提出的东西；今天，我终于可以用一种

更简单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当然，最简单的形式总要最后才能提出。

在这个构成主体位置的“三极三角形”中，我们有什么？主体同三个词项构成三元关系，而这三个词项是主体全部进程的能指基础。

确切说，首先是母亲：她是第一个被象征化的客体；她的缺席或在场将成为主体所依附的那个欲望之符号，主体自身的欲望也将系于此。换言之，这一点将决定他不只是一个得到满足或未得到满足的孩子，而是一个被欲望或未被欲望的孩子。这并不是一种任意建构。请承认，我在这里安置的，是我们的经验一步一步教我们发现的东西。经验让我们知道，一个主体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是一个未被欲望的孩子，会引发怎样层层相继、几乎无穷无尽的解构后果。

这个词项是根本性的。它比一个孩子曾在某时或多或少得到满足更加根本。




被欲望的孩子这一词项所回应的，是母亲作为欲望所在地的构成。

我曾试图向你们展示孩子同母亲欲望之关系的整套辩证法，它都回应于此，并可以概括、集中在这一点上：被欲望的孩子之象征这一原初事实；以及这里的父亲词项［父之名］——父亲位于能指之中，是那个让能指本身被设立为能指的能指。

正因如此，父亲本质上是创造者；我甚至要说，他是绝对的创造者，是从无中创造的人。因为能指在其原初维度中本身能够包含能指，父亲才被界定为这个能指的涌现。相对于这一点，某种在本质上混乱、

未定、尚未同自身实存分离、却注定要同它分离的东西——作为必须被意指的主体——必须找到自己的方位。

认同之所以可能，始终是因为对主体而言，某种东西在能指层面所构成的这种三元关系中得到结构化。主体特殊的人类生理所给予他的东西，若能在他的亲历中获得这种或那种意义，也正是在这项关系中构成的。

我无须再谈诸词项的同源性，也无须再谈相对于这三个象征词项，在主体一侧的所指层面是如何构成的。这种同源性，我已经部分证明过——归根结底，我在这里做的无非就是证明它。在得到更多信息与更多论证以前，我请你们在这一点上跟随我。主体在同自己的形象的关系中，重新找到母亲对他的双重欲望——把他当作一个被欲望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本身只是象征性的。主体在同自身形象的关系中体验并经历它，许多东西都可以叠加在这个形象之上。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我马上来谈。

昨晚我提到，我仔细察看了纪德的童年史；让·德莱[注3]在交给我们的这份病例病理传记中，以真正穷尽无遗的方式陈述了这段历史。显然，纪德——“那个不讨喜的孩子”，作者曾在某张使传记人物战栗的照片前这样称他——这个在自身情欲、原初自体情欲中被交付给最未成形形象的孩子，据他告诉我们，会通过认同于某些灾难性场景来获得性高潮。他十分确切地在阅读某些词语时得到享乐，例如阅读塞居尔夫人的作品时……

> [注3] 让·德莱：《安德烈·纪德的青年时代》，Gallimard，NRF，1957 年。

她的书真正奠定了原初施虐狂的全部含混性，

但其中的施虐狂或许还不是最成熟的形式 ……它在那里采取了挨打儿童的形式，或者一个女仆让手中东西“哗啦一声”落下、

将其摔毁的形式。

他由此认同于安徒生一则故事中的格里布耶[注4]：这个人物顺流漂去，

> [注4] 拉康在这里口误。格里布耶是乔治·桑小说《真正的格里布耶的故事》（1851）中的人物，后来也出现在塞居尔伯爵夫人的《格里布耶的妹妹》（1862）中，并非安徒生作品中的人物。

最后抵达遥远的岸边，变成一只死老鼠——也就是化为这种实存之痛在人性上最未成形的形态。

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把握别的，只能把握同母亲的最初关系所构成的某种深渊。我们知道，这位母亲既具有极其高尚而卓越的品质，她的性欲和女性生活中又有某种完全被略去的、说不清的东西；在孩子最初几年里，她的在场无疑把他置于一个完全无从定位的位置。

年轻纪德的生命重新获得——可以这样说——意义和人的构成，其转折点就在那个关键的认同时刻。关于这一时刻，他的回忆给出了尽可能清楚的叙述；它无疑在他的整个实存上留下了印记，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保存着它的枢轴点和客体。这就是他对年轻表姐的认同；但仅以这种含糊说法给它命名，还远远不够。

确实是认同，他自己这样告诉我们。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一个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其奇特性的时刻：他在那栋房子的二楼发现表姐正

在哭泣。他冲进这栋房子，与其说是受她吸引，不如说是凭借自己对秘密之事的嗅觉，以及对这栋房子里横行的隐秘情事的迷恋。

他穿过一楼时，看见——或更准确说，多少瞥见——表姐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姨母挽着一位情人；到了二楼，他发现表姐在哭。就在这里，陶醉、热忱、爱、痛苦与奉献汇聚到一起，他把自己奉献给“保护这个孩子”，后来他这样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她比他年长：当时纪德［1869 年 11 月 22 日生］十三岁，玛德莱娜［玛德莱娜·隆多，1867 年 12 月 7 日生］十六岁。

这时发生了某种事情；如果不把它放在如下关系中，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其意义：

- 年轻的安德烈不只同表姐相处在这种第三项关系中；楼下还有那个正在消散高烧般欲火的女人；
- 我们还必须记得安德烈·纪德在《窄门》中告诉我们的那件前事：表姐的这位母亲曾试图诱惑他。

那么发生的是什么？在那次诱惑的时刻，安德烈·纪德成了“被欲望的孩子”。他当然惊恐地逃走了，因为那里确实没有任何中介要素、任何接近的要素，能够使这一事件不只是一次创伤；但无论如何，他第一次处在被欲望的孩子的位置上。这个时刻开启了一种新情境的出路；从某个方面说，它将拯救他，却也会把他固定在一个深度分裂的位置上，

这是因为这场相遇以一种迟来的，而且——我再说一次——没有中介的活动方式发生。

在构成这个此前始终欠缺的象征词项时，他会保留下什么？他只会保留被欲望的孩子的位置；借助表姐，他终于能够占据这个位置。原来有一个洞的位置现在有了一个位置，但仅此而已；因为他当然拒绝自己处在那里：他无法接受以自己为客体的欲望。可是反过来，他的自我无疑从未停止：

- 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永远认同于那个欲望主体——此后他依赖于这个主体，也就是他本人；

- 永远爱上——直到生命终结——他曾在姨母臂弯中短暂成为的那个小男孩；这位姨母曾抚摸他的脖颈、肩膀和胸膛。

我们将看到，他整个一生都在我们有据可查的那种东西之中；也就是他亲口承认的：从蜜月旅行开始——人人都为此惊愕并感到丑闻——甚至几乎就在妻子面前，

他都会想到自己所谓抚摸火车上遇到的年轻男孩手臂和肩膀时那种“受刑般的欢悦”。

这是文学中一页如今已经著名的文字；纪德在那里展示了对他来说仍是欲望全部固着之特权点的东西。换言之，在后来成为他自我理想的层面上，这里有某物被抽离了：他作为客体的那种欲望是他无法承受的，于是他替自己承担了它；他从此永远、永久地爱上那个他自己拒绝成为的、受到抚摸的小男孩。

换言之，我们在这里把握到：被欲望的孩子这一词项，是某种东西必须得到展开的所在；主体必须在那里重新接上最初在其存在中构成他的那个能指。这个自我、他所处的这个 x 点，必须以某种方式同它接

合；标示主体全部心理发展的这个自我理想必须在此形成。这个自我理想由如下东西标记：

1. 能指的符号；

1. 要知道它能够从何处出发：是从自我开始逐步推进；还是相反，自我只能经由一系列偶发事件承受它，从能指本身出发，任由历险摆布。

换言之，我们必须承认，仅凭一连串主体并不知情的偶发事件而发生的事情，使他能够维持自己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被欲望的孩子的能指位置；它向我们表明，无论这是经由意识途径还是无意识途径发生，发生的位置都是同一个位置：在一种情形中，我们称之为自我理想；在另一种情形中，我们称之为倒错。

安德烈·纪德的倒错，与其说在于他只能欲望小男孩——

也就是他本人曾是的那个小男孩——不如说在于：他只能不断向自己言说、让自己服从于那部对他而言是作品核心的《通信集》，才能构成自己。他要成为那个让自己在表姐所占据的位置上获得价值的人，那个所有思想都朝向她的人；他一刻不停地在字面上把自己没有的一切给予她，但也仅仅给予这些；他在她之中、通过她、相对于她，把自己构成为人格。这使他同她处于一种致命依赖之中，以至他在某处喊道：

“你们无法知道一个乌拉宁主义者的爱是什么！那就像一种经过防腐的爱。”

他把自己的全部本质投射到那上面；它确实是他作为文学之人、作为一个完全处在能指及其关系与交流中的人的实存之基础、核心和根。正因如此，他在人际关系中被攫住；对他来说，这个未被欲望的女人能够成为至高之爱的客体，并同他根本相系。当这个他用来填补无欲望之爱的洞的客体消失时，他发出那声可怜的呼喊；昨晚我已经指出，它同最典型的滑稽呼喊具有亲缘关系："我的钱匣！我亲爱的钱匣！"——《悭吝人》中那个钱匣。

一切激情，只要是欲望在某个客体中的异化，就处在同一层面。当然，《悭吝人》的钱匣比纪德同妻子的通信消失更容易让我们发笑——至少当我们心中还有一点人性重音时如此，而这并不是人人都有。显然，那些通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本应是某种永远具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仍是同一回事；纪德在那些通信消失时的呼喊，同喜剧中吝啬鬼阿巴贡的呼喊是同一声呼喊。我们所说的喜剧究竟是什么？喜剧是通过散布各处的无数话语触及我们的东西。

喜剧并不等于滑稽。如果我们给出一套正确的喜剧理论，任何滑稽之物都必须能够在其中得到理解。如果我们相信，至少曾有一段时期，喜剧是在共同体面前上演的作品——所谓共同体，是一个人的群体，也就是在自身之上构成一个"人"本身的存在——如果喜剧曾在某个时期成为如下东西：男人与女人关系的表象具有某种仪式价值，以至我并不是第一个把戏剧比作弥撒的人；那么，凡是接近戏剧问题的人，

都曾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弥撒之戏剧仍从根本上表象着历史上某一时刻戏剧功能的完整展开。

因此，如果在希腊戏剧的伟大时代，悲剧表象人同言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命运性而且冲突性的命运中攫住人——那么，只要象征链是人同能指法则的纽带，它在家庭层面与共同体层面就并不相同：这就是悲剧的本质。

喜剧表象如下东西，而且它并非与悲剧无关；你们知道，一部喜剧总是补足悲剧三部曲。我们不能脱离悲剧来考察它。我将向你们表明，甚至在基督教戏剧本身的边缘评注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喜剧的踪迹和影子。当然，不是在我们这个便秘的基督教时代；如今人们不敢再用那些曾被称作“Risus pascalis”、即“复活节之笑”的粗壮闹剧来伴随仪式。不过先把这一点放在一边。

喜剧呈现为这样一个时刻：主体与人试图把同言说的关系不再当作自己在相反必然性中的投入与伪装，而终究当作自己的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在其中把自己分节为从中获益、享用它、消费它的人；总而言之，是那个注定要从这种共融中吸收其实质与质料的人。

可以说，喜剧就像共融宴席终场的表象；悲剧本身正是从这场宴席中被召唤出来。归根结底，是人在消费那里得到呈现的

属于他的实质和共同肉身；现在要知道，这会产生什么。

要理解它会产生什么，我相信绝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回到古代喜剧；后来的所有喜剧只是它的某种退化形式，但其中的特征仍然可辨。请回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如《公民大会妇女》《吕西斯特拉忒》和《地母节妇女》。

你们必须回到这些作品，才能看到它把我们引向何处；当然，在我开始向你们指出如下方向时，我参照的正是这些作品：

一旦主体自己的所指——也就是能指关系之结果所结出的果实——必须实际登上喜剧舞台并得到充分展开，喜剧便因某种内在必然性而显现出主体的这种关系。

这个词项本身必然指称那种所指之物：它收取、承担并享用同一个事实的关系，而该事实本身从根本上同能指秩序处在某种关系中；这就是那个名为阳具的所指的出现。

自从我向你们提出这个词项以后，只需翻开某部作品，我便发现了如下东西。此前，我曾很快勾勒莫里哀的《太太学堂》，把它视为这种根本喜剧关系的表象；此后几天里，我读到了一种在我看来极为独特的复现——如果我对阿里斯托芬喜剧的解读正确，它所复现的是一部真正非凡的喜剧杰作。这就是让·热内的《阳台》。让·热内的《阳台》是什么？

你们知道，这部戏的上演曾遭到相当激烈的反对。对此，我们当然不必惊讶；

在当前的戏剧状态中，可以说戏剧的实质与趣味主要在于演员以各种名目在舞台上表现自己；这自然会让那些前来认同于这种展示的人感到既惬意又刺激——我们只能直呼其名。

如果戏剧确实还是别的东西，我相信让·热内向我们分节出来的这部戏足以使我们感受到；但观众是否有能力听懂它，也并不确定。不

过，我觉得我们很难看不到它的戏剧趣味；现在我来试着向你们说明。

你们看，热内所谈的东西大致意味着如下内容。我并不是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与否毫不重要。高乃依作为高乃依，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但他仍然以极大的严密性完成了它……

- 如果人的功能只要涉及象征界，就包括那位据说能够捆绑和解开之人的权力——也就是基督赋予圣彼得的后继者及全体主教的权力［拉丁文 religere］——把罪与过错的秩序捆绑起来或解开；

- 如果判罪、审判与惩罚之人的权力，也就是法官的权力；

- 如果在那种远远超越战争的大现象中承担指挥之人的权力，也就是战争首领、通常所谓将军的权力；

- 如果所有这些人物都表象着一些功能，而主体相对于自己所承载的言说，在这些功能面前以某种方式陷入异化，因为该功能远远超越他的个别性；

- 如果这些人物突然都要服从喜剧的法则；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向自己表象：享用这些位置是什么样子。如此提问无疑把它们置于不敬的位置；但我们不能停在喜剧的不敬面前，而不试着了解再往前会产生什么。

当然，这总发生在某种危机时期。恰恰由于一连串错误选择的偏差，并且服从城邦那似乎在把它真正拖向毁灭的法律，雅典陷入最深的困厄；就在这个最高时刻，阿里斯托芬试图把人唤醒：我们终究正在这

场没有出路的战争中耗尽自己，还不如舒舒服服待在家里，重新找到自己的妻子。

这里严格说来并不是提出一种道德，而是在建议重新拾回人同自身状态的根本关系；至于其后果是否更为有益，我们无须知道。

于是，我们眼前这位“主教”、“法官”与“将军”，都是从以下问题出发得到提升的：

享用“主教”、“法官”或“将军”的身份，究竟可能是什么样子？由此，你们便能理解《阳台》所采用的机关：这座“阳台”无非就是所谓“幻象之家”。

事实上，在我置于这里的自我理想的不同形式层面发生的事情，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昇华的结果——仿佛根植于内部的功能被逐步中和；恰恰相反，它总或多或少伴随着象征关系的情欲化。

有些人以“主教”、“法官”或“将军”的地位和功能享用自己的身份；他们可以同所有幻象之家的经营者都熟悉的那种人相提并论：一个小老头前来满足于一种经过严格计算的位置，在短短一刻中承担极其怪异而多样的位置；同谋的女伴则愿意在这场合扮演同他相应的角色。

于是，我们看到某个信贷机构的雇员来到这里，披上祭司礼服，要一名顺从的妓女向他告解。她的告解当然只是一场仿制，但他需要真理以某种程度靠近它；换言之，他的同谋必须在意图上提供某些东西，让他能够从中看到同一种罪疚享乐的关系——他至少必须相信她也参与其中……诗人让·热内以何等艺术与抒情在我们面前延展这一人物的对话，正是作品的一大独特之处；这人物确实怪诞到了难以言表的

地步，而且以放大的尺度变得更加怪诞：热内让他踩上高跷，好让他的讽刺位置被抬得更高……我们在其中看到，倒错主体确实沉湎于寻求自己的满足，

在他使自己与之发生关系的某种东西中，也就是与一个形象发生关系；但这个形象是

某种本质上属于能指之物的反映。

换言之，热内在三个大场景中，把某种东西在倒错层面向我们呈现并赋予肉身；它从此获得了自己的名字。用粗粝的语言说，我们可以在一片大乱的日子里称它为："我们生活其中的整个妓院 / 烂摊子"；和一切社会一样，它总处在程度不等的退化状态中。

因为社会只能被界定为文化或深或浅的退化状态：整个妓院、也就是人与言说之间那些神圣而根本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全部混乱，都在那里、在它恰当的位置得到表象；而我们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所涉及的究竟是什么？

所涉及的，确实是某种把主体同法律功能的关系赋予肉身的东西；这些功能具有多种形式，甚至最神圣的形式，可它们本身又在一连串退化中延续。这里一度发生了一次跳跃：我们眼前处在"专家"姿态中的，无非正是"主教"本人、"法官"与"将军"——倒错术语就是这样说的；

他们把主体同言说功能的关系置于问题之中。

发生了什么？发生的是：如果这种关系已经掺假，如果在这种关系中人人都失败、无人能找到自己，它却仍然继续得到支撑。无论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得多么退化，这种关系毕竟仍然存在，仍然纯粹而简单地存续；即使不是作为对这种关系的依赖与合法承认，也至少是作为同如下事实相联系的东西：所谓“它的秩序”仍然存在。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已经陷入最极端的失序，同维持秩序的这种关系会缩减为什么？它缩减为所谓警察。

秩序那种名为维持秩序的最后诉求、最后权利与最后论据，借助如下建立而被创造：作为共同体最终的中心，它也呈现为共同体起源处的东西，即“三支交叉长矛”，位于广场中央。把全部秩序缩减为对秩序的维持，由热内戏剧中的核心枢轴人物——警察总监——赋予肉身。

假设如下，而且非常漂亮：警察总监本质上知道秩序的维持落在自己身上，自己以某种方式是最后的词项、全部权力的残余；但他的形象尚未升到足够高贵的程度，以至前来妓院的小老头中还没有一个要求获得警察总监的服饰、属性、角色与功能。

有人懂得扮演“法官”；为了让一个小妓女承认自己是小偷，他甚至进入她体内来取得这项供认，因为“如果你不是小偷，我怎么会是法官？”这个“法官”这样说。至于“将军”对他的母马说了些什么，我就略过不谈。相反，从来没有人要求成为警察总监。这当然纯属假设：我们对妓院的经验还不够多，无法知道警察总监是否早已升到这样一种人物的尊严——人们可以钻进他们的皮囊里享乐。

可是警察总监——因为这里的警察总监是整个妓院女老板的密友；我完全不是在这里做理论，也从未说过这些是具体事实——会前来焦急地询问："有没有人要求成为警察总监？"而这种事从未发生。

同样，警察总监也没有制服。我们已经看见"法官"的长袍与法冠、"将军"的军帽招摇展开，更不用说后者的长裤；但没有人为做爱而钻进警察总监的皮囊。戏剧的枢轴就在这里。

你们要知道，妓院内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外面的革命正在肆虐。里面发生的一切——我略过许多；阅读这部喜剧时，你们将获得大量发现的乐趣——

里面发生的一切远没有我说得这样图式化：有叫喊，有枪击，总之大家玩得很开心；外面则始终响着冲锋枪的哒哒声。

全城都在革命；这些女人当然都料想自己会壮烈死去，被那些黑发而

贞洁的女工屠杀；女工在这里被认为表象完整的人、真实的人——那种毫不怀疑自己的欲望能够走向实现、能够作为欲望本身以和谐方式确立价值的人。无产阶级意识始终相信道德能够成功；它对也好，错也好，没什么关系……

重要的是，让·热内向我们展示了这场冒险的结局——我不得不讲快一点。警察总监毫不怀疑，因为这就是他的功能。正由于这是他的功能——也正因此，戏剧才如此展开——警察总监毫不怀疑，革命"前后"都永远还是这个妓院 / 烂摊子。

他知道，这个意义上的革命是一场游戏；而且事情的确转瞬即变，我略过其中细节……这里还有一个十分精彩的场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来到幻象之家的中心，向这个友善群体说明王宫里发生的事——也就是权力处在最大合法性之处发生的事：王后绣着东西，又不绣；王后打着鼾，又不打鼾；王后绣一方小手帕，现在要决定中间绣什么——一只天鹅；人们还不知道天鹅将落在海上、池塘上，还是一杯茶上……我就略过象征最后消失的这一部分。

但随后发生的是，有人让自己成为革命的声音、革命的言说。她原是一名妓女，被一个正直的水管工带走，如今在街垒上戴着弗里吉亚帽，扮演女性角色；除此以外，她还是某种圣女贞德。也就是说，她懂得如何同他们说话、如何回答他们——她熟悉男性辩证法的一切角落，

因为她曾待在能够听见这种辩证法各个阶段逐一展开的地方。这位女子叫尚塔尔，戏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

转瞬之间，她便被抹去——也就是说，她身中一弹。紧接着，权力由这座房子的女主人伊尔玛、也就是妓院老板娘赋予肉身；她何等高超地承担了王后的功能！她不也是一个进入纯粹象征状态的人吗？正如剧中某处所说：“在她身上，除了珠宝，没有什么是真的。”

从这时起，我们抵达如下东西：那些人物、那些我们在整个第一幕看见其展示自身的倒错者被编入队伍，走向货真价实而完整的角色，

并承担他们曾在各式爱情嬉戏中赋予肉身的相应功能。

这时，警察总监同这些人物之间展开了一场颇为辛辣的政治对话。他当然需要他们来表象某种将取代先前遭到撼动的秩序的东西，并让他们承担这些功能；他们并非毫不抵触，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在一座房屋厚墙的温暖庇护下享乐是一回事——人们没有充分想到，正是在这种房屋中，秩序得到了最细致的保存——而暴露在现实承担这些功能所带来的狂风乃至责任之下，则是另一回事。

这里显然是直截了当的闹剧；但这正是主题，也正是我最后要强调的这出高雅闹剧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整场对话中，警察总监仍在挂念：

- “有没有人前来要求扮成警察总监？”
- “有没有人充分承认我的伟大？”

必须承认，至少在一瞬间，他在这场相遇中的想象位置也许获得了一种难以取得的满足。发生了什么？首先发生的是：他已经因无休止地等待那个事件而气馁；这个事件本该确认他进入一系列受尊重的功能，因为它们已经遭到亵渎。警察总监于是征询周围人的意见……他如今已经成功证明，唯有自己是秩序，是一切的枢轴；归根结底，这意味着最后除了铁腕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们在这里发现某种不乏意义的东西：弗洛伊德发现自我理想，大致恰好同这种人物的开场同时发生——他向政治共同体提供一种单一而容易的认同，也就是独裁者……警察总监向周围人征询意见，问是否适宜设计一种制服，以及同样能够表象其功能的象征；说到这里，他还颇为羞怯。

说实话，他的提议多少冒犯了听众：他建议用一根阳具。教会会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他转身询问“主教”；主教的法冠确实一度摇了

摇，显出几分犹豫，但他建议，若把它做成圣灵鸽子的模样，也许更容易接受。“将军”则建议把这个图案涂上国旗的颜色；诸如此类的其他建议使人想到，他们当然很快就会达成一份在这种场合所谓的政教协定。

就在这时，戏剧性突变爆发了。一个姑娘登台；在这部真正充满意义的戏里，我略过了她的角色。她刚刚经历某件事，激动得说话仍然断断续续；那件事不折不扣是：有个人原是那位救星的朋友——这件事本身也很有意义——

那位救星救出了后来成为革命象征的妓女。这个朋友就是水管工，房子里的人都认识他；他来找这位姑娘，要求得到一切能让他看起来像警察总监的人物装备。

众人震惊，喉咙发紧。我们的苦等终于到头了。一切都齐全，甚至包括警察总监的假发。总监猛地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有人回答：“只有你一个人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戴着假发。”

这个人物穿戴好那位真正构成戏剧英雄形象者的一切属性以后，做出了一个动作——确切说，是妓女做的：她把某件东西切下来，朝他脸上扔去，并含蓄地说，靠那件东西，他再也不能夺走任何人的童贞。警察总监眼看就要抵达满足的顶峰，仍立刻做了一个动作，检查自己是否还保留着那件东西。它确实还在；于是，他以人们提议的阳具制服形式进入象征状态，已经变得没有必要。

的确，从这个时刻起，一切都十分清楚：那个表象朴素欲望的人……也就是纯粹而简单的欲望，人在其中需要以一种能够真正、直接承担的方式，重新接上自己的实存、自己的思想，以及一种不再同他的肉

身纯然分离的价值……很清楚，正因为这里的主体表象着人——他曾为让我们迄今所谓的“妓院 / 烂摊子”重新获得它的平衡、规范，并被还原为某种能够作为完全属人的东西得到接受之物而战斗——所以，只有在他恰恰阉割自己的条件下，他才会在考验过后重新融入其中、把自己献给它。也就是说，他必须让阳具重新被还原为能指状态，还原为某种可以由那个人给予或收回、授予或不授予的东西。此刻，他同那个人相混同——而且以最明确的方式；喜剧就在这里结束——他同能指的创造者、“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形象相混同并重新接合。

喜剧就在这里结束；我们当然可以随意把其中的重音

落在亵渎神圣上，也可以严格说来落在滑稽上。我会重新采用并参照这些词项。你们将看到，它如何能在后面为我们充当路标，帮助我们处理欲望与享乐这个根本问题；今天，我想先为你们写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字母。

琼·里维埃：《女性气质作为假面》（1929）［返回 3 月 5 日正文］

精神分析研究所指向的每一个方向，似乎都依次引起了欧内斯特·琼斯的兴趣。近年来，研究逐渐扩展到女性性生活的发展；理所当然，我们会在这一主题最重要的贡献中发现他的一篇文章。一如既往，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天赋极大地照亮了材料：既澄清我们已有的知识，又加入他自己的新观察。

在《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1]一文中，他粗略勾画了女性发展的类型图式：首先分为异性恋与同性恋两类，随后又把同性恋一类分为两种。他承认这种分类只是粗略图式，并假定还存在若干中间类型。我今天

所关心的正是其中一种中间类型。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遇到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发展以异性恋为主，却明显表现出异性的强烈特征。这通常被视为我们每个人内在双性性的表现；而分析已经表明，看似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性格特征或性表现，其实是各种冲突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并不必然证明存在一种根本或基础倾向。同性恋与异性恋发展的差别，来自焦虑程度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发展的相应影响。费伦齐曾指出一种类似的行为反应：[2]同性恋男性会夸大自己的异性恋特征，以此"防御"自己的同性恋。我将试图说明，渴望男性气质的女人可能戴上女性气质的假面，以避开焦虑和她们所恐惧的男性报复。

我要讨论的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知识女性。不久以前，女性的智识追求几乎只同一种公开表现男性气质的女性类型相联系；在显著的病例中，她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或声称自己是男人的愿望。

[1] 本刊，第 8 卷，1927 年。

[2] 《男性同性恋的疾病分类学》，载《精神分析论文集》（1916）。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如今情形已经改变。在今天所有从事职业工作的女性中，很难断言究竟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更偏女性还是更偏男性。在大学、科学职业与商业生活中，我们不断遇见一些似乎符合女性完整发展全部标准的女人。她们是出色的妻子和母亲、能干的主妇；她们维持社会生活、促进文化；她们不缺少女性兴趣，例如注重个人仪表；而且一旦需要，她们还能在广泛的亲友圈中抽出时间，扮演投入而无私的母亲替代者。与此同时，她们至少能像一般男人一样履行职业职责。如何从心理上为这一类型分类，确实令人困惑。

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分析一位这种类型的女性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她几乎在每一点上都符合刚才的描述：她同丈夫关系极佳，两人有极亲密而深情的依恋，也有充分而频繁的性享乐；她以自己料理家务的能力为荣。她一生的职业生涯十分成功，对现实具有高度适应力，能够同几乎所有接触的人维持良好而恰当的关系。

然而，她生活中的某些反应表明，她的稳定并不像表面那样毫无裂缝；其中一个反应可以说明我的主题。她是一位美国女性，从事某种宣传工作，主要是演说和写作。她一生中每次公开表现——例如面对听众演讲——以后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焦虑，有时非常严重。尽管她的成功、智识与实践能力都无可置疑，而且善于驾驭听众、处理讨论等，她事后整夜仍会兴奋不安，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不恰当的事，并执着地需要得到安慰。每逢这类场合，这种安慰的需要都会强迫她在活动结束时，从某个或某些男人那里寻求注意或赞美；她刚刚在活动中担任主角或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快就清楚了，她为此选择的男人总是毫无疑问的父亲人物，尽管他们对她表现的判断往往并没有多少实际分量。

她从这些父亲人物那里寻求的安慰显然有两类：第一种是直接安慰，即对她表现的赞扬；第二种、更重要的，是来自这些男人的性关注这种间接安慰。概括来说，对她表现之后行为的分析表明，她试图以或多或少隐晦的调情和卖弄风情，从这种特定类型的男人那里引出性接近。这个态度紧接在她进行智识表现时高度非人格化、客观的态度之后，两者格外不协调，构成了一个问题。

分析表明，她同母亲竞争的俄狄浦斯情境极为尖锐，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稍后我还会回到这一点。除了同母亲的冲突，她同父亲的竞争也非常强烈。她以演说与写作为形式的智识工作，建立在对父亲

明显的认同之上；父亲起初从事文学，后来进入政治生活。她的青春期以有意识地反抗父亲为特征，既同他竞争，又蔑视他。分析经常揭示出这种阉割丈夫的梦与幻想。她十分清楚地感觉自己同许多父亲人物竞争，并声称比他们优越；可她在完成自己的表现后，又会追求他们的好感！任何暗示她不如他们的说法都会引起她强烈怨恨；私下里，她拒绝接受自己应当服从他们判断或批评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她明确对应于欧内斯特·琼斯勾勒的一种类型：第一类同性恋女性对其他女人毫无兴趣，却希望男人“承认”自己的男性气质，声称自己同男人平等；换言之，她们声称自己就是男人。不过，她的怨恨并不公开表达；公开场合，她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

分析随后揭示了她强迫性抛媚眼和卖弄风情的原因——在分析使它显明以前，她本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她无意识地试图防止一种焦虑：完成智识表现后，她预料父亲人物会报复她，由此产生焦虑。她在公开场合成功展示自己的智识能力，意味着她展示自己占有父亲的阴茎，并已经把他阉割。展示一结束，她便被可怕的恐惧攫住，害怕父亲随即施加报复。试图在性方面把自己献给这位复仇者，显然是安抚他的一步。后来发现，这种幻想在她于美国南方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十分常见：如果一个黑人前来袭击她，她打算让他亲吻并爱抚自己来防卫（最终再把他交给司法机关）。但这种强迫行为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决定因素。她做过一个梦，内容颇似童年的这个幻想：她独自在屋里，十分恐惧；随后一个黑人进来，发现她正在洗衣服，袖子卷起，露出手臂。她抵抗他，心里却秘密打算在性方面吸引他；他开始赞美她的手臂，继而抚摸手臂和乳房。这个梦的含义是：她杀死父亲和母亲，把一切据为己有（独自在屋里）；随后害怕他们报复（预期子弹会穿窗射入）；于是，她采取卑微角色（洗衣服）来保护自己，并把

污垢、汗水、罪疚和鲜血——她通过罪行取得的一切——全都洗掉，把自己“伪装”为一个仅仅遭到阉割的女人。在这种装扮下，男人不会在她身上发现需要通过袭击夺回的赃物；而且还会觉得她作为爱之客体颇具吸引力。因此，这项强迫的目的不只是激起男人对她的友好感情，从而取得安慰；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把自己装扮成无罪而天真的人来确保安全。这是对她智识表现的一种强迫性反转；两者共同形成了强迫行为的“双重动作”，正如她的整个生活由男性活动与女性活动交替构成。

在这个梦以前，她曾梦见人们把假面戴在脸上，以避开灾难。其中一个梦里，山上的高塔被推倒，坠向下方村庄的居民；但人们戴上假面，因而没有受伤！

所以，女性气质可以被承担并像假面一样佩戴；它既掩盖对男性气质的占有，也避开一旦这种占有被发现便会发生的报复——这很像小偷翻出口袋，要求别人搜身，以证明自己没有赃物。读者现在或许会问：我如何界定女性气质，或者如何在真正的女性气质与“假面”之间划界？然而，我并不是说二者存在这种差别；无论根本还是表面，它们都是同一回事。这个女人具备女性气质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最彻底的同性恋女性也具备这种能力——但由于她的冲突，它并不代表她发展的主线；与其说它是性享乐的首要方式，不如说它更多被用作避开焦虑的手段。

我用几个简要细节来说明。她结婚很晚，二十九岁才结婚；她对破处极度焦虑，婚前曾让一位女医生扩张或切开处女膜。婚前，她对性交的态度是一种坚定决心：她一定要获得并体验她知道一些女人会从中获得的享乐、快乐与性高潮。她像男人一样害怕性无能。这部分是因为她决心超越某些性冷淡的母亲人物；但在更深层面，是因为她决心

不被男人击败。[3]事实上，她的性享乐充分而频繁，并伴有完整性高潮；然而事实表明，这种满足的性质是安慰，是恢复某种已经失去的东西，归根结底并非纯粹享乐。男人的爱把自尊还给她。在分析中，随着她对丈夫那种敌对的阉割冲动逐渐显露，她对性交的欲望大幅减退，并一度变得相对性冷淡。女性气质的假面正在被剥去；她或者显现为受到阉割（没有生命、不能快乐），或者显现为想要阉割（因而害怕接受阴茎，或通过满足来欢迎它）。有一段时间，丈夫同另一名女人发生恋情；她发现自己面对这个女情敌时非常强烈地认同丈夫。值得注意的是，她没有同性恋经历（青春期以前曾同妹妹有过）；但分析显示，这种缺失由频繁出现并伴随强烈性高潮的同性恋之梦补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女性气质假面采取一些奇特形式。我认识一位能干的主妇，她能力很强，自己能够处理典型的男性事务。但每当建筑工或装潢工上门，她便强迫性地向他们隐藏全部技术知识，向工人表示恭顺，并以天真朴素的方式提出建议，仿佛那些建议只是“碰巧猜中”。她向我承认，即使面对实际上受她铁腕支配的肉贩和面包师，她也无法公开采取坚定而直截了当的立场；

[3] 我在若干女性受分析者身上发现过这种态度；而几乎所有这些人（五例）都有自行安排破处的行为。参照弗洛伊德《处女禁忌》，后面这个症状行为颇具启发性。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她仿佛觉得自己在“扮演角色”，装出一个缺乏教养、愚蠢而不知所措的女人的样子，可最终总能达到目的。在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关系里，这位女人都是优雅而有教养的女士，能力出众、见识丰富，能够通过

明智理性的行为处理事务，无须任何迂回手段。她如今五十岁，但她告诉我，年轻时只要同脚夫、侍者、出租车司机、商贩，或任何其他可能怀有敌意的父亲人物——如医生、建筑工和律师——打交道，她就会非常焦虑；而且她常同这类男人争吵，发生口角，指责他们欺诈自己等等。

日常观察中的另一个病例是一位聪明的妻子和母亲；她是大学讲师，讲授一种很少吸引女性的深奥学科。当听众不是学生而是同事时，她会特意选择非常女性化的服装；她在这些场合的行为也有一个不合宜的特征：她变得轻佻、爱开玩笑，严重到引来议论与斥责。她不得不把向男人展示自己男性气质的场合当成一场“游戏”，当成某种不是真的东西，当成一个“笑话”。她不能认真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学科，不能认真设想自己同男人处在平等地位；此外，这种轻佻态度让她的一部分施虐冲动得以逸出，所以才会冒犯别人。

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实例；在对显性同性恋男性的分析中，我也遇到类似机制。其中一个男人有严重抑制和焦虑；他的同性恋活动实际上退居其次，最大的性满足来源是在特殊条件下手淫，也就是穿着某种特别服装照镜子。看见自己头发从中间分开、系着领结，会让他兴奋。后来发现，这些异乎寻常的“恋物”表象着把自己伪装成妹妹；发式和蝴蝶结都取自妹妹。他的意识态度是渴望成为女人，但他同男人的显性关系从不稳定。在无意识中，同性恋关系完全属于施虐性质，并以男性竞争为基础。他只有在从镜中得到消除焦虑的安慰、确认自己已经安全地“伪装成女人”时，才可以沉溺于施虐和“占有阴茎”的幻想。

回到我首先描述的病例。很清楚，在她表面上令人满意的异性恋之下，这个女人表现出了人们熟知的阉割情结。霍妮是最早指出这个情

结在俄狄浦斯情境中的来源的人之一；我相信，女性气质可以被当作假面承担这一事实，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沿这个方向分析女性发展。为此，我现在将简要勾勒本例力比多的早期发展。

不过在此以前，我必须说明她同女性的关系。她意识到自己会同几乎所有相貌出众或自诩聪慧的女人竞争；也意识到自己面对几乎每一个经常来往的女人，都会闪过仇恨。但只要涉及同女人建立持久或亲密关系，她仍能建立非常令人满意的基础。在无意识中，她几乎完全通过在某方面觉得自己优于她们来做到这一点（她同地位低于自己者的关系一律很好）。她擅长家务，很大程度上正植根于此；借此，她超越母亲，赢得母亲赞许，并证明自己优于那些作为情敌的“女性化”女人。她的智识成就无疑也有部分相同目的，也证明她优于母亲。看来很可能，从她长成女人以后，她同女人的竞争在智识方面比在美貌方面更尖锐，因为谈到美貌，她通常可以退守到自己更优越的头脑中。

分析表明，她对男性与女性作出这一切反应的起源，都在于她在口腔—咬噬的施虐阶段对父母的反应。这些反应采取了梅兰妮·克莱因在 1927 年大会论文中勾勒的幻想形式。[4]吮乳或断奶期间的失望或挫折，同原初场景中的经验结合；后者以口腔术语得到解释，结果便产生针对父母双方的极强施虐冲动。[5]咬掉乳头的欲望发生转移，继而出现摧毁、穿透、剖开母亲肚腹，并吞噬她及其身体内容物的欲望。这些内容物包括父亲的阴茎、母亲的粪便和孩子——她的全部所有物与爱之客体；它们被想象为

[4] 《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本刊第 9 卷，1928 年。

[5] 欧内斯特·琼斯，前引文，第 469 页；他把口腔—施虐阶段的强化视为女性同性恋发展的核心特征。

处在她的身体之内。[6]我们知道，咬掉乳头的欲望也会转移为咬掉父亲阴茎、从而阉割他的欲望。在这一阶段，父母双方都是情敌，双方都占有所欲望的客体；施虐冲动同时指向两者，也害怕双方的复仇。但就像女孩一贯的情形，母亲更遭憎恨，因而也更令人恐惧。她会施加与罪行相称的惩罚：摧毁女孩的身体、美貌、孩子与生育能力；使她残缺，吞噬、折磨并杀死她。在这种骇人的困境中，女孩只有一条安全之路：安抚母亲，并为自己的罪行赎罪。她必须退出同母亲的竞争；如果可能，还要努力把自己偷走的东西还给母亲。我们知道，她认同于父亲；随后，她把由此获得的男性气质用于为母亲服务。她成为父亲、取代父亲，因而能够把父亲“归还”给母亲。这个位置在我的病人生活中许多典型情境里都十分清楚。她乐于运用自己的强大实践能力，帮助较为弱小无助的女人；只要竞争没有过于强烈地出现，她就能成功维持这一态度。但这种偿还只能在一个条件下进行：她必须得到丰厚回报，也就是感谢与“承认”。她以为，所欲望的承认是别人欠她的，因为她作出了自我牺牲；但在更无意识的层面，她所要求的是承认她占有可以归还的阴茎，因而具有至高地位。如果她的至高地位不获承认，竞争便立即变得尖锐；若感谢和承认被扣下，她的施虐冲动就会全力爆发，私下陷入口腔—施虐的暴怒发作，酷似一个发狂的婴儿。

她对父亲的怨恨以两种方式产生：（1）在原初场景中，父亲从母亲那里取走了孩子缺少的乳汁等物；（2）同时，他把阴茎或孩子给了母亲，而没有给她。所以，父亲所拥有或取走的一切，都应由她从他那里夺走；他像母亲一样遭到阉割并化为虚无。她对父亲的恐惧虽然从未像对母亲那样尖锐，却始终存在；部分原因还在于，她预期他会为母亲遭到杀害和摧毁而复仇。因此，他也必须得到安抚与平息。她为父亲披上女性装束的假面，以此向他显示自己的“爱”与清白。

由于这不是我的论证所必需的，我略去了她同孩子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很有意义的是，虽然这个女人的假面对其他女人是透明的，对男人却十分奏效，很好地达到了目的。许多男人由此被她吸引，并通过表示好感给她安慰。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些男人本身都属于害怕过度女性化女人的类型。他们更喜欢自身具有男性属性的女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女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较少。

在原初场景中，父母双方都占有而她独缺的护身符，就是父亲的阴茎；她的暴怒、恐惧与无助由此而来。[7]她剥夺父亲的阴茎并据为己有，由此获得那件护身符——不可战胜的宝剑、“施虐的器官”；父亲则变得无力而无助（她温顺的丈夫）。但她仍以女性顺从的假面面对他，防范他的攻击；在这层掩护下，她“为他”履行许多男性功能（她的实践能力与管理）。面对母亲也同样：她抢走母亲的阴茎，摧毁母亲，把她贬到可怜的低下位置；她战胜母亲，但依然秘密地这样做；表面上，她承认并钦佩“女性化”女人的美德。不过，防范女人报复的任务比防范男人更难。她试图以归还阴茎、用它为母亲服务的方式安抚母亲并作出修复，却永远不够；这个手段被她运用到精疲力竭，有时几乎也把她本人耗死。

所以，看来这个女人通过在幻想中创造一种自己占据至高地位、无人能够伤害她的情境，使自己免于因针对父母双方的施虐暴怒而产生的不可忍受的焦虑。幻想的本质是她凌驾于父母客体之上的至高地位；她的施虐冲动由此得到满足，她战胜了父母。又正是凭借同一至高地位，她成功避开了他们的复仇；她采用的手段是反向形成，并掩藏自己的敌意。于是，她能够同时满足本我冲动、自恋自我和超我。这种幻想是她整个生活与性格的主动力；她几乎把它贯彻到了完美无缺的

地步。但它的弱点在于，无论经过怎样伪装，对至高地位的这种需要都带有夸大妄想的性质。当这种至高地位在分析中受到严重动摇时，

[7] 参见 M. N. 西尔：《未成熟自我的危险情境》，牛津大会，1929 年。

她会坠入焦虑、暴怒与卑屈抑郁的深渊；在分析以前，则会陷入疾病。

我想简要谈谈欧内斯特·琼斯所说的那类同性恋女人；她们的目标是让男人“承认”自己的男性气质。问题是：这类人的承认需要，是否同我所描述病例中以不同方式运作的同一需要——让别人承认她所作的服务——联系在一起？在我的病例中，她并不公开要求别人直接承认她占有阴茎；她要求别人承认的是那些反向形成，尽管只有占有阴茎才使它们成为可能。因此，她仍在间接要求承认阴茎。之所以采取这种间接方式，是因为她害怕自己占有阴茎会“被承认”，换言之，会“被识破”。可以看出，如果焦虑少一些，我的病人也会公开要求男人承认她占有阴茎；实际上，她私下也像琼斯的病例一样，对这种直接承认的任何欠缺深感怨恨。显然，在琼斯的病例中，原初施虐冲动获得了更多满足：父亲已经被阉割，甚至还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但这些女人又如何避开焦虑？就母亲而言，当然是通过否认她的实存。根据我所作分析中的种种迹象，我的结论是：首先，如琼斯暗示，这项要求只是原初施虐要求的移置——乳头、乳汁、阴茎等所欲望的客体应当立刻交出来；其次，承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获得赦免的需要。母亲如今已被放逐到灵薄狱，不可能再同她发生关系。母亲的实存看来遭到否认，实际上却正因为太令人恐惧。所以，战胜父母双方的罪疚只能由父亲赦免；如果父亲通过承认她占有阴茎来批准这项占有，她就安全了。父亲把承认给予她，也就是把阴茎给予她，而且是

给她而不是给母亲；这样，她就拥有它，也获准拥有它，一切便都安然无事。“承认”总有一部分是安慰、批准与爱；此外，它让她重新占据至高位置。男人也许完全不知道，可对她而言，他已经承认自己败北。所以，这种女人同父亲的幻想关系在内容上类似于正常的俄狄浦斯关系，差别在于它以施虐冲动为基础。她确实杀死了母亲，却也因此无法享用母亲所拥有的许多东西；至于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东西，她仍须在很大程度上强取逼索。

这些结论迫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问题：充分发展的女性气质，其本质是什么？什么是 das ewig Weibliche，即“永恒女性”？把女性气质理解为一副假面——男人怀疑它背后隐藏某种危险——稍稍照亮了这个谜。如海伦娜·多伊奇与欧内斯特·琼斯所说，充分发展的异性恋女性状态以口腔—吮吸阶段为基础。其中唯一属于原初层次的满足，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乳头、乳汁）阴茎、精液和孩子；其余一切都依靠反向形成。对“阉割”的接受、谦卑以及对男人的钦佩，部分来自口腔—吮吸层面对客体的过度估价；但主要来自放弃——或减弱——源于较后口腔—咬噬层次的施虐性阉割愿望。“我不能拿，甚至不能开口要；它必须被给予我。”自我牺牲、奉献和自我弃绝的能力，表现了修复与补偿的努力：无论面对母亲人物还是父亲人物，都要归还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这也是拉德所谓具有最高价值的“自恋保险”。

由此可见，完整异性恋的获得如何同生殖器性的获得相重合。我们再次看到，正如亚伯拉罕首先指出的，生殖器性意味着抵达一种后矛盾情感状态。“正常”女人和同性恋女人都欲望父亲的阴茎，都反抗挫折（或阉割）；两者的差别之一，在于施虐冲动的程度不同，也在于这两类女人处理施虐冲动及其引发的焦虑的能力不同。

## 欧内斯特·琼斯：《阳具期》[1]

如果仔细研究过去十年间，特别是女性分析家对女性性欲早期发展这一公认晦暗的问题所作的众多重要贡献，就会察觉不同作者之间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也开始显现在男性性欲领域。多数作者都值得赞许地着意强调自己同同事意见一致之处，以致分歧倾向并非总能得到充分表达。我的目的，是毫无保留地考察这种倾向，希望使它凝结成形。如果存在混乱，最好把它澄清；如果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就应当通过界定分歧，为进一步研究提出有趣问题。为此，我将选择阳具期作为主题。它的范围相当明确，但我们会看到，它的分支延伸到大多数更深而未解决的问题。在 1927 年因斯布鲁克大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2]我曾提出：女性性欲发展中的阳具期，与其说是简单而直接的发展过程，不如说是对心理冲突的一种具有防御性质的次生解决；去年，弗洛伊德教授[3]宣布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当时，我对男性阳具期也已抱有类似怀疑，但由于论文只讨论女性性欲，便没有谈论它；最近，霍妮博士[4]对男性阳具期概念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我将借此机会评论她提出的论据。

[1] 1932 年 9 月 4 日在威斯巴登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作简要宣读；同年 10 月 19 日与 11 月 2 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作全文宣读。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4 卷，1933 年。

[2] 第二十五章。

[3]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3 卷，1932 年，第 297 页。

[4] 卡伦·霍妮：《对女人的恐惧》，《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3 卷，1932 年，第 353 页。

我先提醒你们，在弗洛伊德[1]对阳具期的描述中，两性共同的根本特征，是相信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生殖器官——男性器官。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信念的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年龄，两性都还没有发现女性器官。所以，人类不是被分为拥有男性器官的人和拥有女性器官的人，而是被分为有阴茎者和无阴茎者：一类占有阴茎，一类遭到阉割。男孩起初相信所有人都属于前一类；只有随着恐惧被唤起，他才开始怀疑后一类存在。女孩也持同样看法，只不过这里应使用相应说法——“占有阴蒂的一类”；只有把自己的生殖器同男性生殖器比较以后，她才形成残缺者这一类别的观念，而自己属于这一类。两性都竭力拒绝接受第二类别的信念，而且理由相同：都想拒绝相信阉割这一假定现实。弗洛伊德勾画的这幅图景，你们都很熟悉；它所依据的那些唾手可得的观察事实，也已得到反复确认。不过，对事实的解释当然是另一回事，并没有这么容易。

现在，我想请你们注意弗洛伊德论述中隐含、但为了清晰起见还须进一步强调的一点：阳具期看来存在两个不同阶段。我知道，弗洛伊德会把同一个“阳具期”术语同时用于两者，因此没有明确划分。两者中的第一个——让我们称之为初次阳具期——至少在意识中，以天真或无知为标志；这里不存在围绕问题事项的冲突，因为孩子确信世界其他部分和自己构造相同，都拥有令人满意的男性器官——视情况而定，是阴茎或阴蒂。在第二个阶段，即再次阳具期，孩子开始隐约怀疑世界分成两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而是占有阴茎者与遭到阉割者（尽管这两种分类实际上大体重合）。至少在当前语境

中，再次阳具期似乎比初次阳具期更具神经症性质，因为它伴随焦虑、冲突，以及拒绝接受那种被感为

[1] 弗洛伊德：《力比多的幼儿生殖器组织》，《论文集》（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1924 年）第二卷，第 245 页。

现实——也就是阉割——的努力；男孩一方过度补偿性地强调阴茎的自恋价值，女孩一方则希望与绝望交织。

显然，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别由阉割观念标示；依弗洛伊德之见，这个观念在两性那里都同对解剖学性别差异的实际观察相联系。众所周知，他认为[1]，对遭到阉割的恐惧或想法，会削弱两性的男性冲动。在男孩那里，他认为这会把男孩从母亲身边驱开，并强化阳具态度与同性恋态度；也就是说，男孩为了保住阴茎，会放弃一部分乱伦的异性恋。而在女孩那里，它却幸运地产生相反效果，推动她进入一种女性的异性恋态度。所以，按照这种观点，阉割情结削弱男孩的俄狄浦斯关系，却强化女孩的俄狄浦斯关系；它把男孩驱赶进入再次阳具期，而女孩在该层面短暂抗议以后，则被它驱赶离开再次阳具期。

由于男孩的发展据说得到了更好的理解，也可能是两者中较为简单的一种，我将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熟悉男孩阳具期的自恋性质；弗洛伊德说，它在四岁左右达到顶点，不过在此以前显然早已表现出来。[2]我这里特别指再次阳具期。它同早期阶段存在两个突出差别：（1）施虐性较弱，主要残余是全能幻想的倾向；（2）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仍然保留的主要他体情欲属性是其展示癖方面。因此，它攻击性较弱，同其他人——特别是女人——的关系也较少。这项变化如何发生？看来，这是一次朝向幻想、离开同其他人真实接触世界的变化。如果如

此，这本身就足以使人怀疑其中存在一种逃避成分；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朝向更大现实与更成熟适应的自然演化。

[1] 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的若干心理后果》，《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8 卷，1927 年，第 133、141 页。

本文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时，三位儿童分析家（梅兰妮·克莱因、梅利塔·施米德贝格和妮娜·西尔）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在第一年结束以前就能检测到再次阳具期的痕迹。

在一种情形中，这项怀疑显然得到有力支持，也就是阳具期持续到成年生活时。用精神分析的显微镜考察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以利用神经症与倒错提供的那种熟悉放大效果。阐明其中运作的因素，会给我们提供线索，指导我们在考察所谓正常时把注意力投向何处；你们或许记得，弗洛伊德正是循此道路，才总体上抵达正常人的幼儿性欲。现在，在这些成人病例中，我们很容易确认性生活中存在次生因素，尤其是恐惧与罪疚因素。我特别想到的类型，是这样一个常有疑病倾向的男人：他关注自己的阴茎（或其象征替代物）的大小与质量，对女人只有微弱冲动；特别是穿透冲动显著微弱，甚至根本不存在。自恋、展示癖（或过度谦逊）、手淫和程度不一的同性恋，都是常见的伴随特征。分析很容易看出，所有这些抑制都是由深刻焦虑推动的压抑或防御；稍后我会讨论这种焦虑的性质。

这些经验让我们的目光看清了自恋性阳具主义的次生性质；现在可以转向男孩时期的类似态度——我仍指再次阳具期，而且是显著实例——我主张，我们在那里能够发现充分证据，得出类似结论。首先，图景本质上相同：自恋地集中于阴茎，并对其大小和质量抱有怀疑或不确定。梅兰妮·克莱因[1]在近作“阴茎自豪的次生强化”一节中，详细

讨论了阴茎在帮助男孩掌控源自各方的深刻焦虑时具有的价值。她主张，对阳具主义的自恋性夸大——也就是阳具期，尽管她在这一语境中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来自应对特别大量焦虑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在这一时期的性好奇——弗洛伊德[2]在最初讨论这个主题的论文中特别强调它——很大部分不是对女性的兴趣，而是自己同其他男性之间的比较。这同

[1]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1932年），第 341 页。

[2] 弗洛伊德：《幼儿生殖器组织》，前引文，第 246 页。

穿透冲动的显著缺席相吻合；按逻辑说，这种冲动本会引向对其互补项的好奇与寻找。卡伦·霍妮[1]曾正确地特别强调这种受抑制的穿透；穿透冲动毫无疑问是阴茎功能的主要特征，因此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恰在阴茎观念主导整个图景之处，阴茎最显著的特征却不在场。我丝毫不相信这是因为相关特征尚未发展，仿佛这种迟滞或许源于对阴道对应物的纯粹无知。恰恰相反，特别是儿童分析家已经表明，在更早阶段，男婴的幻想、游戏和其他活动中存在大量施虐性穿透倾向的证据。我完全赞同卡伦·霍妮[2]的结论："未被发现的阴道，就是遭到否认的阴道。"我禁不住把这种所谓的阴道无知，同当时流行的一种民族学神话相比：野蛮人不知道性交与受孕之间的关系。两种情况下，他们都知道，却不知道自己知道。换言之，知识存在，但它是无意识知识，通过无数象征方式揭示出来。意识层面的无知很像年轻女人的"天真"——即使在这个开明时代仍然存在；它只是未获批准或令人恐惧的知识，因此仍停留在无意识中。

在成年生活中对阳具阶段记忆所作的实际分析，其结果同前面提到的阳具阶段持续到成年生活时的情形一致，也同阳具阶段本身所作的儿童分析[3]结果一致。正如弗洛伊德首先指出的，自恋地集中于阴茎同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并行。人们也普遍同意，前者次生于后者，或者至少次生于阉割恐惧。进一步看也不难发现，这两种恐惧——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与对阉割的恐惧——彼此关系格外密切；对当前这组问题的任何解决，如果不能同时照亮两者，就不可能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本人谈到女性生殖器时没有使用“焦虑”一词，而是说对它感到“惊骇”［Abscheu］。

[1] 卡伦·霍妮：《对女人的恐惧》，前引文，第 353—354 页。

[2] 同上，第 358 页。

[3] 尤其参见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

“惊骇”一词具有描述性，但它意味着此前存在阉割恐惧，所以反过来又要求我们解释这种恐惧。弗洛伊德的一些段落读起来仿佛对女性的惊骇是一种简单恐惧症，用来保护男孩免于想到遭到阉割的人，就像保护他避开看到独腿者一样；但我确信，他会承认阉割观念同女性这个特殊的“遭阉割”器官之间存在更具体的关系；两种观念必定内在相连。我认为，他暗示的是：这种惊骇以联想方式提醒男孩，那些拥有女性愿望或被当作女人对待的人（如女人）会遭遇可怕的事情——也就是阉割。我们早就知道，男孩在这里确实把交媾等同于其中一个伴侣遭到阉割；他显然害怕自己可能成为那个不幸的伴侣。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记得：对神经症性阳具男孩来说，女性遭到阉割的观念不只意味着某物被切掉，还意味着切开一道孔洞；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把外

阴视为“伤口”的理论。在日常实践中，若不把这种恐惧理解为一种受到压抑的愿望——在交媾中扮演女性一方，而且显然是面对父亲——我们就很难理解它。否则，阉割与交媾不会被等同。害怕这个愿望得到实现，当然能解释对遭到阉割的恐惧，因为按照定义，它们是同一回事；这也能解释对女性生殖器的“惊骇”——也就是那些愿望已经得到满足的场所。不过，男孩把交媾等同于阉割，似乎意味着他此前已具备有关穿透的知识。而且按照这个假设，人们不容易给予阉割恐惧同围绕占有母亲而同父亲竞争——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之间那种众所周知的关系以充分分量。但我们至少能看到，女性愿望必然是整个问题的枢纽点。

关于阳具期的意义，看来存在两种观点；现在我将试着确定两者在哪些方面对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协调。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简单观点与复杂观点。一方面，可以假定男孩处在性无知中，一直认为母亲自然拥有自己的阴茎，直到实际看见女性生殖器，并结合他自己关于阉割的观念（尤其是他把交媾等同于阉割），才不情愿地怀疑母亲已经遭到阉割。这符合我们所知的他希望相信母亲有阴茎的愿望。这种简单观点相当轻率地掠过了两个显然更早的问题：男孩从哪里得到交媾与阉割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暂且把它搁置。另一方面，可以假定男孩从很早起就在无意识中知道，母亲不只具有嘴和肛门，还有一个他可以穿透的开口。然而，由于我们片刻后要讨论的理由，穿透的想法会带来阉割恐惧；为了防御这种恐惧，他抹去自己的穿透冲动与关于阴道的一切观念，分别以阳具自恋和坚持母亲同样拥有阴茎来取代它们。第二种观点对男孩坚持母亲有阴茎给出了一种不那么简单——而且公认更加迂远——的解释：事实上，他害怕母亲有女性器官，超过害怕她有男性器官，因为前者会带来穿透其中的想法与危险。如果世界上只有男性器官，就不

会有嫉妒性冲突，也不会有阉割恐惧；外阴观念必定先于阉割观念。如果没有一个需要穿透的危险腔穴，就不会有阉割恐惧。当然，这一说法假定冲突与危险来自他同父亲抱有相同愿望，都要穿透同一个腔穴；我同梅兰妮·克莱因及其他儿童分析家一样，相信最早期就已经如此，并不只是在意识发现这个腔穴以后。

现在，我们来到阉割恐惧来源这个棘手问题。不同作者对它持不同观点；其中一些或许只是重音差异，另一些则指向对立的构想。卡伦·霍妮[1]最近结合男孩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讨论了这个问题，态度十分明确。谈到对外阴的恐惧，她说："弗洛伊德的论述未能解释这种焦虑。男孩面对父亲产生的阉割焦虑，不足以说明他为何害怕一个已经遭受这种惩罚的存在。除了对父亲的恐惧，还必定存在进一步的恐惧，其客体是女人或女性生殖器。"她甚至提出一种罕见看法：对外阴的这种恐惧不仅

[1] 卡伦·霍妮：《对女人的恐惧》，前引文，第 351 页。

早于对父亲阴茎的恐惧——无论阴茎在外部，还是藏在阴道中——而且比后者更深、更重要；事实上，许多对父亲阴茎的恐惧只是人为地被推到前台，用来遮掩对外阴的强烈恐惧。[1]这当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结论，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要从数量上估量来自不同来源的焦虑，确有技术困难。我们怀着好奇倾听她如何解释面对母亲的这种强烈焦虑。她提到梅兰妮·克莱因的观点：男孩面对自己针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冲动，会产生以牙还牙式的恐惧；不过，她认为男孩恐惧外阴的最重要来源，是害怕知道自己的阴茎不够大，无法满足母亲，从而伤害自尊——母亲拒绝他的愿望，被他解释为这一含义；母亲会以阉割进行报复的恐惧出现得更晚，也不如受嘲笑的恐惧重要。[2]诚然，临床上

经常能够鲜明看到这种动机有多强；但我怀疑霍妮博士是否已把它分析得足够深入。根据我的经验，这里所涉及的深刻羞耻——它当然可以表现为性无能——并不只是来自把嘲笑恐惧当作最终事实；羞耻与嘲笑恐惧都来自一个更深的情结：面对并入母亲身体的父亲阴茎，男孩采取一种女性态度。卡伦·霍妮也注意到这种女性态度，甚至把阉割恐惧的主要来源归于它；但对她来说，这是害怕嘲笑的次生后果。我们在这里再次被带回女性气质问题；很可能，令人满意地回答它，也就解决了整个问题。

现在，我将试着重构并评论卡伦·霍妮关于外阴恐惧与阉割恐惧之联系的论证。起初，男孩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对自由。卡伦·霍妮引用弗洛伊德关于原初双性性的著名观点，支持她相信女性愿望是原初的。也许确有这种原初女性愿望；但我确信，只有当它们被发展或利用为处理令人恐惧的父亲阴茎之手段时，冲突才会产生。然而，霍妮认为，在此以前，男孩已经对母亲拒绝其愿望作出反应，并因此感到上述羞耻和深刻无能感。

[1] 同上，第 352、356 页。

[2] 同上，第 357 页。

按照她的说法，其结果是，他再也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女性愿望。论证在这里出现一个缺口。首先，我们应当假定男孩立刻把自己的阳具不足等同于女性状态，但这种等同如何发生，并未得到解释。无论如何，他现在为此前的女性愿望感到羞耻，并害怕它们得到满足，因为那意味着父亲会阉割他——事实上，这正是阉割恐惧的根本原因。这里的论证显然又有一个大缺口：父亲如何突然登场？论证的关键——我同霍妮博士意见相左之处——看来如下：母亲的拒绝让男孩感到失

败，使他从男性愿望退回女性愿望；继而，他把这些女性愿望施于父亲，却害怕它们得到满足，因为那将承认自己在男性方面低人一等（而且也等同于阉割）。这颇令人想起阿德勒早年关于男性抗议的观点。我的经验恰恰相反：我在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在同父亲进行令人恐惧的竞争中，看见关键转折点。男孩正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境，才退回一种伴随阉割风险的女性态度。霍妮博士把女性态度看作原初态度；男孩因为害怕自己的男性不足遭到嘲笑，转而压抑它，嘲笑恐惧是主动的动力因素。我的看法则是：无能感本身以及伴随的羞耻，都次生于女性态度，也次生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动机。这一整组观念在具有“小阴茎”情结、并常伴有性无能的男人身上最强；我们也正是在他们身上最清楚地看见其发生。这样的男人真正感到羞耻的，并不是他的阴茎“小”，而是它为什么“小”。

另一方面，我完全赞同卡伦·霍妮及其他研究者——尤其梅兰妮·克莱因[1]——的观点：男孩对俄狄浦斯情结关键情境的反应，极大地受到他此前同母亲关系的影响。但这件事比自尊受伤复杂得多；远为严酷的因素正在运作。梅兰妮·克莱因强调，男孩针对母亲身体怀有施虐冲动，会害怕母亲的报复；这种恐惧可以独立于对父亲或父亲阴茎的任何想法，尽管她

[1] 梅兰妮·克莱因：《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9 卷，1928 年，第 167 页。

也会同意，后者强化了男孩的施虐冲动，从而使图景更加复杂。不过，正如她曾详细指出，[1]这些施虐冲动本身有一段复杂历史。要理解其中起作用的力量的性质，我们必须从摄食层面开始。这一层面的匮乏——也许特别是口腔匮乏——无疑极其重要，会使在生殖器层面应

对父母的任务更加困难；但我们想确切知道为什么如此。我可以讲述若干男性病人的病例：他们之所以无法在同男人或女人的关系中达到成年男性状态，严格说来都同一种态度相关——他们需要先从女人那里取得某种东西，而那当然是他们实际永远无法取得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充分接近乳头，会让男孩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占有自己的阴茎？我完全确信二者密切相关，尽管其逻辑联系显然并不直观。

我不知道，生命第一年的男孩会在多大程度上基于自然认同，确信母亲有一个同自己一样的生殖器官；但我的印象是，在这个观念卷入其他联想以前，他不会认真关注它。第一项联想看来是乳头与阴茎的象征等价。在这里，母亲的阴茎主要是一个更令人满足、更富营养的乳头；单就体积而言，它在这方面就明显占优。那么，一对分列两侧的器官——乳房——究竟如何变成一个位于中线的器官——阴茎？这件事发生时，是否意味着男孩也许通过原初场景的经验或幻想，已经遭遇父亲阴茎的观念？还是说，甚至在这以前，他早期的手淫经验——它经常同口腔经验相联系——再加上他对自己阴茎普遍表现出的口腔态度，就足以造成这种认同？我倾向于后一个意见，但很难取得毫不含糊的资料。不过，无论哪一种解释正确，对神话性母亲阴茎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必然是矛盾情感的。一方面，人们构想一个可见、因而可接近、友善且富有营养的器官，可以接受并吮吸它。另一方面，由口腔挫折所激起的施虐冲动——正是最初创造这个构想的因素——必定通过投射，创造出一种阴险、敌对而危险的器官观念；

[1] 见《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中的多篇论文。

男孩必须通过吞下并摧毁它，才会感到安全。这种矛盾情感始于对母亲乳头（以及乳头—阴茎）的态度；当父亲阴茎卷入联想时，它会大

为增强。我确信，这在生命很早期——肯定在第二年以前——就已经发生。它完全可以同实际经验乃至父亲是否真实存在无关，主要由男孩自己阴茎中的力比多感觉及其不可避免地伴随的穿透冲动产生。矛盾态度的两面都被强化。一方面，模仿父亲的倾向同从他那里获得力量的观念发生关系——首先是以口腔方式；另一方面，则产生众所周知的俄狄浦斯竞争与敌意，而它最初也借助口腔消灭来处理。

关于口腔层面的这些考量，开始照亮我早先提出的谜：为什么许多男人觉得，若不先从女人那里取出某种东西，就无法把某种东西放进她体内？为什么他们无法穿透？或者更广泛地说，为什么他们必须先经过一个令人满意的“女性”阶段，随后才能在男性阶段感到自在？我早已指出，整个问题的秘密必定藏在男孩的女性愿望中。第一条线索是，这个女性阶段属于摄食层面，首先是口腔层面。这一阶段的愿望得到满足，必须先于男性发展；如果在这方面失败，主体便会固着于口腔或肛门层面的女人。这种固着虽然源于焦虑，却可能在倒错形式中遭到强烈情欲化。

现在，我将试着进一步回答这个谜；为了简化，我将分别考察男孩面对母亲和父亲的困难。不过，我必须先强调这种分开的人为性。当我们把父母视为两个不同存在，分别加以观察时，我们正在做一件婴儿还无法做到、而且在婴儿最隐秘的幻想中并不怎么关心的事。我们人为剖开一个概念的诸要素；对婴儿来说，这些要素仍然紧密交织——梅兰妮·克莱因恰当地把它称作“合体父母概念”。

儿童分析的发现，使我们越来越重视依附于这个概念的幻想与情感。我很倾向于认为，弗洛伊德及其他作者最近使用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一词，在很大范围内必定对应于由“合体父母”概念支配的生命阶段。

无论如何，让我们先只考察同母亲的关系。完全撇开父亲的阴茎，我们面对的谜是：男孩从母亲那里取得某物，同他稳妥占有自己阴茎的使用权有何关系？我相信，口腔与阳具之间的这项联系，在于二者共有的施虐冲动。口腔挫折唤起施虐冲动；在幻想中，穿透性阴茎被用作施虐武器，以达到所欲望的口腔目标：为乳汁、粪便、乳头、婴儿等等打开一条通道，而婴儿想把这一切都吞下去。我前面提到的、对女人具有倒错性口腔固着的病人，全都具有高度施虐性。“牙齿 = 阴茎”的等式相当为人熟知，它必定始于发展的这个施虐性前生殖器阶段。施虐性阴茎也具有重要肛门联系——例如常见的幻想：用阴茎从肠道里取出婴儿。于是，阴茎本身同取得的态度相联系；后者遭到阻挠，又等同于前者遭到阻挠——也就是说，无法取得乳汁等物，等同于无法使用阴茎。阻挠进一步导致害怕母亲报复并损伤武器本身。我甚至偶尔发现，这等同于最早的挫折。母亲扣留乳头，使她呈现为囤积乳头或阴茎的人；她必定会永远保留任何靠近自己的阴茎。在这种病例中，男孩的施虐冲动可以采取某种双重虚张声势：以施虐策略扣下女人可能欲望的一切——例如通过性无能。

同母亲的这项冲突无疑为后来的困难奠定基础；但我的经验似乎告诉我，在阉割恐惧的发生中，同父亲的冲突应当得到更大重视。不过，我必须立刻补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在男孩的想象中，母亲的生殖器长期同居住其中的父亲阴茎观念不可分离；所以，如果只关注他同现实“外部”父亲的关系，就会得到一种非常错误的视角。这或许正是弗洛伊德所谓前俄狄浦斯阶段同严格意义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之间的真正差别。造成极大部分麻烦的，是那根隐藏并栖居其中的阴茎——进入母亲身体或被她吞下的阴茎，是出没于泄殖腔区域的巨龙。某些男孩试图以直接的阳具方式处理它：在幻想中使用自己的阴茎，穿透阴道并碾碎其中父亲的阴茎；甚至——我多次发现——把这种幻想推进

到穿透父亲身体本身的程度，也就是鸡奸。顺带说一句，我们再次看到，这如何说明父亲与母亲意象具有紧密可互换性：男孩可以吮吸其中任一方，也可以穿透其中任一方。不过，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以女性方式处理父亲阴茎的重要倾向。最好说“以表面上的女性方式”，因为真正的女性方式要积极得多。我的根本意思是“以口腔—施虐和肛门—施虐方式”；我相信，源于这个层面的消灭态度，为各种表面上的女性态度提供了钥匙：消灭由嘴和肛门、牙齿、粪便，以及在阳具层面由尿液来完成。我一再发现，这种敌对而破坏性的倾向，不只藏在男人对一切女性气质显然充满矛盾情感的态度背后，也藏在讨好别人的深情愿望背后。毕竟，表面顺从的退让，是敌对意图所能想象到的最佳假面。这种女性气质大多以占有并摧毁令人恐惧的客体为最终目标。在完成这件事以前，男孩并不安全；他无法真正关注女人，更不用说穿透她们。他还会把同父亲阴茎相关的口腔与肛门破坏态度，投射到假定容纳它的腔穴上。较早针对母亲身体的口腔与阳具施虐冲动，以及它们以牙还牙的后果，促进了这种投射。摧毁父亲的阴茎，还意味着抢走爱阴茎的母亲所占有的东西。所以，穿透这个腔穴会像他所知道的父亲阴茎穿进自己的嘴一样，对他自己的阴茎具有破坏性。由此，我们得到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简单公式：我针对父亲阴茎的那些所谓女性的——也就是口腔破坏性的——愿望如此强烈；如果我心中仍怀有这些愿望而穿进母亲的阴道，同样的命运就会降临于我。也就是说，如果我同母亲性交，父亲就会阉割我。穿透等同于摧毁；或者回到前面使用的更熟悉说法：交媾等同于阉割。但关键点在于，遭阉割的并不是母亲，而是男孩本人或他的父亲。

考察阉割焦虑的不同来源，以及男性中的女性气质问题以后，我现在回到最初问题：为什么处于阳具期的男孩需要想象母亲确实有一根阴

茎？我还要把它同另一个不常被提出的问题结合起来：那究竟是谁的阴茎？前面的考量已经给出答案；为免重复，我只把它表述为一个命题：母亲身上若有一根可见阴茎，就会立即让早期口腔需要得到安慰，否认有必要诉诸危险的施虐冲动来处理匮乏；最重要的是，它让人确信阉割从未发生，父亲和男孩本人都没有遭到阉割的危险。这个结论也回答了母亲必须拥有谁的阴茎这一问题。[1]那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她自己的，来自男孩最早的口腔需要；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它是父亲的阴茎。不过，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男孩自己的，因为他的命运通过父亲和本人共同面临的阉割危险，同它相连。

为什么实际看见女性生殖器会标志着从初次阳具期过渡到再次阳具期，也须得到解释。它像青春期经验一样，使此前只属于幻想生活的东西显现出来，使阉割恐惧获得现实性。然而，它并不是通过传达父亲阉割了母亲这一观念做到的——那只是在意识中的合理化假面——而是通过唤起一种可能：某个受到压抑的危险愿望可能在现实中得到满足，也就是同母亲性交并摧毁父亲阴茎的愿望。尽管有人提出各种相反说法，俄狄浦斯情结仍为阳具期问题提供了钥匙，就像它曾为许多其他问题提供钥匙一样。

我们已经远离如下构想：男孩此前不知道性别差异；当他发现一个男人以暴力创造出这种差异——阉割伴侣，把她变成女人、变成一种遭阉割的造物——便感到惊骇。即便撇开对童年早期的实际分析，认为男孩对性别差异没有直觉，仅从逻辑上看也很难成立。我们已经看到，（再次）阳具期依赖阉割恐惧，而阉割恐惧反过来意味着

[1] 梅兰妮·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333 页）中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阴茎的女人'永远意味着拥有父亲阴茎的女人。"

穿透的危险；仅凭这一点便可推出，对一个可被穿透之腔穴的直觉，是整个复杂反应的早期基础假定。弗洛伊德说，男孩为了保住阴茎而放弃自己对母亲的乱伦愿望；这就意味着，阴茎是那些愿望（在初次阳具期）的冒犯性载体。那么，这些危及阴茎存在的阴茎愿望，如果不是履行阴茎的自然功能——穿透——还能是什么？实际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一推论。

现在，我可以概括所得结论。主要结论是：男孩的典型阳具阶段与其说是性发展中的自然演化，不如说是一种神经症妥协。当然，它的强度有所不同，大概随阉割恐惧的强度而变；但只有阉割恐惧——也就是幼儿神经症——不可避免到何种程度，它才能被称为不可避免。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只有当我们积累更多儿童分析经验以后才能知道。无论如何，单是放弃乱伦愿望的需要，并不会使它不可避免；产生阳具期的不是外部情境，而是男孩内部发展中或许可以避免的复杂化。为了避开俄狄浦斯情境中那些想象出来并由自身创造的危险，阳具期男孩放弃男性穿透态度，同时放弃对母亲身体内部的一切兴趣，转而坚持自己与"母亲"的外部阴茎确实存在。这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逝"——为了保住阴茎而放弃母亲——但它并不是演化中的直接阶段；恰恰相反，男孩后来必须折返自己的脚步才能继续演化，重新要求自己曾放弃的东西——抵达阴道的男性冲动；他必须从暂时的神经症性再次阳具期，返回原初而正常的初次阳具期。因此，在我看来，典型阳具期——也就是再次阳具期——与其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阶段，不如说是发展的神经症障碍。[1]

[1] 这里提出的结论同我最常辩论的两位作者——弗洛伊德与卡伦·霍妮——的观点在哪些方面相同或不同，或许值得一提。与弗洛伊德一致的根本观点是：从初次阳具期过渡到再次阳具期，源于害怕父亲施行阉割，而且这种恐惧从根本上产生于俄狄浦斯情境。我想，弗洛伊德也会认为，许多阉割恐惧背后的女性愿望，是作为应对既受爱又令人恐惧的父亲之手段而产生；他可能更强调以力比多方式安抚父亲的观念，而我则更多关注女性态度背后的敌对与破坏冲动。另一方面，我不能赞同弗洛伊德一再坚持的性无知观点——尽管在一段关于原初场景与原初幻想的论述中（《文集》第 11 卷，第 11 页），他似乎保持问题开放——而且我认为，所谓遭阉割的母亲，从本质上说是其男人遭到阉割的母亲。我也不认为再次阳具期是发展的自然阶段。我同卡伦·霍妮一致之处，是她对性无知的怀疑、对（再次）阳具期正常性的质疑，以及她认为男孩对俄狄浦斯情境的反应极大受到此前母子关系影响。但我认为，她对后两者之间联系的说明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阉割恐惧背后都有男孩对自身女性愿望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并不产生于他在同母亲关系中为字面意义上的男性不足感到羞耻，而产生于他的摄食性施虐冲动在俄狄浦斯情境中运作时所带来的危险。

现在转向女孩身上的相应问题。我们首先可以指出，前面区分的初次阳具期与再次阳具期，在女孩那里甚至比在男孩那里更加突出。以至于当我提出女孩的阳具期表象着冲突的次生解决时，我以为阳具期所指的，就是如今在我看来只占其后一半的东西；弗洛伊德教授最近在通信中纠正了这个误解。顺带说一句，他对我的说法的谴责[1]也部分基于同一误会，因为他那一方自然以为我在指整个阶段。作为开脱，我可以指出：弗洛伊德在最初论文中以其极端晦暗为由，没有说明女孩的阳具期；而他给出的定义——在这个阶段，人们相信性别差异存在

于占有阴茎者与遭阉割者之间——严格说来只适用于再次阳具期，因为第一个阶段假定还不知道阴茎。

在弗洛伊德的构想中，这一阶段前后两半的差别，同前面指出的男孩情形相似。按照他的看法，阴蒂至上在某个年龄开始；女孩当时不知道阴蒂与阴茎的差别，因此在这件事上处于满足而幸福的状态。我暂且称之为女孩的初次阳具期；它对应于男孩同样被假定不知道性别差异的阶段。在再次阳具期——我曾提出这是一种次生防御反应——女孩意识到差异，并像男孩一样，或者不情愿地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怨恨

[1]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97 页。

便随之而来；或者她试图否认它。不过，同据称存在于男孩那里的情形不同，这种否认意味着女孩对差异已有某种真实知识；因为她并不是坚持此前的信念——两性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阴蒂——而是希望自己如今拥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器官，即一根真正的阴茎。同性恋女人的行为含蓄地、梦则明确地揭示她们相信自己确实有阴茎；在她们那里，这种愿望一直延伸到想象性实现。不过，即使较为正常的女孩处于再次阳具期时，相信自己有阴茎的信念也同希望拥有阴茎的愿望交替出现。

同男孩一样，这个阶段的前后两半由阉割观念划分，也就是认为女人无非都是遭到阉割的人，并不存在真正的女性器官。再次阳具阶段的男孩希望恢复初次阳具阶段的安全，因为假定发现阉割已经扰乱了这种安全：他要回到两性最初的同一。再次阳具阶段的女孩同样希望恢复未受扰乱的初次阳具阶段，甚至强化其阳具性质；也就是说，回到两性最初的同一。我认为，这是对弗洛伊德构想更明确的表述。

关于女性的性发展，看来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为了凸显二者对照，我会在下面这个过度简化的说法中把它们夸大。按照一种观点，女孩的性欲起初在本质上是男性的（至少断奶以后如此）；男性态度失败（对阴蒂失望），把她驱赶进女性状态。按照另一种观点，女孩的性欲起初在本质上是女性的；女性态度失败，则把她——或多或少暂时地——驱赶进阳具性的男性状态。

这显然是一种不完善的表述，对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够公允，但它可以为讨论指出一个方向。我分别称两种观点为 A 与 B，并加入一些显而易见的修正，使其更准确，也缩小它们之间的粗略差异。A 的支持者当然会承认早期双性性，但坚持男性（阴蒂）态度占主导；他们也会同意，再次阳具期存在所谓退行（焦虑）因素，不过认为它们不如维持原初男性状态的力比多冲动重要。另一边，B 的支持者也会承认早期双性性：除更为突出的女性状态以外，还有早期阴蒂性的男性状态；或者更谨慎地说，不预先裁决任何问题：主动目标与被动目标并存，并倾向于同特定生殖器区域发生联系。他们还会承认，在固着于母亲的早期阶段，表面上往往很少爱父亲；父亲主要被视为竞争者。在再次阳具期，他们也会同意，直接的自体情欲、因而属于力比多的阴茎妒羡，同焦虑因素一起，在把女孩从女性状态驱赶进阳具性男性状态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人们普遍同意，看见阴茎的经验对从初次阳具期过渡到再次阳具期产生强烈影响，但并不同意它为何会产生这种影响。进一步说，两种观点都同意，在再次阳具期，女孩欲望一根阴茎，[1]并因自己缺少阴茎而责怪母亲；但她欲望谁的阴茎，以及为何欲望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然而，即使经过这些修正，围绕这一阶段的前后两半仍存在意见分歧，而且绝不只是重音的差异。在考察男性性发展中的相应晦暗时，

强调阉割恐惧问题同外阴恐惧问题之间的关联，证明十分有用。这里，我同样要突出女孩希望拥有阴茎的问题同她憎恨母亲的问题之间的关联；因为我确信，解释其中一个，也就是解释另一个。我还要提前透露结论：或许可能用一个公式，把男性的这组问题等式同女性的等式结合起来。

为了阐明上述两种对立观点，我将利用弗洛伊德提供的两条线索。第一条包含在他下面的评论中：[2]女孩最早对母亲的依恋，“在分析中，在我看来如此难以捉摸；它消失在如此昏暗、朦胧的过去中，又如此难以复苏，仿佛曾遭受某种格外无情的压抑。”我们必定都同意

[1] 顺带在这里评论一下，“欲望一根阴茎”“对阴茎的愿望”等说法带有令人遗憾的含混性。关于女性幼儿性欲，这类说法实际可以区分出三种含义：（1）希望获得一根阴茎，通常通过吞咽，并把它保留在体内，且经常在那里把它转化成婴儿；（2）希望在阴蒂区域占有一根阴茎；为此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获得它；（3）成年后希望在性交中享用一根阴茎。我会尽量在每种情形中说明所指的是哪种含义。

[2]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82 页。

他所指出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有赖于更细致地分析女孩最早期依恋母亲的阶段；关于较晚发展阶段的意见分歧，很可能主要——也许完全——来自对早期阶段所作的不同假定。

举一个例子：弗洛伊德[1]批评卡伦·霍妮时，把她的观点描述为：女孩因为害怕向女性气质推进，在再次阳具期发生退行。他如此确信，早先的（阴蒂）阶段只能是阳具阶段。但争议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对持相反观点者而言，刚才提到的过程不是退行，而是神经症性新形

成。这个问题应当讨论。我们不应过于理所当然地认为，阴蒂的使用在心理上完全等同于阴茎的使用，只因为两者在生理发生上同源。单纯的可接近性也可能发挥作用；毕竟，阴蒂是女性生殖器的一部分。临床上，阴蒂手淫与男性态度之间的对应远非固定不变。一方面，我知道有一个病例：由于先天畸形，阴蒂无法发挥功能，但外阴手淫的类型却明显属于男性型（俯卧姿势等）。另一方面，成年人的阴蒂手淫伴随着最突出的女性异性恋幻想，是日常经验；梅兰妮·克莱因[2]还指出，这种结合是最早婴儿期的特征。在因斯布鲁克论文中，我曾提出，阴道兴奋在最早童年期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承认的更重要——这同弗洛伊德[3]认为它到青春期才开始的意见相反。若干女性分析家此前已经表达这种观点：梅兰妮·克莱因[4]（1924）、约西娜·米勒[5]（1925）与卡伦·霍妮[6]（1926）。我最初得出这个意见，是根据

[1]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96 页。

[2]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288 页。

[3]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83 页。

[4] 梅兰妮·克莱因：《对一名六岁儿童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大会，维尔茨堡，1924 年 10 月 11 日。

[5] 约西娜·米勒：《女孩生殖器阶段力比多发展问题的一项贡献》，《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3 卷，1932 年，第 361 页。

[6] 卡伦·霍妮：《逃离女性状态》，《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7 卷，1926 年，第 334 页。她在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4 卷第 57 页的一篇论文中，全面支持了这一意见。

同约西娜·米勒引用的材料属于同一类的材料，也就是强烈男性倾向与阴道麻木并存的女人。这个遭到深刻压抑的早期阴道功能，最重要的特点是伴随异乎寻常的大量焦虑（远多于阴蒂功能）；我们还得回到这一点。医生往往认为，在生命最初四五年里，实际阴道手淫比阴蒂手淫更常见；而在潜伏期肯定不是这样——这个事实本身就在提示，态度从女性向更男性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过，除了实际的阴道功能，从成人分析与早期分析中还能取得大量关于童年早期女性幻想与愿望的证据：同嘴、外阴、子宫、肛门，以及身体整体的接受态度相关的幻想。由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在我们对这个极早阶段的性欲了解更多以前，女性婴儿是否以阴蒂、因而以男性状态为首要的问题，完全可以保持悬置。

另一个因基本假定不同而产生误解的相关例子，涉及再次阳具期的强度与方向（目标）问题。弗洛伊德认为，强度与方向都应通过初次阳具的男性阶段解释，而看见阴茎的创伤只是强化它；他批评卡伦·霍妮只相信方向由初次阳具期给定，强度则来自较晚的（焦虑）因素。[1] 然而，只要卡伦·霍妮是 B 观点的支持者——我当然无法说她在多大程度上是——她所主张的，恰好会是弗洛伊德归给她的观点的反面：她会同意，再次阳具期的强度来自早先阶段（尽管发生了移置）；她同弗洛伊德的差别只在于认为其方向并非由此产生，而主要由次生因素决定。这一切再次取决于：早期阶段究竟被视为主要属于男性、自体情欲，还是主要属于女性、他体情欲。

弗洛伊德[2]似乎认为，许多幼女长期而排他地依恋母亲这一事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称作发展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在那里，父亲只发挥很小而且负面的作用（竞争）。

[1]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96 页。

[2] 同上。

这些观察事实无可怀疑——我本人也可以举一个极端病例：对母亲的排他依恋一直持续到接近青春期，到了这个年龄，又同样排他地转移到父亲身上。但这些事实本身并不排除女孩的无意识想象中存在正向俄狄浦斯情结；它们只证明，如果这种情结确实存在，它还没有学会在同现实父亲的关系中表达自己。然而，根据我对这类典型病例的经验，以及儿童分析家——特别是梅兰妮·克莱因、梅利塔·施米德贝格与妮娜·西尔——的经验，分析表明，女孩从很早起就具有明确指向一根想象性阴茎的冲动；这根阴茎被并入母亲，却源于父亲，同时还伴有关于父母交媾的复杂幻想。在这里，我要再次提醒你们，本文前半部分强调了“合体父母概念”，即父母在交媾中融为一体的图景。

这把我们引向刚才提到的第二条线索。它涉及幼女关于交媾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她的性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就当前问题而言，它们应当很有帮助，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早已表明——儿童的性理论是其特殊性构造的一面镜子。几年前，弗洛伊德教授写信告诉我，在女性性发展的一片晦暗中，他最确信的两点之一，是幼女最早对交媾的观念属于口腔性质，也就是口交。[1]他像往常一样，把手指放在了一个核心点上。不过，问题可能更为复杂；无论如何，这项核心考量有几个值得追究的推论。首先，如果对交媾的最初想法出现在婴儿自身的口腔经验数年以后，纯粹口腔式的构想便不大可能形成。对这个早期阶段的详细分析——特别是儿童分析——证实了可以预料的事情：经验与构想不仅在发生上，而且在时间上密切相关。梅兰妮·克莱因[2]

极为重视哺乳期不可避免的不完美与不满足对儿童欲望的刺激作用，并会把它同

[1] 我也可以引述另一点，因为来自这样一位权威的任何断言都必然引人关注。

另一点是：女孩因为对阴蒂（与阴茎相比）感到不满而放弃手淫。

[2]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326 页。

断奶时期同对母亲最深的敌意来源联系起来，也同一个初露端倪的观念联系起来：一件类似阴茎的客体，是一种更令人满足的乳头。乳头愿望会转移到阴茎观念上，而两种客体在想象中广泛得到认同，这一点相当为人熟知；但这种转移何时开始施于父亲本人，却很难断言。我认为可以肯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更多施于母亲而不是父亲——也就是说，女孩在母亲身上寻找阴茎。到了生命第二年，这种含糊愿望变得更明确，并同如下观念联系起来：母亲的阴茎来自父亲，母亲在假定的父母口交行为中取得了它。

其次，口交观念很难局限于毫无目的的吮吸。孩子很清楚，吮吸是为了某个目的——为了取得某种东西。因此，乳汁（或精液）与（乳头—）阴茎都是可以吞咽的东西；借助人们熟悉的象征等式，也部分借助孩子自己的摄食经验，我们还会抵达粪便与婴儿的观念——它们同样来自这一原始吮吸行为。弗洛伊德[1]认为，儿童的爱与性欲从根本上没有目标［ziellos］，正因如此，它们注定失望。相反的观点则是：无意识中存在非常明确的目标，失望是因为这些目标没有达到。

我想在这里说明，我认为此处所指的愿望本质上属于他体情欲。女婴尚未有机会在看见男孩阴茎时发展出自体情欲的妒羡；出于卡伦·霍妮清楚陈述的那些理由，[2]女孩希望自己占有阴茎的愿望出现得更晚。在早期阶段，通过嘴把阴茎纳入身体，并用它造出一个（粪便性的）婴儿的愿望，虽然仍处于摄食层面，却类似于成年女性的他体情欲。弗洛伊德[3]认为，女孩希望拥有阴茎的愿望遭到挫败以后，就由一个替代物取代——希望有孩子的愿望。不过，我更赞同梅兰妮·克莱因[4]的观点：阴茎—孩子等式更为内在；女孩希望有孩子的愿望——像正常女人的愿望一样——直接延续了

[1]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86 页。

[2] 卡伦·霍妮：《女性阉割情结的发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5 卷，1924 年，第 52—54 页。

[3] 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的若干心理后果》，前引文，第 140 页。

[4]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309 页。

她对阴茎的他体情欲；她想享受把阴茎纳入身体、用它造出孩子，而不是因为无法拥有自己的阴茎才想要孩子。

这些愿望纯粹属于力比多的性质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我只提其中一种。乳头插入口腔以后，便是排出粪便时的肛门情欲快乐；女孩往往把与此相伴的清洁过程，感受为同母亲（或保姆）的性经验。这项观察的要点是：母亲的手或手指被等同于阴茎，并经常构成导致手淫的诱惑。

如果母亲从父亲那里取得这一切——正是女孩渴望的一切——那么，一种正常的俄狄浦斯竞争情境必定存在，而且严格同女孩自身的不满足成正比。伴随的敌意，同她此前在哺乳期对母亲怀有的敌意一脉相承，属于同一序列，并强化后者。母亲得到女孩想要、却不肯给她的某种东西；父亲阴茎的观念很快越来越明确地凝结在这件东西之中。母亲同女孩竞争并获胜，从父亲那里取得阴茎，也取得可以用阴茎造出的婴儿。这不同于弗洛伊德[1]那项分量十足的断言：俄狄浦斯情结概念严格说来只适用于男孩；“只有在男孩那里，才会发生爱父母一方与憎恨另一方情敌的致命结合。”看来，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比国王更保皇。

不过，我们由之出发的弗洛伊德交媾—口交论，并不能解释他所坚持的那项重要观察：[2]女婴觉得自己同父亲竞争。事实上，把交媾构想为口交，看来只是故事的一半。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互补观念：父亲不只给予母亲，也从她那里接受；简言之，母亲给他喂奶。正是在这里，同父亲的直接竞争如此强烈，因为母亲正在把女孩想要的东西（乳头和乳汁）给他；稍后我还会提到同父亲竞争、憎恨并怨恨的其他来源。当这种可以称作“乳房口交”的构想受到施虐性的

[1]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84 页。

[2] 同上，第 282 页。

投注时，我们便得到人们熟悉的女性主义观念：男人“使用”女人，耗尽、抽干、剥削女人，等等。

女婴无疑认同于这些构想的双方；但就事情的性质来说，她想要与接受的欲望必定比给予的欲望更突出，因为在这个年龄，她想要的如此之多，能够给予的如此之少。

那么，海伦娜·多伊奇、让娜·朗普尔—德·格鲁特、梅兰妮·克莱因及其他女性分析家记录的、针对母亲的阳具活动又如何？我们不能忘记，儿童很早便把阴茎不只理解为爱的工具，也理解为毁灭武器。女孩很大程度上因为无法忍受受阻，而对母亲身体陷入施虐暴怒；她抓住一切武器——嘴、手、脚。就此而言，阴茎的施虐价值，以及它所赋予的引导破坏性尿液的力量，或许并不是她妒羡男孩的最小用途。我们知道，阻挠会刺激施虐冲动；从婴儿的幻想和实际行为判断，看来很难高估婴儿身上的施虐冲动量。以牙还牙的原则让它导致相应恐惧；同样，我们很难高估婴儿恐惧的深度与强度。我们必须把两性的性发展视为在每一点上都受到应对恐惧之需要的影响；而且我必须赞同梅兰妮·克莱因[1]的怀疑：弗洛伊德[2]曾公开试图在不参照超我——也就是罪疚与恐惧因素——的情况下描绘性发展，这项努力是否成功。

这里，我不得不怀疑：弗洛伊德是否过于重视女孩对外部器官（阴蒂—阴茎）的关切，因而牺牲了她对自己身体内部的可怕恐惧。我确信，对她来说，内部是远为强烈的焦虑来源；她经常炫示对外部的关切，把它当作防御态度。梅兰妮·克莱因[3]对女性发展最初几年所作的敏锐研究，极其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结论。约西娜·米勒[4]恰当地指出，女孩有两个生殖器官这一解剖事实——内部的阴道（与子宫）和外部的阴蒂——使她能够在前者受到威胁时，把情欲性

[1]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323 页。

[2]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94 页。

[3]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269 页及以下。

[4] 约西娜·米勒，前引文，第 363 页。

从内部器官移置到外部器官。归根结底，怀有罪疚的女孩最核心的恐惧——甚至在意识中——是自己永远无法生育，也就是内部器官已经受到损伤。这令我们想到海伦娜·多伊奇[1]提出的三项等价的女性恐惧：阉割、破处与分娩——尽管第一项须得到谨慎界定；也令我们想到成年人典型地害怕“内部疾病”，尤其害怕子宫癌。

早期对母亲的恐惧同对母亲的憎恨一样，会转移到父亲身上；恐惧与憎恨往往以奇特方式集中于阴茎观念本身。正如男孩把自己的施虐冲动投射到女性器官，随后利用这些危险器官作为以同性恋方式摧毁父亲的手段；女孩也把自己的施虐冲动投射到男性器官，而且结果大体类似。最奇特的经验之一，就是发现一个以同性恋方式投身于取得阴茎之事业的女人，同时恐惧、厌恶并憎恨任何真实阴茎。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可以瞥见围绕阴茎发展起来的恐惧与惊骇：它是一切致命武器中最具破坏力的一件；而它穿透身体内部的观念可以多么骇人。[2]这项特殊投射极其重要，以至我们必须追问：女孩有多少恐惧来自她的施虐愿望——咬掉（并吞下）阴茎，从母亲、后来从父亲身上撕下它——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这根危险的阴茎会穿透她，因为它是以施虐方式构想的。我们很难断言，但这里很可能就是问题的中心。

随着女孩长大，当她更清楚地理解父亲才真正占有（并扣留）阴茎时，经常把对母亲的怨恨转移到父亲身上。弗洛伊德[3]把敌意、怨恨与不满从母亲向父亲的这种奇特转移，引用为它不可能来自同母亲竞争

的证据；但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至少还有另一种可能解释。父亲的在场会刺激对阴茎的他体情欲；它遭到阻挠所引发的怨恨，先施于母亲、后施于父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条支流还汇入了因父亲阻挠力比多欲望而产生的

[1] 海伦娜·多伊奇：《受虐狂在女性心理生活中的意义》，《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1 卷，1930 年，第 48 页。

[2]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击打幻想如此常见；其中的穿透遭到规避。

[3]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81、286 页。

怨恨：这种阻挠还使女孩暴露在对母亲的恐惧中。因为，只要某项愿望会招致惩罚恐惧，满足这项愿望就可能是抵御焦虑的最有力保障——至少无意识通常这样相信；所以，任何拒绝这项满足的人都犯下双重罪行：他同时拒绝了力比多快乐与安全。

当我们试图重构再次阳具期的发展时，必须牢记整个背景；它无疑只是实际复杂性的一小部分。此时，女孩在意识中觉察到男性身上连接着一根真实阴茎；她典型的反应是希望自己也占有一根。她为什么恰好具有这个愿望？她想拿阴茎做什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对它的回答，也必须同时回答另一个同样关键的问题：女孩对母亲的敌意来自哪里？在这里，A、B 两种观点之间出现了相当明确的分野，应当能够刺激进一步研究。

A 观点对两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无疑比 B 观点的回答更简单。按照 A 的看法，女孩希望占有她看见的阴茎，因为她向来珍视这种东西；她在其中看到，自己关于一个有效阴蒂的最狂野梦想得到了 n 次方的实现。

这件事并不包含严重的内部冲突，只有怨恨；尤其是针对母亲的怨恨，因为她把随之不可避免的失望归咎于母亲。对阴茎的妒羡，是她离开母亲的主要理由。阴蒂—阴茎的实际价值看来本质上属于自体情欲；多年前，卡伦·霍妮对此作出了最佳阐述。[1]这项愿望几乎完全属于力比多，方向同女孩此前的倾向一致。当这项愿望受挫，女孩便退回一种女性的、乱伦性的他体情欲态度，但那只是次优选择。对女性气质可能存在的任何所谓防御——或者更准确说，对它的反对——与其说由对女性气质本身的深刻恐惧支配，不如说由保留男性阴蒂—阴茎位置的欲望支配，因为女性气质会危及这个位置；换言之，就像男孩面对这一替代选择时会作出的反对——因为它等同于阉割。

[1] 卡伦·霍妮：《女性阉割情结的发生》，前引文。

简言之，这种观点用一个主要因素——希望占有阴蒂—阴茎的自体情欲——同时解释对母亲的憎恨与再次阳具期的力量；它既简单又前后一致。但问题是，它是否同样完整——也就是说，它对初次阳具期的基本假定，是否适当考虑了所有可查明的因素。

B　　观点的回答是：女孩起初以他体情欲方式欲望阴茎，却像男孩一样，因为害怕同他体情欲愿望相连的假定危险，而被驱赶进一种自体情欲位置（再次阳具期）。这里，我可以引用几位作者，鲜明说明两种对立观点。一方面，海伦娜·多伊奇[1]同弗洛伊德一致，写道：“我的观点是，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由阉割情结开启。”另一方面，卡伦·霍妮[2]谈到“这些逃进男性角色的典型动机——它们源于俄狄浦斯情结”；梅兰妮·克莱因[3]则断言：“在我看来，女孩对自身女性态度的防御，与其说来自她的男性倾向，不如说来自她对母亲的恐惧。”

所以，男性形式的自体情欲在这里是次优选择；女孩采用它，是因为女性气质——真正得到欲望的东西——会带来危险与不可忍受的焦虑。怨恨母亲最深的来源，是不完善的口腔满足；它使女孩在他体情欲、后来在异性恋的方向上，寻找一个更有力的乳头——阴茎。对乳头的力比多态度，在这里表现为同外阴手淫——无论阴道还是阴蒂——相联系的女性幻想；这可以独自发生，也可以在保姆进行清洁操作时发生。在这个阶段，她以同性恋方式依恋母亲；但只有从母亲那里，她才可能通过诱骗或强取，获得自己所欲望的阴茎满足。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容易，是因为在这个早期年龄，母亲毕竟仍是（他体情欲）力比多满足的主要来源。她不只依赖母亲获得情感与满足，也依赖母亲满足全部生命需要。没有母亲和母爱，生命将不可能维持。所以，女孩有最强烈的动机深深依恋母亲。

然而，在无意识中，这幅图景还有另一面，

[1] 海伦娜·多伊奇：《受虐狂在女性心理生活中的意义》，前引文，第 53 页。

[2] 卡伦·霍妮：《逃离女性状态》，前引文，第 337 页。

[3]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324 页。

而且远为严酷。攻击并抢劫母亲的施虐冲动，会导致强烈的报复恐惧；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它常常发展为对穿透性阴茎的恐惧。当女孩遇见一根不是接在母亲身上，而是接在父亲或兄弟身上的真实阴茎时，这种恐惧又被唤醒。其实，她的状况没有比以前更糟：她仍有阴蒂，母亲也没有从她那里夺走任何东西。不过，她责怪母亲没有给她更多——没有给她阴茎。但这项责备——母亲没有充分照顾她的自体情欲愿望——背后还有一种更深、更强的责备：母亲阻挠了她那具有

接受与取得性质的真正女性需要；如果她坚持这些需要，母亲便威胁要摧毁她的身体。因此，B 观点对母亲敌意所给的理由，看来比 A 观点更加充分。两者都同意，母亲在前生殖器层面造成了阻挠，但对生殖器层面的阻挠评价不同。按照 A 观点，母亲在那里没有剥夺女孩任何东西，只是女孩因为没有得到更多而怨恨；按照 B 观点，母亲既阻挠女性目标（朝向阴茎），又威胁使身体残缺——也就是摧毁真正属于女性、用于接受阴茎与生育的器官——除非女孩放弃这些目标。难怪她确实放弃了，总会放弃到某种程度，而且经常完全放弃。

再次阳具期是她对这个情境的反应，是她防御俄狄浦斯情结危险的方式。[1]她在这个阶段希望拥有自己的阴茎；这把受到威胁的力比多偏转到更安全的自体情欲方向，从而拯救它，正如偏转到倒错时也能拯救它一样。转向自体情欲——因而更符合自我——的层面，并伴随神经症性强化，又反过来遭到失望。极少有女孩不会在某种程度上终其一生，对自身低人一等之感的来源自我欺骗。与所有自卑感一样，真正来源是罪疚与恐惧所造成的内部禁止；这更多适用于他体情欲愿望，而非自体情欲愿望。

[1] 我在因斯布鲁克大会论文中坚持的这个观点，据我所知最早由卡伦·霍妮提出（《女性阉割情结的发生》，前引文，第 50 页），后来由梅兰妮·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171 页及以下）中得到详细发展。

不过，这个阳具位置还有额外优势，所以才如此强大。它完全驳斥了令人恐惧的母亲对其女性气质的攻击，因为它否认女性气质本身存在，因而也否认任何这种攻击的理由。此外，还有更加非理性的无意识幻想。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可以得到处理。一方面，女孩现在以最强

有力的攻击武器武装起来，因而也拥有最强的保护武器；琼·里维埃[1]曾特别强调这一动机。另一方面，借助偿还这个重要机制——梅兰妮·克莱因在此问题上对它作过重要研究——她可以补偿自己抢走母亲阴茎的危险愿望：她现在有一根阴茎，可以还给遭到剥夺的母亲；这个过程在女性同性恋中发挥广泛作用。再者，她不再冒着被男人的危险阴茎施虐性攻击的风险。弗洛伊德[2]问道：如果确有逃离女性气质，它的来源除了男性努力还能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女孩的情感能量可以拥有比男性努力深得多的来源，尽管后者往往证明是这些能量得到良好伪装的出口。

我想，人们至少会普遍同意一点：女孩对阴茎的欲望，同她对母亲的憎恨相联系。两个问题在本质上彼此相关；但正是在这种关系的性质上，意见分歧最为尖锐。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憎恨是女孩因没有获准拥有自己的阴茎而产生的怨恨；这里提出并得到梅兰妮·克莱因[3]有力支持的观点则认为，憎恨本质上是围绕父亲阴茎的竞争。按照一种观点，再次阳具期是对不幸解剖事实的自然反应；当它导致失望，女孩便退回异性恋乱伦。按照另一种观点，女孩在极早年龄便发展出异性恋乱伦，以及俄狄浦斯式的母亲憎恨；再次阳具期则是逃离这一情境不可忍受的危险。因此，它同男孩身上的相应现象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

现在，在总结时，我想总体比较男孩和女孩各自的这些问题。

[1] 琼·里维埃：《女性气质作为假面》，《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0 卷，1929 年，第 305 页。

[2] 弗洛伊德：《女性性欲》，前引文，第 297 页。

[3] 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前引文，第 270 页。

在再次阳具期，两性都缺少——或者说放弃——朝向符合自身性质的他体异性恋方向发挥功能的观念（男孩穿透，女孩被穿透）。两性也都同样强烈地否认——或者说拒斥——阴道：人们尽一切努力维持“两性都有阴茎”这项虚构。两性再次阳具期的这个核心特征，必然存在一种共同解释；而这里讨论的两种观点都提供了一种。按照第一种观点，它来自发现性别差异及其令人不快的含义；按照第二种观点，它来自对阴道的深刻恐惧，而这项恐惧又来自围绕与阴道相连的父母交媾观念所产生的焦虑，并经常因看见异性生殖器而重新激活。

两种观点的核心差别——其他差别由此产生，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特别针对它——大概在于：不同分析家赋予母亲并入父亲阴茎的早期无意识幻想以不同重要性。二十多年来，分析家早已熟知这种幻想确实存在；但尤其由于梅兰妮·克莱因的杰出研究，我们或许必须承认，它是幼儿生活从不缺席的特征，并认识到围绕它的施虐冲动与焦虑，在男孩和女孩的性发展中都发挥支配性作用。这个概括可以富有成效地扩展到梅兰妮·克莱因及其他儿童分析家围绕她所谓“合体父母”概念描述的全部幻想；我在前面提出，这个概念同弗洛伊德的前俄狄浦斯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再次阳具期的主要特征——压制他体异性恋功能——不只在男孩与女孩那里本质相同，其动机也相同。两种情况下，主体都是为了身体完整而放弃，以保住性器官（男孩的在外部，女孩的在内部）。女孩不肯冒阴道或子宫受损的风险，正如男孩不肯冒阴茎受损的风险。两性都有最强烈的动机否认一切交媾——即穿透——观念，所以把心智固定在身体外部。[1]

[1] 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正在运作的动力。本文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后的讨论中，琼·里维埃指出，这同成长中儿童试图同外部世界建立接触时走向外部化的一般倾向相符。

本文两部分都从一对相关问题出发：男孩的阉割恐惧与外阴恐惧，女孩希望拥有阴茎与憎恨母亲。现在可以表明，这两个表面上不同的问题对，在本质上为两性共有。共同特征是避开穿透，并害怕同一性别的父母一方造成伤害。如果男孩穿透阴道，他害怕父亲阉割自己；如果女孩允许自己拥有一个可被穿透的阴道，她害怕母亲使自己残缺。如我前面所述，危险经常通过投射同异性父母一方发生联系；这是次生表现，真正来源是对作为情敌的同性父母一方的敌意。事实上，我们拥有典型的俄狄浦斯公式：乱伦交媾会带来遭情敌父母一方残害的恐惧。它对女孩和男孩一样真实，尽管女孩被迫采用更广泛的同性恋伪装。

回到阳具期概念。如果这里提出的观点有效，那么我早先建议的“初次阳具”一词只适用于男孩。它并无必要，因为实际只是指生殖器；它甚至可能误导，因为它使人倾向于以纯粹阳具性——也就是自体情欲——的意义思考男孩的早期生殖器功能，从而排除从最早时候——生命第一年本身——便存在的他体情欲。对于那些认为女孩发展最早阶段本质上属于女性的人来说，这个术语用于女孩会更加误导。至于据说作为初次阳具期特征的性无知，它在意识中无疑真实存在；但大量证据表明，在无意识中并非如此，而无意识是人格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来谈自己所谓的再次阳具期，也就是通常只说“阳具期”时所指的阶段。上面讨论的 A 观点倾向于把两性的再次阳具期都看作从初次阳具期自然发展而来，而且在两性中方向大致相同。B 观点更强调

再次阳具期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早期阶段，甚至在重要方面逆转后者的方向。也许可以把这一点最鲜明地表述如下：在两性那里，早期阶段此前的异性恋他体情欲，在再次阳具期都大体转化成一种替代性的同性恋自体情欲。因此，对两性而言，后一个阶段与其说是纯粹的力比多发展，不如说是力比多与焦虑之间的神经症妥协——自然的力比多冲动同避开残害的愿望之间的妥协。严格说来，它并非真正的神经症，因为仍然开放的力比多满足属于意识，而不像神经症那样属于无意识。它更像性偏离，完全可以命名为“阳具倒错”。它同性感倒错——也就是同性恋——关系密切，在女孩那里尤其明显。这项联系如此密切，以至——尽管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本文目的——我愿把当前主题引出的若干考量用于同性恋问题。同性恋在本质上似乎是对情敌父母一方的敌意；它通过一种特殊技术受到力比多化：占有异性的危险器官——这些器官由于施虐性投射而变得危险。我们已经看到，生殖器施虐冲动在多大程度上来自更早的口腔施虐冲动；所以，我曾在较早场合提出，口腔施虐冲动是女性同性恋的特殊根源，[1]它很可能也是男性同性恋的根源。[2]

为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要提醒你们，不应把阳具期或阳具倒错看成一种明确固定的实体。像思考一切类似过程一样，我们应当以动力与经济术语思考它。换言之，它会表现出一切可能变化。不同个体之间，它可以从轻微迹象变化到最显著的倒错；同一个体身上，其强度也会随潜在因素当前所受刺激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

我也不主张阳具期必然具有病理性，尽管它显然可以通过夸大或固着而变成病理。它偏离发展的直接道路，是对焦虑的回应；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研究仍可能表明，最早的幼儿焦虑不可避免，而阳具防御是这个年龄唯一可能的防御。只有对早期年龄分析积累更多经验，

才能回答这类问题。此外，这里所得结论并不否认人性中的同性恋成分具有生物、心理与社会价值；在那里，我们要回到唯一尺度——心理经济能够自由和谐运作的程度。

[1] 前引文。

[2] 梅兰妮·克莱因（前引文，第 326 页）把它追溯到一种“口腔—吮吸固着”。

现在，请允许我单独列出那些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结论。

第一，典型的（再次）阳具期是一种倒错；像所有倒错一样，它服务于保住某种力比多满足的可能性，直到有一天——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主体能够处理对残害的恐惧，并重新恢复暂时放弃的他体异性恋发展。作为对这项恐惧的防御而起作用的同性恋，依赖于产生恐惧的施虐冲动。

于是，我们看来更有理由承认一项也许是弗洛伊德最伟大发现的价值——俄狄浦斯情结。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怀疑：对女孩不亚于对男孩来说，现实与幻想中的俄狄浦斯情境都是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心理事件。

最后，我想我们最好提醒自己一句来源比柏拉图更古老的智慧：“起初……他造男造女。”

# 第15课 · 1958年3月12日

你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试图做什么：在构成你们实践经纬的这些困难、这些死路与这些矛盾中——你们能够察觉它们，是我们工作的最低预设——我们试图不断把你们带回某一点；在那里，这些死路和这些困难既能以真正分量呈现于你们面前，你们也能看到自己实际上如何借助那些局部理论，甚至借助遁术以及所用术语本身的意义滑动来避开它们，而这些术语也是一切托辞的所在。

上次我们谈了欲望与享乐。今天，我想沿着弗洛伊德的文本本身向前走，看看他的观察在某一点上带来了什么，它给后继者造成了哪些困难；又看看后人如何从某些预设要求出发，试图更紧密地把握问题，从而析出某种沿困难方向走得更远的东西；也许我们还可以迈出第三步。这里明确涉及弗洛伊德关于女人的阳具位置，更准确地说，关于他所谓的阳具期。

我要提醒你们我们已经抵达并强调的东西，也就是最近三四次课程开始分节出来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欲望本身被明确置于分析经验之中介的核心；我们在这里把它表述为收拢、集中我们所谓的“被表明的要求”。

下面两个说法同样合而为一：

- “我要求”；
- “我向你表明我的要求”，正如人们说：“我向你发出命令”“我向你宣告判决”。

所以，这个“要求”意味着：

- 小他者，也就是被要求的人；
- 但也包括这个要求对之具有意义的那一位，也就是大他者；在它的诸维度中，有一项是作为这个能指发挥效力的场所。

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被表明的要求”的第二个词，取“我向你表明某件事、向你表明我的意志”这个意义；这就是我们特别思考的重要点。现在，这个“被表明的”意味着：相对于需要，已经构成的诸能指在主体身上发挥结构化作用；

相对于这种欲望，它造成一种根本改变；相对于需要，这项改变由

欲望进入要求而构成。

我暂停片刻，插入一段题外话。出于时间和经济方面的理由，今年虽在讨论无意识的形成，我们迄今却把梦放在了一边。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根本断言：梦表达一个欲望。但归根结底，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追问梦的这个欲望究竟是什么。梦里不止一个欲望；如果我们所说的是白日欲望，它们只是给梦提供机会与材料，而人人都知道，我们关心的是无意识欲望。

这个无意识欲望，弗洛伊德究竟为什么在梦中认出了它？以什么名义？它由什么得到认出？表面上，梦里显然没有任何东西对应于欲望在语法上的表现方式。梦没有任何这样的文本，除非只是表面上没有——也就是说，它必须被翻译到一种更深的分节中。但在这个遭掩蔽、潜伏的分节层面，究竟是什么

区分并强调梦所分节出来的东西？当然，表面上什么也没有。

请注意，归根结底，弗洛伊德在梦中认作欲望的东西：

- 正是通过我向你们所说的东西，也就是通过需要的改变而显出标记；
- 正因为根底里的东西受到掩蔽，被分节在某种使它发生转化的东西之中。

转化成什么？转化为：它要经过若干样态与意象，而这些样态和意象在那里作为能指。

所以，这需要一整套结构介入；毫无疑问，这就是主体结构，因为其中必须有若干代理机构运作。不过，我们只能通过如下事实认出这种主体结构：梦中经过的一切，都服从能指的样态与能指的转化，服从隐喻与转喻、凝缩与移置的结构。

在这里，为梦中欲望的表达制定法则的，正是能指法则。通过释读一个梦中特别得到分节的东西，我们侦测到的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是某种我们假定要使自己得到承认的东西；它参与一场原初历险，被铭写在那里并得到分节，只要我们始终把它带回童年发生并遭到压抑的某种原初之事。在梦中得到分节的一切之中，我们最终把意义的首要地位赋予它：那里呈现了某种在主体欲望的结构化方面真正具有最后决定意义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它分节出来：它就是欲望，就是围绕某一欲望发生的一切之原初历险。这个欲望是幼儿欲望，其根本欲望就是对大他者欲望的欲望，或者说被欲望的欲望。围绕这场历险在主体身上受

到标记、得到铭写的东西，始终在那里持存、潜伏；它对梦中作为无意识欲望而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给出最终说明。它通过什么表达？通过偶然为梦提供材料之物的假面；某种东西则经由能指法则总是强加给欲望的特殊条件，向我们在这里得到表明。

我试图在这里教给你们的，是用主体对大他者欲望的原初依赖这个根本观念，替换理论中那些因为永远局部而或多或少混乱的东西，也就是满足、照料、固着与攻击的机械学和经济学。主体的欲望本身早已通过如下机制受到塑造：

它受要求的条件塑造，并随主体历史的进展铭写到主体结构中。这个欲望构成过程中的种种曲折、

种种变迁服从大他者欲望的法则；可以说，它们使主体最深的欲望——那个悬置在无意识中的欲望——成为这个大写 $D$、这个大他者之欲望的总和与积分。

只有这一点，才能赋予你们所知的分析演变以意义。它最后如此强调同母亲的原初关系，以至看来略去了整个后续辩证法，甚至俄狄浦斯辩证法。这里有一种东西既朝向正确方向，又把它表述偏了：重要的不只是挫折本身——也就是主体得到或没有得到多少真实之物——而是主体如何瞄准并定位大他者的欲望，也就是

母亲的欲望。相对于这个欲望，主体要使自己得到承认或被放行，主动把自己献上；相对于母亲欲望中某个 x，他要成为或不成为那个作出回应者，成为或不成为被欲望的存在。

这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在接近它的同时又忽略它，如果只是通过最初看起来最接近儿童内部发生之事的途径尽可能深入——你们知道，梅兰妮·克莱因发现了许多东西——却只把它表述为主体、孩子同母亲人物之间的对抗与面对面关系，那么最终得到的就是一种真正镜面式的关系：身体，

可以这样说——因为它已经十分显眼，占在前景——母亲的身体以某种方式变成

孩子的驱力能够在其中定位并投射的围墙与居所；而这些驱力本身又由某种根本失望所造成的攻击推动。

归根结底，在这种辩证法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带出一种幻觉性的投射机制，

带出一种从原初幻想的自生发生出发建构世界的方式。“外部”作为“坏”之场所的发生，仍是纯粹人为的，并以某种方式让后来对现实的一切进入都服从于一种纯粹幻想的辩证法。

为了补足这种克莱因式辩证法，必须引入如下观念：对主体来说，外部首先被给予；

- 它不是从主体内部、从主体驱力中投射出去的东西；
- 而是大他者欲望所在的位置和场所，主体必须前去那里与它相遇。

这至关重要，也是我们能够解决克莱因道路所产生诸悖难的唯一途径。克莱因道路在许多方面证明极富成果，却最终使某种东西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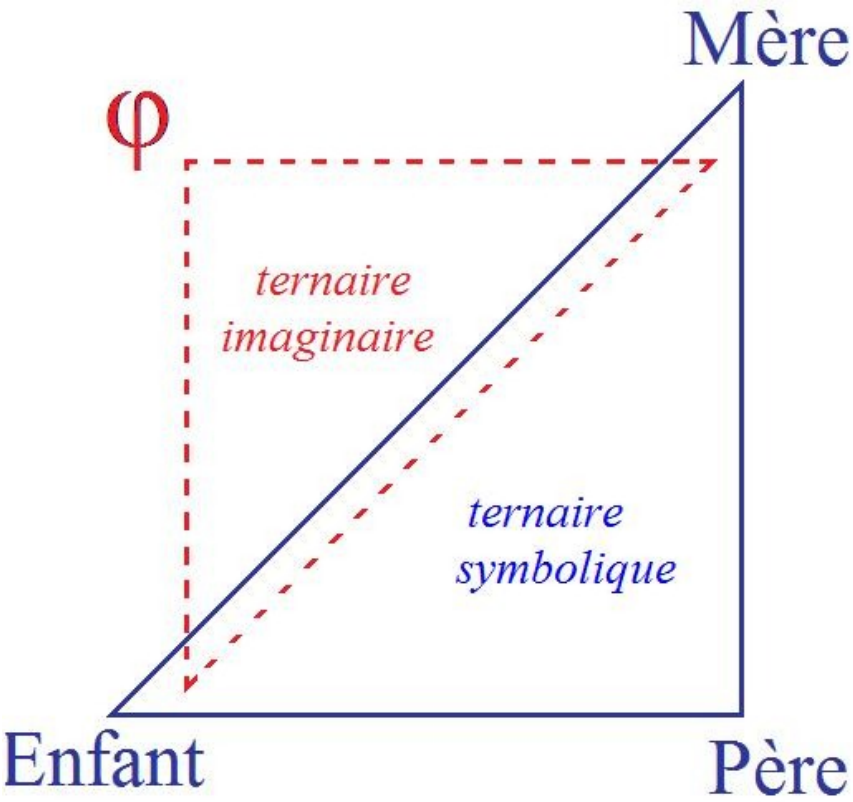
将其完全略去；或者在自身没有察觉时，以某种隐含方式重新建构它；

但这种重构同样不合法，因为没有得到推动理由。弗洛伊德发现的欲望之原初辩证法，即弗洛伊德式辩证法，处在第三项关系中；它让一个母亲之外的维度介入，甚至透过母亲，

让那个被欲望或作为竞争者的人物在场，也就是父亲这个第三人物。

归根结底，我曾试图向你们给出的图式在这里获得了正当理由。我告诉你们，必须提出根本象征三元组：母亲、孩子与父亲。母亲的缺席或在场向孩子提供某种东西——孩子在这里被设立为一个象征词项；由于引入了能指维度，他不再只是一个主体——

只需引入能指、引入象征词项，母亲的缺席或在场就向孩子提供了如下事实：这个孩子将成为或不会成为一个被要求的孩子。




而这根本的第三项，以某种方式就是：

-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或加以禁止的东西；
- 作为意义、作为能指性在场，被设立在母亲这项缺席或在场之外的东西；
- 允许或不允许它显现的东西。

……从能指秩序介入的那一刻起，主体就必须相对于它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然，主体把自己的具体而真实的生命展开在某种已经包含想象意义上之欲望的东西中……

- 从捕获的意义上说；
- 从一些形象迷住他的意义上说；
- 从他相对于这些形象必须感觉自己“作为自我、作为中心、作为主人”，或者受到支配的意义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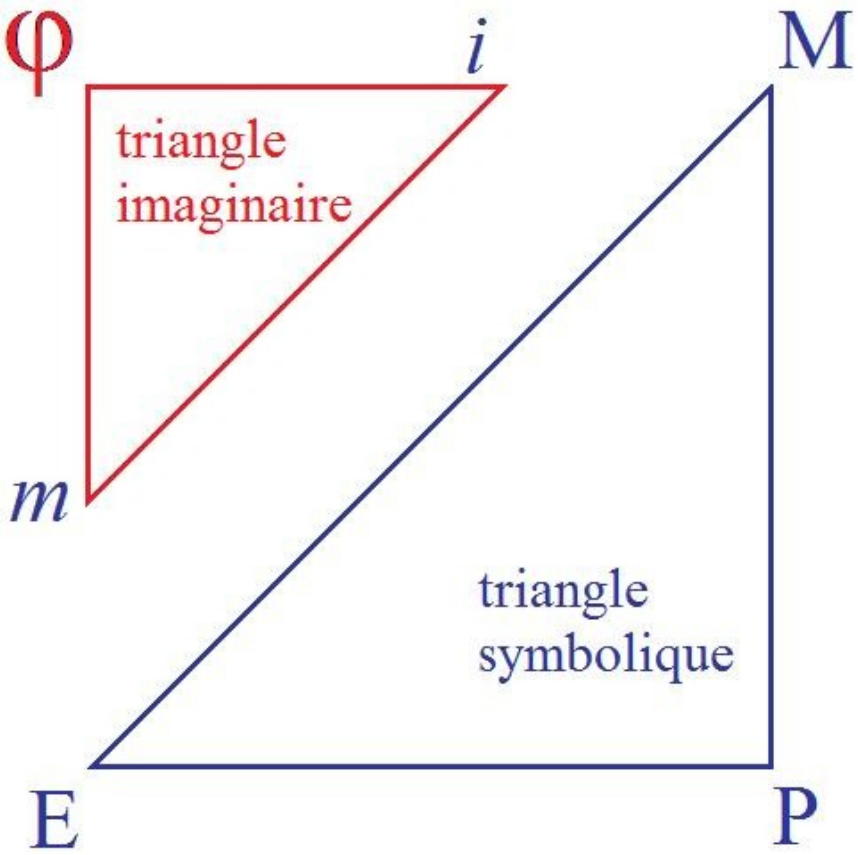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想象关系中，你们知道，自我形象、身体形象在人那里以一种原初重音起作用，并以某种方式支配一切。

当然，形象在人那里的这种选择性，同人向我们所说的能指辩证法开放这一事实深刻相连。可以说，把捕获性形象缩减为身体形象这个根本的核心形象，并非与主体同能指三元组的根本关系无关。不过，这种同能指三元组的关系为主体引入了第三项；借助这第三项，主体越出同形象的双项捕获关系；可以说，主体要求自己得到意指。

正因如此，在想象界层面也有三个极——如同象征场域的最低限度构成——它们超出我与我的形象。由于我必须进入能指的条件，就会有一个点、某种东西必须标示：只要我的欲望必然经过我在象征层面所表明的一项要求，它就必须得到意指。

换言之，需要有一个一般象征，来象征始终把我同自己的欲望分开的间距；

这道间距使我的欲望因进入能指而始终带有改变的印记。要把我的欲望引入能指，把它变成我在分析辩证法中面对的欲望，就必须引入这种根本欠缺；而这道间距、这项欠缺有一个一般象征。借助这个象征，所指被指称为始终是遭到改变的所指，甚至是偏到一旁的所指。我们在我给你们的图式中看到的就是这一点：



这在主体内部处于想象界层面：

- 这里是他的形象［$i$］；
- 这里是自我得以构成的点［$m$］；
- 这里我安置字母 $\phi$，它就是阳具。

如果我们不把阳具理解为如下东西，就不可能推导阳具作为能指的构成功能——它贯穿主体被引入自身纯粹实存与性位置的整个辩证法：它是主体的欲望借以必须作为欲望本身得到承认的根本能指，无论主体是男人还是女人。

这意味着，无论欲望是什么，它在主体身上都必须具有这样的参照：那无疑是主体的欲望，但前提是

- 主体本人已经接受自己的意指；
- 主体作为主体所拥有的力量，必须从一个符号那里取得；而他只有通过使自身某物遭到残割，才取得这个符号，一切价值都将凭借这个东西的欠缺而成立。

这不是推导出来的东西，而是分析经验所给予的；这就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根本内容。

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在 1931 年撰写《论女性性欲》[注1]时，向我们断言了某种东西……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女性性欲》（“Über die weibliche Sexualität”，1931），法译收入《性生活》，PUF，1969 年，第 139 页。

- 它乍看之下无疑成问题；
- 它无疑并不充分；
- 它无疑要求进一步展开。

……它召唤了所有精神分析家的回应：首先是女性分析家——海伦娜·多伊奇、卡伦·霍妮，还有许多其他人，以及梅兰妮·克莱因、约西娜·米勒；随后，琼斯总结这一切，并以一种看来或多或少同弗洛伊德的分节相容的方式作出回应。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察的东西。让我们从问题最为悖论性的地方入手。这个悖论首先显现在某种自然观察的层面；弗洛伊德像一位博物学家那样告诉我们：

“我的经验向我表明，阳具不只在男人那里，也在女人那里处于力比多发展的中心。”

至于男人，弗洛伊德已经按照我刚才试图向你们给出的一般公式表明：

- 被引入这种辩证法，将使男人能够在人的类型之传递中占据位置、取得位阶，使他能够轮到自己成为父亲；

- 如果没有我刚才所谓的这种“根本残割”，一切都无法实现；正是借助它，阳具将成为权力的能指，成为能指、权杖，也成为使这种男性气质能够被承担的东西。

当然，到这里我们理解了弗洛伊德。但他走得更远，向我们表明同一个阳具如何出现在女性辩证法的中心。此处似乎裂开了一道深渊：迄今，我们至多能够用斗争与生物竞争来理解男人如何通过阉割情结被引入其男性身份。

在女人那里，这无疑构成一个悖论；弗洛伊德首先纯粹而简单地把它作为观察事实告诉我们。这里似乎又同某种如同一切观察所得而呈现、仿佛属于自然、仿佛自然发生的东西相重合。当他说女孩同男孩一样最初欲望母亲时，的确正是这样向我们呈现事情。

让我们照原文来说：欲望只有一种方式。女孩最初相信自己拥有阳具，也相信母亲拥有阳具。这就是驱力的自然演化意味着的东西：

- 经过本能阶段的一次次转移，从某种具有乳房形态的东西，借助若干其他形态，

- 最终抵达这个阳具幻想；借助它，女孩归根结底以男性位置面对母亲。某种复杂的东西——对她而言比对男孩更复杂——必须介入，她才能承认自己的女性位置。

弗洛伊德的分节假定她最初未能承认女性位置，但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解释这种假定。这绝不是一个小悖论：它向我们提出一种如此逆反自然的东西；毕竟，这反而会让我们想到一种相对于男孩位置的对称性。有人曾把阴道称作“阴道之口”。

一些观察甚至使我们能够断言——而且我要说，这同弗洛伊德的资料相反——存在原始的亲历经验；我们可以在幼小主体那里找到其原初痕迹。这些经验表明，同原初误认的断言相反，在喂养操作发生时，某种东西至少看来可以在主体身上因反作用而被推动。

我的意思是，仍在吃奶的女婴会表现出某种情动；它无疑含糊，但把它关联于一种深层身体情动，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当然很难通过记忆定位这种情动，但它使我们能够通过一连串传递，把喂养之口同阴道之口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在完整而成熟的女性气质中，吸收、甚至吮吸器官的功能也是经验中可以辨认的东西。这会以某种方式提供一种连续性：如果这里只涉及性欲驱力的迁移，我们就能看到女性气质在生物层面上的演化康庄大道由此得到勾勒。

琼斯正是这种看法的辩护人与理论家；他认为，出于种种原则性理由，不可能承认女性性欲的演化注定要经过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种绕路与人为作用。所以，他提出一套理论，几乎逐点反对弗洛伊德

作为观察资料向我们分节出来的东西。他把女童的阳具期建立在一种驱力上，并向我们解释、证明这种驱力在两个要素中的自然支点：

- 第一项是人们已经承认的原初生物双性性；但必须说，它纯属理论、相当遥远。我们完全可以同琼斯一起说，它离我们能够接近的经验十分遥远。

- 但还有另一项：阳具器官的萌芽在场，也就是最初快乐所系的阴蒂器官。对女童来说，这些快乐同阴蒂手淫相连；它可以以某种方式为阳具幻想提供开端，而这种幻想发挥弗洛伊德所说的决定性作用。

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做的：阳具期是一个阴蒂性的阳具期，幻想中的阴茎

是女性解剖实际给予的那根小阴茎的夸大。弗洛伊德从失望以及这场失望所产生的出路中——但它仍以一种自然机制为基础——

向我们提供女童进入女性位置的动力。

他告诉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刻，俄狄浦斯情结发挥它在本质上应当发挥的规范化作用；不过，它在女童那里发挥作用的方式同男孩相反。

俄狄浦斯情结让她能够通过把握男性的阴茎，接近自己所欠缺的阴茎：

- 她可能在某个同伴身上发现它；
- 也可能把它定位或同样发现于父亲身上。

女童通过自身某物面对阳具期幻想阶段所遭遇的失望与幻灭，被引入俄狄浦斯情结；最早在这个领域追随弗洛伊德的分析家之一朗普尔—德·格鲁特夫人，就是这样把它理论化的。

她十分正确地指出，女童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向阶段进入这个情结：她首先在同母亲的关系中呈现于俄狄浦斯情结；而正是在同母亲的这项关系失败时，

她找到了同父亲的关系。后来，这项关系将通过如下等价得到规范化：她永远不会占有的阴茎，等价于她确实能够拥有、能够作为阴茎替代物给予的孩子。

让我们相对于我教你们区分的东西，标出若干路标。这里的Penisneid，即阴茎妒羡，

被表述为女人进入俄狄浦斯辩证法的根本环节。就其本身而言，它像男人的阉割一样处于这套辩证法的核心；而通过我稍后要向你们表述的批评——也就是琼斯提出的批评——它无疑会遭到质疑。当然，一个人刚开始接近分析理论时，从外部看会觉得它是某种人为构造。我们先停一下，强调一项必须强调的事情：在女孩这种俄狄浦斯演化的不同阶段中，这个术语的用法何等含混！

琼斯的讨论也指出了这一点：Penisneid　究竟是什么？围绕阳具期，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了进入与离开俄狄浦斯情结的三种形态：

- 第一种是幻想意义上的 Penisneid：阴蒂就是阴茎这一愿望、这一长期保留、有时终生保留的愿望。弗洛伊德相当强调，如果这种幻想始终占据前景，它就具有不可还原的性质。这是 Penisneid 的第一种意义。

- 还有另一种意义：当所欲望的是父亲的阴茎时，Penisneid 就会介入。也就是说，主体在阴茎的现实中看见阴茎所在之处、前去寻求占有它的地点。俄狄浦斯不只是受禁止的情境；情境及其发展还以一种生理不可能性使她受到挫折。随后，这一演化发挥一种功能：它让女童产生同父亲生孩子的幻想，也就是以象征形式拥有这根阴茎。

现在请回想，谈到阉割情结时，我教你们区分阉割、挫折与剥夺。在这三种形式中，哪些分别对应刚才三个词项？我已经告诉你们：

- 挫折是一种想象之事，但它涉及一个完全实在的客体。正因如此，女童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阴茎是一项挫折。

- 剥夺是一种完全实在之事，但它只涉及一个象征客体。女童没有同父亲生孩子；归根结底，从来就不可能让她拥有这个孩子，她也确实无法拥有。孩子在这里仅作为象征，而且恰恰象征她在现实中受

到挫折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因此，对父亲之孩子的欲望确实在演化的某个时刻以剥夺的名义介入。

- 剩下的便是对应于阉割的东西，也就是以象征方式从主体身上切除某种想象之物；在这里，确实对应于一个幻想。

| Agent | Manque | Objet |
| --- | --- | --- |
| Père *réel* | Castration *symbolique* | Phallus *imaginaire* |
| Mère *symbolique* | Frustration *imaginaire* | Sein *réel* |
| Père *imaginaire* | Privation *réelle* | Phallus *symbolique* |

弗洛伊德在这里遵循了正确路线。他告诉我们，女童同阴蒂的关系在于：到了某个时刻，她必须放弃一直作为希望而保留的阴蒂——也就是希望它迟早会变得像阴茎一样重要。

如果你们记得我在谈论阉割——它选择性地显现于男孩——时认为必须分节出来的东西，那么，阉割的对应项在结构上正位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争论女孩那里是否一切都围绕阴蒂驱力旋转，也可以像你们马上要通过琼斯的批评看到的那样，探究俄狄浦斯历险的曲折道路。但从一开始，我们不能不注意弗洛伊德指出的阉割对应项在结构上的严密性：它必定位于主体同一个幻想发生关系的层面，而且这种幻想关系取得能指价值。对称点必定就在这里。

现在要理解的是，这如何发生。当然，使用这个点，并不意味着它就向我们提供整件事的全部钥匙。琼斯的批评表面上从弗洛伊德那里找到了钥匙，因为弗洛伊德看起来向我们讲述的是某种驱力异常史；正是这一点使若干主体以生物学预设的名义反抗、愤然起身。

但你们将看到，他们在分节自己的异议时最终会说出什么。事物的性质迫使他们

分节出若干点、若干特征；恰恰是它们使我们能够迈出下一步，恰当理解所涉及的东西，越出自然驱力理论，并看到阳具确实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介入。我们可以把那段话称为今天课程的前提；它无非是在重述我们刚才通过其他道路划定的东西：阳具在这里作为能指介入。

现在来谈琼斯的回应与分节。他围绕这个问题有三篇重要文章：

- 一篇题为《早期女性性欲》[注2]，写于 1935 年；我们今天就要讨论它；

> [注2] 欧内斯特·琼斯：《早期女性性欲》，收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Payot，1969 年，第 442—452 页。

- 在此以前有《阳具期》[注3]，1932 年在威斯巴登第十二届国际大会上宣读；

> [注3] 欧内斯特·琼斯：《阳具阶段》，收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Payot，1969 年，第 412—441 页。

- 最后还有《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注4]，1927 年 9 月在第十届大会上宣读。

> [注4] 欧内斯特·琼斯：《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收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Payot，1969 年，第 399—411 页。

弗洛伊德在 1931 年的文章中提到的就是最后这篇；他用寥寥数行驳斥琼斯的立场——我必须说，态度十分轻蔑。琼斯后来在《阳具期》中试图回应并分节自己的立场；总之，他反对弗洛伊德，同时努力尽可能贴近弗洛伊德的原文。

我今天要依据的《早期女性性欲》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想证明的东西极其重要；

它也是琼斯分节得最远的一点。文章发表于 1935 年，也就是弗洛伊德女性性欲文章问世四年以后。它应费德恩邀请而作；当时，费德恩是维也纳学会副主席或主席。文章在维也纳发表，向维也纳圈子提出琼

斯明确称为伦敦派观点的东西，也就是从那时起已经围绕克莱因经验形成中心的观点。

琼斯告诉我们，应当从经验入手；只有伦敦派经验同弗洛伊德对立。

他把对立表述得如此鲜明，反而使论述在纯粹性、清晰性和讨论依据上有所收获。他作出若干评论，十分值得停下来考察，并尽量回到原文。他首先指出，经验向我们表明：当我们接近儿童时，很难把握所谓男性位置——女童在阳具期据说以这种位置面对母亲。

我们越是回溯起源，就越是面对某种在这里具有批判性的东西。

请原谅我；跟随这篇文本时，我们将面对若干客体。相对于我在这里试图向你们勾勒的路线，它们有时看来稍稍偏在一旁，但因为它们所揭示的东西，仍值得提出来。

我立刻告诉你们，琼斯的假设本质上朝向他在文章结尾明确分节出来的问题：女人是一个“born”——也就是作为女人如此“天生”——的存在，还是一个作为女人被“made”、被“制造”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疑问置于这里，也正是在这里反抗弗洛伊德的立场。有两个词项将以某种方式成为他论证道路前进的目标：

- 某种来自事实概要的东西；在接近儿童的具体经验中，这些事实可以反驳、偶尔也可以确认，但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修正弗洛伊德的构想。

- 但推动他全部论证的，是他最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东西，一种“是或否”。对他而言，它绝对排除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他的

> 视角中，绝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位置——仿佛人类的一半由某些 made、即在俄狄浦斯隘道中被制造出来的存在构成。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归根结底，如果问题真在于“制造”，俄狄浦斯隘道制造男人的程度一点也不少。然而，女人在那里带着一种归根结底不属于自己的行装进入；在他看来，恰恰这个事实同男孩构成了充分差别，使他能够要求某种东西。其实质

就是说：的确，我们在女人、女童演化的某一时刻观察到某种把问题推到前台的东西；某种要求、某种欲望以 Penisneid 的含混形式显现，而它对我们如此成问题。

但这究竟是什么？他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 它是一种防御形成；
- 它是一条绕路；
- 他解释说，它是某种可以同恐惧症相比的东西。

离开阳具期，本质上必须被理解为从一种恐惧症中痊愈。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流传极广、属于正常的恐惧症；但它本质上具有同样的序列和同样的机制。

这里有某种东西……你们看到，我决定直接跳到他论证的核心；

……这里有某种格外有利于我们思考的东西，因为你们或许还记得，我如何试图向你们分节恐惧症的功能。

如果女童同阳具的关系确实必须这样构想，我们无疑十分接近我试图向你们提出的构想：在女童的俄狄浦斯中，同阳具的关系作为一种享有特权的能指要素介入。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在这一点上归附琼斯的立场？当然不是！

如果你们记得我曾区分恐惧症与恋物，那么我们会说，阳具在这里发挥的更像恋物而非恐惧症客体的作用；不过，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一点。

让我们回到琼斯批评的开端与分节，看看他从何处出发、这种恐惧症将从何处构成。对他而言，这种恐惧症是对某种东西的防御性建构，是对儿童原始驱力所产生之危险的防御。他在这里追踪的是女童层面的儿童；但在这个层面，女童同男孩处于相同位置，也有相同命运。不过这里讨论的是女童。他指出，儿童同母亲的关系原本是一种原始男性位置——这就是我刚才停下来告诉你们，我们将遇到一些十分奇特之物的地方。他说：

“她看待母亲，并不像男人看待女人，把她视为一个乐于满足其接受某物之愿望的造物。”

她远不是像男人面对女人那样，“像男人看待女人一样”，也就是说，把女人视为一个人们乐于接受或接纳其欲望的造物，一个人们乐于同意并满足其欲望的存在[注5]。

> [注5] Payot 1969 年法译作：“她看待母亲，并不像男人看待女人，也就是说，把她视为一个人们乐于满足其接受愿望的存在。”

必须承认，在这个层面引入一种如此成熟的男女关系位置，至少相当悖论。可以肯定的是，当弗洛伊德谈到女童的男性位置时，他绝没有援引文明这种最成熟的效应——假如它真的已经达到——

仿佛男人在那里就是为了满足女人的一切欲望。

但一位起初怀着如此博物学式主张进入这个领域的作者，笔下却出现这种东西；

我们不能不把它提出来，视为这片地带某种困难的见证，竟使他在论证刚一开始就在这里绊倒。他以它来对立的，其实是儿童的位置——这当然并非毫无道理。这里不是作为男人的位置，而涉及儿童如何看待母亲：

“一个成功地用孩子如此急切想要的那些东西填满自己的人……”

你们在这里认出了母亲的奶罐，也就是梅兰妮·克莱因所描述的儿童眼中的母亲；

——我来翻译琼斯：

- “一个成功地……的人”［a person who has been successful］。

这个 successful 具有全部分量，因为它在母亲主体那里暗示了某种东西……

而琼斯没有察觉这一点。

……如果紧贴我们在儿童那里找到的文本，所涉及的确实是一个欲望的存在，也就是母亲；因为她十分幸运，能够：

- “成功地用孩子如此强烈欲望的那些东西填满自己……”[注6]

> [注6] Payot 1969 年法译作：“她反而把母亲视为一个成功地用她如此强烈欲望的那些东西——既有固体又有液体的食物——填满她的人。”

[successful in filling herself with just the things the child wants so badly…]

也就是那两类令人愉快的材料：固体与液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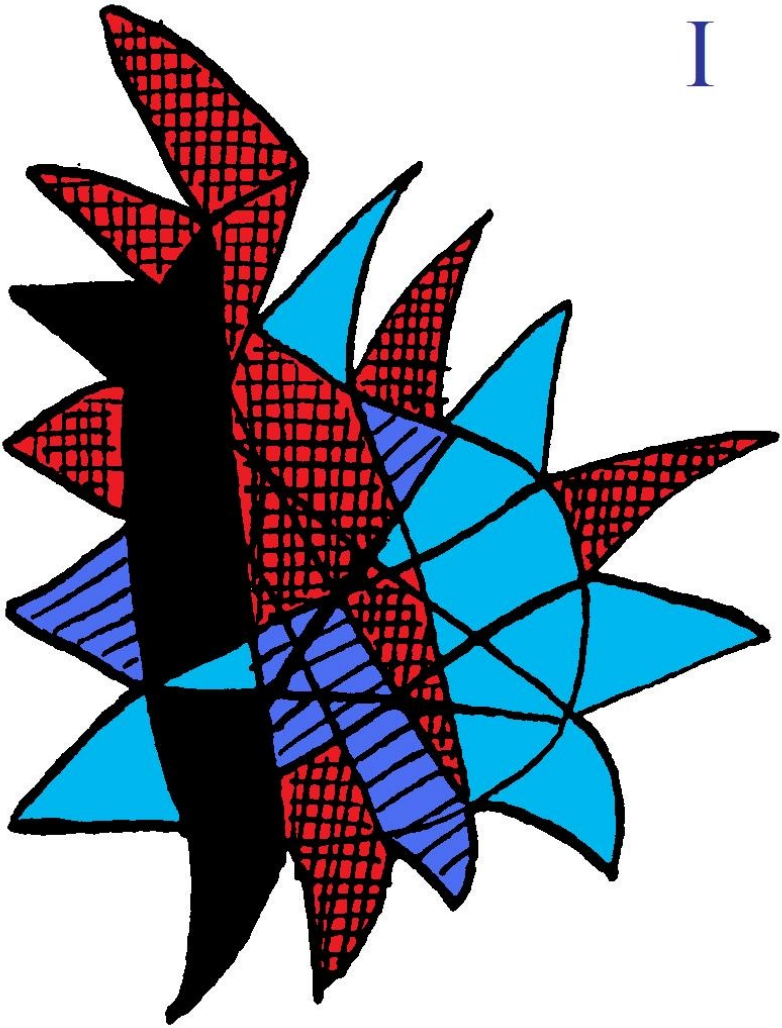
只要向我们表象儿童的原始经验，我们就不能忽视梅兰妮·克莱因在她的《论文集》[注7]中围绕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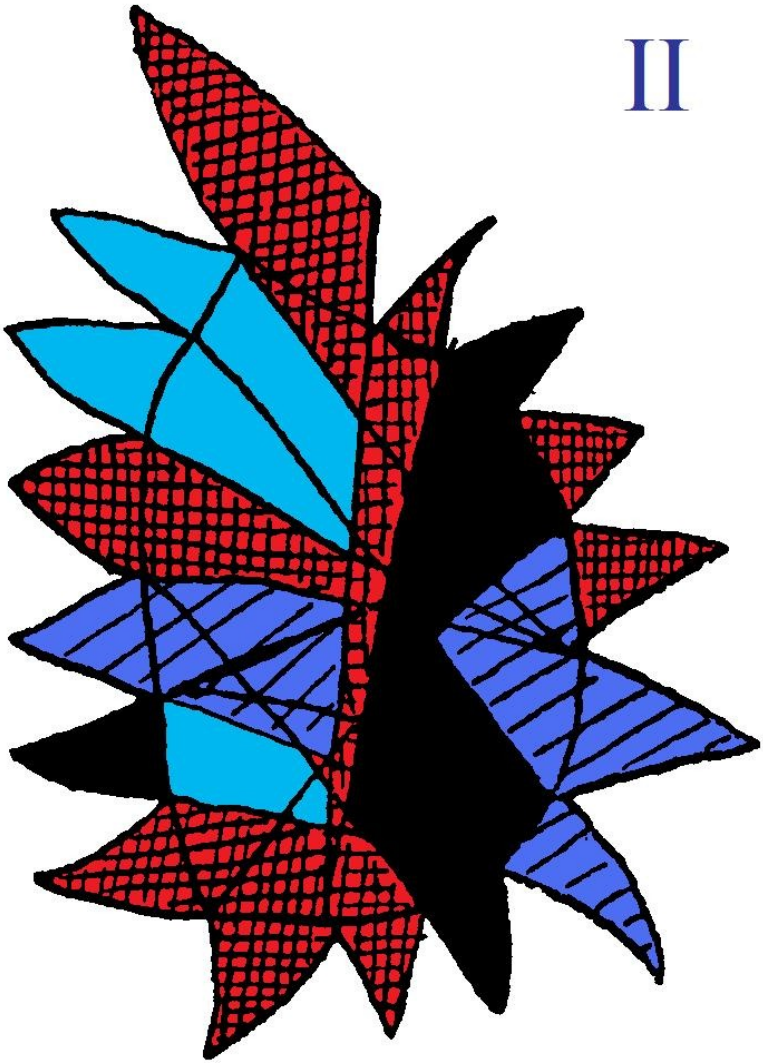
> [注7] 梅兰妮·克莱因：《早期焦虑所阐明的俄狄浦斯情结》，收入《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Payot，1968 年。

“儿童极早期俄狄浦斯”向我们展示的东西。我们无疑像通过望远镜一样接近这种原始经验；但她通过分析三四岁的儿童，尽可能靠近那个位置。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种客体关系，它以我所谓“母亲身体的帝国”这种形式得到结构。

这个“母亲帝国”的场域及其内部包含的一切——我参照中国历史，把它们称作“战国”——儿童会把它画出来，而她向我们展示这些图画。

# I






因为儿童这时已经能够画图，并在内部描绘出她辨认为能指的一切：

兄弟、姐妹、排泄物，一切共同居住在母亲身体里的东西；除此以外，她还使我们能够区分、而治疗辩证法确实能够分节出来的东西：

父亲的阳具，也就是某种从一开始便已经被引入其中的要素；

相对于儿童占有这个身体内容物的要求，它既特别有害，又格外具有竞争性。

在我们看来，同样很难把这些资料看成别的；它们凸显并深化了这些所谓自然关系的问题性质。相反，我们难道不是已经看见它们由我上次所谓的一整套能指组合库结构起来了吗？它们表明，主体同这些要素的关系早已建立并得到分节，其方式是任何自然生物关系都无法真正说明的。

梅兰妮·克莱因就是这样把一项参照引入儿童辩证法——也就是把阳具带入这种原始经验层面的东西；她的确把这项参照呈现为某种从儿童所提供之物中读出的东西。不过，这个说法仍然颇为惊人：把阴茎引入为一种更可接近、更便利、以某种方式更完美的乳房；这就是我们必须作为经验资料承认的东西。

当然，如果它已经得到资料支持，它就有效。但无论如何，这绝不是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恰恰是它本身使我们能够追问：究竟是什么让这根阴茎实际比原初乳房更可接近、更便利、更能带来享乐？这正是这根阴茎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儿童是否已经——通过什么中介，当然正是这点将遭到追问——被引入能指辩证法。

事实上，琼斯随后全部论证只会越来越紧迫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向我们解释，女童也许曾经拥有过它以后……他没有裁定，但他的出发资

料本身要求这样假定；而他仍在其中作出裁定，只为了告诉我们：阳具只能作为某种防御的手段和托辞介入。

……所以，他假定女童最初在力比多上感兴趣的，是对自身器官、对女性器官的一种原始把握。

但他将试着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她必须压抑对阴道的这种把握。他告诉我们，在女童同自身性器官的关系中，这会唤起比男孩同自身性器官关系更大的焦虑，因为这个器官更加内在、弥散，更深地构成她最初运动的特有来源。所以他分节道，阴蒂……我确信，他的分节向你们显示了这个相对天真的表述所包含的必然性：由于阴蒂在外部，它只用来承受焦虑的投射。此外，它更容易成为主体取得安慰的客体；主体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甚至至多通过视觉，确认它始终在那里。这就是琼斯的意思。

他还将表明，女人在后续发展中总会把他所谓的安慰需要转向更外部的客体，即自己的外表和衣着。换言之，焦虑中的某物发生移置；焦虑的客体被安置在某种并非其起源点、而且恰恰因此遭到误认的东西上，由此得到缓和。

你们很清楚，我们再次发现了某种隐含的必然性：琼斯说，阳具正是以一种可以外化、可以表象的东西的名义走到前台；它作为一个要素、一个界限词项、一个焦虑在其面前止步的点介入。当然，这就是他的辩证法。

我们将看看它是否充分。借助这套辩证法，他承认阳具期必须被呈现为一个恐惧症位置；它使儿童能够把自己的恐惧和报复焦虑集中到某种可接近的东西上，从而以某种方式拉开距离。她自己的口腔或施虐

欲望曾把这些恐惧投向母亲身体内部；它们随即又显现为可能从她自己的身体内部威胁她本人的危险。

这就是琼斯为自己所谓“阳具位置作为恐惧症”给出的发生。

正因为它是幻想出来、却又可接近、外化的器官：

- 阳具才介入运作；
- 后来，它之所以能够再次从舞台消失，是因为同敌意相连的恐惧可以得到缓和，也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转移到母亲以外的其他客体；
- 同深层器官相连的性欲性与焦虑，也可以通过若干手淫练习的过程发生移置；归根结底，他说，同女性客体的关系会变得不那么局部，并能够转移到其他客体上；
- 随后，那种归根结底无法命名的焦虑、同女性器官相连的原初焦虑——它在女童那里对应于男孩的阉割焦虑——可以转变成对被遗弃的恐惧；按照琼斯的说法，后者将变成女性心理更具特征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如下情形。要解决它，请看弗洛伊德的立场：他作为观察者，把它呈现为自然观察。与阳具期的联系具有驱力性质；女性气质的进入从一种力比多出发，这种力比多依其性质——让我们把事情说准确，不采用琼斯略显讽刺画式的批评——是主动的。只有当这个受挫的位置通过一系列转化与等价，使主体不再只向父亲人

物，而也向许多其他人要求并接受某种将来填满其欲望的东西时，它才会抵达女性位置。

归根结底，弗洛伊德已经充分分节的预设是：幼儿的原初要求，如他所说，“没有目标”。它要求的是一切；正是通过这项本来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得到发展，儿童逐渐进入一个更规范化的位置。这里无疑有某种成问题的东西，但它包含一项开放，使我们能够用欲望与要求这些词项分节问题；而我在这里正试图让你们把重音放在这些词项上。

对此，琼斯回答：这是一部自然史，一种博物学家的观察，但它并没有那么自然；我要让它变得更自然。他明确这样说。阳具恐惧症的历史，只是一个从原本已经得到原初规定的位置出发而发生的绕路。女人是 born，即天生如此；她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口的位置，一个吸收之口、吮吸之口的位置；

恐惧症消退以后，她会重新找到它；相对于原始位置，恐惧症只是一条简单绕路。

你们所谓的阳具驱力，纯粹只是由儿童对母亲的敌意和攻击唤起的一种恐惧症的人为作用。在一个本质上属于本能的循环中，这里只有纯粹绕路；随后，女人将名正言顺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阴道位置。

为了回应这一点，我试图向你们分节：在克莱因式动力与机械学中，阳具完全不可构想，除非它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包含为欠缺的能指——也就是主体的要求同其欲望之间这道距离的能指。只有对必然进入能指循环作出某种扣除，欲望才能重新接合。

女人必须经过这个能指，无论这看起来多么悖论，因为对她来说，问题不只是实现某种原初资料、某种纯形式位置，而是进入一种辩证法。由于能指存在，并由于构成俄狄浦斯关系的一切禁令，这套辩证法在男人那里也已经同自然关系拉开距离；它将使女人进入联盟与亲属关系的交换循环，也就是说，使她本人变成交换客体。

对这种俄狄浦斯关系的基础结构所作的一切正确分析，实际表明的是：女人必须把自己提出——更准确说，必须接受自己——作为这个交换循环的一个要素。仅从自然观点看，这个事实本身比我们迄今在她的本能演化中注意到的所有异常都远为巨大；正因如此，我们确实有理由在想象界层面、在欲望层面，为她本人进入其中所必须经过的迂回道路找到一种代表。

同男人一样，女人必须把自己铭写到能指世界中。标示这个事实的，是某种需要相对于欲望的关系；作为所指，欲望始终必须同一切可能属于自然需要的东西保持某种距离、某道间距。因为要被引入这种辩证法，自然关系中的某物就必须被切除、被牺牲。为了什么？恰恰为了让它本身成为进入要求的能指要素。

不过，还有一件相当——我不会说令人惊讶，但它将向我们展示我刚才所说的必然性如何回返的——事情。它带着如下社会学评论的全部直截了当呈现出来；这项评论建立在我们所知并在较近时期得到分节的一切之上：人类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半——必须成为交换的能指。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正是这样分节的；女人由此进入这种组合学：在基本结构中，法则有多种安排方式——它们当然远为简单，但在亲属关系的复杂结构中产生远为复杂的效应［……］。

我们在儿童进入这套能指系统的辩证法中观察到的，以某种方式是女人作为能指客体进入可以加引号称作“社会辩证法”之过程的反面。当然，这里的“社会”一词必须带上全部重音，表明它恰恰依赖能指与组合结构。我们在反面看见如下结果：儿童要进入这套能指辩证法，我们观察到什么？

十分确切地说：没有任何欲望比什么的欲望更让他直接而紧密地依赖？女人的欲望。女人的欲望恰恰由她所欠缺的东西、由阳具得到意指。我曾向你们表明，我们在儿童演化中遇到的一切绊脚点与意外——

直至最根本的绊脚点与意外——都同如下事实相连：儿童发现自己并非单独面对母亲，而是面对母亲以及某种恰恰作为这个欲望之能指的东西，也就是阳具。

我们在这里面对下一课的对象。两种情形必居其一：

- 或者儿童进入这套辩证法，也就是使自己成为交换流中的客体；也就是说，他在某个时刻放弃父亲和母亲，放弃自身欲望的原始客体；

- 或者，他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这些客体，就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某种对他而言远超这些客体之价值的东西。因为价值恰恰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一旦他把客体还原为纯粹能指，价值就开始存在。也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依恋这些客体，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欲望客体，就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后一种情形。

当俄狄浦斯依恋被保留下来时——也就是说，当俄狄浦斯情结、同父母客体的幼儿关系没有过去时——正是在它没有过去的程度上，而且严格只在这个程度上，我们看见什么发生？宽泛地说，就是欲望的那些倒转或倒错；它们表明，在同俄狄浦斯客体的想象关系内部，不可能发生规范化。

不可能发生规范化，十分确切地是因为：即使在最原始的关系——儿童同母亲的关系——中，也始终有一个第三项，也就是作为母亲欲望之客体的阳具。它把儿童置于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使他自己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他的欲望，就是成为母亲唯一的欲望。于是，这推动他走向一系列解决方案；它们始终会缩减这个三元组，或把其中诸项加以认同。既然母亲必须是阳具性的：

- 或者阳具被放到母亲本人的位置上，这就是恋物癖；
- 或者儿童本人以某种内在方式在自身汇合阳具与母亲；没有这种汇合，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得到满足，这就是易装癖。

简言之，正因为儿童——也就是带着自然需要进入这套辩证法的存在——不放弃自己的客体，他的欲望才无法找到满足。这个欲望只有通过部分放弃，才能找到满足。这正是我一开始向你们分节的根本内容：它必须变成要求，也就是必须得到意指，通过能指的介入与存在而得到意指；

也就是说，变成一部分遭异化的欲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女性性欲》（1931）[返回 3 月 12 日正文]

［初刊：《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17 卷第 3 期，1931 年，第 317—332 页；《弗洛伊德全集》第 14 卷，第 517—537 页。］

## 一

在正常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我们发现儿童深情依恋异性父母一方，而在同同性父母一方的关系中，敌意占据主导。对男孩而言，推导这个结果并不困难。母亲是他的第一个爱之客体，并始终如此；随着恋爱倾向增强，也随着他更深入地理解父母之间的关系，父亲必然成为竞争者。女童的情形却不同。她的第一个客体毕竟也是母亲；她如何找到通往父亲的道路？她如何、何时、为何离开母亲？我们早已明白，女性性欲的发展因一项任务而复杂化：放弃最初起支配作用的生殖器区域——阴蒂——转向一个新区域——阴道。如今，另一项同类转变，即把原初母亲客体换成父亲，在我们看来对女性发展同样具有特征性与重要意义。我们仍无法看清两项任务以何种方式彼此联系。

众所周知，强烈依恋父亲的女人十分常见，而且完全不必是神经症患者。我正是在这类女人身上作出这里报告的观察；它们使我形成了关于女性性欲的某种看法。其中有两个事实格外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只要存在特别强烈的父亲依恋，分析便证明此前有过一个同样强烈而热烈的、排他性依恋母亲的阶段。除了更换客体，第二阶段几乎没有给爱之生活增添新特征；原初母亲关系已经得到极为丰富而多样的发展。

第二个事实表明，人们也严重低估了这项母亲依恋的持续时间。在若干病例中，它远远延伸到第四年；有一例延伸到第五年，因而占据性欲早期繁盛期中长得多的部分。我们甚至必须承认一种可能：一些女性停滞在原初母亲依恋中，始终不能真正转向男人。

由此，女性的前俄狄浦斯阶段获得了一种我们迄今未曾赋予它的重要性。

由于这个阶段为我们用来解释神经症发生的一切固着与压抑提供场所，似乎必须撤回“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核心”这一命题的普遍有效性。不过，若有人抗拒这种修正，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扩大俄狄浦斯情结的内涵，让它包括儿童同父母双方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表述来兼顾新经验：女人只有克服一段由负向情结支配的前史以后，才抵达正常的正向俄狄浦斯情境。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父亲对女孩来说无非是一个讨厌的竞争者，尽管她对父亲的敌意从未达到男孩所特有的高度。我们早已放弃男性与女性性发展会平滑平行的一切期待。

洞察女孩的前俄狄浦斯前史会产生一种惊奇，很像在另一个领域发现希腊文化背后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

在最初这种母亲依恋领域，一切在我看来都如此难以通过分析把握，如此古老灰暗、影影绰绰，几乎无法复苏，仿佛遭受过一种格外无情的压抑。不过，这种印象也许来自如下事实：在对我的移情中，女人可以坚持那项父亲依恋——她们正是从所谈的前史中逃到那里。女性分析家——如让娜·朗普尔—德·格鲁特与海伦娜·多伊奇——看来确实能够更容易、更清楚地察觉这些事实，因为受分析者向一个适当的母亲替代者移情，帮助了她们。我也未能把任何一例完全看透，所以只限于报告最一般的结果，并仅列举几项新见解的样本。这些见解包括：母亲依恋阶段让人想到它同癔症病因有格外密切的关系；想到这个阶段与这种神经症都属于女性气质的特殊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还有，我们可以在这种母亲依赖中找到女人后来偏执狂的萌芽。[1)]

因为，那种令人惊讶、却经常遇见的恐惧——害怕被母亲杀死（吃掉？）——似乎正是这种萌芽。很容易假定，这项恐惧对应于儿童因教育和身体照料的诸多限制而对母亲发展出的敌意；而心理组织的早期状态有利于投射机制。

## 二

我先提出两个令我觉得新颖的事实：女人对父亲的强烈依赖，只是继承了同样强烈的母亲依恋；而这个较早阶段持续了意外漫长的时间。现在，我要回过头来，把这些结果纳入我们已经了解的女性性发展图景；其中难免有所重复。不断把它同男人的情形作比较，只会有助于我们的论述。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禀赋中假定的双性性，在女人那里比男人那里显现得清楚得多。男人只有一个支配性的性欲区域、一个性器官；女人却有两个：严格属于女性的阴道，以及同男性器官相似的阴蒂。我们认为自己有理由假定，阴道在许多年里几乎并不存在，也许直到青春期才提供感觉。不过近来，越来越多观察者把阴道冲动也安置到这些早期岁月。于是，童年中属于生殖器性的一切根本过程，在女人那里必定发生于阴蒂。女人的性生活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具有男性性质；只有第二阶段才具有特殊的女性性质。所以，女性发展中存在一个把前一阶段转变为后一阶段的过程，在男人那里没有任何类似过程。另一项复杂化来自：男性化阴蒂的功能会以极其多变、而且显然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方式，延续到后来女性性生活中。当然，我们不知道女性的这些特殊之处如何获得生物学根据，更不能把目的论意图加在它们身上。

同这第一项重大差别平行的，是客体选择领域的另一项差别。在男人那里，母亲由于喂养与身体照料的影响，成为第一个爱之客体，并一直保持这个位置，直到由一个在本质上同她相似或源自她的客体取代。对女人来说，母亲也必定是第一个客体；所有儿童客体选择的原初条件毕竟相同。但到发展终点，男人—父亲应当成为新的爱之客体；也就是说，女人自身性别位置改变的同时，客体的性别也必须改变。这里给研究带来的新任务，是回答如下问题：这种转变通过哪些道路发生；它完成得多么彻底或不完整；这种发展会出现哪些不同可能性。

我们也已经认识到，两性另一项差别涉及同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我们的印象是，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论断，严格说来只适用于男孩；而我们拒绝“厄勒克特拉情结”这个试图强调两性行为类似性的名称，是正确的。同时爱父母一方、又因竞争而憎恨另一方的致命关系，只在男孩那里建立。随后，看见女性生殖器证明阉割可能存在；对这项可能性的发现，迫使俄狄浦斯情结发生改造，导致超我形成，并由此开启一切旨在把个体编入文化共同体的过程。父亲代理被内化为超我以后，还有一项任务需要解决：使超我脱离那些最初在心理上代表它的人物。在这条奇特的发展道路上，恰恰是以保存阴茎为目标的自恋性生殖器兴趣，被转而用于限制幼儿性欲。

在男人那里，阉割情结的影响还留下某种程度的、对被认作遭阉割之女人的轻视。极端情况下，它会发展为客体选择受到抑制；若得到器质因素支持，则会发展为排他性同性恋。阉割情结在女人那里的效应完全不同。女人承认自己遭到阉割这个事实，也因而承认男人的优越和自己的低下；但她同时反抗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形。三条发展方向从这种分裂态度中产生。第一条导致普遍背离性欲。女童因同男孩比较

而受到惊吓，对自己的阴蒂不满，放弃阳具活动，也由此放弃整个性欲，同时放弃自己在其他领域相当一部分男性气质。第二条方向以反抗性的自我坚持固守受到威胁的男性气质；终有一天取得阴茎的希望维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晚期，被提升为人生目标；不管怎样，自己仍是男人的幻想，往往在漫长人生阶段中继续发挥塑造作用。女人的这种“男性气质情结”也可能以显性的同性恋客体选择告终。只有第三条相当迂回的发展，才汇入正常女性的最终形态；它把父亲作为客体，从而找到女性形式的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在女人那里是较长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它没有被阉割影响摧毁，反而由后者创造；它避开了那些在男人那里会摧毁它的强烈敌对影响，甚至极常根本不被女人克服。所以，它消解所产生的文化成果也更小、更不重要。若说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的这种相互关系差异，会塑造女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性格，大概并没有错。[2)]

所以，排他性母亲依恋阶段——可以称作前俄狄浦斯阶段——在女人那里要求比在男人那里大得多的重要性。女性性生活中许多此前不易理解的现象，一旦追溯到这个阶段，便得到充分阐明。例如，我们早已注意到，许多女人按照父亲榜样选择丈夫或把丈夫放在父亲位置，婚后却在他身上重复自己同母亲的不良关系。本来，他应当继承父亲关系，实际上却继承了母亲关系。这很容易理解为一种顺手发生的退行。母亲关系是原初关系，父亲依恋建立在其上；如今，婚姻中原初之物从压抑中显现。把情感依恋从母亲客体转写到父亲客体，本来正是通向女性状态之发展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在如此多女人那里得到一种印象：她们成熟期充满同丈夫的斗争，就像青年期在同母亲的斗争中度过；那么，在上述评论的照明下，我们会得出结论：她们对母亲的敌对态度并非俄狄浦斯情结竞争的结果，而来自此前的阶段，只是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得到强化与运用。直接分析研究也证实了这一

点。我们的兴趣必须转向那些在离开这个曾受到如此强烈而排他性爱恋的母亲客体时发挥作用的机制。我们已经准备好发现，这里不是单独一个因素，而是一整系列朝同一个最终目标共同起作用的因素。

其中有些因素格外突出，它们总体上受幼儿性欲的条件制约，所以同样适用于男孩的爱之生活。首先应当提到对其他人的嫉妒：对兄弟姐妹、竞争者的嫉妒，而父亲也在其中占有一席。幼儿之爱没有限度，要求排他，不满足于分享。第二项特征是，这种爱严格说来没有目标、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从根本上正因如此，它注定以失望告终，并让位于敌对态度。在生命后期，最终满足没有出现，可能促成另一种结果。这项因素可以像目标受抑制的爱之关系那样，保证力比多投注不受扰乱地延续；但在发展过程的推动下，力比多通常会离开不能满足的位置，寻找一个新位置。

另一个远为特殊的离开母亲的动机，来自阉割情结对没有阴茎的造物所产生的效应。女童总会在某个时候发现自己的器官低下；如果她有兄弟或身边有其他男孩，这当然会发生得更早、更容易。我们已经听说，由此分出三条方向：（α）停止全部性生活；（b）反抗性地过度强调男性气质；（c）走向最终女性气质的开端。这里不容易给出更精确的时间，也不容易确立典型进程。单是发现阉割的时间点就各不相同；另外一些因素看来也不恒定，并取决于偶然。她自身阳具活动的状态、这项活动是否被发现，以及被发现以后经历了多大程度的阻止，都会发挥作用。

女童通常会自发发现自己的阳具活动——对阴蒂的手淫；起初它肯定没有幻想。身体照料对其唤醒的影响，通过一种极常见的幻想得到解释：母亲、乳母或保姆成为诱惑者。女孩手淫是否少于男孩，而且从一开始力度更弱，仍可保持悬置；这完全有可能。真实诱惑也相当常

见：要么来自其他儿童，要么来自想要安抚儿童、使其入睡或依赖自己的照料者。凡诱惑介入，都会扰乱发展过程的自然进程，往往留下广泛而持久的后果。

正如我们已经听到，手淫禁令会成为放弃手淫的契机，也会成为反抗下禁令者——即母亲或后来通常同母亲融为一体的母亲替代者——的动机。反抗性地坚持手淫，看来开启了通往男性气质的道路。即使儿童未能压制手淫，表面无力的禁令仍会在后来产生效应：她竭力作出一切牺牲，摆脱那项已遭厌弃的满足。成熟女孩的客体选择甚至也可能受到这项始终坚持的意图影响。自由性活动受到阻挠所产生的怨恨，在脱离母亲时发挥重大作用。青春期以后，当母亲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守护女儿的贞洁时，同一动机还会再次发生作用。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母亲同样反对男孩手淫，因而也为他创造了强烈的反抗动机。

女童看见男性生殖器，由此经验到自己的缺陷时，并不会毫不犹豫、毫不反抗地接受这项令人不快的教训。正如我们已经听到，她固执地保留终有一天也会取得这种生殖器的期待；而对它的愿望在希望消失很久以后仍然存在。在所有情况下，儿童起初都只把阉割视为个人不幸；后来才把它扩展到某些儿童，最后扩展到某些成年人。随着她洞察这种负面特征具有普遍性，女性气质——因而母亲——便受到严重贬值。

上面的描述谈女童如何回应阉割印象与手淫禁令，很可能会给读者留下混乱而矛盾的印象。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实际上，几乎不可能给出普遍适用的描述。不同个体身上会发现各式各样的反应；同一个体身上，对立态度也会并存。禁令第一次介入，冲突便出现；从此以后，它将伴随性功能的发展。我们如此难以区分这个第一阶段的心理

过程与后来覆盖并在记忆中歪曲它们的过程，也使理解格外困难。例如，后来阉割事实会被理解为对手淫活动的惩罚，而惩罚的执行归给父亲；但两项观念肯定都不可能属于原初。男孩也总是害怕父亲施行阉割，尽管对他的威胁大多同样来自母亲。

无论如何，在最初这段母亲依恋阶段的终点，离开母亲的最强动机表现为一项责备：母亲没有给孩子一件正常生殖器，也就是把她生成了女人。我们还会略感惊讶地听到另一项追溯得没那么远的责备：母亲给孩子的乳汁太少，没有哺乳足够长的时间。在我们的文化条件下，这种情形很可能经常真实发生，但肯定没有分析中所宣称的那样频繁。看来，这项指控更像儿童普遍不满的表达。在一夫一妻制的文化条件下，儿童六至九个月就被断离母乳，而原始母亲会两三年专心照料自己的孩子；仿佛我们的孩子永远没有吃饱，仿佛他们从未在母亲乳房上吮吸足够长的时间。不过，我并不确定，分析像原始人的孩子那样长期受乳的儿童时，是否不会遇到相同抱怨。幼儿力比多的贪欲就是如此巨大！综观分析所揭示的全部离开母亲之理由——母亲没有给女孩唯一正常的生殖器，没有充分喂养她，迫使她同别人分享母爱，从未满足她全部爱的期待，最后又先刺激、后禁止她自身的性活动——它们看来都不足以为最后的敌意辩护。其中一些是幼儿性欲之性质不可避免的后果，另一些则像后来为了说明未获理解的情感转变而编造的合理化。也许实际情形更像这样：母亲依恋必须毁灭，恰恰因为它是第一次而且如此强烈；这很像我们经常在年轻女人最初那些于最炽烈热恋中缔结的婚姻里观察到的情形。两种情况下，爱之态度都会因不可避免的失望和攻击契机的累积而失败；第二次婚姻通常远为顺利。我们还不能断言，情感投注的矛盾性是一条普遍有效的心理法则，仿佛根本不可能在深深爱一个人的同时，不伴随也许同样强烈的恨，反之亦然。正常成年人无疑能把两种态度彼此分离：不必憎恨

自己的爱之客体，也不必同时爱自己的敌人。但这看来是后来发展的结果。在爱之生活的最初阶段，矛盾情感显然才是常态。许多人终生保留这种古老特征；强迫症患者的客体关系以爱恨平衡为特征。我们也可以断言，矛盾情感在原始人那里占据主导。所以，女童对母亲的强烈依恋必定高度充满矛盾情感；借助其他因素，这种矛盾情感恰恰会把她推向离开母亲；也就是说，这再次源于幼儿性欲的一项一般特征。

对这个解释尝试，立刻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男孩如何能不受动摇地维持自己肯定不弱的母亲依恋？答案也立刻备好：因为他们可以把一切敌对感情安置到父亲那里，从而处理自己对母亲的矛盾情感。不过，第一，在彻底研究男孩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以前，我们不应给出这个答案；第二，总的来说，更谨慎的做法大概是承认，我们对这些刚刚认识的过程还远没有充分看透。

## 三

另一个问题是：女童向母亲要求什么？在那段排他性母亲依恋时期，她的性目标具有什么性质？从分析材料得到的回答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女孩面对母亲的性目标既有主动性质，也有被动性质；它们由儿童经过的力比多阶段决定。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在这里值得特别关注。很容易观察到，在心理经验的每个领域——不只性欲领域——一种被动接受的印象都会在儿童身上引发主动反应的倾向。她试图亲自做刚才在她身上或同她一起做过的事情。这是强加给她的掌控外部世界之工作的一部分，甚至能使她努力重复那些本来会因痛苦内容而有理由避开的印象。儿童游戏也服务于这个意图：用主动行动补充被动经验，并以这种方式把它取消。当医生撬开反抗中儿童的嘴来查看咽

喉，医生离开以后，儿童就会扮演医生，把这套暴力程序在一个年幼的兄弟姐妹身上重复；后者面对她就像她面对医生一样无助。反抗被动并偏爱主动角色，在这里清晰可见。并非所有儿童都会同样规律而有力地从被动转向主动；在一些儿童那里，这种转向也可能不发生。从儿童的这项行为，我们可以推断她会在性欲中表现出怎样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对强度。

儿童同母亲最早的性经验和带有性重音的经验，自然具有被动性质。她由母亲哺乳、喂食、清洁、穿衣，并被指导完成一切活动。儿童的一部分力比多依附于这些经验，享用与之相连的满足；另一部分则试图把它们转向主动。在母亲乳房那里，首先是主动吮吸取代被哺乳。在其他关系中，儿童要么满足于独立——也就是成功亲自完成此前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要么在游戏中主动重复自己的被动经验；或者，她真正把母亲变成客体，自己作为行动主体面对母亲。最后这种情形发生在严格的活动领域；我曾长期觉得它难以置信，直到经验消除一切怀疑。

我们很少听说女童想给母亲洗澡、穿衣，或提醒她排泄。她偶尔会说：“现在我们来玩我当妈妈、你当孩子。”但她大多会在同玩偶的游戏中间接满足这些主动愿望；在那里，她本人表象母亲，玩偶表象孩子。女孩相对于男孩偏爱玩偶游戏，通常被理解为女性气质早早觉醒的标志。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们不应忽视：这里表达的是女性气质的主动性；女孩的这种偏爱，很可能见证她排他地依恋母亲，同时完全忽略父亲客体。

女孩面对母亲那种令人惊讶的性主动，按时间顺序表现为指向母亲的口腔倾向、施虐倾向，最后甚至是阳具倾向。这里很难报告细节，因为它经常涉及晦暗的驱力冲动：发生时，儿童无法在心理上把握它

们；所以它们只能在事后得到解释，并在分析中以一些原本肯定不属于它们的表达形式出现。有时，我们会发现它们转移到后来的父亲客体身上；它们在那里并不合适，会严重干扰理解。攻击性的口腔与施虐愿望因早期压抑被迫采取一种形式：害怕被母亲杀死；这项恐惧反过来又为针对母亲的死亡愿望一旦进入意识提供辩护。这种母亲恐惧在多大程度上依托母亲对儿童怀有的某种无意识敌意——并被儿童猜出——无法确定。（到目前为止，我只在男人那里发现害怕被吃掉；它被关联于父亲，但很可能是指向母亲的口腔攻击经转化而成的产物。一个人想吃掉曾喂养自己的母亲；面对父亲时，这个愿望缺少最直接的契机。）

我曾在一些强烈依恋母亲的女性身上研究前俄狄浦斯阶段；她们一致报告，自己对母亲给她们灌肠时总是作出最强烈的抵抗，并以恐惧与愤怒的叫喊回应。这很可能是儿童极常见、甚至规律性的行为。我直到听到露丝·麦克·布伦瑞克的一项评论，才理解这种特别激烈反抗的理由；她当时正研究同样的问题，并说自己愿把灌肠后的愤怒爆发同生殖器刺激后的性高潮相比。其中的焦虑，应当被理解为已经唤起的攻击性快乐发生转化。我认为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在肛门—施虐阶段，肠道区域受到强烈被动刺激，会以攻击性快乐的爆发回应；它直接表现为愤怒，或因受到压制而表现为焦虑。这种反应在后来岁月中似乎会消退。

在阳具期的被动冲动中，有一项格外突出：女孩通常指控母亲是诱惑者，因为她必定是在母亲（或代替母亲的照料者）进行清洁与身体照料时，体验到最初或至少最强烈的生殖器感觉。母亲们经常向我报告，她们观察到两三岁的女儿喜欢这些感觉，并要求母亲通过反复触碰和摩擦来强化。我认为，母亲如此不可避免地为孩子开启阳具期这

一事实，正是后来幻想中父亲如此规律地作为性诱惑者出现的原因。随着离开母亲，性生活的引入也被转写到父亲身上。

最后，在阳具期还会产生针对母亲的强烈主动愿望冲动。这个时期的性活动在阴蒂手淫中达到顶点，其中很可能表象着母亲；但儿童是否由此形成性目标的表象，这个目标又是什么，根据我的经验无法猜测。只有当弟妹出生，给儿童的一切兴趣提供新推动时，这种目标才可以得到清楚辨认。女童想让自己像男孩一样给母亲制造这个新孩子；她对这件事的反应以及面对孩子的行为也同男孩一样。这听起来相当荒谬，但也许只因为我们太不习惯听到它。

离开母亲是女孩发展道路上极有意义的一步，它不只是客体更换。我们已经描述它的发生及其表面动机的累积；现在还要补充：伴随它可以观察到主动性欲冲动大幅下降、被动性欲冲动上升。主动倾向受到拒绝的影响当然更强；它们已经证明完全无法实行，因而也更容易被力比多放弃。但被动倾向一方也不乏失望。离开母亲时，阴蒂手淫往往也会停止；女童此前的男性气质遭到压抑时，她的总体性欲追求往往有相当部分受到持久损伤。转向父亲客体，是借助那些逃过颠覆的被动倾向完成的。通往女性气质发展的道路如今向女孩开放，只要已经克服的前俄狄浦斯母亲依恋之残余没有使它变窄。

综观这里描述的这段女性性发展，我们很难压下对整体女性气质的某项判断。我们发现，起作用的是同男孩一样的力比多力量；也可以确认，它们一度在两处采取同样的道路，产生相同结果。

随后，是生物因素使它们偏离最初目标，甚至把主动的、在各种意义上属于男性的倾向引导到女性气质的轨道。既然我们不能拒绝把性兴奋追溯到某些化学物质的效应，首先自然会期待：生物化学终有一天

会向我们展示一种物质，其在场引发男性性兴奋，另有一种引发女性性兴奋。但这种希望看来并不比另一种如今已经幸运克服的希望更不天真——以为能够在显微镜下分别找到癔症、强迫性神经症、忧郁症等的病原体。

性化学中的事情也必定更加复杂。不过，对心理学来说，身体里究竟只有一种性兴奋物质，还是有两种或无数种，并不重要。精神分析教我们用一种力比多就已足够；它当然具有主动和被动目标，也就是不同的满足方式。问题的剩余部分就包含在这种对立中，尤其包含在具有被动目标的力比多倾向之存在中。

## 四

只要查阅关于我们主题的分析文献，就会确认我在这里阐述的一切已经存在其中。若不是在一个如此难以接近的领域，每一份个人经验与个人看法的报告都可能具有价值，那么发表本文本无必要。我也确实把若干东西把握得更鲜明、分离得更谨慎。其他一些论著同时讨论超我与罪疚感问题，因而论述变得不清楚；我避开了这些问题。在描述这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结局时，我也没有处理如下复杂化：儿童因为对父亲失望而回到已经放弃的母亲依恋，或者后来一生中不断从一种态度切换到另一种态度。不过，正因为我的工作只是众多贡献中的一项，我可以免于详尽评价文献，只须突出同一些文章最有意义的一致，以及同另一些文章最重要的偏离。

在亚伯拉罕那篇至今其实仍未被超越的《女性阉割情结的表现形式》（1921）中，人们会希望加入最初排他性母亲依恋这个因素。我必须在根本点上赞同让娜[3]·朗普尔—德·格鲁特的重要论文（1927）。她认识到男孩和女孩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完全同一，主张女孩面对母亲具

有性（阳具）主动，并以观察证明它。她把离开母亲追溯到了解到阉割的影响；这迫使儿童放弃性客体，并因而往往也放弃手淫。她为整个发展提出一个公式：女孩必须经过一个“负向”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才能进入正向情结。这篇文章的一项不足，是把离开母亲呈现为纯粹客体更换，却没有处理它是在最鲜明的敌意标志下发生的。海伦娜·多伊奇最近的文章（1930）充分重视了这种敌意，也承认女孩的阳具主动和母亲依恋的强度。多伊奇还指出，转向父亲是通过（面对母亲时已经唤起的）被动倾向发生的。在她较早（1925）出版的《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中，她还没有摆脱把俄狄浦斯图式也应用于前俄狄浦斯阶段，所以把女孩的阳具主动解释为对父亲的认同。

费尼歇尔（1930）正确强调了如下困难：分析所得材料中，哪些是前俄狄浦斯阶段未经改变的内容，哪些经过退行（或其他方式）歪曲？他不像让娜·朗普尔—德·格鲁特那样承认女孩的阳具主动，也反对梅兰妮·克莱因（1928）把俄狄浦斯情结“提前”，认为它在生命第二年之初就开始。这项时间规定必然也会改变对发展中其他全部关系的理解；它事实上不符合成人分析的结果，特别不符合我关于女孩前俄狄浦斯母亲依恋长期持续的发现。如下评论指出了一条缓和矛盾的道路：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无法区分哪些东西由生物法则刚性规定，哪些会在偶然经验的影响下移动和改变。正如诱惑效应早已为人所知，其他因素——弟妹出生的时间、发现性别差异的时间、直接观察性交、父母追求或拒绝的行为等——也都可以加速并催熟幼儿性发展。

一些作者倾向于压低儿童最早、最原初的力比多冲动之意义，使后来的发展过程占据优势；极端来说，前者只剩下指明若干方向的作用，而沿这些道路行进的强度则由后来的退行与反向形成提供。例如，卡伦·霍妮（1926）认为，我们严重高估了女孩的原初阴茎妒羡；后来

展开的男性气质追求，其强度则应归于一种次生阴茎妒羡，它被用来防御女性冲动，尤其防御对父亲的女性依恋。这不符合我的印象。后来通过退行与反向形成得到强化，肯定是事实；要相对估量汇集的力比多成分，或许也很困难。但我仍认为，我们不应忽视：最初那些力比多冲动自有一种强度，始终超越后来的一切，严格说来可以称作不可通约。父亲依恋与男性气质情结之间确实存在对立——这就是主动与被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一般对立——但这不允许我们假定，只有一个是原初的，另一个只从防御取得力量。如果对女性气质的防御如此有力，它的力量还能来自哪里？只能来自男性气质追求；后者最早表现在儿童的阴茎妒羡中，因而理应以此命名。

对琼斯（1928）的看法也可以提出类似异议；他认为，女孩的阳具阶段与其说是真正的发展阶段，不如说是一种次生保护反应。这既不符合动力关系，也不符合时间关系。

---

1) 在露丝·麦克·布伦瑞克那个著名病例（《嫉妒妄想的分析》，1928）中，病症直接从前俄狄浦斯的（姐妹）固着产生。

2) 可以预见，男人中的女性主义者以及我们的女性分析家，都不会同意这些论述。她们大概很难忍住如下异议：这种学说来自男人的“男性气质情结”，旨在为男人贬低和压迫女人的先天倾向建立理论辩护。但这种精神分析论证在此处像在许多地方一样，让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根著名的“两头棍”。反对者反过来也会觉得容易理解：女性不愿接受看来同她们热切欲望的男女平等相冲突的东西。把分析用于争斗，显然无法裁决问题。

3) 应作者要求，我把她的名字改成这里的写法；此前《杂志》把它写作 A. L. de Gr.。

## 欧内斯特·琼斯：《早期女性性欲》[1] [返回 3 月 12 日正文]

这次讲演计划作为维也纳与伦敦系列交流讲演的第一场；贵会副主席费德恩博士出于一项特殊目的提出这个计划。数年来已经很明显，伦敦的许多分析家在若干重要主题上同维也纳同事意见不一；例如，性欲的早期发展——特别是女性性欲——超我的发生及其同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儿童分析技术，以及死亡本能的构想。我说"许多分析家"，并不试图列举他们；但显然存在某种危险：地方观点可能统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人们开始谈论维也纳学派或伦敦学派，仿佛它们表象着可能彼此分岔的不同倾向。我确信，事实绝非如此。这些差异正是接触不充分所伴随的差异；在本例中，地理和语言因素又强烈促成了接触不足。过去几年的政治与经济动荡，并没有拉近伦敦与维也纳。许多英国分析家不读《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而阅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维也纳分析家更少。我也尚未成功让两刊之间的翻译交流达到我所希望的自由程度。德文研究进入《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渠道，确实比英文研究进入德文版《精神分析杂志》自由得多；但这条单向道路远不完善，也绝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事实是，在我们看来，伦敦的新工作与新观念尚未在维也纳得到充分考量。费德恩博士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通过安排直接的人际接触与讨论来补救当前困难。我也认为，这是最有希望的推进方式。首先，我的印象是，如今人们更多通过口头话语而非书面文字学习精神分析。过去二十年里，分析家的阅读习惯无疑有所衰退，

[1] 1935 年 4 月 24 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发表于《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21 卷及《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6 卷。

相应地，写作习惯则越来越带有自恋倾向。其次，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选择那些鲜明认同于某种观点或研究方法的讲者。

我选择当前主题同你们讨论，是很自然的。早在八年前的因斯布鲁克大会上，[1]我就支持过一种不完全符合普遍接受观点的女性性发展看法；三年前在威斯巴登大会上，[2]我扩充了自己的结论，并把它们延伸到男性发展问题。用通俗话说，我的根本主张是：幼女身上的女性气质比分析家通常承认的更多；她可能经过的男性阶段，其动机也比通常所想更为复杂。这个阶段在我看来既是某种原初之物，也是一种对女性气质恐惧的反应。许多女性分析家支持这一观点。卡伦·霍妮最早以她那有力的方式抗议：对幼女发展的观察太过排他地通过男性目光进行。尽管她后来的观点在我看来非常值得质疑，我仍要赞扬她给这些问题的研究带来的新刺激。此后，儿童分析家——特别是梅兰妮·克莱因——能够更加贴近这些问题，并报告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直接观察。

现在，让我回顾最值得关注的主题，并分别标出意见一致与意见不同之处。从开端开始。先天双性性的假设在我看来十分可能；许多生物事实都可用来支持它。不过，这项假设很难证明，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把它视为绝对理所当然，并在每次遭遇临床困难时都退回那里。

来到个体生命的开端，我们会同意：至少在第一年，而且很可能更晚，母亲在女孩生活中的作用远大于父亲。弗洛伊德这样谈论这个阶段：“同最初母亲依恋相连的一切，在分析中，在我看来都如此难以捉摸；它消失在如此昏暗、朦胧的过去中，又如此难以复苏，仿佛曾遭

受某种格外无情的压抑。”所以，我们显然需要更细致地分析女孩最早依恋母亲的阶段；而在我看来，幼儿的“早期分析”

[1] 见第二十五章。[2] 见第二十六章。

正向我们提供这种分析。关于较晚发展阶段的意见分歧，很可能主要、甚至完全来自对早期阶段的不同假定。

所以，我们从最困难的点、全部问题的症结开始。这个第一阶段是否集中于单一客体——母亲？它是否如阴蒂手淫看来所暗示的，属于一种男性态度？粗略地说，这似乎就是弗洛伊德的观点。若果真如此，女孩在发展中既要改变自己的性态度，又要改变爱之客体的性别；她在发展中经历的著名困难，可以由这些任务的复杂性解释。

在伦敦，部分由于梅兰妮·克莱因早期分析的经验，也由于我们在成人身上的发现，我们对这个早期阶段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女孩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更多属于女性而非男性；其典型特征是接受与取得。她更多关注身体内部而非外部。她看待母亲，并不像男人看待女人，把她视为一个乐于满足其接受某物之愿望的造物。她反而把母亲视为一个成功地用孩子如此急切想要的那些东西填满自己的人，也就是固体与液体两类令人愉快的材料。她努力从母亲那里把这些东西取出来；喂养的延迟与许多其他不完善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则刺激她欲望中的攻击性成分。对乳头的不满以及吮吸一种更充分、类似阴茎之客体的愿望，很早便会产生；后来，它在我们熟悉的阴蒂不满与阴茎妒羡中得到重复。所以，对某种阴茎的最初愿望由口腔挫折诱发。在这个哺乳阶段，我们仍然关注部分客体，远不主要涉及对父亲的爱。部分客体仍被感受为属于母亲身体。但父亲开始成为它的来源；按照弗洛伊德已经表明是儿童最初交媾构想的口腔性交形式，母亲从

他那里取得了这件东西。实际上，只要女孩同时持有这项理论的反面——既有交媾—口交理论，又有乳房—口交理论——父亲就会被视为母乳的竞争者。第一年后半段、而且通常到第一年结束时，父亲的人格就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他的真正女性之爱，以及接近其性器官的欲望，开始同他同母亲的明显关系发生冲突。到了第二年，我们已经可以明确谈论俄狄浦斯情结。它同后来更熟悉的形式不同，因为遭到更深压抑、更加无意识；“合体父母意象”在其中也发挥更大作用。

女孩对母亲身体内容物的施虐态度，记录在无数切割、抢劫和焚烧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口腔施虐很快扩展到尿道与肛门施虐；而且排泄物具有破坏性的构想，在女孩那里看来甚至比在男孩那里更加突出。女孩应对这种施虐冲动及其引发的焦虑，比男孩困难得多；这有两个明确理由。第一，她的焦虑根本上涉及身体内部，没有像男孩那样可以把焦虑集中其上的外部器官。她只有阴蒂；卡伦·霍妮最早强调它在提供安慰方面较为低下，因为男孩能够自由看见、触摸外部器官并用它排尿。后来几年，女孩会把大量焦虑移置到整个身体外部，包括衣服，并从其完整性与总体令人满意的状态中取得安慰；但这在幼童那里发挥的作用小得多。第二，男孩还有另一个能为施虐与仇恨导电的人格避雷针——他的性竞争者父亲。相反，女孩的性竞争者与施虐客体是同一个人——母亲；婴儿在力比多及一切其他生命需要上都完全依赖她。摧毁这个客体将带来致命后果，所以施虐冲动及其伴随焦虑比在男孩那里更多受到压抑并转向内部。简言之，女孩出于两个理由更少有机会把施虐冲动外化。这解释了她对母亲那种显著的依恋与依赖；弗洛伊德在最近一篇论文中特别强调过它。我们认为，这些考量还解释了他所谓这个发展阶段特有的晦暗与“无情压抑”。

我刚才讲述的最早阶段——也就是生命第一年左右——看来在维也纳和伦敦得到非常不同的构想。我确信，关于后来发展阶段的几乎一切意见分歧，都可追溯到这些根本差别。现在让我试着说明事情为何如此。

幸运的是，我们都同意口腔阶段十分重要；口腔阶段是后来女性气质的原型，也是一个广受接受——尽管可能稍逊——的信条。海伦娜·多伊奇曾就此指出阴道功能具有吮吸性质。早期阴道敏感性问题公认十分晦暗；但若干女性分析家——最近是佩恩博士与布赖尔利博士——已经提出证据，表明它同母乳喂养一起发生；即使这些证据并非绝对定论，也至少极有意义。不过，一方面很难把它同外阴感觉区分；另一方面，也很难把它同肛门、子宫及一般身体内部所涉及的总体保持性感觉与幻想区分。无论如何，我们如今很难再坚持阴道态度在青春期以前不会发展的观点。成人阴道麻木乃至性交困难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以及它们所暗示的被否定之物，在我看来明确驳斥了把阴道视为无关紧要或仅仅尚未发展的器官之观念。它们反而证明，阴道受到了情欲投注，而且主体深深恐惧这种投注。我会把这个器官在童年中的晦暗归于三个原因：（1）同它有关的幻想——那些涉及阴茎与婴儿愿望的幻想——同作为情敌的母亲发生最直接冲突；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女孩无法像男孩面对父亲那样，充分表现对母亲的敌意。（2）阴道是最深焦虑的所在地，所以它的性欲性及伴随焦虑都会广泛向外移置。它像嘴一样被感受为邪恶而危险的器官，因而必须隐藏。（3）在月经开始以前，它没有生理功能，也相对无法接近；这些事实使它不能像阴茎甚至阴蒂那样，被用作现实与力比多安慰。

现在来到阴茎—阴蒂问题；最尖锐的意见分歧就在这里。考察这个问题同父母关系的联系，可以最清楚地显示这一点。如果为了简洁，你

们允许我有意夸大分歧，那么可以这样说：按照一种观点，女孩憎恨母亲，是因为母亲使她“阴蒂成为阴茎”的愿望失望；按照另一种观点，女孩之所以希望自己的阴蒂成为阴茎，是因为她对母亲怀有无法表达的仇恨。同样，按照一种观点，女孩因为对自己的阴蒂失望而爱上父亲；按照另一种观点，她希望用阴茎替换阴蒂，是因为爱父亲的道路上存在障碍。你们会同意，即使考虑到我把它们呈现得过于尖锐，这里仍存在十分明确的意见分歧。

我曾在别处指出，“阴茎愿望”这个短语在当前语境中有三种含义，由此造成混乱；我会通过界定自己所用的含义来避免混乱。此刻，我们所说的是希望阴蒂成为阴茎；我相信，这个说法毫不含糊。我们都熟悉同这个愿望相连的不满足与怨恨，以及它在女孩心理中发挥的作用。但如此多女孩妒羡男孩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看不见她的女性属性、卖弄风情等等，以及玩偶存在这一重要事实。

这里的问题，是这个愿望的动机。我们同意，其中一部分来自卡伦·霍妮最完整描述的简单自体情欲妒羡：男孩能自由观看和触碰，并能在排尿时使用这个器官。然而，按照一种观点，这是愿望的主要动机；对其他作者而言，它只说明较小部分。在我看来，远为重要的是可以称作阴茎愿望之次生动机的东西。简言之，它们涉及女孩为应对指向父母——尤其母亲——的施虐冲动所作的各种努力。即使有重复之嫌，我仍要再次提到并强调我们视为这种施虐冲动之根本表达的东西：撕开一条进入母亲身体的道路，并吞噬她相信被并入其中的父亲阴茎。梅兰妮·克莱因恰当地所谓“合体父母概念”，在这里大致对应于维也纳常说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但我们会扩展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术语，让它也包括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特有的施虐冲动使女孩产生相应焦虑，害怕自己身体内部同样遭到抢劫和摧毁。

现在，让我列举占有阴茎的幻想用来缓解这种可怕施虐冲动及其伴随焦虑的方式。首先要说，阴茎观念对女孩的价值，从根本上同它排泄并引导尿流的能力相联系。海伦娜·多伊奇与卡伦·霍妮特别强调阴茎妒羡同尿道施虐之间的这项联系；梅兰妮·克莱因以及最近的玛乔丽·布赖尔利，则广泛讨论了口腔施虐与尿道施虐之间的密切联系。按照我在牛津大会以前阐述的“同病疗法原则”，最成功处理这种受压抑尿道施虐的方式，是找到一条能让它在现实中表达的道路，从而使人确信它并不致命。男孩能够通过自己的排尿游戏做到这点，这要归功于肉眼可见而完整的阴茎所提供的安慰。

当然，女孩的阴茎观念充满矛盾情感。一方面，它是良好、友善而富有营养的；从中流出的液体被等同于乳汁。另一方面，它邪恶而具有破坏性，其液体拥有腐蚀力。所以，女孩在幻想中对想象性阴茎有两种用法。只要它邪恶、施虐而具有破坏性，它就是一种攻击母亲的武器；女孩想象父亲正是这样做的，由此可以从母亲身体里取得自己所欲望的东西。只要它良好而有益，它就可以用来把女孩认为自己从母亲那里抢走的阴茎还给母亲；特别是当女孩认为自己阉割了父亲，使他无法满足母亲时如此，这在同性恋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态度。它还可以用来中和、进而修复那根邪恶的内化阴茎——女孩曾把它吞下，并通过自己的施虐冲动把它变成体内有害而自我毁灭的器官；一根可见而完整的阴茎，将是抵御那些无法接近的内部焦虑之最佳安慰。第三，女孩可以先认同父亲，随后发展出一根完整阴茎作为补偿，以此偿还遭到阉割的父亲。

所以，女孩希望自己的阴蒂成为阴茎，背后存在一张极其复杂的幻想网络。它们的目标部分属于力比多，但大部分属于防御——由各种彼此不同的尝试组成，旨在控制她的施虐冲动，并平息这种冲动所造成

的绝望焦虑。弗洛伊德围绕这个阳具期问：如果不是原初而自然的男性追求所致，为何会出现任何逃离女性气质的行为？作为回答，我赞同梅兰妮·克莱因的结论：女孩压抑女性气质，与其说源于自己的男性态度，不如说源于对母亲的仇恨与恐惧。它同一种对母亲的过度固着并行，而这种固着经常严重妨碍女孩的发展。在我们看来，女孩确实存在一种原初而自然的阴茎愿望；但我们并不把它视为以阴蒂为基础的男性追求，而视为把男人阴茎并入自身身体的正常女性欲望——最初通过口腔道路，后来通过阴道道路。

在我们看来，这个愿望直接通向对婴儿的愿望：把阴茎纳入并转化为孩子的正常愿望。这又同弗洛伊德的观点矛盾；他认为，女孩希望孩子，主要是为了补偿没有自己的阴茎所造成的失望。如果他的描述所指的不是阳具期所谓阴蒂—阴茎，而是原初经口腔并入的阴茎，我就可以同意。我想毫无疑问，由于无法接受这根阴茎——不是阴蒂意义上的阴茎——所产生的失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把注意集中于婴儿来补偿，通常采取玩偶形式。我们熟悉同一种现象：一些女人因内部或外部理由被剥夺性享乐，会表现出过度母性。但这不是弗洛伊德的意思。

我想简要谈谈女孩对父亲的态度。她曾施虐性地抢走母亲的阴茎，并由此面对母亲发展出罪疚与恐惧；后来，她把它们转移到父亲身上。毕竟，她吞噬的既是母亲的阴茎，也是父亲的阴茎，所以父亲也受到伤害。女孩对母亲的妒羡与嫉妒远多于对父亲；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的许多后者，其实是从前者移置而来。不过，一旦她对邪恶的内化阴茎产生强烈焦虑——阴茎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她以施虐方式取得——顺势疗法原则便再次发挥作用。随后，正如我们常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的，女孩被迫咬掉男人的阴茎，以便为原初幻想造成的焦虑取得安

慰。另一方面，如果同母亲的关系主要良好而深情，同父亲的关系就会沿着较少施虐的道路发展，并变得令人满意。

现在，我们来到阳具期的消逝与显性女性气质的发展。这里也必定存在意见分歧，因为很容易看出，一个人对这个发展阶段的看法，会深受其早期阶段看法影响。首先，正如我更怀疑阳具期作为发展阶段存在，我也比维也纳派看来更怀疑其消逝观念。

用“阳具位置”这个说法描述相关现象，看来更准确。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种情感态度，[2]而非力比多发展的一个阶段。某些力量或需要维持这种态度；它们减弱时，态度便减弱；但只要它们持存，态度就会持存——往往终其一生。“阳具位置”在六岁、十岁或三十岁时的显著程度，经常不亚于两三岁时。维也纳分析家描述为阳具期消逝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开始认出女孩女性气质的时期；许多伦敦分析家则认为，他们能够在这以前、在它受到更深压抑的状态下认出它。诚然，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随着女孩长大，女性气质常常压抑较少、因而更加可见？我接下来就处理这个问题。

你们或许记得，我在威斯巴登论文中区分初次阳具期与再次阳具期；两者之间的分界，由意识发现性别差异标志。这项发现往往导致妒羡与模仿；它们是再次阳具期的主要特征。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观察得到普遍同意：这个阶段的消逝——或者更确切说，女性气质更清楚的证据——往往伴随对母亲毫不含糊的敌意与怨恨。弗洛伊德的解释不只在时间上，而且在本质上把两个事件连在一起。他为女孩离开阳具期给出的理由，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失望。女孩开始认识到，希望拥有自己的阴茎注定失望；所以，她明智地接受现实，转而寻找可以安慰自己的其他快乐来源。在这样做时，她既改变了自身性别——从男

性转向女性——也改变了爱之客体的性别——从母亲转向父亲。所以，再次阳具期的消逝开启了包含同母亲竞争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符合一项无疑的观察：阳具期减弱以后，正常的俄狄浦斯情境更加可见。正如让娜·朗普尔—德·格鲁特简洁表述，女孩必须经过一个反向俄狄浦斯情境，才能抵达正常情境。

[1] 参见“力比多位置”，以及梅兰妮·克莱因卢塞恩论文中的精神病性“位置”。

[2] 与其说它由明确观念构成，不如说它是一种情感态度。

另一方面，在伦敦，我们把再次阳具期从根本上视为对早已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防御。所以，对我们来说，防御性的阳具期为什么终结，便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成为问题；它同幼儿恐惧症为何会消失的问题并非全然不同。

我给出的答案同弗洛伊德相似，因为两者都可以用“适应现实”来表述。不过，在我看来，现实印象发挥作用的方式，同弗洛伊德所说完全不同。它们从根本上强化自我发展，使幻想付出代价。作为防御的阴茎幻想遭到放弃，因为：（1）它被认作幻想，因而不是充分保护；（2）焦虑减少，因而防御需要减少；（3）还有其他防御可用。

现在，让我依次考察这些理由。我们知道，幻觉式愿望实现的力量具有明确界限，至少对正常人如此；弗洛伊德经常以饥饿为例说明这个事实。无论愿望旨在满足身体需要——例如力比多需要——还是抵御焦虑，都同样如此。在本例中，幻想中的保护被发现并不奏效，正因为它没有提供外部现实的安慰；女孩所需要的正是后者，而且她正在别处开始找到它。

第二，随着自我变强，她的焦虑已经减少。她更能把母亲看作一个真实而通常充满爱的人，而不再看作幻想中的想象食人女妖。她也不再像生命最初两三年那样依赖母亲。所以，她如今能够对母亲和环境中的其他人表现出更多施虐冲动，而不再把它锁在内部并发展出内部焦虑。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阶段：环境会觉得成长中的女孩“难对付”、难以管教。

第三，女孩正在学会把自己的力比多与焦虑都外化。她已经经过部分客体之爱阶段，如今更关心作为整体的父亲或兄弟。

这取代了并入母亲的早期部分客体。她的焦虑远不再那么内在，开始采取一种具有特征性的遗弃恐惧形式；它往往持续终生。

幼女如今更大胆提出要求，第一次敢于公开成为母亲的竞争者。她表现出的母亲怨恨，不只有弗洛伊德赋予它的意义——责备母亲没有让她的阴蒂成为阴茎——也是长期受压抑的较早敌意终于冲破阻挡。责备不只是母亲只给她阴蒂，而是母亲始终把乳房与父亲阴茎据为己有，不允许女孩尽情把它们并入自己的身体。看见男孩的阴茎，并不是改变她一生的唯一创伤事件；它只是一条长链的最后一环。我也不认为，若女孩从未经历这种创伤，她就会是男性的；而若认为正是这种创伤把她驱赶进女性气质，似乎就会推出这一结论。

现在，我可以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主张。需要解释的主要事实，是幼女对阴茎的欲望与她对母亲的怨恨。两种观点——为当前目的，我夸张地称之为伦敦与维也纳观点——的核心差别，在我看来围绕早期俄狄浦斯情结问题；这项情结由口腔不满足开启。女孩无法应对它产生的焦虑，便或多或少暂时逃进“阳具期”，后来再恢复正常发展。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比把她的女性气质视为一种外部经验（看见阴茎）之

结果的观点，更符合可查明的事实，在内在上也更可能。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她的女性气质在本能构造的推动下逐步发展。简言之，我不像女性主义者那样，把女人看作 un homme manqué——“一个残缺的男人”，一个永久失望、竭力用异于自身真正性质的次生替代物安慰自己的造物。最终问题是：女人是天生的，还是被造就的？

更一般地说，我想维也纳派会责备我们过高估计早期幻想生活，牺牲了外部现实。我们则会回答：分析家忽视外部现实并没有严重危险；但他们始终可能低估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现实之重要性的学说。

# 第16课 · 1958年3月19日

今天，我想开始引入认同问题。无论上次缺席还是在场，我都先提醒一下前次所说的意义：

我试图重新把注意力引向阳具期观念造成的困难，并表明，如果我们很难把阳具纳入生物学理性，那么，只要提出阳具卷入某种主体功能、必须发挥我所谓的能指作用，弗洛伊德从经验中析出的东西就会立刻变得更清楚。

当然，作为能指的阳具并不是从天而降。另一方面，它在

自己的想象起源中，必定具有某种属性、某种履行这种能指功能的能力。这不是任意一种能指功能；在人类主体被钩入整套能指机制时发生的一切中，它比其他东西更适合发挥能指功能。

它以某种方式是一个十字路口能指：人类主体被能指系统咬合时发生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汇聚于此；因为主体的欲望必须经过这个系统，才能使自己得到承认，并因此受到深刻改变。这是一项经验资料。

由此可见，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在冲突与俄狄浦斯戏剧的经验中，真正处处都会遇到这个阳具。我们在主体进入俄狄浦斯戏剧时遇见它，

也在俄狄浦斯戏剧的出口遇见它；甚至以某种成问题的方式看见它溢出这部戏剧。因为我们不能不被如下问题触动：阳具——特别是父亲

的阳具——出现在克莱因式原始幻想中；恰恰是它的在场提出问题：我们要把这些克莱因式幻想安置在哪个界域？

- 是安置在梅兰妮·克莱因本人提出的界域，也就是某种极早期俄狄浦斯的假设中？
- 还是相反，承认一种原始想象功能，并把它归为前俄狄浦斯？

至少暂时可以悬置这个问题。这里的功能以完全一般的方式显现；恰恰因为它本质上作为能指功能、作为象征功能显现，在把我们的公式推进到最终词项以前，我们必须先看阳具卷入了何种能指经济。换言之，要考察弗洛伊德的探索以如下形式分节的某种东西：离开俄狄浦斯时，在俄狄浦斯欲望被压抑以后，主体以新的面貌走出来。

他带着什么？答案是：带着一个自我理想。在正常俄狄浦斯中，越过、通过俄狄浦斯之外并离开俄狄浦斯所造成的压抑，产生如下效应：主体内部构成某种同他本人具有严格说来含混关系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仍须一步一步推进，因为人们总是走得太快。

无论如何，有一点从弗洛伊德所处理的东西中单义地——我的意思是异口同声地——析出；所有作者都不得不把以下内容设为最低限度公式：这是一种不同于自我认同的认同。如果我们能在主体同同类形象的某种关系中，看见所谓自我的结构析出，那么，自我理想的结构就提出它自身的问题。它并不——这样说几乎是同义反复——呈现为一个理想自我。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我经常强调，弗洛伊德本人谈自恋的文章中，这两个词项彼此不同；

让我们拿放大镜仔细看看：我们会发现，文本中很难区分它们。首先，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即使准确，按照约定，我们也应当看到：弗洛伊德基于经验的文本赋予自我理想功能的东西，同我们能够赋予自我形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任何同义关系。即使我们把后者提升到极高位置，变成一个理想形象，主体在那里认同于：

- 自身成功的合成形态；
- 可以说是自身的模型；主体同它混同，借此确信自身完整。

例如，当我们提到自恋性安慰的必要，提到对自身身体受到自恋损伤的恐惧时，受到威胁、遭到触及的某种东西，可以归入这个理想自我界域。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至于自我理想，我们知道——因为它在经常具有抑郁、甚至对主体具有攻击性的功能中介入——弗洛伊德让它介入多种抑郁形式。你们知道，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题为《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自我理想》的章节结尾——这正是他第一次以决定性、经过分节的方式引入自我理想概念——他倾向于把所有抑郁都归入某种动摇或冲突的关系；不是归在自我理想名下，而是归在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关系下。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让我们承认，无论发生在这种抑郁界域中的一切，还是相反发生在亢奋关系中的一切，都可以从两个代理机构之间公开敌对的角度来把握——无论是哪一方

宣战，是自我奋起反抗，还是自我理想变得过度严苛——这种过度关系中的任何失衡都会带来后果与反作用。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自我理想向我们提出了它自己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们：自我理想来自一种认同，一种较晚的认同；它至少同俄狄浦斯的第三项关系相连。在这种关系中，欲望关系同竞争、攻击与敌意的关系复杂交织。

某种事情在那里展开，冲突的结局被置于天平。如果结局未定，冲突的出口至少呈现为已经造成主体转化。有人说，某种东西被引入、被内投到一个特定结构内部；相对于主体，它从此成为主体自身的一部分，却仍同一个外部客体维持某种关系——两方面都在那里。

这里，我们切实触及分析教给我们的东西：主体内关系与主体间关系不能分离。也就是说，在主体内部，在他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的功能中，无论周围与环境如何改变，作为自我理想取得的东西确实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主体之内，就像流亡者把祖国带在鞋底上。自我理想确实属于他，是一种已经取得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主体内部多出来的某种东西。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坚持在一切正确分析进路中，主体内关系与主体间关系必须保持相连，并谈论相关代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时，日常用法与语言最微小的必然性已经证明：分析中谈到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关系时，人们通常说这种关系可以良好或恶劣、冲突或协调；但人们把必须说出的东

西放在括号里，或者没有完成表述：这些关系像主体间关系一样得到结构、得到分节。

主体之间存在的同一种关系模式，在主体内部得到重现；当然，你们很清楚，它只有从一种能指组织出发才能重现。尽管我们会这样说，却不能以为只要说出来就够了：仿佛超我确实是某种严厉的东西，在拐角盯住自我，要让它受尽可怕折磨。

它不是一个人。它在主体内部像一个主体那样运作，相对于另一个主体行事；恰恰因为主体之间可以存在一种关系，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格存在。只须能指的存在与作为能指的运作所引入的条件，

主体间关系就能建立起来。

分析所处理的，正是活生生的人格内部的这种主体间性；我们必须在这种主体间性中构想自我理想功能。你们知道，在词典里找不到这种功能，也不会得到单义答案；你们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这项功能当然不等同于超我。它们在术语中几乎同时出现，但也正因如此彼此区分。

它也有一部分相混，可能拥有相同代理机构；不过，它更多朝向某种在主体欲望中发挥赋型功能的东西。它似乎同承担性别类型密切相连，仅此而已；而性别类型又卷入一整套经济——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卷入对男性与女性功能的承担。这里不只涉及完成繁殖所必需的行为，也涉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整套关系模式。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的成果有何意义？它能够深入某种以某种方式只显现在表面的东西，并通过结果深入其中；也就是从结果失败的病例侧面进入。这正是

人们熟知的所谓精神病理学方法：它把一种功能分解、拆散，

在它不知不觉发生错位、偏离之处把握它；通常或多或少正常嵌入某种环境补足的东西，因此在我们面前显露其根茎与棱角。

我想……我们已经积累一种经验：某一类型主体同其所谓正规类型、令人满意的类型之认同，部分失败，或者我们暂时假定它失败。现在我们将从中看见自己如何选择，因为我们总得作出选择……我想取一个特殊病例。让我们考察女人以及所谓 masculinity complex，即男性气质情结，考察它如何同阳具期的存在相互分节。

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首先向你们展示了阳具期存在的成问题一面。这里有某种本能性的东西吗？是否存在某种本能发展的缺陷，以至有人会告诉我们：单是阴蒂的存在，就要为整个链条尽头表现出的男性气质情结负责、成为其原因？

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好理解，事情不会如此简单；若仔细察看，弗洛伊德那里也没有这么简单。无论如何，后来的论争足以向我们表明它不那么简单，即使这场论争的灵感有误——也就是说，它以某种

预先断定结论为出发点，认为事情不可能如此。但无可质疑的是，这场论争看见了：

- 事情不是如此；
- 问题并不纯粹只在于一种自然异常或著名双性性，迫使女性发展发生绕路；
- 事情无疑更加复杂；
- 我们并不能因此立刻简单表述它是什么；但我们确实看到，在女人所谓男性气质情结的变迁中，有某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显示这个阳具要素的联系、游戏与用法。这至少值得保留，因为一个要素能够被用于什么，毕竟足以从根本上照亮这个要素是什么。

那么，处理这个主题的分析家——特别是女性分析家——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不会讲她们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我特别参照两位处在琼斯式问题讨论背景中的分析家：海伦娜·多伊奇与卡伦·霍妮。你们中能读英语的人，可以参阅海伦娜·多伊奇的《受虐狂在女性心理生活中的意义》［《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0 年，第 11 卷］，以及卡伦·霍妮的一篇文章。

以卡伦·霍妮[注1]为例。她告诉我们什么？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她后来在理论和技术上得出的最后表述，从职业开端直至中期，她在临床层面无疑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看见了一些至今仍保有全部价值之物的

人。无论她后来从中推导出怎样较为薄弱的精神分析人类学处境，她的发现仍然保有全部价值。

> [注1] 卡伦·霍妮：《女性阉割情结的发生》（“On the Genesis of the Castration Complex in Women”），《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5 卷，1924 年。

她在这篇《论阉割情结》中凸显了什么？可以概括如下：

她注意到，女人身上一切围绕阉割观念组织起来的形成，同主体在分析中严格说来把器官作为自己欠缺之物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之间，存在联系与临床类比；后者包含各种回响与临床痕迹。她通过一系列临床例子表明——你们应当参阅原文——两者没有性质差异：这些病例同某些女性同性恋类型处在不知不觉的连续谱上；在那里，主体在面对伴侣的某个位置上所认同的是父亲形象。

阶段的构成方式相同，幻想、梦、抑制和症状都一样。两者仿佛是一种形式；甚至不能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减弱版，只能说它越过或没有越过某道本身仍不确定的界线。在这里，卡伦·霍妮把重音放在如下点上：这些病例中发生的事情，促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某个时刻。它不是最初，也不在中段，而是非常接近终点；因为它假定已经抵达这样一个时刻：不但同父亲的关系已经构成，而且构成

得如此充分，以至在女童主体身上形成了明确欲望父亲阴茎的形式。人们非常正确地告诉并强调我们，这意味着对阴茎这个现实的承认：

- 甚至不是幻想中的阴茎；
- 甚至不是一般阴茎；
- 也不在那种含混的半明半暗中——在这个层面，我们不断追问阳具究竟是什么：它是想象的，还是不是？

当然，阳具在核心功能中意味着这种想象性存在；在这种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女性主体即使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仍可能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拥有它。她只是作为形象拥有它：

- 或者在自己的分节中曾经拥有它；
- 或者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应当拥有它。

有人告诉我们，这里涉及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根作为真实而实现、作为存在、并因此得到期待的阴茎。

如果我此前没有把俄狄浦斯情结调制为三个时刻，并让你们注意父亲在每个时刻以不同样态出现，我甚至无法推进这一说法。我曾告诉你们，作为真实阴茎占有者的父亲在第三个时刻介入，尤其对男孩而言。现在，女童那里的事情也得到完美定位。按照人们的说法，发生了什么？

有人告诉我们，在相关病例中，正是剥夺她在这里期待的东西，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它并非卡伦·霍妮发明，而始终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得到运作：某种转化、转向与突变，使原本的爱转化为认同。

- 正因为父亲使一种以特定方式定向的期待失望，而这种期待已经意味着情境发展到较成熟阶段；

- 正因为主体面对这项要求，已经可以说抵达“俄狄浦斯情境的顶点”——若其功能不恰恰要求它被越过；也就是说，主体必须在越过它时找到令人满意的认同，即对自己性别的认同——

……正是在这个程度上，某种始终留存并作为问题、作为谜得到分节的东西发生。

弗洛伊德本人强调，这场游戏——我们把它承认为爱转化成认同的最佳可能性——并不是自然顺畅地发生。不过，我们仍在本例中接受它，首先因为我们观察到：正是在这个时刻，必须把它分节出来，给出一个公式，让我们能够构想这种同剥夺时刻相连的认同是什么。

所以，我想试着向你们给出几个公式，因为我认为它们有助于区分是它与不是它的东西。换言之，我试图引入辩证法、能指分节这个根本要素；我并非为了乐趣，也不是出于在词语中自得的癖好，而是为了让我们通常对词语与能指的使用，不至于像所谓“把膀胱当灯笼”那样——把分节得不够充分的东西，当作足够照亮问题的东西。

只有把它们恰当分节，我们才能有效衡量发生的事情，并区分一个病例与另一个病例中发生的东西。当这里的女性主体采取了某种认同父亲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们愿意，情境如下：父亲在这里；儿

童层面的某物曾在那里得到期待。最后，悖论而独特的结果是，有人告诉我们，从某种角度、以某种方式，儿童会在自我理想意义上成为这个父亲。

她当然不会在现实中变成父亲。在这种病例里，只要以最开放的方式倾听一个女人讲述她同父亲的关系，就能听到“比如说，我咳嗽的样子像他”。这里所涉及的确实是某种认同。那么，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一步一步看这项转化的经济：女童并没有因此变成男人。我们找到的这种认同的符号与印记，部分会像刚才那样表达、说出口；甚至可能被主体本人注意并在一定程度上引以为傲。它们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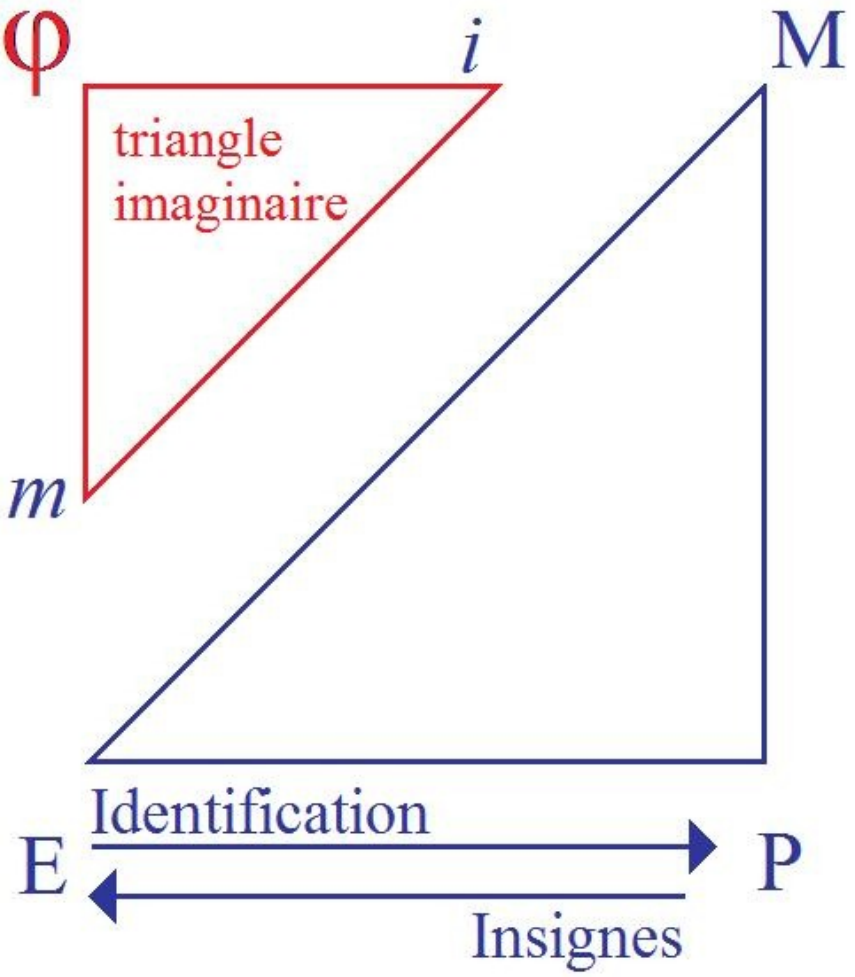
这里毫无疑问：它们是能指要素。一个女人若说“我咳嗽的样子像父亲”，或“我像他那样把肚子或身体挺出去”，这里涉及的毕竟就是能指要素——我们暂且这样说。更准确地说，为了析出所涉及的东西，我们暂且用一个特殊术语来指称它们；因为它们不是在能指链中运作的能指，我们称之为“父亲的徽记”。这里表面的心理态度表明：直呼其名，主体通过面具呈现自己；她把面具覆在每个主体本身多少都有的一侧未分化之物上，给自己戴上男性气质的徽记。

也许应当带着那种始终帮助我们在这里避免错误的缓慢，追问在这一进路中，一切由之出发的欲望变成了什么？这个欲望毕竟本来不是男性欲望。既然主体在这个层面取得了父亲的徽记，欲望又会变成什么？

这些徽记将面对谁使用？面对某个第三者，面对某种因经验向我们表明而占据如下位置的东西：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始演化中，处于这个第三位置的是母亲。

对这种病例的分析本身将表明：从认同发生的时刻起，也就是从主体披上自己认同对象之徽记的时刻起，主体朝某个方向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属于某种东西进入能指状态的序列，而这东西就是徽记。但这里运作的欲望，已不再等于在同父亲的关系中原本被期待的欲望。按照事情当时抵达的点，按照我们当时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所处的点，可以假定原先的欲望已经极其接近一种被动生殖器位置、一种激情欲望、一种严格的女性召唤。很清楚，转化以后在场的已不是同一个欲望。我们暂且悬置这个欲望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剥夺。值得回到这里，因为也可以说挫折。为什么是剥夺而非挫折？我在这里指出，这条线索仍然悬着。无论如何，这里的主体［E］也来到那里［P］；只要她拥有一个自我理想，只要她自身内部可能发生某种像主体间性一样得到结构的东西，就会建立一种关系：这个主体将实行某种欲望。是什么欲望？




图式中出现的是父亲同母亲的关系。很清楚，在分析中、在我们分析这种主体时所发现的，并不是父母之间发生之事的复制品或再现；理由很多，哪怕只是因为主体对此进入得十分不完整。

恰恰相反，经验表明，关系中将介入的是整个过去、迄今调制儿童同母亲关系的全部复杂变迁。也就是说，从起源以来发生的一切：由于母子关系中必然存在的不合时宜与顿挫而造成的挫折、失望，以及它们带来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其中尤其以特殊重音介入攻击性关系——最原初形式的攻击性关系——以及竞争关系。

例如，一切外来要素进入这个三人组所产生的影响：所有曾或多或少不合时宜地介入主体演化及其母子关系的兄弟姐妹。所有这些都会留下痕迹与反映，缓和或强化后来呈现为对男性气质徽记的要求。正是这些东西将投射到年轻主体同

客体的关系中；此后，这种关系从认同点得到支配。在该点，主体披上自己所认同者的徽记；后者在她那里成为自我理想，或者发挥自我理想的角色与功能。

当然，这是一种想象我所说诸位置的方式；但如果你们想理解它，显然必须假定一种

往复运动。主体在相关的摆动以后，把这些徽记带回自己这里。她发现自己以某种方式重新得到构成，并具有一个新欲望。所以，这项转化的公式与机制包含三个时刻：

- 首先，一个最初必须属于力比多的要素介入［母亲］；
- 第二，旁边存在一个第三词项，主体同它处于某种能够把它区分出来的关系中；这至少要求，在主体过去同这个第三词项［父亲］的关系中，曾经介入一种名为竞争的根本区分要素；
- 第三，某种交换发生：原来作为力比多关系客体的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在主体那里被转化为能指功能；主体的欲望则转到另一个层面，转到此前同第三词项建立的欲望层面。

在这项操作中，另一个取代遭压抑欲望的欲望，从根本上看仍然相同，

却也发生了转化：这就是构成认同的过程。首先必须有指向某个作为客体之客体的力比多要素。这个客体在主体中变成一个能指，占据从此名为自我理想的位置。另一方面，欲望经历某种包含一个 Ersatz、即替代物的过程；另一个欲望来到第一个欲望的位置。

这个欲望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虚无；它此前已经存在，涉及第三词项，并从那里经过转化而来。这就是我请你们记住的图式；它以某种方式是一切严格意义上之认同过程的最低限度图式，是次级层面的认同、奠定自我理想之认同的图式。

三个词项缺一不可。可以说，转化所产生的交错换位——一方面，客体被转化为能指；另一方面，这个能指此时在主体中占据位置，而这严格说来构成认同——正是我们在构成自我理想的东西之基础上所发现的。它还总是伴随着我们所谓的欲望转移：

也就是说，另一个欲望从别处出现；它同一个第三词项发生关系，而该词项同最初所涉的力比多关系毫无关系。这个取代第一个欲望的欲望，在这项取代中并通过这项取代而发生转化。

这至关重要。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让我们重新采用通常呈现的图式：儿童在同原初客体的最初关系中——这是一般公式——发现自己占据同父亲位置对称的位置。他进入竞争。

相对于同客体的原始关系，他位于对面的某个 X 点。

正因为他在这里成为某种能够披上其竞争对象之徽记的东西，他随后才会在自己必然所在之处重新找到位置，也就是在事情发生的那个 X 点的对面；他在那里以一种称作自我理想的新形式构成自己。他以最普遍的形式保留了这次经过的某种东西。你们清楚看到，这里所涉的不再是父亲或母亲，而是同客体的关系。母亲就是原初客体，是卓越意义上的客体。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次往返中——它使他相对于客体

同一个第三项进入竞争——他所保留下来的东西，可以由我们所谓的共同因子来刻画。这个共同因子产生于能指的存在，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心理中，只要人们同能指世界打交道，能指便是必要条件，是他们的欲望必须穿过的隘口。

在这次往返中，始终有某种东西蕴含这个共同因子；它涉及：

- 能指在欲望中的作用；
- 表明欲望的东西；
- 必然使欲望成为被表明的欲望的东西。

这个共同因子恰恰就是阳具。因为它始终包含在其中，因为它是这个共同因子的最小公分母，所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在一切情况下总会在那里找到它。换句话说，正因如此，我们才把阳具——小写 φ——放在这里的 X 点。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它始终相对于自我来定位……也就是说，相对于主体同自身之间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东西，它占据第三方的位置；而后者归根到底是相对于原初认同构成的，始终或多或少脆弱。这种认同事实上总多少带有理想性，是主体借助一个始终多少受到争议的形象对自己形成的认同；

……而这个［自我］同主体向其发出要求的东西，也就是同客体的那种根本关系，毫不相干。自我理想就在这次往返中构成；可以说，它总是在那个虚拟点的对面——在那里，第三项遭到竞逐、进入竞争。处在其对面的自我理想，总同那个作为阳具的、随处可见的转喻性共同因子保持某种关系。

当然，在自我理想层面发生的事情，本质上在于至少包含这个共同因子；它自然又以一种不让人看见它的方式组合起来，或者只让人把它

看成一种总从我们指间溜走的东西，一种在一切能指性承担的深处奔流之物。

这里还有一点：这个能指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咬住所指。自我理想在同父亲的这种关系中构成，它始终蕴含阳具。在这里，父亲就是第三项。它始终蕴含阳具，而且只是在阳具作为共同因子、作为能指这一层级的枢轴因子时，才蕴含它。

例如，海伦娜·多伊奇还告诉我们什么？卡伦·霍妮向我们展示了阉割情结同女性同性恋之间的连续性。海伦娜·多伊奇则会向我们谈另一件事。她也会告诉我们，阳具阶段确实发挥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作用；不过，对她而言，重要的是还要看到它后来的命运。

她从以下方面看到这种后来的命运：她说，对受虐位置的采取——她认为这一位置对于女性位置具有本质的、构成性的意义——奠基于这样一个层面：正因为小女孩的阴蒂享乐受到禁止，她才会获得这样一种满足：她所采取的位置不再只是

被动位置，更是一个享乐位置；这个享乐位置恰恰在强加给她的阴蒂享乐剥夺中得到保证[注]。

> [注] Staferla 的破折号位置容易使 assurée（“得到保证的”）所指含混；米勒编订本整理为 une position de jouissance assurée dans cette privation…，明确“得到保证”的是享乐位置，而被剥夺的是阴蒂享乐。

这里存在某种悖论，但海伦娜·多伊奇坚持这个悖论；它在她那里甚至延伸为技术性准则和经验观察，在悖论性上走得相当远。我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向你们转述一位分析家的经验材料；这些材料本身无疑受到某种材料选择的制约，但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

对海伦娜·多伊奇而言，女性满足的问题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出现，以至于她认为：一个女人凭借其女人的、女性的本性，可以获得一种相当完整的满足——至少完整到她的行为以及她对女性功能的适应中，不会出现任何神经症性或非典型的表现——而她却不必以任何明确形式获得严格意义上的生殖器满足。

我再说一遍，这是多伊奇夫人的立场。也就是说，女性位置之满足的实现，归根到底

可以全部处在她的母性关系层面，处在同生殖功能之实现各个阶段相关的一切层面，也就是怀孕状态、哺育以及维持母亲位置本身所具有的满足中。

同性交行为本身相关的满足、也就是直称其名的性高潮本身的成熟，同这种阳具剥夺的辩证过程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海伦娜·多伊奇提出：她在一些主体那里以或深或浅、或强或弱的程度，遇见了这种卷入阳具辩证过程的情形。

也就是说，人格中某种必然带有冲突、因而也不稳定的平衡，是相对于男人、相对于一定程度的男性认同构成的。倘若过度削减这种复杂关系，倘若分析推进到过远的程度，就可能使主体失去此前多少较为顺利地在生殖器层面实现的享乐。

海伦娜·多伊奇的这项考虑甚至包含一条指示：应当以某种方式让主体保留

其在这一层面上多少成功、无论如何已经获得的认同［所带来的益处］；不要通过推进过远的分析，去削减、拆解、分析这些认同，否

则主体就可能失去分析所揭示的、构成既得享乐之根底与结构的东西：

- 只要这种在生殖器享乐层面获得的东西，同主体相对于其认同的过去有所联系；
- 只要享乐可以存在于对某个一度取得之位置的受虐式挫折中；而为了维持这种挫折，就必须同时维持那些使挫折得以施行的位置。

换句话说，在某些条件下，削减严格说来属于男性认同的那些认同，可能危及主体在这种认同本身的辩证过程中、于享乐层面取得的东西。这个说法价值如何，自可评判。这里的问题只是：它确实能被提出，而且提出者无疑并非没有经验；哪怕仅从她的思考来看，

她也无疑表现为一个会反思自己职业

以及自己所作所为之后果的人。

反过来说，正是凭借这一点，而且仅仅凭借这一点，这个说法才值得保留在问题之中。我再对你们说一遍，并概括多伊奇夫人的立场：在人际关系实际呈现的样子中——我并不是说，知更鸟和螳螂那里也以同样方式呈现——就人类这个物种而言，女性位置的重心、其主要满足要素，似乎位于严格意义上的生殖器关系彼岸。

可以说，女人可能在那里找到的一切，本质上都同一个辩证过程相连；它在此介入不应令我们惊讶。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同样显现在男人面对性交行为之位置中的某种东西——也就是所谓前期快乐

的极端重要性——在这里提供了要纳入考察的力比多材料，只不过其方式或许更为突出。

然而，这些力比多材料之所以真正参与其中，是因为它们在主体的历史中被纳入

某种能指辩证过程；这个过程蕴含着同第三个客体发生可能认同的侵入，

而在此场合，这个客体就是父亲。因此，一切以阳具诉求和对父亲的认同之名出现、从而使女人同其客体的关系复杂化的东西，无非是对如下材料的能指性加工：严格说来，在性交行为中产生的满足正是从这些材料借取而来，也就是我刚才所谓的

前期快乐以及性高潮本身。我指的是，把性高潮本身认作行为本身的顶点；考虑到我们在生理学上知道，阴道中并不存在一套直接用来引发快感的神经组织，这确实在经验上向我们提出一个值得在女人那里提出的问题。

这使我们尝试表述自我理想同欲望的某种命运之间的关系，并按如下方式提出问题：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在某个时刻，我们都会看到他同某个客体发生关系——无论这个客体是什么，它已经在其客体实在性中构成。这个客体将成为某种作为自我理想的东西。它将凭借自己的徽记而成为自我理想。

为什么在这种客体关系中所涉及的欲望，在这里被称作剥夺？它之所以这样命名，并非如人们所说，是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实在客体……当然，在我给出的第一个例子中，也就是父亲介入女孩发展之时，父亲

在生理构成上必须确实是一个足够实在的存在，阳具才能进入一个超出纯粹想象功能的发展阶段——这种想象功能可以在阴茎嫉羡中维持很久，这是确定的……而是因为这个欲望以某种能够被要求的东西为目标。

严格说来，只有当所涉之物能够被主体象征化时，剥夺的辩证过程才可能建立。正因为父亲的阴茎能够被象征化、能够被要求，今天所讨论的

认同层面的事情才会发生。这同禁令层面所介入的东西完全不同；例如，只要阳具享乐——直称其名，就是阴蒂享乐——也许在发展的某个时刻受到禁止，这项禁令便构成了。

受到禁止的东西把主体逐入一种他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来表明自身的状态。这才严格说来构成它的痛苦性质；而正因为自我有时可能被自我理想置于这种遭到拒斥的位置，严格意义上的忧郁状态才会建立。

我们还会回到这种拒斥的性质。不过，你们现在就要听出：我所暗示的东西，可以同我们词汇中那个我曾联系于这种拒斥的术语——也就是 Verwerfung——联系起来。正因为主体作为活生生的实在，可能被自我理想置于这种遭到排除、失去一切可能意指的位置，抑郁状态本身才会建立。

但是，在自我理想的形成中，所涉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它在于：这个客体同我们所谓的剥夺相遇；只要剥夺是一种否定性的欲望，只要所涉的是某种能够被要求的东西，只要主体是在要求层面看见这个欲望遭到拒绝，那么，作为遭拒的欲望同客体之间的这项联

系，便是把这个客体构成为某个能指的起点。它占据某个位置，代替主体，成为主体的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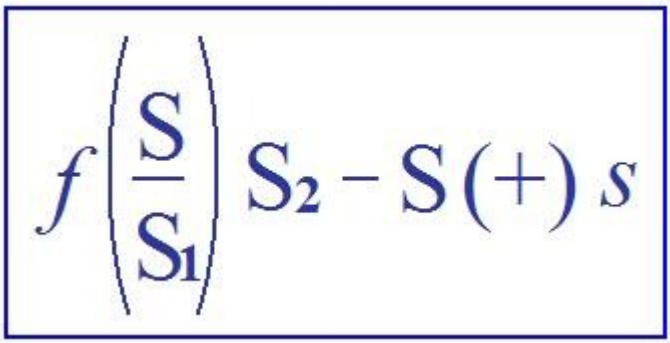
在同欲望客体的认同中发生的事情——以女孩认同其父亲为例——正是：她曾欲望、却拒绝了她要求之欲望的父亲，成为某种处在她的位置上的东西。

自我理想形成的隐喻性是一项本质要素。正如在隐喻中一样，由此产生的是某种东西的改变：

- 它同这个欲望毫无关系；
- 它参与客体的构成，是一个此刻处在别处的欲望：那个曾把小女孩同母亲联结起来的欲望。相对于大写 D，我们把它称作小写 d。

小女孩先前同母亲的整段历程，现在进入这个问题并承受这项隐喻的后果。它由此受到联结。

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我曾给你们的隐喻公式，因为你们知道，它是：



也就是说，某种由意义改变产生的东西。隐喻之后的这项意义改变，发生在此前由主体历史建立的关系中，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仍在讨论小女孩同母亲的第一个例子。此后，塑造她同其客体之关系的，将是这段历史——一段因她内在这个新功能的建立而改变的历史；

这个新功能就叫作自我理想。

卡伦·霍妮：女性阉割情结的发生[1]，柏林［返回 19-03］

尽管我们对女性阉割情结可能采取的种种形式了解得越来越全面，[2]我们对这个情结整体性质的认识却没有相应进展。如今我们已经熟悉的大量材料，反而比以往更强烈地使我们意识到整体现象的非凡性质，以至于这个现象本身成为一个问题。综观迄今观察到的女性阉割情结的各种形式，以及人们默默从中得出的推论，可以看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奠基于某项基本观念。我们可以把它简述如下（其中一部分逐字引自亚伯拉罕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许多女性，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暂时或永久地受苦。女性心理生活中那些源于反对成为女人的表现，可以追溯到她们作为小女孩时对阴茎的欲求。她们不愿接受自己在这方面存在根本欠缺的观念，于是产生被动的阉割幻想；主动幻想则源自对受到优待的男性所抱持的报复态度。

这个表述把如下事情当作公理性事实：女性觉得自己的生殖器使她们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个事实本身却未被视为问题——也许是因为在男性自恋看来，它实在太不证自明，无须解释。然而，迄今为止研究得出的结论——

[1] 本文于 1922 年 9 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宣读。

[2] 尤其参见亚伯拉罕：《女性阉割情结的表现》（1921），《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3 卷，第 1 页。

这个结论无异于断言：半数人类都不满于分配给自己的性别，而且只有在有利情形下才能克服这种不满——不仅令女性自恋感到断然不能满意，也令生物科学不能满意。因此，问题出现了：女性阉割情结呈现出的种种形式，不仅对神经症的发展影响深远，也对一切实际意义上属于正常女性者的性格形成与命运影响深远；它们真的仅仅奠基于对女人身份这一事实的不满，也就是奠基于她对阴茎的欲求所造成的不满吗？还是说，这只不过是其他力量提出的托词——至少大体上如此——而我们通过研究神经症的形成，已经知道这些力量的动力效能？

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想从纯粹的个体发生角度提出一些思考，希望它们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些思考是在我多年执业过程中逐渐迫使我接受的；我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总体而言，她们的阉割情结都非常明显。

按照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女性阉割情结完全以“阴茎嫉羡”情结为中心；事实上，“男性气质情结”这个术语几乎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于是，首先出现的问题是：即使主体没有男性式生活方式，没有一个受到偏爱的兄弟使这种嫉羡显得可以理解，而且女人的经历中也没有任何“偶然灾祸”[3]使男性角色看起来更值得向往，为什么我们仍能观察到阴茎嫉羡近乎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典型现象出现？这里的要点看来是把问题提出来；一旦提出问题，答案几乎就会从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材料中自发显现。假如我们以“阴茎嫉羡”最常直接显现的形式为出发

点，也就是希望像男人一样排尿，那么，对材料的批判性梳理很快会表明：这个愿望由三个组成

[3] 参见弗洛伊德：《处女的禁忌》，《小论文集》第四辑。

部分构成，其中有时这个部分、有时另一个部分更为重要。

我可以最简短谈论的部分，就是尿道情欲本身；作为最显眼的因素，它已经得到充分强调。倘若我们要充分估量由这个来源产生的嫉羡有多强烈，首先必须意识到，儿童会对排泄过程作出怎样的自恋性高估。[4]事实上，全能幻想，尤其具有施虐性质的全能幻想，更容易同男性射出的尿流联系起来。作为这个观念的一个例子——而它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我可以引述自己听说的一件男校班级轶事：孩子们说，两个男孩小便时若让尿流交叉成十字，他们此刻想到的那个人就会死去。

毫无疑问，小女孩必然会在尿道情欲方面产生强烈的不利感；然而，倘若像迄今许多论者那样，径直把内容为希望像男人一样排尿的一切症状与幻想都归于这个因素，就是夸大了它的作用。相反，产生并维持这个愿望的动力，往往存在于完全不同的本能成分中——首先是主动与被动的窥视欲。之所以产生这种联系，是因为男孩恰恰可以在排尿行为中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并观看自己，而且甚至获准这样做；因此，每次排尿时，他至少就自己的身体而言，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满足其性好奇心。

这个植根于窥视冲动的因素，在我的一个病人那里表现得格外明显；有一段时间，像男性一样排尿的愿望支配了她的整个临床图景。在此期间，她来作分析时几乎每次都会宣称自己看见一个男人在街上小便；有一次，她完全自发地惊呼：“如果我能向上天讨一件礼物，那就

是只要有一次能像男人那样小便。”她的联想毫无疑问地补全了这个想法：“因为那样我就会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构造的。”男人排尿时能够看见自己，女人却不能；对这个病人来说，

[4] 参见亚伯拉罕：《梦与神经症中对排泄过程的自恋性高估》，《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20 年。

她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于前生殖器阶段，这个事实确实是她那极为显著的“阴茎嫉羡”的主要根源之一。

正如女人由于生殖器隐藏起来，始终是男人面对的巨大谜团；男人也恰恰由于其器官一览无余，而成为女人强烈嫉羡的对象。

尿道情欲与窥视冲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另一个病人那里同样非常明显；我把这位女性称作　Y。她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手淫，这种方式表现了像她父亲一样排尿。在这个病人所患的强迫神经症中，主要起作用的是窥视冲动；一想到自己这样手淫时会被别人看见，她就会产生极度强烈的焦虑。因此，她表达了小女孩那个源自久远时期的愿望：我也希望有一个生殖器，可以像父亲那样，每次排尿时都把它展示出来。

此外，我认为，这个因素在女孩一切过度羞窘和拘谨的病例中都发挥主导作用。我还推测，至少在我们的文明种族中，男女服饰的差别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女孩无法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因而就其展示癖倾向而言，她退行到一个展示自身的愿望仍适用于整个身体的阶段。这使我们找到一个线索，可以解释为什么女人穿低胸礼服，男人却穿燕尾服。我还认为，这项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们讨论男女差异时总会首先提到的标准，即女人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男人则具有

较强的客观性。其解释是：男人的探究冲动在察看自己的身体时得到满足，随后可以、或者必须转向外部客体；女人则相反，她无法对自身获得清晰认识，因此更难从自身解脱出来。

最后，我假定为“阴茎嫉羡”原型的这个愿望还包含第三种要素，即受到压抑的手淫愿望；它通常深藏不露，却并不因此而不重要。这个要素可以追溯到一项观念联系——大多是无意识的——在其中，男孩获准在排尿时握住自己的生殖器，被理解为获准手淫。

例如，一个病人曾看见一位父亲责备自己的小女儿，不许她用小手触碰身体的那个部位。她极其愤慨地对我说：“他不准她这样做，自己却一天做五六次。”你们很容易在病人 Y 身上认出同样的观念联系；在她那里，男性的排尿方式成为她所采用之手淫形式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这个病例还表明：只要她在无意识中仍坚持自己应当是男人的诉求，她就无法彻底摆脱手淫强迫。我从这个病例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颇具典型性：女孩在克服手淫方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困难，因为她们觉得，有一件男孩因身体构造不同而获准做的事，却不公正地遭到禁止。或者，用我们眼前这个问题的术语，也可以换一种说法：身体构造的差别很容易引起一种痛苦的受伤感；因此，后来人们用来解释对女人身份之拒绝的论点——男人在性生活中享有更大自由——其实奠基于童年早期确实如此的实际经验。范·奥弗伊森在其女性男性气质情结研究的结尾强调，分析使他强烈感到：男性气质情结、幼儿阴蒂手淫和尿道情欲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把三者联结起来的环节，很可能就在我刚才向你们提出的这些思考中。

这些思考回答了我们最初的问题，即为什么“阴茎嫉羡”具有典型发生的性质。可以把它们简要概括如下：小女孩的自卑感绝不是原初的——亚伯拉罕也在一处指出这一点。不过，她觉得自己同男孩相比，

在满足某些本能成分的可能性方面受到限制，而这些成分在前生殖器时期极为重要。事实上，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作为实际事实，从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儿童的观点来看，小女孩在某些满足可能性方面确实比男孩不利。倘若我们不清楚这种不利处境的实在性，就无法理解："阴茎嫉羡"在女童生活中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必然使女性发展复杂化。后来，女人成熟并成为母亲时，会在性生活中承担很大一部分——就创造力而言，或许甚至比男人更大的一部分；但这无法补偿这个早期阶段的小女孩，因为它仍处于她直接满足的可能性之外。

我在这里中断这条思路，因为现在要转向第二个、范围更广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的情结真的奠基于"阴茎嫉羡"吗？后者应被视为它背后的最终力量吗？

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我们必须考察：什么因素决定阴茎情结得到或多或少成功的克服，还是经由退行得到强化，进而发生固着？对这些可能性的考察，迫使我们更仔细地检视这些病例中客体力比多的形式。于是我们发现，那些想成为男人的欲望往往极为醒目的女孩和女人，在生命伊始都经历过一个对父亲极强固着的阶段。换句话说，她们最初试图以正常方式掌握俄狄浦斯情结：保留对母亲的原始认同，并像母亲一样把父亲当作爱的客体。

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女孩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可以无损地克服"阴茎嫉羡"情结。凭借对母亲的认同，她可以从对阴茎的自体情欲式、自恋式欲望，转向女人对男人（即父亲）的欲望；也可以转向母性地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无论对健康女人还是异常女人后来的爱情生活而言，思考如下事实都很有启发：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形中，这两

种态度的起源——或至少其起源之一——也带有自恋性质，具有占有欲望的性质。

在我们考察的病例中，这种女性与母性发展显然已经以非常显著的程度发生。例如，病人 Y 的神经症——正如我将在这里引述的所有病例一样——始终带有阉割情结的印记；她出现了许多表明这个阶段的强奸幻想。她想象中强奸她的男人无一不是清晰可辨的父亲意象；因此，必须把这些幻想理解为某个原初幻想的强迫性重复：病人直到生命相当晚期仍觉得自己同母亲浑然一体，并在这个幻想中同母亲一道经历了父亲的完全性占有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病人在其他方面神志完全清楚，分析开始时却强烈倾向于把这些强奸幻想看成实际事实。

其他病例也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类似的执着，坚持认为这个原初女性幻想是真实的。另一个病人——我称她为 X——曾作出无数陈述，直接证明同父亲的这项爱情关系对她来说显得何等真实。例如，有一次她回忆起父亲如何给她唱过一首情歌；伴随这项回忆，她发出一声幻灭而绝望的呼喊：“可这一切原来都是谎话！”她的一个症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想在这里把它作为整组类似症状的典型例子引述：她有时受到一种强迫驱使，必须吃下大量盐。她幼年时期，母亲曾因肺出血而不得不吃盐；她无意识地把肺出血理解为父母性交的结果。因此，这个症状代表她的无意识诉求：她要像母亲一样，从父亲那里遭受同样的经验。正是同一项诉求，使她把自己看成妓女——实际上她还是处女——并感到一种强迫性需要，要向每一个新的爱情客体作某种忏悔。

大量明确无误的这类观察告诉我们，认识到如下事情至关重要：在这个早期阶段，作为种系发生经验在个体发生中的重复，儿童以对母亲

的认同——无论敌对还是爱恋——为基础，构造出一个自己曾被父亲完全性占有的幻想；而且在幻想中，这项经验被呈现为确实发生过，仿佛它同那个遥远时代一样真实——那时，所有女人最初都是父亲的财产。

我们知道，这个爱情幻想的自然命运，是遭到现实否认。在后来由阉割情结支配的病例中，这种挫折往往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失望，并在神经症中留下深刻痕迹。由此，现实感的发展发生程度不一的紊乱。人们经常得到一种印象：对父亲这项依恋的情感强度太大，以至于病人无法承认这种关系在根本上的非实在性；另一些病例则仿佛从一开始就具有过强的幻想能力，使她们难以正确把握现实；最后，病人同父母的真实关系往往如此不幸，足以解释她们为何抓住幻想不放。

这些病人觉得，自己的父亲仿佛真的一度是她们的情人，后来却背叛或抛弃了她们。有时，这又成为怀疑的起点：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还是真的？我稍后将谈到一个称作 Z 的病人；这种怀疑态度在她身上通过一种重复强迫暴露出来：每当一个男人看起来受到她吸引，她就会焦虑，唯恐男人的好感只是自己的想象。即使她真的已经订婚，也不得不不断向自己确认，整件事情不是她凭空想象出来的。在一次白日梦中，她想象自己遭到一个男人袭击，便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把他击倒在地，又用脚踩住他的阴茎。幻想继续发展，她想把他交给警察，却因为害怕他会声称整个场景是她想象出来的而作罢。我谈到病人 Y 时，曾提过她怀疑自己的强奸幻想是否真实，而这项怀疑涉及同父亲的原始经验。在她那里，我们可以追踪到源自这里的怀疑如何扩展到她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并真正成为其强迫神经症的基础。对她而言，正如对许多其他病例而言，分析进程使如下事情变得很可能：这

种怀疑的起源，比我们熟悉的对主体自身性别的那种不确定性具有更深的根源。[8]

病人 X 喜欢沉浸在许多生命最早期的回忆中，把那个时期称作自己的童年乐园。在她的记忆中，这项失望同她五六岁时父亲施加的一次不公惩罚紧密联系。事实表明，当时她的妹妹出生，她觉得妹妹取代了自己在父亲感情中的位置。随着分析揭开更深层次，事情变得清楚：在对妹妹的嫉妒背后，潜藏着对母亲的狂烈嫉妒，而它首先涉及母亲的多次怀孕。“总是妈妈得到孩子，”有一次她愤慨地说。她觉得父亲对自己不忠，这种感受还有另外两个受到更强压抑的根源——二者的重要性绝不相同。其中一个，是她目睹父母性交以后对母亲产生的性嫉妒；那时她的现实感已经充分觉醒，再也不可能把所见的一切完全纳入一个仿佛自己亲历的幻想中。她有一次听错了我的话，使我找到这项感受的后一个来源：我谈到“nach der Enttäuschung”（失望之后）的一个时期，她却把它听成“Nacht der Enttäuschung”（失望之夜），并联想到布兰甘妮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情之夜守夜。

[8] 参见弗洛伊德对怀疑的解释：怀疑主体爱（恨）的能力。

这个病人的一种重复强迫以同样清晰的语言说话：她爱情生活中的典型经验，是先爱上一个父亲替代者，继而发现他对自己不忠。联系这类事件，这个情结的最后一个根源变得清晰可见：我指的是她的罪疚感。当然，这些感受很大一部分必须被理解为最初指向父亲、后来转向自身的责备。但是，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追踪到，罪疚感——尤其是那些由强烈的摆脱母亲冲动产生的罪疚感（对这个病人而言，这项认同具有“除掉她”和“取代她”的特殊意义）——怎样在她身上产生了对灾祸的预期，而这项预期自然首先涉及她同父亲的关系。[8]我特别想强

调，这个病例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印象：希望有一个孩子（父亲的孩子）的欲望极其重要。[7]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往往低估这个愿望的无意识力量，尤其低估它的力比多性质；同许多其他性冲动相比，自我后来更容易赞同这个愿望。它同"阴茎嫉羡"情结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众所周知，母性本能从阴茎欲望那里获得一种"无意识的力比多强化"[8]；阴茎欲望在时间上出现得更早，因为它属于自体情欲时期。随后，当小女孩在同父亲的关系中经历上述失望时，她不仅放弃对父亲的诉求，也放弃要一个孩子的愿望。经由退行，肛门期的观念和旧有的阴茎要求接替了这个愿望——这符合我们熟悉的等式。此时，这项要求不只是重新复活，而且得到女孩希望有一个孩子之全部能量的强化。

［修订本段译文时，我曾把 repetition-compulsion（重复强迫）误写为 competition-repulsion（竞争—排斥）。——英译编者］

[7] 参见奥托·兰克：《倒错与神经症》，载本刊第 4 卷第 3 分册。

[8] 参见弗洛伊德：《论本能的转化，特别是肛门情欲的转化》，《小论文集》第四辑。

在病人 Z 的病例中，我尤其清楚地看见了这项联系。她的几种强迫神经症症状消失以后，最后、也最顽固地残留的症状，是对怀孕与分娩的强烈恐惧。后来发现，决定这个症状的经验，是她两岁时母亲怀孕以及弟弟出生；她已经不再是婴儿以后，还继续观察到父母性交，这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病例似乎格外适合说明"阴茎嫉羡"情结的核心重要性。分析一旦揭示她对阴茎——即弟弟阴茎——的欲求，以及她对这个闯入者的强烈愤怒——弟弟把她逐出了独生子女的位置——这些内容便带着浓重情感进入意识。此外，这

种嫉羡还伴随着我们惯于追溯到它的一切表现：首先是对男人的报复态度，并伴有极强的阉割幻想；拒绝女性的任务与功能，尤其拒绝怀孕；还有一种强烈的无意识同性恋倾向。只有当分析在可以想见的最强阻抗之下穿透到更深层次时，事情才变得清楚："阴茎嫉羡"的来源，是她嫉羡母亲而非自己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随后，通过一项移置过程，阴茎取代孩子成为嫉羡对象。同样，她对弟弟的强烈愤怒，实际所针对的是她认为欺骗了自己的父亲，也针对母亲——是母亲而非病人自己得到了孩子。只有取消这项移置以后，她才真正摆脱"阴茎嫉羡"和成为男人的渴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甚至希望自己也拥有孩子。

那么，发生了什么过程？粗略说来，可以勾勒如下：（1）涉及孩子的嫉羡移置到弟弟及其生殖器上；（2）随后清楚出现了弗洛伊德发现的机制：作为爱情客体的父亲遭到放弃，同父亲的客体关系经由退行被对父亲的认同取代。

后一个过程表现在我已经谈过的那些男性身份诉求中。很容易证明，她想成为男人的欲望绝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她的诉求真正意味着扮演父亲的角色。例如，她选择了同父亲一样的职业；父亲去世以后，她对母亲采取的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向她提出要求并发号施令。有一次，她响亮地打了个嗝，不禁满意地想："简直和爸爸一样。"然而，她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同性恋客体选择；客体力比多的发展倒像是受到了全面扰乱，其结果是明显退行到自体情欲式的自恋阶段。概括来说：把涉及孩子的嫉羡移置到弟弟及其阴茎上、对父亲的认同以及向前生殖器阶段的退行，全都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煽起一种强烈的"阴茎嫉羡"；它随后一直停留在前景，仿佛支配整个图景。

依我之见，俄狄浦斯情结的这种发展，是那些阉割情结占主导地位之病例的典型。发生的事情是：对母亲的认同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对父亲的认同阶段，与此同时又向前生殖器阶段退行。我相信，这种对父亲的认同过程，是女性阉割情结的根源之一。

在这里，我想立刻回答两项可能的反对意见。第一项或许是：父亲与母亲之间的这种摆动，肯定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恰恰相反，每个儿童身上都能看到它；而且我们知道，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每个人的力比多终其一生都在男性客体与女性客体之间摆动。第二项反对意见涉及同性恋，可以表述如下：弗洛伊德在一篇讨论女性同性恋病例之心理发生的论文中，已经使我们确信，这种朝对父亲认同方向的发展，是显性同性恋的基础之一；可是，我现在却把同一过程描述为阉割情结的结果。对此，我想强调：恰恰是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帮助我理解了女性的阉割情结。正是在这些病例中，一方面，力比多正常摆动的幅度从量上大大遭到超越；另一方面，对父亲之爱恋态度的压抑以及对父亲的认同，并不像同性恋病例那样取得彻底成功。因此，两条发展道路之间的相似，并不能用来反对这个过程对女性阉割情结的重要性；相反，这个观点使同性恋远不再是一种孤立现象。

我们知道，在阉割情结占主导地位的一切病例中，无一例外都存在程度不一的明显同性恋倾向。扮演父亲的角色，也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欲望母亲。自恋退行与同性恋客体投注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一切程度的紧密性；于是，我们得到一条不间断的序列，而显性同性恋位于它的顶点。

这里自然会出现第三项批评。它涉及“阴茎嫉羡”在时间与因果上的联系，可以表述如下：“阴茎嫉羡”情结同对父亲认同过程的关系，难道不正好同这里的描述相反吗？要建立这种持久的父亲认同，难道不必

首先存在一种异乎寻常地强烈的“阴茎嫉羡”吗？我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格外强烈的“阴茎嫉羡”——无论源自体质还是个人经验——确实有助于为病人转向父亲认同铺平道路；然而，我所描述的病例以及其他病例的历史都表明：尽管存在“阴茎嫉羡”，一种强烈而完全女性化的父亲爱恋关系仍然已经形成；只有当这份爱遭遇失望时，女性角色才被放弃。这项放弃以及随之而来的父亲认同，继而使“阴茎嫉羡”复活；而且只有当这种感受从如此强大的来源获得滋养时，它才能发挥全部力量。

要发生这种向父亲认同的逆转，现实感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觉醒。因此，小女孩不可避免地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仅仅满足于在幻想中实现自己对阴茎的欲望；她现在开始反复思量自己缺少这个器官，或者推想它是否可能存在。这些思量的趋势由女孩的整个情感配置决定，具有如下典型态度：对父亲的女性爱恋依恋尚未完全平息；由于经由父亲遭受失望，她对父亲产生强烈愤怒和报复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剥夺的压力下，她与涉及父亲的乱伦幻想相关的罪疚感受到猛烈激发。因此，这些反复思量无一例外都涉及父亲。

在我已经多次提到的病人 Y 那里，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曾告诉你们，这个病人产生了强奸幻想——她把它们看成事实——而这些幻想最终都涉及父亲。她也已经达到在极大程度上认同父亲的地步；例如，她对母亲的态度完全像一个儿子。她因此会做这样的梦：父亲遭到蛇或野兽攻击，随后她救了父亲。

她的阉割幻想采取了我们熟悉的形式：她想象自己的生殖器区域构造得不正常，此外还觉得自己的生殖器仿佛受过某种伤害。她围绕这两点发展出许多观念，主要认为这些异常是强奸行为造成的。事实上，事情变得清楚：她之所以顽固坚持这些同生殖器相关的感觉与观念，

实际是为了证明这些暴力行为的实在性，进而最终证明她同父亲之爱情关系的实在性。下面这个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幻想的重要性，以及支配她的重复强迫有多强：分析以前，她坚持接受了六次剖腹手术，其中几次仅仅因为她感到疼痛而实施。另一个病人对阴茎的欲求采取了极其怪诞的形式；这种自己曾受伤的感受被移置到其他器官上，所以她的强迫症状得到解决以后，临床图景呈现为明显的疑病症。此时，她的阻抗采取如下形式："既然我的心脏、肺、胃和肠显然都患有器质性疾病，让我接受分析当然荒谬。"在这里，她对幻想实在性的坚持同样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一次差点迫使医生对她施行肠道手术。她的联想不断带出一个观念：父亲以疾病把她"击倒"了（geschlagen）。事实上，这些疑病症状消退以后，遭到殴打的幻想（Schlagephantasien）成为她神经症中最突出的特征。在我看来，仅仅用"阴茎嫉羡"情结完全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些表现。但是，倘若把它们视为一种冲动的效果——以强迫方式重新经历在父亲手中遭受的痛苦，并向自己证明这项痛苦经验的实在性——它们的主要特征就完全清楚了。

这组材料还可以无限扩充，但无非会一再表明：我们在完全不同的外观之下，都会遇见这个基本幻想——主体通过同父亲的爱情关系遭受了阉割。我的观察使我相信，这个幻想虽然长期以来已在个别病例中为我们熟知，却具有如此典型而根本的重要性，以至于我倾向于把它称作整个女性阉割情结的第二个根源。这项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于：受到压抑的女性身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同阉割幻想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或者，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是受到创伤的女性身份引起阉割情结；继而，是这个情结损害女性的发展——不过，它并不是最初就这样做。

我们在这里很可能找到了对男人之报复态度的最根本基础；这项态度在阉割情结显著的女人那里经常成为突出特征。人们试图把这项态度解释为“阴茎嫉羡”的结果，以及小女孩期待父亲把阴茎作为礼物送给她却遭到失望的结果；但是，这些解释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分析心理更深层次时揭示的大量事实。当然，在精神分析中，“阴茎嫉羡”比那个受到远为深刻压抑的幻想更容易暴露；后一个幻想把男性生殖器的丧失归因于同父亲作为伴侣发生性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阴茎嫉羡”本身根本不附带罪疚感。

这种对男人的报复态度尤其经常以格外猛烈的方式指向施行破贞行为的男人。解释很自然：按照幻想，病人首次交合的对象恰恰就是父亲。因此，在后来实际的爱情生活中，第一个性伴侣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代表父亲。弗洛伊德在《处女的禁忌》中描述的习俗表达了这个观念；按照这些习俗，破贞行为实际上被交托给一个父亲替代者。对无意识来说，破贞是同父亲发生之幻想性行为的重复；因此，破贞发生时，属于幻想性行为的一切情感都会重现——强烈的依恋感同对乱伦的憎恶结合起来，最后则是上述报复态度：报复失望的爱，也报复据称通过这项行为遭受的阉割。

我的论述到此结束。我的问题是：由“阴茎嫉羡”产生的对女性性角色之不满，是否真的是女性阉割情结的全部始末？我们已经看到，女性生殖器的解剖构造对女人的心理发展确实意义重大。同样无可争辩的是，“阴茎嫉羡”从根本上制约着阉割情结在她们身上的表现形式。但是，由此推论她们对女人身份的拒绝奠基于这种嫉羡，看来并不成立。相反，我们可以看出，“阴茎嫉羡”绝不排除对父亲产生深刻而完全女性化的爱恋依恋；只有当这项关系因俄狄浦斯情结而破裂时——

同相应的男性神经症完全一样——嫉羡才会使主体转离自身的性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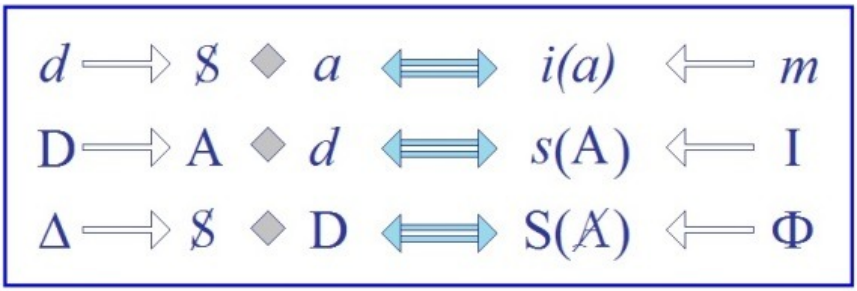
认同母亲的男性神经症患者和认同父亲的女性，都以同样方式拒绝各自的性角色。从这个观点来看，男性神经症患者的阉割恐惧——其背后潜藏着一个阉割愿望，而我认为人们从未充分强调这一愿望——恰好对应女性神经症患者对阴茎的欲望。倘若男人对认同母亲的内在态度，不同女人对认同父亲的内在态度截然相反，这种对称会更加醒目。这种相反体现在两个方面：对男人而言，成为女人的愿望不仅同其意识自恋相冲突，而且还因第二个理由遭到拒绝，即成为女人的观念同时意味着他以生殖器区域为中心的一切惩罚恐惧得到实现；对女人而言，父亲认同则得到朝同一方向发展的旧有愿望确认，而且不携带任何罪疚感，反而带来一种获判无罪的感受。因为，我曾描述阉割观念同涉及父亲的乱伦幻想之间存在联系；这项联系产生了一个同男人相反的致命结果：成为女人本身被感受为有罪。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9]、《一例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发生》[10]以及《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越来越充分地表明认同过程在人类心理中占有何等巨大的分量。在我看来，恰恰是同异性父母的这种认同，构成两性之同性恋与阉割情结共同发展的出发点。

[9] 《小论文集》第四辑。

[10]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 卷，第 125 页。

# 第17课 · 1958年3月26日




我先把这个写在黑板上，免得之后引用时写错或写得不完整。我希望至少能在今天讲述结束以前，阐明这三个公式的整体。稍稍从上次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我颇为满意地注意到，我的某些说法并非没有引起一些波动。

具体说，是因为我似乎认同了某位女性精神分析家提出的意见：某些针对女性的分析未必适合一直推进到底；理由例如是，分析本身的进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剥夺这些受分析主体严格意义上的性关系。我的意思是，分析的继续或推进，可能威胁某种已经争得、已经获得的享乐。

随后有人问我是否认同这个说法，也就是：分析是否的确应当

在某一点停下来，而理由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分析自身进展法则之外。对此我的回答是：一切取决于人们把什么视为分析的目标。不是它的外在目标，而是可以说在理论上调节它的东西。

无疑，有一种分析视角把目标理解为对现实的调适，而且认为这种现实调适蕴含在分析发展这个概念本身之中。我的意思是，仿佛男人或女人的状况中已经给定：对这项状况的充分澄清，必然会把他引向某种预先成形的、和谐的适应。这是一项假设；事实上，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

换句话说，为了照亮我的提灯，并采用今天还会出现的那些术语——这一次是在完全具体的意义上，因为我们谈的是女人——女性的发展以及她对某种无疑属于人类秩序的适应，确实是分析理论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要点。谈到女人时，我们是否立刻就能确信，不应混淆：

- 她所欲望的东西——我赋予“欲望”一词完整含义——同她所要求的东西；

- 同样不要把她所要求的东西，同她所意愿的东西混淆；后者是在“女人之所愿，上帝亦愿之”这句俗语的意义上说的。

这些简单提醒即便不是自明的，至少也来自经验；它们可以用来表明：

我们所提出的、分析中究竟要实现什么的问题，并不简单。上次，这个问题以某种侧面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论述；当时我们所谈、我想把你们引向的东西，也就是今天我要带你们返回、给出一个更普遍公式的东西，今后将成为我批判男人与女人那些根本的、确切说规范性认同时所用的路标。上次，我使你们瞥见了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那种产生自我理想的认同：它是围绕俄狄浦斯这场危机的出口点、枢轴点与终点；分析经验正是围绕这场危机开始，

并不断围绕它旋转，尽管分析经验采取的立场越来越离心。

我曾坚持一个可以这样表述的要点：一切自我理想类型的认同，都在主体同大他者中的某些能指之间建立某种关系；我把这些能指称作徽记。归根到底，这项关系自身嫁接到另一个欲望上，而不是那个曾使主体与大他者这两项彼此对峙的欲望——这里的大他者是这些徽记的携带者。大体上可以这样概括。当然，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不过，同某些人交谈时，我提供的参照也只有如下这一点。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弗洛伊德以及所有作者都把它指出为首要事实——正因为一个女人认同自己的父亲，她才会在同丈夫的关系中，把自己曾对母亲提出的全部责难都加诸丈夫吗？

这里存在某种典范性的东西，可以说明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事情。我们当然不应只对这个例子着迷；我们还会在其他形式下重新找到同一个公式。正因为认同通过承担某些标志、某些刻画一个主体同另一个主体之关系的能指而形成，它才会前来覆盖并蕴含如下关系升至前景：

这个主体同一个第三项之间的欲望关系。

你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主体 S、大写 A 和小写 a。这里哪个是大写 A，哪个是小写 a？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有两个。让我们从我试图带你们返回的这项观察重新出发；可以说，它同拉罗什富科那句谈论人们无法直视之物的箴言有关：太阳与死亡。在分析中也有这类东西。相当奇怪的是，人们恰恰越来越斜视分析的核心点，而且经由越来越遥远的理论望远镜去看它。阉割情结就属于这类东西。

请观察自弗洛伊德最初把握它以来发生的事情。这里存在主体形成中的某个枢轴、某种本质之物；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很奇怪，以往从未被提升、从未得到分节：在主体的形成中，围绕一种极为确切、特殊、悖谬、古老、乃至令人恐惧的威胁，发生了某种事情。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它无疑具有致病性，却也具有规范性。它围绕的威胁并非孤立，而是同所谓俄狄浦斯关系——即主体、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相互连贯：

- 父亲在这里承担威胁携带者的职能；
- 母亲则是某种自身深藏不露之欲望的目标客体。

你们在起点处重新找到的，恰恰是有待澄清之物。对某些徽记的这种关系之承担，正是在这个三方关系中产生；归根到底，这些徽记已经在阉割情结中有所指示，却以一种谜样的方式出现，因为这些徽记本身同主体处在一种奇特关系中。人们说，它们受到威胁；与此同时，所涉的毕竟又是

把它们拾取、接收下来，而且是在涉及第三项——母亲——的欲望关系中这样做。

在起点处，我们找到的正是这一点；而说到这里，我们恰好面对一个谜，面对某种需要由实践者在这里加以分节与协调的东西。我们拥有这种依照定义和本质都很复杂、很难把握和分节的关系，并且在主体的生活中遇见它。我们将会找到什么？

一千种形式、一千种反映，一种形象与根本关系的散布，使我们得以把握

它的一切作用、一切心理反映以及神经症主体的经验所承载的繁多心理任务。于是会发生什么？

发生了一种我称作心理学化动机的现象：为了在个人、在主体自身之中寻找阉割恐惧的起源与意义，我们抵达一系列

对阉割恐惧之分节的移置与转调。简单概括，它们大体按如下层次展开：阉割的这道痕迹最初同父亲的客体、同对父亲的恐惧相关；我们首先被引向考察它的作用，并发现它同主体的一种倾向、一种欲望——保持身体完整的欲望——相关。正是围绕自恋性恐惧这个观念，阉割恐惧才被提升出来。

随后，我们始终沿着一条必然属于发生学的路线——一旦在个人自身中寻找后来发展之物的发生，就会向起源倒推。由于我们总有临床材料可以把握某种效果的所谓化身，女性器官恐惧被提升到前景；而且其方式相当含混：

- 要么女性器官本身成为对那个受到牵连之器官构成威胁的场所；
- 要么相反，它成为该器官消失的模型。

继续向前，通过越来越远的倒退，我们将在阉割恐惧的起源处找到某种东西。你们会看到，它达到的最后一点在我看来相当醒目而奇特：受到恐惧的，是处于阉割以前的东西。

我们逐渐抵达的最后一点如下——今天我不再为你们罗列所遇到的作者，但你们知道，最后一位是梅兰妮·克莱因：处在阉割恐惧起源处的，正是阳具本身。它隐藏在母亲器官的深处，并在儿童最初的时期被知觉为父亲的阳具，被知觉为坐落于母亲身体内部。正是它受到儿童与主体的恐惧。

你们是否认为，看到这个具有威胁性的器官以某种镜像方式出现在受威胁器官对面，已经足够醒目？而且，追溯得越远，它就越带有神话性质。但是，要迈出最后一步，归根到底还必须把母亲性器内部的父亲器官视为具有威胁性。那是因为在所谓主体的原初攻击倾向、原初施虐倾向的源头，主体自己已经把这个器官变成了理想武器。

最后，一切都归结为阳具器官的纯粹反映；它被看成某种属于纯粹而简单之攻击的原始倾向之载体。归根到底，阉割情结被孤立出来，被还原为对一种原初的、局部的攻击驱力的隔离；与此同时，它似乎也从此断开了联系。事实上，作者们的一切努力，以及从这一刻起最难做到的事情，正是把阉割情结重新纳入作为情结的语境中，也就是把它重新纳入其出发点；在最初探索神经症时，正是这个出发点深刻地促成了它在主体经济中的核心性质。当然，我们知道，作者们不得不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仍旧复原、重新安置如下东西：当我们审视事情时，它最终显得只是一个系统、一组概念纯粹、简单而徒劳的自我回转。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仔细考察梅兰妮·克莱因在所谓早期俄狄浦斯层面所表述之事的经济——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词项矛盾——那就等于说：“前俄狄浦斯的俄狄浦斯”，“在俄狄浦斯的任何人物尚未出现以前作为俄狄浦斯的俄狄浦斯”；

我们会发现，她用来命名

自己最终在儿童那里遇见、或自以为遇见之驱力的解释性能指，只不过已经把最初所涉及的整套辩证过程准确地蕴含在她自己的能指中。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蕴含我们必须从起点和本质重新把握的这个问题：既然阉割具有这种本质性质，既然我们按照分析经验、分析理论以及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便赋予它的位置来把握阉割，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学会看出它意味着什么。

在遭到恐惧、得到体验、可以被心理学化以前，它意味着什么？阉割不是一种实在阉割。我们已经说过，这种阉割同一个欲望相连。它甚至同人类主体欲望的演化、进展

与成熟相连。另一方面，既然它是阉割，那么，同这个器官的联系——而在阉割情结概念中，这项联系本就很难准确定位——显然不是一种针对整个生殖器官的阉割。

正因如此，在女人那里，它并不采取对生殖器官本身构成威胁的样貌，而是指向作为另一种东西的生殖器官，恰恰是作为阳具。同样，在男人那里，人们可以正当地提出问题：在阉割情结概念中，应当把阴茎本身单独分离出来，还是应当把阴茎与睾丸都包含进去？事实上，这显然表明，所涉的是不同于这个或那个器官的另一种东西：它同器官保持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具有能指性质。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种能指性质。

可以说，在阉割情结的本质中，至少必须保留如下最低限度：一方面是某个欲望，另一方面是我在这里称作标记之物，二者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的经验与分析理论告诉我们，要使欲望顺利穿过某些阶段、抵达成熟，

就必须让某种像阳具一样难以定位的东西，受到如下东西的标记：严格说来，它只有穿过阉割威胁，才会得到维持和保存。

这一点必须作为本质的最低限度保留下来；一旦越过它：

- 我们就会进入同义替换；
- 我们就会进入滑动；
- 我们就会进入等价替换；
-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进入晦暗。

从字面上说，如果不把这些特征视为本质，我们就不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试图到主体身上寻找这项关系的种种化身以前，难道不应首先把目光投向这两个极——欲望与标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追寻一项联系的理由；

一旦离开这个出发点，这项联系就会变得越来越谜样、越来越成问题，而且很快越来越受到回避。

我坚持这种标记性质；而且在——

一切不同于分析性、解释性与意指性表现的表现中，当然也在一切以仪式、礼制和社会方式体现它的东西中——它都具有如下性质：成为支撑这种阉割关系之一切事物的标志；通过分析，我们已经开始

瞥见这项关系在人类学上的涌现。

在此以前，不要忘记我们从中认出阉割情结的标志与宗教化身。例如，直称其名就是割礼；还有青春期礼仪、纹身等形式的铭刻与标记，以及一切制造标记、在主体身上留下印记的东西。它们同某个阶段相连，而这个阶段毫不含混地呈现为进入欲望某个水平、某个层级的阶段；这一切总是以标记和印记的形式呈现。你们会对我说：

“好了，这就找到了！标记并不难遇见！”

经验中早已如此：只要有了羊群，每个牧羊人都会有自己的小标记，用来区分自己的羊与别人的羊；这项观察并不那么愚蠢。这里确实存在某种关系，哪怕只在如下意义上：我们至少已经从中把握到，标记相对于羊群的构成，毕竟呈现于某种超越性之中。

这足以令我们满意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例如，割礼表现为构成某种羊群——选民的羊群、上帝之子。

我们只是重新找到这一点吗？当然不是！分析经验以及弗洛伊德

从一开始带给我们的东西是：

- 欲望与标记之间存在一种紧密、亲密的关系；
- 标记不只作为牧羊人的辨识标志待在那里——此时我们很难知道牧羊人究竟在哪里；当所涉的是人，这意味着被标记的生命存在在这里拥有一个欲望，而这个欲望同这项标记并非没有某种亲密关系。

我们不应推进得太快，也不应断言正是这项标记改变了欲望。也许，这个欲望从起源处就有一道裂隙，使这项标记能够产生自己的特殊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欲望的特征同标记的作用、角色及功能之间，存在最紧密的关系。我们重新遇见能指与欲望之间的这种对峙；我们这里的一切追问都必须围绕它展开。

我不想离题太远，不过仍要在这里稍作插话：不要忘记，这个问题显然通向能指在人那里的功能，而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听人谈论它。弗洛伊德写作《图腾与禁忌》，并且把表述《图腾与禁忌》视为一项本质需要和满足——请参阅琼斯的文本，仔细看看这对他有多重要；它绝不只是应用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并不是为了以苍穹的尺度放大

他在诊室里接触的那只人类小动物：这并不像斯宾诺莎那里“天上的狗”相对于“地上的狗”；而是因为，这则神话如此根本，以至于对他来说它不是神话。

《图腾与禁忌》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如果我们想理解弗洛伊德在病人的俄狄浦斯经验层面所作的特殊追问，就必然会被引向

“弑父”这个主题。当然，你们知道，在这里，

弗洛伊德并不质疑自己。要构想一种从自然通向人类的过渡，为什么必须经过弑父？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按照他那属于观察者和自然学家的方法，他围绕自己抵达的这个汇合点、这个十字路口，把一切文献、民族学资料提供给他的一切，都聚集起来、使之繁生。

当然，我们首先看见什么在繁生？他自己的特殊经验同

民族学材料相遇。如今材料是否多少已经过时，并不重要。恐怖症的功能连同图腾主题，正是他重新找到自己、获得满足、看见自己追踪的标志彼此结合之点；这个事实充分表明，它同一项把能指功能推向前景的进展绝对不可分辨。恐怖症是一种把能指推到前景的症状——能指以孤立方式出现，并作为能指得到提升。去年我用了整整一年向你们解释、展示：恐怖症的能指对主体而言拥有三万六千种意义。关键就在这里：所缺少的正是那个能使各种意义——至少暂时——稍稍安定下来的能指。

没有它，主体就会被这些意义彻底淹没。

同样，图腾也正是如此：它是包办一切的能指、关键能指，是使一切得以安排的能指；

首先得到安排的是主体，因为主体在这个能指中找到自己是什么。对他而言，受到禁止之物也以这个图腾之名得到安排。但是，可以说，这最终向我们遮蔽、隐藏了什么？它隐藏了“弑父”本身：为了让转变与革命得以围绕弑父发生，原始部落的年轻男性由此看见某种将成为原始法则的东西得到安排，也就是乱伦禁令。这只是向我们隐藏了如下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 死亡；
- 能指的出现。

毕竟不要忘记：人人都知道，在生命的通常进程中，生命几乎不会在自己制造的

尸体面前停留。大鱼吃小鱼，甚至杀死以后也未必吃掉；

但可以确定，生命运动会夷平自己面前有待消除之物。这已经是整个问题：一场死亡凭什么得到记忆？即便这项记忆以某种方式保持隐含，也就是说，即便从一切迹象看来，这项记忆的本性就是被个人遗忘；无论所涉的是“弑父”还是杀害摩西。

它的本性从根本上就是忘记某种仍绝对必要的东西；这件东西是钥匙，是枢轴点，我们的思想必须围绕它旋转：某种联系已经被能指化，以至于这场死亡不再只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实在界、在生命的繁生中存在，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死亡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死者，仅此而已！他们死去以后，生命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再理会他们。换句话说，是什么造成了：

- 弗洛伊德写作《图腾与禁忌》时的激情；
- 以及一本书问世时雷霆般的效果——它普遍遭到拒绝与唾弃？

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开始说：

- 这个人在给我们讲什么？
- 他从哪里冒出来的？
- 他有什么权利给我们讲这些？
- 我们民族志学家从未见过这种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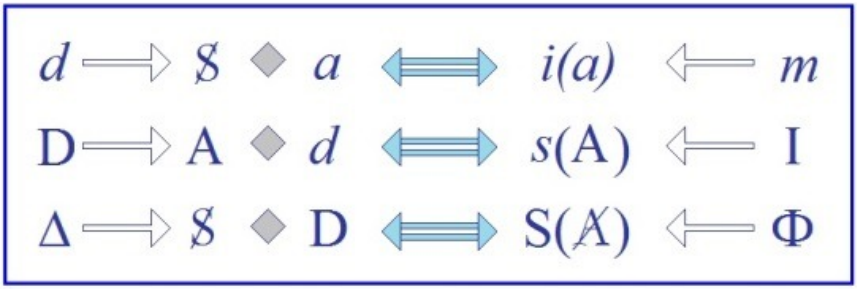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极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且围绕它，

批判性、民族学、文学和人类学工作的全部灵感事实上都受到深刻改变。这是什么意思？只可能意味着，弗洛伊德在其中结合了两种东西：他把欲望同能指结合起来。他像人们所谓“变位”一个动词那样把二者“结合变位”。他把这种结合变位的范畴带入一种思想；在他以前，涉及人的这类思想始终是我所谓学院化的思想。我以此指称某种古代哲学谱系：从柏拉图主义直到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又穿过基督教，它深刻地倾向于：

- 忘记、回避欲望同能指的这种有机关系；
- 把欲望安置在能指之外、从能指中排除出去；
- 把欲望还原、解释、纳入某种快乐经济中赋予动机；
- 回避欲望中绝对成问题、不可还原、严格说来具有倒错性的东西；
- 回避人类欲望之表现所具有的本质而鲜活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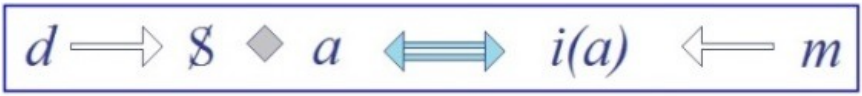
而在这些性质的前景，我们必须放置这种不仅不适应、无法适应，而且从根本上遭到扭曲、受到标记的性质。

我们在这里正努力做的，就是安置欲望与标记、欲望与徽记、欲望与能指之间的这项联系。以下是我为你们写下的三个小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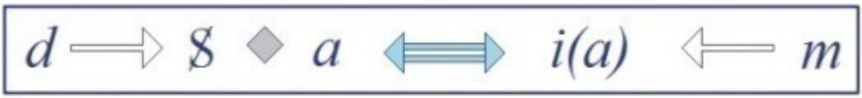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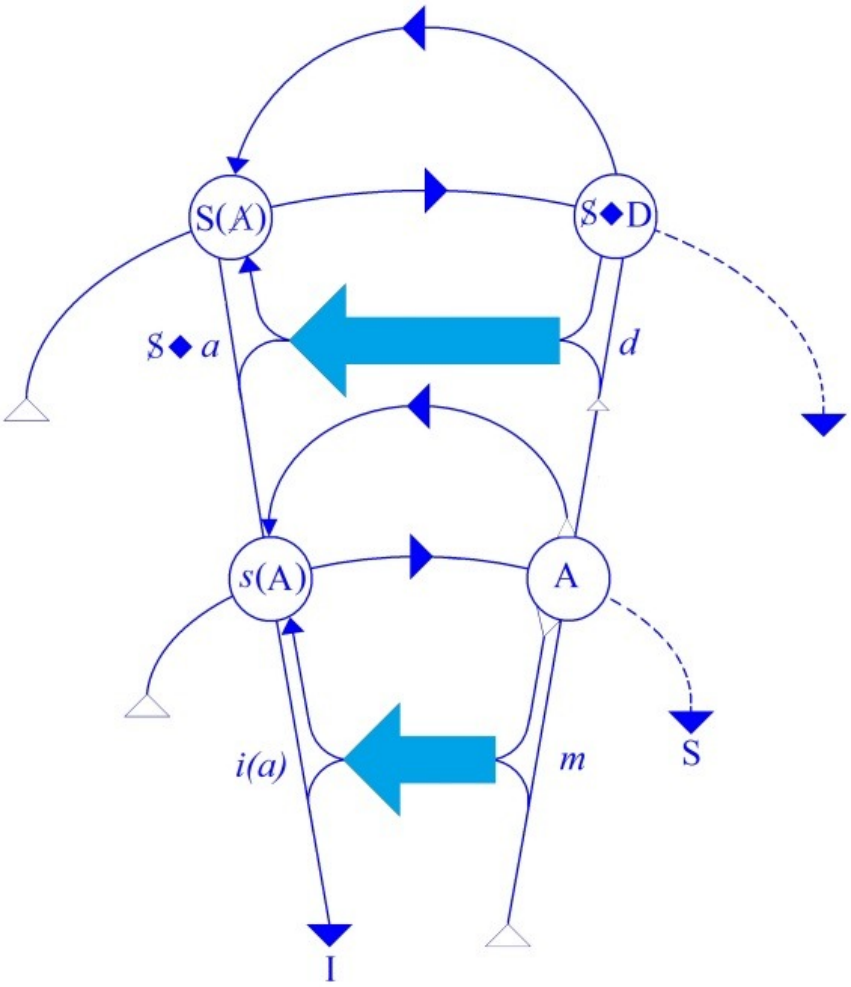

今天我只想引入这些公式，告诉你们它们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无法走得更远。不过，依我看，你们不仅可以围绕这些公式，尝试表述我刚才向你们提出的问题；也可以围绕它们表述分析思想针对始终属于我们根本问题之物的一切漫游，乃至离题妄想。

归根到底，不要忘记，它就是欲望的问题。首先让我们说明这里这些字母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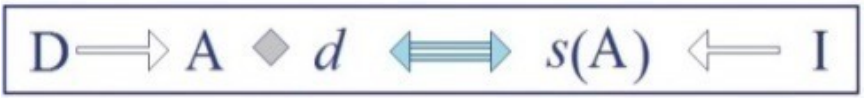

- d 是欲望；
- S 是主体；
- 小写 a 是小他者，是作为我们同类的他者；他的形象［i(a)］扣住、俘获、支撑我们，而我们围绕这个形象构成我曾为你们界定为自恋认同的第一重认同秩序，也就是 m、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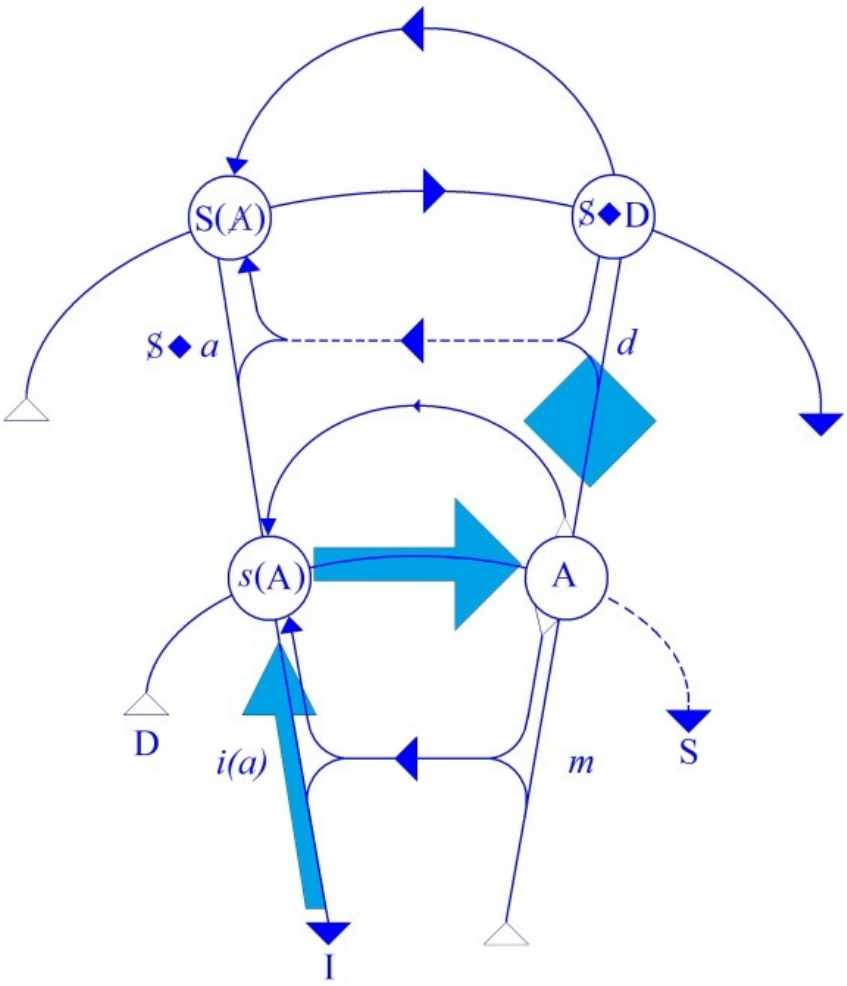





第一行使你们进入某种关系。箭头向你们表明，从任何一端出发都无法把它走到底；从每一端出发，它都会在指向性箭头本身遇见另一个方向相反之箭头的准确点上停止。不过，这一行确实使自我性或自恋性认同同欲望功能发生某种关系。我还会重新评论这一点。

第二行涉及我在本学年开端用全部论述表述的东西；我曾试图使你们在诙谐中看到欲望的一种根本关系——不是同能指本身的关系，而是同言说、也就是同要求的关系。






• 这里写下的大写 D 指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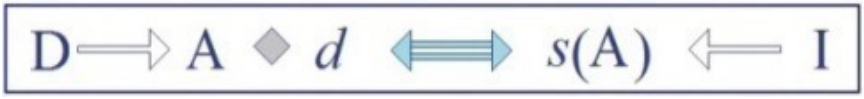
• 后面的 A 是大他者。大他者作为场所、所在地与见证者，主体在同任意一个 a 的关系中，把他当作言说场所来参照。我无需在这里

重申：长久以来，我不断返回并表述把这个大他者作为言说本身之场所的必要性。

- 这里重新找到小写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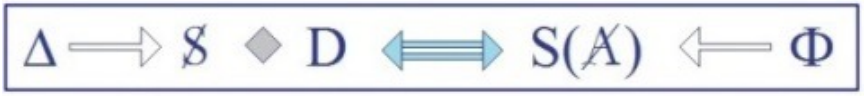
- 这里，你们第一次遇到一个符号，就是小写 s。小写 s 在此具有我们公式中通常赋予它的含义，也就是所指。s(A) 意味着："在大他者中得到表明的东西；在大他者中，借助能指而对作为主体的我取得所指价值的东西。"严格说来，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徽记。

- 认同正是相对于大他者的这些徽记产生；它的果实与结果，是在主体中构成 I，也就是自我理想。仅仅通过构成这些公式，你们就已经使如下事情呈现出来：只有当大他者这一项进入考虑时，标志才能上升为自我理想的认同。




- 你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小写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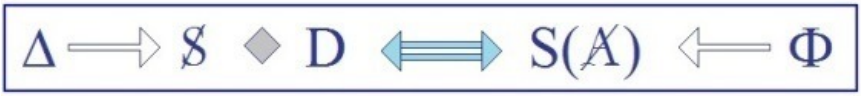
第三行，换句话说，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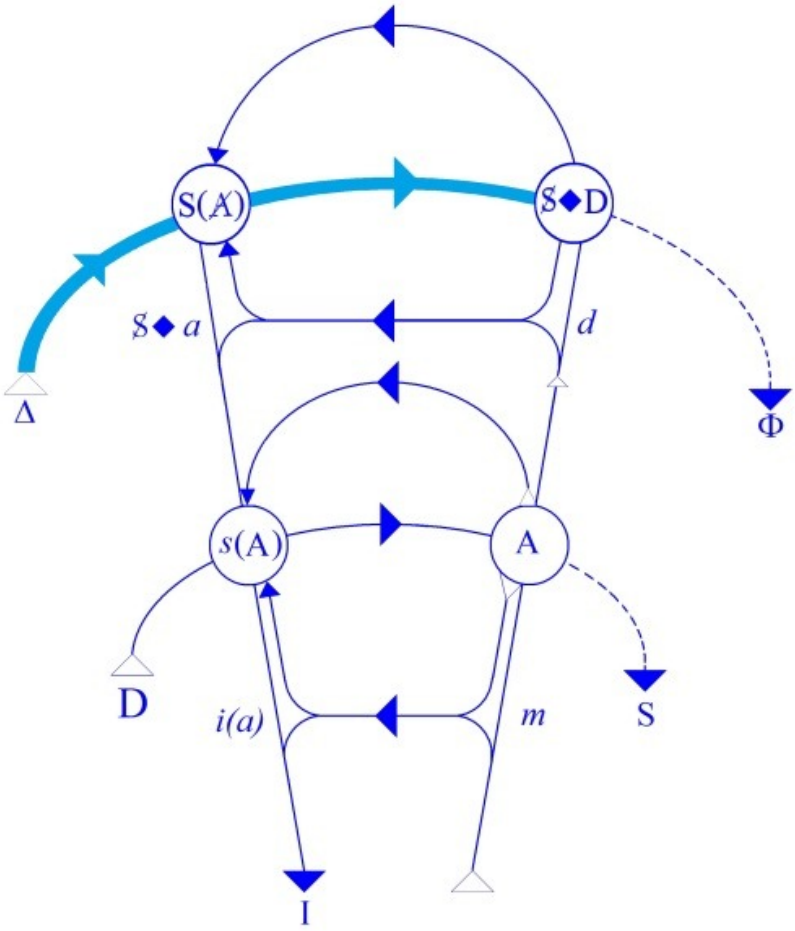



涉及我今天试图在你们面前表述的问题。它像前面几行一样，试图把以下内容表述成一条路标链：Δ　恰恰就是我们正在追问的东西，即使人类主体同能指发生某种关系的那项动力本身；这里所涉的是作为主体之本质的主体，是完整主体，是在其完全开放、成问题、谜样的性

质中的主体，而这个公式表达的正是这一点。你们看到，主体在这里再次返回自己同如下事实的关系：他的欲望经过要求［S ◊ D］，他把欲望说出来，而这会产生某些效果；这不过是

这里所象征的东西。






这里的大写 S 一如往常，是我们用来指称能指的字母。这个 S(A) 公式说明，S 是我将尝试向你们说明的某种东西，确切说，也就是 Φ——阳具——所实现的东西。

换句话说，阳具是一个把某种新东西引入 A 的能指；它只在 A 中、只在 A 的层面引入这项东西。借助阳具，这个公式将在能指效果作用于

他者的这个准确点上得到照明。也就是说，这个公式将使我们能够阐明

由这些以如此方式分节的关系之存在所造成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重新把握所涉之事。人同欲望的关系，不是简单纯粹的欲望关系；它本身不是一种客体关系。倘若这种客体关系已经建立，分析就不会有问题。人会像人们设想大多数动物那样，径直趋向自己的客体；人也就不会同自己是欲望动物这个事实发生可以说第二重的关系。在我们称作倒错的层面，发生的一切正在于：他享用自己的欲望。

如果欲望起源的全部演化，都围绕那些称作受虐关系的亲历事实旋转，

那么，在发生学秩序中，人们会让受虐关系首先出现；不过，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某种退行才抵达它。表现为最具典范性、最具“枢轴性”的，是所谓施虐关系或窥视欲关系。

然而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孤立为彼此替代、彼此等价的驱力形式，是通过对经验中所给之物进行一种还原、人为操纵以及次生拆解。

窥视欲关系把展示癖与窥淫癖结合起来，因而始终含混：主体看见自己正被看见，或者把主体看成被看见者；当然，绝不是简单纯粹地看见主体。主体处在一种享乐中，处在由如下事实散发出的某种辐射或磷光中：主体仿佛从某道不知来自何处的原始裂隙出发，从自己同客

体相互牵连的关系中抽离出来。他由此从根本上把握自己是这项关系中的承受者。因此，在对欲望的这项分析探索深处，我们找到

受虐狂。受虐狂就在于：可以说，主体在自己作为生命存在的生存中，把握自己为受苦者；他在这里作为欲望主体而受苦。

现在，问题在哪里？人类欲望面对任何还原与适应，都永远保持其不可还原性；任何精神分析经验都不能反驳这一点。主体并不只是满足一项欲望，还会在欲望这件事本身中享乐；这是其享乐的一个本质维度。完全忽略这种原初材料是错误的。所谓存在主义研究曾为它带来一些光亮，也从某个角度重新照亮了我在这里尽力向你们表述的东西。我只是假定，你们充分参照我们的日常经验，这个说法便会具有意义。萨特先生在《存在与虚无》一些精彩程度各异的篇章中充分展开了它。从哲学上说，那部作品并不总是绝对严谨，却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文学才华[注]。

> [注] J.L. 速记稿与 Staferla 在此均录作句法不通的 le côté tout à fait faux du désir humain...；米勒编订本则断为“人类欲望永远不可还原于任何还原与适应”，并把“完全错误”移到下一句“忽略这种原初材料是完全错误的”。译文据米勒本恢复这两层判断，不把“虚假”误作人类欲望本身的性质。

醒目之处在于：恰恰只有从分析以某种方式赋予欲望维度公民权以来，这个层次的事情才可能得到如此耀眼的表述与展开。

琼斯先生在分析中的用途和功能，同他不理解的东西成正比；他很快就试图通过赋予阉割情结一个等价物来表述它。总而言之，阳具能指贯穿其写作者与分析家的一生，对他造成的效果

可以称为他的一种真正恐怖症的对象。

因为，他写得最好的东西——以《阳具阶段》一文为顶点——恰恰在试图表述并说明：为什么我们随时都在脚下遇到这个该死的阳具？为什么这个本身并不实在的客体拥有特权，而明明还有同样有趣的东西，例如阴道？事实上，这个人说得对：这个客体的趣味绝不亚于阳具，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是令他惊讶的是，二者并不具有相同功能。

只要他从一开始、刚试图表述弗洛伊德的这个阉割情结究竟是什么时，就感到有必要赋予它一个等价物，他就注定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已经看见最初那一下冲动从何处出发：它在这里突然出现，没有保留阉割情结中或许坚硬、不可还原的东西，也就是阳具能指。他并不是没有某种方向。也许他唯一的错误，是相信自己用来结束《阳具阶段》一文的这句话："上帝把他们造为男人和女人"——他以此作结，充分显出其信念的《圣经》起源。既然上帝把他们造为"男人和女人"，那么，这样做当然就是为了让两者结合。事情毕竟必须抵达这一点，或者必须说明为什么。

可是，我们恰恰在分析中发现，一旦要求"说明为什么"，就会进入形形色色的复杂情况。因此，他从一开始便用另一个术语替代阉割：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他从希腊语词典中找出这个词——必须承认，在作家笔下它并不是最常用的词之一——意思是消失。什么的消失？

欲望的消失。据琼斯先生所说，这就是主体在阉割情结中恐惧的东西。于是，他迈着莎士比亚人物般轻快的小步，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生命存在可能把某件事预感为危险，而这件事不是欠缺的消失、不是同客体断奶，而是自身欲望的消失——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

问题。因为，要使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成为阉割情结的一个等价物，除了像他那样把它界定为“欲望的消失”，别无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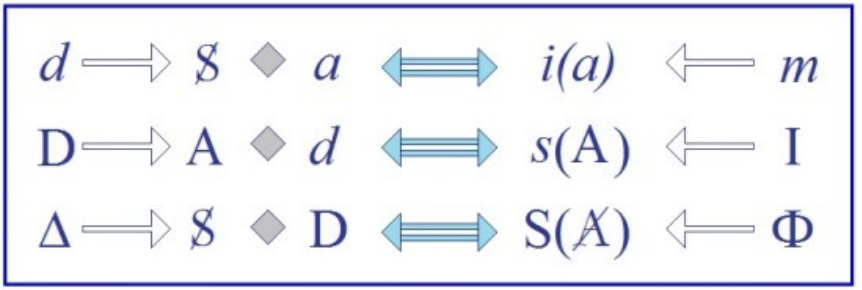
这里难道不存在某种完全没有根据的东西吗？但它相对于我们可以用需要的术语称作适当关系之物，已经属于第二级或第三级的东西，这一点看来毋庸置疑；而他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

话虽如此，即使我们承认，仅仅以这些术语提出问题所暗示的一切复杂情形都已解决，问题仍然是：在同大他者的这种关系中——正是在大他者中、在大他者的目光里……我把窥视欲位置置于核心并非无缘无故；因为它事实上处在这个位置的核心，同样也处在大他者的态度中。我的意思是，任何施虐位置，要在严格意义上能够被称作“施虐的”，都会以某种方式伴随某种受虐认同。

因此，问题在于：人类主体处在同自身存在相分离的这种关系中，是什么使他面对大他者而占据这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那里，他所把握、所享用的并非客体关系，而是同自身欲望的关系。归根到底，所要知道的是，阳具本身在其中究竟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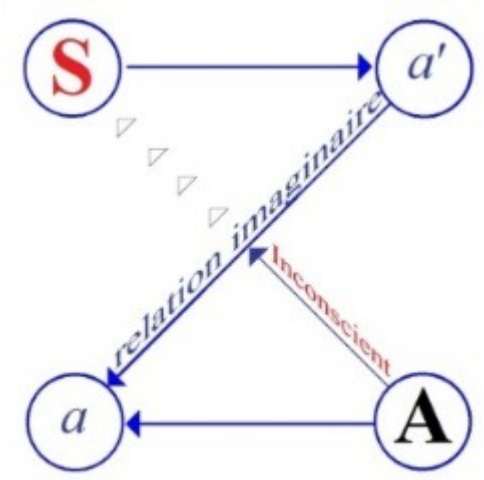
问题就在这里。在试图依据一些参照，通过发生学重构来产生、想象它以前——我把这些参照称作“现代蒙昧主义的根本参照”；依我看，下面这个公式远比那些以宗教教育或教理问答之名教给你们的小册子中的任何内容都更愚蠢：“个体发生重演种系发生。”

当我们的曾孙得知，在我们的时代，这句话足以解释一大堆事情时，他们会对自己说：“人毕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当然，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那时拿什么替代了它。因此，所要知道的是，阳具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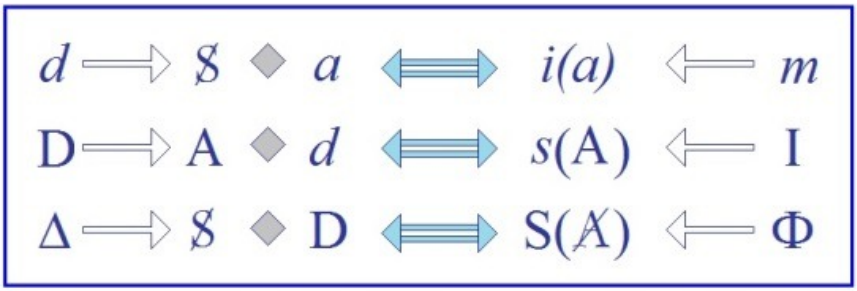



今天，让我们提出如下这一点：第三行的存在意味着，阳具确实是某种发挥特定角色、发挥能指角色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从第二行出发。它意味着：如果人同小他者存在一种得到结构化、被构成为我们刚才所谓人类欲望的关系，而且这种欲望从根本上已经是某种倒错的东西，那么，他的全部要求都会受到某种关系的标记。

这就是你们在这个新菱形小符号中看到的含义；你们不断在公式中重新遇见它。它只意味着，这里的一切都由某种东西支配，恰恰是我们始终置于问题表述根基的四项关系；它说明，若没有 $a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A$ 这项三元关系，就不可能构想、表述任何 S，S 也不可能存在。它仅仅意味着这一点。




可以说，要使要求存在、获得机会、成为某种东西，作为言说场所的 A 同按照第一行中 S ◊ a 的方式结构起来的这个欲望之间，就必须存在某种关系。




这些线条的组合蕴含如下内容：

- 正如自恋认同——也就是构成主体自我的东西——形成于同他者形象 i(a) 的某种关系中，而我们已经看过这项关系在声望、仪态与支配上的一切变体、一切差异和一切细微层次；在这里还存在某种对

应项、相关项。它处在这张图的旋转点另一边，也就是处在中央那条双重等价线［⟺］的另一边；它使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同第一段线条［S ◊ a］所表述的、主体从根本上具有欲望并同欲望的种种命运相连这一性质发生关系；

- 同样，一切属于对大他者徽记之认同的认同——s(A)，也就是对第三项本身的认同——都依赖什么？依赖要求，依赖要求以及大他者同欲望的关系：A ◊ d。

这一点完全清楚而显明；它使我们能够把完整价值赋予弗洛伊德用来称呼如下东西的术语。我们以非常不恰当的方式把它称作挫折——我还会重新表述并返回这个术语为何很不恰当——所涉的是 Versagung。

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正因为某种东西受到 Versagung［拒绝］，主体那里才会产生次生认同或对大他者徽记之认同的现象：s(A)。这蕴含什么？它蕴含，为了使某种关系——我是指对主体而言——得以在如下二者之间建立：

- 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

- 以及主体欲望的这个现象；它被置于完全异质的层面，因为它同小他者发生关系，而小他者就是主体的形象［i(a)］…… 就必须有某种东西把同小他者的这种关系引入大他者、引入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要解释作为倒错欲望的人类欲望，这项关系既不可或缺、又有必要，而且在现象学上可以触知。

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出之问题的必要性。它对你们来说可能显得晦暗。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倘若什么都不提出，我们不仅会发现它变得越

来越晦暗，而且一切都会混淆；而我们要知道的是，只要提出这一点，就能从中整理出一点秩序。

我们提出，Φ——阳具——是这样一个能指：通过它，同作为小他者的小写 a 之关系被引入作为言说场所的大写 A；这项关系借此得到引入——但不只如此——因为能指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就是这样。它看起来像是首尾相咬，但它必须首尾相咬。能指显然在这里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步步都会遇见这个能指。

我们首先在起源处遇见它：倘若同能指的这种关系不处在起源，就不会有起源；这里说的不是文化的起源——不过，如果我们区分文化与社会，它们本就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人就不会进入

文化。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

- 正如我们把父亲能指界定为这样一个能指：它在大他者的场所提出并授权能指的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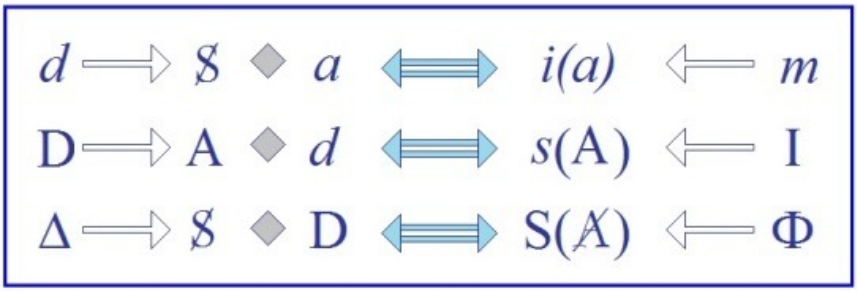
- 还存在另一个拥有特权的能指；它的效果是在大他者中设立某种改变其本性的东西。正因如此，这个大他者才被划杠：S(A)。

这个东西改变大他者的本性，使它不再简单纯粹地只是言说场所；相反，它像主体一样，卷入这项在现象层面被安置为面向小他者之反映的辩证过程。它提出大他者卷入其中，而且还向它添加一点——它完全只是作为能指进行这项添加——即这项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能指把它铭刻下来。

无论这会给你们造成多大困难，我都请你们把这一点留在心里；今天就停在这里。

随后，我会向你们展示，这一点使我们能够表述和说明什么。

# 第18课 · 1958年4月16日




我想带你们返回对我们经验之客体——也就是无意识——的某种原初把握。归根到底，我的意图是：

- 向你们展示，无意识的发现为我们开启了哪些道路与可能性；
- 同时也不让你们忘记，这项发现对我们的能力施加了哪些限制。换句话说，就是向你们展示：一种规范化——治疗性规范化——的可能性，会在怎样的视角与道路中显露出来。

不过不要忘记——全部分析经验都在提醒我们——这种规范化会撞上人类状况中任何规范化所内含的矛盾与二律背反。

分析甚至使我们能够深化对这些界限之性质的理解。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弗洛伊德最后几篇文章中的一篇，被人们不恰当地译作《有终与无终的分析》，实际讨论的是有限与无限。所涉的是分析如何结束，或者它如何必须被置于一种无限的作用范围中。问题正在这里。弗洛伊德在所谓“具体经验”层面，以最清楚的方式向我们

指出了分析目标向无限的投射；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存在某种不可还原性：

- 对男人而言，存在于阉割情结中；
- 对女人而言，存在于阴茎嫉羡中，也就是存在于同阳具的某种根本关系中。

分析、弗洛伊德的发现一开始把重音放在哪里？放在欲望上。弗洛伊德从根本上发现的东西，他从各种症状中把握的东西——无论是病理症状，还是他在此前看来多少可以还原的正常生活现象中解释出的东西，例如梦——本质上始终是一个欲望。

而且，例如在梦中，他不只向我们谈论欲望，而且谈论欲望实现；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注意。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梦中，他谈到欲望的满足。

另一方面，他指出，症状本身确实包含某种类似这种满足的东西；但我认为，他已经充分标出了这种满足成问题的性质，因为它是一种反过来的满足。因此，从一开始，经验中就显出：

- 欲望在这里同某种作为其外观——直称其名，也就是它的面具——的东西相连；
- 分析经验中向我们呈现的欲望，同某种以成问题的方式覆盖它的东西紧密相连；至少，这项紧密联系促使我们停下来，把它视为本质问题。

最近几次，我反复强调欲望出现在意识中时，在分析经验里以何种悖谬形式显现。更确切地说，我强调分析经验如何提升了欲望作为倒错欲望的这种内在性质：它是一种第二级的欲望，即对欲望本身——恰恰作为欲望——的享乐。

总的来说，分析使我们能够知觉到的欲望功能并不是由分析发现的。但是，它向我们展示如下事实达到了何等深度：人类欲望并不以直接方式卷入同它所满足之客体的简单纯粹关系，而是同如下东西相连：

- 主体面对这个客体时采取的某种位置；
- 主体在同客体的关系之外采取的某种位置；它使任何东西都永远不会在这项客体关系中简单纯粹地耗尽。

另一方面，分析也恰好提醒我们一项始终为人所知的事情，即欲望具有某种

流浪、逃逸而不可捉摸的性质；它恰恰逃脱自我的综合，以至于分析带来的这项自我综合，在每个时刻都只能以综合的幻象性肯定作为出口。

我要提醒你们，欲望者始终是我；而在我之中，我只能在这些欲望的多样性中把握自己。可以说，通过这种现象学多样性，通过欲望的这种矛盾、异常和疑难，无疑显现了一种更深的关系：主体同生命的关系，主体同所谓“本能”的关系。这条道路同样处在分析中，它曾使我们在安置主体相对于其生命存在位置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但是，分析恰恰教导我们、使我们经验到：生命目标、

生命目的，以及或许也属于生命彼岸的东西，是经由怎样的目标实现媒介完成的。对于最初生命目的的某种神学，我也说不清；弗洛伊德把它设想为快乐原则的彼岸，也就是生命所瞄准的终极目的——

返回死亡。所有这一切，分析即便没有使我们能够加以界定，至少也使我们能够瞥见；

因为分析也使我们能够沿着这些欲望的行进道路，追随其实现。

这种人类欲望在其同大他者欲望之间的深刻内在关系中，历来就已受到瞥见；

只需返回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章，就能重新找到那些道路：一种已经相当深入的思考，可以使我们从这些道路着手展开

这项研究。

弗洛伊德带来的新意、这种原创性以及使我们能够如此根本地照亮欲望性质的新现象，在于……黑格尔最初处理欲望时遵循的道路，当然远非外人所认为的纯粹演绎；它是经由自我意识同他者那里自我意识之构成的关系来把握欲望。与这条道路不同，

此时出现的追问与问题是：生命本身的辩证过程，如何能够通过这个中介

得到引入？

无疑，在黑格尔那里，这只能通过某种跳跃来表达；他在此称之为综合。弗洛伊德经验则向我们展示另一条道路；它同样极其奇特而醒目：

欲望在这条道路上呈现为同大他者本身的关系深刻相连，却又呈现为“无意识欲望”。

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回到弗洛伊德自身经验中最初处理“无意识欲望”的层面。无疑，我们必须向自己重现

弗洛伊德遇见这项经验的最初时期，必须向自己重现

它那令人惊异的新颖性质。我不会把它称作直觉，而更愿意称作对某种东西的占卜式洞察：这件东西已经在一项人类经验——弗洛伊德的经验——中呈现为某种东西，

呈现为对某种处在面具彼岸之物的把握。

如今精神分析已经形成，并展开为一套如此广阔、如此变动不居的论述，我们可以向自己重现弗洛伊德开始阅读病人的症状和自己的梦、开始向我们带来“无意识欲望”概念时所带来之物的分量——但我们重现得相当不充分。正因欠缺这一点，我们无法恰如其分地衡量弗洛伊德作为解释而提出的东西。

相对于我们自己允许自己作出的解释，相对于我们如今能够、又不再能够允许自己做的事，弗洛伊德的解释经常向我们显出一种极端干预主义的性质；我们总会为此感到非常惊讶。

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充说，他的解释具有“偏离靶心”的性质。

难道我没有一千次向你们指出：例如谈到朵拉病例，谈到他的那次干预，

或者谈到他对一位女性同性恋者——我们曾在这里详细讨论——的分析干预时，弗洛伊德的解释同他对某种心理学的不完整认识紧密相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比如说，他当时对一般同性恋者的心理学、尤其对同性恋者但也包括癔症患者的心理学认识不足；这使他的解释多少"偏离靶心"。因此，对我们而言，弗洛伊德的解释在不止一个病例中都呈现为既过度指导、又近乎强加；它带有匆忙性质，确实把"偏离靶心"这个解释术语的全部价值发挥出来。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解释在当时无疑就是应当作出的解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消解症状的有效解释。

这意味着什么？它显然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开始清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想到：弗洛伊德作出这类解释时，面对的情境同现在的情境完全不同。

我们必须切实领会：从分析家口中说出的解释—裁决，只要严格说来属于解释，那么，这项裁决、这项作为真实而被说出、提出和给出的东西，便从未说出的东西那里获得其当时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解释是在怎样的未说背景上被提出的？

弗洛伊德向朵拉作出这些解释时，例如他告诉她，她爱 K 先生；归根到底，他直截了当地向她指出，她正常而言应当同 K 先生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里有某种令我们惊讶的东西，尤其因为我们当然根本不可能出于最充分的理由考虑这件事：朵拉最终完全不想知道任何与此有关的东西。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当时作出这种解释，是在如下背景上提出的：对主体、病人、朵拉来说，她完全没有预设弗洛伊德待在那里，是为了可以说矫正她对世界的把握，使她内在的某种东西抵达客体关系的成熟。

当时还没有任何东西形成一种可在此称作文化氛围的东西，也就是使主体期待从分析家口中听到完全不同之物的那种东西。事实上，朵拉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有人牵着她的手，弗洛伊德对她说："说吧！"这项以如此方式引导的经验之地平线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显露；唯一隐含之物来自有人让她说话这个事实本身：这里确实必定牵涉某种属于真理秩序的东西。

我们的情况远非如此。主体来到分析时，已经带着如下观念：人格、本能和客体关系的成熟，是某种已经组织好、具有规范性的东西，而分析家以某种方式代表其尺度。分析家掌握某种东西的道路与秘密；这种东西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关系网络。即便主体并不知晓全部关系，至少已经掌握其大体轮廓；至少他大体上抱有如下观念：

- 必须取得某种进展；
- 其发展中可能存在停滞…… 简言之，关于"使他本人规范化"、使其本能规范化的全部背景与全部蕴含——

你们可以把想要的一切都放进这个括号——意味着分析家介入时，是从一种

所谓判断与制裁的位置介入。还有一个更确切的词，我们稍后会指出。

无疑，这赋予其解释完全不同的分量。但是，要准确把握我谈论无意识欲望、弗洛伊德的发现时所涉之物，就必须返回那些新鲜的时期：

当时，分析家的解释除了直接侦测某件绝对封闭地呈现之物背后的某种彼岸之物，不蕴含任何东西。

这里每个人都把“意义”一词挂在嘴边。我不认为“意义”在这里不是对起初所涉之物的某种弱化。欲望这个术语，凭借它有机会在主体那里联结、汇集起来的同一之物，把全部分量赋予分析经验最初把握中遇见的东西。倘若我们要努力同时汇集自己抵达的位置，以及不仅我们的经验而且其可能性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就应当返回这里。

我的意思是，使分析成为可能的东西，也应当使我们免于落入这条斜坡、这种倾向，乃至我几乎愿称作的这个陷阱。我们自己同病人一道卷入其中，又把病人引入一种充满预设的经验，诱使他走上某条建立在若干循环论证之上的道路。我指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归根到底，可以为他的状况给出最终解决方案，使他最后——直称其名——变得同某个客体完全同一。

因此，让我们返回分析经验中所呈现的欲望之成问题性质，也就是返回症状，无论哪一种症状。我在这里以最普遍的含义使用症状，既包括

疾病症状，也包括梦以及任何可分析之物。我所谓的症状，就是可分析的东西。可以说，症状戴着面具呈现，以悖谬形式呈现：弗洛伊德所分析的最初那些癔症患者的疼痛，首先表现为某种表面上完全封闭的东西。

弗洛伊德凭借一种真正可以说受到猎犬本能启发的耐心，逐渐把它联系到这位病人长期守候在病父身旁这件事。

而且，她照料父亲时还有另一件事产生作用；弗洛伊德最初只在某种迷雾中瞥见它：她当时同一个童年朋友之间可能存在的欲望；可以说，她希望把他变成自己的丈夫。随后，某种同样以尚未充分揭露的形式呈现之物出现，也就是她同两个姐夫的关系；这两个人分别娶了她的两个姐妹，而分析使我们瞥见，他们以不同方式为她代表了某种重要之物：

- 她憎恨其中一个，因为某种我说不清的不体面、粗野和男性笨拙；
- 可以说，另一个反而似乎无限吸引着她。

事实上，这个症状似乎凝结在若干场合：她以某种间接沉思，围绕这个姐夫同她一个姐妹之间十分幸福的关系打转。我重新提起它，是为了用一个例子固定思路。

很清楚，我们当时处在分析经验的某种原始时期。经历了后来的一切经验以后，我们如今感到……弗洛伊德当然曾告诉病人，在最后这个例子中，她简单纯粹地爱上了自己的姐夫，而且症状——此时具体说是腿疼——正是围绕这个受到压抑的欲望结晶；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并知道，对一个癔症患者来说，这种说法同告诉朵拉她爱上 K 先生一样带有强加性质。

当我们接近这样一项观察时所看到、亲手触到的东西，弗洛伊德也表达过；这个视角比我向你们提出的还要高。要抵达这里，完全不必推翻弗洛伊德的观察，因为即便弗洛伊德没有这样表述、诊断和辨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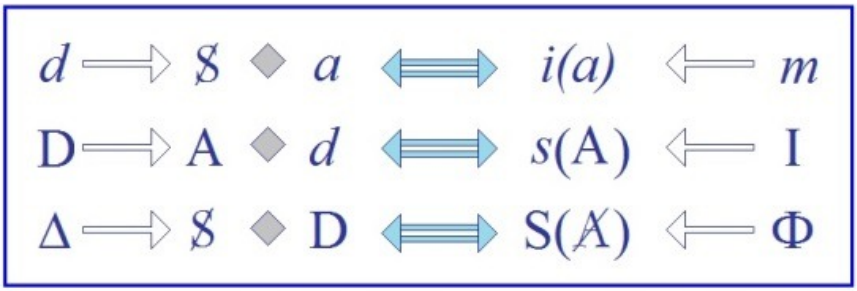
他也以最清楚的方式给出了全部要素。我会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观察之构成使这一点显露出来；它越过他在段落中表述的那些语句，以比他所说的一切都更加无限有说服力的方式显露。

因为他将突出什么？谈到伊丽莎白·冯·R　的这段经验，他将恰恰突出：按照他的说法与经验，许多病例中癔症症状的出现，同这种本身如此艰辛的经验相连——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一个病人，扮演护士角色；而尤其相连的，是

当主体面对一位亲人承担护士角色时，这项功能所取得的分量。也就是说，由于一切把照料者与被照料者联结起来的爱与激情法则，主体比任何其他时刻都更处于必须满足某种东西的位置；我们可以在这里以最强重音把这件东西称作要求。

弗洛伊德确实把主体面对向她提出之要求的完全服从、乃至自我牺牲，作为此情境被证明具有致癔性质的一项本质条件。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同他另外列举的其他癔症患者不同，在这个癔症患者那里，无论个人还是家庭方面的前史，就这个方向而言都极为模糊、并不突出；因此，这个术语在这里取得全部分量。弗洛伊德也给出了充分提示。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同这项条件相关联的东西。我把这个术语作为要求功能，孤立在这三个公式的中间一行。我们会说，所涉的某种东西正是作为这个根本位置的函数而出现……弗洛伊德在这里以某种方式受到语言必然性的带动，可以说他只有一个错误：过早地给出方向，把主体过于明确地置于、卷入这个欲望情境……首先从根本上说，所涉的是主体在一个欲望情境中产生的兴趣。

这里确实产生了一项兴趣；但我们不能说："既然她是癔症患者"——如今我们已经知道癔症患者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彻底说："无论她从哪一边把握它。"因为一旦说出"她从哪一边把握它"，就已经把她卷入可以说一种第三方关系：她是从姐妹的视角对姐夫感兴趣，还是从姐夫的视角对姐妹感兴趣？

关键恰恰在于：如今我们知道，作为癔症认同之相关项而可能留存于此的东西

是双重的。可以说，她产生兴趣，她卷入欲望情境；而这里由症状从根本上表现的正是这一点，它把我们带回面具概念。

面具概念，也就是采取这种含混形式的欲望，恰恰不允许我们相对于情境中的这个或那个客体为主体定向。主体对情境本身的这种兴趣，也就是对

欲望关系的兴趣，由出现的这件东西表达；我把它称作症状的面具要素。弗洛伊德已经指出这一点，他在这里说："症状在会谈中说话。"我始终向你们谈论的"它说话"，从弗洛伊德最初的表述开始，就已经在文本中得到表达。

后来，他说病人的肠鸣会在会谈中发出声音、开始说话，并具有言语意义。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

- 疼痛在会谈中再次出现、加剧、变得或多或少难以忍受时，本身就是主体论述的一部分；
- 他通过主体的音调与声调变化，衡量主体正在会谈中承认、放出的内容有多灼热，具有多大分量与揭示价值。

弗洛伊德依据主体在会谈中控诉自己的症状加剧到何种程度、依据其方式本身的声调变化与强度，衡量痕迹及其方向、向心方向——总而言之，也就是分析的进展。

我采用了这个例子，但同样可以采用其他例子，可以采用一个梦或某种东西作为例子：

- 它使我们能够确定症状与无意识欲望的问题位于何处；欲望本身仍是一个问号、一个 x、一个谜，而欲望本身同它所披戴之症状——也就是面具——的联系又位于何处；
- 它使我们能够归根到底表述如下事情：人们告诉我们，症状本身就是某种会说话的东西；我们可以同弗洛伊德一道说——而且从弗洛伊德最初开始就说——它会分节自己。因此，症状是某种朝欲望得到承认的方向前进的东西。

但是，在弗洛伊德到来、他身后整个弟子与分析家群体兴起以前，这个为了使欲望得到承认而存在的症状是什么？这是一种试图崭露头角、寻找道路的承认；

不过，它恰恰只通过创造我们所谓的面具——也就是某种封闭之物——才显现出来。这种对欲望的承认，是不由任何人作出的承认，也不以任何人为目标，因为在开始学会其钥匙以前，没有人能够读懂它。因此，它从根本上是一种以对大他者封闭的形式呈现的承认；是对欲望的承认，却不由任何人承认。

另一方面，倘若它是获得承认的欲望，那么，作为获得承认的欲望，它就是不同于欲望本身的另一回事。况且，人们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欲望是受到压抑的欲望。因此，我们的介入在简单阅读之上增添了某种东西。这是一个被主体排除、主体却又想让它作为获得承认的欲望得到承认的欲望。它或许仍是一个欲望，但归根到底，是一种不指向任何东西的欲望[注]：

> [注] un désir de rien 直译是“无物之欲望”。这里的 rien 不宜实体化为哲学性的“虚无”：紧接着的三个分句把它展开为不在场、被拒绝、被排除的欲望。米勒编订本保留相同措辞，并把这些限定连成一条清楚的句法链。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结构定义与悲剧经验 · 获得承认的欲望与对一项欲望的承认

- 这是一个不在场的欲望；
- 这是一个遭到拒绝的欲望；
- 这是一个遭到排除的欲望。

无意识欲望的这种双重性质，把欲望认同于它的面具，使它成为不同于任何朝向客体之物的另一种东西。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一点。它使我们能够从字面上读出，弗洛伊德谈到爱情生活的这种贬抑、这种 Erniedrigung 时，作为分析维度而呈现的那些最本质发现之定位意味着

什么。这种贬抑来自俄狄浦斯情结的根底。同样，当他谈到母亲欲望构成如下事情的原理时，我们也可以这样阅读：

对某些主体而言——人们恰恰说这些人没有放弃乱伦客体，也就是母亲——母亲欲望构成其原理。总之，他们没有充分放弃母亲；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了解到，主体从不会完全放弃她。

当然，必然有某种东西对应于这种程度不一的放弃；我们把它称作并诊断为“对母亲的固着”。弗洛伊德在这类病例中向我们呈现爱与欲望的分离。他告诉我们，这些主体面对一个完整地享有如下地位的女人时，无法设想接近她：她是一个可爱的存在、一个人类存在、一个在完整意义上已经完成、拥有并能够给予和给予自身的存在。人们告诉我们，只要客体在那里，这里就没有欲望。当然，这意味着客体戴着面具待在那里；因为这个欲望并不是朝向母亲，而是朝向据说接替母亲、占据其位置的女人。可恰恰如此：欲望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个主体会在妓女那里找到欲望。这是什么意思？当然，在这类最初探索欲望奥秘之黑暗的阶段，我们会说：“正因为妓女完全同母亲相反。”

“因为她完全同母亲相反”，这足以使主体恰恰能够把她置于从属位置吗？此后，我们对无意识的形象、幻想及其性质已经取得充分的认识进展，可以知道：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前往妓女那里寻找的，无非是古罗马在妓院门口明白雕刻、展示的东西，也就是阳具——恰恰是作为栖居在妓女身上之物的阳具。

现在我们知道，主体前往妓女那里寻找的是：

- 所有其他男人的阳具；
- 阳具本身；
- 匿名的阳具。

总而言之，这同样是某种以谜样形式存在的面具，是某种成问题的东西；它把欲望同一个拥有特权的客体相连，同某种具有如下意义的东西相连——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认识到阳具阶段的全部重要性：主体经验必须穿过这些隘口，主体才能重新接合自己的自然欲望。

简言之，谈到我们此时所谓的“母亲欲望”——它在这里是一种标签，是对我们在事实中观察到之物的象征性称呼，即欲望客体相互关联却又断裂地被提升为不可调和的两半——我们发现：在此情形中，乃至在我们的解释本身中，可以被提出为其客体的东西，就是替代性客体。女人作为母亲功能的继承者，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欲望要素、遭受了这方面的挫折；而这个欲望要素本身又同某种格外成问题的另一件东西相连，后者也以面具与标记的性质呈现。

直称其名，就是以能指的性质呈现。仿佛一旦涉及无意识欲望的关系，我们就面对一种必然机制、一次必然的分裂（Spaltung）。长期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并设想，欲望异化于同大他者的一种完全特殊的关系；它在这里呈现为不仅受到以大他者本身为中介之必要性的标记，而且在以大他者为中介的过程中，受到一个特殊能指、一个选定能指的标记。可以说，生命力量——在此也就是欲望——的行进道路必

须“附着”于这条必经之路；而这个特殊能指——在此也就是阳具——具有成问题的性质。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正停在这里。能够构想为什么我们会在

所谓“生殖器”成熟的道路上遇见这项障碍——它不只是一项障碍，而且是一条本质隘口——这一事实给我们引入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全都向我们提出同一个问题：主体必须经由相对于阳具采取的某种位置……

- 对女人而言，阳具作为欠缺；
- 对男人而言，阳具作为受到威胁之物…… 才必然实现表现为可以说最幸福出口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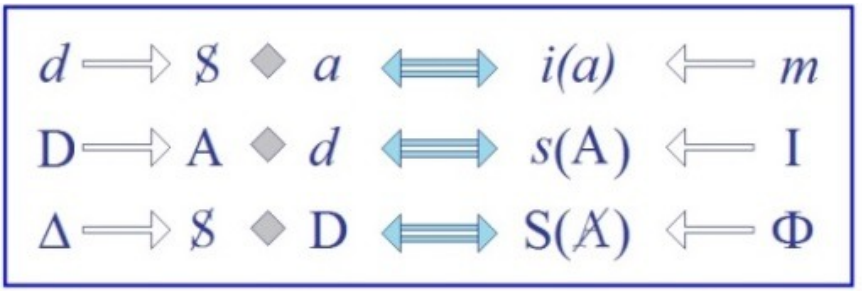
- 通过介入、命名某件东西，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总会做得比自己以为所做的更多；
- 通过解释——我刚才想告诉你们的词，那个我刚才称作授权、制裁、准许的确切词语，就是“核准”——我们把同一之物认同于同一之物，我们说：“就是这个。”

症状沿着

欲望承认的道路存在，并朝向一个“无人”；我们取代了这个“无人”。但是，我们也总在某种程度上误认想使自己得到承认的欲望，因为我们

总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指定客体；可是，它不是一个客体，它是欲望，却是对大他者中指向另一个欲望之欠缺的欲望。

这把我们引入可以说第二章，也就是我在这里通过三个公式向你们提出之物的第二行，即要求［D］这一章。




我处理并重新把握这些事情的方式，也就是我试图向你们表述分析中每时每刻所涉及的欲望之原创性的方式，并不是以关于每个人成熟程度的某种多少带有理论性的观念来监督分析。我想，你们应当开始听出：如果我谈论言说层级或无意识中字母的层级，肯定不是为了消除作为欲望的那种不可还原、不可表述之物。

我只是向你们作出一项哲学家们迄今似乎没有注意到的观察。我提到它，是因为最近某个在此受到糟糕灵感驱使的人，自以为应当指出：某些精神分析家——仿佛此时有许多人这样做——相对于

那个著名的未表述之物，过度重视语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哲学家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

这个人物的说法是：未表述之物或许并非不可表述。我把他称作“受到糟糕灵感驱使”，这已经是我想法的最低限度。我们会反过来回应如下

事情；比起试图把所有人都卷入他的同行争吵，他最好留意这一点：某件东西——也就是欲望——并非可分节表达的，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得到分节。

我的意思是，只要欲望同人那里的能指在场相连，它本身就已经得到分节；然而，恰恰因为所涉从根本上是同能指的这项联系，这并不意味着——

甚至远非如此；恰恰相反，这正是如下事情的理由——在某个特殊病例中，

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分节表达。

现在，让我们返回要求［D］这第二章。在这里，我们处在得到分节而可以分节表达的东西中，处在当前得到分节的东西中。此刻所涉的正是欲望与要求之间的这项联系；

而我们今天不会走完这段论述。不过，下次我想向你们展示：在欲望与要求这两项之间，以及我们刚才在这种欲望中指认为从根本上属于戴着面具的欲望的那些悖论之间，事情如何得到分节。

无疑，我们只有经由某项要求才能接近欲望，因为病人一旦接近我们、来到我们这里，就是要向我们要求某种东西。而我们仅仅对他说：“我们听着”，就已经

在投入程度与情境的明确性上走得极远。

因此，这里应当重新从所谓要求的前提出发……

- 从使要求叠加于要求之上的东西出发；
- 从构成要求情境的东西出发；
- 从要求在个人生命内部得以投入的方式出发。

在这里，必须返回起初设立要求的东西。我不会重讲“Fort！——Da！”的辩证过程。要求首先并且首要地同某种处在语言自身前提中的东西相连，也就是同呼唤的存在相连。呼唤既是在场的原则，又是使人能够把在场推开的词项；这是在场与缺席的游戏。它把

呼唤客体的最初分节，变成某种使客体已经不只是象征客体的东西：客体成为对在场的欲望使之成为的东西，而不是人们所谓的一个客体。

最初的辩证过程不是母亲—乳房、母亲—食物或母亲—完整客体这类部分客体，仿佛所涉的是一种逐步取得的征服：婴儿发现乳房延伸为腋窝、颈部和头发。

这里所涉的客体，是把这种在场括起来的象征括号；它内部包含在场可能带来之全部客体的总和，因而使这个象征括号从一开始就比任何财物都更加珍贵。

它所包含的任何一件财物，都不可能独自满足对在场的呼唤。正如我已经多次向你们表述的，每件特定财物只能用来——而且有时确实用来——可以说压垮这项呼唤的原则：儿童也许吃饱了，开始睡觉。此

刻当然不再有呼唤。同母亲在场之内部任何所谓部分客体的一切关系，在这里只是替代物，是对欲望的压垮，而不是满足本身。

因此，只要客体是呼唤的客体，它在这里的这种象征化就具有首要性质。我们已经阅读过如下事实，而它从一开始便标出了这一点；但一如往常，我们不懂得把所读之物的后果推演到底：在客体、在这里所涉的客体中，

在在场的客体中，面具维度已经出现。

我们的好朋友斯皮茨先生带给我们的，不正是这一点吗?

首先得到辨认的，是这种直接正面的框架、这副面具；还包括作为象征化在场之特征的彼岸性质，也就是越过这种在场进行寻找——因为它戴着面具、形成症状、得到象征化。儿童通过自己的行为向我们表明，

他拥有这种彼岸的维度。只需同儿童游戏——我曾在另一个问题上谈到儿童面对面具时非常特殊的反应，也已经告诉过你们——就能看到摘下面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欣喜；也能看到面具下出现另一副面具时，面具下面所发生之事具有怎样格外焦虑的性质。因为此时，他不再笑了。

不过，我们甚至不必从事这类小练习；只需观察儿童，就能发现先于言语的交流、最初的交流。只有从未简单观察过儿童出生头几个月的发展，才会注意不到，真正作为交流的最初交流——也就是同你在儿童面前作为象征化在场之彼岸的交流——就是笑。在任何言语以前，

儿童就会笑。当然，笑同微笑与放松相连，笑的全部生理机制也始终同某种满足相连。

人们曾为此谈到吃饱儿童的微笑；但是，儿童向你发笑时，当然是在同其欲望满足的某种关系中发笑，却又是在这项满足之后与彼岸发笑。只要他仍在场并醒着，笑就朝向这种在场的彼岸；这种在场能够满足他，内含对其欲望的应允。熟悉的在场——他已经习惯、已经认识，而且能够满足其多样欲望的在场——

便以儿童先于言语的最初笑声这种极为独特、特殊的方式受到呼唤、把握与辨认；这些笑声出现在某些照料他、喂养他、回应他的在场者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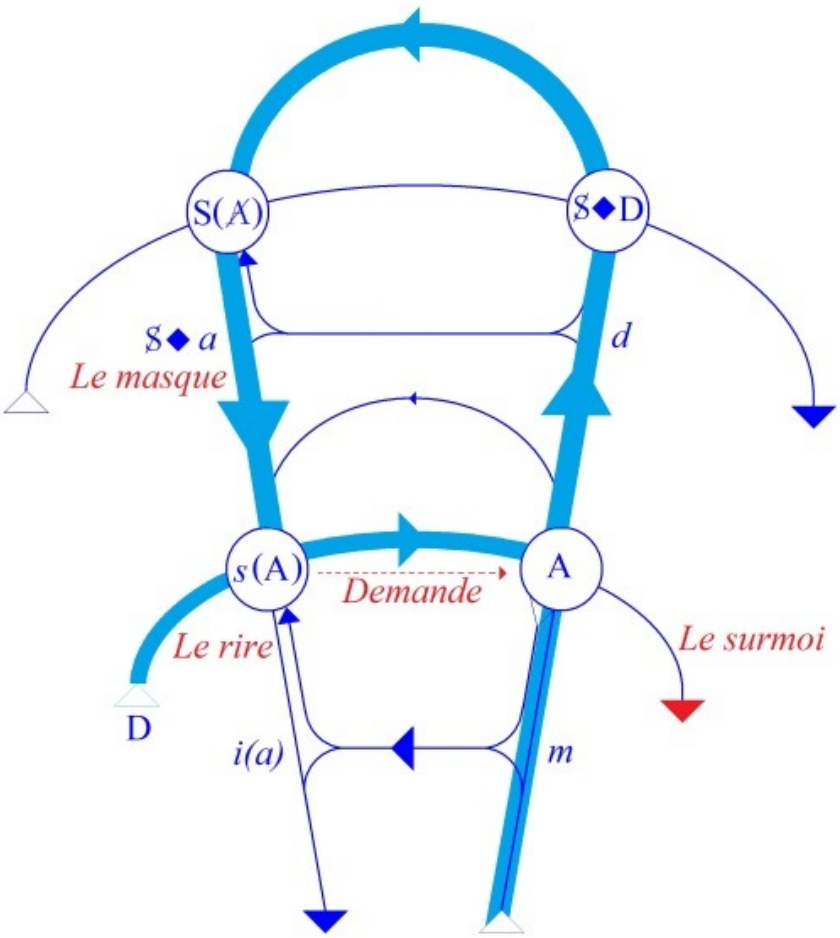
笑也回应母亲的所有这些游戏；它们是给儿童带来声调变化与分节本身的最初练习。正因为笑同我在本学年最初几次讲座的全部表述中所谓的诙谐相连，它就是彼岸——直接之物的彼岸、一切要求的彼岸。欲望严格说来同一个能指——此时是在场的能指——相连；最初的笑声正是朝向这种在场的彼岸、朝向后面的那个主体。

于是，可以说，我们从这个时刻、从起源处，就找到了认同的根源。随着儿童发展，认同会先后同这个或那个人发生——首先同母亲，随后同父亲。我不是说这一步穷尽了问题，而是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根源。

认同非常准确地就是这种笑的相关项，因为笑的反面当然不是哭。哭表达腹痛、表达需要；哭不是交流，哭是一种表达。

但是笑——因为我不得不表述为什么——是一种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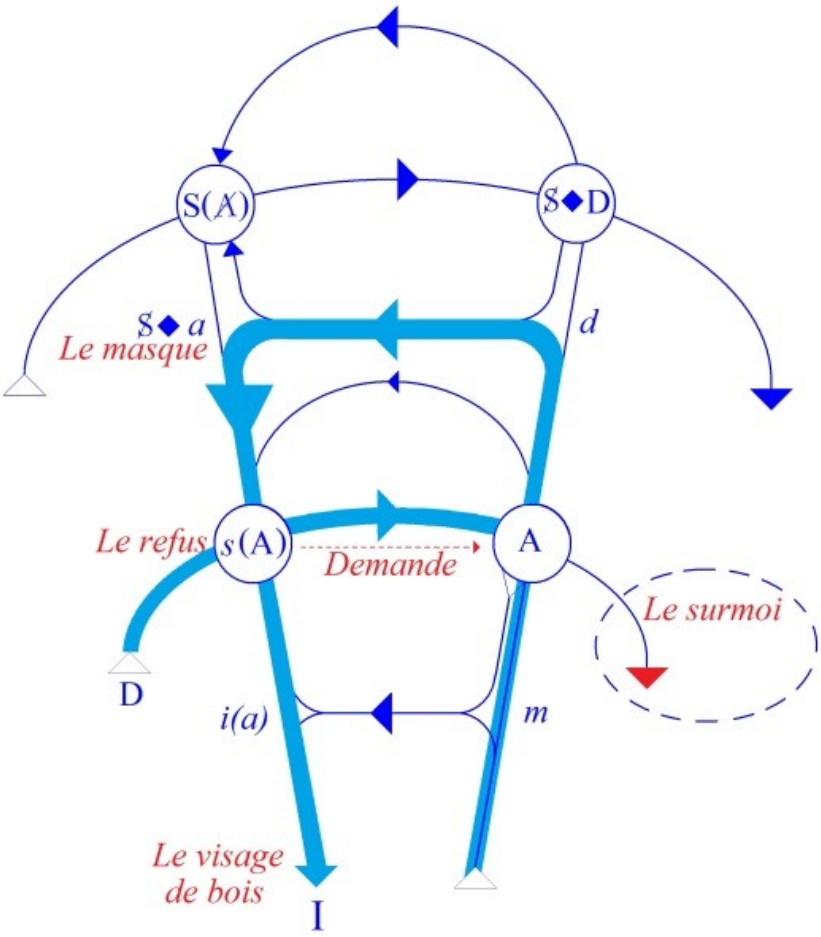
那么，什么对应于笑的反面？笑确认、交流并朝向某个存在；他越过这个被表明的在场，是快乐与认同的动力和来源。它的反面是：人不再笑，像教皇或爸爸一样严肃，若无其事；因为待在那里的人给你一张木头脸，因为现在无疑不是发笑的时候。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因为需要在此刻不应得到满足。正如人们所说，欲望按照那个掌握满足欲望之权力者来塑形；他同所谓现实的阻力相对立——现实或许并不完全是人们所说的那样，但它无疑在这里以某种形式、从要求的这种辩证过程一开始便呈现出来。




按照我的旧图式，我们看到所涉之事发生于要求在这里顺利抵达港口，也就是越过面具，不是遇见满足，而是遇见这种在场的讯息［s(A)］之时；主体由此表明，自己面前确实有一切财物的来源：笑声在这里爆发。过程也无须在此继续向前。

不过，它可能必须继续向前，因为面孔显出一张木头脸，因为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处在这种需要与欲望起源处的东西，在这里以转化的形式出现。木头脸转移到回路中，来到这里；我们恰恰在这个位置遇见他者形象［i(a)］并非偶然，称作自我理想［I］的要求转化也在这里发生。与此同时，在这里的能指线上，称作禁令与超我之物的原理与位置开始形成；它作为来自大他者、就此得到分节之物。分析理论始终很难调和自我理想与超我的存在、共存及共同维度；不过，它们无疑对应于

不同的形成物与产物。


S(Ⱥ)
$◆D
$◆ a
Le masque
d
Le refus
s(A)
Demande
A
Le surmoi
D
i(a)
m
Le visage
de bois
I

只需对需要和要求这项需要的言说作出本质区分，就能理解这两种产物如何既处在共同维度、又彼此不同：

- 超我在能指分节之线［A ⁀› S］——也就是禁令——上得到表述，即便采取其最原始的形式；

- 自我理想则产生于欲望转化之线［d ⁀› S ◊ a］，因为欲望始终同某副面具相连。

换句话说，在要求中，满足同面具相连；二者的对立使面具在不满足中、经由遭到拒绝的要求而构成。今天我想把你们带到的就是这一点。不过，由此会产生什么？归根到底，是否有多少种不满足形式，就有多少副面具？是的，事情正以这种方式呈现。以此为准，你们可以有把握地在心理维度中为自己定向；它从某些主体如此鲜明的挫折出发展开。

你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陈述中发现不满足与面具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有多少种不满足，就有多少副面具。主体按照自身不满足的多样性，同大他者发生多重关系；这确实提出一个问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把每种人格变成一种不断变动的认同镶嵌画。

我会说，恰恰是第三维度的介入回应这个问题。我今天将把它留在一边，留待下次处理。引入它的不是所谓生殖器成熟，不是赠予，不是

忘我性，也不是其他属于问题次要特征的道德化废话；相反，从某个时刻开始，确实有一个欲望介入：

- 一个不是需要、而是Ἔρως［爱欲］的欲望；
- 一个不是自体情欲的、而是所谓他体情欲的欲望；因为这些说法准确表达了同一件事。

不过，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因为事实上，这种生殖器成熟本身并不足以带来决定性的主体重组，使我们得以把握欲望与面具之间的联系。

下次，我们会看到把这个阶段同一个占据优势、拥有特权的能指相连的本质特征与条件。我们称它为阳具，并非偶然；那是因为具体而言，它就是这个能指。我们还会悖谬地看到，正是在这个阶段，某种东西同时得以实现：它使主体能够穿过自身面具的多样性，重新找到自己是“一个”；

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主体从根本上分裂，从根本上受到一种本质分裂（Spaltung）的标记；这项分裂处在如下二者之间：

- 主体内在属于欲望的东西；
- 属于面具的东西。

# 第19课 · 1958年4月23日

所要做的是继续深化欲望与要求的区分。我们认为，这项区分对正确进行分析至关重要；缺少它，分析便会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实践性推测，奠基于一边的挫折和另一边的满足。这两个术语在我们看来构成分析道路的一种真正偏离。因此，所要做的是沿着我们已经命名的某种东西继续前进：欲望同要求之间的距离。

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次分裂（Spaltung）。我不是随意使用这个词；弗洛伊德最后一篇著作即便没有引入它，至少也强烈强调了它。可以说，弗洛伊德写到一半时，笔从手中落下，因为死亡径直把笔夺走了。

这次自我分裂（Ichspaltung），确实是弗洛伊德最后思考汇聚的点——我们不能说它把他带到这里或带回这里，因为我们只留下其中一个片段，也就是《全集》第 17 卷中的寥寥数页。你们应当阅读它，让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你们心中唤起弗洛伊德思想的在场。你们同样会看到，他何等有力地强调：涉及精神分析的 Ich［自我］时，自我的综合功能远非一切。

让我们重新把握上次所说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唯有向前走三步、

向后退两步，每次重新出发、争取一小步，才能取得进展。我会相当迅速地提醒你们，上次谈到一边的欲望与另一边的要求时，我所坚持的东西。就欲望而言，我强调它同面具相连、不可分离的性质；我特

别通过提醒你们如下事情来说明：把症状简单区分为外表之下的一个底层，未免操之过急。

我向你们谈过病人伊丽莎白·冯·R。归根到底，我曾告诉你们，只要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我们就能说——而弗洛伊德也这样说、这样表述：

- 她右大腿上部的疼痛，就是她对父亲的欲望和对童年朋友的欲望；
- 每当她在病史中唤起如下时刻，疼痛就出现：她完全受制于父亲的欲望与父亲的要求，而她的童年朋友之欲望又在边缘处勉强实行这项闯入；她责备自己竟然对它加以考虑；
- 她左大腿的疼痛，则是对两个姐夫的欲望；其中一个代表良好的男性欲望，也就是娶了她最小妹妹的人；另一个则代表坏的欲望，而且这些女士全都把后者视为一个非常糟糕的男人。

越过这项观察，在理解我们对欲望的解释意味着什么以前，必须懂得把握：在症状中——这就是“转换”的含义——欲望同作为其身体表现的东西同一，既是它的正面，也是它的反面。另一方面，我引入了欲望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取得进展，那是因为事情只是以问题形式得到引入——因为分析向我们展示，欲望由一项意指行为决定。然而，欲望由一项意指行为决定，绝不完整交付其意义。可以说，欲望也许是这项意指行为的副产品。

我曾向你们引述一些真正引入倒错问题的文章。在其中一篇里，

倒错也被呈现为一个症状，而不是简单纯粹地表现一个

代表我们的无意识欲望。这篇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文章，代表作者们意识到倒错中同症状中一样存在 Verdrängung［压抑］的时刻。文章讨论一个神经症主体的病例；作者[注1]在如下事实上停下来：主体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成功完成首次性交以后——这并不是说后来的其他事情不会令人满意——紧接着这次性交，便作出一个谜样行为；它事实上在其一生中仅此一次。

> [注1] 奥托·兰克：《倒错与神经症》（1923），《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4 卷，第 270—292 页；亦见《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第 8 卷第 4 期。

他从给予自己恩惠的女人那里返回家中时，完成了一次格外成功的暴露行为——我想，我在某次研讨班中已经暗示过它。说它格外成功，是因为它以最大程度的完整性、同时也以最大程度的安全性完成：他在铁路路堤旁脱下裤子暴露自己；借助经过列车的灯光，他就这样向一整群人暴露，却当然没有冒任何风险。作者在主体神经症的整体经济中，以一种多少还算成功的方式解释了这项行为。

我甚至不会在这个方向上展开，而要停在如下事情上：对分析家而言，这是一项所谓具有意指性的行为，无疑如此。

但它具有何种意义？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他仍然拥有它吗？

我再告诉你们一遍：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交合。

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他仍把它置于所有人面前供其支配，也就是它已经成为私人财产吗？

可以说，他通过展示它想做什么？他想在展示之际消隐到自己所展示的东西背后，只剩下阳具吗？

这一切同样都有可能，甚至可以同时处在同一项行为与同一个主体语境内。不过，这里首先显得极为重要、值得强调的事情——我会说它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重要，而且病人的说法、观察的语境以及事情的后续都充分突出并确认这一点——是首次性交完全令人满意。

在任何其他解释以前，所涉行为首先表明的是：他的满足已经取得、已经实现。这项行为指示了满足彼岸仍留待欲望的东西。我只是重提这个小例子，用来固定我谈论欲望问题时的想法：欲望由意指行为决定，而这不同于任何可以把握的意义。我还想借此提醒你们，并在上次所说之上补充一点：这类考虑展示了欲望同掩蔽它的症状、同其表现中出现之物的深刻连贯与融合。

它会把人们总围绕癔症提出的许多徒劳问题放回恰当位置；而尤其还会把各类社会学、民族志及其他事实中的徒劳问题放回原处，因为人们在这些问题周围总会手忙脚乱。让我们举个例子：普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人”的小丛书，最近其中一册很出色的小书问世了，就是米歇尔·莱里斯[注2]的著作，

> [注2]　米歇尔·莱里斯：《埃塞俄比亚贡德尔人的附身及其戏剧性面向》，普隆出版社，1958 年；或梧桐出版社，1980 年版。

讨论附身效应以及附身的戏剧性面向；他围绕自己在埃塞俄比亚贡德尔人中的经验展开这些问题。

阅读这本出色的小书，我们会清楚看到，具有无可争辩之一致性的恍惚事实，怎样同某种在外部得到类型化、决定、期待、预先定位的性质相互结合、完全融合；

这种性质已经为据称攫取那些人物主体性的“精灵”所知，而这些人物会显出所谓萨满教仪式所观察的全部奇特表现——这正是所指地区涉及的事情。

而且，不仅是这种约定俗成的成分可以在这个或那个精灵的化身表现中受到观察、显现并重现。这些表现本身还具有可以训练的性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可以训练，以至于主体把它感受为对那些精灵的驯练，尽管精灵才是据称攫取他们的存在。

可是，事情发生逆转：这些精灵已经学会规矩行事。附身现象

包含了有力铭刻于情感中的一切现象，包含一整套感人场面；

主体在表现持续期间完全受到附身。它同这种联系于神或精灵徽记的全部丰富性完全相容。只有以完全人为的方式，才会把它变成一种问题，试图用模拟、模仿或其他这类术语把它纳入我们的思维方式。欲望表现同其形式的同一性，在这里完全可以触知。

这项辩证过程、这个欲望问题所铭刻的另一个点、另一个词项，是我上次反过来坚持的东西，也就是：

欲望相对于一切满足的这种离心性；

它使我们能够理解，欲望总体上为何同痛苦具有深刻亲缘性。

也就是说，在极限上，欲望简单纯粹地毗邻的东西——不再是在其发展形式、戴着面具的形式中，而是在其简单纯粹的形式中——就是这种生存之痛；它代表另一极，代表其表现向我们呈现于其中的空间，总而言之，代表区域。

通过这样描述我所谓的欲望区域、描述它相对于满足的离心性，我当然不是想解决问题：这里给出的不是解释，

而是问题的安置；我们今天恰恰必须向其中推进。

另一方面，我要提醒你们上次提出之对立的双联画另一面：它同认同功能、理想化功能的性质相连；这项功能依赖要求的辩证过程。发生在这个领域的一切认同，都奠基于同能指的某种关系，奠基于能指大他者；就整体而言、并就要求而言，这个大他者被刻画为大他者在场的标志。

这里也建立了某种必然同欲望问题相关的东西，也就是：

- 这种在场标志如何开始支配这项在场所带来的满足；
- 什么使人类从根本上如此广泛、如此恒常地以言语为报偿；同更为实质性的满足相比，言语至少也占有显著而分量十足的比例。

这只是提醒你们同我刚才所说相关的根本特征。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只有人类才以言语为报偿？这里还要作一段补充上次内容的插话：并不只是人类以言语为报偿。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某些家畜——而且并不排除这样认为——会从人类言说中获得某种满足。我无须在这里唤起例子，但我们甚至了解到一些奇怪的事情。看来，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那些被人们多少还算恰当地称作专家的人所说的话。据说，为了获利、也就是从皮毛中取得收益而遭到圈养的水貂，如果没有人同它们交谈，就会萎

靡不振，只能给毛皮商提供品质相当普通的产品。看来，这会增加间接费用，使水貂养殖变得非常昂贵。

因此，无论如何，某种东西似乎在那里显现；我们也没有办法进一步进入它的问题。不过，它无疑同遭到圈养这个事实本身相关，因为从一切表象来看，除非获得进一步信息，野生水貂不可能遇见这类满足。总而言之，我只是想向你们指出，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可以在哪种关系与方向中看待条件反射的巴甫洛夫研究。

归根到底，什么是条件反射？

在最常见、占据绝大多数实验的形式中，条件反射就是对某个多少预先决定、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循环进行干预。研究者用所有那些小电信号、小铃、小钟把可怜的动物吵得头昏脑涨，使它们听令分泌各种生理产物、分泌胃液；这些东西毕竟都是能指，除此无他。

它们由某些存在——至少是实验者——制造；对这些存在而言，世界十分明确地由若干客观关系构成，而我们可以正当地单独分离为严格意义上能指的东西，又构成这个世界的重要部分。况且，所有这些东西之所以得到构造和炮制，是为了展示：心理进展可以通过怎样的逐步替代道路来构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如此训练有素的动物，是否等于被教会了某种语言？

还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这一点；恰恰是这次跳跃并未发生。当巴甫洛夫理论开始考察语言在人那里造成的事情时，他或它——

巴甫洛夫或该理论——非常正确地选择了如下说法：就语言而言，所涉的不是条件反射中运作的意指系统之延伸，而是第二套意指系统；

这就隐含地承认——理论中或许没有得到充分表述——二者包含某种不同之物。至于不同之处，我们会说，可以尝试界定这种区别、这种差异：它必须位于我们所谓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因为这个关系构成一个统一而具有能指性的系统之场所。或者我们还会说，这套信号论述所欠缺的是对有关主体——也就是动物——而言的连接链。

归根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件能够简单表述的事情说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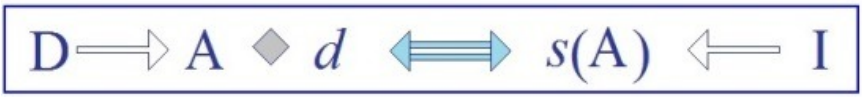
无论这些实验推进得多远，其中没有发现——也许根本不打算发现——的东西，就是使这些参与运作的能指得到安排的法则。换句话说，也就是动物最终会服从的法则。事实上，非常清楚的是，这里没有丝毫参照这类法则的痕迹，也就是没有任何信号彼岸之物；从已经建立的一小串信号中，看不出任何法则化的外推。正因如此，可以说人们未能设立法则。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意味着动物没有大写 A 的大他者维度；而是没有任何东西真正作为论述在其内部得到分节。

因此，如果概括主体同大他者中的能指之关系所涉及的事情，也就是要求辩证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抵达的是能指从根本上的如下特征：

不是像条件反射那样，能指作为某种东西替代主体的需要；而是能指本身能够替代自身，从根本上具有替代性质。

我们正沿着这个方向看到重要之物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能指在大他者中占据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方向看到显露的，就是我在这里以各种方式试图表述为能指结构之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拓扑空间——若不说排印空间——它恰恰构成能指的替代法则：位置的这种编号、这些编号位置，赋予一个能指系统本身以根本结构。主体正是相对于一个

如此重新找到并处在大他者位置的世界，使自己在其内部呈现出来；于是，经验突出显示的、称作认同的某种东西才会产生。在满足欠缺之处，主体认同于那个能够进入要求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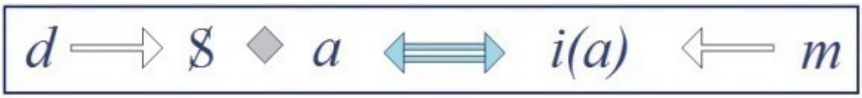



上次，我把你们留在这里，并提出问题：

- 那么，为什么不出现最大程度多元的认同？
- 有多少个未满足的要求，就有多少种认同？
- 有多少个在主体面前呈现为回应或不回应要求的他者，就有多少种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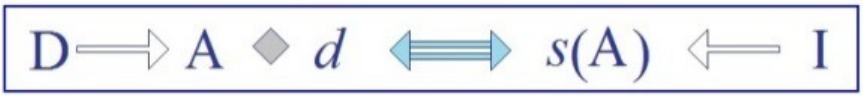
这种距离、这种分裂（Spaltung）的钥匙，反映在我今天第一次放到黑板上的这个小图式构造中。我们应当在我已经向你们重复过两次的三条线中重新找到它。我想，你们的笔记里已经有了，但我可以再提醒你们，也就是：

1）




这一行把一边欲望的小写 d，经由这项主体同小写 a 的关系［S ◊ a］，同 a 的形象［i(a)］以及 m——也就是自我——联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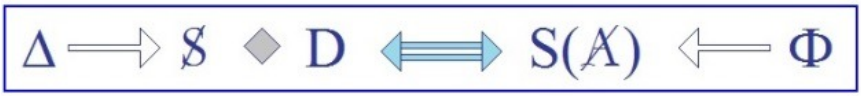
2）




第二行确切地表现要求：它从要求通向认同，途中经过大他者相对于欲望的位置。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看到大他者得到分解，因为欲望处在它的彼岸；这一行还经过 A 的所指［s(A)］。在这个层面，它会被放在这里——我指图式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上次为你们画出的阶段——对应于如下事实：它［大他者］只回应要求。由于我们将在第二步寻找的某种东西，这项关系继而会以一种并不简单而是双重的方式发生分裂——我已经沿其他道路作了铺垫——分裂为两条能指链。第一条就在这里；在要求层面，它单独而简单地存在，是一条要求必须穿过才能显露的能指链。

另一种东西将会介入，使这项能指关系加倍。对于能指关系的这种加倍，你们可以在许多可能当中——当然绝非以单义方式——像迄今所做的那样，把它认作母亲的回应。下方的线［2］表现归根到底在要求层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母亲的回应独自构成法则的层面；换句话说，它使主体服从母亲的任意性。

3)




最后，另一行［3］表现另一个层级的介入；它对应父亲的在场，以及这个层级越过母亲而使自身作用得到感知的种种方式。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一切确实只是妈妈与爸爸的问题，我很难看出，我们如何能够至少说明自己处理的那些事实。

因此，我们现在将进入这种分裂（Spaltung）的问题；它简单纯粹地同造成欲望与要求之间这道裂隙、造成二者之间这种不一致的东西同一，也就是欲望与要求之间所建立的分歧与分叉。正因如此，我们还必须再次返回、重新提出能指是什么的问题。

我知道，每次我们分别时，你们都会问自己：归根到底，他究竟可能想说什么？你们这样问是对的，因为事情当然不是就此说定，也不是一望便知。让我们在基本层面重新把握能指是什么的问题。我建议你们让自己的思想停在若干观察上。

例如，你们是否认为，我们至少触及了某种……我不知道该给你们什么例子，也许可以围绕它谈论涌现？如果我们注意到如下事实的特殊性：不是一条痕迹，因为痕迹是一道印迹，不是能指；不过，我们确实感觉到二者可能存在关系。事实上，所谓能指材料始终多少具有痕迹那种消逝性质。这似乎是这种能指材料的一项存在条件。

然而，这仍然不是能指：即便鲁滨逊在岛上散步时发现了星期五的脚印，它也不是能指。

相关知识卡 鲁滨逊的脚印：从标志、痕迹到能指

反过来，假定鲁滨逊自己出于某个理由抹去这道痕迹，我们就明确引入了能指维度。从痕迹被抹去、抹去它具有意义之时起，作为痕迹的某种东西才明显构成为能指。事实上，我们看到，能指在这里若是一个模槽，那是因为它见证过去的在场。反过来说，在具有能指性的东西中，在作为充分展开之能指的言说中，始终存在一次经过，也就是某种处在所有得到分节而本性短暂、消逝的要素彼岸之物。从一个要

素向另一个要素的这次“经过”，构成我们所谓能指链的本质；而这次作为消逝之物的“经过”本身，就形成声音。

相关知识卡 鲁滨逊的脚印：从标志、痕迹到能指

我甚至不说“能指分节”：它也许是某种始终谜样的分节；但是，支撑它的是声音。同样是在这个层面，某种东西涌现，回应我们最初关于能指的指称：它见证一个已经过去的在场。

反过来，在一项当前的“经过”中，显现的是某种加深它、处在其彼岸并使之成为声音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的，仍然是抹除之后留下的东西——只要存在一段文本，也就是只要这个能指铭刻在其他能指之间——留下的东西

就是它遭到抹除的位置；恰恰也是这个位置支撑传递，它是如下事情得以发生的本质之物：

在经过中彼此接续的东西取得“声音”的一致性。

我们实际上只处在涌现的层面和时刻，但这是一个必须把握的本质点。能指本身是某种可以被抹除、只留下“自己位置”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再也无法找回它。这项属性至关重要，并且意味着，我们可以谈论涌现，却不能谈论发展。事实上，能指自身已经内含它。我的意思是，能指的根本维度之一，就是能够自我取消。

为此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们此时可以把它称作能指自身的“样态”；

它通过某种十分简单、人人都熟悉的东西得到物质化；我们不能让使用上的平常性向自己掩盖其原创性：这就是横杠。一切种类的能指，按其本性都是可以被划杠的东西。

自从有哲学家从事思考以来，人们就大量谈论 Aufhebung，也学会多少巧妙地使用它。这个词既意味着取消——而且这正是它的基本含义，例如："我取消一份报纸订阅，或者取消某处的预订"——又凭借一项使它在德语中十分珍贵的意义含混，意味着"提升到一种能力、一个更高位置"。

人们似乎没有充分停在如下事情上：严格说来，能够被取消的只有一种东西——粗略地说，就是能指。因为事实上，当我们取消任何其他东西——无论属于想象界还是实在界——那只是因为严格而言，我们这样做时以及通过这样做，不只取消所涉之物，而且把它提升到能指的等级与资格。

因此，在能指内部——在其链条、运作和操纵中——总有某种东西

能够罢黜它的功能——无论在同一行还是同一血统中；横杠是私生的标志——能够凭借我们所谓一般考虑这项严格意义上的能指功能，罢黜作为能指的它。

我的意思是，在作为某种可用标志系统的既定能指组中，

并且在一项当前而具体的论述中，能指从由其位置构成的功能中坠落；

我已经把它从能指施于世界、为世界加上标点时所设立的这种考虑或星座中拔出。它由此从考虑（considération）坠入去考虑（désidération），也就是被如下事情标记的位置：它留下某种有待欲望之物。

我不是为了好玩才玩文字游戏；我只是想通过这种用词，向你们指出一个方向。沿着它，我们接近能指操纵同我们的客体——也就是欲望——之间的联系。考虑同由能指横杠标记的去考虑之间的对立，当然只是为了在这里指出一个方向、一个开端。

当然，这并没有解决欲望问题。无论拉丁语“欲望”一词的词源中这两项结合，可以进入怎样的经济［desiderare：为某人或某物的缺席感到惋惜。（布洛赫—瓦尔特堡）］，严格说来，仍只有当能指呈现为遭到取消、受到横杠标记之物时，我们才握有可以称作象征功能产物的东西；它之所以是产物，恰恰因为得到孤立，同一般能指链以及该链设立的声音相区别。

只有从能够被划杠的时刻起，任意一个能指才拥有自己的特有地位；也就是说，它进入如下维度：任何能指原则上都……为了把我这里所谓的“取消”同其他含义区分开，这项取消如此本质……弗洛伊德在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使用过这个术语，却似乎没有人想到前去定位；如果是弗洛伊德使用“取消”，它就具有不同回响……原则上，任何能指都是可以撤销的。

那么，作出这些观察以后，结果就是：对于一切不属于能指的东西——此时尤其是实在界——横杠成为把它提升到能指尊严的最可靠、最短捷方式之一。

我已经在谈到挨打儿童的幻想时，以极其确切的方式向你们指出了这一点；

我曾向你们指出，在这个幻想演变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弗洛伊德指出必须加以重构，而且除非间接地、在极少数例外病例中，否则从不被察觉的阶段——第一阶段的那个标志原本表示受憎恨兄弟遭到贬抑，也就是他被父亲殴打；到了第二阶段，当所涉的是主体本人时，它反而成为主体受到爱的标志：主体确实因为挨打而进入爱的秩序、进入被爱的状态。

鉴于这项行为在两个阶段之间发生了意义改变，这毕竟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严格说来，只有在如下情形下才可以构想：同一项行为——

- 当所涉的是他者时，被理解为虐待，并由主体知觉为他者不受爱的标志；

- 当主体在自己相对于他者之位置的某个时刻成为其载体时，这项行为便获得本质价值与能指功能。正因为主体本人发现自己被提升到能指主体的这种尊严，他此刻才在其积极领域、开创性领域中得到把握。严格说来，这项行为把他设立为一个可以涉及爱之问题的主体。

弗洛伊德正是这样表达的——必须始终返回弗洛伊德的句子，它们永远都斩钉截铁——

他在《两性解剖差异的若干心理后果》中说：

“此时挨打的儿童，在爱的层面成为受到爱、受到珍视的人。”

恰恰是在这个时刻，也就是在我向你们谈论的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引入一项只是在《一个孩子挨打》中隐含的观察。我已经通过分析文本开始指出它，而弗洛伊德在这里逐字表述出来。他完全没有说明理由，只是凭借自己那种惊人的嗅觉为它定向；而在这项

对欲望彼岸之承认的辩证过程中，问题的全部关键都在这种嗅觉。他说：

“‘一个孩子挨打’这种单调形式中读得出的极端特殊之固定性，很可能只容许一种意指：在那里挨打的儿童，因此受到珍视。”

这项研究讨论的是小女孩，而弗洛伊德正是在这种 Starrheit 中认出这一点。这个词很难译成法语，因为它在德语中具有含混含义，既表示凝视那样的固定，又表示僵硬。二者并非绝对相关，尽管这里发生了两种含义的交叠：它们在历史上具有类同，而此处所涉的恰恰是这一点。我们看到某种东西在这里显露；我已经向你们标出当前有待解开之结的位置，也就是如下三者之间的关系：

- 主体本身；
- 作为成问题客体的阳具；
- 横杠从根本上具有的能指功能，只要它在挨打儿童的幻想中参与运作。

为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在如此多方面都确实留下许多有待欲望之物的阴蒂。所要看的是，它为什么在这里处于如此含混的位置，以至

于归根到底，弗洛伊德即便在此处受到殴打之物中认出它，主体自己反而没有这样认出它。所涉的是阳具：

- 只要它在主体发展的经济中占据某个位置；
- 只要它是这种主体构造不可或缺的支撑；
- 只要它围绕阉割情结与阴茎嫉羡旋转。

现在，所要看的是，它怎样在这项关系、这次攫取、能指对主体的这次掌握中参与运作；或者反过来说，所涉的这套能指结构——我刚刚提醒了它的一项本质要素——怎样参与运作。为此，归根到底，我们应当停下来片刻，考察这种阳具能够以何种方式得到看待：

- 为什么人们谈论阳具，而不简单纯粹地谈论阴茎？
- 况且，我们实际上为什么看到的是另一种东西，又以何种方式使阳具介入？阴茎以多少令人满意的方式补充阳具，则是另一件事；对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都是如此。
- 还有：在此情形下，阴蒂以何种程度牵涉我们可以称作“阳具的经济功能”的东西？

让我们观察阳具、希腊语 φαλλός［phallos］在起源处是什么。我们首次在古希腊得到文本证据；如果前往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等人不同地方的文本中寻找，就会首先看到，φαλλός［phallos］完全不等同于作为身体附属物、延伸、肢体、可以说正在发挥作用之器官的那个器官。

φαλλός 在绝大多数用法中指一种拟像、一项徽记[注]；

> [注] Staferla 在 insigne 后以方括号补入 [fallace]；J.L. 速记稿与米勒编订本都只作 un simulacre, un insigne，没有这一补词。由于它既无这两版支持，又会把“徽记”误导成“虚假”，译文不将其纳入正文。

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呈现：

- 无论是一根顶端悬挂男性器官的棍子；
- 还是男性器官的仿制品；
- 还是一块木头、一块皮革，或者它所采取的各类其他形式……

它是某种替代性客体；与此同时，这种替代还具有一项属性：

它同我们刚才理解的替代、同标志—替代有很大不同。

可以说，这个客体几乎具有实在替代物的全部特征，也就是我们在带荤的笑话里总多少带着一点笑意称作“假阳具”（godemiché）的东西[注]；它可以说是人类制造品中因其“难以找到”而最奇特的客体之一。

> [注] J.L. 速记稿与 Staferla 在 nous appelons（“我们称作”）之后都有明显缺文，句法在这里中断。米勒编订本补作 un godemiché, de gaude mihi：godemiché 指假阳具，拉丁语 gaude mihi 意为“使我欢悦”。CNRTL 的词源条目指出，后一拆解属于民间词源的次生影响，并非该词最可信的历史词源。译文据米勒本补出缺词，同时保留这一校勘边界。

无论就它的存在还是就它的可能性本身而言，我们毕竟不能不考虑这种东西。

希腊语 ὄλισβος［olisbos，假阴茎］经常同 φαλλός 混淆。简言之，这个客体的层级格外奇特；对古人而言，它毫无疑问在秘仪中发挥某种作用。可以说，最后的面纱就环绕这个客体放置——而且看来如此严密，以至于入门仪式会揭开它们；也就是说，在意义揭示中，它被视为具有最终意指性质的客体。这是非常醒目的。

这一切难道没有把我们引向所涉之事吗？归根到底，就是阳具本身这种占据优势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它作为最明显形式之欲望的代表。我要逐项把它同我谈论能指时所说的事情对立起来：能指从根本上是“引入世界之充实中的空洞”。

反过来说，在 φαλλός 中显现的，是生命以最纯粹方式作为肿胀、作为冲力显现的东西。我们清楚感到，φαλλός 的形象处在我们作为术语操纵的一切之根底；例如，德语术语 Trieb

正因如此才能用法语 pulsion［驱力］来翻译。

可以说，这是生命世界中拥有特权的客体；况且，它的希腊语名称同“流动”“汁液”乃至“血管”本身这一秩序中的一切都具有亲缘关系，因为 φλέψ［phléps：静脉、动脉］与 φαλλός 似乎拥有同一个词根。

所以，事情似乎是：欲望在其生命外观中最为明显、最为显现的这个点［阳具］，恰恰只有在能指区域中可以说释放横杠，才能进入这个区域。

侵入以及生命冲力本身这一秩序中的一切，只要在这里显露、在这个形式或形象中达到最大程度，就会成为某种开创下列一切的东西——这是经验向我们展示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只是在阅读它：

- 要么，它作为某种缺席的内涵出现在本不应存在它的位置，因为它并不存在；这使不拥有 φαλλός 的人类主体被视为遭到阉割；
- 要么反过来，对拥有某种可以自称与它相似之物的人而言，它表现为受到阉割威胁。

事实上，如果我暗指古代秘仪，那么，庞贝“秘仪别墅”的壁画就格外醒目。这些少数壁画以惊人的完整性保存下来；就在画面表现揭开 φαλλός 的地方旁边，一些真人大小、身形令人震撼的人物突然出现。这类精灵可以通过若干交叉材料得到辨认——卢浮宫的一只花瓶以及其他几个地方都有一个。他们长着翅膀、穿着靴子，没有戴头盔却近乎如此；无论如何，他们手持鞭子，开始对画面中一位申请入门、正在接受秘仪的女子施行仪式惩罚。也就是说，鞭笞幻想以最直接的形式、同揭开阳具最直接相连地突然出现。



同样完全清楚的是，经验提供各类检验与证据；这无需得到证明，也无需对“秘仪”深处作任何研究。在一切古代祭仪中，人们越接近祭仪本身——也就是越接近大女神丰饶力量的能指性显现——同 φαλλός 相关的一切，就越成为日益突出的切除、阉割标记或禁令之对象。大女神、叙利亚女神的祭司具有宦官性质，这是最得到公认的事情之一，可以在各类文本中找到。

因此，正因为阳具得到安置，并始终被某种作为阉割的东西覆盖，

横杠才会被放在它进入能指领域、也就是进入它在大写 A 的大他者中之位置的道路上。

在发展中引入阉割的，从来不是——请直接在观察中注意这一点——一项禁令，例如对手淫的禁令。如果你们阅读小汉斯的观察，就会看到最初的禁令对他毫无作用。

如果你们阅读安德烈·纪德的故事，就会看到，在他最初几年里，父母一直为阻止他而斗争。布鲁阿尔代尔教授则向他展示自己那些大尖锥和大刀——因为当时医生已经流行在家里摆放一整套百宝工具——并向他保证，如果再次这样做，“人们就会把这东西锯掉”。童年纪德十分清楚地向我们报告，自己一刻也没有相信过这种威胁，因为它事实上在他看来“异想天开”；换句话说，

它无非是布鲁阿尔代尔教授本人幻想的一次偶然显现。

所涉完全不是这种事情。文本与观察都向我们指出：归根到底，在实在界层面最没有理由把自己设想为遭到阉割的“在世存在”——也就是有机会成为如此者，即母亲——却正是从这个角度，也就是在大他者层面、在阉割显现于大他者中的位置上，受到这样把握。在这里，大他者的欲望受到 A 的能指横杠标记。对男人和女人而言，

作为阉割情结发挥作用的特殊之物，都是从根本上经由这条道路引入。

上学期初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时，我以如下说法强调这一点：首先并且首要的是，在主体间辩证过程中第一个遭到阉割的人就是母亲。阉割位置首先在那里受到遇见。男女的命运由此不同：因为阉割最先在他者那里遇见，小女孩才会把这种觉察同母亲使她遭受的挫折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在母亲那里被知觉为阉割的东西，首先以对母亲之责备的形式，也被知觉为对她自己的阉割。弗洛伊德坚持，阉割情结最初以这种怨恨方式向女孩呈现，而这种怨恨又增添到先前的其他挫折之上。

正因为父亲在这里只是替代她最初发现自己遭受挫折之物，

她才进入剥夺经验的层面。父亲的实在阴茎已经在象征层面呈现；人们告诉我们，她期待它来替代自己知觉为遭到挫折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此时才能谈论剥夺，包括这项剥夺引发的危机，以及它向主体提供的放弃岔路：

- 要么放弃自己的客体，也就是父亲；
- 要么放弃自己的本能，也就是认同父亲。

由此产生一项奇特后果：恰恰因为阴茎以象征替代物的形式被引入女人的阉割情结，它在女人那里成为各类所谓嫉妒冲突或伴侣不忠冲突的来源。它被感受为一种实在剥夺；我的意思是，其重音同从男人一侧看同一冲突时所能代表的东西完全不同。

我在这里快速带过，之后还会返回。不过，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如果阳具以被划杠的形式处于指示大他者欲望的位置，那么，接下来的整个发展会向我们展示，主体如何必须相对于大他者的这个欲望，找到自己作为被欲望客体的位置。因此，正如弗洛伊德在《一个孩子挨打》那项惊人的洞见中向我们指出的，归根到底，主体总是必须被安置为不拥有 φαλλός；他将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主体认同，因为——我们会看到——主体本身就是作为这样的主体、一个受到横杠标记的主

体。这一点在女人那里清楚显现；今天，我只是通过一项提示，开始处理她围绕阳具的发展作用。

这样，归根到底，女人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男人其实也是如此；她的女性气质的一切典型表现，无论神经症性与否，都必须围绕这个两难安置。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为了找到自己的满足，她首先要得到：

- 男人的阴茎；
- 随后通过替代，得到对孩子的欲望。 这是经典理论。我这里只是在指出分析理论中的通说。

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归根到底，为了重新找到一种像母性满足一样根深蒂固、

一样根本、同样苛求而且同样出于本能的满足，她只有通过替代性路线才找到满足。我会说，阴茎首先是一个替代物，我甚至会说是一个恋物；随后，孩子在某个方面同样是一个恋物。正经由这些替代，女人才重新接合可以说自己的本能与自然满足。

反过来说，就属于她欲望路线的一切而言，她同 φαλλός [ phallos] 功能所蕴含的一项必要性相连：她必须在程度不一的意义上成为这个 φαλλός，因为它正是被欲望之物的标志。事实上，即便 φαλλός 的功能受到深刻压抑，严格说来在被视为女性气质的东西中，整个展示阶段仍回应这一点，也就是女人把自己作为欲望客体提出的方式。在女性功能中，只要女人展示自己、把自己作为欲望客体提出，一切都会使她以潜在而隐秘的方式认同于 φαλλός；归根到底，就是把她的主体存

在安置为受到欲望的 φαλλός、安置为“ 大他者欲望的能指”。它把这种存在安置在所谓女性假面的彼岸，因为她所展示的女性气质，归根到底恰恰同这种深刻认同相连，认同于一个同她的女性气质最为紧密相连的能指。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我们在这里看到某种东西的作用与根源出现：主体沿大他者欲望的道路达到完成时，其深刻的 Verwerfung［拒斥］，也就是她作为一种存在，对自己严格说来以女性方式显现之物的深刻拒绝。因此，她的满足经由替代性路线；而她的欲望则显现在一个只能通向深刻 Verwerfung、通向自身存在之深刻陌异的层面，通向她必须使自己显现成的东西。

不要以为男人的情况更好。甚至还更滑稽。这个可怜人拥有 φαλλός！而恰恰是知道母亲没有它这件事，使他受到创伤；因为母亲强大得多，那么事情将走向何处？卡伦·霍妮正是在这种对女人的原始恐惧中，指出了阉割情结紊乱最为根本的一项动力。

正如女人陷入一个两难，男人也陷入另一个两难。对他而言，假面在满足路线中建立；因为归根到底，他通过我们熟知的东西，解决威胁其实际所有之物的危险：简单纯粹地认同于拥有阳具徽记的人，认同于外表看来已经躲过危险的人，也就是父亲。归根到底，男人只有通过一串无限延伸的代理才具有男性气概。这些代理经由直接祖先，来自他的所有祖父母与先祖。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但反过来说，在欲望路线中，也就是只要他必须从女人那里找到自己的满足，他同样会寻找 φαλλός。我们拥有一切临床及其他证据；下次我还会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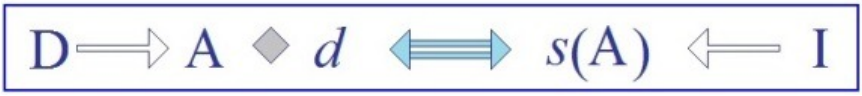
而恰恰因为他没有在寻找之处找到这个 φαλλός，他才会在其他一切地方寻找它。

换句话说，象征阴茎对女人而言，可以说位于她欲望的场域内部；对男人而言，却在外部。这就向你们解释了为什么男人在

关系中总有离心倾向。

因此，归根到底，正因为她不是她自己；

- 正因为她处在自己的欲望场域中；
- 也就是说，正因为她必须在自己的欲望场域中成为 φαλλός…… 女人才会经验到 Verwerfung；而主体认同 [I] 则终止于第二行层面：




正因为男人在满足时——也就是使他者获得满足时——不是他自己，所以他才发现在爱中处于自己的大他者之外。因此，可以说，正因为他只把自己知觉为

满足的工具，爱的问题归根到底才成为这项深刻分裂的问题；爱把这项分裂引入主体活动内部。

因为，按照爱的定义本身，所涉始终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对男人而言，就是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予一个没有他所没有之物的存在，也就是给予一个没有阳具的存在。

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的若干心理后果》（1925）［返回 23-04 正文］

我和我的学生们在著作中日益坚定地提出一项要求：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还必须深入童年最初阶段，也就是性生活早期绽放的时期。只有研究与生俱来的驱力构成最初如何表现、生命最早印象产生何种效果，才能正确辨认后来神经症的驱动力，并避免成熟期的重塑与层层覆盖可能诱发的错误。这项要求不只在理论上意义重大，也具有实践重要性；它使我们的努力同某些医生的工作区别开来：这些医生只以治疗为取向，仅在一段有限范围内采用分析方法。对这种早期时期的分析旷日持久、十分艰辛，对医生和病人提出的要求也并非总能在实践中得到满足。此外，它还会把我们引入黑暗，而我们至今仍缺少穿越黑暗的路标。是的，我认为可以向分析家们保证：即便在未来几十年里，他们的科学工作也不会面临机械化并因此变得乏味的危险。

下面，我要报告分析研究的一项结果；如果能够证明它普遍有效，它将十分重要。为什么不推迟发表，直到更丰富的经验为我提供这项证明——如果它确实能够得到证明？因为我的工作条件已经改变，而我无法否认这项改变的后果。以前，我并不属于那种无法把一项所谓新发现暂时保留在自己手中、直到它得到确认或修正的人。《梦的解析》和《一例癔症分析的片段》（朵拉病例），即便没有按照贺拉斯的办法压下九年，也确实被我压下了四五年，才向公众发表。可是当时，时间在我面前无边无际地延伸——如一位可亲诗人所说，是“时间

的海洋”——而材料又如此丰富地涌向我，使我几乎无法抵挡经验。当时，我还是一片新领域中唯一的工作者；我的克制既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也不会伤害别人。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我面前的时间有限，而且不再能够全部用于工作；获得新经验的机会也不再如此丰富。如果我自以为看见某种新东西，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能等待它得到确认。此外，所有漂浮在表面的东西都已经捞取殆尽；其余东西必须通过缓慢努力从深处提取。最后，我不再孤单；一群热切的同事准备利用那些尚未完成、尚未得到确定认识的东西。我可以把一部分从前必须亲自操办的工作交给他们。因此，我觉得自己有理由在这一次报告某项迫切需要检验的东西；只有经过检验，人们才能认识它有无价值。

我们研究儿童性生活最初的心理形态时，通常都以男性儿童、小男孩为对象。我们认为，小女孩那里必定存在类似过程，却又会以某种方式不同。发展进程中的这个差异究竟位于何处，却始终无法清楚显出。

俄狄浦斯情结的情境，是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在男孩那里辨认的第一站。它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儿童在这里坚持同一个客体；在此前的婴儿与照料期，他尚未生殖器化的力比多已经投注这个客体。同样，他把父亲感受为具有干扰性的情敌，想要除掉并取代父亲，也完全可以从现实关系中顺畅推导出来。我曾在别处[1]说明：男孩的俄狄浦斯态度属于阳具阶段，并因阉割焦虑——也就是对生殖器的自恋兴趣——而毁灭。理解上的困难来自一项复杂情况：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按照双性潜质，具有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含义。男孩也想作为父亲的爱情客体取代母亲；我们把这称作女性态度。

男孩俄狄浦斯情结的前史远未全部清楚。我们知道，其中存在一种性质温柔的父亲认同，它尚不带有围绕母亲的竞争含义。这个早期时期的另一项要素，是我认为从不会缺席的生殖器手淫活动，也就是幼儿手淫；照料者以程度不一的暴力压制它，从而激活阉割情结。我们假定，这种手淫依附于俄狄浦斯情结，构成其性兴奋的释放。它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联系，还是最初作为器官活动自发出现、后来才接合俄狄浦斯情结，尚不确定；后一种可能远为可信。尿床以及教育干预使儿童戒除尿床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仍成问题。我们偏爱一种简单综合：持续尿床是手淫的结果；男孩把它受到的压制看成对生殖器活动的抑制，因而理解成阉割威胁。不过，我们是否每次都说得正确，尚待确定。最后，分析使我们依稀看见：童年极早期偷听父母性交，如何能够引起最初性兴奋，并通过其事后效果，成为全部性发展的出发点。手淫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态度，后来都会接合这项在随后得到解释的印象。但是，我们不能假定这种性交观察经常发生；而我们在这里遇见了“原初幻想”的问题。因此，即便在男孩俄狄浦斯情结的前史中，也仍有如此之多未获澄清之处，等待梳理与裁决：是否应当总是假定同一进程，还是极其不同的前期阶段会通向同一个最终情境的汇合点？

小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比男孩的多包含一个问题。母亲最初是两性共同的第一个客体；男孩在俄狄浦斯情结中保留这个客体，不足为奇。但是，女孩如何能够放弃母亲，转而把父亲当作客体？追踪这个问题时，我得以作出一些观察，它们恰好能够照亮女孩俄狄浦斯关系的前史。

每位分析家都遇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们格外强烈而执着地坚持对父亲的依恋，也坚持这项依恋所达到的顶点——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

孩子。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这个愿望幻想也曾是她们幼儿手淫的驱动力；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仿佛我们在这里面对儿童性生活中一项基本而无法继续分解的事实。然而，恰恰对这些病例作出的深入分析显示了另一种事情：这里的俄狄浦斯情结拥有一段漫长前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次生形成物。

按照老儿科医生林德纳的一项观察，儿童在愉悦吮吸时发现会带来快乐的生殖器区域——阴茎或阴蒂。儿童是否真的把这项新发现的快乐来源当作刚刚失去之母亲乳头的替代物——后来的幻想（口交）或许暗示如此——我暂且不作判断。简言之，生殖器区域会在某个时候得到发现，而给最初施于其上的活动预设心理内容，看来并不正当。然而，以此开始的阳具阶段的下一步，并不是把这种手淫同俄狄浦斯情结的客体投注联结起来，而是小女孩注定遇见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发现。她注意到兄弟或玩伴那显眼可见、尺寸很大的阴茎，立刻把它认作自己那小而隐藏之器官的优越对应物，从此陷入阴茎嫉羡。

两性的行为在这里形成一种有趣对比。处在类似情形的小男孩第一次看见女孩的生殖器区域时，会表现得犹豫不决，最初几乎不感兴趣；他什么都没有看见，或者否认自己的知觉、削弱它、寻找解释，以便使之符合自己的预期。只有后来，当一项阉割威胁已经对他发生作用时，这项观察才会变得意义重大；对它的回忆或再次遇见会在他内心激起一场可怕的情感风暴，使他相信此前曾加以嘲笑的威胁确实真实。这次相遇会产生两种反应；它们可能发生固着，继而分别、共同或连同其他因素，永久决定他同女人的关系：厌恶这个受到残损的生物，或者以胜利姿态蔑视她。然而，这些发展属于虽然不太遥远、但仍在将来的时期。

小女孩则不同。她转瞬之间便作出了判断和决定。她看见了，知道自己没有，并且想要拥有。[3]

所谓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在这里发生分岔。如果不能很快克服它，它可能给预定的女性气质发展道路造成巨大困难。仍有一天会得到阴茎、从而同男人一样的希望，可能一直维持到难以置信的晚期，并成为一些奇特、否则无法理解之行为的动机。或者，会发生我想称作拒认的过程；在儿童心理生活中，它看来既不罕见、也不十分危险，但在成人那里却会开启精神病。女孩拒绝接受自己遭到阉割的事实，坚持自己仍然拥有阴茎这项信念，随后被迫像男人一样行动。阴茎嫉羡的心理后果，只要没有耗尽在男性气质情结的反向形成中，便多种多样而影响深远。承认自恋创伤以后，女人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仿佛一道疤痕。她克服了最初那项尝试——把自己缺少阴茎解释为个人惩罚——并理解这种性别特征具有普遍性以后，就开始认同男人对这个在决定性一点上有所短缺之性别的蔑视；而至少在这项判断中，她仍坚持自己同男人平等。[4]

即便阴茎嫉羡已经放弃其本来客体，它也不会停止存在，而是经过轻微移置，在嫉妒这种性格特征中继续存活。当然，嫉妒不只属于一个性别，而且奠基于更广泛的基础；但我认为，它在女人的心理生活中仍然发挥远为重大的作用，因为它从已经转向的阴茎嫉羡这个来源获得了巨大强化。在我尚未认识嫉妒的这项来源以前，曾为女孩如此常见的手淫幻想“一个孩子挨打”构造出第一阶段；在这里，它意味着：另一个作为嫉妒对象之情敌的儿童应当挨打。[5]这个幻想似乎是女孩阳具时期的残余；“一个孩子挨打”这个单调公式中令我注意的那种独特僵固性，很可能还容许一种特殊解释。在那里受到殴打——爱抚的儿童，根本上或许无非就是阴蒂本身；因此，这项陈述在最深处包含对

手淫的承认，而从阳具阶段开端直到较晚时期，手淫始终同这个公式的内容相连。

阴茎嫉羡的第三项后果，似乎是同母亲客体之温柔关系的松动。我们并不十分理解这里的联系，却会确信，最后几乎总是母亲被指责应对阴茎欠缺负责，因为她使儿童带着如此不足的装备来到世上。历史进程经常如下：发现自己在生殖器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以后不久，女孩便对另一个据称更受母亲疼爱的儿童产生嫉妒；这为她脱离母亲依恋提供了动机。于是，那个受到母亲偏爱的儿童成为挨打幻想中第一个客体，而幻想又以手淫告终；这正好与之相符。

阴茎嫉羡——或者说发现阴蒂处于劣势——还产生另一项令人惊讶的效果；它无疑是所有效果中最重要的。我从前经常产生一种印象：一般而言，女人比男人更难耐受手淫，更经常抵制它；在同样情形下，男人会毫不犹豫地采用这项应急手段，女人却无法使用。可以理解，如果想把它确立为规则，经验会显示无数例外。两性人类个体的反应毕竟都由男性与女性特征混合而成。不过，仍然会留下这样一种表象：手淫离女人的本性较远。为了解决这个假定的问题，人们可以考虑：至少阴蒂手淫是一项男性活动，而女性气质的展开以清除阴蒂性欲为条件。如今，对阳具前史的分析告诉我，女孩出现阴茎嫉羡迹象以后不久，就会产生一股对抗手淫的强烈逆流；它无法仅仅归因于施教照料者的影响。这股冲动显然是那次压抑冲击的先兆；后者将在青春期清除很大一部分男性性欲，为女性气质的发展腾出空间。这次最初反对自体情欲活动的行动或许无法达到目标。我分析的病例正是如此。冲突随后继续存在；女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会尽一切努力摆脱手淫强迫。倘若不认识这项强烈动机，女人后来性生活中的许多表现都会始终无法理解。

要解释小女孩对阳具手淫的这种反抗，我只能假定：一项伴随因素使这种会带来快乐的活动变得极其扫兴。我们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寻找这个因素；它必定是同阴茎嫉羡相连的自恋创伤，是这样一项提醒：自己在这方面终究无法同男孩较量，因而最好放弃同他竞争。

以这种方式，对两性解剖差异的认识把小女孩从男性气质和男性手淫那里推开，使她进入通向女性气质展开的新道路。

迄今尚未谈到俄狄浦斯情结，它在此前也没有发挥作用。但是现在，女孩的力比多沿着预先画好的象征等式——阴茎 = 孩子——滑入一个新位置。她放弃对阴茎的愿望，把希望有一个孩子的愿望放到它的位置上，并且为了这个意图把父亲当作爱的客体。母亲成为嫉妒对象，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如果我可以相信一项孤立的分析发现，那么，在这个新情境中可能出现身体感觉；我们应当把它们判断为女性生殖器装置过早觉醒。如果后来必须放弃这种失败的父亲依恋，它可能让位于父亲认同；女孩由此返回男性气质情结，并且可能固着于其中。

现在，我已经说完自己必须说的要点，可以停下来审视结果。我们已经对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前史获得认识。男孩那里相应的东西仍然相当未知。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情结是一项次生形成物。阉割情结的作用先于它，并为它作好准备。在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的关系上，两性形成根本对立。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因阉割情结而毁灭；[6]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则由阉割情结促成并开启。只要考虑到阉割情结始终按照其内容发挥作用，这项矛盾便得到澄清：它抑制并限制男性气质，却促进女性气质。男女在性发展的这个部分所呈现的差异，是生殖器解剖差异以及与之相连之心理情境的可理解后果；它对应已经执

行的阉割同仅仅受到威胁的阉割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的结果根本上是一项本可预见的自明之理。

不过，俄狄浦斯情结如此重要，以何种方式进入并摆脱它也不可能毫无后果。对男孩而言——我在最近提到、而这里总体上接续的那篇文章中已经说明——俄狄浦斯情结并不只是遭到压抑；它在阉割威胁的冲击下彻底粉碎。它的力比多投注遭到放弃、去性欲化并部分升华；它的客体则被纳入自我，在那里构成超我的核心，并赋予这个新形成物以特有属性。在正常——更准确说，理想——的病例中，无意识里也不再存在俄狄浦斯情结；超我已经成为它的继承者。按照费伦齐的观点，阴茎格外高的自恋投注，源于这个器官对物种延续的重要意义。因此，人们可以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灾变——转离乱伦、设立良心与道德——理解为世代战胜个人。倘若考虑到神经症奠基于自我对性功能要求的抵抗，这是一项有趣观点。不过，离开个体心理学的立场，最初并不会澄清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

对女孩而言，粉碎俄狄浦斯情结的动机并不存在。阉割早已在此前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就是把儿童推入俄狄浦斯情结的情境。因此，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逃脱了男孩那里为它准备的命运；它可以慢慢放弃、通过压抑得到处理，并把其作用远远移入女人的正常心理生活。人们不愿明说，却又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对女人而言，道德正常的水平会有所不同。超我永远不会像我们对男人所要求的那样不留情面、非人格化并独立于其情感起源。批评历来归于女人的一些性格特征——她比男人表现出更少的正义感，更少愿意服从生命的重大必然性，作决定时更常受到温柔与敌对感情的引导——都能从上面推导出的超我形成变化中得到充分说明。女性主义者想迫使我们完全平等地安置并评价两性；他们的反对不应使这些判断发生偏转。不过，我们

也会欣然承认，大多数男人同样远远落后于男性理想；而且由于双性潜质与交叉遗传，所有人类个体都在自身之中结合了男性与女性特征。因此，纯粹男性气质与纯粹女性气质始终是内容并不确定的理论构造。

我倾向于赋予这里提出的、关于两性解剖差异之心理后果的论述以价值；但我知道，只有当从少数病例中得到的发现普遍获得确认、被证明具有典型性时，这项评价才能维持。否则，它就只会是认识性生活发展中多样道路的一项贡献。亚伯拉罕（1921）、霍妮（1923）和海伦娜·多伊奇（1925）关于女人之男性气质情结与阉割情结的宝贵而内容丰富的著作，包含许多接近我的论述之处，却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完全重合；因此，我也想从这个方面证明发表本文是正当的。

---

［初次发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1 卷第 4 期，1925 年，第 401—410 页；《全集》第 14 卷，第 19—30 页。］

[1] 《俄狄浦斯情结的消亡》。

[2] 参见《性学三论》。

[3] 这里有必要修正我多年前提出的一项断言。我当时认为，儿童的性兴趣不像正在成熟者那样由性别差异唤起，而是围绕孩子从哪里来的问题燃起。因此，至少对女孩而言，这个说法肯定不成立。对男孩来说，有时可能采取一种方式，有时采取另一种方式；或者，对两性而言，都由生活中的偶然诱因作出决定。

[4] 我早在第一篇批判性文章《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就已承认：这构成阿德勒学说的真理核心。该学说毫不犹豫地从这一个点

——器官劣势、男性抗议、离开女性路线——解释整个世界，并以牺牲性欲、取消其重要性而支持权力追求为傲！那么，唯一毫无歧义地配得上“劣等”这个名称的器官，就是阴蒂。另一方面，我们又听说，一些分析家以数十年努力仍从未察觉阉割情结的存在而自豪。我们必须怀着钦佩向这项成就的伟大低头，即便它只是一项负面成就、一种忽视与误认的绝技。两种学说构成一组有趣对立：这里没有丝毫阉割情结的痕迹，那里则除阉割情结的后果外别无一物。

[5] 《一个孩子挨打》。

[6] 参见同上。

# 第20课 · 1958年4月30日

如果我们原则上处理的“人的事情”受到人同能指之关系的标记，就不能像谈论那些能指帮助人提出的事物那样，使用能指来谈论这些“事情”。换句话说，我们谈论“人的事情”的方式，同谈论其他事物的方式必然有所不同。

我们很清楚，事物并非对能指的接近毫无感觉；它们同 λόγος［逻各斯］秩序的关系必须得到研究。我们比前人更有能力发现：语言最终如何穿透事物、在其中开出沟槽、把它们掀起并稍稍搅乱；这个问题会提出许多疑问。

不过，我们现在毕竟抵达这样一个点：我们知道——至少假定，如果没有弄错——事物本身并不在语言中展开。至少，对如今在我们这里构成的科学、也就是 φύσις［ phusis，自然］科学而言，工作的出发点正是这里。

首先想到整肃语言，也就是把语言还原到最低必要程度，以便能够实现对事物的这项掌握；这就是所谓先验分析论。总之，人们设法把语言对事物的作用还原为追问功能。归根到底，语言曾深刻卷入事物，直到大致对应现代科学开端的某个时期；人们已经尽可能——当然不

是彻底——使语言从事物中脱离。如今，一切当然又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是否同时观察到：

- 事物发生奇特震颤，而它无疑同我们追问事物的方式不无关系；
- 另一方面，语言又出现奇怪绝境；我们谈论事物时，它会变得严格说来无法理解？

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处理的是人。对此，我只要你们注意：语言迄今没有得到脱离。用来追问人的语言无法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得到脱离——当我们以学院或精神病学心理学的论述谈论“人的事情”时，便以为它已经脱离。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以前，它还是同一个语言。我们完全可以亲自发现，自己构造的东西何等贫乏，而且又何等一成不变。事实上，精神病学谈论幻觉已经整整一个世纪，却几乎一步都没有迈出；人们仍然不知道、仍然无法以不同于荒唐可笑的方式界定精神病学中的幻觉是什么。

况且，精神病学心理学的全部语言都带有同一项障碍，使我们感觉它在原地深深踏步。我们这样表达这件事：我们说，人们把这个或那个功能物化；即便用布洛伊勒式语言谈论精神分裂症中的不协调，我们也会感到这些物化十分任意。当我们说物化时，会产生一种仿佛触及某种东西的印象。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完全不是责备这种心理学把人变成“一件事物”——但愿上天让它真能把人变成“一件事物”；这正是一门人的科学之目标。问题恰恰在于，它把人变成的事物，无非是过早冻结的语言；某种东西已经编织在语言中，而它匆忙用自己的语言形式替代了后者。

归根到底，我们所谓无意识形成物、弗洛伊德向我们呈现为无意识形成物的东西，无非是某种初级之物被语言“掌握”——况且，正因如此，他才把它称作初级过程。语言标记这个初级之物；因此，弗洛伊德的发现、无意识的发现，可以说由对这个初级之物的追问所“准备”，因为首先得到侦测的是它的语言结构。我说“准备”，是因为这项发现可以使我们准备追问这个初级之物，引入对初级倾向的正确追问。

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准确把握首先必须承认之事，就尚未抵达那里；也就是，这个初级之物首先并且首要地像语言一样编织起来。正因如此，我才带你们返回这里；同样正因如此，那些迄今向你们许诺、炫示“精神分析与生物学的综合”的人，已经明确地向你们表明——因为这个方向上绝对没有任何开端——这是一项诱饵。我们甚至还会走得更远，断言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以前，作出这种许诺就是诈骗。

因此，我们正在尝试定位、投射并在你们面前显现我所谓的语言质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除这个初级之物。只要它本身是不同于语言的另一件东西，我们正是在寻找它的过程中向前推进。前几课，我们触及了我所谓“欲望与要求的辩证过程”。我曾告诉你们，在要求中，认同是对——姑且这样说——情感客体的认同。归根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恰恰因为要建立任何主体间之物，大写 A 的大他者就必须说话。或者换一种说法：因为言说的本性，就是成为大他者的言说。再或者，因为：

- 原初欲望的一切表现，都必须在某个时刻安置于弗洛伊德继费希纳之后所谓的“另一个场景”之上；
- 这对人的满足是必要的，因为恰恰作为言说存在，他绝大部分满足都必须以言说为中介。

我们立刻就要注意到，仅凭这个事实，一项完全原初的含混便得到引入：如果欲望不得不

以言说为中介，而且——这一点完全显明——这种言说只有在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中才拥有地位、得到安置并依其本性展开，那么，主体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察觉这件事。

我的意思是，主体同这个大他者之间的区分，是起源处最难作出的区分之一。况且，我无须强调弗洛伊德曾充分强调的事情，也就是

童年中这样一个时刻的症状价值：儿童相信父母知道自己的全部思想。弗洛伊德恰恰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解释了这个现象同言说的联系：归根到底，儿童的思想形成于大他者的言说中。因此，在起源处，他的思想属于这种言说再自然不过。

在他同这个大他者之间，起初只有一道薄弱边缘；它恰恰由自恋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标出，却是一道可以跨越、因而含混的边缘。我的意思是，自恋关系完全向某种永久转递主义开放。

儿童的经验同样展示了这一点。不过，两种含混样态……

一种发生在这里的想象层面，另一种属于象征秩序；后者也就是我刚才提醒的第一种含混，欲望通过它奠基于大他者的言说…… 两条界限、使主体异化的两种跨越样态并不混同。正是在二者的不协调中，第一种可能性建立——正如经验所展示的——

主体当然尤其在想象层面把自己区别出来：他同自己的同类

围绕一个第三客体建立竞争位置。

但是，当他们只有两个时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也就是，当主体必须在大他者面前支撑自己时。这项辩证过程归根到底毗邻所谓承认辩证法。你们会认出它——至少，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交流过一些内容，你们中的某些人能够稍稍瞥见它——你们知道，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曾经在享乐冲突和所谓“殊死斗争”的道路中寻找这种承认辩证法；

他在那里使自己的全部“主奴辩证法”得到感知。了解这一切十分重要；但它显然没有覆盖我们的经验场域，而且理由再充分不过。

因为，除了主奴斗争的辩证法外，还存在其他东西：

- 儿童同父母的关系；
- 以及恰恰发生在承认层面的事情，因为参与运作的不是斗争或冲突，而正是要求。

归根到底，所要看到的是：如果主体的欲望异化于要求，并因不得不穿过要求而发生深刻转化，那么，欲望在某个时刻怎样能够……它又怎样必须重新进入？这些事情很简单：儿童最初因自身无力而完全依赖要求，也就是依赖大他者的言说；后者改变、重新结构化并深刻异化其欲望的本性。

我们在这里暗指的东西，大体对应所谓“前俄狄浦斯”——无论这样称呼是否正确——而确实可以正当地称作“前生殖器”的要求辩证法。由于主体同大他者之界限具有这种含混，我们在这里看到如下东西被引入要求：

- 这种口腔客体，只要它在口腔层面受到要求，就会得到纳入；
- 这种肛门客体，它成为原始肛门赠予之辩证过程的支撑；后者从根本上同主体是否满足教育要求相连，也就是归根到底同他是否同意放出某个象征客体相连。

简言之，最初欲望因要求而发生这种深刻重组，就是我们谈到所谓口腔与肛门客体的辩证过程时不断触及的东西。我们看到由此产生的结果：主体在要求关系中面对的这个大他者本身，也服从于一项吸收、纳入或拒绝的辩证过程。某种不同的东西可以、也必须得到引入；主体欲望的原创性、不可还原性与真实性由此得到恢复。

我不认为，所谓生殖器阶段的进展想表达的是其他事情。它在于：

主体已经安置于要求的最初前生殖器辩证过程中，却在某个时刻面对另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此前从未得到整合，而且若没有比最初欲望更加关键、

更加深刻的重组，也无法得到整合。这个欲望向主体引入自身的通常道路，是作为大他者的欲望：

- 他辨认出一个处在要求彼岸的欲望，一个没有受到要求掺假的欲望；
- 他在自己曾向其提出要求的第一个大他者彼岸遇见并安置这个欲望；为固定思路，我们就说这个大他者是母亲。

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对历来教导之物的一种表述与表达方式：生殖器欲望通过俄狄浦斯得到承担，并在主体经济中占据位置。但是，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大他者的这个欲望所发挥的功能上：它一次而永远地使主体同大他者得到真正区分。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相互性情境：如果主体的欲望完全依赖向大他者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依赖大他者，那么就存在相互性。它在儿童同母亲的关系中表现为：儿童也很清楚，自己握有某种东西，可以拒绝母亲的要求；例如，他可以服从或不服从肛门或排泄训练的请求。

因此，两个主体围绕要求的这项关系，包含某种原创关系；一个补充第一维度的新维度可以由此得到引入，使主体不只是在依赖关系中的主体——这项依赖关系构成其本质存在。

必须得到引入的东西，当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那里、从起源处便处于潜在状态，也就是：

- 越过主体所要求之物；
- 越过大他者对主体提出之要求…… 必须存在大他者所欲望之物的在场与维度。

这最初向主体深深遮蔽，却仍在那里，内在于情境，并且会在俄狄浦斯经验中逐渐展开。它在结构中更为原初、更为根本，至关重要：

- 我在所谓父亲隐喻中详细讨论过的父母关系之知觉；
- 以及从任何一点出发，对最终通向阉割情结之物的知觉本身；也就是，这将成为要求的这个彼岸之展开。

仅凭主体的欲望最初正是在大他者欲望本身的存在中被找到、被定位——这里的大他者欲望不同于要求——这一事实，我今天就想用一个例子来向你们说明；而且要用第一个理应出现的例子。因为，如果这一点以某种方式引入了主体同能指的关系对其无意识所作的全部结构化，我们就应当立刻找到它。

首先，我已经向你们暗示过，在弗洛伊德最初对癔症所作的观察中，我们能够指出什么。让我们进入弗洛伊德第一次向我们谈论欲望的时期。他是在谈论梦时这样做的。我已经向你们评论过弗洛伊德从伊尔玛的开创性梦、那个注射之梦中得出的东西。

我不再返回那里。让我们看第二个梦——因为弗洛伊德也在《梦的解析》中分析了自己的一些梦——也就是“约瑟夫叔叔之梦”。我会另找

一天分析它；它具有十足证明力，尤其适合说明两个相互交错的环路图式，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清楚地展示梦展开的两个层级：严格意义上的能指层级，即言说；以及转喻客体以某种方式在其中取得化身的想象层级。我们不要在这里走偏。

我选取弗洛伊德在第三章“梦的移置”中分析的第三个梦。

我们会把它称作“美丽女屠夫之梦”。梦如下：

> “我想办一场晚宴，但所有存粮只有一点熏鲑鱼。
>
> 我想去买东西，却想起今天是星期日下午，所有商店都关门。
>
> 我想给几家供应商打电话，电话却坏了。因此，我必须放弃办晚宴的愿望。”
>
> ［德文原文表达同一内容。］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这就是梦的文本。弗洛伊德一丝不苟地记录梦的文本如何得到分节、得到言语表达；他始终而且只把梦的分析设想为从梦这种画谜的言语表达出发。

“我自然回答说，只有分析才能决定这个梦的意义……”弗洛伊德说。

事实上，病人向他提出这个梦时说：

“您会注意到，您曾告诉我，梦总是某种实现欲望的东西。可是这个梦却使我极难实现欲望。”［这位机智的病人开口说：“您总是说，梦是

得到实现的愿望。现在我要给您讲一个梦，它的内容恰恰相反：我的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您怎样使这同自己的理论相符？”]

“不过，我承认，”弗洛伊德继续说，“乍看之下，它似乎合理而连贯，而且看来完全同欲望实现相反。梦的材料是什么？你们知道，梦的动机始终存在于前一天的经历中。”他对

病人说。“我的病人的丈夫是一名肉类批发商。他是一个正派而勤勉的人。几天前，他告诉妻子自己胖得太多，想要进行减肥疗程：他会早起，不再接受晚宴邀请。她笑着说，丈夫常去一家餐馆，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画家；画家想给他画像，因为从未找到一颗如此富有表现力的头。不过，她丈夫以惯常的粗鲁方式回答，非常感谢，但他确信，比起他的整张脸，画家更喜欢美丽年轻姑娘的一块屁股。我的病人目前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不断逗弄他。

她还要求丈夫不要给她鱼子酱。这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她早就希望每天早上吃一片鱼子酱三明治，却不准许自己这笔花费”——梅耶松先生这样翻译，但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她不准许自己享有这种自由”；这里并没有把花费呈现出来——“当然，只要告诉丈夫，她立刻就会得到鱼子酱；可是她反而请求丈夫不要给她，好让自己能围绕这件事更长久地逗弄他。”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分析：病人的丈夫是一位正派而勤勉的肉类批发商。前一天，他告诉妻子，自己变得太胖，因此想开始减肥疗程。他会早起、运动、严格节食，尤其不再接受晚宴邀请。她笑着继续谈起丈夫：他在常去的餐桌上认识了一位画家；画家执意要给他画像，因为从未见过如此富有表现力的头。可是，她的丈夫以自己粗野的方式回答，非常感谢，

但他完全相信，比起自己的整张脸，画家更喜欢美丽年轻姑娘的一块屁股。她现在非常爱丈夫，并同他相互逗弄。她还请求丈夫不要送给她鱼子酱。——这是什么意思？她早就希望每天上午能吃一个鱼子酱小面包，却不准许自己承担这笔花费。当然，只要向丈夫提出请求，她立刻就能得到鱼子酱。可是，她反而请求丈夫不要送给她，这样她就能围绕这件事更长久地逗弄他。]

这里是弗洛伊德的一段插话：

（“我觉得这个理由十分牵强；这类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通常掩藏着未曾表达的动机。想想伯恩海姆的那些催眠对象：他们执行催眠后指令；当人们追问理由时，他们不会回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而是用一种明显不能令人满意的动机来解释。鱼子酱大概就是这类动机。我注意到，她不得不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满足的愿望。

她的梦也向她展示：‘对愿望的拒绝’、欲望的这种延宕与推迟已经真正实现。

但是，她为什么需要一个未满足的愿望？”）

[德文原文表达同一段分析。]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这项观察出自弗洛伊德，并且放在括号中。

> “她迄今想到的东西不足以解释这个梦。我继续追问。过了一会儿——克服阻抗时理应如此——她告诉我，自己昨天拜访了一个女友；她十分嫉妒这个女友，因为丈夫总说她许多好话。万幸的

是，这个女友身材细瘦，而她的丈夫喜欢丰满体形。那么，这个瘦削的人谈了什么？自然是她想长胖的愿望。她还问病人：

‘你们什么时候再邀请我们？在你们家总能吃得那么好。’现在，梦的意义已经清楚。我可以对病人说：‘这就好像你在心里回答她：当然啦！我要邀请你，让你在我家大吃一顿、长胖，从而更加讨我丈夫喜欢！我宁愿一辈子再也不办晚宴！’梦告诉你，你无法办晚宴；它由此实现你的愿望：不为女友的体形变得更加丰满作出任何贡献。你之所以知道社交晚宴会使人变胖，是因为丈夫已经决定不再接受晚宴邀请，以便减肥。现在只差一项吻合来证实这个解答。我们仍不知道梦里的熏鲑鱼对应什么。‘你为什么在梦中想到熏鲑鱼？’她回答：‘那是我女友最喜欢的菜。’碰巧我也认识这位女士，而且知道她像我的病人拒绝鱼子酱一样，不准许自己享用熏鲑鱼。”

［德文原文表达同一段分析。］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弗洛伊德由此引入这个梦的另一种更细致解释；它进入认同的辩证过程。他就此作出以下观察：

“她认同了自己的女友。正是作为这项认同的标志，也就是只要她认同于他者，她就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未实现的愿望。”［如果她在梦中所指的不是自己、而是女友，如果她把自己放在女友的位置上，或者用我们的说法，认同于女友，那么这个梦便获得一种新解释。我认为，她确实这样做了；作为这项认同的标志，她在实在中为自己创造了遭到拒绝的愿望。］

我想，你们已经应当在这段简单文本中感到这道轮廓正在勾勒。我本可以随意翻开《梦的解析》的其他任何一页；我们都会找到同一项辩证过程。我认为，拿起手边遇到的第一个梦，就能以格外简单的方式向我们展示欲望与要求的辩证过程——因为这项辩证过程在癔症患者那里格外简单。

不过，让我们继续，以便把这段极其重要的文本向我们表述之物追踪到底；因为归根到底，它是弗洛伊德最早对癔症认同之含义作出的极为清楚的表述之一。

他明确指出这种认同的意义。为了不讲得太长，我跳过几行。这里讨论的是人们所谓模仿与同情；他极为有力地批判了把癔症传染简单还原为纯粹模仿的做法。

“这个过程，”他说，“比人们所描绘的癔症模仿稍微复杂一些。下面的例子会证明，它回应无意识推论。假如一位医生把一个表现某种颤抖的主体，同其他病人安置在同一间病房里，那么，听说这种症状受到模仿，他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这种传染大体以如下方式产生：病人们通常——我们应当看到这项观察具有怎样的分量；我不只指它提出的时代，也指对我们而言——“病人们通常对彼此的了解，比医生对其中任何一人的了解更多；医生查房以后，她们仍然相互关心。这项观察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即便观察者——无论是否行为主义者——不再关心人类客体的照片，人类客体仍继续体验自身同能指的小小特殊关系。其中一人今天发作了吗？其他人很快就会知道，原因是家里来了一封信、再次想起一段爱情悲伤，或其他类似的事。她们的同情被唤起，在无意识中进行如下考察：如果这类动机能引起这类发作，我也能有这类发

作——症状作为基本要素，同论述认同、同在论述中得到分节的情境发生分节——因为我有同样的动机。如果这些是

有意识的结论，它们会导致害怕同样发作来临的焦虑。但是，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心理层面，最终实现了受到恐惧的症状。因此，认同不是简单模仿，而是由于

相同病因而据为己有；它表达一种'就像'，涉及一种持续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共同之物。"——"据为己有"这个术语翻译得不完全准确，更接近"当作自己的东西"——"癔症患者尤其会认同于那些曾同她发生性关系的人，或者同她和相同对象发生性关系的人。况且，语言也为这种构想负责；它说明两个爱人是一体。"弗洛伊德说。

［这个过程比人们惯于设想的癔症模仿稍微复杂；它对应一项无意识推论过程，下面的例子可以澄清。医生把一位表现特定抽搐的女病人，同其他病人安置在医院同一间病房；如果某天早晨得知这类特殊癔症发作已经受到模仿，他不会惊讶。……不过，心理传染大体以如下方式发生。病人们通常对彼此的了解，比医生对其中任何一人的了解更多；医生查房结束以后，她们会相互关心。其中一个今天发作；其他人很快就会知道，原因是家里来信、爱情悲伤重新受到唤起，或其他类似的事。她们的同情受到激发，一项没有进入意识的推论在她们内心发生：如果这种原因能引起这种发作，那么我也能这样发作，因为我具有同样诱因。倘若这是一项能够进入意识的推论，它或许会通向害怕同样发作的焦虑；但它发生在另一个心理场域，因而终止于受到恐惧之症状的实现。因此，认同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以相同病因诉求为基础的据为己有；它表达"就像"，涉及一种留存在无意识中的共同之物。

癔症最常使用认同来表达某种性共同性。癔症患者在症状中尤其——但并非只——认同于那些曾同她发生性关系的人，或者同她和相同对象发生性关系的人。语言同样考虑了这种构想。两个爱人是“一体”。]

当然，同受到嫉妒之女友的认同，正是弗洛伊德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如下事情：弗洛伊德在这段文本中强调的首要问题，是我们从分析第一步便最先遇见、谜底由之展开的欲望：病人在作这个梦时，一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满足的欲望。

这个未满足的欲望发挥什么功能？因为，如果我们从梦中读出一个愿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围绕这项愿望之满足所发现的，就是严格意义上属于人处在要求与欲望之间的根本情境。我正尝试把你们引入它，而且确实经由癔症患者把你们引入；因为，让我们大致这样说：癔症患者仿佛悬置于第一个阶段，悬置于我刚才试图向你们展示其必要性的要求与欲望之间的必然裂分。这里再清楚不过：

- 她要求什么？我谈的是梦以前、现实生活中的她。这个病人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要求什么？要求爱。而癔症患者像所有人一样——只不过这在她们那里更加累赘——要求爱。

- 她欲望什么？她欲望鱼子酱。只需阅读文本。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 她意愿什么？她意愿人们不要给她鱼子酱。

问题恰恰是：要使癔症患者维持一种使她满足的爱情往来，为什么必须：

- 第一，她欲望另一件东西；鱼子酱在这里唯一的角色，就是成为另一件东西；
- 第二，要使这件“另一件东西”充分履行赋予它的功能，人们恰恰不能把它给她！

因为，她丈夫巴不得给她鱼子酱。不过，他大概以为，这样自己会更加清静。可是，弗洛伊德明确告诉我们，她意愿丈夫不给自己鱼子酱，以便两人能够继续疯狂相爱，也就是无休无止地相互逗弄、给彼此找麻烦。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除了我们停下来考察它们这个事实外，这些结构要素并没有什么格外新颖之处；

然而，它们毕竟开始在这里取得含义。你们看到，这里所表达的是一套结构；远远越过其滑稽面向，它必定代表一项必要性。正如我们知道的，如果癔症患者恰恰是这样一个主体：对他而言，把他者构成为大他者、构成为言说标志的携带者，是某种难以同之建立如下关系的东西——这项关系使作为癔症主体的他能够保留主体位置；而这正是我们能够赋予他的定义本身。

总而言之，癔症患者如此向言说的暗示开放，以至于这里必定存在某种东西。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某处提出这种催眠如何产生的问题。它同睡眠的关系远非透明；某种谜样的选择性会攫取

——我的意思是满足——一些人，却在另一些人那里遭到抵抗与彻底远离。这表明，催眠中必然实现某个未知时刻；它本身也许使“力比多情境”的纯粹性能够在主体那里原初地成为可能。

我更愿意说“力比多态度”，因为所涉恰恰是我们正尝试阐明的位置与岗位；弗洛伊德谈到的这个未知要素，围绕要求与欲望的这种分节旋转。我们稍后会尝试展示这一点。因此，主体的这种关切、这种必要性——

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满足的欲望——同为主体构成一个实在的大他者所必需之物相连；也就是，构成一个不完全内在于要求之相互满足的大他者，

也就是不让主体的欲望彻底被大他者的言说俘获。

所涉的这个欲望按其本性就是大他者的欲望；梦的辩证过程极其准确地把我们引向这里。因为病人并不想让这个鱼子酱欲望在现实中得到满足：那么，在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这个梦中——它事实上无可争辩地倾向于使病人就自己追寻的问题之解答获得满足——这个欲望在哪里得到表现？

这个鱼子酱欲望在梦中由什么表现？梦中参与运作的人、弗洛伊德指出病人认同的那个人同样在那里。她是不是癔症患者并不重要！对病人而言，一切都纯之又纯，一切都癔之又癔。当然，大他者也是癔症的；而且事情尤其容易如此，因为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癔症主体几

乎完全从大他者的欲望出发构成自身。主体在这里陈述的欲望，同样也是大他者偏爱的欲望；甚至当她无法办晚宴时，只剩下这个欲望。

她只剩熏鲑鱼；它既指示大他者的欲望，也指示这个欲望可能得到满足，却只为大他者满足：不过不要担心，还有熏鲑鱼！梦并没有

说事情发展到她把熏鲑鱼给女友的地步，但意图已经在那里。意图已经在那里……

反过来说，她女友的要求当然是梦的发生要素：女友曾请求来她家吃晚宴——她家饭菜总是这么好吃，而且在那里还能遇见英俊的屠夫。这个可爱的丈夫总说这位女友许多好话，他心里也必定藏着自己的小欲望：那个年轻姑娘的屁股，在可亲画家提出为他勾画、描绘他那富有表现力又如此有趣的脸时，立刻受到唤起；这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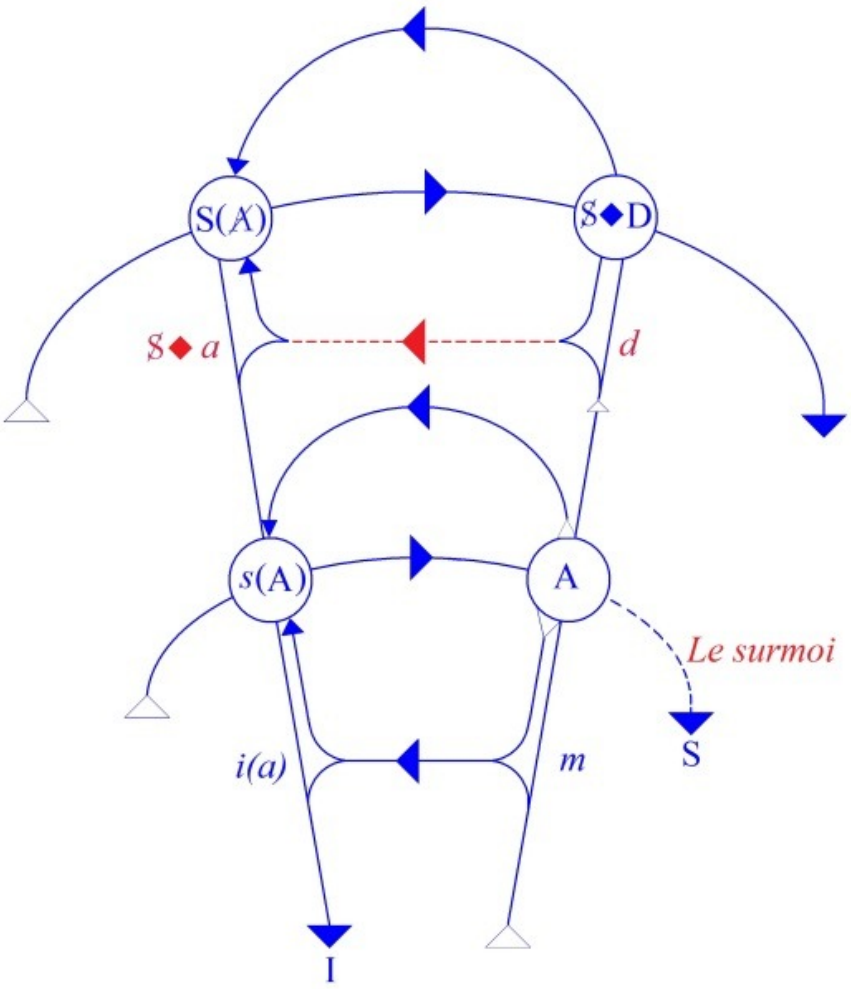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每个人都在彼岸拥有自己的小欲望，只是强度多少不同。癔症患者病例的重要之处在于，她向我们展示：对她来说，只要这个欲望处在一切要求的彼岸，也就是必须以遭拒欲望的身份发挥功能，它便占据首要角色。

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使用。如果不从承认这项最初结构要素出发，你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女性或男性癔症患者。另一方面，癔症在人同能指的关系中是一套完全原初的结构：如果你们不知道它位于结构的哪个位置，

只要把要求的辩证过程推进得足够远，就必定会在某个时刻遇见这种要求与欲望的分裂（Spaltung）；否则，就会冒犯下重大错误的风险，也就是把

病人变成癔症患者；因为我们在这里分析的一切，对主体而言当然都是无意识的。

换句话说，癔症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无法在要求中得到满足；但你们知道这一点却十分重要。抵达这里以后，我们将能够开始指出上次为你们画的小图式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甚至无法向你们给出定位和解释——当然，因为那样做还有些为时过早——但现在我们即将抵达那里。请看。




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所涉围绕某种如下的东西：表现为必须经过要求的需要，也就是必须朝向大他者。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场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相遇，大体占据可以称作讯息的位置，也就是s(A)：从大他者那里得到表明的东西……于是，要求的某种剩余产生

了；它在于改变主体欲望尚未成形时所表现的东西，而且原则上以主体认同的形式显现。

如果你们愿意，下次我会手持文本再次处理这一点。弗洛伊德第一次

以完全分节的方式谈论认同；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在我下次讨论以前先去阅读。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怎样表述它，也会看到，原始认同的表述方式同我在这里为你们标出的方式并无不同。

另一方面，你们知道，在自恋关系或自恋短路所处的这条道路上［$A_{\rightarrow} m_{\rightarrow} i(a)_{\rightarrow} I$］，主体同他者的关系中已经引入一种可能、一道开口、某种第三项的轮廓。我曾描述阳具的功能；它是某个能指，标记大他者作为受到能指标记者所欲望的东西。这是我带给你们的本质内容。

阳具就是这个标记大他者所欲望之物的特定能指；作为实在大他者、作为人类大他者，它存在于自身经济中。我们正在研究的正是这个公式：它［大他者］受到能指的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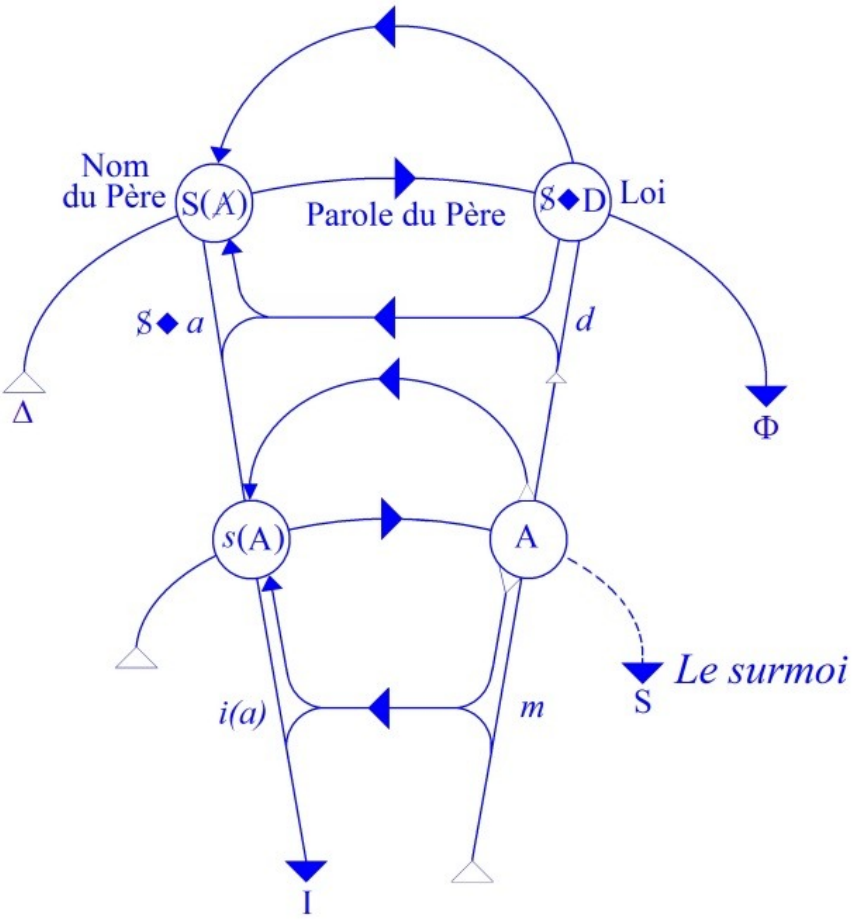
恰恰因为大他者受到能指标记，主体才必须、也只能经由这个大他者承认：归根到底，自己同样受到能指标记。也就是说，始终有某种东西留存在能够通过这个能指、也就是通过要求得到满足的东西彼岸；能指的作用在周围造成裂分，而这种同能指相连的不可还原剩余也拥有自己的标志。这个标志会在这里同所指中的这项标记发生认同；主体必须在那里遇见自己的欲望。

换句话说，正因为大他者的欲望遭到划杠，主体才会认出自己遭到划杠的欲望、自己那未满足的欲望。经由大他者，他同自己最真实欲望——也就是生殖器欲望——的相遇，发生在这个被划杠欲望的层面。

正因如此，生殖器欲望受到阉割标记；换句话说，它同阳具能指保持某种关系。这是两个等价的原因。

首先回应要求的是母亲的言说。所涉来自某种同它的关系；而且处在它的彼岸，也就是处在这种言说同一个彼岸法则之关系的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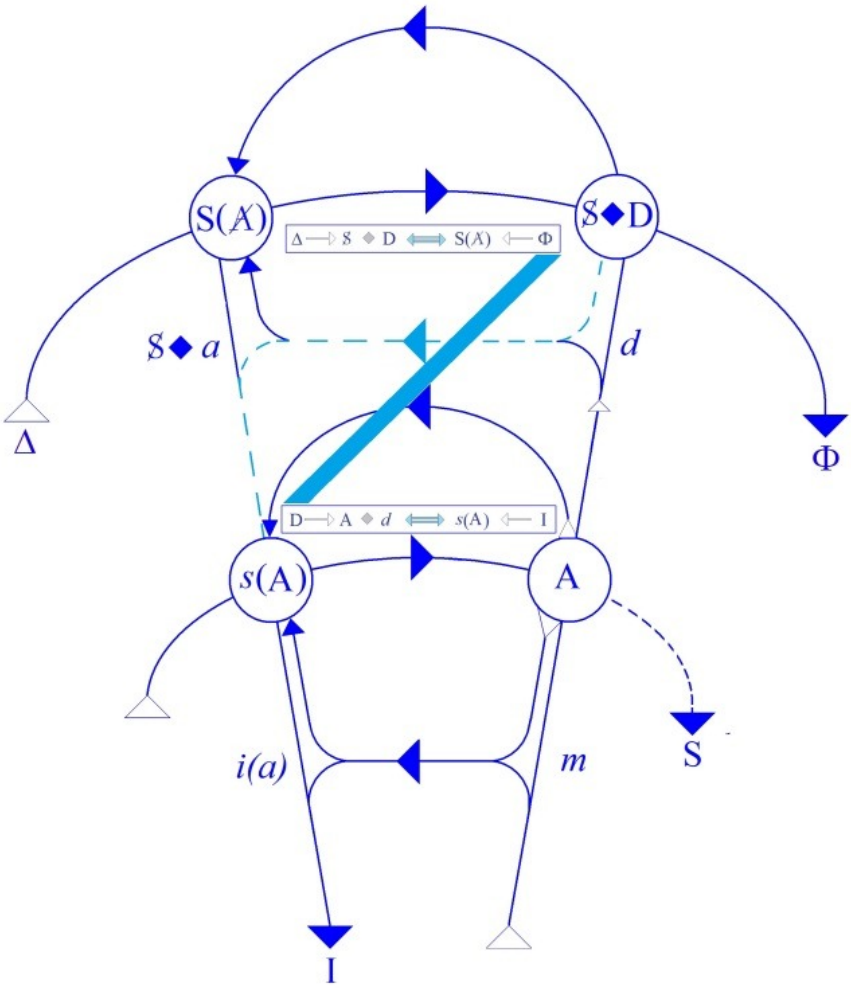
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这个法则由父亲化身。正是这一点构成父亲隐喻。




但是，你们完全有权认为——我想，我向你们解释时，恰恰是这类欠缺必定给你们也留下了某种有待欲望之物——一切都不能还原为言说的这种层叠。越过言说、越过元言说——无论怎样称呼，也就是越过父亲的法则——归根到底，还理应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当然，正是在这个法则所处的同一层面，这个选定能指——也就是阳具——得到引入；在正常条件下，这使这里发生之事在同大他者的第二级相遇中得到遇见。我的几个小公式把它称作 S(A)，即 A 的能指；也就是我刚才界定为阳具能指功能的东西：它标记大他者作为受到能指标记者——也就是遭到划杠者——所欲望的东西。

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样始于主体严格说来已经构成之时：主体不再含混，不再永久卷入大他者的言说；完整的主体仍处在同镜像时刻之关系的这一边，处在言说关系中同小他者的二元关系这一边。主体——在这里的 Z 形公式中——完整的主体，就是横杠已经得到引入的主体，也就是他自己同样在某处受到能指关系的标记。正因如此，主体同要求本身的关系 S ◊ D 才在这里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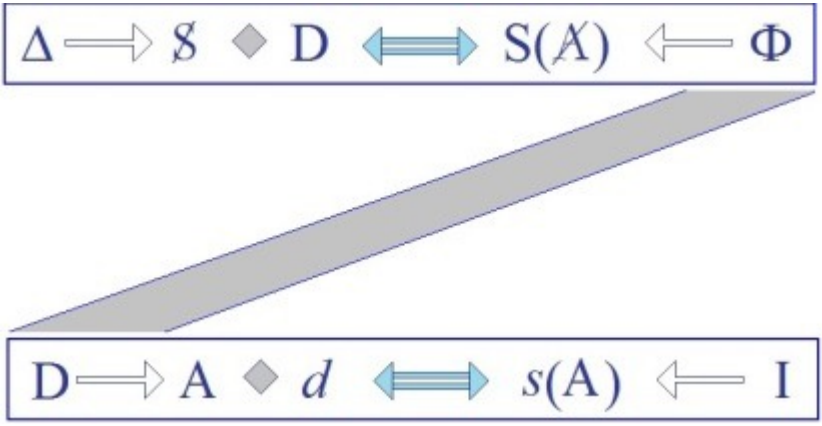

这是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的整合通常得以实现的必经阶段；

也就是，主体的欲望经由它们得到结构化。这如何发生？图中已经展开：经由阳具能指，超出同大他者言说之关系的彼岸之必要性如何得到引入。当然，一旦构成，它不会停留在这个位置；我的意思是，一

旦阳具作为大他者的欲望在那里，它就会整合到大他者的言说中。正因如此，阳具能指连同它包含的一切及其全部后果，会来到这里，占据同母亲之言说关系的原始位置；

它来到这里发挥自己的功能。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展开并解释事情：对尝试划定言说整合之各阶段的我们而言，所发生的是言说使欲望能够为主体找到位置；而对主体而言，这可以说始终是无意识的。我的意思是，此后，要求的辩证过程将在这里为他展开；他不会知道，这项要求辩证过程只有在其欲望、真实欲望于自身同大他者欲望的一种关系中找到位置时才有可能——这项关系对他而言仍然无意识。




换句话说，这两条线通常会互换；仅仅因为它们必须互换，间隙中就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意外。我们将以不同形式遇见这些意外。今天我只想向你们指出，对癔症患者而言，简单显现并前来填充这个功能的东西，是由于某些始终在场的欠缺要素。

之后我们仍会尝试指出它；不过，今天已经很容易唤起发生之事，大体如下：大他者欲望的这个彼岸，首先以纯粹状态在朵拉那里产生。我们立刻切实触及为什么整套要素中缺少一部分。

人们完全没有谈到母亲。你们也许已经在朵拉病例中注意到，她彻底缺席：

朵拉同父亲对峙。完全清楚的是，她想从父亲那里得到爱。她想得到父亲的爱；而且必须承认，在分析以前，朵拉的生活非常平衡。

我的意思是，在你们知道的戏剧爆发以前，她已经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十分幸福的解决方案：要求朝向父亲，而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父亲拥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在此事中进行得格外顺利，甚至正因为它是一个未满足的欲望。弗洛伊德没有向我们掩饰，朵拉很清楚父亲阳痿，而且他对 K 夫人的欲望是一个被划杠的欲望。不过，我们同样知道——只是知道得稍晚；弗洛伊德直到太晚才知道——K 夫人才是朵拉欲望的客体。她之所以恰恰是朵拉欲望的客体，是作为父亲的欲望、父亲的被划杠欲望之函数。

要维持这种平衡，只需一件事：朵拉必须处在某个位置，必须在某处实现这项基座、这项平衡与自我认同，使她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而这要作为未满足之要求的函数：要求父亲的爱。只要仍有一个欲望，而且这个欲望本身无法为朵拉或她父亲得到满足，这项要求就会这样维持良好。一切都取决于所谓自我理想的认同将在何处产生。你们在这里看到，它在起源处总是继两次穿过大他者之线以后发生。

这里也是一样，只不过父亲的欲望代表第二条线；在两次穿过两条线以后，癔症患者的认同将在这里实现。它不再是对父亲的认同——父

亲简单纯粹地只是要求所朝向的人时才会如此。不要忘记，如今还存在一个彼岸——它十分有利于癔症患者的满足与平衡——也就是父亲的欲望。

另一个人处在能够满足欲望的位置：K 先生，也就是如此迷人、

如此妩媚、如此光彩照人的 K 夫人之丈夫；K 夫人才是朵拉欲望的真正客体。他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朵拉是癔症患者，因为对一个癔症患者而言，过程无法继续向前。为什么？因为欲望是唯一负责占据这个彼岸位置的要素；这个彼岸在这里由主体相对于要求的特有位置所定位。但是，因为她是癔症患者，她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她只需要在某处存在彼岸的这个欲望。可是，要使她能够依靠这个欲望达到完成，找到自己的认同和理想，就必须至少在这个要求彼岸层面发生一次相遇，使她能够停靠并沿这条线定位自己。

她恰恰在 K 先生所在之处找到自己的他者——小写 a 意义上的他者，也就是她在其中认出自己的人；整项观察已经绝对明确地证明这一点。正因如此，她既对他极其感兴趣，又在最初欺骗身边的人——此时就是弗洛伊德——使他相信她爱 K 先生。

她不爱他，但他对她不可或缺。更加不可或缺的是，K 先生必须是欲望 K 夫人的人。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标出过一百次，整个循环之所以完全短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面对他者、小写 a，她重新落入攻击性爆发的情境；它在此表现为一记响亮耳光，也就是对他者的愤怒：

只要他是你的同类，他就会简单地夺走你的存在。

从 K 先生向她说出致命话语的那一刻起，这个可怜人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完全不是在那里支撑朵拉对自己的认同，理由很简单——妻子对他什么都不是。朵拉恰恰无法容忍这一点。为什么无法容忍？如果按照人们告诉我们的说法，朵拉像癔症患者一样，以一种虽不完整却显然属于同性恋的方式得到结构化，那么，她正常而言确实应当对此非常满意。

完全不是！这恰恰释放了她的愤怒，因为此刻，她那座癔症式漂亮构造崩塌了：这座构造把她认同于面具、认同于大他者的徽记——此时非常明确地说，是 K 先生而非父亲向她提供的、充实的男性徽记。也就是说，她此刻返回简单纯粹的要求，返回简单纯粹地要求父亲的爱；当她把自己设想成对父亲而言事实上更加客观的那个东西——一件交换客体——时，便进入一种近乎偏执狂的状态。也就是说，她是让 K 先生消遣、占住他的人；与此同时，她的父亲可以忙于 K 夫人——无论多么徒劳都无妨；这对他已经足够，因为你们在这里恰恰感到欲望的功能与本性。

可是此刻，我们的癔症患者从高处跌落，返回要求完全原始的性质：她此刻简单纯粹地要求父亲只关注自己；换句话说，要求父亲给她爱；再换句话说，按照我们的定义，要求父亲把自己没有的一切给她。正因如此，今天我刚刚为你们作了第一次围绕横杠的小练习，尝试向你们展示——恰恰以癔症患者为例——欲望同要求的这项关系是什么意思。

随着你们逐渐习惯这一点，我们将能够走得更加可靠、也更加遥远。

# 第21课 · 1958年5月7日

我们从一项近况出发；昨晚参加学会“科学报告”的诸位已经能够领会它。有人向你们谈论异性关系。这恰恰也是我们试图谈论的东西：在那个视角中，异性关系被证明从根本上具有形成作用。归根到底，它是父母与儿童之间发展张力的一项初始材料。

从另一视角来看——它正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且无疑符合初步经验——受到追问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人类之间的异性关系是一种简单的东西吗？事实上，如果我们依照经验，看来并非如此。

倘若它很简单，看来它至少应当在人的世界内部形成一系列和谐小岛，至少为那些已经设法清除坏灌木的人如此。

迄今看来，我们不能认为分析家在这里拥有一种共同声音——而且，毕竟有必要为此搬出分析家吗？即便抵达完成，

异性关系对人而言也没有表现为某种［……］，因为人的整个问题至少可以说恰恰围绕它旋转。

例如，让我们看看巴林特的著作；它们颇为集中于此，因为这甚至出现在那部文集的标题——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生殖器之爱》[注1]——中。作品证明，一次完全最终的分裂（Spaltung）仍然共存，欲望潮流同温柔潮流并置。异性关系的整个问题正围绕这种并置构成。

> [注1] 迈克尔・巴林特：《论生殖器之爱》，《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29 卷，1948 年，第 34—40 页；亦见《原初之爱与精神分析技术》。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这丝毫没有削弱昨晚报告的趣味，远非如此！仅仅它采用的参照术语就值得注意，例如这种审美条件、对性器有意识而审美的赋值；

重新采用报告者的术语，它在她的视角中构成俄狄浦斯关系的一个根本阶段。

多尔多夫人告诉我们，儿童自己的性器及其象征呈现为美好形式；她还补充说：“性器是美的。”从说出这句话的嘴里传来，这个视角对这种男性性器的拥有者无疑颇为恭维[注]。

> [注] 法文 sexe 可以指性、性别或性器官；这里紧接 ce sexe mâle（这种男性性器）以及下文的阳具勃起。J.L. 速记稿与米勒编订本均保留这一衔接，故此处不能译作抽象的“性别”。

总之……这似乎也不是一种可以由我们以单义方式采用的材料。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位发言者围绕这个问题以权威方式提出的全部保留意见，以及他向我们作出的所谓民族学观察；毕竟，如果我们参考野蛮人——那些历来构成人类学家参照词项的高贵野蛮人——

那么，只要野蛮人确实是原初者，阳具的这种美好形式看来并非初始材料。

总而言之，按照全部文献——我甚至不是指学术文献，不是指那些

后来在民族志学家书房里加工的东西，而是指那些亲赴现场、身处所谓“野蛮人”——无论好坏——之中的民族志学家所能提供的经验——看来，至少隐藏阳具的勃起，确实是两性关系的基础与原则，即便在最落后的部落中也是如此。即使一些部落只拥有最原始的衣着方式，某种恰恰用于隐藏阳具的东西仍然存在，

例如民族学见证的阴茎套；它作为严格的残余、作为最后留下的衣物存在。这件事十分醒目。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民族志学家还见证，女性在面对严格意义上的阳具勃起表现时，会产生一种作为真正原初反应的恼怒。例如，在极少见的完全没有衣物的情形中，在楠比夸拉人那里——你们知道，我们的朋友列维—斯特劳斯曾多次访问，并详细谈论他们——我曾就这个领域向列维—斯特劳斯提出问题，而他向我作出见证；况且，我此刻告诉你们的内容反映了他见证并在自己的书中说过的事情：他从未在群体面前，以自己能够看到的方式观察到男性勃起。性关系并不特别躲藏，而是在晚间营火周围、离群体两步之处发生；但是，勃起无论白天还是当时，都不会公开被看见，也不会公开发生。这同我们的主题并非毫无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必须把阳具的意指本身安置为“美好形式”，

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颇为片面的视角。我很清楚，另一边也存在女人的“美好形式”。

文明的一切要素当然都为它赋值；不过，即便只是由于其个体多样性，我们也不能说自己可以在这里谈论一种单义的“美好形式”。让我们实际地说，无论如何，这种“美好形式”比另一种留下更多浮动。每个女人背后无疑都会勾勒米洛的维纳斯或克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之形，不过，结果并不总是单义地有利。

人们曾经大力责备杜米埃把自己时代那些身形略显松垮的男女市民之形，赋予希腊诸神；这被指责为亵渎。这里恰恰十分准确地安置了我所指出的问题：如果使诸神人化显然如此可悲，那无疑是因为人并不总能如此轻易地神化自己。

简言之，完全清楚的是，如果人类繁衍的必要性交付给“美好形式”这个主体，那么，全部迹象都表明，我们会满足于中等要求；“美好形式”这个术语或许并不完全适合履行这项任务，至少始终颇为谜样。

事实上，为给阳具的这种“美好形式”赋值而说出的一切恰当、醒目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其中受到追问的东西。这当然不消除它作为凸显形式、占优形式的性质[注]；不过，我们在这里继续的论述，只要有其根据、只要直接延续的不只是弗洛伊德的论述而且还有弗洛伊德的经验，就会给我们另一种关于阳具意指的观念。阳具不是一种形式，也不是一种客体形式；后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俘获性的形式、令人着迷的形式，因为问题在大他者中仍完整存在。

> [注] 此处 prégnante 属于形态 / 完形心理学语汇，指一种会以强大力量凸显于知觉、形成稳定完形的形式，不是“孕育性的”。J.L. 速记稿与 Staferla 均并列 forme prégnante, forme prévalente；米勒编订本删去前一项，只保留 forme prévalente。译文保留速记稿的两项，并记录米勒本异文。

相关知识卡 格式塔心理学的“良好形式”与拉康的批评

两性之间的吸引是一件无限复杂得多的事情；分析学说的全部经济向我们揭示这一点。我们正在着手按照如下公式给出解答；

这个公式本身当然仍只是必须展开才能得到理解的公式：

阳具既不是幻想，也不是形象，更不是客体——无论部分客体还是内部客体——它是一个能指。唯有它是能指这个事实，才使我们能够表述并构想它在两性相遇的不同层面承担的各种功能。

说它是一个能指还不够。是哪一个？它是一个能指，是欲望的能指；这当然提出一个走得更远的问题：欲望的能指是什么意思？这项断言的分量显然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说出

并表述欲望在其公式中是什么。

在我们的经验中所占据的功能里，欲望恰恰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

它不只是两性的食欲、两性的吸引或性本能。当然，这也不排除存在程度不一、因人而异的倾向；它们具有某种原初性质，大体显现为这个或那个个体面对性结合时力量的强弱。这件事丝毫没有解决我们在这个或那个个体——无论是否神经症患者——那里看到的欲望构成问题。其欲望的构成，同他可以说作为性能力行囊所拥有的东西，是两件不同的事。

因此，为了在昨天的视角可能造成的迷失以后重新上路，我们将

径直重新把握弗洛伊德的文本。我必须说，这项观察不是今天才作出的，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梦的解析》这部文本的存在令人赞叹，

仿佛一种奇迹；因为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把它读成一项正在行进的思想。

而且远不止如此：事情按照对应于一种多层而过度决定的构成——这个词恰好适用于这里——的时间得到引入；因此，只需像我上次告诉你们那样，从最初几个梦重新开始，最先出现之物的分量就远远超出标题把它们放在开头的那些理由。

一些最初的梦——例如我上次同你们评论并称作“美丽女屠夫之梦”的梦——在那里出现，是为了讨论前一天的回忆如何参与梦的决定过程。你们已经看到，从另一方面说，它确实用于处理要求与欲望的问题；不是我把它们放进梦里，它们本来就在：要求与欲望都在那里，而弗洛伊德没有把它们放进去。

是弗洛伊德自己读出了它们。他看到病人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满足的欲望。这是弗洛伊德说的；仅凭这一点，再加上我们此后知道的一切——当然，弗洛伊德写下它时并不是手持一盏小灯、替它贴上名称；他已经从某种视角看待事情——如果他以这个次序安置事情，那是受到接近与构成之需要的推动；这远远超出章节划分。事实上，这个梦以真正而格外特殊的方式，引入一个

对我正尝试向你们推进的视角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欲望，以及这里的要求。

几乎无须说，要求也无处不在；因为这个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位女友要求她邀请自己来家中吃晚宴。况且，在梦本身中，要求以最清楚的形式存在。病人知道当天一切都关门，自己无法弥补材料与存粮的不足，无法应付必须提供的晚宴。随后，她提出要求；它以能够呈

现要求的最清晰、最孤立方式提出——她在电话中要求。在当时——这是《梦的解析》第一版的一部分——电话尚未得到普遍使用；电话确实在那里带着自己的全部象征力量。

让我们再向前一点：接下来会遇见哪些最初的梦？

我们进入“梦的材料与来源”［第五章］，首先遇见“植物学专著之梦”；这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梦。我会跳过它，但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准确带来

我们此刻能够期待的东西，也就是我今天恰恰要尝试向你们展示的：观察阳具能指同欲望的关系如何运作。只不过，因为这是弗洛伊德的梦，向你们展示会自然更长、也更复杂一些。

如果有时间，我会这样做。它完全清楚，严格按照我上次给你们的小图式结构起来；上次谈到癔症患者的欲望时，我已经开始为你们画出这个图式。但是弗洛伊德

并不简单纯粹地是癔症患者：如果他同癔症之间具有一切欲望关系都包含的关系，那也是以一种更加精心加工的方式。因此，我们跳过植物学专著之梦，来到一位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属于癔症患者的病人那里，重新把握癔症患者的欲望：

> “一位聪明、细腻却又性格矜持、属于‘静水流深’类型的年轻女士讲述：‘我梦见自己太晚赶到市场，在肉贩和菜贩那里什么也买不到。’这当然是一个无辜的梦；不过，梦不会这样呈现，我要求她详细叙述。如下：她同提着篮子的厨娘一起去市场。她提出某项要求以后，肉贩告诉她：‘已经买不到了’，又想给她另一件东西，

并说：‘这个也很好。’她拒绝了，前往菜贩那里。菜贩想卖给她一种奇特蔬菜，扎成小捆，却是黑色的。

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要。’”

［德文原文表达同一内容。］

弗洛伊德的评论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并不是我们分析了这个病人。

所要看到的是，弗洛伊德认为自己能在一部怎样的著作里找到什么：在当时，它就仿佛第一部原子理论著作突然问世，却同此前的物理学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准备。事实上，它确实受到了近乎彻底的沉默。因此，弗洛伊德就在书的最初几页，为了谈论近期而无关紧要之物在梦中的在场［第五章第一节］，若无其事地向读者“抛出”如下评论，并尝试把这个梦同当天事件联系起来：

“她确实太晚去市场，什么也没买到。人们忍不住会这样描述这段经历：肉铺已经关门。”

但他没有说这是病人说的。他已经相当迅速地向前推进，说事情自然迫使人这样表述。不过，停一下！弗洛伊德评论道：

“这难道不完全像一种非常粗俗的说法，涉及一个男人在衣着上的某种疏忽吗？”

换句话说，在维也纳俚语中，人们似乎会这样谈论一个忘记扣裤扣的人；至少在熟人之间，通常会用下面这句话提醒他：

“你的肉铺没有关门。”

“不过，做梦者没有使用这些词，”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并补充道，“她也许避开了它们……话虽如此，让我们继续寻找。”

“当梦中的某件东西具有论述性质，是被说出或听见、而不是只在思想中出现——通常很容易区分——它便来自清醒生活中的

论述……”

因此，所涉是作为横幅上的铭文而进入梦的言语。它们不是情境所蕴含的东西；所涉的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很容易区分的东西，

也就是语言要素；弗洛伊德要求我们始终把它当作独立有效的要素。

> “它来自清醒生活中的论述。它们当然被当作原材料处理，被切碎、略加改变，尤其同原本所属的整体脱离。解释工作可以从这类论述出发。那么，肉贩的那句话——‘已经买不到了’——来自哪里？”

“Das ist nicht mehr zu haben（已经买不到了）。”弗洛伊德后来写作《狼人》时，把这句话作为一项证据交给读者：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重构主体生命中遗忘以前之物、幼儿遗忘以前之物的困难。他正是就此告诉病人：

> “这些话是我自己说的。几天前，我向她解释，最早的童年亲历已经无法作为其自身重新取得；不过，在分析中，它们通过移情与梦重新交还给我们。因此，我就是肉贩，而她拒绝把古老的思想与感受方式移情到现在。那么，她在梦里说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要’又来自哪里？

> 分析必须拆开这句话。几天前，她本人同厨娘争执时曾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还补充：‘请你规矩一点！’——Benehmen Sie sich anständig！”

她对厨娘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这段话是作为句子要素受到采用。正如弗洛伊德所说，“Das kenne ich nicht,

das nehme ich nicht（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要）”这句话在梦中保留的，恰恰是不具有那项意指的部分；审查恰恰倾向于排除的是对女佣说出的另一部分。弗洛伊德注意到，因为这部分在梦中得到保留，意义才对应“Das kenne ich nicht, das nehme ich nicht”。如果更严谨，还可以补充：

“Das kenne ich nicht, Benehmen Sie sich anständig!（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请你规矩一点！）”

> “我们把握到移置：她对厨娘说的两句话中，梦只保留了没有意义的一句；受到压抑的另一句，才同梦的其余部分相符。人们会对一个故意衣着不整的人说：‘请你规矩一点！’”

［这里可以把移置切实抓住：她对厨娘使用的两句话中，梦采用了没有意义的那句；受到压抑的“请你规矩一点！”却独自同梦的其余内容相符。人们会对一个胆敢提出不体面要求、又忘记“关上肉铺”的人这样喊。］

这同样不是十分准确的翻译，因为德文原文是：

“人们会对一个胆敢提出不体面要求、又忘记‘关上肉铺’的人说：‘请你规矩一点！’”

这个译文是随意发挥的。

> “我们的解释确实准确，这一点由它同蔬菜女贩事件背后的种种暗示相吻合而得到证明。一种成捆出售、形状细长而且还是黑色的蔬菜，除了梦把芦笋与黑萝卜混在一起的产物，还能是什么？我无须为任何人解释芦笋；不过，另一种蔬菜在我看来同样也是一个暗示。”

“暗示”一词并不在德文原文的这个位置；德文原文说，另一种蔬菜指向一个性主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猜到了这个同一的性主题；当时，我们想用下面这句话来象征整段梦叙：

‘肉铺关门了。’我们在这里无须发现这个梦的全部意义；只要已经证明它充满意义、绝非无辜，就足够了。”

［我们的解释确实已经找到踪迹，这一点随后由蔬菜女贩事件中蕴含的种种暗示彼此呼应而得到证明。一种捆扎成束出售的蔬菜（她后来补充说，它是长形的），而且还是黑色的；这除了芦笋与黑萝卜在梦中的结合，还能是什么？对任何知情的男人或女人，我都无须解释芦笋；不过，另一种蔬菜——作为一句呼喊：Schwarzer, rett’ dich!（黑家伙，快救救自己！）[注]——看来同样指向我们从一开始就猜到的那个

性主题；当时，我们想用“肉铺关门了”来替代整段梦叙。无需完整认清这个梦的意义；有一点已经确定：它富于意义，绝非无害。]

> [注] 德文 schwarzer Rettich 是“黑萝卜”；弗洛伊德把 Rettich 拆听为 rett' dich（救救自己），又让 schwarzer（黑色的 / 黑家伙）成为呼语。法译只保留了“暗示性主题”，没有呈现这层声音双关。

如果刚才显得稍微有些冗长，我向你们致歉。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许多，我只想把内容重新集中到这个我们往往读得过快的小梦上。这里以最清楚的方式表现了癔症患者同某种东西的另一种关系；我们此刻正把自己的目标集中在它上面。上次我已经指出，癔症患者在梦和症状中，需要在某处标出欲望本身的位置。这里所涉的是另一件事：阳具能指的位置。

让我们把自己的理论论述同这些关于癔症患者之梦的参照交织起来，以便有所变化，从而也减轻你们注意力的疲劳。紧接着还有同一位病人的另外三个梦；适当时我们会加以利用。让我们暂时停在此刻需要凸显的东西上：所涉仍是前几天的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现象，也就是应当给欲望怎样的位置。

不过，在这里得到标出的，并不是主体外部场域中一个欲望本身的位置：

- 只要她在要求的彼岸拒绝把这个欲望给予自己；
- 只要她在梦中把它承担为他者、也就是女友的欲望，所涉就是由自身能指支撑的欲望；既然我们讨论的正是这个东西，按照假设，这个能指就是阳具能指。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能指在这里发挥什么功能。

正如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弗洛伊德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含混地引入了阳具能指以及这里受到追问的东西；它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分析中唯一没有作为这样一种要素加以凸显的东西——毕竟，他总得给我们留下一点工作——但它极其醒目。事实上，如果阳具不是欲望客体而是欲望的能指，那么，主体相对于阳具之行为的全部含混，就会落在如下两难之中：这个能指，

- 主体可以拥有它，
- 或者可以成为它。

正因为它是一个能指，这项两难才会提出；而且，这项两难绝对至关重要：正是它

处在阉割情结的一切滑动、一切嬗变和全部戏法——姑且这样说——的根底。

为什么阳具会来到这个梦中？我不认为，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出发，说阳具作为阳具在这位癔症患者的梦中围绕弗洛伊德那句话——“Das ist nicht mehr zu haben（已经买不到了 / 再也无法拥有）”——得到现实化，我们就作出了任何滥用性的跨越。

我已经请人向我确认“拥有”这种可以说是绝对的用法；它表现在某种语言用法中，使我们说“拥有它或不拥有它”，或者，用法语说得更好：“有还是没有”；德语中同样具有这层意味。在这里，这句话所涉及的是阳具作为欠缺的客体涌现。谁欠缺的客体？这当然正是应当弄清的事情；不过，最不确定的恰恰是：它是否简单纯粹地就是主体作为生物学主体所欠缺的客体。

让我们说，首先并且首要的是，这件事以能指性术语呈现；只要引入它的是一个句子，是一个以如下方式得到分节的句子，它就同另一个表述相连：这是“再也无法拥有的东西”——Das ist nicht mehr zu haben。

这不是一次令人受挫的经验，而是一项意指，是对客体欠缺本身的能指性表述。当然，这同我在这里置于首要位置的观念相符：阳具在这里是能指，只要有谁没有它——是谁？——没有它的是大他者。因为所涉的是一件在语言层面得到表述、并作为这样的东西安置在大他者层面的事情；它是欲望的能指，只要欲望被表述为大他者的欲望。我稍后会回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梦。所涉是同一位病人的第二个梦，一个据说“无辜”的梦。

> “她丈夫问：‘是不是该给钢琴调音了？’她回答：‘没必要！……Es lohnt nicht！’”

这句话的意思近似于：“不划算！”

> “‘首先得把它重新包起来。’这是前一天一个真实事件的重复。不过，她为什么会梦到这件事？她确实说，这架钢琴是一个令人恶心的箱子，发出的声音很难听，而且她丈夫在婚前就已经拥有它。”

正如分析将向我们展示的，她说的恰好同自己所想的相反；也就是说，她丈夫在婚前并不拥有它。

“不过，‘没必要’这句话会给我们答案。弗洛伊德说，她昨天拜访一位女友时说过这句话。人们请她脱下短上衣，她拒绝说：‘没必要，我马上就得走。’于是我想到，昨天在分析过程中，她曾突然把手伸向自己的短上衣；那里有一颗纽扣刚刚绷开。这就仿佛她在说：‘请不要看这边，没必要。’这样，她用胸廓替换了箱子——箱子：Kasten；胸廓：Brustkasten——梦的解释把我们带回她身体发育的时期：当时，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形态感到不满。如果我们留意‘令人恶心’和‘难听的声音’，并且回想女性身体的小半球在暗示和梦中多少次以对照和替代的方式代替大半球，那么，分析还会把我们带回童年。”

［德文原文表达同一内容，并把词语关系写作：Kasten（箱子）补成 Brustkasten（胸廓）。］

这里，我们来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果阳具是欲望的能指，而且是大他者欲望的能指，那么，对处在这场欲望辩证过程第一步的主体而言，问题的另一面如下：

所涉是成为或不成为阳具。

让我们径直信赖自己赋予阳具的这项能指功能，并这样说：正如“一个人不能既是又曾经是”，一个人同样不能“既是又不是”；如果一个人所不是的东西必须成为他所是的东西，那么，剩下的做法就是不成为他所是的东西。也就是说，把他所是的东西推入显现之中；这极其准确地就是女人在癔症中的位置：作为女人，她把自己做成面具。

她把自己做成面具，恰恰是为了在这张面具背后成为阳具。癔症患者的全部行为都与此相关；这种行为显现在她伸手去碰纽扣的动作中

——长久以来，弗洛伊德的眼睛已经使我们习惯于看出这个动作的意义——但它同时伴随一句话："没必要。"

为什么说"没必要"？当然，因为不能让人看到背后；因为背后自然应当有阳具。可是，确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看，因为在那里恰恰找不到它！对癔症患者来说，所涉……正如弗洛伊德紧接着在一条写给他所谓 die Wissbegierige 的注释中带给我们的；法文把这个词译作"那些想要深入探究的人"，

更确切、更严谨地说，它的意思是："求知爱好者"。

这会把我们带到某个东西的核心；也许我已经用一个借自某种道德学的术语向你们标示过它。尽管如何，这种道德学仍带有一种也许比许多其他道德学更加丰富的人类经验；它就是神学道德学所谓的 cupido sciendi［求知欲］，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来翻译欲望的术语。

谈到欲望时，各种语言之间的对等关系是些微妙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已经从

讲德语的学生那里得到过一个提议："Begierde。"这个词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不过，一些人认为它太过动物性。黑格尔竟用它谈论主奴关系，倒很有趣；主奴关系并没有太多动物性色彩……

因此，弗洛伊德说："我要指出，这个梦覆盖着一个幻想：我这边作出挑逗行为，他那边加以防御。"

简言之，他再次向我们指出了癔症患者的一项根本行为；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这个语境中看见它的意义：癔症患者的挑逗，恰恰趋向

于构成欲望；但越过所谓防御，它又趋向于指出一个位置——越过这种外观、

这张面具，那里存在某种从根本上被呈交给欲望的东西。当然，欲望无法接近它，因为它被呈现在一层面纱背后；但另一方面，它自然也不可能在那里被找到：

“你没有必要打开我的胸衣，因为你在那里找不到阳具；但是，如果我把手伸向胸衣，那是为了让你欲望我胸衣背后的阳具，也就是欲望的能指。”

这也许会使我们开始追问：为了让你们切实感觉到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极其严格地

界定这项欲望？我的意思是，不要局限于某个人在同我对话时所说的东西：谈到我不时又端给你们、而你们绝不能让其离开视野的那些小小线条框架时，他在我看来颇为恰当地把它称作一架小小的考尔德活动雕塑。为什么？

让我们尝试表述，所谓“欲望本身”是什么意思。在这场辩证过程中，我们把欲望放在这架小活动雕塑的要求彼岸。为什么需要一个要求的彼岸？我已经告诉过你们，需要一个要求的彼岸，是因为要求出于自身得到分节的必要性，会使需要偏离、改变并移置。因此，某种剩余便可能存在。

只要人被卷入能指辩证过程，某种东西就会出问题；无论那些乐观人士怎样想，他们无疑会向我们指出，儿童与父母之间对另一性别的定

位如何顺利。只缺一件事：父母之间也能同样顺利；而我们恰恰正是在这整个层面上处理问题。

因此，存在一项剩余。它怎样呈现？它必然必须怎样呈现？现在所涉还不是性欲望。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性欲望必须来到这个位置；不过，只要人的一项需要同能指之间存在一般关系，我们就面对如下事情：能指对需要的作用标出一道偏离的边缘；如果某种东西恢复这道边缘，并且这个彼岸得到呈现——经验证明，它确实会呈现——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欲望。

不过，就欲望呈现的可能形式而言，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表述：人类主体的欲望必然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取决于要求的辩证过程所决定的东西。如果要求对需要产生某种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我已经在这里表述过：从根本上说，要求在其存在中，

而且仅凭它作为要求得到分节这一事实，便把大他者设定为“缺席”或“在场”，并设定大他者给予或不给予这项缺席或在场；也就是说，作为对爱的要求，它所要求的是某种什么都不是、不是任何特定满足的东西；主体单凭对要求作出回应，便带来这个东西。

正是在这里，象征界以要求形式得到引入的原创性取得位置：也就是说，

相对于需要，要求之引入的原创性安置在对爱的要求这一背景上。如果无论以什么形式，这件事都相对于需要包含某种损耗，那么，这种损耗是否应当在要求的彼岸重新找到？完全清楚的是，如果它必须在要求的彼岸重新找到——也就是越过要求这个维度归根到底给需要带

来的扭曲——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在彼岸重新找到某种东西：在那里，大他者失去自己的占优地位；或者，如果你们愿意，需要只要从主体出发，便重新取得首要位置。

然而，既然被要求之物已经穿过要求的过滤器，抵达无条件之物的层面和阶段，那么，我们只有以可以说第二重否定的名义，才能在彼岸重新找到恰恰需要找到的东西，也就是在这项要求中已经丧失之物的边缘。而这个彼岸，恰恰就是欲望所具有的绝对条件性质。

在欲望本身中呈现的东西，当然是某种借自需要的东西……

如果不借用我们需要的原材料，我们又怎样形成自己的欲望？ ……不过，它所进入的并不是无条件状态——因为所涉是某种借自一项特定需要的东西——而是绝对条件状态；它同需要与任何客体之间的一切比例都不可通约。之所以恰恰可以把这项条件称作绝对的，是因为它在这里废除了大他者的维度；这是一项大他者无须回答“是”或“否”的要求。

这就是人类欲望本身的维度和根本特征。无论是什么欲望，只要处于纯粹欲望状态，就是如下东西：它是某种从需要的地基上拔出的东西，并且取得一种

相对于大他者的绝对条件形式。

这恰恰是边缘，是从对爱的要求中减去需要的迫切要求所得的结果——姑且这样说。也就是说，反过来，欲望将呈现为对爱的要求中抗拒被完全还原为需要的东西；因为事实上，它除自身以外什么也不满足，也就是作为绝对条件的欲望。

正因如此，性欲望会来到这个位置；恰恰是因为对主体、对个体而言，性欲望从根本上在两个层面都呈现为问题。第一，在需要层面，最先强调这一点的并不是弗洛伊德；自世界成为世界以来，人们便一直追问：人这种具有辨认何者对自己有利之能力的存在，怎样承受、怎样接受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无可争辩地把他推向种种反常的极端，

因为它不对应任何可以直接加以合理化的需要，反而把所谓物种的辩证过程引入个体之中。

性需要依其本性，对一个恰恰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主体呈现为某种问题——即使哲学家用另一种方式表述过这个主体：

- 也就是一个能够合理化自身需要的人，
- 也就是能够用等价关系的术语表述这些需要的人，
- 也就是能够用能指的术语表述它们的人。

第二，相对于对爱的要求，性欲望的表达同样以问题方式呈现——它恰恰将成为欲望，并被称作欲望，因为它只能安置在我们刚刚界定的欲望层面——无论人们怎样说，也无论人们试图以忘我性形式、用什么圣水把它覆盖。

相对于所有语言中所谓“表述自己的要求”，欲望问题都具有问题性。因为，用这里颇有揭示力的最日常语言来说，归根到底，无论要求以什么方式得到表述，都会勾勒出如下东西：从性欲望受到追问的那一刻起，大他者便以欲望工具的形式参与运作。

正因如此，性欲望作为一个问题，正是在我们如此界定的欲望层面提出；也就是说，它无法真正得到表述。

没有真正的词语能够表达某种东西——请听我亲口这样说，因为让我说出并非一切都能还原为语言，也许不是坏事；当然，我一直这样说，即使人们没有听见——没有词语能够表达某种东西，而这件东西却有一个名称，它恰恰就是欲望。民间智慧对此知道得很清楚：要表达欲望，只有花言巧语（baratin）。因此，欲望之能指的问题本身便得到提出；正因如此，表达欲望的东西不是一个同其他能指一样的能指。

它确实是某种借自生命之流在这个秩序中的冲力之占优形式的东西；不过，它仍以能指的名义被纳入这场辩证过程，并且带有一切进入能指维度之物在转入能指界时包含的僵死化。

这种含混的僵死化在这里极其准确地以面纱形式呈现；我们每天都看到这层面纱以癔症患者胸衣的形式重现，也就是女人在欲望问题上相对于男人的根本位置：在那里，在短衫背后，尤其不要前去观看，因为那里当然什么都没有；恰恰除了能指，什么都没有——而这并非无物——也就是欲望的能指。在这层面纱背后，存在着某种不得展示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上次或上上次谈到“古代秘仪中阳具的揭示”时向你们提到的魔，呈现出来、得到表述，并被命名为羞怯之魔。而羞怯在男人和女人那里具有不同的效力。

无论它的起源是什么，我已经暗指过这一点：

- 是女人对它怀有的恐惧，
- 还是某种从男人细腻的灵魂中自然而然涌现的东西…… 我已经暗指过这层面纱；在男人那里，它十分规律地覆盖阳具。大致在正常情形下，覆盖女人整个存在的，恰恰是同一个东西，只要受到追问的东西恰好位于背后。受到遮蔽的，是阳具的能指。揭开某种只会显示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也就是揭示出受到揭开之物的缺席，极其准确地同弗洛伊德谈到女性性器时所谓美杜莎头颅引发的“惊骇”、或者回应这种作为缺席本身得到揭示的“恐惧”相连。

归根到底，从这一视角来看，欲望主体同欲望之能指之间的这场游戏，在我们目前抵达之处远未穷尽，而只是刚刚开始。不过，你们清楚地看到，它彻底颠覆了某种观念；例如，有一种观念遮蔽了在性关系中接近他者的整场辩证过程，并据说会由性关系使之成熟：进展就是从部分客体走向完整客体。严格说来，这里存在一种真正的伪装、一场偷换。

因为，用准确的术语来说，真正的问题毋宁由如下事实提出：当他者进入欲望的位置时，他根本不会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成为完整客体。问题反而在于：作为欲望的工具，他会彻底成为客体。

他确实会成为这个东西；所要做的，是使他者作为大他者的这个位置仍然与之相容，

也就是，使他仍然作为言说的场所、要求所朝向的人而存在；他作为大他者的根本不可还原性，表现在他可以给予爱，也就是可以给予某种愈加彻底无偿的东西，

因为爱没有任何别的支撑，只有我曾告诉你们的这一点：给予自己的爱，恰恰而且从根本上，就是不把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作为爱给出；因为恰恰只要人并不拥有爱，所涉才是爱。

一种主体性给予或不给予爱，其中具有某种绝对之物；而要接近这个主体，把他作为欲望客体，又恰恰必须让他彻底成为客体：所涉就是二者之间的这项不协调。性欲望之接近的困难，正位于这道从根本上令人眩晕、从根本上令人恶心——直呼其名——的差距之中。

在某处，弗洛伊德曾极其准确地暗指癔症患者以恶心与厌恶形式表现的症状；他把它同眩晕现象相互靠近，因为……

这样说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的文本[注2]。布洛伊尔的文本援引马赫及其关于《运动感觉》的研究，以一种直觉标出：这个迷路性现象的根本机制，存在于视觉感觉与运动感觉的不协调之中；这个现象会显现，而我们也会看到如下系列勾勒出来：眩晕、恶心与厌恶。

> [注2]　约瑟夫·布洛伊尔：《理论性考察》，载约瑟夫·布洛伊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癔症研究》，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

事实上，下面这件事完全可以观察，而且我已经在不止一个人身上观察到：以阳具能指的形式领悟和知觉在欲望中对大他者的接近……在能够分析这样一件事情之处，会产生一种短路；阳具能指同某种东西建立这项短路，而在主体那里，这个东西当时只能显现为空位，也就

是器官通常应当占据的位置——我的意思是两腿之间的位置；在那个时刻，它只作为一个位置受到唤起……这件事伴随如下事实——我可以就这个主题向你们提出十个观察，它们采取各种形式：有的完全鲜明、赤裸而清楚，有的采取各式各样的象征形式；不过，主体无论如何都说得十分明白——只要作为欲望客体的他者被知觉为阳具，并且作为阳具又被知觉为主体自身阳具位置上的欠缺，主体便会感到某种近似于一种非常奇特的眩晕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它向我比作一种形而上学的眩晕；在另一些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主体面对存在本身的观念时曾体验这种眩晕，只要存在本身潜藏在一切存在者之下。

今天，我会在这里结束。我们将返回癔症患者成为阳具或拥有阳具的辩证过程。

我们还会进一步推进。你们将看到，它会把我们带到强迫症患者那里的什么地方。

我现在就向你们预告：你们毕竟应当清楚地感觉到，这同另外一整场想象性辩证过程并非没有关系；人们不仅向你们提出过它的理论，而且在某种涉及

强迫神经症的技术中，还或多或少强行把它灌给病人，因为阳具作为想象性要素在那里发挥占优作用。

我们将会看到，不再把阳具视为形象和幻想，而是视为能指，能够为这件事带来哪些理论与技术上的修正。

# 第22课 · 1958年5月14日

[黑板上]

- Forderung：要求
- Begierde：欲望
- Bedurfhis：需要
- Wunsch：梦的欲望

我们将尝试继续沿这条道路向前。正如你们看到的，阳具主题在其中发挥绝对关键的作用；它使我们更加贴近分析中说出的、宣示的东西，以及人们实际怎样使用客体概念。

你们应当清楚地感觉到，正常而言，我们必须既接近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种客体关系在当前分析实践中的实际功能，同时又要

通过集中考察人们怎样使用它、它提供哪些服务，尝试对我们谈论阳具时归根到底以简单而精确的方式指称的东西，作出更精细的表述；

这项表述还应当使我们能够批判客体关系的这种用法。

如果我们考察一篇随时间取得历史价值的报告，也就是刊登在《法国精神分析杂志》上、题为

《强迫神经症中的自我》的报告[注1]，就会发现这个标题完全不恰当，因为它实际只讨论强迫症患者的客体关系。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情。我们会尝试弄清作者为什么要在标题中谈“强迫神

经症中的自我”，从而对此略有认识；因为事实上，文章根本没有真正谈到强迫神经症中的自我，只说它弱或者强。关于这一点，作者最后受到当时听见的某种说法提醒，保持了谨慎态度；我们只能认为这种谨慎值得赞许。

> [注1] 莫里斯·布韦：《强迫神经症中的自我：客体关系与防御机制》，第十五届罗曼语族精神分析家会议报告，载《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3 年第 17 卷第 1—2 期，第 111—196 页；后收入莫里斯·布韦《客体关系》，巴黎：帕约出版社，1967 年。

不过，这篇报告汇集了同一作者此前两篇文章的成果；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如下内容：

- 第一篇写于 1948 年 12 月，1950 年刊登于《法国精神分析杂志》，题为《在女性强迫神经症中意识到阴茎嫉羡的治疗效应》［第 215 页］。这是他关于阴茎在强迫神经症中之功能的第一篇临床报告。初次处理问题时的这种新鲜感，赋予文章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也显示事情后来怎样可以说反而恶化了。毫无疑问，在这项对女性强迫神经症中的阴茎嫉羡尚属新鲜的经验层面，某种东西反映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新鲜经验。

- 随后还有另一篇文章，刊登于 1948 年 7—9 月的《法国精神分析杂志》，题为《男性强迫神经症四个病例的治疗中转移之同性恋面向的重要性》［第 419 页］。

- 第三篇文章就是题为《强迫神经症中的自我》的报告［《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3 年，第 17 卷第 1—2 期，第 111 页］。

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值得阅读，因为用法文讨论这个主题的文章并不很多。归根到底，它们相当准确地呈现了这些问题在这里发展到的水平。另一方面，重读它们必然会产生一种总体印象；这项印象将以某种方式构成背景，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处理问题的准确表述，并据此定位以这种方式为中心的治疗之价值与分量。

因为归根到底，这种“客体关系”在各种总览表中得到表述；我们在那里看到客体在主体那里逐渐构成，却很清楚地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假窗。我不认为，无论“生殖器客体”还是“前生殖器客体”，本身都是什么格外有意义、

格外重要的东西——除了可以让所谓“总览表”显得漂亮。

然而归根到底，这种客体关系的价值来自它的枢轴，来自把客体概念引入分析辩证过程的东西；这首先并且首要地就是所谓“部分客体”。这个术语借自亚伯拉罕的词汇与表述，不过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亚伯拉罕谈的是“对客体的部分之爱”；这显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这项滑移本身已经具有某种意义。

要把这个“部分客体”简单纯粹地辨认为、认同于我们正在谈论的阳具，根本无须费很大力气。我们尤其能够轻松地谈论它，因为我们恰恰已经赋予它自身的分量；与此同时，这使我们不再因把它当作一个特权客体使用而感到任何窘迫。我们知道它为什么配得上这种特权：恰恰是以能指的身份。正是由于把这种特权赋予一个特定器官会造成异乎寻常的窘迫，作者们才最终完全不再谈论它；然而反过来说，它几乎又在全部分析中无处不在。

事实上，如果重读这些文章，你们会发现，分析家显然被怎样使用——这是贯穿所有这些页面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首要事实……不仅是所涉的这位分析家，而且是所有听他报告的人……分析家在幻想层面受到使用。也就是说，按照我刚刚列举其三篇文章的作者之视角，强迫神经症的治疗完全围绕这个阳具的一种"并入"——这是作者使用的术语——或"想象性内投"旋转；这个阳具在分析对话中以归属于分析家的阳具之形式出现。

归根到底，这里会有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中，对这个幻想性阳具的并入幻想、吞食幻想具有鲜明的攻击性，也就是所谓施虐性；与此同时，它被体验为可怕而危险。

- 但这个幻想会具有充分揭示某种东西的价值；这件东西涉及主体本人相对于客体关系视角中所谓"对应客体"的位置，也就是构成其阶段的客体。在这里，具体说来是施虐—肛门阶段的某种第二时期：在那里，人们会从摧毁客体的根本倾向，过渡到某种至少以部分形式开始尊重客体自主性的东西。

归根到底，强迫神经症病人所处的整个时刻之辩证过程——用我们的说法，就是主体性时刻——据说悬系于维持这种部分客体的某种形式；围绕它，可以建立一个不会完全注定遭受根本毁灭的世界，

因为强迫症患者抵达的这种脆弱平衡之下，紧邻着前一个阶段。强迫症患者确实被呈现为随时会滑向世界毁灭的人，因为按照作者所表达的视角，这些事情只能以主体同其环境之关系的术语来思考。正是通过维持这个部分客体——这种维持当然需要一整座建筑、一整套脚手

架，而后者恰恰构成强迫神经症——，强迫症患者才得以避免滑入始终构成威胁的精神病。作者无疑把这一点视为问题的基础本身。

不过，我们仍然不能不提出异议：无论存在怎样的准精神病症状，例如人格解体、自我紊乱、陌生感、世界变暗之感——这些感觉显然触及自我的内涵，甚至也许触及其结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注意到：

- 强迫症与精神病之间的过渡病例始终存在，却一直非常少见。作者们早已注意到，认为两种疾病能够相容，反而是一种虚假的希望；

- 另一方面，当所涉是真正的强迫神经症时，在精神分析中最不可能遭遇的恰恰就是这件事：我们可能无法治好强迫症患者，但要冒险看见他滑入精神病，对我们而言，这种风险本身确实显得异乎寻常地幻想性，因为它极其罕见。

无论是在分析过程中出于任何原因，还是在一次不当乃至粗暴的治疗干预中，强迫症患者滑入精神病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自己的实践中从未见过。感谢上帝！我也从未感觉自己面对这类病人时会冒这种风险。因此，这种判断中必然有某种东西泄露的远不只是临床经验：理论一致性的需要把作者带得比自己原本想走的更远；甚至很可能还有走得更远的东西，也就是他面对强迫症患者时的某种自身立场。这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启了关于所谓反转移的问题。当然，所涉并不是“某个特定个人的问题”：这里当然不是以个人意义谈论反转移，而是取其更一般的意义，把它看作由我经常所谓“分析家的偏见”构成；换句话说，就是分析家的话语赖以得到表述的那些已说出或未说出的背景内容。

因此，让我们先定位一种实践可能代表什么；这种实践被引向把

强迫神经症治疗的整个枢轴，安置在这种“阳具的想象性并入幻想”周围，

而且所涉是分析家的阳具。它向我们展示一种反转；不过，说实话，这项反转有些神秘，因为我们不太看得出它在哪个时刻、又为什么发生——除非假定那是某种磨损效应，是主体对某种东西的接受。

因为，据说到了某个时刻，由于修通（working through）、治疗的坚持以及分析家在治疗中的在场，主体会看到对这项阳具幻想的并入取得一种阳具价值，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某种性质突然不同的东西被引入他体内。此前，那看来是对一个危险客体的并入，因而在幻想中遭到排斥；如今，它变成一个受到接纳的客体，一个力量之源。“源”这个词确实就在那里；并不是我作出了这些比较和隐喻。

这种内投此时变成“保存性的”：

> “……它难道不同宗教圣餐具有共同特征吗？至少在强迫神经症中如此，”有人在第 172 页告诉我们，“在那里，人们不经咀嚼便吞咽下去。”作者补充这一点，是为了评论那些“在这项幻想中出现的幸福感；
>
> 这项幻想不包含任何毁灭，因而类似于亚伯拉罕所讨论的忧郁症患者之吮吸幻想。这种内投也许可以称作被动的；在我看来，把它称作保存性的内投要恰当得多。

它难道不同宗教圣餐具有共同特征吗？在那里，人们不经咀嚼便吞咽下去。”[注2]

[注2]　莫里斯·布韦：《强迫神经症中的自我》，载《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3年1—6月，第1—2期，第172页。

这些并不是我从亚伯拉罕的《忧郁症》中带着倾向性挑选的特征[注3]。

[注3]　卡尔·亚伯拉罕：《乔瓦尼·塞甘蒂尼》，载卡尔·亚伯拉罕《全集》第一卷，巴黎：帕约出版社，1965、2000年，第161页。

我们感觉，某种实践或苦修恰恰围绕这件事情发生，而且主要在幻想上运作。无疑，它带有剂量、屏障、制动、阶段以及技术要求的全部预防措施；我们看到某种事情在那里得到实现，它将使

强迫神经症主体采取某些关系。归根到底，我们不太看得出人们希望从这些关系中得到什么；但它们无疑涉及所谓“同客体保持的距离”。

总而言之，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在幻想层面，所涉是让主体尽可能接近，穿过一个距离被取消的阶段；随后，无疑要——至少我们必须如此希望——在一个客体面前重新取得这项距离。这个客体先后把恐惧与危险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自身之上，随后又成为一个象征；人们借此建立一种被视为更加正常、并被称作“生殖器性的”力比多关系。说实话，当我们采取某种视角时，也许会比作者更加严格，不会那么轻易为抵达目标而自我庆贺。例如，他谈到一位女病人时，颇为自得地说，经过几个月治疗以后从她那里听到如下声明：

“我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经验：我能够享用丈夫的幸福。看到他的喜悦，我深受感动；他的快乐也成了我的快乐。”[第164页]

请你们仔细衡量这些用语。它们当然并非没有价值；它们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某种

经验，但我必须说，这种经验绝不意味着该病人先前的性冷淡有任何消除。

能够享用丈夫幸福的非同寻常经验，是一种经常观察到的事情；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病人以任何方式达到了性高潮。说实话，文章也告诉我们，病人仍然“半性冷淡”［“……不过，她仍然半性冷淡……”第 164 页］。正因如此，紧接着又加上下面这句话，也许会使人略感惊讶：

> “这难道不是对成年生殖器关系最恰当的刻画吗？”［第 164 页］

显然，正是“成年生殖器关系”这个观念，赋予整个视角以我所谓生殖器关系中的“假窗”构造。仔细考察时，事实上并不十分清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一旦作者们尝试加以解释，他们似乎并没有在其中找到这一切仿佛蕴含的简单性与统一性。

> “……至于对自我一致性的肯定，它不仅显现在强迫症状与人格解体现象的消失中，还表现为主体获得一种自由感与统一感；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新的经验。”［第 164 页］

这些也许颇为乐观的近似判断，至少对我们而言，同强迫神经症中真正的进展与治愈所代表的东西也并不完全符合。话虽如此，我们清楚看到，当需要在某处定位并评价强迫性构成、强迫性结构是什么，以

及它怎样得到体验和演变时，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怎样的高山、一堵怎样的壁垒、一套怎样的现成构想。

我们在这里尝试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表述事情，因为我们认为——并不是为了比别人更加复杂；如果你们逐渐习惯计算我们在这里投入运作的维度数量，我不相信你们最终会觉得事情多了许多——简单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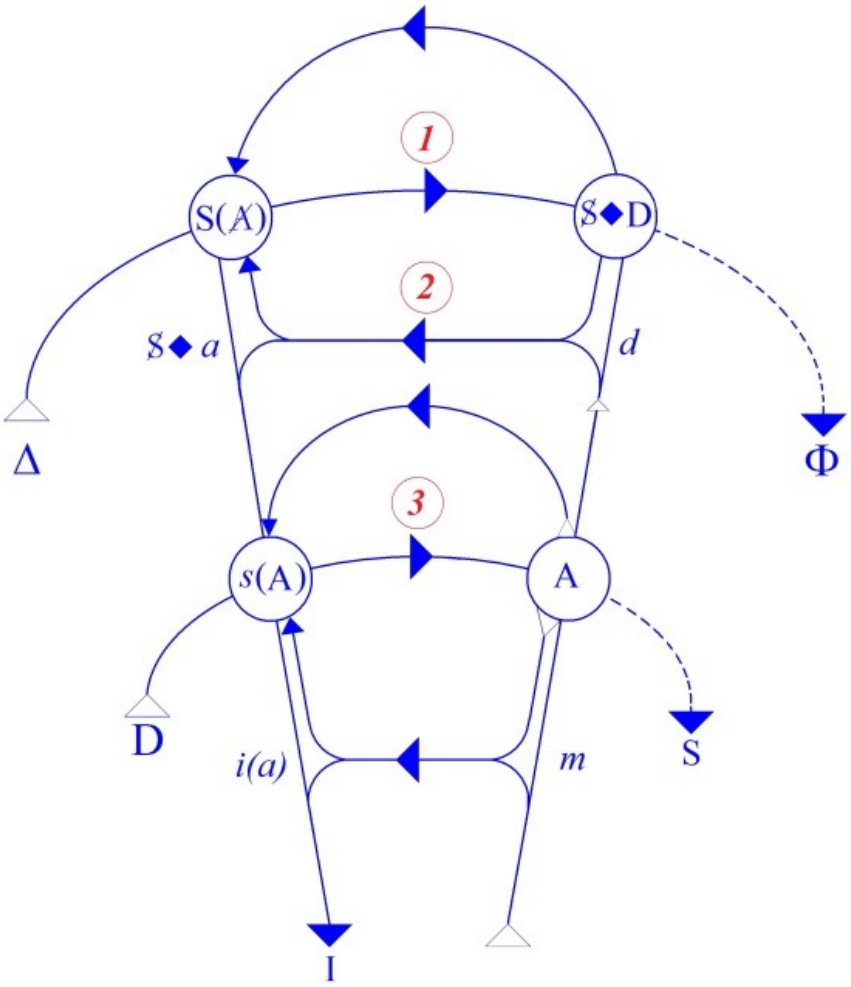
它也许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表述，较少采取多线并行的形式。

当然，不少听众心底都希望拥有一张与露丝·麦克·布伦瑞克夫人的表格相对应或相对立的总览表；我们也许有一天会抵达那里。不过显然，在抵达以前，也许应当一步一步前进，看看我们说必须批判部分客体——即阳具——这个观念时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了使用它，

也许还为了看见某种用法——即当前用法——的危险，必须把它放回自身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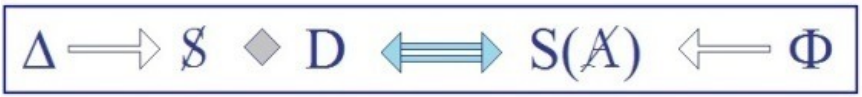
我们正尝试用这个小图式表述它的位置。完全可以用符号与方程把这一切覆盖起来，不过，我不想给你们一种人为造作的印象，尽管这些事情确实是

我已经尽力还原到其根本必要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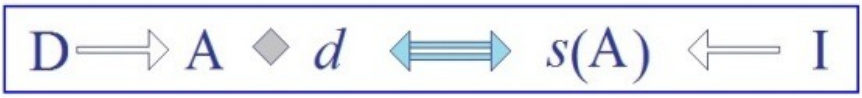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把大写 A 的大他者放在这里；代码位于其中，它接纳要求。我们还看到，在从 A 通向讯息所在之点的过程中［s(A) ← A］，大他者的所指产生了。而需要从这里开始，在那里经历大量转化以后重新出现，并在不同层面上取得

不同性质。如果我们把这条线［1］看作主体的实现线：



那么，它在这里转化为某种始终或多或少属于认同的东西［I → s(A)］；也就是主体在自身要求的隘道［3］中通过，并最终得到重塑［D → A］：



我们知道，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令人满意的主体，一个拥有自己所需支点数量——姑且说四个，但谁知道呢？——而能够站立的主体。恰恰是在这个要求的彼岸，一项 Begehren 得到表述——上次我们已经尝试把它称作 Begierde、即欲望，以界定它［A ◊ d］——；在其拓扑位置上，某种必要性同这项拓扑相连：性欲望必须在这个要求彼岸的场域中取得位置，并同时得到表述、必然承受这个彼岸特有的表述方式。

归根到底，性驱力、倾向本身能够取得位置的地点，同把它结构性地系于要求彼岸这个位置的必要性，在这里彼此重合。

某种东西介入全部能指，并叠加于它们之上，从而形成一个所指；我们通常把所指放在 S/s 这项表述之横杠下方。正是只要这件事情发生，性驱力才占据那里。

这个所指首先是一项“有待表明之物”；因此，它恰恰就是这个特殊能指——阳具：

- 它处在能指的整体之中；
- 它得到专门化，用来指明能指对所指的一切效应本身，也就是只要这些效应确实是能指对所指的效应。

这会走得很远；要赋予阳具自身意义，也不可能少走一步。阳具之所以在即将作为能指发生的东西中占据这个特权位置，正是由于这项功能；它处在这里所谓的欲望彼岸之中，也就是要求场域之外的整个场域。只要这个欲望彼岸得到象征化，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会在这里看见如下可能性——这只是把我们所说之物的意义表达出来——：主体同要求本身之间可以存在一项关系［S ◊ D］。因为完全显然的是，要使主体同要求之间存在关系，主体就不能完全包含在要求中。

直到这个彼岸构成之时——只要按照假设，它通过阳具能指得到表述而构成——，单纯的大他者一直凭母亲是一个言说存在这一事实，为主体仅仅在其身体中的构成制定全部法则；就在此刻，某种东西越过这个大他者出现。

而母亲是言说存在这一事实绝对关键。无论分析家——斯皮茨——怎样想，

要构成同母亲的关系，不能只有给婴儿轻轻摩擦抚弄、用古龙水护理。母亲必须同他说话，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不仅她必须同他说话，而且人人都知道，儿童同这件事保持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一位哑巴保姆必然会在婴儿发展中造成一些相当明显的后果。

越过这个大他者，如果这里有某种由能指构成、并被称作欲望彼岸的东西，我们就获得 S ◊ D 这项关系的可能性；也就是主体本身，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主体，换言之，一个遭到划杠的主体。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人类主体绝不会是全部哲学

所构造的简单纯粹主体，即作为世界这个 perceptum［被知觉者］之 percipiens［知觉者］而与之恰好对应的认识主体。我们知道，不存在纯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主体；除非把人类主体还原为类似光电管或眼睛的东西，

或者还原为哲学中所谓的意识。

不过，作为分析家，我们知道始终存在一项分裂（Spaltung），也就是说，主体始终沿两条线得到构成；况且，正因如此，我们的一切结构问题才会产生。这里必须构成什么？恰恰是我所谓的不再是 A 的所指［s(A)］，而是 A 的能指［S(A)］：只要大他者认识这项分裂，它本身由这项分裂结构；换言之，只要大他者 A 本身已经承受这项分裂的效应。

在这里，事情发生反转；也就是说，大他者已经受到由阳具能指标明的这项能指效应所标记。如果你们愿意，所涉就是 A，只要阳具在其中遭到划杠、被提升为能指状态［ϕ → Φ］。在这里，代表于讯息位置的是作为遭到阉割的大他者；这就是欲望的讯息［S(A)］。欲望的讯息就是这个东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容易得到接收，因为欲望难以表述的整个问题，恰恰来自无意识的存在。

换句话说，图式中在这里表现为“较高层面”的东西——姑且这样说——通常反而必须被我们设想为处在“较低层面”；它没有在主体意识中得到如此清楚的表述，尽管它确实在其无意识中得到表述。

甚至，恰恰因为它在主体的无意识中得到表述，所以它才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要知道是何种程度，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能够在主体意识中得到表述。我们上次谈到的癔症患者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当然，癔症患者尚未接受精神分析；否则，按照假设，她就不再是癔症患者。我们曾说，癔症患者把这个彼岸设立并定位为一项欲望，而且是大他者欲望形式的欲望。

为了固定思路——稍后我会进一步向你们论证，但现在就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要尝试表述某种东西，

就总得从表述和评论开始——我会告诉你们，事情以如下方式发生：

- 正如在这里的第一道环路中，主体通过需要及其张力的表现，使要求的第一条能指线之道路得到穿越［D → A］；同样，为了给事情赋予拓扑位置，我们可以把自我同他者意象本身的关系放在这里［m → i(a)］。

- 同样，正是在这里，也就是说，不是在作为小 a、作为想象他者的他者那里，而是在大写 A 的大他者本身那里，某种东西使主体能够接近这个有待表明的彼岸；这恰恰就是我们正在探索的场域，即主体欲望的场域［A $\underset{\rightarrow}{}$ d $\underset{\rightarrow}{}$ ⋯］。

欲望的这个小 d，占据了小 m相对于主体所占据的同一位置；这只是表达如下事情：主体尝试表述自己欲望的地方［d］，恰恰就是他将遇

见大他者欲望本身的地方。我们所表达的，正是这个以经验为根据的东西；长久以来，我已经用其他形式向你们表述过它，也用这种形式表述过：所涉的欲望，

特别是处在其无意识功能中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恰恰就是我们

上次借梦谈论癔症患者时看到的东西。那些梦并不是精心挑选的，就像我给你们的弗洛伊德文本也不是精心挑选的一样。

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看来这种事情已经开始发生——，

我无论怎样劝你们完整阅读都不为过；否则，你们自己就可能碰巧读到某些段落。它们也许不是经过挑选的，但仍会成为各种错误、甚至错误辨认的源头。如果你们看不见某篇文本在某种思想的发展中占据什么位置——我本来不想说“一种思想”，尽管严格说来恰恰应当这样说；可是“思想”这个词被谈论太久、滥用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从来不太清楚自己在谈什么——，那么，只谈“思想”还不足以让人断言所涉确实是某种东西。

它甚至是一项研究、一种努力的发展；作出这项努力的人对自己的“磁场”——姑且这样说——抱有某种观念，却只能通过某种迂回抵达它。必须根据已经走过的整个道路来判断每一次迂回。因此，上次的两个梦并不是我随意挑选的。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自己怎样选取它们。我选择第一个梦，是因为在另一些梦之后遇见了它；我也向你们解释过为什么没有首先选取那些梦——我会返回那里——，也就是因为“植物学专著之梦”虽能帮助我们理解需要

证明的东西，却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梦，适合稍后再作解释。

我先继续表述癔症患者的梦。癔症患者向我们展示的是，她可以说在某项东西中找到自己的支点……这些术语并不是我专用的：如果你们阅读布韦先生关于强迫神经症的文章，就会看到他使用完全相同的术语，说当人们除去强迫神经症患者的强迫观念以后，他们仿佛缺少一个支点。你们看到，我在这里使用术语的方式同其他作者共有；也就是说，我们都尝试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微小印象加以隐喻化……

……我们曾说，癔症患者从一项欲望——即大他者的欲望——中取得自己的支点。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要求彼岸创造一项欲望。我认为，我们已经对此作了充分表述。这里可以提到第三个梦；上次我没有时间处理，但现在完全可以念给你们听：

> “她把一支蜡烛插进烛台；蜡烛断了，所以立不稳。学校里的小女孩们说她笨手笨脚；但女教师说，这不是她的错。”

在这个病例中，弗洛伊德再次以如下方式把梦同真实事实联系起来：

> “她昨天确实把一支蜡烛插进烛台；不过，那支蜡烛并没有断。这是象征性的。事实上，人们知道蜡烛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断了、立不稳，就指示男人阳痿……

弗洛伊德强调：

> ‘这不是她的错。’可是，这位受到精心教养、远离一切丑陋事物的年轻女人，怎么会知道蜡烛的这种用法？”

［她把一支蜡烛插进烛台；可是蜡烛断了，所以立不稳。学校里的女孩们说她笨手笨脚；女教师却说，这不是她的错。这里同样有一个真实诱因：昨天她确实把一支蜡烛插进烛台，不过蜡烛并没有断。这里使用了一个透明的象征。蜡烛是一件会刺激女性生殖器的物品；如果它断了、因而立不稳，就意味着男人阳痿（“这不是她的错”）。难道只有这位受到精心教养、一直远离一切丑陋事物的年轻女人，才知道蜡烛的这种用法吗？碰巧，她还能说出自己从何种经历中获得这项知识。一次在莱茵河上乘船游览时，一条坐着学生的船从他们身边驶过；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唱或吼着一首歌：“当瑞典女王在百叶窗紧闭时，用阿波罗蜡烛……”最后一个词，她没有听见或没有听懂。她丈夫不得不给她所要求的解释。］

于是，我们得知她乘船游览时听见一首十分不雅的学生歌曲，谈的是瑞典女王关紧百叶窗以后怎样使用阿波罗蜡烛。她没有听懂最后一个词，丈夫向她作了解释。当然，紧闭的百叶窗、阿波罗，这一切都在这里适得其所地重新出现、尽情嬉戏。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阳具能指可以说以赤裸、孤立的状态出现，处于即使不是飞动的、至少也是部分客体的状态；而重要之点当然在“这不是她的错”。我们不知道这个梦取自病人分析的哪一时刻——她无疑正在接受分析——。

“这不是她的错”意味着：这件事在他者层面、在所有他者面前发生；正是由于女教师，所有女同学才不再嘲笑她。象征在这里受到唤起——而这恰恰就是我要抵达的地方——，它可以说同“所谓美丽女屠夫之梦”中已经存在的东西相交并相互确认。也就是说，重点必须放在如下事实：对癔症患者而言——归根到底，癔症是主体恰好围绕自身性

欲望得到构成的一种方式，是主体采用这项欲望的方式——，需要强调的是：

- 当然，是欲望维度，只要它同要求维度相对立；
- 但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个词项，需要强调欲望在大他者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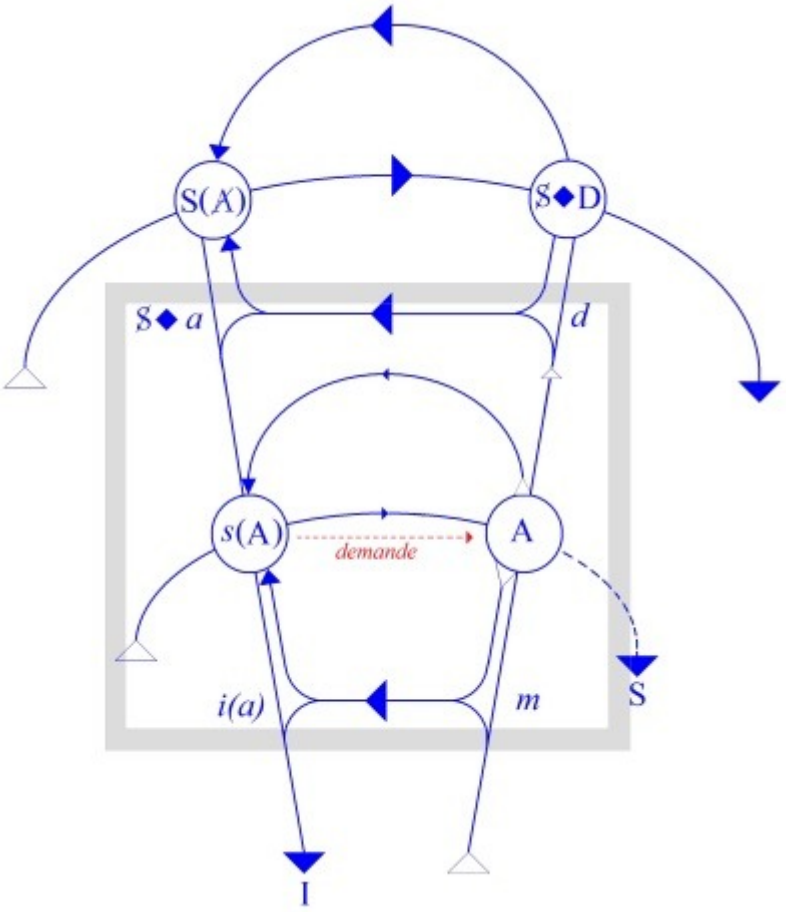
我已经提醒你们，朵拉怎样生活，直到她的癔症患者位置失代偿为止。除去几个小小的症状，她非常自在；而这些症状恰恰把她构成为癔症患者，并且可以在这两条线的区分和分裂（Spaltung）关系中读出。我们会返回怎样表述症状的过度决定。它同两条能指线本身的存在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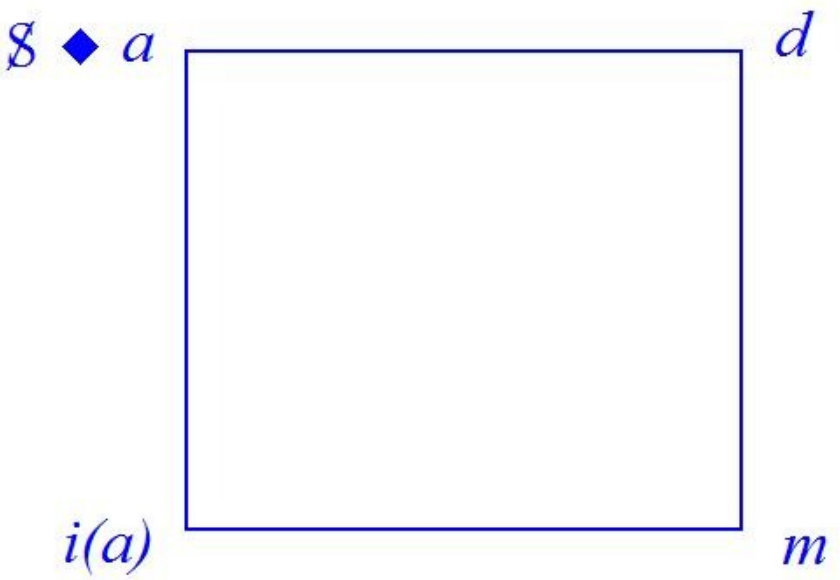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前几天展示的是：朵拉想要的，归根到底是作为主体继续存在；她当然像每个真正的癔症患者一样要求爱，但她支撑大他者的欲望本身。是她在支撑它，是她充当它的支点。只要让她父亲同所谓 K　　夫人的事情与相遇以世界上最顺利的方式发生，而且无人需要插手，事情就运转得非常好。她所支撑的词项——大他者的欲望——最符合她行动的风格，也最符合她相对于父亲和 K 夫人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朵拉的癔症结构：K夫人、大他者与不满足的欲望

正是在这里，我曾向你们指出一件事：只要她碰巧认同于 K 先生，处在同此时作为想象他者的他者之某种关系中；只要面对这项欲望，她就在与其对应的位置支撑它，整座小小构造便成为可能。你们已经清楚看到，这里勾勒出一个小正方形；它的四个顶点分别由自我［m］、他者意象［i(a)］、此时已经构成的主体同想象他者本身的关系［S ◊ a］以及这里的欲望［d］代表。我们由此找到一个作为这样的

人类主体正常站立所需的四只脚；这个主体对他者木偶背后牵动的机制与线绳并没有更多或更少的了解——他是在自己能够看见之处看见，也就是说，他大致能够在这个关键构成项中找到方位。






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层面、面对大他者的欲望，而且——我上次已经展示——事情并不因此走得更远；因为归根到底可以说，在癔症患者那里，返回线更为淡薄。

况且，正因如此，癔症患者才会同自己的想象界发生种种困难；这里，想象界由他者意象代表，并且可能在那里产生碎裂效应与各种解体，

严格说来，这些东西在其症状中为她所用。我在癔症患者层面只提醒这一点。

我们将怎样表述强迫症患者层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强迫结构中发生的事情？经典理论告诉你们——它在弗洛伊德那里作出表述，而且在弗洛伊德关于强迫神经症的最后说法中得到表述——：强迫神经症比

癔症稍微复杂一点，但复杂不了太多。如果能够把事情的本质点出来，我们便能加以表述；但如果没有点出本质——我刚才谈到的作者无疑就是这种情况——，人们就会彻底迷失，在“施虐性”“肛门性”“部分客体”“并入”之间浮游，

再加上“同客体的距离”；人们简直不知道该向哪位圣人祈求，才能弄清自己身处何处。

临床上的情况极其多样，作者的观察已经展示这一点：那些病例甚至几乎不可能以皮埃尔和保罗的名义归入同一个临床条目，更不用说背后的莫妮克和让娜。不过，我的意思是，在作者关于自我的报告之临床材料中，只有皮埃尔和保罗。从单一客体的质地来看，皮埃尔和保罗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主体；几乎无法把他们放在同一条目下。当然，这也不是一项异议，因为目前我们同样不特别有能力表述其他疾病分类条目。

非常醒目的是，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强迫神经症实践，我们仍无法像临床显然要求的那样把它肢解开来；因为它向我们呈现的面向极其多样。

人们会想起柏拉图[注4]所谓好厨师之刀的正确切入；好厨师懂得沿关节切割。就目前而言，如果无人——尤其是那些曾处理强迫神经症的人——能够恰当地对它作出分节，这确实标志着某些理论欠缺。

> [注4] 柏拉图：《斐德若篇》，265e。

让我们从目前抵达之处重新开始。强迫症患者本人怎样做，才能作为主体持续存在？他同样像癔症患者；况且可以料到，癔症患者与强迫神经症患者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关系，以至于早在任何严肃阐述以前

——也就是弗洛伊德以前——，雅内先生便能作出一种极其奇特的几何叠合工作；可以说，那是几何学中所谓图形变换的逐点对应，

使强迫症患者真正被设想成一个经过变换的癔症患者图形。

当然，强迫症患者同样朝向欲望：如果这一切首先并且处处涉及的不是欲望，那么，神经症之间就没有任何同质性。不过，问题在这里：经典理论，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最后的表述，关于强迫神经症告诉了我们什么？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生涯中说过许多事情。他首先发现，所谓“原初

创伤”同癔症患者的原初创伤相对立。癔症患者承受的是一次被动遭受的诱惑，是性闯入、侵入主体生命；而他清楚看到，只要这种心理创伤经得起重构的批判，强迫症主体那里所涉的反而是某种主体曾在其中发挥主动作用、并从中获得快乐的事情——弗洛伊德当时这样说。

这是第一次近似判断。随后，《鼠人》中的整个发展出现了，也就是强迫症患者情感关系的极端复杂性显现，尤其是恨，以及对

情感矛盾性的强调，对主动—被动、男性—女性这两组根本对立的强调，

以及最重要的恨—爱对抗。况且，必须像阅读《圣经》一样重读《鼠人》。《鼠人》仍然富含一切尚待讨论的强迫神经症内容；它是一项工作主题。

弗洛伊德最终抵达的最后一项元心理学公式是什么？他说……当时，临床经验和元心理学阐述使攻击倾向显露出来，并且已经促使弗洛伊

德作出“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这项根本区分；这项区分至今仍使分析家备受折磨……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曾发生过早的去融合、解缠；换句话说，毁灭倾向本身过早脱离，从而必然标记强迫症患者后来发展的全部过程，也就是他在自身特殊主体性中的安置。

这将怎样嵌入这场辩证过程？在我看来，它会远为直接、具体而可感地嵌入。如果要求和欲望这些术语开始在你们脑中找到自身逻辑，

你们就会发现它们可以每天使用——至少在你们的分析实践中每天都能使用——，而且非常好用。

我的意思是，你们可以在它们用旧以前把它们变成日常用语；不过，你们始终会追问，所涉究竟是欲望与要求，还是欲望或要求。我们刚刚提醒的毁灭本能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某种

在经验中显现的东西；首先必须从日常、普通的层面把握这项经验，也就是我们对强迫症患者的了解。甚至不只是我们分析的强迫症患者，而是那些我们仅仅作为见多识广的心理学家便能看见其生活、并衡量这件事对其行为之影响的强迫症患者。

完全确定的是，强迫症患者趋向于摧毁自己的客体。这几乎是一条经验真理。只需先停在这里，看看强迫症患者的这种毁灭活动是什么。

这就是我向你们提出的看法：请你们考虑，癔症患者正如经验清楚显示的那样，完全生活在大他者层面；对她而言，重点就在大他者层面。正因如此，她需要大他者的欲望，否则大他者除了法则还会是什么？可以说，癔症患者之构成运动的重心首先安置在大他者层面；其

理由绝非无法表述，而且归根到底同弗洛伊德谈到本能过早融合与去融合时所说的东西相同。对欲望本身、对要求彼岸的寻求与瞄准，则构成强迫症患者。

我希望你们对一个将要成为强迫症患者的儿童略有经验。我认为，没有哪类年轻主体能比他们更清楚地显示我上次尝试向你们表述的东西：需要的边缘必然只有有限分量——就像人们说“有限责任公司”一样——，需要始终是分量有限的东西；在需要同

对爱的要求之无条件性质之间的这道边缘中，安置着我所谓的欲望。而我怎样界定这项欲望本身？因为它必须处在这个彼岸——姑且这样说——，所以它否定对爱的要求中包含的他异性要素。

不过，为了保存这种无条件性质，同时把它转化为欲望的绝对条件性质，在纯粹状态的欲望本身中，大他者遭到否定。可是，主体曾不得不穿越并认识对爱的要求这种最终的、极限的无条件性质，因此这项性质如今仍被转移到需要本身之上。

将会成为强迫症患者的儿童，就是父母这样谈论的儿童——日常语言在这里同心理学家的语言会合——：“他有一些固定观念。”

他的观念并不比任何其他儿童更加离奇。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停留在他要求的材料上，例如他会要求一个小盒子；一个小盒子确实算不了什么，许多儿童要求小盒子时，人们根本不会停下来多想——当然，分析家除外，他们会在那里看出种种精细暗示。说实话，这未必错；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看见：在所有要求小盒子的儿童中，有些儿童的父母认为，这项对小盒子的要求严格说来是一项无法容忍的要求。它确实无法容忍。

如果以为只要把这些父母送到父母学校，他们就会恢复正常，那就完全错了；因为同人们所说的相反，父母当然参与其中。这意味着，一个人成为强迫症患者也并非毫无缘由；当然，某处总得有一个模型。不过，在对这项要求的接纳本身中，父母指责的固定观念面向完全可以辨认，而且甚至不属于父母伴侣的人也总能立刻看出。

在儿童要求小盒子的方式所表现的这项极特殊的要求中，对这里的他者严格说来无法容忍的，恰恰就是人们含混所谓“固定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项同其他要求一样的要求。换句话说，它具有我向你们指出属于欲望的绝对条件性质。

而强迫症患者恰恰是这样一个儿童……出于一些理由——你们看见，它们同这里所谓强烈的倾向与驱力彼此对应——，某项东西将成为这只三脚架第一项基础要素；不过，三脚架随后要站立，当然必须有四只脚……

……重点落在欲望上，不仅落在欲望上，而且落在欲望本身上。

也就是说，在它的构成中，欲望包含对大他者的这种毁灭；它是需要的无条件形式，是转入绝对条件状态的需要。恰恰只要它处在对爱的无条件要求彼岸——主体可能有机会经历这项要求——，它本身便是某种否定大他者本身的东西；这恰恰使它像儿童对小盒子的欲望一样，令任何人都如此无法容忍。

请格外注意，因为你们必须清楚，我在下面两种说法中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

- 当我说“欲望就是对大他者的毁灭”时；
- 以及当我说“癔症患者在大他者的欲望中寻找自己的欲望”时。 我说“癔症患者在大他者的欲望中寻找自己的欲望”，所涉是她归属于大他者本身的欲望。我说“强迫症患者把自己的欲望置于一切之前”，这意味着他恰恰在一项彼岸中寻找欲望，瞄准欲望自身的构成；也就是说，只要欲望本身毁灭大他者。

这就是强迫症患者同自身欲望之间的深刻矛盾之秘密：如此受到瞄准的欲望，内在携带着

这项内部矛盾；它造成强迫症患者欲望的绝境。作者们尝试用内投与投射之间某种可以说瞬时、永恒的往返运动来翻译这项绝境。

我必须说，这是一件极难表象的事情；尤其因为作者在一些地方已经充分指出，内投机制与投射机制何等毫无关系。我曾以比这位作者更有力的方式向你们表述这一点，不过，仍然必须从这里出发，也就是：

- 投射机制是想象性的；
- 内投机制是象征性机制。 二者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反过来说，在我看来——你们可以设想它；如果看清自己的强迫症患者，也能在经验中重新发现——，强迫症患者栖居着种种欲望。只要你们稍稍插手，便会看见这些欲望像异乎寻常的虫害一样群集；在一

种格外适合的培养基中，如果你们确实把强迫神经症的治疗引向幻想的培育——做到这一点用不了什么，只需拥有我刚才所说的一些转移要素——，你们就会看到这些虫害几乎能够向任意方向繁殖。

正因如此，强迫神经症的培养不会持续很久。不过，如果你们尝试看到本质，也就是强迫症患者偶尔鼓起双重勇气、开始尝试跨越要求屏障时发生什么——换句话说，开始出发寻找自己欲望的客体……首先，他并不容易找到它；不过，尽管如此，既然实践已经存在，仍有许多东西可以充当支撑：哪怕只是小盒子也好。完全清楚的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会遭遇最异乎寻常的意外；人们会尝试在不同层面借助超我和其他上千种当然存在的东西，为这些意外提供动机。

然而，比这一切更为根本的是：强迫症患者的根本运动朝向欲望本身，首先朝向欲望的欲望构成；因此，他每次朝向抵达这项欲望运动时，都包含我们所谓对大他者的毁灭。可是，欲望本身依其本性又需要大他者这项支撑。

大他者的欲望并不是通往主体欲望的路径，而干脆就是欲望的场所；强迫症患者每次朝向自身欲望运动时，都会在其力比多运动中撞上一项可以说绝对可触的东西：

- 在强迫症患者的心理中，某种东西越是发挥欲望客体的作用——哪怕它处在串联之中——；
- 强迫症患者接近这个客体的法则，就越会受某种东西制约：当他接近客体时，严格说来会出现一种真正的力比多张力下降；以至于当他把这个欲望客体握在手中时，对他而言什么都不再存在。你们会

观察到这一点；它完全可以通过实例得到观察。我会尝试向你们表述，并通过实例加以展示。

因此，对强迫症患者而言，整个问题在于赋予这项欲望某种唯一能够给它造成支点表象的东西；对他而言，欲望制约大他者的毁灭，而欲望本身又在这场毁灭中消失。癔症患者凭借自己的认同，极其轻易地占据那个对应点；而在这里，恰恰因为没有大他者、没有大写 A 的大他者……我说的是，就欲望而言；我不是说大他者对强迫症患者并不存在，而是说谈到他的欲望时，大他者并不存在……正因如此，他寻找唯一能够在这个参照点之外把欲望本身维持在其位置上的东西。某种处在对面的东西前来占据这个位置：S 相对于 a 的另一项公式，也就是癔症患者的认同。

在强迫症患者那里占据这个位置、承担这项功能的是一个客体；这个客体无疑采取受到遮蔽的形式，但始终完全等价于、可认同于并且可还原为阳具能指。今天我必须结束在这里。接下来，你们将看到这对强迫症患者面对这个客体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也将看到他面对小他者的行为。下次我会向你们展示，怎样从这里推导出若干更为常见的真理。

例如，主体只有通过给自己设置我们所谓“绝对竞争”，才能真正展示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只要他必须展示自己的欲望——因为这对他而言是根本要求——，他就只能在欲望所在之处以外展示它；极其准确地说，是在某种他必须以壮举加以克服的东西中展示它。我的意思是，强迫症患者全部活动的表现性面向，正是在这里找到自身理由与动机。

# 第23课 · 1958年5月21日

在我们持续探索神经症结构的过程中——这些结构受到我们所谓无意识的形成物的制约——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强迫症者。关于强迫症者，我们最后说，大体而言，他必须在某处把自己构成在自己那转瞬即逝的欲望面前。

我们已经开始指出：在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这一公式中，为什么在强迫症者那里，这一欲望会转瞬即逝。它之所以转瞬即逝，是由于主体同他者、同大他者本身的关系有一种根本困难；这个大他者乃是能指对欲望作出安排的场所。我们力图在这里阐明的正是这一维度，因为我们相信，恰恰由于没有把握这一维度，理论上才会出现困难，实践中也会发生偏离。与此同时，我们还想让你们在这番论述的内部——仿佛编织在其中一样——感受到：如果在走过足够长的路程之后回看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其意义就在于发现了对欲望作出安排的能指。当然，在这一现象内部，主体试图借助一种能指效应本身，来表达、显现他自己接近所指时发生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著作本身也置身于这一努力之中。谈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人们说了许多所谓自然主义，即把人的现实还原为自然的努力。事情绝非如此。弗洛伊德的著作试图在人的这一存在与自然之间订立一种契约，而这一契约无疑

不是在某种内在固有的关系中寻找的。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人总是从这一事实出发而得到考察：人已经并且正在把自己构成为言说的主体，构成为言说行为中的“我”；

而且，既然在分析中，人也从未以别的方式受到考察，我们又怎么能够否认这一点？

因此，他面对自然时所处的姿态，根本不同于一个“生命的内在承载者”。所以，人与自然的联结、他同自然的关系，必须在这一使他成为言说主体的经验内部得到阐明和表述。正是这种同生命的关系，在他从生命的种种形式中攫取出来的那种诱饵中，由阳具的能指得到了象征化。这里正是我们在分析主体的过程中所探索的一切能指交叉口的中心点、最敏感也最富意义的点。可以说，阳具是这些交叉口的顶点和平衡点，是人同所指之关系最卓越的能指。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它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可以说，人在其中被纳入

性欲望辩证法的方式，注定具有一种绝对特殊的问题性。第一个问题是，它必须在先于它的某种东西中找到位置，也就是要求的辩证法；因为要求总是在要求某种比它所诉诸的满足更多、并且超出这一满足的东西。由此可以说，欲望必须安置于其中的场所具有暧昧性质，而这一场所始终成问题：

- 它在这一要求的彼方；当然，就要求指向需要的满足而言，它在要求的彼方。

- 它又在要求的此岸——是的，此岸！——因为要求一经以象征性的方式得到表述，便会超出它所诉诸的一切满足：作为对爱的要求，它指向他者的存在，力求从他者那里获得那种本质性的临现；由此，他者给出的东西超出一切可能的满足，也就是他自己的存在本身，而这恰恰是爱所瞄准的东西。

欲望必须在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中组织起来并取得自己的位置，这个空间处于

- 对满足的召唤，
- 与对爱的要求之间。

因此，为了给欲望定位，我们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双重位置上：相对于要求而言，欲望既在其彼方，又在其此岸，这取决于我们从要求的哪一面、哪一个方面来看它，即：

- 把它看作同一种需要相关的要求，
- 或者把它看作以能指方式得到结构化的要求；作为这样的要求，它总是超出满足层面上的任何一种回答，并且自身召唤某种绝对的回答。于是，这一回答会把它作为绝对条件的本质性质，投射到在这个间隔中组织起来的一切东西之上。归根到底，这个间隔位于要求的两个层面内部：即“所指”层面和“能指”层面；欲望必须在这里得到表述并取得位置。

正因为欲望必须在这一场所得到表述并取得位置，所以当主体接近这一欲望时，他者便成为中继。他者作为言说的场所，并且恰恰作为要求所诉诸的对象，也将成为必须在其中发现欲望、发现欲望之可能表述的场所。

矛盾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挥作用，因为在这个他者内部——就他自己也被某种欲望占据而言，而且这种欲望从开端处和根本上说都与主体相异——主体在表述自己欲望时所遇到的困难，正是他将不断绊倒于

其中的困难；而分析的发现所勾勒出的那些结构越是展开，这种绊倒就越具有能指意义。

我们说过，这些结构并不相同：

- 如果重音落在这一欲望本质上得不到满足的性质上，这就是癔症者进入欲望的领域及其必然性的方式；
- 如果重音落在主体通向这一欲望时对他者的根本依赖上，这就是强迫症者所面对的方式。

上一次结束时我们说过，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同于那种癔症式认同。为了面对那个对她而言构成谜点的欲望，癔症者总是会遭遇我们给出的一种多少带有强迫性的解释；弗洛伊德最初几次接近癔症分析时，正是这种解释方式构成了其特征。

弗洛伊德没有明说的是：对于癔症者，欲望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对她说“这就是你所欲望的那个人”，始终是一种强迫性的解释、一种不准确的解释、一种偏离目标的解释。关于癔症者，无论在哪个例子中——

- 无论是弗洛伊德给出的最初那些观察，
- 还是后来多拉的案例，
- 甚至，如果我们把癔症者的意义扩展到我们在这里详细评论过的那位女同性恋者的案例，

——每当弗洛伊德采用这种做法，他都可以说犯了错误；至少无一例外地，他最终都遭到患者的拒绝，患者拒绝接受关于其欲望、症状和行为的意义。

事实上，癔症者的欲望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某一客体的欲望，而是对一种欲望的欲望；她努力使自己维持在她召唤自己欲望的那个点面前。为了把自己维持在她召唤自己欲望的那个点面前，也就是在他者欲望所在的点面前，她反倒会认同于一个客体：

- 多拉认同于K先生；
- 我曾向你们谈到的伊丽莎白·冯·R，也认同于她家庭或周围环境中的不同人物。

正是在她认同于某个人的那个点上——当涉及癔症者时，用自我或自我理想来称呼这个人同样不恰当；这个人对她而言成了她的另一个自我——才会发生认同。弗洛伊德始终以完全符合我正在说明的方式，明确阐述了这种认同对象的选择：也就是说，正因为她——或他——在另一个人那里辨认出了可以说是其欲望的迹象，即她或他面对着同她或他一样的欲望问题，认同以及癔症极具特征的危机传染、群体发作和症状表现的一切形式才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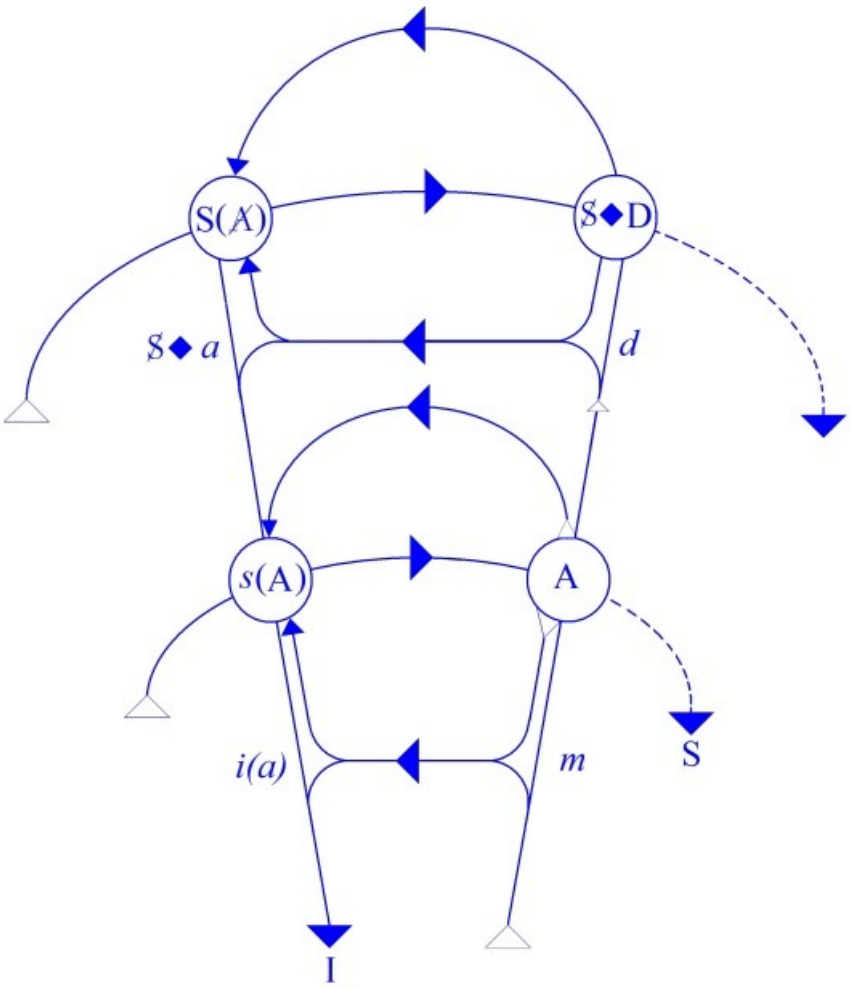
强迫症者有另一些解决办法，因为他者欲望的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将循着有关强迫症者的经验所容许的步骤来接近它。可以说，从哪一头把握强迫症者的切身经验并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不要忘记它的多样性。

分析开辟的那些路径，也就是我们的经验——必须说，它一直在摸索——促使我们解决、寻找强迫症者问题答案的道路，都是局部的，也可能有所偏向。它们当然自行提供了一份材料。至于这份材料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说明：

- 首先，相对于所取得的结果；
- 我们也可以就这些路径本身展开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是汇聚的。

当我们逐字梳理这种在实践中取得方向的经验时，得到的印象无疑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倾向于围绕主体对自身幻想的运用来展开。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幻想所起的作用有某种谜样性质，因为“幻想”这个术语从未得到界定。我们曾在这里长时间讨论想象性关系以及意象的功能，把意象说成仿佛是本能的向导、渠道和指示，为本能的实现标明道路。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人那里，意象功能的这种用途——只要我们能够确切辨认它——是何等受限、单薄和贫乏，因为它看起来缩减成了自恋意象、镜像意象；我会说，它被缩减为一种极度多价的功能。我不说它被中和了，因为它同样在攻击性关系和色情关系层面发挥作用。那么，走到目前这个位置，我们如何阐明那些无疑极为重要、居于优势、人人都在谈论并处在分析经验核心的想象性功能，也就是幻想的功能呢？




我认为，在这里［$S \diamond a$］，我们应当看到：眼前的图式为我们开启了阐明和定位幻想功能的可能性。我先请你们通过对这种拓扑的一种直觉性侧入，把它表象出来。

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真实空间，而是某种可以在其中勾勒出如下同源关系的东西：

- 如果同他者意象［$i(a)$］的关系，确实形成于某种已被纳入要求回路、纳入要求的原初回路的经验层面，也就是说，主体最初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向他者提出诉求的回路；

- 并且，如果正是在这一回路上的某处，发生了那种传递主义式的适应、那种派头效应，使主体同作为其同类的另一个人建立起某种关系；

- 因而，如果意象关系处在这里，处在各种经验的层面，也处在主体进入言说游戏本身的时刻，即从尚不能言说者状态过渡到言说状态的界限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我们借助通向他者欲望的途径，寻找主体欲望之实现道路的这个领域中，幻想的功能与位置同样处在一个同源的点上。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幻想界定为：被纳入能指的某种运用之中的想象性之物。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以一种极具特征的方式显现并可被观察到，哪怕只看下面这件事：

当我们谈论幻想，例如在强迫症者的经济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施虐幻想时，仅仅因为这些表现体现了某种被称作施虐的倾向，就把它们称作幻想性表现，这还不够。这里牵涉到某部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本身并不是一种对本能的研究，而是一场游戏，单凭“想象性”这个词远不足以界定它。因为这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有种种场景；总而言

之，它们是一个个场景脚本。这里涉及的是某种在能指中得到深度阐明的东西。

归根到底，我认为，每当我们谈论幻想时，都不应忽视它的“场景脚本”一面和“故事”一面；这构成了幻想的一个本质维度：

- 它并不是毁灭本能的一种盲目意象；
- 它也不是主体面对猎物时突然杀红了眼的某种东西——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自己也不得不诉诸意象；
- 它不仅是主体在一个“场景脚本”中表述出来的东西，而且主体本人也把自己投入这个“场景脚本”之中。

$\not{S} \diamond a$这一公式中的S带着一道小横杠，也就是主体相对于$a$达到最充分表述的临现点；

在我们此处所谓施虐倾向的一切严格意义上的幻想展开中，只要这种倾向可能牵涉强迫症者的经济，这个公式就是有效的。

你们会注意到，其中总有一个场景：主体本身以不同程度受到遮蔽的形式出现在“场景脚本”里，卷入他者的各种不同意象；作为同类、也作为主体的反映的另一个人，则在其中得到临现。我还要进一步说：人们并没有充分强调某一类工具的在场性质。我已经跟随弗洛伊德提到过鞭打幻想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曾特别阐明这一幻想，认为它似乎起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这正是他有关这一主题的那篇论文、那份精确报告的一个方面：它在女性心理中的作用。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他从这一角度，并从自身经验的某个角度来把握它。当然，这种幻想绝不局限于弗洛伊德当时谈到的领域和案例。

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研究领域完全有理由受到限制：这种幻想在女性性欲发展的某个转折处、某个特殊点上起着特殊作用，确切地说，是由于阳具能指之功能的介入。正是这一功能，在强迫性神经症以及我们看到所谓"施虐幻想"出现的一切案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这一因素的在场和优势地位归根到底仍是谜样的；它使这种工具占据优势，而我们不能说它的生物学功能能够以任何方式恰当地解释这一点。人们也许会想象或发现

它同某种表层兴奋、皮肤刺激有不知怎样的联系。但你们会感到，这种说明多么不完整，甚至近乎人为。这个因素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幻想之中；附着于它的功能之上的是一种能指的多价性，它使天平的全部重量更多地落在所指一边，而不是落在任何可能联系于下列推导的东西一边：

- 生物学秩序；
- 需要的秩序；
- 或任何其他秩序。

因此，幻想无疑参与想象性秩序，却只凭借自身的能指功能，才会在这种经济中的某一点取得幻想的功能并得到表述——我认为，要谈论幻想，这一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迄今还没有人这样表述过它。

我还要进一步说：我认为，要让人理解所谓无意识幻想，没有别的办法。所谓无意识幻想，难道不就是某种东西的潜伏状态吗？根据我们对

无意识结构之组织的全部认识，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完全可以作为一条能指链而存在。无意识中有一些能指链作为能指链持续存在，并从那里对有机体进行结构化、发生作用，影响那些在外部表现为症状的东西——这正是分析经验的全部基础。与其设想某种想象性之物的无意识审级和无意识影响，不如把幻想本身放在我们于无意识层面所遇到的共同尺度上，也就是放在能指层面；后者更容易理解。

幻想本质上是被纳入某种能指功能的想象性之物。目前我还不能把这一进路阐明得更远。我只是以某种方式，先向你们提出稍后会得到更精确阐述的东西，也就是下列位置：

- $S$点相对于$a$的位置；
- 幻想事实：$\$ \diamond a$。

总而言之，幻想事实本身是一种经过表述而且始终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场景脚本”。这正是它的特征：它可以发生并长期潜伏于无意识的某一点，却已经像梦一样得到组织；只有当能指功能独自赋予它结构和一致性、并同时赋予它坚持不退的性质时，我们才能理解它。

例如这些“施虐幻想”：分析强迫症者时，从最初接触和共同经验中便可看出它们在强迫症者那里占据的位置。不过，它们未必以公开、确证的方式占据这一位置，而是在强迫性转化的代谢中，随着

主体本身为了重新取得某种平衡而作出的尝试出现；他所寻求的这种平衡，就是在与自身欲望的关系中认出自己。

当然，当我们看到一个未经处理、处于“自然状态”的强迫症者——他来到我们面前时就是这样，或者发表的病例让我们以为他应当这样到来——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向我们诉说种种妨碍、抑制、阻塞、恐惧、怀疑和禁令的人。

我们也知道，他并不会在这时就向我们谈起这种幻想生活。我们同样知道，正是在那些接受了治疗性干预的强迫症者那里，或者当他们试图自主地寻找解决、出路并处理自身严格意义上的强迫性困难时，我们才会看到这些幻想或多或少居于优势地侵入他们以往的生活和心理生活。我们暂且只给这些幻想贴上“施虐的”这一简单标签；它们已经向我们呈现出自己的谜，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于把它们表述为一种倾向的表现，而应当把它们表述为主体同他者本身之关系的一种能指组织。你们也知道，在某些主体那里，这些幻想可以采取一种真正侵袭性的、吸收一切的、令人着迷的形式，可以说，它能够吞噬他们心理生活、切身经验和心智活动中的一个个部分，甚至一整片领域。

这里要做的，正是尝试为这些经过表述并持续存在的幻想所起的经济作用给出一个公式。在这些主体那里，它们的特征在于始终停留为幻想，只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才得到实现；而且，对主体而言，这种实现总是令人失望。因为在这里我们恰恰观察到主体同欲望之关系的机制：主体越是试图沿着呈现在面前的道路接近自己的欲望，他的欲望就越趋于熄灭、衰减和消失。我会说，强迫症者就是坦塔罗斯；只是古代地狱图像把坦塔罗斯呈现给我们时，首先把他画成了一幅口腔性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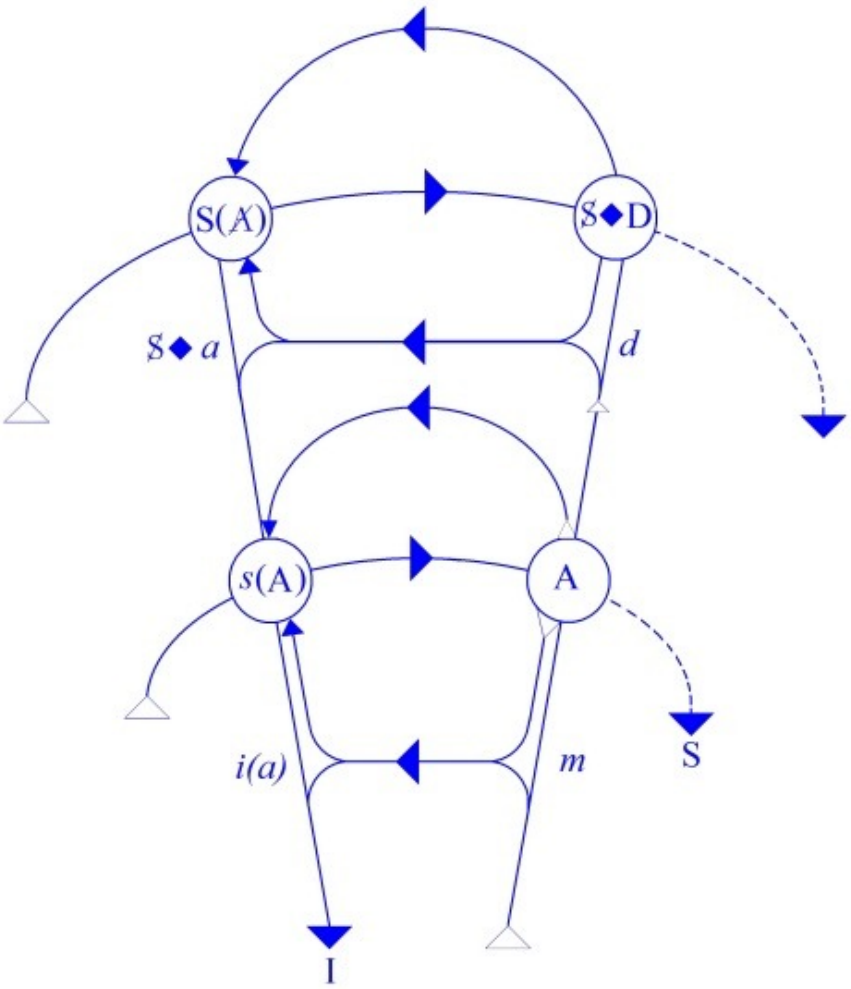
不过，我把他这样呈现给你们，并非毫无理由。我们会看到，这种作为强迫性幻想本身之平衡点、层面与位置的口腔性底层毕竟必须存在；因为归根到底，治疗者、分析家自己在幻想层面上抵达的正是这个平面。你们已经看到，我谈及那三篇系列文章所勾勒的治疗路线时也暗示过：某些治疗者以及分析实践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了一种幻想性的吸纳之中，以便找到一条道路，使强迫症者在实现自己欲望的道路上，以新的方式重新取得平衡，获得可以说某种“调节”。

不过我们要注意，从这一头把握事情，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来看，

我们也必须依次展开这把折扇。当然，我们并未忽视：

- 强迫症者的症状中以最明显方式呈现出来的东西；
- 通常以所谓超我的要求这一形式呈现的东西。

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强迫症者的这些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在他身上的根源。我认为，强迫症者那里发生的事情可以在这幅图式的层面上得到指示和解读，而这种方式随后会显示出同样富有成效。




我们可以说，强迫症者始终在请求许可。

我认为，你们会在具体层面、在强迫症者通过自己的症状告诉你们的东西中再次发现这一点。这一点甚至已经被写进症状，而且常常明白

说出：他始终在请求许可。至于下一步是什么，我们随后会看到；但如果我们信赖这幅图式，那么这里发生的事情确实很重要。

请求许可，恰恰就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要求保持某种关系。对于强迫症者，许可归根到底就是重新建立这个大写的他者；我们已经说过，为了进入那种对他而言受到质疑、遭到追问甚至陷入危险的辩证法，他会让自己最彻底地依赖大写的他者，也就是作为言说者的他者。

这已经向我们表明，维持这一场所对于强迫症者何等重要。我甚至要说，我们正是在这里看到弗洛伊德始终所谓的Versagung，即拒绝，何其贴切。拒绝——而且在根底上也蕴含着许可，即某物在承诺的背景上遭到拒绝而形成的契约——不同于所谓“挫折”。如果涉及一个完整的主体，那么他同他者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在单纯要求的层面上提出的。只有当我们诉诸发展，想象一个多少无助的小孩面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当我们亲手把某个人变成一个任由另一个人摆布的客体时，问题才会以这种方式提出。

但是，只要主体凭借言说处于我们所界定的同他者的关系中，那么在他者的一切回答之外——确切地说，正因为言说创造了这一回答的彼方——某处就存在一个虚拟点。它无疑不仅是虚拟的；说实话，若非分析存在，我们只能回答说，没有人能够抵达这一点，除非借助我们总是假设某人可能拥有的那种自发而高明的分析，从而完美实现“认识你自己”。但对我们而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直到目前为止，只有分析才严格地勾勒出这一点。

Versagung，即拒绝这一观念所勾勒的，严格说来正是主体相对于要求的这一位置。我要在这里强调一点——可以说，这是我请你们沿着同

一条前进战线再迈出的一小步，就像刚才谈幻想时所要求的那样——当我们谈到

阶段、同客体的根本关系，谈到所谓口腔期、肛门期乃至生殖器期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这里形成了一种海市蜃楼：我们把这一切重新投射到发展中，于是便采用这样一个观念——但它始终只是事后重构的观念——仿佛一种围绕某项中心功能组织主体之周围世界的结构性关系类型，在发展中界定了主体同世界的关系，并赋予其环境中发生的一切一种特殊意义。

通常，人们甚至不会如此周详地表述这一点。比如说，环境的所有这些作用仿佛都要通过典型的口腔、肛门和生殖器客体发生折射，而这一事实恰恰经常被略过。人们径直谈论客体，又在旁边谈论环境，却从未想到要看清下列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由主体某个特定的排斥阶段所界定的某种关系中的典型客体；

另一方面，是具有多重影响的具体环境，也就是主体无论是谁、从最幼小时起、不管人们怎么说，都始终受到支配的那些客体的多样性。

所谓客体的缺席、所谓婴儿的［……］，在得到进一步证据之前，都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抱持最大怀疑的说法。我得告诉你们，对我而言，现在你们若肯相信我，就应把这一观念看成纯粹的幻觉；因为只要诉诸对幼儿的直接观察，就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中的主体对婴儿来说同样众多，同样有趣并富于刺激。

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取得的发现，确实可以界定并表述为主体要求的某种风格。那些使我们谈到主体同世界依次具有口腔、肛门乃至生殖器关系的表现，是在哪里发现的？我们是在分析中发现

它们的；接受分析的人，早已越过作为儿童发展阶段的那些阶段。于是我们说，主体退行到了这些阶段。当我们说主体退行到这些阶段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说这里存在某种向童年时期同样的想象性阶段的返回——即便这些阶段能够设想；我们暂且假定它们可以接受——是一种欺骗我们的说法，并没有向我们交出现象的真正性质。比如，当我们谈到神经症主体对某一阶段的固着时，如果这里涉及的确实是我们在分析中看到的东西——这在所有情形中都是我们的目标和道路［原文如此］——也就是说，主体在退行过程中所表述的东西，那么有什么表述能比通常给我们的说法更令人满意呢？

我们随后会更清楚地看到“退行”这个术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主体在分析中以一些术语表述其当前要求，这些术语使我们能够辨认出他分别同某个客体保持的某种口腔、肛门或生殖器关系。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意味着：主体在某一阶段的关系正因为进入了能指功能，才能对他此后的全部发展施加决定性影响吗？

正因为主体在某一层面，即无意识层面，以口腔性的术语表述自己的要求，主体$S$才在这里同无意识的某种虚拟能指表述保持特定关系。

正因为主体以吸纳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欲望，我们才能同时谈到：

- 某种会在探索的某一时刻以特殊价值呈现、被称为“固着于某一阶段”的东西；

- 另一方面，使主体退行到这个阶段也会有其意义，以便主体的主体性组织借以呈现的方式中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能够得到阐明。

但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这一点，而不是要为主体曾在某一时刻——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道理——于口腔、肛门或其他要求层面遭受的不满足提供补偿、重心、回返，甚至象征性的回返，仿佛主体会停在由此得到的满足上。

我们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主体同他者之关系的问题，正是在其要求的那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向他提出的；此后，这些问题将对他的欲望如何就位、如何获得位置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要求之中一切曾被主体实际体验过的东西，都已经一劳永逸地成为过去。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满足或补偿，归根到底都只能是象征性的；给予这些满足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错误。当然，这是一种错误，但这样做并非全然不可能。我们会看到，恰恰由于幻想的介入，由于幻想所承载的那种多少可以说具有实体性的东西，为什么它并非全然不可能。

但我认为，这是分析方向上的错误，因为到了分析结束时，它仍会让主体同他者之关系的问题悬而未决。

我们说，强迫症者同癔症者一样，需要一种未获满足的欲望，也就是一种超出要求的欲望。

强迫症者把自己的欲望变成一种被禁止的欲望，借此解决其欲望转瞬即逝的问题。他让他者来承载这种欲望，确切地说，是让他者的禁令来承载它。不过，让他者以这种方式承载和支撑自己的欲望，具有暧昧性。因为一种被禁止的欲望并不等于一种被压灭的欲望。禁令的作用在于支撑欲望；但欲望要得到支撑，就必须显现出来。

而强迫症者所做的正是这一点；问题是他如何做到。你们知道，他采取的方式极其复杂。他既把欲望展示出来，又不把它展示出来；总之，他把自己伪装起来，而原因不难理解。

可以说，他的意图并不纯粹。人们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并把它准确地称作强迫症者的攻击性：从根本上说，他的欲望每次涌现，都会使他产生一种报复性投射或对报复的恐惧，从而恰恰抑制其欲望的一切表现。

我认为，这只是对问题的第一种接近，还不是全部；如果只是说强迫症者在某种秋千上来回摆荡，便完全没有认出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架秋千从

一种欲望的显现开始；它一旦走得太远，就变成攻击性欲望，随后又降下或重新荡回，

进入可以说欲望的消失之中；这种消失被归因于主体害怕他者会对这一攻击性作出实际报复，也就是害怕遭到同他所显现的欲望所欲施加的毁灭相等的毁灭。

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整体上把握这里的问题；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几乎必须穿过同他者的这种关系在我们自己内部、我指的是我们分析家

以及分析理论本身内部发展出来的种种幻觉。归根到底，同他者之关系这一观念始终受到某种滑移的诱惑，而这种滑移力图把欲望还原为要求的问题。

如果欲望确实如我在这里所阐明的那样，是某种产生于言说在要求中打开的裂隙之中的东西，并因而作为这样的东西超出任何具体要求，那么很明显，任何试图把欲望还原成某种请求得到满足的东西的做法，都会遭遇内在矛盾。

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要说，忘我性这一术语——

也就是承认他者的欲望本身。如今，分析家几乎一致把主体成功实现的顶峰和最高点，置于这种承认之中；他们称之为生殖器成熟。上一次我给你们读过一个例子，出自我曾提出质疑的那位作者的一段文字：主体从满足他者的要求中取得深刻满足，归根到底，就是通常所谓的“利他主义”。

——恰恰遗漏了欲望问题中真正需要解决的东西。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这种道德化视角——无需夸大词义也可以这样说——呈现给我们的“忘我性”，就是一种强迫性幻想。可以肯定的是，在分析中，

就事情呈现的样子而言，那些气质——我说的是实践出于很容易理解的理由而加以理论化的气质——当中，癔症气质远比强迫性本性罕见。

分析的部分“教化”正沿着强迫性愿望的路线和路径进行。强迫症者触手可及的幻觉乃至幻想，归根到底就是让他者本身同意他的欲望。这

本身就带来极端困难，因为他者必须同意，但这种同意完全不同于对任何满足的回答、对要求的回答。然而这一点被彻底略过了：人们用一种短路来给我们提供答案，仿佛最终只需达成一致，仿佛“要在生活中找到幸福，只须不把自己曾遭受的挫折施加给别人”，这样的想法更可取。

分析中的一部分不幸结局和彻底混乱，正来自这样一种处理要求的方式：从某一时刻起，主体受到那些良好意图的前景鼓舞，而这些意图很快就变成有关分析治疗圆满结束的一系列预设；主体于是投身于强迫症者最常见的倾向之一，这种倾向大致可以表达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令无疑是绝对命令，在道德中极为本质并具有结构作用，但在生活中未必总能实际运用；一旦涉及性结合这样的实现，它无疑完全偏离目标。

同他者建立关系时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这无疑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滑移。它之所以更加诱人，是因为分析家面对作为小他者、作为其同类的另一个人时，正处于一种攻击性关系之中，所以他自然容易占据可以说饶过对方的位置。饶过对方，正是一整套仪式、预防措施和迂回手段，

总之，是强迫症者全部花招的根底。

如果分析最终只是把那些在其症状中无疑不无缘故地以复杂得多的方式显现出来的东西加以“教化”和泛化，把它们作某种道德化的外推，再把所谓“忘我性的出路”、即对他者要求的服从，作为问题的终点和出路提供给他，那么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绕这样一个圈子。

总而言之，正如经验所表明的，这不过是用一个症状取代另一个症状，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症状；因为它当然必定会导致尚未得到、也不可能通过这些道路以任何方式得到解决的欲望，以多少具有问题性的其他形式重新涌现。很显然，从这个角度看，强迫症者自行找到并试图借以解决欲望问题的道路，即使并不适切，也反而更切合问题，因为问题至少在其中清楚可读。

例如，存在几种解决模式，其中一些恰恰位于同另一个人的实际关系层面。只要强迫症者还能够同自己的同类相处，还没有被自己的症状淹没——而他很少会被完全淹没——他的行为方式本身

就足以提供指示；它无疑通向一条死路，但对方向的提示仍不算太差。例如，我曾向你们谈到强迫症者的功绩表现。这种功绩表现究竟是什么？要有功绩表现，至少得有三个人：

- 因为一个人无法独自作出功绩表现；至少必须有两个人，才会出现类似的东西，才会有赢下来的竞技表现、冲刺……
- 还必须有一个人记录并充当见证者。

很明显，强迫症者在功绩表现中力图获得的，恰恰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他者的许可”。他以某种极为多价的东西为名来寻求它；我们可以说，是以自己完全配得上所寻求之物为名。然而，满足根本不能归入他借以挣得这一资格的领域。请观察我们的强迫症者的结构。

所谓“超我效应”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给自己强加各种格外艰难、格外严酷的任务，而且确实完成了；他们越是因为自己欲望去做，完成起来反而越容易，并且完成得极其出色。于是，他们觉得自

己有权享受一小段假期，在此期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由此便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工作与假期的辩证法。

在强迫症者那里，工作声势浩大，其目的在于腾出那段扬起主帆的时间，也就是假期；

而假期过去之后，通常会显得这段时间几乎完全浪费了。为什么？因为问题当然在于取得他者的许可。可另一个人——我指实际存在的另一个人——同这整套辩证法毫无关系，理由很简单：现实中的另一个人正忙于应付他自己的他者，根本没有理由承担这项使命，给强迫症者的功绩表现

戴上一顶小小的桂冠；而这顶桂冠，本应意味着他的欲望得到实现，然而这种欲望

同他展示自己全部能力的领域毫无关系。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完全值得以幽默的面貌展示出来。但事情并不限于此。大他者和小他者这类概念的意义恰恰在于：

它们可以应用于、可以结构化沿着远不止一个方向展开的切身关系。

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说，主体在功绩表现中支配——这话不只我一人说过——驯服乃至驯养所谓根本焦虑。我认为，这里仍有一个现象维度遭到了忽视：本质不在于这种熟练掌控，也不在于这种所冒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强迫症者那里始终

被限制在极其严格的界限之内。我的意思是，一种精细的经济会严格区分强迫症者在功绩表现中承担的风险，与黑格尔辩证法中所谓“死亡的风险”相似的一切东西。

强迫症者的功绩表现中总有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停留在虚构之中，因为死亡——

我指真正危险所在的地方——完全不在他看似实际挑战的对手那里。它恰恰在那位不可见的见证者、那个作为观众在场的他者一边；他计算击中的次数，并会谈到对手说：“这家伙可真不好惹！”——正如施雷伯的妄想中某处所说。不过，在这整套功绩表现的辩证法中，都能重新找到这种感叹和承认挨了一击的方式：它隐而不显、潜伏其中，又为主体所盼望。

在这里，强迫症者让作为其同类的另一个人的存在进入某种关系；另一个人就是他可以设身处地占据其位置的人。恰恰因为他可以把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所以在他通过派头效应、体育竞技以及多少有所承担的风险所展示的东西中，实际上不存在任何

根本的风险。

同他竞技的这个另一个人，归根到底永远不过是另一个他自己；无论怎样、无论从哪一边着手，这个另一个人都已经把桂冠让给了他。但

这一切在其面前发生的他者才是重要的，也正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的那个他者：

- 它是可以说功绩表现得到记录的点和场所；
- 它是可以说他的历史得到铭刻的地方。

……这个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维持。正是它使强迫症者如此依附于一切言语秩序中的东西，依附于一切属于计算、汇总、铭记乃至伪造的东西；也正是它使强迫症者首先想要维持的——尽管他不动声色，看起来仿佛瞄准别的东西——成为这个大写的他者，事情在其中以能指的方式得到表述。

这是我们能够开始接近这一愿望的第一条进路，因为问题在于考察：在一切要求以及他所欲望的东西之外，强迫症者的行为从总体上瞄准什么。可以肯定，维持他者是他的根本目标，因为这是首要的、预备性的目标；只有在它内部，他的欲望才能得到那种如此困难的确认。

这种确认可能是什么，又将会是什么？这是我们随后必须阐明的。但首先，必须把他的行为的“四角”固定下来，才不会让树木遮蔽森林，也不会为了捕捉这里或那里的某个小机制而

停在那个机制上，被它迷住；因为它带有某种风格，我们便在那里找到一种满足。

显然，人们总会停留在有机体的某个细节上；这种满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自然现象的领域，一个细节总会反映总体中的某种东西。但是，主体同能指之关系的组织如此不自然，以至于我们不能

完全依靠某一种防御机制来重构强迫性组织的全部，因为你们当然可以开始用防御机制的目录来表达这一切。

我试图做的是另一件事：我试图让你们找到主体的每一种防御都围绕其定向并

发生极化的四个基本方位。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其中两个：首先接近的这个方位，即幻想的作用；现在通过功绩表现，我们又看到，他者的这种在场本身是完全根本的东西。

还有一点，我至少想为你们引出这一章。听我谈到功绩表现时，你们无疑想到了自己那些强迫症者的种种行为；但有一种功绩表现，也许不完全适合归在同一个标题之下，那就是分析中所谓的行动呈现（acting out）。为此，我查阅了一些文献——希望你们也以我为榜样去查一查，哪怕只是为了确认我的说法。

结果非常惊人：人简直无法从中理出头绪。

就这一主题写得最好的是菲利斯·格里纳克，她的文章题为《行动呈现的一般问题

》[注1]。这篇文章非常出色，因为它表明，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就这一问题提出任何有效的阐述。

> [注1] 菲利斯·格里纳克（Phyllis Greenacre）：《行动呈现的一般问题》（“General Problems of Acting Out”），《精神分析季刊》（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第19卷第4期，1950年，第455—467页。

我认为，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限定。而如果只停留于下列一般观念，就完全不可能加以限定：行动呈现是一种症状，是一种妥协，具有双

重意义，是一种重复行为……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会被淹没在最一般形式的一切重复强迫之中。

我认为，如果行动呈现有其意义，那么它总是在试图解决要求与欲望问题的过程中涌现的某种东西。正因如此，这类被称为行动呈现的行为更多地发生在分析期间；因为不管人们在分析中实际如何处理它，分析毕竟是在尝试解决欲望与要求之关系的问题。

行动呈现无疑发生在分析中实现无意识欲望的道路上和领域内。

它极富启发性；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行动呈现事件的特征，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切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例如，正是这些部分使它同所谓失败行为绝对区别开来；后者在这里更恰当地被我称作

成功行为，也就是让某种［……］清楚显现出来的症状。例如，行动呈现总是包含一个具有高度能指意义的因素，而且恰恰因此是谜样的。只有当一项行为带着特别缺乏动机的性质呈现出来时，我们才会称之为行动呈现。这完全不等于说它没有原因，而是说它恰恰在心理学上无法得到动机说明，因为它始终是一项被赋予意义的行为。

另一方面，行动呈现中总有一个客体在发挥作用，而且是在物质意义上的客体。下一次我会回到这一点，以便向你们说明，在这整套辩证法中，应当赋予客体作用的只是何种有限功能。

另一方面，幻想同行动呈现之间还存在一种功能上的关系，几乎是一种等价关系。我的意思是，行动呈现的结构通常非常接近一个“场景脚本”；它以自己的方式同幻想处于同一层面。有一件事把它同幻想区分开，也把它同功绩表现区分开：功绩表现是一种练习、一种壮举、一

种戏法，归根到底意在取悦他者，取悦那个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对此毫不在乎的大他者；而行动呈现却是另一回事。这正是它值得我们考察的地方：行动呈现始终是一则讯息，也正因此引起我们的兴趣。

当它发生在分析中时，总是指向分析家；它所指向的分析家，可以说所处的位置不算太差，却又不完全在其应有的位置上。一般而言，这是主体给我们的一个暗示；它有时会走得很远，有时会非常严重。如果行动呈现发生在治疗界限之外，它仍是一个暗示。显然，这种暗示几乎无法被分析家利用；而严重之处恰恰在这里：每当我们在治疗界限之外精确指认出某种具有这种悖论性行为之特征、也就是所谓行动呈现的东西时，

最终必须触及的无疑是在这条线上得到表述的某种东西，也就是澄清主体同要求的关系；这一澄清会揭示，只要问题在于使主体最终触及能指作用于主体的这种效应的实际现实，亦即使自己达到阉割情结本身的层面，那么同这一要求的任何关系从根本上说都是不适切的。

严格来说，也就是说，这一步已经错失了。

它可能遭到错失——下一次我将试着向你们说明这一点——而且恰恰是由于

在这个间隔空间中发生了从功绩表现到幻想、再从幻想到

对客体的一种完全充满激情而又部分的爱——这样说正合适。因为亚伯拉罕从未说过部分客体，他说的是“对客体的部分之爱”。正是由于在这个客体的中间空间内移动，人们才获得了一些幻觉性的解决办法。而所谓

强迫性神经症内部的“同性恋移情”，恰恰体现了这样一种幻觉性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所说的幻觉性解决；我希望下一次向你们详细说明，为什么它是一种幻觉。

# 第24课 · 1958年6月4日

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专辟一章讨论认同。在今年余下的几次研讨班里，我们将深入这一领域：这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约1920年开启的第二地形学领域。

因为今年我们一直试图给出无意识的形成物及其所代表之物的一个维度；只有走过这段路，我们才不会在地形学问题上迷失于它通常具有的其他意义。因此，我们至少要指出这一地形学意味着什么，尤其要说明：为什么它把自我的功能推到前景时，所取的意义同后来人们对它的使用明显不同，而且远为复杂。这先为你们标明方向。

眼下，我从这一章关于认同的论述中提取一点。当然，你们必须读它，必须看清弗洛伊德所区分的三种认同类型如何对应我将在这里这幅图式上向你们作出的转置。走到目前为止，这幅图式对你们恰好应当具有一种中介、一种阐明乃至解释图式的价值；它连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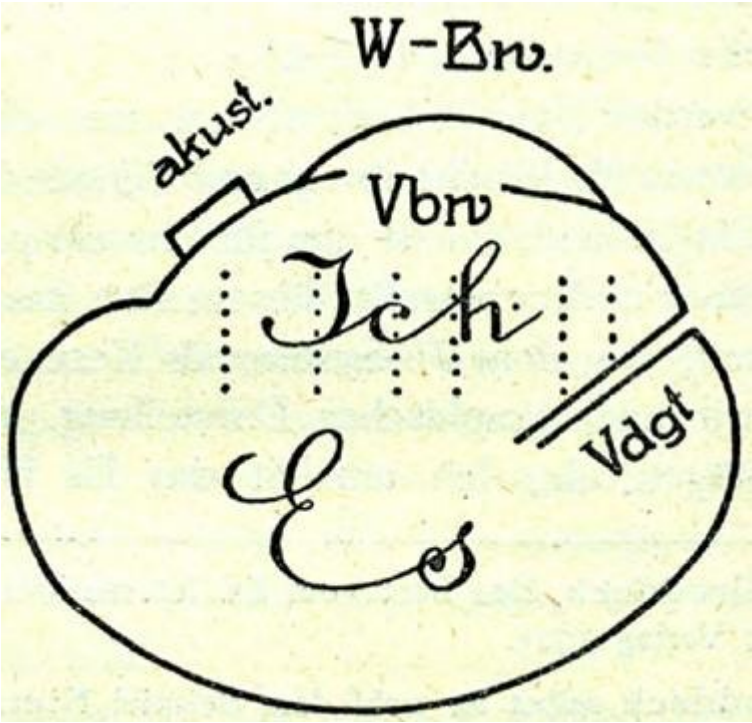
- 一方面，无意识结构的情形，而这一无意识结构从根本上像言说、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
- 另一方面，从中显现出来的地形学。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弗洛伊德区分了三种认同类型。这一点得到明确阐述，并在某一段中得到清楚概括。第一种认同是最原初的

同某一客体建立情感联结的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他在这一章中特别详加论述的形式；事实上，弗洛伊德围绕认同所作的全部思考都具体奠基于此，而这些思考又从根本上同全部地形学问题相连。不过，在评价弗洛伊德地形学的各个可以说“器官”之前，我们不应忘记一个首要事实：它们源自那幅著名的带眼睛的蛋形图式；



你们正是从这幅图式出发，想象并“直观化”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某处有一只眼睛，还有一种仿佛插入代表超我之实体的滴管。它无疑是一幅十分方便的图式。它的缺点恰恰在于：为了表象地形学关系，人们采用了空间图式。

这是连我自己也无法逃避的必然性，因为我同样借助空间图式来表象自己的地形学。

我尽量把不便降到最低，因为地形学同空间图式的区别在于：比如这幅图式、我的小网络，就算你们把它拿起来揉皱，捏成一只小球放进口袋，原则上其中的关系仍完全相同；它们是联结和次序的关系。

而对这幅蛋形图式来说，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因为它完全朝向空间投射。于是你们会想象，弗洛伊德想以本我指称处在某个地方的某种器官，上面长着由自我所代表的突起，而这个自我确实像一只眼睛安在那里。但请读原文：弗洛伊德丝毫没有提到任何带有这种实体性质的表象，也没有提到任何容许人们把它表象成某种有组织分化的东西。身体器官的发展完全是另一回事。“认同”这个术语所指的也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分化所依托的是认同；它们属于另一种类、另一种秩序，完全不同于器官的分化。

提醒这一点极为重要，哪怕只是因为误解可能走得非常远。归根到底，真的有人想象，自己实施脑叶切除术时切掉了一片超我。他们不仅相信这一点，还把它写下来，并怀着这种想法实际操作。

我们看看弗洛伊德如何阐明第二种认同：它沿着退行的道路产生，用来取代同客体的联结；这种力比多联结等同于把客体内摄到自我之中。我再说一遍，正是第二种认同形式，在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

自我分析》乃至《自我与本我》的整篇论述中，由于它同客体的暧昧关系而给他提出了最多问题。分析的一切问题也都汇聚在这里，尤其是倒错的俄狄浦斯情结问题：为什么在某一时刻、某些案例以及倒错的俄狄浦斯情结形式中，一个原本受到力比多依恋的客体，会变成认同的客体？

在某些情形中，维持问题本身比用随便一种方式解决它更重要。我们绝没有任何义务去表象这一问题的某种可能答案；

毕竟，这也许正是中心问题，是我们注定始终停留在其此岸的问题，是构成枢轴点的问题。某处必须有这样一个点；因为无论我们站在哪里，认定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始终还会留下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又如何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一切都清楚的点上？

很显然，必定有一个点使我们恰恰始终浸没在问题之中。我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点就是它；不过可以肯定，弗洛伊德本人始终围绕它打转，并且从未声称自己已经解决了它。重要的倒是考察这个零点的坐标如何变化。我再说一遍，本质问题就在这里：经验从根本上向我们表明，对某一客体的爱与随后出现的认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这里以最清楚的方式，引入了我在最近一次研讨班结束时谈到同阳具的关系问题时所提及的区分与对立，归根到底就是成为与拥有的对立。他正是这样阐明下列两者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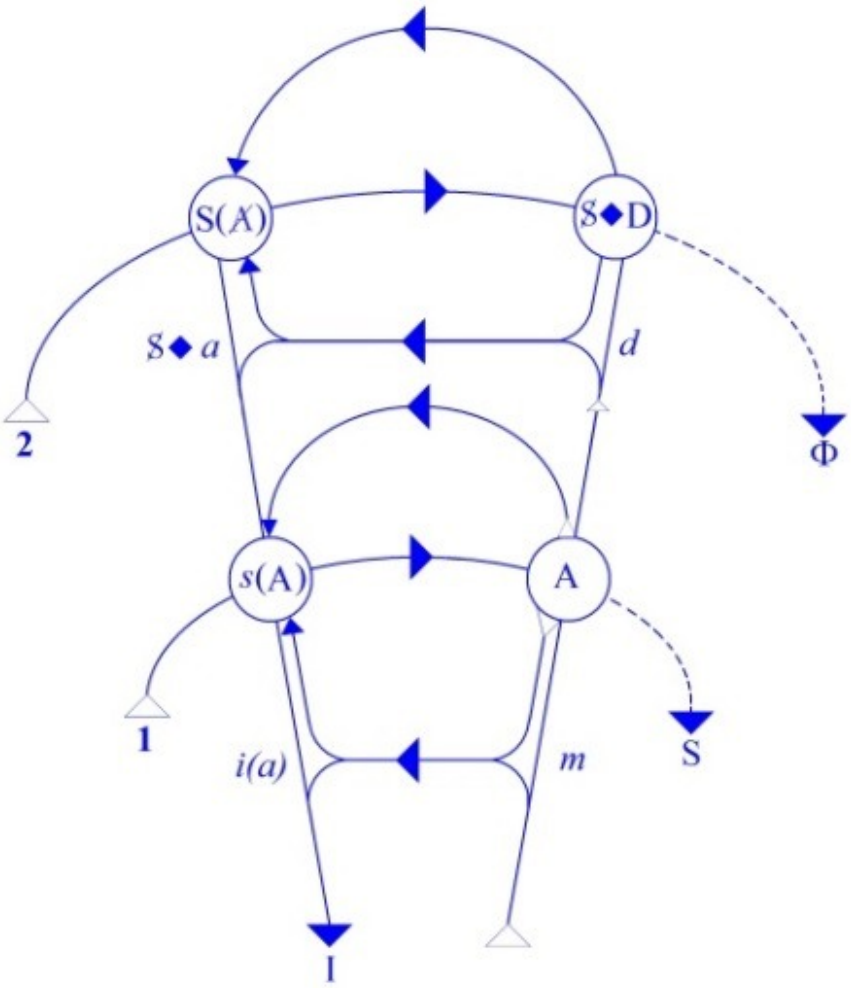
- 对所爱客体的色情性、力比多依恋；
- 以及对同一个客体的认同。

但是弗洛伊德确实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他的经验所显示的是，这种认同始终

具有退行性质。这种从力比多依恋

转变为认同的坐标和相关关系，都表明其中发生了退行。我想，你们知道的已经够多，无须我把每一点都说破。无论如何，我在此前几次课中已经阐明，退行由什么得到证明。当然你们知道这一点，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表述它。我们这样表述：能指的选择清楚地给出指示。我们所谓退行到肛门期——包括它的一切细微差别和变体——乃至退行到口腔期，始终是我们在当下、在主体话语中看到的退行性能指。分析中不存在其他退行。

主体躺上你们的躺椅，像婴儿一样哼哼，甚至模仿婴儿的行为，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但我们并不习惯把它看作分析中真正遇到的退行。病人确实会作这种姿态，不过这通常不是好兆头，也不是你们平常所谓的“退行”。既然我们已经谈到这两种认同形式，就来尝试把它们应用到我们的图式上，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这里有两条线；我们站在主体需要的层面时——弗洛伊德使用了Bedürfnis这一术语——它们就从这里出发。顺带向你们指出，弗洛伊德在同一段有关认同出现及其同客体投注之关系的思考中，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后来必须承认，客体投注……”

顺便提醒你们，扬克列维奇对这些章节的翻译，确实把它们译得无法理解，

有时甚至让它们说出同弗洛伊德原文恰好相反的意思。比如“客体投注”被译作“专注于客体”，实在晦涩得不可思议。

“……客体投注来自Es（本我）；本我把色情性刺激知觉为需要。”

你们看到，Es在这里被呈现为某种非常暧昧的东西：它把色情性刺激、

色情性的压力与张力知觉为“需要”。无论如何，从需要的视角来看，这两条线［1和2］给出了要求的两个地平线：

- 一条是这里经过表述的要求［1］，即满足某种需要的要求；因为对需要之满足的任何要求，都必须穿过语言所强制规定的表述隘口。

- 另一条则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主体在自己的存在而非表述中进入能指层面，于是在要求所指向的一方［2］、即他者那里产生了对爱的无条件要求。它同下述事实相连：要求所诉诸的那一方本身得到象征化，也就是说，他作为以缺席为背景的在场出现，可以作为缺席者而被使之在场；这就是另一个地平线。

在一个客体以色情意义得到爱之前，在所爱客体的爱欲能够被知觉为需要之前，

要求的设立和定位已经创造出对爱的要求这一地平线。这幅图式把两条线分开：一条是作为满足某种需要之要求的要求，另一条是对爱的要求。它们因为拓扑学上的必要性而被分开；但刚才的说明仍然适用：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同一条线，也就是儿童在母亲面前表述出来的那条线。

换言之，当主体的需要作为能指在这两条线上得到表述时，其中发生之事的展开具有一种暧昧性和同时性。两者的叠加、同时性和暧昧性始终以恒常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你们马上会看到这种暧昧性的一项应用：它正是弗洛伊德在全部著作中永久维持的如下暧昧性：

- 移情本身的观念，我指移情在分析中的作用；
- 与暗示的观念。

弗洛伊德一直告诉我们，移情毕竟就是一种暗示，我们也确实这样使用它。但他又补充说：“……只不过我们用它来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解释这种暗示。”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解释暗示，就因为暗示本身具有一个向其敞开的背景，因为可以说，潜在的移情已经在那里。我们非常清楚它确实存在，我马上就给你们一个例子。

潜在的移情已经是对暗示的分析，它本身就是使这种分析成为可能的东西；

它是对暗示中径直强加给主体之物的第二层表述。换言之，暗示据以建立的地平线在这里［1］；它从根本上处在要求层面，处在主体仅仅由于来到这里便提出的要求层面。这些要求是什么？

我们如何给它们定位？从一开始就把这一点弄清楚很有意义，因为要求变化极大：

- 有些人确实每时每刻都把治愈的要求完整带在场。另一些更知情的人则知道，这项要求被推到了明天。
- 还有一些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要求治愈，他们是来看看。
- 有些人来这里是为了成为分析家。

知道要求所处的位置有多重要？因为分析家即使不回应它，也已经以这种方式被设立，并因而回应了它；这构成一切暗示效应。但不要告诉我，移情只不过是使暗示得以运作的东西。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的。不但通常如此理解；我甚至要说，直到弗洛伊德原文的某个时刻，他仍写道：应当让移情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理由利用移情所提供的何种力量？暗示的力量。这里，移情被理解为分析家对主体的掌握和权力，被理解为使主体依赖分析家的情感联结；我们有理由利用它，好让某个解释被主体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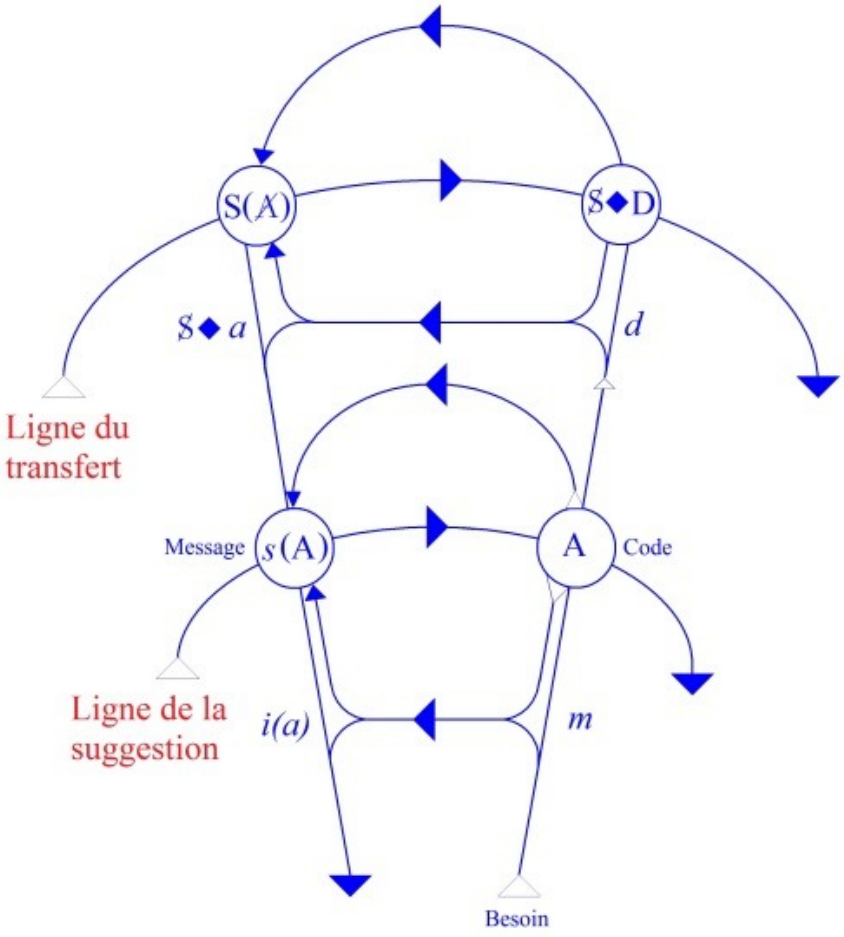
在这个层面，这不就是以最清楚的方式说出我们在利用暗示吗？直呼其名：正因为病人已经开始很喜欢我们，我们的解释才会被他囫囵吞下；我们就在暗示的层面上。

当然，弗洛伊德绝不打算止于此。但是，当人们说“是的，我们要分析移情”时，请仔细观察这里出现的分岔：它会使作为某种东西的移情完

全消散——我强调这些词，是因为它们不是我的词，而是有关移情问题的一切讨论中隐含的词——即移情作为对主体的情感掌握而消散。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同那种依靠对病人的权力来使自己暗示的解释获得接受的人不同，区别仅仅在于我们会分析这种权力的效应，那么我们所做的，除了把问题无限推后以外，还有什么呢？

因此，我们仍要从移情出发，分析刚才发生的事情，例如主体接受某个解释这一事实。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走出暗示的恶性循环。然而，我们恰恰假设另一种东西是可能的。因此，移情必定不同于对某种权力的使用：移情已经是一片敞开的领域，是另一种能指表述的可能性；它不同于把主体封闭在要求中的表述。

所以，无论内容是什么，把这里所谓的东西放到地平线上都是正当的；它不是暗示之线，而是移情之线，也就是某种经过表述、潜在地处于要求层面所表述之物的彼方的东西。




而处在地平线上的，正是产生要求本身的东西，也就是他者的象征化，也就是对爱的无条件要求。客体随后才作为色情客体安置在那里，主体也正是在那里瞄准它。

我们说，在把客体作为所爱之物加以瞄准之后，认同接替并取代了这种瞄准，而且这种认同是一种退行；这恰恰意味着，这里所涉的是这

条移情之线同暗示之线之间的暧昧性。因为我们知道——我早已从一开始便阐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在这里向我们阐明——暗示之线上会发生原初形式的认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对标记的认同。作为要求主体的另一个人，有权满足或不满足要求；他每时每刻都以某种当然处在前景的东西来标记这种满足，也就是他的语言、他的言说。

我强调过儿童同母亲之间言说关系的重要性；它们至关重要，并且使其他一切符号、母亲的全部哑剧——正如昨晚所说——都以能指方式得到表述。这些能指结晶在那些所谓情感表情的约定俗成性质中；母亲正是借助这些表情同儿童交流。这又赋予人类的一切情感表达一种约定俗成的性质，使所谓情感表达的自发性在考察之下显得——

而且无需为此成为弗洛伊德主义者——不仅极成问题，而且极度漂移：在情感的某一能指表述区域中表示某种情感的东西，

在另一个区域——这是一项参照——从情感表达的角度看，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所以，如果认同本身具有退行性质，恰恰是因为移情之线与暗示之线之间始终维持暧昧性。换言之，我们无须惊讶：在分析的延续、展开和迂回过程中，一系列同退行相关的认同为退行划分出节拍，标记其时间和节奏。况且，两者并不相同。退行与认同不能同时发生；一种是另一种的停顿和止步。

但仍然如此：如果存在移情，正是为了让这件事维持在不同于暗示的另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不把它作为没有任何要求满足与之回应的东西来瞄准，而是把它作为能指表述本身来瞄准；这正是两者的区别。

你们会问：“什么操作使我们能够让两者保持区分？”我们的操作恰恰是禁欲或不介入的操作，即从不把要求本身当作可奖赏之物。我们知道这一点；但这种不介入尽管至关重要，单凭自身仍然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两条线之所以能够保持区分，正因为让它们保持区分符合事情的本性。

换言之，正因为对主体而言两者是有区别的，并且恰恰因为两者之间有整个领域——谢天谢地，这个领域绝不狭窄，从未遭到取消，它被称为欲望领域——两者才能保持区别。也就是说，由于我们作为他者在场，别人对我们的全部要求只在于不要助长这种混淆。因为当然：

- 只要我们作为他者进入这里，尤其以分析所特有的、我们称作容许性的方式进入——尽管这种容许性只在言语层面——就已经足够；

- 只要事情在言语层面是容许的——为什么？当然不是为了使病人得到满足，尽管他确实会因此满足；但他并没有在实在的诸要素中得到满足——

- 只要他在要求层面得到满足，这两个层面就会不可挽回地混淆：一个是我所谓的移情之线［2］，另一个是我所谓的暗示之线［1］。

因此，由于我们在场并倾听病人，我们正是那个使移情之线趋向于同要求之线混淆的东西。所以从原则上说，我们是有害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退行是我们的道路，却是一条下降的道路；相对于我们行动的终点，它指示的不是目标，而是迂回。我们必须始终把这一点牢记在心。谢天谢地，有某种东西阻止了这种不可挽回的混淆建立起来……

尽管有一整套分析技术以建立这种混淆为唯一目标和终点，因此它最终导致“移情神经症”。随后你们会在一本名为《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的期刊上读到：要解决所谓移情问题，只剩一件事可做：

- 让病人坐起来；
- 给他看些和善的东西；
- 让他看看外面多么美好；
- 再让他小步跨过门槛走出去，免得惊动苍蝇。

而这竟出自一位技术大师！

幸好，两条线之间有某种东西反对移情之线与暗示之线的这种混淆；两者之间恰恰有欲望。这些事情如此明显，以至于催眠师——或者简单说，对催眠感兴趣的人——都很清楚：不管一种暗示多么成功，都无法彻底占有主体。究竟是什么在抵抗？

恰恰是这一点——我甚至不会说主体的这个或那个欲望，那是显而易见的——而从根本上说，是拥有自己欲望的欲望；这更加明显，但并不因此就不必说出来。对主体而言，正是这些必然维持欲望的形式，使他仍然保持人类主体本身的性质：一个分裂的主体。如果他不再是分裂的主体，他就是疯子。他仍是分裂的主体，因为这里有一个欲望领域；它毕竟必定不那么容易维持，因为我向你们解释的正是：为什么一种神经症——一种癔症性神经症或强迫性神经症——会以它现有的方式构成；它就是为了维持某种经过表述、名为“欲望”的东西，而这一点界定得很清楚。

神经症并不是力量较大或较小、较强或较弱，也不是从那种直觉性的意义理解的固着：仿佛固着就是主体某一步踩进了一罐胶水的地方。固着显然是另一回事。如果它像

某种东西，倒更像是为了固定一个否则会逃走的东西而打下的木桩。神经症者那里所谓的“量的因素”、即欲望的力量，差异极大。我甚至要说，这是最有说服力地确保神经症中的结构变异具有自主性的事情之一。

经验清楚表明，具有同一种神经症形式的人，在某位论述强迫性神经症的作者所谓其一名病人的“旺盛而早熟的性欲”方面，禀赋却截然不同。

我得说，所谓“旺盛而早熟的性欲”，指的是那位在某处被这样描述的人：

> “他自慰时轻轻捏住包皮末端；当时他深信，一旦包皮套退缩，就会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他不敢清洗自己的［……］，因为害怕弄伤自己、失去某种东西。医生的建议［……］他们多次尝试性交都失败，只得去看医生。”[注1]

[注1] 莫里斯·布韦：《男性强迫性神经症四例治疗中同性恋移情方面的重要性》，《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8年，第419页；后收入莫里斯·布韦《著作集》，帕约出版社，1967年。

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症状！至少在作者把分析引到的那个阶段，主体显示自己

完全有能力满足妻子并履行丈夫的义务。然而！然而！我们总不能把一种“旺盛的性欲”归给这种性欲：无论我们假设何种力量支撑这些症状，它毕竟会任由自己衰弱和受骗，以至于人们能够对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主体作出这样的描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强迫性神经症者不会向你们展示一幅不同的图景，例如一种确实可以称作旺盛乃至早熟的性欲。临床病例中这种十分明显的差异，恰恰向我们表明：一种神经症之所以是强迫性神经症，完全不取决于欲望的这种量的因素；而这种差异也不妨碍我们认出，各个病例中所涉的始终是同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即使量的因素介入，也只是因为它恰好必须穿过所谓“结构的隘口”。

这里刻画神经症的乃是结构。例如在强迫症者的情形中，正是结构使他的欲望变得微弱：无论他正值青春期，还是到四五十岁、即欲望毕竟已经衰退的时刻才来找我们，想稍微弄明白曾经发生过什么，也就是弄明白自己迄今在生活中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事情都是如此。在所有这些病例中，呈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欲望的强弱；相反，无论强弱，强迫症者的一生都在忙于把自己的欲望置于强势位置，为欲望构筑一座“堡垒”，而且是在那些本质上属于能指关系的关系层面上。

这座“堡垒”里住的是强欲望还是弱欲望，问题并不在此。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无论如何，“堡垒”都是双刃剑；向外部构筑的堡垒，往往给住在里面的人带来更多麻烦，问题就在这里。

因此你们看到，第一种认同由同客体的第一重联结来界定；也就是——如果你们愿意用图式化的方式说——发生在对母亲的认同层面的东西。

另一种认同形式［第二种］是对所爱客体的认同，它具有退行性质；也就是说，它本应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不太容易抵达的地平点，因为这个点恰恰是无条件的，更确切地说，它只服从能指存在这一条件。

因为在能指存在之外，爱本身的维度不可能有任何开启。爱完全依赖于能指的存在，这是其唯一条件；然而在能指存在内部，除了存在表述这件事以外，它不依赖任何特殊表述。正因为如此，它不太容易得到表述：归根到底，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完整、填满它，甚至我一生中的全部话语也不能，因为爱还是我的话语的地平线。

这恰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层面上，这个$S$意味着什么？换言之，这里所涉的是哪个主体？我们无须惊讶，这始终只能构成一个地平线；也就是说，全部问题在于知道

什么将在这个方向、这个间隔中构成并得到表述。

如果对于神经症者而言，经过表述之物沿着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么神经症者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同所有人一样经历着欲望的悖论，因为没有任何被纳入人类处境的人能够逃脱它。所谓正常欲望关系与神经症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并不只是这个悖论，因为欲望的悖论是根本的；区别在于，神经症者向这一悖论本身的存在

敞开。

这当然没有使他的生活变得简单；但从某个角度说，也没有使他处于太糟的位置。我们完全可以趁此机会把这个角度表述为哲学家的角度。哲学家的角度同样不清楚；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像质疑神经症者的角度一样质疑它，甚至不知道哲学家有没有机会这样做。

不论这是否有效，可以肯定的是，事情的本性决定了它必定如此；因为这毕竟发生在某种同哲学家所阐明、或至少应当阐明之物有所亲缘的东西、道路、线条和开口之上。说实话，这个欲望问题，你们真的见过它在哲学道路上得到过细致、恰当而有力的阐明吗？直到现在，在我看来，哲学最有特征的一件事就在于：它最为小心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会促使我就行动哲学另开一个插话，而结论仍然相同。人们漫无边际地谈论行动，把它看成不知哪一种人类自发性和原创性的工具，仿佛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改变问题的既定条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改造世界。

……但非常奇怪的是，人们从未突出某种对我们而言是经验真理的东西，也就是欲望同行动之关系中深刻的、完全昭然若揭的悖论。上一次，我提到功绩表现、竞技表现、展示、行动乃至孤注一掷的出路，已经开始向你们引入它的特征与轮廓。

我所用的这些术语不是我创造的，因为弗洛伊德用Wirkung［行动］这个词指称完全悖论性的行动、完全一般化的行动，也就是人的行动。人们尤其会在声称与历史一致地把人的行动指认为“渡过卢比孔河”时看到它。我的朋友科耶夫把这件事说成某个汇聚点，是恺撒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和谐解决……不过，我上次经过那里时，只看到河

床干涸。它非常宽阔；我到那里时正值枯水期，当然不是恺撒渡河的季节……而且，即便恺撒以他的天才“渡过卢比孔河”，在“渡过卢比孔河”这个事实中也始终包含“投身水中”的意味，毕竟那是一条河。

换言之，人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和谐。对我们分析家来说，世界上最令人惊讶的事情莫过于：分析中竟没有人从这种悖论视角着手，试图阐明行动的问题；而我们不断从这个角度看见它，也从未见过别的行动。况且，这使我们很难恰当界定严格所谓的行动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动呈现是一项同其他行动一样的行动；但它之所以突出，恰恰是因为我们使用移情而激发了它，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做一件极度危险的事。而正如你们从我的提示中看到的，我们对移情越没有非常、非常准确的认识，这件事就越危险。

也许下面这项顺带的提示能使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所谓“阻抗”可以十分具体而有形：在某些情形中，主体不接受我们在退行层面上向他提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乍看似乎如此吻合，可对他而言却完全对不上。如果主体“抵抗”，只要我们坚持，他最终总会让步，因为我们随时准备拨动暗示这根弦。然而，只要这种“阻抗”表达了维持某一点的必然性——欲望必须在这里以另一种方式，即在欲望层面得到表述——这种“阻抗”具有怎样的价值？

它恰恰具有弗洛伊德在某些文本中赋予它的价值。他若称之为 Übertragungswiderstand，

［移情阻抗］，就是因为它同移情是一回事——移情取我眼下告诉你们的意义；在这里，无疑需要维持的是另一条线，即移情之线。在这

条线上，表述线提出的要求不同于我们立刻为回应要求而赋予它的东西。

作过这一番提醒之后——它只涉及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些事情仍需要得到阐明——我想告诉你们：

- 第二种认同意味着一个对退行过程中所发生之事作出判断的点；
- 正是这种移情召唤，使那场名为退行的能指骚动成为可能，并且必须把我们带向某种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眼下我们试图瞄准的，就是如何运用移情。然而，移情自然倾向于退化成某种我们总能以一定方式在其退行层面满足的东西，也就是使我们形成某种分析观念；这种观念恰恰受到挫折观念，以及有时在客体关系中以千百种方式表达的不同表述的迷惑。

可以说，一切表述分析的方式都始终倾向于退化，但这并不妨碍分析毕竟还是另一回事。

弗洛伊德这样阐明第三种认同形式：这种认同可以产生于主体同一个完全不是性驱力客体的人之间新近觉察到的共同点。

这种第三种认同位于何处？弗洛伊德给出的例子，使我们在这幅图式上如何回答没有任何暧昧。他以癔症者的认同为例，并作出精确阐述。正如我这些日子一直告诉你们的，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点总是以最清楚的方式说出来：对癔症者而言，问题在于在某处聚焦——如同光学仪器能使一点聚焦那样——聚焦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给她带来一些特殊困难。

让我们尝试更精确地阐明这一点。对她而言，这一欲望毕竟注定陷入某种死路，因为她只有在认同于随便什么东西、认同于某一个小小的特征时，才能完成对自身欲望之点的聚焦……弗洛伊德写道：

> “我所说的是一个标记、一个特征、唯一一个特征——不论是哪一个——它取自另一个人；她能够在此人身上预感到同一个欲望问题……”

也就是说，癔症者的死路为她向另一个人敞开了大门，至少向所有其他人敞开了大门：一切可能的癔症者，乃至所有其他人的一切癔症时刻；只要她在他们那里瞬间预感到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欲望的这一疑问。弗洛伊德正是这样给它定位的。

我会向你们表明：从拓扑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对强迫症者完全相同，尽管其表述略有不同；这是有原因的！换言之，这里所涉的认同就是这里的［$\mathcal{S} \diamond a$］，即上一次我向你们指出强迫症者的幻想所处的地方。主体必须在某一点同另一个人建立某种想象性关系；并不是这项关系本身带来满足，而是它作为想象性关系给主体带来满足。

原文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所涉的是一个同任何性驱力都没有关系的人或客体。它是另一种东西，是一种支撑；如果你们愿意，它是幻想的一只木偶。你们愿意让“幻想”这个词具有多广的范围都可以。这里所涉的是我上次所阐明、此后还会再谈的幻想，因为幻想可以是一种无意识幻想。这里的另一个人没有任何用处，除了一项并非微不足道的用处：使主体能够维持某种位置，避免欲望的这种坍塌，避免神经症者的问题。

这就是第三种认同形式，它完全至关重要。我不知道，如果进入对那篇论文中病例报告的阅读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因为这种事总比预想中花费更长时间；

论文由布韦先生撰写[注2]，刊载于同样发表了我的《精神分析中的攻击性》报告的《法国精神分析杂志》。我请你们阅读它。我还会回来讨论，但今天先想借此阐明一个点：一种分析技术把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同性恋移情带回当下，我要指出它的错误所在。

> [注2]　莫里斯·布韦：《男性强迫性神经症四例治疗中同性恋移情方面的重要性》，《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8年第3期，7—9月；后收入莫里斯·布韦《著作集》，帕约出版社，1967年。

只要阳具客体在幻想中出现，尤其只要它在幻想中被当成分析家的阳具，发生的事情便位于一个已经设立、却始终可能受到刺激的增殖点。主体作为强迫症者，正是在这里借助幻想维持自己能够停留在欲望面前的可能性——这一位置对癔症者而言要棘手、危险得多。幻想中的阳具就在这里出现；在我所指的那种技术中，分析家会借助当下的解释把自己做成这个阳具，并坚持要求主体

以某种方式同意共融，吞下并在幻想中把这个部分客体纳入自身。

我说，这是一种层面上的错误：

- 它很可能把当时受到质疑的东西转移到了暗示性认同层面、要求层面；
- 可以说，它利用移情基础上向分析敞开的暗示位置所提供的抓手，助长主体的某种想象性认同；
- 它为这里受到质疑的东西给出一个错误、偏离、偏在一旁的答案；我不是说幻想中受到质疑的东西，而是主体实际带给分析家的材料中受到质疑的东西。

这一点可以在那些病例报告本身中读出；而人们却打算据此建立关于“部分客体”“同客体的距离”“客体的内摄”以及一切后续问题的整套学说和理论。为了只给下次将详细继续讨论的内容作个引入，我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在这份病例报告的每一时刻，人们都能清楚感到并觉察这样一个事实：问题——

也就是强迫症者分析的答案——在于让强迫症者发现阉割的真正所是，即发现阉割是他者的法则。遭到阉割的是他者；而主体由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中的错误牵涉，感到自己受到这种阉割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如此尖锐，以至于他一接近自己的欲望就会感受到其效应。我正在说的是：他者这个地平线，即大他者本身作为同小他者有别的地平线——由于问题正在这里——

在这份病例报告的每一时刻都可以亲手触到。

从他的病史开端就是如此：这个主体第一次接近一个小女孩时，焦虑得喘不过气来，转身逃走，跑去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从他说出下面这句话的一刻起，他便感到完全安心：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只须从字面上把握这份材料：这里唯一存在的是一种参照和维持；这种维持当然是虚拟的，是一个计划，是不顾一切地参照作为言语表述场所的他者，主体从此将在其中

投入自身的全部。对他接近自己欲望时所感到的惊恐而言，这是唯一可能的避难所；这一点已经被写在那里，问题只在于看清下面是什么。

在分析家作出种种促请之后，某些幻想终于显露，我们来到一个梦前。分析家解释这个梦时——他立刻就这样说——严格把它看作主体的被动同性恋倾向已经变得明显。梦是这样的：

> “我陪您回到您的私人住所。您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我躺到床上。我极为窘迫。房间一角有一只坐浴盆。我虽然不自在，却很开心。”[《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8年，第435页]

我们被告知，在分析此前的一个阶段已经作过准备以后，主体没有多大困难便承认这个梦的被动同性恋意义。在我们看来，这足以

阐明它吗？当然，只要重新审视这份病例报告，就能展示出全部迹象，证明这样做

并不够。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梦的文本本身向我们表明，主体来到另一个人的位置上——这样说正合适。他说："我在您的私人住所里——我躺在您的床上。"

为什么说这是被动同性恋？在得到进一步证据以前，其中没有显现任何能使另一个人在这里成为欲望客体的东西。相反，我十分清楚地看到，有某种东西在第三方的位置、房间一角得到指明；它得到充分表述，却似乎无人注意，然而它在那里绝非无缘无故：这就是坐浴盆。

它使阳具临现，同时又没有展示阳具，因为我并不预先认定梦中指明有人正在使用它。坐浴盆在那里，指出问题所涉之物，即问题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在场。那个著名的部分客体并非无缘无故来到这里；它就是阳具。但阳具在那里恰好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

- 另一个人拥有它，还是没有它？这是把它展示出来的机会。

- 另一个人是它，还是不是它？这是处在背后的问题。

简言之，这就是阉割的问题，正是这位受各种清洁强迫观念折磨的强迫症者所面对的问题；这些观念清楚表明，这种器具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成为何等危险的来源。我在这里提到这些清洁强迫观念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给你们读过有关"坐浴盆"的那一小段，它表明坐浴盆长期以来怎样使阳具、至少他自己的阳具为他临现。问题围绕阳具提出，并且围绕受到调动的阳具提出；它在他者层面被当作那项本质上属于象征性操作的客体。正是这项操作使阳具在他者中、他者层面以及能指层面，成为遭到能指行动打击之物、承受阉割之物的能指。

本质的阐明就在这里：目标不在于知道主体最终会不会通过同一个比自己更强者的同化，从而接受一种更高力量并感到自身得到巩固；而在于知道，他究竟会如何实际解决地平线上的问题。神经症结构所指示的那条线本身已经隐含这个问题，也就是主体是否接受阉割情结；只要这一接受得到实现，

阉割本身就会在其能指功能中得到实现。一种技术正是在这里同另一种技术区分开来；我会向你们说明为什么。

姑且撇开同结构、同强迫症者欲望之存在本身的意义相连的正当性不谈；即便不论这一点，所获得的治疗性解决——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结点、封口乃至伤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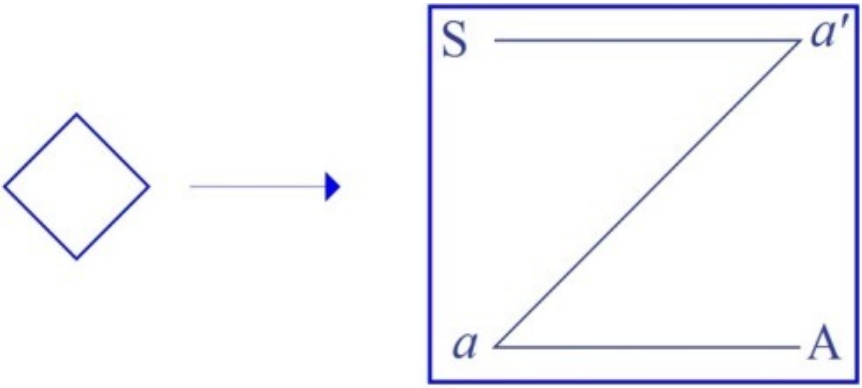
也使我们毫无疑问地看到：某种技术是不利的，既不符合所谓治愈，也不符合哪怕跛脚的矫形；只有另一种技术才能给出

不仅正确而且有效的解决。

# 第25课 · 1958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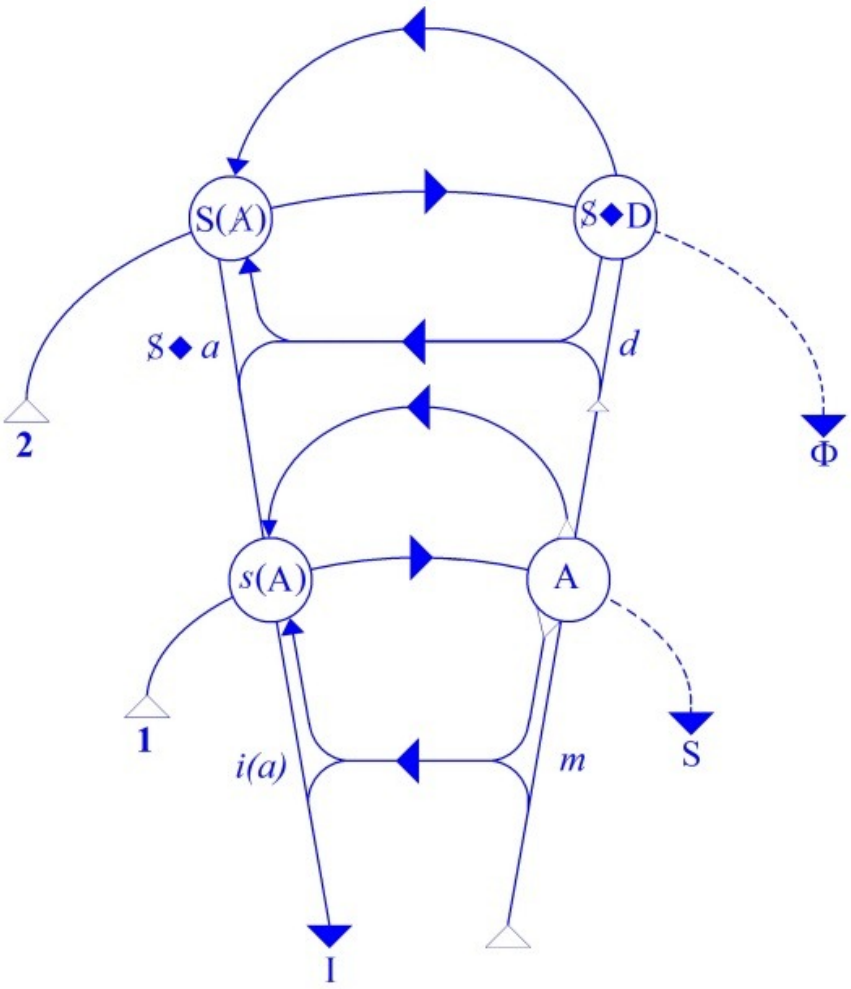
我们仍借助自己的小图式，重新拾起论题。你们有些人对那个菱形小符号提出疑问，比如我把$S$写在小$a$、小他者面前［$S \diamond a$］时对它的使用。这在我看来并不极其复杂。

不过，既然有人提出疑问，我就提醒一下：这里的菱形同一幅远为古老而根本的图式中的正方形是一回事；主体同他者的关系被铭写其中。他者既作为言说的客体，也作为来自他者的讯息。这是我们对来自他者之物所作的第一种近似描述；它会遇到$a' \rightarrow a$关系的屏障，也就是想象性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它表达的是被划杠的主体——或者视情况而定，未被划杠的主体——同某种东西的关系；也就是主体或者受到能指效应的标记，或者还只是作为一个未经规定、尚未被能指行动所产生的Spaltung分裂开的主体而得到考察。这一主体同某种由这个四方关系规定的东西发生关系。当我把它写成$S \diamond a$时，它并未进一步规定这个框

架中所涉四方形的哪一个顶点，例如小他者、即同类和想象的另一个人。如果我写主体$S$同要求的关系，即$S \diamond D$，也是同一回事。它并不预先判定要求本身介入这个小正方形的哪一角；要求就是需要以能指形式得到的表述。




• 因此，这里［2］有一条能指线；它作为能指线，无疑

得到了表述，因为它产生于一切能指表述的地平线上；它是一切要求表述的根本背景。

- 这里［1］则是通常意义上的已表述之物。不论表达得多么糟糕，我们都有一个精确的表述、一个能指和音素的序列。

在后面［2］，也就是在一切能指表述的彼方，这里所代表或对应的是能指线、能指表述作为整体所产生的效应；它仅仅由于自身在场，就使象征性之物显现在实在中。

正是能指线作为整体并在得到表述时，使要求的这个地平线或可能性显现出来；

要求的这种力量就在于，它按其本质和本性是对爱的要求、对在场的要求，当然带着全部暧昧性。我说“爱”，只是为了固定某种东西——恨在这里占据同一个位置——；爱与恨的矛盾情感只有在这一地平线中才能设想。也正是在这个地平线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术语来到同一点；相对于主体而言，它显然同爱与恨相同源，我在一篇文本及其他地方找到了它：无知。

因此，受到能指行动标记的$A$的能指就在这里，也就是被划杠的$A$［$\not{A}$］；这个精确的点同要求之线［1］上的那个点同源。在一切要求的根本图式中，要求经过他者以后在后一个点返回，形成所谓讯息［$s(A)$］。

如果你们愿意，以同源的方式说，第二条线［2］的讯息点上必须产生的，恰恰是这个关于一个能指的讯息［$S(\not{A})$］，它表示他者受到能指的标记［关于讯息的讯息］。

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讯息实际产生了；它只是作为“产生的可能性”处在一个同源点上。

另一方面，在同要求抵达他者之点同源的位置，也就是要求服从他者中的代码、服从他者场所和言说场所的位置上，这个地平线同样有“可能产生之物”，即所谓的这种参照、这种“意识到”；

但它并不只是“意识到”，而是作为言说者的主体对某种作为其要求本身的东西加以表述，并相对于它给自己定位［$S \diamond D$］。

这一点必须能够产生，是分析本身的根本预设，也是分析中首先发生的事情。它从根本上、在第一步并不是主体再次提出自己的要求。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再次提出，但它是经过表述的再次提出：主体正是在自己的话语中以某种方式使其要求显现出来，或者直接显现，或者作为话语的底纹显现。对我们而言，要求作为底纹出现，无疑总比主体以要求的形式与性质直接重提它重要得多。要求的形式和性质就是它借以表述的那些能指；正因为要求以古老能指得到表述，我们才会谈到例如肛门性退行和口腔性退行。

我提醒你们，上一次我所阐明、试图引入的是：一切严格具有移情性质的东西，都悬系于这条背景线［$\Phi \rightarrow \Delta$］的存在；这条线从我们可以用$\Phi$标记其起点的某一点出发，在$\Delta$处结束。

我们随后会根据这条$\Phi \rightarrow \Delta$线进一步说明后者的意义；这条线是它的起源和基础，是作为能指之效应在主体性经济中的基础。正因为某种东西相对于这条线［$\Phi \rightarrow \Delta$］得到定位，我们才能谈论移情。也就是说，一切属于移情秩序的东西，都会根据分析家的行动或不行动、介

入或不介入，始终倾向于在这个中间区域发挥作用，并总能以某种方式被带回要求的表述。

当然，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有某种东西在要求层面得到表述，这是正常的，是分析中言语表述的本性。但分析的法则恰恰是“主体的任何要求都不会得到满足”；理由无非是，我们指望分析中会产生某种东西，使这条要求之线［1］发挥作用，却不把它放在某项明确提出、得到或未得到满足的要求层面。人人都同意：我们不满足主体有时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极端而言，无论是亲吻我们的手，还是仅仅要求我们回答——并不只是在挫折主体。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更深的挫折，它属于言说的本性和本质，因为言说本身会使这个“要求的地平线”［2］涌现。

归根到底，问题始终处在这个“地平线”层面。我为了固定观念，把它简单地称作“对爱的要求”；但你们看到，它也可以是对另一种东西的要求，例如某种有关其存在得到承认的要求。这会引出一切冲突，因为分析家作为同类在场，便否定了主体的存在。黑格尔式的意识关系中的否定有时也在这里隐约显现为对知识的要求。这一切自然都处在分析关系的地平线上。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之所以牵涉症状、服务于神经症的解决，是因为正是在同这两条线的拓扑关系中——

只要它们由分析中言说的一切表述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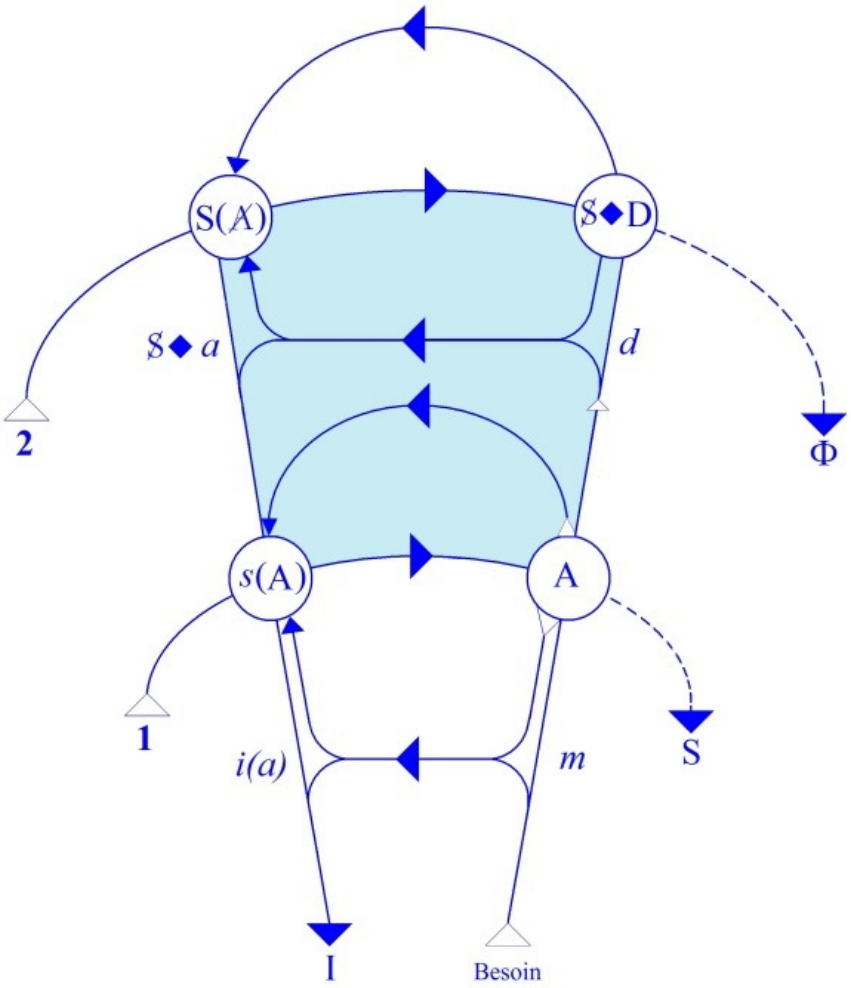
主体参照他者的另一个场所、即想象性参照场所的四个顶点便在其中得到定位；不过这里的这个顶点只是一个假顶点。这些顶点由自我同

他者意象［$i(a)$］之间的自恋或镜像关系实现；这种关系已经位于此岸、先于这一切，并完全牵涉要求的第一重关系。

而在彼方，恰恰是在经过表述的要求［1］与其本质地平线［2］之间的中间区域。这个地平线当然也经过表述，因为这里所涉的是一切表述的区域；它本身也作为这样的东西经过表述，因为它由已经表述出来的东西支撑，但这不等于它可以被表述。因为处在这里地平线上的、严格说来这个最终术语［$\Phi$］，没有任何东西足以用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表述它，除非言说的展开无限延续

下去。

所谓欲望就位于这个中间区域：我们所关心的欲望，即主体全部经济中真正受到质疑的欲望；它能够牵涉分析中显露之物，也就是言说中在下列两者间摆荡的游戏里开始运动的一切：一边是需要的、可以说“脚踏实地”的能指；另一边则是这一能指得到表述以后，由能指作为始终在主体无意识中在场之物而产生的一切，也就是能指已经揉制、塑造并结构化主体这一事实。




欲望位于这个中间区域——原因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即作为他者欲望的人的欲望。也就是说，它超出人必须向他者表明自己需要这一必然性中的需要表述过程。这种欲望以绝对条件的形式存在，是某种超

出需要之一切满足的东西；它产生于满足需要的要求［1］与对爱的要求［2］之间的边缘，并定位在那里。

欲望的问题性在于：

- 人的欲望总要在他者场所中寻找，而这使欲望成为一种在他者场所本身得到结构化的欲望；

- 他者场所又是言说的场所；这构成欲望、人的欲望的全部问题性，使它服从无意识的形成物和无意识的辩证法。也正因此，我们能够处理欲望，并能根据它是否在分析的言说中得到表述而影响它。若没有这一根本情境，分析就不会存在。

说到这里，我们还有它可以说的对应物和支撑［$\$ \diamond a$］，也就是欲望固定在其客体上的点。这个客体远非某种自然客体，而始终由主体相对于他者采取的某个位置构成。人正是借助这种在本质和本性上属于幻想的关系重新找到自己，并给自己的欲望定位。由此可见幻想为何重要，也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那里，

“本能”这个术语何其罕见。

那里谈的始终是驱力；换言之，这是赋予欲望的一个技术术语，因为言说把欲望孤立、切分，使它同自身目标——即所谓倾向的方向——及其客体形成一种成问题、脱节的关系。另一方面，你们知道，欲望从根本上由替代、移置乃至各种转化与等价形式构成，而这些形式本质上都受制于言说。

上一次，我们已经试图更紧密地围绕某种东西聚焦问题；它必定同这里所说的内容有关，因为归根到底，其中的一些要素透显于某些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强迫性神经症性质的研究——我已多次使你们能够亲自接触这些研究。可以肯定，其中涉及的“同客体的距离”“阳具客体”“客体关系”这些要素和术语，在这些研究彼此之间至少是后来的关系中，必然会促使我们看看，依据这里带来的东西，我们如何判断和评价它们。

因此，上一次我从《移情的同性恋方面的重要性……》一文中彼此相关地选取了两次治疗、两个强迫性神经症病例。我向你们指出，对幻想所作的这种或那种暗示——姑且说指导，甚至严格说是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怎样以某种方式呈现为问题。比如谈到一个梦时，我向你们指出，由于某些预设，人们怎样在体系中把它简化，最终略过一些突出的要素，并因而略过梦本身。

人们谈论同性恋移情之梦，仿佛这种说法在那里甚至可能有意义；而梦本身却给出了问题所涉之物的意象，即一种远非二元的关系。因为我曾向你们展示，一件客体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在那里出现；它就是梦中谈到的那只著名坐浴盆。主体在梦中被转移到分析家的床上；主体在那里，

既感到自在——按照梦的显在内容，这种姿态确实可以称为等待——同时，这张床又以完全经过表述而且本质性的方式在场。

分析家没有停下来考察这一点，更令人惊讶，因为同一位分析家的另一篇文本表明，

他绝非不知道某些分析家所谓“空心的阴茎”或“杯子”所具有的严格阳具意义；主体女性在承担阳具意象时，阳具这一能指可以采取的形式之一恰恰就是它。

总而言之，梦中呈现给我们的这种圣杯，至少足以引起注意，甚至足以使那位用二人关系解释此梦的人多一分谨慎。我还要进一步说，我又一次重读了这份“第二号病例报告”，也读了它前面的那一份。在我看来，这实在不是最值得接受批判的一份，

因为批判在这一层面实在太显而易见。我只请你们重读这份病例报告。

不过，让我们随意选取其中这句话：

> “因此，我们是在分析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时提到这一点的；此前已有过同类干预，但人们又回到这里，因为主体已经真正受到吸引，要深入移情这一事实［……］移情情境变得越来越明确［……］必须反复坚持，才能克服某些沉默［……］因此，移情变得公然带有同性恋性质［第424页］［……］于是我们提到，既然男人之间确实存在被称作友谊、而任何人都不会为之感到受辱的亲密关系，那么当其中一个人必须从另一个人那里接受［……］指示［……］时，这些关系总会对其中一方带上某种被动性质。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想到使用一个这位退役军官能够‘一望即明’的类比。为什么战斗中的士兵会为一个他们所爱的首领牺牲，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毫无抵抗地接受［……］他的指示和命令？*

> 于是，他们同首领的感受和思想如此一致，以至于认同于他，并且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如首领若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8年，第424—425页]

你们看到，这类干预恐怕需要突破一大片相当严密的沉默。

>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行动，只因为他们以被动方式爱着自己的首领。这番说明没有立刻使J.完全摆脱拘谨，但使他能够继续保持客观；而当时，他将同我们一起重新经历其他一些更明确的同性恋情境！”[《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8年，第425—426页]

事实上，这样的情境确实接踵而来。说实话，这里十分清楚：人们在被称为受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的“二人关系”中，为一整套想象性制作确定方向、使它更加容易，并打开坡道；

而病例报告本身证明，这种做法不只是系统性的，更是执意坚持的。它在两个项、两个层面上，从材料中挑选一切有利于简化的东西，来制作这项被分析家赋予意义的二人关系。

这里甚至还没有涉及我随后会着重强调的因素，即引入一个能指会给解释打上怎样的标记。正因为解释本质上、也必须本质上围绕对能指的处理展开，解释才必须是一种简短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

所涉段落显然包含一项干预；它显示出一种意指性、理解性和说服性的性质，意在诱导主体恰恰去经历这种关系。这项关系作为这样的关系得到表述，并在作者著作的这个层面被看作二人关系；作者还在别

处确切地把分析情境是一种如此简单的关系这一观念表述为二人关系。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亲手触到，甚至无须是分析家也看得出来：它在本性上近似暗示。无论如何，仅仅因为这种解释选择某一意义，并在这份约六页的病例报告中三次返回这一意义，它便向我们展示了受分析者同分析家之关系的几个本质阶段。它以帮助理解二人情境的形式出现，而且采用同性恋关系的术语；弗洛伊德学说经典地把这种关系呈现为一种力比多底层，认为它处在一切从社会角度考察的关系之下。

也就是说，这种形式极其暧昧，无法把严格所谓的“同性恋驱力”——通过选择一个同性而非规范所希望的异性色情客体而同其他驱力区分开来的同性恋驱力——同“同性恋”一词在上述力比多底层意义上的使用区分开来。后者属于另一种性质。这无疑会提出各种问题；但是在

治疗内部以教化方式使用这些观念，我并不是说其本身不正当；我说的是，它的系统性无疑提出了治疗全部定向和全部方向的问题。

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效应；但你们难道没有同时看到，

这里已经对强迫性神经症选定了一种干预模式吗？你们从其他方面对强迫性神经症的一切了解都提醒我们：主体同自身、同自己“在世存在”的这种被称为强迫性神经症的关系，无论如何都远比主体在任何得到表述的层面上同自己性别建立的力比多依恋关系复杂得多。

从弗洛伊德最初的病例报告起，人人都知道：指向同类、并因而转而指向主体自身的毁灭驱力起着怎样的作用。人人也都知道：

- 其中还涉及其他要素，即力比多发展中的退行与固着；它们远非如此简单，我甚至要说，它们令人棘手；

- “施虐的”与“肛门的”那项著名联结，并非某种本身可以被视为简单、甚至在任何时刻得到过简单阐明的东西。

简言之，一切都显示：如果这种治疗定向或方向能够产生效应，那么所涉之物恰恰会在远为广阔的视角中得到表述。我不是说这已经完全足够，但它至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安排事情确实可以在其中取得秩序的不同层面和界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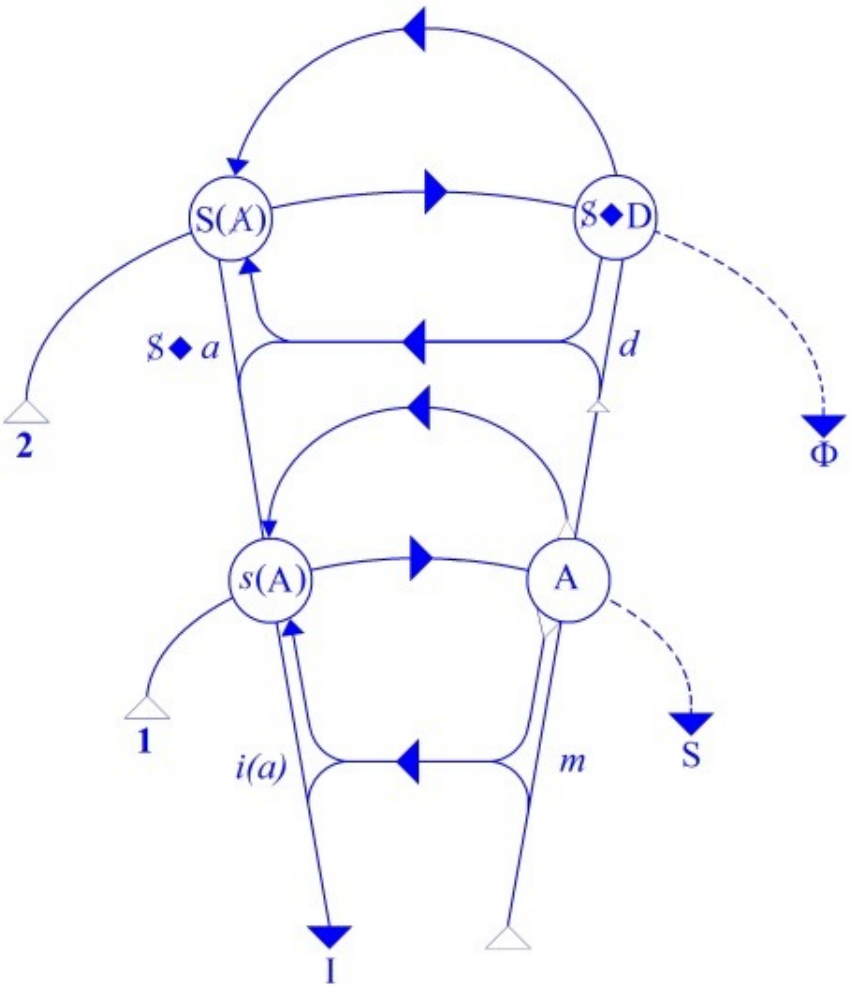
在这幅平面上，我们可以看见并定位某种归根到底只是强迫症者经济中的细节，即对另一个人的认同在这项经济的某一点上所起的作用。这个另一个人是一个小$a$、一个想象的另一个人；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之一，他勉强让自己的强迫性经济维持大致平衡。

顺着这个方向推进，给主体以某种满足，也就是认可这种关系：在强迫症者的历史中，经常而持续出现另一个人；主体把他当作参照，请求他的认可和批评，并认同于这个人——那位作者也这样阐明——把他当成一个比自己更强、自己真正倚靠的人，一种梦想；这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可以说，对这一机制予以确认——在这里它严格说来无疑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主体用来平衡自己同另一个人欲望之关系的问题性的方式——可以产生某种治疗效应，却远不能凭自身做到更多。况且，那位作者后来工作的展开，岂不表明事情被越来越推向他所谓“同客体的距离”？它具体体现于某种尤其围绕口交幻想而产生的东西：口

含一个阳具，而且不是随便哪个阳具，而恰恰是想象中的分析家身体的一部分——分析家的阳具。这最终制作出一种幻想；主体从同类和同性的另一个人那里取得的这种想象性支撑，在这项作为想象性经验呈现的经验中获得了具体形态和物质形式，并被比作天主教的圣餐，即吞下圣体。

我们在这里看到，某种东西仍沿着同一条线、沿着某条幻想制作之线产生，而这一次走得更远；

我们现在当然能够看见它，也能够在图式上把它具体化：这里所涉的是原初幻想产物层面所发生之事的生产。




我会向你们表明，事情恰恰从主体自身、从下列东西的转移出发：也就是$S \diamond a$关系处在幻想层面时，主体借助幻想产物给自己定位、设法应付自身欲望；随后，它转移到严格所谓的讯息层面，即对要求之回答的讯息层面，转移到讯息位于这里的位置。病例报告以某种方式阐

明这一点绝非偶然——你们会看到——以至于我们在这一时刻看到好母亲、仁慈母亲的意象出现，并听到人们谈论儿童期女性超我的软化；这一切发生在所指和大写他者的意指层面。

认可主体的这一幻想产物，确实只能从字面上表达为：把主体的各种形成物——也就是欲望——的复杂性进行化约，

把它化约为主体同分析家的直接关系中经过表述的要求关系。但是你们会说：如果这样做成功了呢？的确，为什么不可以？这不正是人们可能形成的某种分析观念吗？

我的回答是：

- 它不仅不够；而且这些病例报告以最易察觉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材料，我们还有其他文献可以通过经验看清它的结果。这种做法无疑并非不产生某些效应。

- 但另一方面，发生的事情远不能代表我们可能期待的治愈，也不能代表所谓已经实现的生殖器成熟。归根到底，人们在这里明确说，生殖器成熟由主体任由分析家爱自己这一事实来代表；既然如此，怎么会看不出谈论生殖器成熟所包含的悖论？

这里确实有某种异乎寻常之处：生殖器成熟远没有像一个过程那样得到实现；相反，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主体性的症状减少是通过一个在本性上具有某种退行性的过程发生的。这里的退行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退行，也是地形学意义上的退行，因为一切属于欲望的生产、组织与维持秩序的东西，都被化约到了要求层面。

事实上，在这些阶段发生的事情远不能像有时那样被解释为改善，解释为主体同另一个人的关系得到正常化；它们反而呈现为突然的爆发：

- 或者是行动呈现。去年我曾围绕一份病例报告向你们展示过一次：它涉及一个具有强烈倒错倾向的主体，最终以一次真正的行动呈现收场。主体透过女洗手间的门，观察正在小便的女人；也就是说，他真正去重新找到恰恰作为阳具的女人。某种东西在要求的影响下遭到排除，随后以突然爆发的方式重新进入；在这个同主体一生完全孤立的行为中，它具有行动呈现的一切强迫形式，并使一个能指本身临现。

- 或者——还有许多证据以其他形式向我们显示，例如一次突然的迷恋。它在一些主体那里具有悖论性面貌，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主体本身看作偏离常规的同性恋者：他们有多少同性恋的东西，就只有能够看到的那一些，丝毫不多。他们突然迷恋上一个同类；

这是一种成问题的迷恋，我甚至要说，是这类干预真正制造出来的人工作品。它确实采取同性恋迷恋的面貌，归根到底却只是$\mathcal{S}$相对于$a$的这项关系［$\mathcal{S} \diamond a$］受到强制后的产物；在这种分析定向和指导方式中，正是通过把一切化约为要求，这项关系才真正遭到强制。

因此我要说，面对这种当时确实缺乏一切批判和细腻度的实践，有某种东西使评论者感到泄气。

正因如此，我想选取更早的另一篇文章。正如我曾告诉过你们，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始终显得有趣得多，也更能够表明：如果换一个方向，他对这些主体的研究原本可能怎样展开。它讨论的是

《在女性强迫性神经症中意识到阴茎嫉羡的治疗影响》——这就是标题本身[注1]。

> [注1] 莫里斯·布韦：《在女性强迫性神经症中意识到阴茎嫉羡的治疗影响》，《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0年第2期，4—6月，第215—243页；或见《著作集》第1卷，第49—73页，巴黎：帕约出版社，1967年。

这份病例报告很有意义，因为女性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并不很多；对于那些可能草草勾勒神经症之性别特殊性问题的人，它也很有意义——他们认为，主体出于同其性别有关的理由，才会选择神经症的这一或那一坡道。

然而，从女性强迫性神经症这个例子中，我们会看到：神经症结构秩序中的一切东西，给自然性别、生物性别的位置可能具有的决定作用留下了多么狭小的余地。事实上，我们在男性强迫性神经症病例中看到的阳具客体本身那项著名优势，在这里以极有意义的方式重新出现。

下面是作者在这里如何设想、发现并展开分析的进展。他本人这样阐明：

> “……同男性强迫症者一样，女人需要以退行方式认同于男人，才能摆脱幼年时期的焦虑；但是，前者会依靠这种认同，把儿童期的爱之客体转变为生殖器期的爱之客体……”

这严格对应我刚才向你们指出的悖论：男性主体在这里对分析家的认同，仿佛仅凭自身便构成从儿童期爱之客体通向生殖器期爱之客体的过渡。

这里肯定有某种至少会提出问题的东西：

> “……而她，这个女人，首先立足于同一种认同，倾向于放弃这一最初客体，转向一种异性恋固着；仿佛她能够进行一次新的女性认同，这一次认同于分析家本人。”[《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0年，第215—216页]

因此，原文带着无疑醒目而又必要的暧昧性说，这里得到阐明并明确指出的是对分析家的认同。文中提到分析家是男性，并假定在第一个病例中，这种认同会自动而理所当然地完成，从而确保主体通向生殖器性。

由此，在这一预设和假设之下，如果我们在女性病例中取得了文中所说的结果——不过作者相当谨慎，因为病例报告并没有声称取得非凡改善——，

那么随着这种对分析家的认同逐渐发生，人们便会带着某种困窘乃至惊讶地发现，这一认同会依次以两种方式进行：

- 第一种方式起初带有冲突性质，即对男人提出权利要求，甚至敌视男人；
- 随后，当这种关系据说逐渐软化时，便出现一种奇特的问题性。人们始终由于必须以某种方式设想女性认同的这一进展，才承认它是可能的；而据说，这是由于分析家本人所具有的根本暧昧性。

当然，这项解释并不能使我们满意。

> “一次新的认同，这一次是女性认同，这一次认同于分析家本人。不言而喻，对移情现象的解释在这里格外棘手。如果男性分析家的人格起初被把握为一个男人的人格，并伴有这所包含的一切禁令、恐惧与攻击性，那么在阳具占有的欲望——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和评价的东西——以及相应地阉割分析家的欲望被揭露，并且由此取得上述松弛效应之后，男性分析家的人格便被同化于仁慈母亲的人格。”[《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0年，第215—216页]

他还补充说：

> “这种同化难道没有表明，反男性攻击性的本质来源，在于最初以母亲为客体的毁灭驱力吗？”

在这里，克莱因式的地平线总能提供某种支撑。

> “对前一种欲望的意识带来后一种驱力自由行使的权利；于是，这种对阳具占有欲望的意识何以具有解放力量便变得‘一望即明’，两种认同何以能够相互过渡也同样如此：这是由于分析家本人具有根本暧昧性，而起初病人只能知觉到其男性面貌。”[《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0年，第215—216页]

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刚才那句话。事实上，一切都在这里。你们会看到，这首先以对问题所涉之物的解释为基础，即把它解释为阳具占有的要求或欲望，以及相应地阉割分析家的欲望。仔细观察事情便会发现，这远不能代表病例报告中实际呈现的东西。我将按照报告呈现给我们的顺序来考察：这是一名五十岁的女性，身体健康，有两个孩子，从事一种辅助医疗职业。

她因为一系列极为常见的强迫现象前来治疗：

- 强迫性地认为自己感染了梅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她从中看到不知怎样一种施加于子女婚姻的禁令；不过，对长子的婚姻，她未能加以阻止；

- 强迫性地想到杀婴、投毒；总之，是一整套可以说极其常见的强迫观念，尤其属于女性强迫观念表现的典型。

作者甚至在列出这些症状以前，就首先谈到宗教主题的强迫观念。和一切宗教主题的强迫观念一样，其中当然有各种辱骂性和排泄物性质的句子强加给主体，并同她的信仰构成形式上的矛盾。

我们先来看看主体同宗教现实之关系中出现的一个要素；作者本人立刻强调这一点。她是天主教徒，因此对她而言，这一现实尤其体现为基督的身体在圣体中的临在。此外，她还会在想象中——文中明确说，这并非幻觉现象——看到男性生殖器官处在圣体的位置并取代圣体。

再往下几行，作者指出这位强迫症者主要宗教主题的一个重要细节：她的天主教教育完全由母亲负责；据说，她同母亲的冲突能够转移到精神层面，而这一层面始终只具有义务和强制的性质。我们不讨论这一点；这是一个意义十足的事实。

在我们停下来考察此后给出的解释方式以前，我想先让你们自己在这个症状前停留片刻。这个症状本身非常足以促使我们作出一些说明。

文中说，生殖器官出现在圣体面前并取代了圣体。对我们——我的意思是，对我们分析家——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分析家，就必须赋予这一位置和叠加以价值：所谓“压抑”、尤其所谓“被压抑者的回返”，难道不就是某种仿佛从底下渗色、来到表面——正如书写所表现的那样——的东西吗？或者像一块随着时间升上、重新浮到表面的污迹？

如果我们肯按照分析家的立场，赋予事物的文本性质以重要性，那么在这个病例中就必须尝试阐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对这个受过宗教教育的女人而言，基督至少应当具有宗教意义。

同一切身处基督教的人一样——这并非无关紧要——对她而言，基督就是圣言、就是λόγος［logos］。天主教教育不断向我们重复这一点；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圣言，对此没有丝毫疑问，这正是所谓信经最简短的形式。归根到底，如果我们参照这个λόγος［logos］，参照它的所是；既然有人告诉我们它是圣言，它就是圣言。

这意味着圣言的全部吗？透过基督，有某种东西显现出来，取代他、占据他的位置。我们全部探索都汇聚于对分析经验的表述，并由此把这种东西称作独一的特权能指：它由这样一个事实界定，即它指称能指本身在所指上产生的效应、标记和印痕。

因此，这个症状中发生的，是一种替代。原有关系被呈现为主体同圣言、同本质上的圣言、完整的圣言乃至道成肉身的圣言之关系；现在，圣言的整体被一个特权能指所取代。严格说来，这个能指用来指称整个能指集合落在这个人类主体身上所造成的效应、标记、印痕和创伤；由于能指的审级，在他那里才有一些东西前来产生意指。

我们继续阅读病例报告。接下来会发现什么？主体后来会说，她梦见自己用脚踢碎基督的头；而且她补充说，这颗头很像您的头——她是在对分析家说话。接着又联想到：

> “我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经过一家殡葬用品店，那里陈列着四尊‘基督像’。看着它们时，我感到自己正踩在它们的阴茎上。我体会到一种尖锐的快感，同时又感到焦虑。”

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什么？我们显然发现，某种作为他者的东西得到认同；它无疑是大他者，在这里是作为言说场所的他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主体用脚后跟踩碎基督的形象。不要忘记，这里的基督由一件客体、即一尊十字架苦像具体化。而这件客体本身可以说在其整体上就是阳具，这又是一件不能不令我们惊讶的事。

如果继续追随病例报告给出的细节，这一点尤其醒目：受分析者同分析家的关系中将会介入某种极为特殊的东西。

她责怪分析家的治疗给自己的生活造成麻烦，而这项责怪具体化为：她无法给自己买鞋。

分析家当然不至于无知到认不出鞋的阳具价值。换言之，鞋——尤其是鞋的后跟，这一次它被大量用来踩碎基督的头——在这里意义十足。我们对此要注意：

- 这发生在一次分析内部；
- 实际上，人们从未观察到女人的恋物癖，尤其是鞋子恋物癖；
- 相反，在病例报告如同分析中那样展开的过程中，某种同鞋有关、带有阳具意义的东西出现，便在这里取得了全部价值。

让我们尝试理解它。为此无须走得很远。此时，分析家竭力向主体暗示，这里所涉的是占有阳具的需要和欲望；说实话，单看这句话本身，也许还不是他可能说出的最糟糕的话。问题是，对他而言，这代表主体成为男人的欲望——他也明确这样说——而主体直到最后都不断反对，并以最大力量抗议：她从来没有过成为男人的欲望。

事实上，欲望占有阳具与欲望成为男人也许不是一回事，因为分析理论本身就假设，事情能够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得到解决。谁会想不到这一点？

但我们看看受分析者这时怎样回答。她说：我穿着漂亮时，男人会欲望我，我便怀着真正的喜悦对自己说：“又有几个要白费力气了。”想到他们可能因此受苦，我就高兴。简言之，她把分析家带回坚实的经济地面：如果她同男人的关系中确实存在同阳具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自己尝试阐明它。下面大致就是我建议你们采用的表述。这里有几个要素：

- 当然，有同母亲的关系！文中告诉我们，这项关系极其根本，是现实主体同这位母亲之间真正具有一致性的关系；而病例报告又向我们展示了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多么成问题。我们随后会回到母亲同父亲的这些关系，以及病人同父亲的关系。

- 无论如何，这位母亲以多种方式显现过自己，尤其是这一点：父亲没能战胜妻子对初恋的依恋，尽管那只是一段柏拉图式恋情。这种事情既然被写进病例报告，就必定占据过某个位置。

另一方面，病例报告这样呈现主体同母亲的关系：

- 她从各方面都对母亲评价更高，认为母亲比父亲更聪明，等等；

- 她被母亲的精力迷住，等等。母亲偶尔放松的那些时刻，使她充满难以言说的喜悦。她始终认为，母亲偏爱自己的妹妹。

况且，任何插入她同母亲之结合的人，都会成为她死亡愿望的对象；

有关希望妹妹死亡的大量梦材料和童年材料，都将证明这一点。

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主体同母亲的关系中，这里首先并且首要涉及的，恰恰就是我向你们强调的主体同母亲欲望的关系吗？

欲望问题很早便以格外明显的方式进入主体的生活，尤其是在这位强迫症女人的历史中。

这一欲望最终使主体看到自己面前浮现出一个目的：不是拥有这个或那个，而是首先成为母亲欲望的客体。这就包含着毁灭母亲欲望的客体——尽管这一客体是什么仍不为人知。正是这一点，使此后一切将主体对自身欲望的接近同毁灭效应联结起来；同时也可以说，使主体对这一欲望本身的接近从属于并由某个能指界定。这个能指本身恰恰就是欲望效应在主体生活中的能指，也就是阳具。

我再阐明一次：对这个主体而言，问题并不是母亲是否拥有阳具——例如恐惧症者那里会这样提出——而是欲望这种东西在他者中产生的效应是什么。换言之，来到主体前景的问题是：如果他是或不是他者这一欲望所欲望的东西，他自己将会是什么。我们看到来到前景的东西，恰好在道成肉身的λόγος［logos］这里显得如此美妙：也就是他者，恰恰作为受到圣言标记的他者。此时此地发生的，就是阳具能指本身的替代。

换言之，我还要把自己的想法推得更远：弗洛伊德看到了并标出了分析的边界；可以说，它停在某一点。在某些病例中，他说这一点显示为不可还原，并在主体那里留下一种创伤；对男人来说，这就是阉割情结，它始终保持占优势的表现。归根到底，这一表现可以概括为：只有在他没有阳具这一背景上，他才能拥有阳具。

这同女人那里呈现的东西完全相同，即：只有在她是阳具这一背景上，她才没有阳具！

否则，这种不可还原的Penisneid怎么会使她勃然大怒？

不要忘记，德语中的Neid并不简单意为某种愿望；Neid的意思是，这件事使我

真正勃然大怒。攻击和愤怒的一切底层，都包含在这种原初Neid中；现代德语如此，更古老的德语形式乃至盎格鲁—撒克逊语更是如此。

弗洛伊德以某种方式在这里标出了他某次所谓分析中可能发生之事无限的、投射到无限中的性质——

而人们误把它译作“无终止的”——，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由于有些事情他没有机会完成，尽管许多内容已经指向它，尤其是那篇有关自我之Spaltung的最后论文，我还会回来讨论它……

无论在男人还是女人那里，阉割问题的答案都不围绕“拥有或不拥有”这一两难。只有当主体觉察到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并确立一件事——即他并不拥有阳具——以后；只有从分析中实现主体没有阳具这一点起，他才能使这一可以说“自然的”位置正常化：要么他是阳具，要么他没有阳具。

因此，这确实是最终的能指关系；阳具意象在能指层面取得的功能会产生想象性死路，而这项死路可以围绕这一关系得到解决。我们的主体那里发生的正是如此：她开始被卷入移情机制以后，

也就是当症状效应得到更精细的表述时，便以我今天刚才引述的、完全可辨认的方式发生某种事情：只要幻想在分析中得到临现，它就同拥有或不拥有鞋子相连；这些鞋是女鞋、阳具性的鞋，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作“恋物性的”鞋。

对于一个男性主体而言，只要他在自己的倒错中所拒绝的是

女人遭到阉割，这件东西会取得怎样的功能？对男性主体而言，恋物倒错的含义就是断言：

女人在没有阳具这一背景上拥有阳具。否则，便无须用一件客体来代表它；何况这件客体显然还独立于女人的身体。

如果女人在移情制作过程中开始筹划表面上相同的事情，即她拥有阳具——因为她所强调的，就是她能以服装形式拥有它；这些服装会激起男人的欲望，她则能借此使他们的欲望失望——，那么这正是她自己的表述。表面上，她无疑确立了同一件事。但当它由主体本人、即女人而非她对面的男人确立时，事情就完全不同。

对她而言，她在这里展示的是：当她想把自己呈现为拥有那件自己非常清楚并不拥有的东西时，这件事对她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也就是我所谓的化装价值，她借此恰好把自己的女性气质做成面具。这里所涉的是，她把这个对她而言作为欲望能指的阳具呈现出外观，让她显得就是阳具。

问题在于，她要成为某种欲望的客体，而且她自己非常清楚，这种欲望只会被她使之失望。当分析家把问题解释为占有阳具的欲望时，她正式表达了这一点。这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下面两者之间产生了根本分歧：成为那个作为他者欲望之客体的东西，与拥有或不拥有承载其标记的器官。由此，我们得到下面这个公式：原初欲望是——

“我想成为她——母亲——所欲望的东西。为此，我必须毁灭眼下作为她欲望客体的东西。”

主体想要成为这一欲望的客体。治疗必须引导她看到：男人本身并不是这个欲望的客体；必须向她表明，男人同女人一样都不是阳具。她对作为男人的丈夫具有攻击性——下一次我会更清楚地向你们展示——正因为她认为丈夫是阳具；我不是说她认为他拥有阳具，而是认为他是阳具。正因此，丈夫才是她的对手；也正因此，她同丈夫的关系才带着强迫性毁灭的标记。

如果这一毁灭欲望按照强迫性经济的本质形式转而指向她自己，那么治疗的目标确实在于使她注意到：

“只要你也想成为阳具，你自己就是那个你想毁灭的东西。”

而按照这种方式继续治疗时，人们做了什么？请注意区别：“你就是那个你想毁灭的东西”，被替换成了“你想毁灭这个东西”，也就是分析家的阳具；它在这里被纳入一些

完全不大可能而又一闪即逝的幻想。病例报告的细节会向你们展示，对分析家阳具的这项毁灭。

分析家说：“你想毁灭这个东西——而我把它给你。”

换言之，整项治疗被设想成这样一个事实：分析家在幻想中给予，

可以说，同意一种阳具占有欲望。

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之一是：分析似乎进行到近乎结束之处时，文中告诉我们，病人仍保有自己的全部强迫观念——虽说现在只剩下一项；它们当然作为整体全都得到了分析的认可，但它们仍然存在这一事实毕竟有其重要性。此时病人做了什么？

病例报告完全带着无知写下：她竭尽全力干预自己的长子。她一直非常害怕这个儿子，因为说实话，这是唯一一个她从来无法妥善控制其男性反应的孩子。她对他说，眼下最紧迫的事就是他也去接受分析。

也就是说，分析家相信阳具是情境的答案；正如他亲口所说，他采取仁慈母亲的位置，把阳具给了病人，病人却又把它还给他。也就是在她确实拥有阳具的唯一一点，她把阳具返还给分析家。有借便有还。

分析家把全部分析定向于这样一个结论：受分析者想成为男人。直到最后，受分析者仍然没有真正、也没有完全信服。然而，其中所牵涉的某种东西，

即拥有或不拥有这个阳具的问题，无疑在这里得到了平息；但根底、本质、阳具作为欲望能指的意义，仍未解决。

# 第26课 · 1958年6月18日

6月18日也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成立的周年纪念日。

我们也曾在某个时刻说过“不”。

上一次，我开始评论一位正由我们的某位同事治疗的强迫症女性的病例，

并开始引出若干原则。我们试图阐明：当一项治疗围绕分析所带来内容中显然存在的某种东西——即意识到阴茎嫉羡——展开时，应当根据什么判断其治疗方向是否良好、治疗实施是否正确；这些原则可以从我们的阐明方式中推导出来。

我想，从总体上说，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种用法的意义。当然，总会有一些理解上的小小滞后；你们曾停留在某些图式上，以为某些对立很容易记住，后来我们的进展却又稍微撼动或重新质疑它们，使你们失去方向。

例如，只须问一问：我上次提出的内容同人们以为可以停留的某项原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我说过，归根到底，对女人而言，

她的性发展必然经过某种可以称作下列公式的东西：

“她必须在她并非阳具这一背景上成为阳具。”

对男人来说，阉割情结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表述：

“他在自己并不拥有阳具（或者受到不再拥有它的威胁）这一背景上拥有阳具。”

显然，从某个角度来看，当人们谈论并对置某个阶段的性发展时，这些图式能够相当清楚地呈现某种对立。但停留于此完全不够，因为成为与拥有的辩证法对两性都有效。男人也必须觉察到自己并不是阳具。事实上，我们正可以沿着这一方向，看到阉割情结与阴茎嫉羡的解决所牵涉的部分问题位于何处。

我们会更详细地考察它；我希望，你们将逐渐把那些本身并非错误、却只属于局部视角的东西放回原位。为此，今天重新从我们的图式出发。恰当地阐明分析所处的不同路线极其重要。

有一篇文章，我建议你们阅读，就是格洛弗的《不确切解释的治疗效应》[注1]。这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中最出色、最聪明的一篇。它真正厘清了处理解释问题时的出发基础。

> [注1] 爱德华·格洛弗：《不确切解释的治疗效应：对暗示理论的一项贡献》，《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1年，第12卷。本文全文附于本课末尾。

归根到底，这篇文章的底蕴和它提出的问题，大致可以这样定位：格洛弗写作时，弗洛伊德尚在人世，但分析技术已经围绕阻抗分析和攻击性发生重大转折。

格洛弗阐明，随着分析经验以及分析中既有观念的发展，这种阻抗和移情分析意味着遍历、覆盖——如同分析进展必须覆盖一片地形那样——我们在分析中学会辨认的全部幻想系统；我们姑且把“fantasy systems”译作“幻想系统”。

很显然，当时人们已经比分析开端时学到和知道得更多；于是问题便是：在我们尚不了解这些“幻想系统”的全部广度和范围时，我们的治疗究竟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当时所作的是不完整的治疗，效力低于

现在所作的治疗？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围绕它，格洛弗可以说被引向对所有已经阐明的立场作一次总体定位；

这些立场是任何面对某种障碍而处在受咨询位置的人所采取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把“解释”的观念加以推广和扩展，使之包括受咨询者采取的一切经过阐明的立场，并排列出医生相对于病人的不同位置。

这里预示了今天所谓的医患关系，但其阐明方式本来开启了一条一般道路；很遗憾，它没有沿这个方向得到展开。

恰恰因为我们不认识症状中包含的真理，结果才会同这一症状行为合作。格洛弗从全科医生说起：医生对病人说“振作起来，到乡下去，换一种活动！”——总之，他占据了一个不认识的位置。

他立刻占据某个位置，而这并非毫无效力，因为这个位置恰好能够定位在某些症状形成的地方。他立刻相对于病人承担某种功能，而且可以用分析地形学本身的术语来定位。我不再详述。

格洛弗在某处指出，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分析治疗整体倾向于解释所谓“施虐系统”以及罪疚反应。他指出，直到不久以前，这一切都没有

得到突出。人们无疑减轻了病人的焦虑，却让那套著名的“施虐系统”未获解决、未受遏制，并同时继续受到压抑。

这只是他开始提出、而非最终得出说明的一条方向；如今重新拾起它恰恰会很有意义。我要就此提出一个说明：问题在于定位对攻击性的分析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段时间里，分析家深受自己这项发现震撼，以至于它变成一种陈词滥调。我们的攻击性得到如此充分的分析，连受训分析家相遇时都用这套术语

彼此交谈。问题在于知道这项发现究竟代表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根本图式上把它定位于某处。刚才我已经尝试这样做，因为我们毕竟也可以对此提出疑问。

我曾多次指出，这里始终留有一种暧昧性。当年我教导你们、几乎对你们喊叫，强调自恋系统本身是攻击反应形成的根本，并告诉你们：在同小他者的想象性关系中被激发的攻击性，不能同作为生命功能的全部攻击力量混为一谈，它只是一种想象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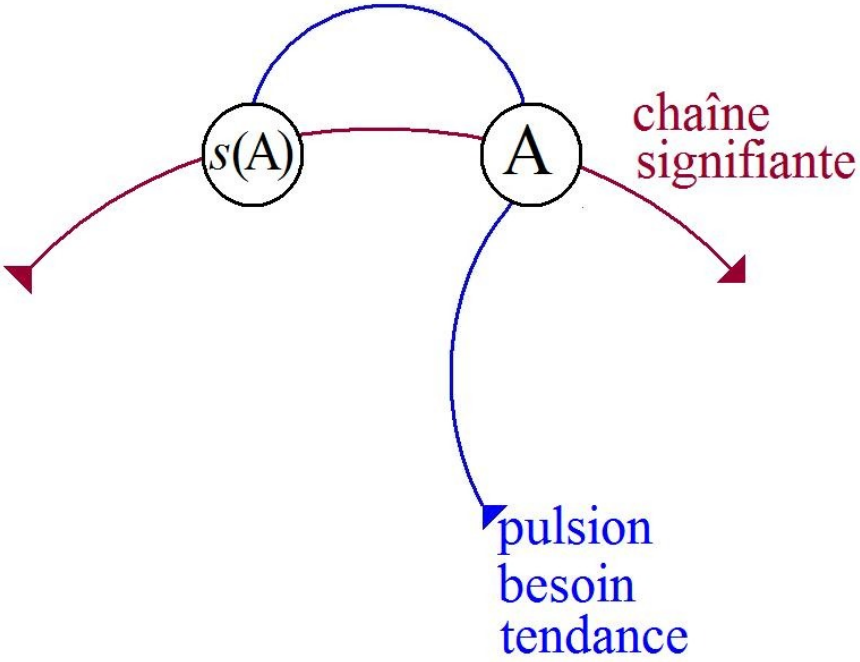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要回顾这些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必须承认：至少当我们处在人类层面时，暴力的确是攻击中的本质。它不是言说，甚至恰好同言说相反。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生的是暴力或者言说。

如果暴力在本质上同言说有别，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暴力本身——我说“暴力”，是为了把它同我们对

“攻击性”的使用区分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压抑？因为，如果我们遵循这里确立的原则，即只有显示为沿言说结构、也就是沿能指表述得到标记的东西，才能受到压抑，问题便会产生。

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事实上，正是通过想象性，通过那种潜伏于想象性关系本身的对同类的谋杀，属于攻击性秩序的东西才会得到象征化；它由此被纳入从根本上属于无意识、可分析乃至一般而言可解释之物的机制。让我们真正重新把握事情。如果我们跟随并重新从最简单的形式逐字梳理这幅小图式，也就是下列两者的交叉：

- 倾向——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驱力——只要它代表一种个体化的需要；
- 以及它必须前来在其中得到表述的能指链。




单凭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它已经给我们提供若干要素，并容许我们作出一些说明。让我们作个假设：假定对人类而言只有实在性，也就是我们漫无边际使用的那种著名实在性。假定只有它。某种能指之物对这一实在性加以表述，并非不可设想。

为了固定观念，假定——正如某些学派有时想说的——能指只是一种条件作用；我不是说反射本身，而是某种可以还原为反射的东西。仿佛语言并不属于另一种秩序，只是我们在实验室里人为创造的那种东西：教动物一听见铃声就分泌胃液。铃声就是一个能指。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人类世界：它完全围绕每一种需要同

若干预先规定的符号的聚合而组织起来，使每项需要都能让人听见。如果这些符号对所有人都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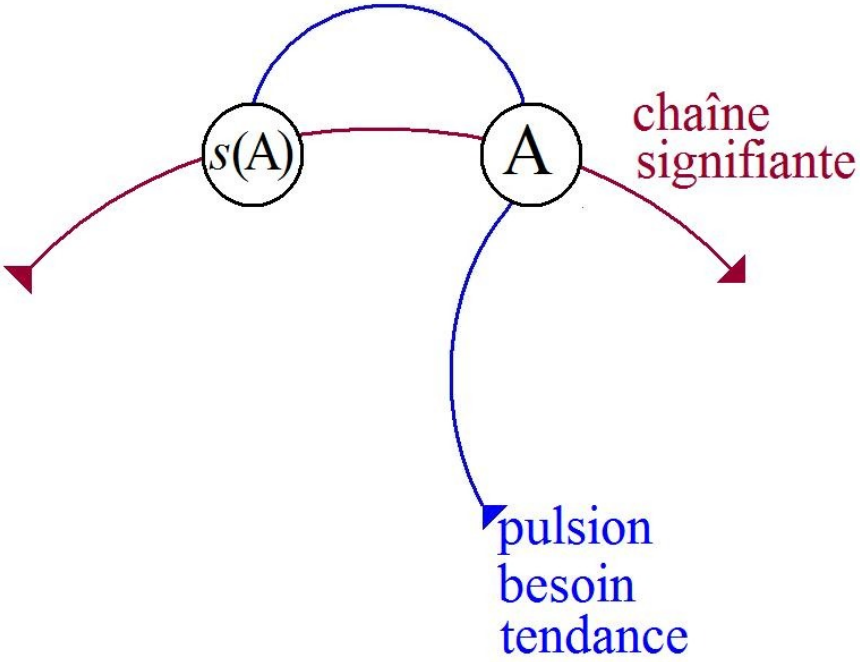
原则上便会形成一个以完美理想方式运作的社会：每次驱力冲动随需要出现，都会同某种我们姑且称为以不同方式变化的铃声联系起来；听见的人会以适当方式发挥功能，立刻满足所说的需要。这样，我们便抵达理想社会。我要提醒你们，我描绘的正是乌托邦主义者历来梦想的东西：一个完美运作并最终满足下列原则的社会——

“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人们还会补上后半句。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

归根到底，如果这幅图式停留在能指同需要的冲力或倾向相交的层面，会导向什么？导向主体对另一个人的认同；而这个另一个人负责表述能够回应需要的事物之分配，也就是资源分配。恰恰是这一点已经让你们看到，事情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要说明主体的这种表述、主体在某种秩序中的这种立场，就绝对必须把要求的背景纳入考虑；

这种秩序存在于实在秩序彼方，我们称之为象征秩序；它使实在秩序复杂化、叠加于其上，却不与之贴合。然而，即使在这幅图式目前画在黑板上的简单状态和层面，我们已经可以注意到某种事情发生了；在人那里，至少有某种属于自然和有机秩序的东西，使图式在这个阶段就变得复杂：这个主体、这个可以说为我们精神分析推测提供背景的神话儿童，在母亲面前开始表现自己的需要。




- 他在这里［$A$］遇到作为言说主体的母亲。
- 他的讯息在这里［$s(A)$］抵达终点，也就是至少在母亲满足他时如此。

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问题并不是从母亲不满足、挫折他时开始的。那样就太简单了；当然，人们总是努力回到这里，恰恰因为它简单。

我告诉过你们，有意义的问题并未逃过温尼科特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他的思想和实践覆盖了精神分析及其技术当前发展的全部广度，

直至极为精确地考察那些处于同精神病相接之界限和边界领域的幻想系统。温尼科特在那篇

我曾向你们提到的有关过渡客体的文章中，以最精确的方式表明：本质问题在于儿童怎样从满足中走出来，而不是怎样从挫折中走出来，从而为自己构筑一个世界。

当要求得到满足、而非受到挫折时，人类主体才会表述出一个包含要求彼方的世界；温尼科特称作过渡客体的正是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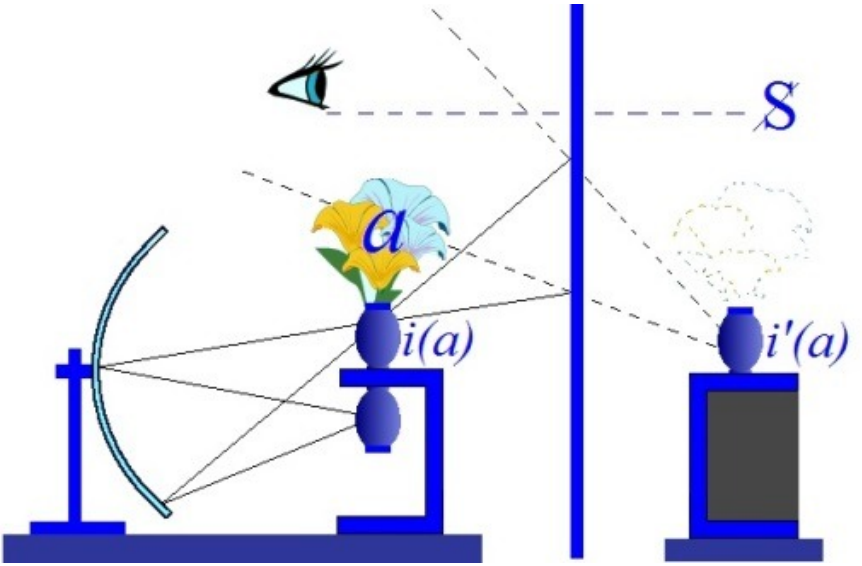
这些小物件很早便在儿童同母亲的关系中取得极端重要性：他嫉妒地拉扯的一角尿布，随便什么碎片，或者一个拨浪鼓。过渡客体在儿童发展系统中的重要性，是某种必须绝对看见、定位并从其早熟性上加以理解的东西。

说完这一点，让我们停在这种挫折上，也就是从我们三年前讨论镜像阶段、试图确定的某个时间起，讯息不再来到这里［$s(A)$］这一事实。镜像阶段并没有从此蒸发。我很喜欢你们中那些对我们说“每年都是不同的东西，体系变了”的人。体系并没有改变，我只是在努力带你们遍历它的领域。

我们发现，在同母亲的这种关系中，只要母亲在这里强加我所谓的、与其说是她的法则不如说是“她的全能”或“她的任性”，事情就由于另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儿童、人类儿童——不是随便一种幼兽，经验也向我们表明这一点——向某种属于想象性秩序的关系敞开；这是他同自身身体意象以及他者意象的关系。按照我们的图式，它明确位于需要得到或未得到满足的返回线上所发生之事的彼方。

也就是说，他相对于自己拥有的理想意象，在自身身体中体验到例如失望、不适和眩晕反应。由于他自身组织的一项特征，这个意象对他

取得完全占优势的价值；而我们多少有理由地把这项特征同他出生时的早产状态联系起来。




简言之，从开端起，我们便看到两个回路彼此干涉、相互作用：

- 第一个是象征回路；为了固定观念、把事情挂到你们已经熟悉的衣架上，可以说它联系于儿童期女性超我；
- 另一个是同这一自身理想意象的想象性关系；当儿童遭遇挫折或失望时，这一意象多少会受到影响乃至损伤。

换言之，回路从一开始就在象征层面和想象层面这两个平面上发挥作用：

- 同原初客体之意象、即母亲的关系；母亲是他者，是把需要表述为能指的可能性所处的场所；

- 另一方面，是他者意象［$i(a)$］；主体在这里同自己具有一种联结，同一个代表我们所谓其完成路线的意象相联——当然是想象性的完成。

从年初起，从我们开始在诙谐层面把握事情以来，我们所说的全部内容有什么意义？我向你们带来这幅图式，向你们展示它在诙谐中的贴切性和不可避免性；我告诉过你们，如果没有某种东西位于这个他者的彼方，就不可能组织起任何符合经验所交给我们、符合分析中经验所表述的精神生活。这个他者由于有权作出某种东西而首先被置于全能位置；这种权力不是挫折的权力——这样说并不够——而是Versagung，即兼具承诺与拒绝之暧昧性的拒绝。可以说，必须有这个他者的他者；它使主体能够把这个作为言说场所的他者觉察为本身也受到象征化。也就是说，在这里必须有他者的他者。

如果你们愿意，当我们采用家庭俄狄浦斯三角系统时，就能清楚感到：这里有某种比“家庭”这个社会经验交给我们的术语更激进、更根本的东西；它正是俄狄浦斯三角以及弗洛伊德发现具有持久性——我的意思是恒常性——的原因。

我曾在那里向你们指出大写的父亲；他从来不是某个父亲，而更确切地说是“死去的父亲”，是下列东西的承载者：

- 一个能指本身，是第二层次的能指；
- 一个授权并奠定整个能指系统的能指；它使第一个他者、即言说个体最初诉诸的主体本身也得到象征化。

只有在这个他者的层面、严格说来在法则的层面，而且是在一项——我将着重强调——道成肉身的法则层面，

经过表述的人类世界才会取得自身维度。我们从经验中看到它如何发挥作用，经验又向我们表明，相对于他者的另一个他者这一背景绝对不可或缺；若没有它，语言的宇宙——

正如语言宇宙不仅在需要的结构化中，而且在我今年试图向你们证明并使你们理解其原创维度、名为欲望的新事物中显示出效力那样——

——便无法得到表述。

正是在这一层面，作为言说场所的他者变得可被觉察。这个他者原本可能只是我刚才谈到的铃声所在之地；若是这样，严格说来它就不是他者，

而只是能指系统有组织的场所，把自身的秩序和规律引入某一物种内部的生命交换。

很难看出谁可能组织它；不过，毕竟可以设想，在某个特定社会中，

“满怀善意的人们”致力于组织并使它运作。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之一。只不过，他者并不是这个东西。它恰恰不只是一个完美组织、固定并凝固之物所在的场所；它自身也是一个受到象征化的他者。

正是这一点赋予它自由的外观。事实是，它受到象征化；而在他者的他者层面——也就是此处的父亲层面、法则得到表述的场所、他自己依赖某个他者的瞄准点——发生的是：这个他者本身服从能指表述。它不只服从，还受到某种东西的标记，

即一种使之失去自然性质的效应——让我们清楚强调自己的想法：

- 这种能指在场还远未达到我们在这里仅为说明思想而作为出发假设的完美表述状态；
- 这种能指对他者本身的效应，也就是他者在这一层面承受的标记。阉割本身代表的正是这一标记。

从前，我们曾在“阉割、挫折、剥夺”三元组中明确标出阉割的如下性质：

- 行动是象征性的；
- 施动者是实在的；
- 所需要的是一个实在的父亲；
- 阉割确实存在；
- 阉割是一项象征性行动，并作用于某种想象性之物。

……我们在这里重新发现这种必然性。

| Agent | Manque | Objet |
| --- | --- | --- |
| Père *réel* | Castration *symbolique* | Phallus *imaginaire* |
| Mère *symbolique* | Frustration *imaginaire* | Sein *réel* |
| Père *imaginaire* | Privation *réelle* | Phallus *symbolique* |

正因为某种实在的东西进入了法则层面——一个多少有所失职的父亲，有什么关系！或者某种取代他、占据其位置的东西——，下列事情才会产生：某种作为主体得以设立的要求系统之背景的东西，会在

要求系统中得到反映。这个系统远没有得到充分表述、远非完美、远没有达到满负荷或充分运作；然而其中受到标记的东西名为：

- 能指对主体的效应；
- 能指对主体的标记；
- 欠缺，即这一能指在主体中引入的欠缺维度。

这种被引入的欠缺，在能指系统中作为能指对主体的效应本身得到象征化；

它严格说来就是所指。所指并不那么来自深处，仿佛生命会绽放成种种意义；它来自别处，来自语言与能指本身，并在那里印下这种名为所指的效应。

正如我们围绕阉割提出的内容所表明的，这一点原初地得到象征化。严格名为阉割的象征性行动所依托的是一幅意象，可以说是从想象系统中选取的意象。阉割这项象征性行动用来标记自己的符号取自想象领域：他者意象中的某种东西被选择出来，承载欠缺的标记；正是通过这一欠缺，生命存在由于身为人、也就是由于同语言发生关系，而把自己觉察为——

- 被排除在欲望的全体之外；
- 某种受限的、局部的东西；
- 一个受造物，有时是生命谱系中的一个环节，只是生命借以通过的众多个体之一。

动物不同于此：它确实只是实现种型的个体之一；作为每一个个体，相对于种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已经死去。对它们而言，我们也已经如此。相对于生命的运动本身，我们已经死去；因为语言使我们能够把这个运动投射为一个整体，甚至投射为已经抵达终点的整体。

这正是弗洛伊德在死亡本能观念中所阐明的东西。他的意思是，对人而言，生命已经被投射为抵达终点，也就是抵达重新返回死亡之处。弗洛伊德对死亡本能的这一阐明，表达了某种动物存在的本质位置；这个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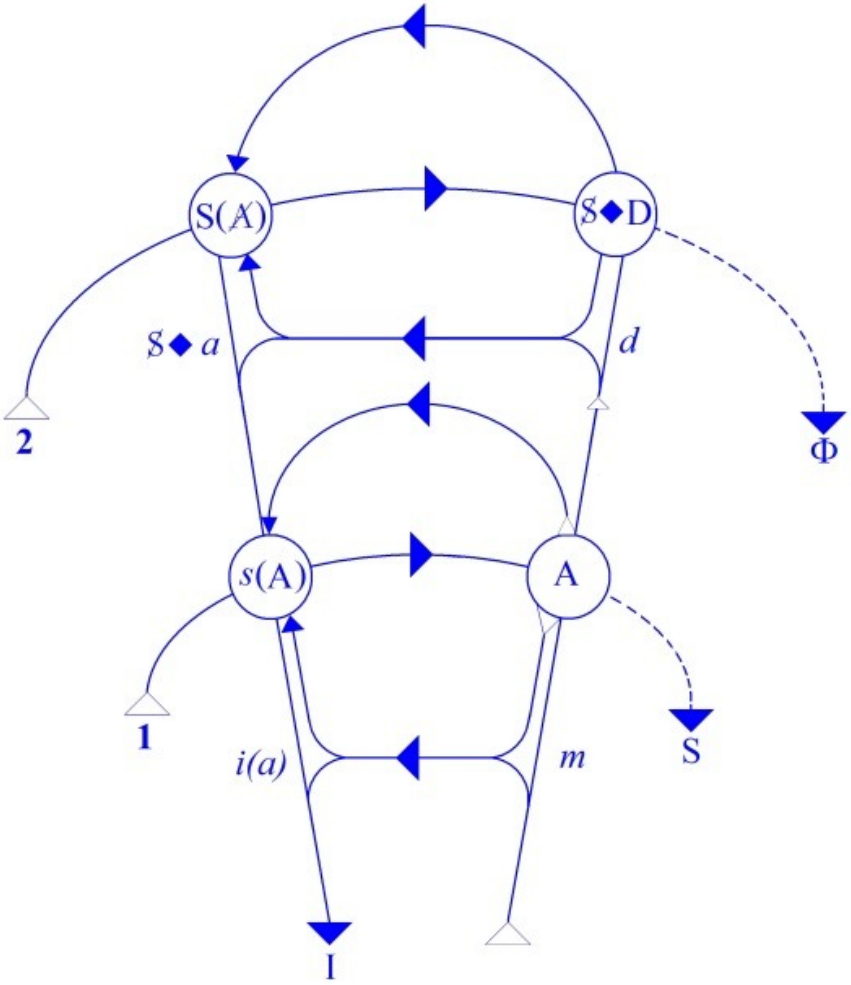
被纳入并表述于一个能指系统中；这一系统使他能够支配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内在性，并把自己觉察为已经死去。

主体恰恰只能以想象性方式做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只能作为虚拟之物、作为极限、以思辨方式做到。这里当然没有任何死亡经验能够与之回应，也正因如此，它才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象征化。它在某个精确的点和器官上得到象征化；生命的冲力在这里以最敏感的方式显现。

正因如此，阳具仅仅因为代表生命力量的升起，便在能指秩序中取得位置；它在人类个体的存在中，代表受到能指标记、被能指打上那种本质易逝性之印的东西。能指在主体生活中引入了缺失存在的维度，而这种易逝性使缺失存在能够在能指本身中得到表述。

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事情以何种秩序呈现给分析：有人并不是从学派走向现象，而只是从神经症者那里显现的现象本身出发；神经症正是以其失序显现这种表述之本质的特选地带。经验已经证明，我们总是在失序中相当容易地学会找到秩序的齿轮和接合处。

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首先交给经验的东西——这项经验立即把阉割情结本身的底层推到前景——众所周知，出自对主体症状的把握和知觉。症状是什么意思？它在这幅图式中位于哪里？



它位于$s(A)$中的某处，产生在意指层面。弗洛伊德带来的全部内容，本质上就是：

- 症状是一种意指；
- 症状是一个所指；

……而这个所指远不只牵涉主体。主体的历史和全部病史都被卷入其中。因此，我们可以正当地用$s(A)$在这个位置象征它。要这样理解：它是他者的所指，作为这样的所指来自言说的场所。

但弗洛伊德还教给我们：

- 症状从来不简单；
- 症状始终受到多重决定。

没有任何症状的能指不来自某项先前经验；确切地说，是来自发生在某个层面的经验。那里涉及主体所压抑之物、主体全部压抑之物的核心，也就是阉割情结。这里的$S(A)$无疑在阉割情结中得到表述，却未必、也并非总是完全得到表述。

人们从中出发的那项著名创伤、那幕著名原场景究竟是什么？无非是某种进入主体经济并在无意识发现的核心和地平线上始终作为能指发挥作用的东西：一个由自身影响方式界定的能指，正如我刚才开始阐明的那样。

也就是说，生命——我指被把握为活着的生命存在——尽管作为生命而活，却具有那道正好构成能指维度自主性的偏差和距离。那么，创

伤或原场景是什么？无非是生命在一种对自身的可怖统觉中把握自己；只要生命同自身拉开距离去观看创伤和原场景，它便以彻底的异样和不透明的粗暴，成为某种生命自身无法忍受之存在的纯粹能指。

这就是生命作为纯粹状态的能指向自身显现，也就是某种尚不能以任何方式解决和表述的东西。相对于所指的这种能指必然性和背景，是弗洛伊德从开始阐明症状是什么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置于一切症状形成中的东西。最近，我们在癔症者那里看到的，难道不正是使我们能够定位神经症者问题的东西吗？

这是能指同主体作为要求之依赖者的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里，癔症者必须阐明某种我们暂且称作其欲望以及欲望客体的东西，因为这个客体恰恰不是需要的客体。正因如此，我曾对所谓“美女屠夫之梦”稍加着重。

这里涉及什么？事情显现得非常清楚；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从精神分析刚刚萌芽时便说：对癔症者而言，问题在于使欲望客体作为不同于并独立于一切需要客体的东西而维持和存续。同欲望的这种关系，在一切要求的背景上以欲望本身的谜样形式构成并维持欲望，正是癔症者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所谓的这个$x$就是不可言说的欲望。

我的癔症者欲望什么？这个问题为她开启的，我不会说是整个宇宙，但至少是一个已经足够广阔的世界：可以称为潜伏于世上每个人类存在中的癔症维度，也就是一切可能以有关自身欲望的问题呈现的东西。

癔症者正是同这个世界直接相通；首先当然同所有癔症兄弟姐妹那里可能发生的这一秩序中的一切直接相通。正如弗洛伊德向我们阐明的，

癔症式认同就奠基于此。对任何癔症者而言，所有其他人在当下提出的有关自身欲望的问题，都会在她那里产生回声；当这个人也是癔症者时尤其如此，但即便某人只是以癔症方式提出问题，

即便只是偶尔乃至以潜在方式成为癔症者，也是如此。

这个“有关自身欲望的问题”为癔症者打开一个世界，一个认同的世界；严格说来，它使她同面具建立起某种关系。我的意思是，一切能以某种方式按照特定类型固定并象征“有关欲望的这一问题”的东西，都会使她成为癔症者的亲属——姑且说，是对作为癔症者者的召唤——，使她从根本上认同于某种一般面具；一切可能的面具形态都在它下面骚动。

现在我们来到强迫症者。我试图逐步接近的强迫症者结构，也由同欲望的某种关系来指明；不过它不是$d/x$关系，而是我曾向你们指出在他那里至关重要的另一种关系。如果你们愿意，今天就把它称作$d/0$。

强迫症者同自己欲望的关系，服从一个我们早已借助弗洛伊德认识的事实，即所谓Entbindung、“驱力去融合”［Entbindung：解缚］很早就发挥了作用；某种名为“毁灭”的东西被孤立出来。

同所有主体一样，强迫性主体最初接近欲望时，接触到的是他者欲望；而正因为这个他者欲望首先作为这样的欲望遭到毁灭和取消，强

迫症者的全部结构才会启动。它作为这样的结构，仅仅由此——这样说并没有那么新，我只是以新方式加以阐明——从这里得到决定。

当你们手里有一名强迫症者时——已经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会知道——他的处境和结构具有一项本质特征：不仅如我已经预告和告诉你们的，他自己的欲望

会在他接近时下降、闪烁、摇摆并消散，而且还带着这样一个标记：欲望最初被他作为某种会毁灭的东西来接近，因为他者的欲望反应最初向他呈现为对手，一开始就带上某个标记，他则以毁灭反应的风格来回应。正是这种反应潜伏于主体同他者意象本身的关系中；这个他者意象会剥夺并毁掉他。因此，强迫症者接近自己欲望时始终留有这个标记，使每一次接近都令欲望消散。

我正在你们面前连续几课展开评论、有时加以批判的那位作者［布韦］，把这一点知觉为所谓“同客体的距离”，并将它同所谓“客体的毁灭”混淆。我的意思是，他对强迫症者心理的设想，是一个不断需要防御疯狂的人；疯狂被界定为“客体的毁灭”。

这无非是那位作者的一种投射——我会向你们说明为什么。鉴于他本人采取的视角和试图抵达的结论，他沿自己的道路设想解决强迫症者的欲望问题；这不仅受理论层面的不足影响，也受到个人因素影响，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可以说被迫产生的幻想。

我会向你们表明，这同他把强迫症者的欲望问题带入何种想象性视角有关。

不过，明显而寻常的经验表明：典型强迫症者没有丝毫精神病危险，不论你们把他带到哪里。时机成熟时，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只要事情得到某种阐明，向你们展示强迫症者在结构上同精神病者何其不同，我就能告诉你们原因。相反，其中实际被觉察、尽管遭到错误翻译的，是这一点：强迫症者只有保持距离，才能维持同自己欲望的可能关系。

强迫症者必须维持的是同自己欲望的距离，而不是同客体的距离。我们会看到，客体在这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经验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必须同自己的欲望保持某种距离，这一欲望才能存续。

但这还有另一面：请在临床与具体情形中观察——只要强迫症者同另一个人建立某种充分在要求层面得到表述的关系，首先无论是同母亲，后来在一切事情中尤其无论是同配偶，都会如此。因为对我们分析而言，“配偶”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无非是在我们试图给它定位的事物层面取得充分表述的某种东西。

也就是：不管情愿与否，主体都不得不同配偶不断回到某种要求关系中，始终同此人处在这种关系中；哪怕在一系列事情上“闭口不谈”，也从不免于痛苦：要求要求被推到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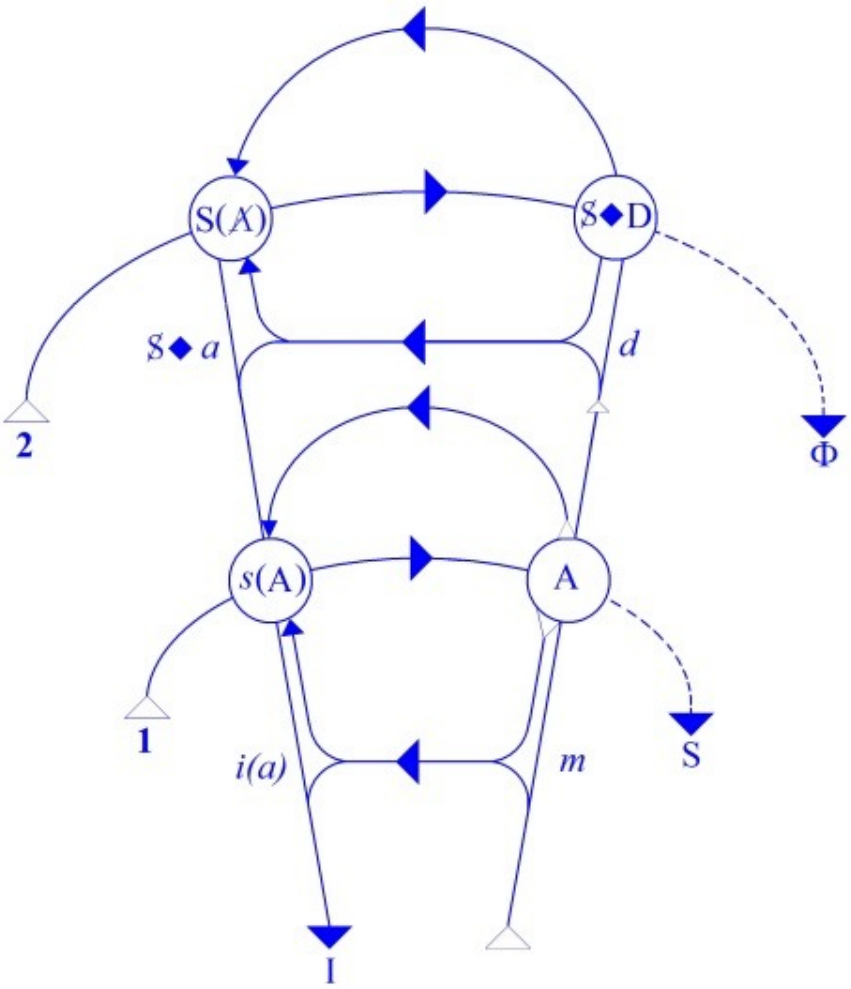
强迫症者同配偶的关系层面会发生什么？最需要细心观察的恰恰是下面这件事；只要你们肯下功夫，就会注意并观察到：

强迫症者致力于毁灭他者的欲望。可以说，只要另一个人落入“强迫症者的领地”并受其牵制，每一次接近通常都会以隐秘攻击和持续磨损收场；它们在强迫症者的作用下，倾向于使另一个人的自身欲望遭到取

消、贬值和贬低。这些无疑都是细微差别，运用相关术语需要一定练习；但离开这些术语，我们甚至无法觉察正在发生之事的真正性质。

另一方面，我过去已经说过并标出，在强迫症者的过往和童年中，

要求的表述在他那里取得一种格外特殊而突出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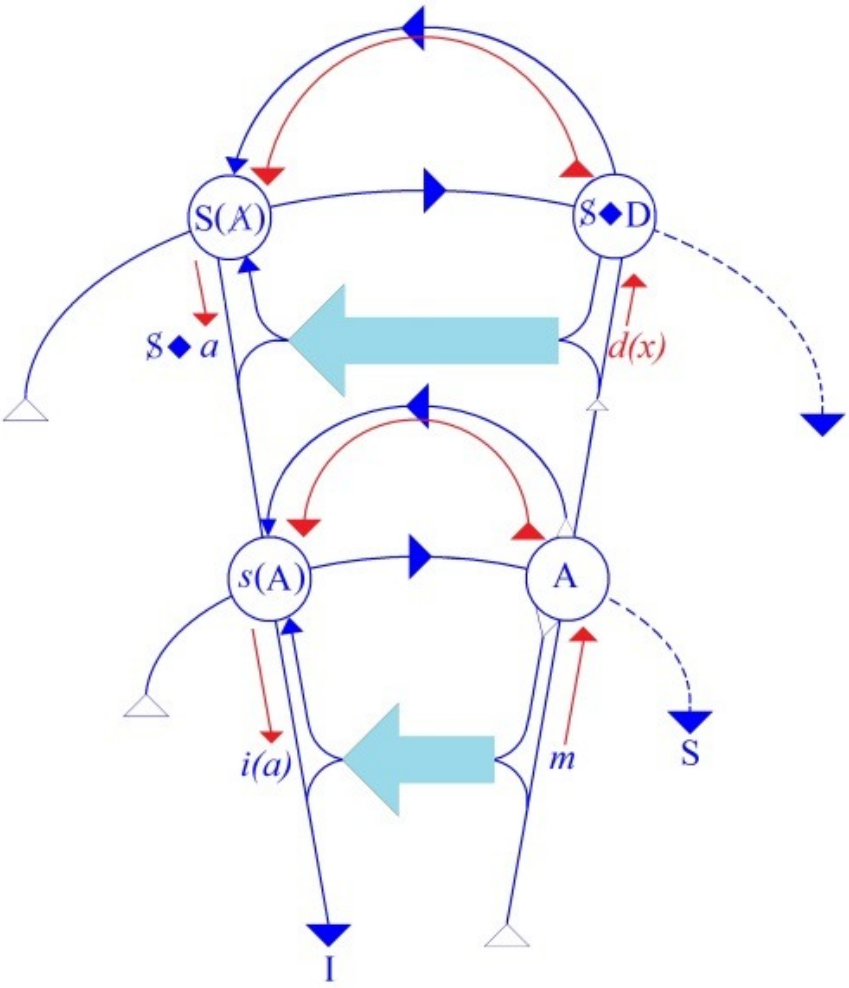

在这幅图式上，你们开始能够理解并定位它。我曾向你们描绘一个总在要求什么的小孩；所有小孩确实都终日有所要求，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小孩有一项特征：即使周围那些怀着最好意图的人，也始终把他的要求感受为

严格说来无法忍受。用俗话说，这就是“磨人”的孩子。

他要求的东西并不比别人更离奇；特殊之处在于他要求的方式，在于主体同要求的关系。正是这一点构成要求表述在这个已经表现出强迫性结构的儿童那里所具有的特殊或早熟性质；例如，它会在俄狄浦斯刚刚衰退的时期、所谓潜伏期表现出来。

至于我们的癔症者，我们看到，为了支撑自己的谜样欲望，她把某种东西作为人为手段［$a$］来使用；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两股平行而相同的张力来表示它，

它们处在这种理想化形成和对小他者认同的层面［$\rightarrow \not{S} \diamond a$，$\rightarrow i(a)$］。




请想想K先生对多拉的感情。况且，每一位癔症者在自身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有类似支撑物；它来到这里发挥同小$a$相同的支撑作用。强迫症者并不采取同一条路线和道路。他也围绕如何应付自己的欲望问题组织起来，却必须从

其他要素和其他地方出发。

我开始向你们表明，强迫症者正是在同其要求的一种早期而本质的关系［$\$ \diamond D$］中，才能在同他者的关系中显现欲望的特殊性质与位置；可以说，他在这里维持了必要距离，使这种在本质上遭到取消的欲望、这种可以说盲目的欲望的位置，能够在某处、尽管从远处成为可能；所涉的正是维持这一位置。

我们将绕强迫症者同自身欲望的关系一周，划定它的范围。主体同自身要求的这种特殊关系，是第一项特征；还有其他特征。请观察：强迫观念是什么？

你们知道言语公式在其中何其重要，以至于可以说，强迫观念始终是某种得到言语化的东西。弗洛伊德对此毫无怀疑：即使面对可以说潜在的强迫性行为，他也认为，这种行为无非是揭示自身结构，因为它采取了

言语性强迫观念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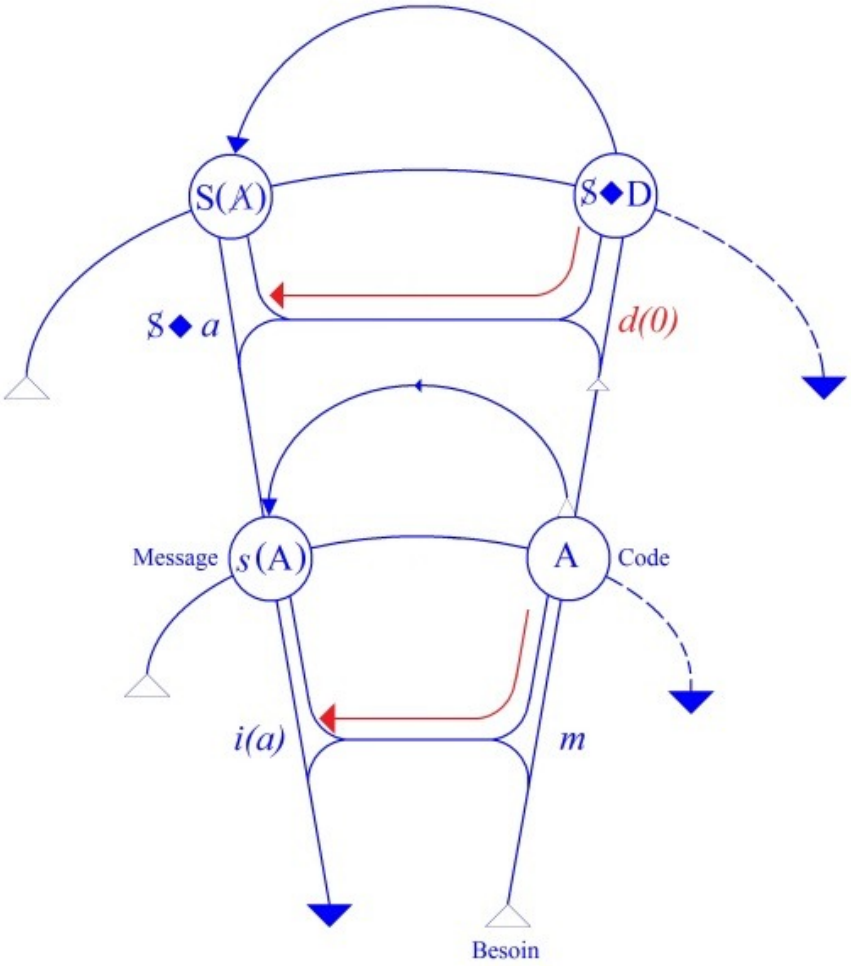
他甚至说，即便治疗强迫性神经症，人们在最初几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让主体使自己的症状得到所谓的全部展开；临床上，这可能表现为问题加重，却是在某种真正得到表述的东西中，强迫性形式整体发生的一种毁灭。

此外，还有必要强调言语性取消的性质、从强迫观念结构本身出发的言语性质吗？人人都知道，它之所以对主体具有现象学上的焦虑性本质和力量，正在于：这里所涉的是言语和能指实施的言语性毁灭。主体受制于所谓对他者的“魔法性”毁灭——我不知为何这样称呼，为什

么不径直说“言语性”——；这种毁灭就在症状的结构本身中被交给主体。

这也把我们引向一种必须遍历、才能理解其必然性的现象学。你们已经看到，癔症者的回路最终抵达两个平面：一边是在图式中这个较高层面的理想化［$\not S \diamond a$］或认同，另一边则是与之平行、在想象层面经过这里的象征化［$i(a)$］。

如果容许我把这幅图式一直用到底，我会说，对强迫症者而言，回路大致如下；我们也在这里重新找到它。


S(A)
$◆D
$◆a
d(0)
Message
s(A)
A
Code
i(a)
m
Besoin

我来解释。言语性强迫观念的图式包括：

- 这幅毁灭同他者之关系的图式；
- 这种害怕以思想伤害他者的恐惧；也就是以言语伤害他者，因为这些思想是说出来的思想；
- 这种亵渎的强迫观念也把我们引向一整套值得稍加长久停留的现象学。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对亵渎本身感兴趣；亵渎这个主题本身，是进入言语性强迫观念的极好入口。亵渎是什么意思？

我很希望有某位神学家对此回应。无疑可以说，它使一个崇高能指堕落；而我们必须考察，它同那个名为不被承认的父亲的最高能指之间的关系，究竟位于可以说何种能指授权层面。

即使两者发挥同源作用，它们也绝不能混为一谈。

上帝同创造具有关系、同能指本身具有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亵渎在本质上只位于这一维度，同样毫无疑问。也就是说，亵渎使这个能指堕落到客体行列，以某种方式把λόγος［logos］认同于其转喻效应，使它下降一个等级。不过，这无疑还不是对亵渎问题的正确而完整的回答。

但对于强迫观念中所涉的言语性渎圣——我的意思是在强迫症者那里观察到的现象——这无疑是一条本质进路。请回想鼠人中的一幕：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四岁时对父亲勃然大怒，

在地上打滚，一边叫他：“你这毛巾，你这盘子”，等等。

一如既往，我们又在弗洛伊德那里找到最为巨大而典范的东西：“你”这个属于另一个人的本质称呼，同这个“某种惰性之物”真正碰撞并勾连。能指进入人类世界后产生一种可以说堕落的效应，这种效应名为客体，尤其是惰性客体，即凭自身只是一件交换和等价客体的东西。儿童愤怒时那一长串客体名称已经充分表明这一点：问题不在于父亲究竟是灯、盘子还是毛巾，而在于“你”下降并被毁灭到客体行列。

你们会对我说，言语性强迫观念中对他者的这种毁灭乃是某种东西……

你们容许我以此结束，因为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要说，某种事情在这里发生；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它的全部结构。它使强迫性主体只有在某种能指表述中才能保存他者；他所向往的毁灭效应必须借助一项能指表述来支撑他者。

请仔细想一想：你们在这里发现的，正是强迫症者所体验之世界的经纬。强迫症者是一个生活在能指中的人；他极为牢固地安顿在那里，完全没有什么可怕。对他而言，能指足以保存他者的维度。不过，这个维度可以说被偶像化了。图式为我们给出这一主题；我再用鼠人的病例提醒你们：法语容许我们以一种我曾在这里起过头的方式来表述它——所以你们不会惊讶——就在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以及从这里开始的“你”的层面。主体向另一个人表述的是：“你就是那个把我……的人。”而对强迫症者而言，话就停在这里。

充分言说本应表述主体投入同他者之根本关系的承诺，

但它无法完成，只能诉诸某位幽默作家借以引出著名“To be or not…”的那种重复：那人挠着头，想把句子继续下去：“To be or not… To be or not…”，最后靠重复找到了结尾：“你就是那个把我……你就是那个把我……杀掉那个杀我的人。”[注]

> [注] 法语原文以 Tu es（“你是”）与 tuer（“杀死”）的同音制造滑移，并从未完成的 Tu es celui qui me… 转入 Tuer celui qui me tue。中文无法复制这一同音，正文保留句义和重复结构。

法语在这里为我们给出同他者之关系的根本图式。这项同他者的关系奠基于一种表述；它可以说形成于他者的毁灭之上，

却由于自身是一项表述、一项能指表述，而使他者继续存续。

我们将从这一表述内部看到，“成为”与“拥有”问题上阳具能指的这种关系和位置究竟是什么；上一次课结束时，我们就停在这里。

它将使我们看到两种答案之间的差异：一种答案能够向强迫症者展示，他同作为他者欲望能指的阳具究竟具有怎样的真正关系；另一种答案则在某种想象性幻景中满足他，即通过分析想象性幻想，向要求作出象征化让步。你们知道，整个病例报告都沿着这个维度展开；归根到底，它相当于对那个女人说：“您想要阴茎？那么……”正如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面对一个把他堵在路灯旁的人时所说：

- “您想要什么？”

那人回答：

- “自由！”
- “好吧，您已经有了！”

卡西米尔·佩里埃说着，从他两腿之间钻过去离开，把他留在那里目瞪口呆。

这也许不完全是我们能够期待的分析答案！这份病例报告的结尾，主体那种欣快而陶醉的认同，以及完全符合从分析家那里找到的男性理想的描述，也许给主体的平衡带来某种改变，但无疑并不是对强迫症者问题的真正回答。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第12卷，1931年10月，第4辑

爱德华·格洛弗：不确切解释的治疗效应：对暗示理论的一项贡献

[返回1958年6月18日正文]

精神分析对治愈理论的兴趣，自然主要指向分析治疗中发生的治愈过程；至少在今天，其他方法的治疗效应更多属于一般心理学兴趣。早些时候，我们当然必须特别注意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理论意义。当时经常有人声称，精神分析不过是伪装起来的暗示；此外，分析方法所依据的经验来自医患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情境，例如催眠，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大多数有关“移情的解决”的讨论，都可以看作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它们在分析方法与其他治疗方法之间提供了一项

粗略却可用的区分。弗洛伊德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专门研究（1）、费伦茨关于移情的研究（2）、欧内斯特·琼斯关于暗示与自我暗示的研究（3）、亚伯拉罕关于库埃法与自我控制的研究（4），以及拉多关于治愈过程的一项未完成研究（5），都为这一区分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基础。

不过，我们仍会周期性地受到推动，重新考察不同心理治疗形式之间的关系；尤其每当分析知识取得进展时更是如此。每逢这种进展发生，我们都不得不问自己："在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新知识以前，那些病例究竟发生了什么？"诚然，如果我们此前没有使用"治愈""彻底分析"等术语，就不会负有这项义务。但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这样说，所以无法逃避这种周期性的内省。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新增知识根本不会影响治疗程序；就像儒尔丹先生一样，我们一直都在说"散文"。这无疑适用于最近大量有关超我分析、焦虑与罪疚的工作。我们确实已经能够把阻抗细分为超我阻抗、自我阻抗和本我阻抗；但即使没有为它们贴上特殊标签，我们也一直试图削弱这些阻抗。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压抑的实际内容时，显然，新幻想系统的发现给治愈理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可以这样表述：同表面上确切的解释相比，不确切解释会产生什么效应？如果我们同意解释的准确性与其他因素一道有助于治愈，也同意新的幻想系统不断得到发现，那么在这些系统尚未被发现以前取得的治愈，应当如何理解？

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明显困难，是我们没有充分而具有约束力的术语定义。以"治愈"标准为例：标准也许发生过变化；过去的标准也许更专门围绕症状；随着知识增加，我们的治愈标准也许变得更高、更宽或更严格。比如，把分析应用于性格过程，无疑提高了治疗标准的严

格程度；它是否又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标准，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人们普遍同意，不能只凭症状变化，立即在分析性与非分析性治疗过程之间作出区分。

至于幻想系统的意义，人们也许会说，表象内容本身并不是主要致病因素；疾病中重要的只是情感的历史，因此新发现的幻想内容唯一价值，在于为情感反应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入口。反对这一观点的理由是：它会为解释的彻底歪曲或对压抑内容的掩饰敞开大门；而且，它会夺走精神分析解释与伪分析暗示之间一项宝贵的区分。

顺带说，一种略带犬儒色彩的观点会暗示，新发现未必总是准确，甚至未必真的新颖。人们不免会想到：兰克刚出版《出生创伤》以后、这套理论正式破产以前，有一段时间，某些分析家多么迅速地在自己的所有病人那里发现了“出生创伤”。不那么犬儒的观点则认为，许多新幻想系统，或对已知系统的新制作，在性质上主要属于重复：它们用不同说法重复某种核心关注，而说法则由力比多发展阶段与自我反应决定。按照这一观点，重复帮助移置，因而具有保护性；我们发现的系统越多，就越能有效阻止防御性移置。这样，我们可以说，以前人们在不利条件下——即不了解幻想的种种变体——逐步处理情感障碍，但毕竟仍然把它们处理了。

下一种观点同前一种略有相似，却使我们更接近一个僵局。这种观点认为，致病障碍通过固着和压抑，束缚于某些特定系统；但可以通过退行——即向后移置——到较早而非特定的系统（Rückphantasieren，向后幻想），或通过分配——即向前移置——到后来、更复杂的幻想系统，来减轻这些障碍。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说，早年虽处不利条件，确实取得了正当治愈。但如果有人主张，某种特定神经症是对一组同某个特定固着阶段相关的特定无意识幻想的防御，而且除非直接

把它们从压抑中释放，否则不可能期待彻底治愈，我们便不得不极为仔细地考察：在这些幻想尚未发现的年代，治愈怎样可能发生。

显然，如果有人提出这种主张，研究的第一步就是估量压抑在过去的治愈中所起的作用。它始终是分析中的未知量。无须仔细思考也能看出，分析开端阶段偶尔观察到的症状迅速消失——例如最初两三个月——部分归因于移情因素，但主要归因于压抑效能的增强。这种效能在下列两个时点之一达到顶峰：第一，自由焦虑或罪疚的数量已经减少时；第二，移情神经症有可能带出深层焦虑或罪疚，以及覆盖其上的受压抑仇恨层时。不过，人们容易忘记，同样的因素也能够以较不醒目的方式运作，并在分析晚得多的阶段产生效应。在这种情形中，深层罪疚受到逐渐扰动，无疑是压抑增强的诱发原因。按照这种观点，在不了解特定幻想系统时取得的治愈，来自真正分析手段对冲突平衡的总体恢复，而这又会带来压抑效能的增强。

如果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就可以忽略不确切解释的实践意义。当然，人们会同意，在我们考察的假设性病例中，许多解释之所以不确切，是因为它们没有揭示特定幻想系统，尽管也许揭示了某些相关类型、具有共同象征内容的系统。不过，我们很难有理由忽略不确切解释的理论意义。毕竟，如果记得神经症是自发的自我治愈尝试，那么心理装置似乎很可能把至少一些不确切解释当作替代产物加以利用。如果考察恐惧症和强迫观念所呈现的移置因素，我们便有理由这样描述事态：病人无意识地形成一种对焦虑来源的不确切解释，又有意识地按照它生活。因此，在不了解特定幻想系统的病例得到治愈时，另一项因素似乎也在发挥作用：病人抓住不确切解释，把它转变为移置性替代物。这个替代物远不像他在症状形成期间自行选择的替代物那样明显不当，却又同焦虑的真正来源保持足够距离，因而能够帮助固定那

些已经由其他更准确的分析工作大幅削弱的投注。过去有人说，不确切解释无关紧要；即便没有好处，至少也不会造成重大伤害，只会无害地从病人心中滑过。从狭义症状角度看，这话颇有道理；但从更广阔的分析意义看，它似乎并非正当假设。很可能存在一类不确切解释：它同焦虑真正来源之间保持最适度的心理距离，以牺牲主体接受更深分析的能力为代价，在症状意义上带来改善。极其不准确的解释若没有强大移情权威支撑，很可能毫无作用；但略微不确切的解释却可能增加我们的困难。研究病人自发提供的解释，可以取得某种佐证。这些解释相对于其幻想活动的某个方面往往极为准确，尤其当解释真正出于直觉，也就是没有受到理智理解或先前分析经验激发时。然而我们会发现，除精神病病例外，病人当下提出的解释并不是真正的解释。可以这样检验：装作同意病人的看法；十个神经症病例中有九个，病人随后会因眼前焦虑得到解除而漠然对待你。教训当然是：除非确信自己立足稳固，否则最好保持沉默。

这个主题可以无限展开，但我用一个简短例子结束其纯分析方面。请回想那些熟悉的宫内幻想：它们有时被解释为出生创伤的迹象，有时被解释为潜伏期以前生殖器性乱伦愿望的表象；或者回想亚伯拉罕特别强调的，在母亲子宫或阴道中攻击父亲或其阴茎的幻想；又或者回想梅兰妮·克莱因赋予特定含义和意义的、更偏“腹部性”的子宫幻想。我们便会看到，说明当前问题的材料十分充足。我只再补充一项评价：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主体对某个特定阶段固着时，这些幻想越普遍，我们就越难确定它们在某一病例中的价值。换言之，我们越难确定神经症选择。借用最近有关神经症诱发因素的讨论（6）中的术语：只有揭开压抑，证明同一因素不仅存在于易感系列中，而且确实致病以后，我们才能谈论诱发事件系列中的某项特殊质性因素。

在离开这个问题方面以前，为防止误解，最好先区分“不确切”解释与“不完整”解释。显然，在揭示受压抑幻想的深层时，人们会作出大量初步解释；许多情形中，这些解释确实无法避免。举一个简单例子：共同经验表明，当分析建立在肛门性组织之上的无意识同性恋幻想时，必须先在生殖器性幻想层面作大量准备工作。即使生殖器性焦虑已经缓解，对更原始组织的工作也取得进展，人们仍会观察到病人周期性地重新激活生殖器性焦虑；肛门系统当下已经受到过强投注。在这种情形中，先前对生殖器性幻想的解释完全准确而正当，但从致病意义看仍不完整而间接。然而，如果完全没有尝试揭示肛门幻想，而只解释生殖器性幻想，这项解释就是不确切的。此后，如果在分析肛门幻想的过程中，生殖器系统重新受到投注，而分析家只给出一项生殖器性解释，那么这项解释便既不完整，也不确切。肛门—施虐系统中的施虐成分也会产生类似情形。对肛门成分的初步解释是不完整的；除非施虐因素受到永久忽视，否则它并非不确切。这个具体例子值得仔细考察，因为它凸显出比较近年与早年分析结果时的另一点。分析强迫性神经症时可以观察到：当施虐成分引起阻抗，阻抗经常采取表面上色情性幻想和仪式受到夸大的形式；病人则非常乐意接受以力比多幻想为依据的解释。一层施虐幻想对色情成分形成防御时，同样如此。如今，现代精神分析治疗的整体趋势都朝向解释施虐系统与罪疚反应。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早先一些症状性成功是否由于人们强调力比多因素，却只略微强调施虐因素，从而使病人摆脱焦虑，却留下未获解决、继续受到压抑的施虐系统。把早年移情神经症与自恋神经症的分析结果，分别同近年结果比较，会很有意义。如果我提出的观点有效，我们便会预期：过去对自恋神经症的结果相对贫乏，对移情神经症的症状性结果则更加迅速而显著；反过来，我们会预期，现代治疗自恋神经症的结果更佳，对移情神经症的结果则较慢

——尽管最终更为彻底。当适应不良更明显地位于力比多组织时，对罪疚层的深入考察可能延后症状缓解。[1]

再说明一次“不完整”解释。除了揭示幻想的彻底程度以外，只有紧随解释而来的直接防御反应也得到研究，一项解释才算完整。以“罪疚”或“焦虑”为依据的解释也是如此：只有追踪同这一特定情感相联系的幻想系统，它才不再是不完整的。追踪过程可能经过移情重复抵达儿童期核心，也可能经过儿童期核心抵达移情重复（7）。

---

现在转向问题的非分析方面，有一两点值得考察。精神分析家从未质疑暗示方法能够缓解症状，无论它属于简单移情类型，还是伪分析类型，即以一定程度的解释性理解为基础的暗示。他当然会质疑结果是否持久，或者推测主体要以总体幸福、适应能力或情感自由中的何种代价换取这种结果；但他很难质疑这种缓解确实发生。分析家在自己的

[1] 如果另写一篇题为《不确切解释的恶化效应》的姊妹篇，无疑将主要讨论局部解释施虐幻想所产生的结果。在没有作出充分解释的情况下扰动罪疚系统，一个常见结果是病人在负性移情中中断治疗。即使焦虑症状已经消失，他离开时也可能带着更强的自卑感；这无疑是罪疚已经激活的标志。即使没有这种戏剧性结局，不确切解释以后也会出现许多其他主动阻抗的迹象。讨论本文时，瑟尔小姐指出了分析中阻抗或停滞的一个常见来源：用超我系统的术语解释本我系统，或者反过来。这项观察无疑可靠，在强迫病例分析中很容易用实验方式加以证明。在仪式形成的早期阶段，保护或取消（“抵消”）系统由超我支配；它迟早会受到受压抑的力比多与施虐性（本我）要素渗透。此

时，继续采用“超我”解释就是“不确切”的；若坚持下去，分析就会陷入停顿。

咨询实践中，有许多机会观察一两次会谈所产生的治疗获益。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也能观察到上述同样的因素发挥作用。病人在咨询后有所好转，或者因为释放了诱发焦虑与罪疚的投注，或者因为接受分析的可能性在无意识中吓退了他们，又或者因为医生在咨询期间作出某些相当准确、却又足够不确切而恰好满足病人需要的说明。

严格说来，这项观察不是分析性的；但把它同前面对实际分析中不确切解释效应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来足以支持我们重新考察当前的暗示理论。人很容易让过程短路，径直声称：任何并非纯粹分析性的心理治疗过程，长远而言必定同症状形成过程具有某种共同之处。除非我们分析心灵内容，揭示处理这些内容的心理机制以及相应情感，否则我们会自动站到心理防御一边。

因此，当一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已经削弱，前往非分析性心理治疗者那里治疗自己的症状——即辅助性防御——时，医生必定要采取某种程序，补充次级防御系统或症状系统。他必须运用一套三级防御系统。姑且撇开理论考量，合理的做法似乎是从审查暗示实际采用的技术开始。最方便的是采用一项共同评价标准：向病人揭示了多少心理真理。也可以把标准反过来：按照程序偏离心理真理的程度，或者转移注意所采用的手段，来对暗示程序分类。

依据这些标准，无疑可以对方法作出精细划分，但这样做没有太大好处。为了我们的目的，只须以分析的客观性为共同尺度，对比几种暗示程序。偏离客观性最极端的形式，通常根本不被视为暗示方法；但

它无疑属于暗示程序，而且会产生十分明确的结果。这就是全科医生或咨询医生采用的“忽视”结合“反向刺激”的方法（8）。

心理真理甚至不只是被推到一旁，而是遭到彻底忽视。不过，医生无疑受到自己对反刺激与吸引力的直觉理解所推动，会建议病人从事日常惯例以外的活动。他建议改变地点（休假）、身体习惯（娱乐、运动等）或者心智活动（轻松读物、歌舞杂耍等）。这里的倾向十分明显：医生在不知不觉中试图强化压抑机制（忽视），并明确调动反投注系统。因此，他建议休假、打高尔夫或听音乐会，就是在促成替代性症状形成。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强迫型症状。病人必须做或想某种新东西——强迫仪式或思想——或者采用某种反向吸引物——反投注、取消、抵消或赎罪。这套反投注系统无疑有助于总体操作成功，但压抑要素也很重要。医生通过展示自己的压抑能力鼓励病人。他实际是在说：“你看，我是瞎的；我不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你也照样做吧。”

下一组方法虽得到正式承认，却同前一种非正式类型没有多大差异。它包括正式的暗示或催眠暗示方法。这里的倾向同样彻底反对分析真理，但压抑方面没有那么突出。暗示者承认自己了解一点病人的处境，却命令或恳求病人忽视它——辅助压抑。病人能够而且将会好转，事实上已经好转，等等。为了弥补辅助系统固有的薄弱，暗示者会采用各种同样属于强迫型的程序——暗示或建议。兴趣必须转移到“另一种东西”上，而这种东西的性质同致病兴趣多少相反；当然，催眠程序中还总会残留魔法系统——手势和话语。

第三组方法的区别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心理真理或分析理解。人们向病人提出或详细说明在细节与准确度上不等的解释，随后再作直接或间接暗示。通过劝诫、说服或暗示，病人被引导去相信自己现

在已经、或现在应当摆脱症状；此外也可能加上、也可能不加上某种反向类型的辅助暗示。尽管细节各异，这些程序都可以归入同一个标题：伪分析暗示。事实上，尽管这种看法激起过强烈不满，分析家仍大胆地把一切伪弗洛伊德式分析说成在本质上是伪分析暗示。他们能看到的唯一区别，是程序第二或第三阶段没有公开提出暗示性建议。然而，由于负性移情完全没有得到分析，正性移情也只得到极少分析，医患之间存在一种密切关系，无须公开建议。尽管如此，大概为了万无一失，人们仍会施加大量间接的伦理、道德或理性主义影响。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由强大的移情权威支撑。这意味着，病人通过同暗示者分担罪疚、从暗示者的超我借取力量，使自己的自我接受一个新的替代产物。新的“治疗性症状建构”暂时已经变得同自我协调。[2]

此时，那位出于自身理由急于证明精神分析本身只是另一种暗示形式的批评者，也许会这样论证：如果早年分析家没有彻底揭露无意识内容，那么早期分析成功必定部分归因于情感意义上的暗示因素，而非言语意义上的暗示因素。我们或许还记得，对精神分析的旧指控是，分析解释属于“言语性”或观念成形秩序的伪装暗示。即使有显得冗长的危险，也必须澄清下面几点。分析始终试图尽可能彻底地解决正性与负性的分析情感联结；始终把自己的解释推到现有客观理解的最大限度。压抑因素——永远是未知量——确实可能处理过那些没有得到完整解释的心理建构，但分析始终尽最大努力松开压抑的束缚。同样可能的是，当解释不完整时，某些移置系统仍被留下来充当替代物或反投注；不过，分析始终努力阻止

[2] 这里我略去了对暗示过程中所涉动力学和地形学变化的详细描述。欧内斯特·琼斯在前面已经引用的文章中对此作了详尽说明。

一切已知的保护性移置。简言之，分析从不试图把移情维持为最终治疗手段；从未提供少于已知心理真理的东西；从未站在压抑、移置或合理化机制一边。精神分析澄清自己的立场以后，并不反击这项批评，而是提出一套暗示理论。它愿意同意，这项批评可能适用于糟糕分析、错误分析或伪分析；但又补充说，糟糕分析可以想见会是良好暗示，尽管在某些情形中，它甚至对这一点也有所疑虑。例如，激起受压抑的施虐内容，随后没有充分分析罪疚反应，便撤去移置的支撑，始终是一种糟糕分析。提供新的或经过强化的移置替代物，并支撑那些能够得到意识支持的撤回投注倾向，很可能始终是良好暗示。扰动深层罪疚，可以想见是一种糟糕暗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糟糕的伪分析暗示。伦理暗示和岔开路线之所以取得相当成功，大概不仅因为它们给病人的施虐反应又涂上一层合理化，也因为所建议的岔开路线活动，会充当无意识施虐形成物的强迫性“取消”。[3]

除了压抑与替代这两个因素以外，还必须考察第三项根本因素。如今，各种分析来源已经积累大量材料，表明心理功能归根到底一直以具体经验为尺度得到评价。知觉系统与概念系统的关系当然始终引起一些学术兴趣；但精神分析对此主题的贡献如此详尽而原创，以至于从一切实践目的看，它几乎成了精神分析的专属领域。对无意识而言，思想是一种实体，词语是一项行动，行动是一种思想。精神分析在这一一般系统中发现的复杂变体，取决于如下事实：在无意识的上层——如果容许我们使用这种宽泛的地形学术语——实体被看作具有不同的来源、属性与性质。系统地说，

[8] 里维埃夫人在私人通信中强调，无论评价分析方法还是暗示方法，都必须重视施虐因素。

实体的性质取决于形成这层特定心理组织时占优势的力比多与攻击性兴趣系统。

在口腔兴趣与攻击占优势的时期，整个世界都是乳房，其中的一切都是好奶或坏奶。在排泄兴趣与肛门性心理组织占优势的时期，整个世界都是肚子。在儿童期生殖器阶段，世界一时是生殖器泄殖腔，一时是阳具。这些主要系统相互重叠、彼此依赖，由此产生幻想形成物的繁多与多样。不过，有一个要素为所有阶段共有，因此在幻想的一切变体中都得到表象；它就是直接或反转的攻击性因素。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实体都是善意或恶意的、创造性或毁灭性的、好的或坏的。

精神分析家反复表明，只要心理警觉稍微放松，人便会公开把心灵说成身体器官。心灵是嘴；谈话是尿液或肠气；观念富饶而具有生育力。病人在放松警惕时会告诉我们，他们“怀着思想”。对移情幻想的分析已经相当详细地证明这一点。一项解释像阳具一样受到欢迎或怨恨、恐惧。分析家因为说话，也因为沉默而遭到责备；他们的评论被称作施虐攻击，沉默则被称作毫不留情的剥夺时期。简言之，分析在无意识中被看作婴儿处在世界之中或同世界对立的旧情境。解释是一种实体：好奶或坏奶、好的或坏的粪便或尿液——或者婴儿、阳具。它是最高父母的实体，友好或敌对；或者是婴儿的实体，在世界中友好或敌对地逗留以后，以友好或恶意形式返回。

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9），心灵的这种天生倾向，不仅对病人的客观性，而且对分析家的客观性，都是一块持久绊脚石。分析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不断测量并计入它；这种测量与揭示正是移情解释的本质。

无论以移情还是投射形式，它都在普遍观察到的分析恐惧中起很大作用。就在前几天，一位凭直觉理解象征、却没有直接或间接接触过分析程序的病人，在分析第一阶段表达了如下观点：词语其实是尿液，尿流是一种攻击工具；联想可以是敌意或友好的尿液；解释通常是友好的尿液，

但色情与施虐幻想十分重要的那些日子例外。联想不好时，尿液就是坏的；解释不好时，分析家正把坏尿液灌进病人；病人必须把它排出去，或者视情况由分析家把它取出。从预后角度看，这个病例的情形不太好，但材料完全是自发产生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心灵这种天生倾向是分析的持久绊脚石；但分析的绊脚石也许正是暗示的拱心石，至少是关键结构的一部分。从最早时期起，人们便对“实体”的意义有所觉察，而它已经潜入暗示理论：我们可以在有关“磁性流体”的古老信念中，也可以在伯恩海姆等人相当现代的“植入”理论——观念成形——中看到它。看起来合理的是，这些在各自时代显得科学的解释，是某种更原始“具体”观念形态的遥远衍生物；我们可以在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系统、偏执狂患者的妄想系统，以及——经过分析研究——神经症者的移情系统中研究这种观念形态。我们还记得，雅内把“梦游激情”或渴求比作成瘾者的渴求；欧内斯特·琼斯（3）则指出，它同有关酒精之意义的精神分析观念——亚伯拉罕——具有联系。那些已经失信或不充分的暗示理论，由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发挥作用。它们又向我们提供一条有关催眠与暗示关系性质的线索，也稍稍提示伪分析暗示的治疗界限。由言语或其他交流媒介象征的那种本质实体，必须是一种友好而具有治愈力的实体。它必须能够填补病人身心中的危险空间，能够温和驱逐病人身心中的危险实体，或者至少能够中和它们；在中和罪疚的过程中，它不

得唤起焦虑。例如，在精神剖腹手术期间，不能让癔症者在心理上怀孕。因此，伪分析暗示者最好在为罪疚施用暗示性鸦片以前先缓解焦虑，并应避开对施虐的分析。全科医生在其非正式而不自觉的暗示系统中为他树立了好榜样（8）。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后者不但站在压抑一边，灌输强迫性反投注策略，而且还迎合病人根本的偏执核心。他不知道病人的心灵出了什么问题，却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病人的肠道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于是用泻药或温和缓泻剂排出毒素，再用友好的补药和增强活力的补血剂善后。这样，他完全无须把心灵牵涉进来，就能处理病人偏执而危险的全能系统。那个公开试图以心灵处理心灵的暗示者应当记住，归根到底，他必须把暗示性干预奠基于一套“友好偏执”系统。暗示同真正分析的区别在这里再次显明：分析必须时刻揭示这套最深层的心理系统；关注病人焦虑反应的暗示者，却必定会利用它。

## 结论

暗示的运作还包含许多其他因素，分析已经或将会对此说出很多话；但就当前目的而言，无须讨论更多细节。考察分析中不确切解释的效应，会使我们关注一种可能性：对我们而言不完整的解释，对病人而言却是合适的移置。由于解释由分析家给出，它能够作为一套同自我协调的移置系统——替代产物、症状——发挥作用。把这一点应用于暗示方法的研究，我们便会看到，暗示技术随着它对不同防御机制的着重程度而变化。所有方法都依赖压抑机制，但在压抑的辅助机制方面，不同方法之间有十分明确的差异。一般来说，非分析性暗示类型完全同心理真理对立，并强调改变行为和思想，因而可以被看作“强迫性暗示系统”。伪分析类型虽然更接近真理，却仍离得足够远，能够通过把能量聚焦于一个移置来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称之为“恐

惧症秩序的癔症式暗示”。但最具原创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最大胆的技术家，是很少因自己的暗示专长获得承认的全科医生或咨询医生。他凭直觉试图同时处理病人的表层焦虑与最深层罪疚。他无意间成了纯粹的“癔症式暗示者”，因为他选择压抑，并默认把自己的压抑——无知——提供为榜样；然而，他对药物的使用又表明，他凭直觉理解到罪疚的更深核心，而这些核心在其他情形下会产生偏执。他扮演“友好迫害者”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说，他是最早那些魔法药理学家的直系后裔。

这些结论并不自称原创。人们早已认为，催眠表现代表一种诱发的癔症；拉多（5）也曾对宣泄法的情感释放现象提出类似看法。亚伯拉罕（4）认为，自我暗示状态是被诱发的强迫系统；当然，在分析期间诱发或发展出移情“神经症”，也被视为过程的组成部分。当前各种伪分析暗示类型尚未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既然心理治疗界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它们，现在正是赋予其更明确地位的时候。从移置角度看，它们试图利用的是一套恐惧症系统。治疗要成功，病人必须发展出一种同自我协调的恐惧症。我们可以把这种暗示看成一种顺势疗法：暗示者用病人自己的症状形成游戏来同他过招。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霍加斯出版社，1922年。
2. 费伦茨：《内摄与移情》，载《精神分析文集》，1916年。
3. 欧内斯特·琼斯：《暗示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自我暗示的性质》，载《精神分析论文集》，贝利耶、廷德尔与考克斯出版社。
4. 亚伯拉罕：《库埃自我控制法的精神分析札记》，《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26年，第7卷，第190—213页。

5. 拉多：《精神分析技术中的经济原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25年，第6卷，第35—44页。

6. 《诱发因素在神经症障碍中的意义》，英国精神分析学会1931年5月6日专题讨论会。

7. 格洛弗：《精神分析的技术》，《杂志增刊》第3号，1928年。

8. 格洛弗：《心理治疗者的心理学》，《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1929年，第9卷，第1—16页。

9. 格洛弗：《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导论》，《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0年，第11卷，第471—484页。

# 第27课 · 1958年6月25日

上一次，我们走到这样一个点：试图以同心方式开始标出

强迫症者的欲望星座。我曾预告，今天要在已经开始接近的内容内部继续讨论；

我当时谈到强迫症者那里要求的位置：他者很早便把这种要求感受为带着一种特殊而执拗的重音，因此极难忍受。另一方面，强迫症者毁灭他者欲望的需要，也已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论题，即某些幻想的功能。

在我选择作为基础的那位作者的工作中——这里与其说是论战意义上的批判，不如说是“系统分析”意义上的批判——

这种阳具幻想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具体说，在1950年《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2期、4—6月号的那篇文章中[注1]，作者专门考察了分析一例强迫性神经症时，阴茎嫉羡在女人那里取得的重要性。

> [注1] 莫里斯·布韦：《在女性强迫性神经症中意识到阴茎嫉羡的治疗影响》，《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14卷，1950年第2期，第215—243页；或见《著作集》第1卷，第49—73页，巴黎：帕约出版社，1967年。

当然，我教给你们的一切——尤其是阳具能指的重要性——不会证明作者夸大了这个要素的重要性。问题在于考察如何使用它；当然也不是玩一种轻松的小游戏，对一项本来就被说成尚未完成的治疗结局加以批评，从外部评判一项自己未曾进入的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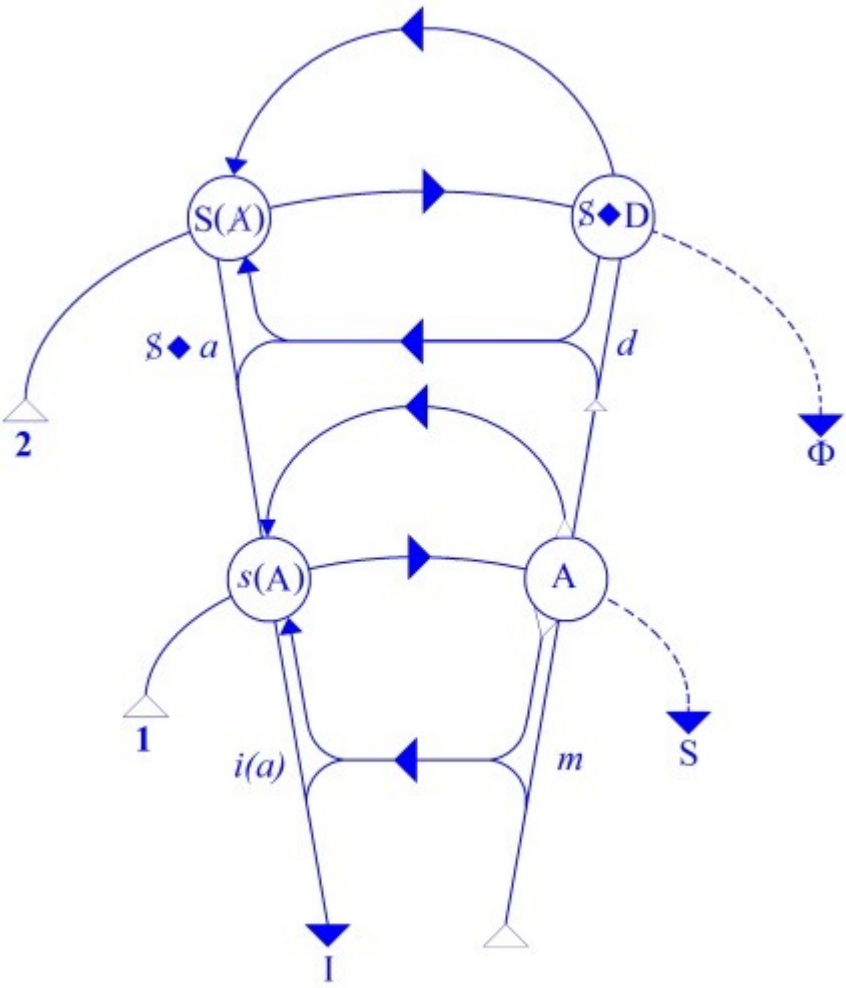
我只是从这份病例报告中向你们指出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要素：治疗方向的犹疑，乃至一种公然同我们看来合乎逻辑的方向相反的定向。我们这样做时，从来不是从病例报告本身——把它当作一串事实及其报告——出发，而是从作者本人的表述出发。我的意思是，从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出发；你们总能在恰当位置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表达。因为人的精神特性，尤其是常识，确实正如有人不无讽刺而又恰当地说过的，是“世上分配得最广的东西”［笛卡尔］。

毫无疑问，阻碍我们的东西也已经阻碍过那些作者的思想；而且，病例报告确实充分阐明了这些障碍。那里有种种疑问；我还要进一步说，

还有对悖论性结局、对所寻求之物没有获得出路的种种说明。最后，那里还有

一些矛盾；作者本人也许没有赋予它们可能具有的全部重要性，但它们无疑可以被称作矛盾，因为已经白纸黑字写进原文。

因此，为了着手阐明这项治疗的一般方向及其得到表述的方式，我们先来直击要害：确立下列差别——某种东西呈现为已经表述却不可被表述；人们所瞄准的东西同实际做出的事情之间又有差别。让我们从自己的图式出发，首先把它变成若干位置的场所；它把这些位置补足，也使我们能够在其中重新找到最熟悉的知识，只不过这些知识在那里按照某种次序和某种拓扑得到表象。


S(A)
S◆D
S◆a
d
2
Φ
s(A)
A
1
i(a)
m
S
I

让我们再问一次：这条能指线、即图式上方的线是什么？

- 我们说过，它是一条能指线，因为它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
- 另一方面，它既然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就恰好是主体无法表述、而我们必须帮助他表述的那类句子。

它在图式上位于哪里？我们如何理解它？

我们可以说，它所结构化的归根到底是神经症的整体。这里的神经症并不等同于一个客体、一种寄生物、一件异于主体人格的东西，恰恰等同于

主体的行动和行为中的全部分析结构。归根到底，随着我们对神经症的观念向前发展，我们已经觉察到，它不只是由

能指要素中的症状构成；这些症状可以被分解为该能指的所指效应——我正是这样教你们重新翻译弗洛伊德的阐述——，而且主体的整个人格也以某种方式带着这些结构关系的标记。

这远远超出“人格”这个词凭借自身带有的静态意味，

在第一种意义上引向的所谓性格。所涉的并不是性格，

而是这样一种人格：它在主体的行为以及同大他者和小他者的关系中勾勒出——

- 某种始终以同样方式重新出现的运动；
- 一种节拍；
- 某种从大他者通向小他者、再通向另一个小他者的过渡方式；它始终不断重新出现，构成强迫性行动的底色，或者说其调式。

这意味着，它是强迫性行为的整体；况且，癔症性行为也同样如此。

我们说它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并不是说在名为话语的已表述语言之外，还有某种囊括主体一切行动、同语言形成等价关系的东西，如同所谓一个动作姿态；因为动作姿态不只是一个界定清楚的动作，它还具有能指意义。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里涵盖的东西。

我们几乎可以采用一个恰好贴切的法语表达：une geste，也就是《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中的用法；“罗兰的武功传奇”就是他全部历史的总和。[注]归根到底，如果你们愿意，这是一则言说；神经症者全部行为的总和以某种方式呈现为一则言说，我甚至要说是一则充分言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充分言说的原初意义：它以话语的形式使主体

投入；它本身也是充分言说，却是密码学意义上完整的一则言说。主体不知道它的意义，尽管归根到底，他确实发出了这则言说——

> [注] 法语阳性名词 geste 指动作姿态，阴性名词 geste 则指英雄的功业或武功故事；拉康借同形词把个人行为同其全部生命叙事连接起来。

- 以他的全部存在；
- 以他显现的一切；
- 以他唤起并不可避免地沿某种完成道路实现的一切；若没有属于分析这种摆荡秩序的东西介入，这条道路也会是一条未完成的道路。

……因此，这是一则由这个被划杠的主体发出的言说；这个主体被自己划杠，我们称之为无意识。

我们正是用$\mathcal{S}$这个符号来表象它。这里所涉的正是这一点。归根到底，你们从我们正在作的这项区分中看到的，是我们把大写的他者界定为言说的场所：仅仅由于主体说话、使用言说，他者便被设立并勾勒出来；这个大写他者作为言说的场所而诞生。

这并不意味着，他由此就在其他异性中作为主体得到实现。每当存在言说，他者都会受到召唤。我想我无须再回到这一点；我已经强调得够多。那么，你们在这里看到、恰恰在图式上方线条中得到表述的这个彼方，归根到底就是他者的他者。

这则在他者本身的地平线上得到表述的言说，就是这里所涉的他者的他者。我们会说，这个他者的他者、也就是大他者的言说本身在其中得到勾勒的场所，没有理由对我们关闭。

这甚至是主体间关系本身的原则：这个作为言说场所的他者，会直接而实际地作为主体被给予我们，也就是作为把我们自己当作他的他者来思考的主体。这是一切策略的原则：同某人下棋时，你会赋予他同自己一样多的计算。

既然我们敢说，这个本应对我们最为透明、可以说连同他者维度一道给出的他者的他者，正是无意识话语得到表述的地方，正是某种已经得到表述、却无法由我们表述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这样说？什么使我们有权利这样做？

非常简单：由于人类生活的经验与条件，也就是人类生活卷入言说处境这一事实，我们凭借要求的处境服从这个他者；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要求对他而言是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如此晦暗？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把它们给出的东西表述出来，仍绝非无用。我们总是满足于用种种过早的客体化来遮暗它们。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他者怎样接纳自己的要求？换言之，在我们的策略中，他为什么会变成unbewußt、即无意识的，并实现其话语的这种悖论位置？

当我告诉你们"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时，意思正是这个：在他者的他者这一地平线上虚拟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者的言说产生在那里。只要他者的这则言说变成我们的无意识，也就是某种在我们内部使一个能够回答我们的他者临现的东西，事情便如此；因为我们在这个言说场所中使一个能够回答我们的他者活起来。

这正是他对我们晦暗的原因：他那里有某种我们不了解、把我们同他对自己要求的回答隔开的东西；这个东西无非就是他的欲望。

这足以使我们立刻觉察一件事：这项说明只是表面上显而易见；它的要点依据如下事实取得价值，即这个欲望恰恰位于这里［$d$］：

- 位于作为单纯言说场所的他者，
- 与作为血肉存在的他者之间；我们的要求能否得到满足，掌握在后者手中。

欲望位于这里，恰好制约了它同某种属于言说秩序之物的关系，也就是：

- 能指作用于主体本身的象征化；
- 这种归根到底造就我们所谓主体的东西，我们用这个$\mathcal{S}$来象征它。

它不同于一个纯粹而简单的自身；我的意思是，英语用一个雅致的词称作“self”的东西——用英语说出来、把它孤立出来，可以清楚地区分其含义——，也就是个体在世界中的这种在场所具有的不可还原部分。

这个东西才严格成为主体，而且成为我们象征意义上的被划杠主体，因为它受到那项使之从属的处境之标记。它不仅从属于作为言说场所的他者……这里的主体被界定为一个时刻：不是同世界的某种关系，不是眼睛同世界的关系，也不是作为知识关系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人类个体在言说处境中涌现的时刻……因此，如我告诉过你们，主体受

到他者的标记；不仅受到作为言说场所的他者标记，也因为这个他者自身受到这些言说条件的制约和标记。

那么，在这个由他者欲望的障碍弄得晦暗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什么？某种东西把这样受到标记的主体［$\$$］送回自己的要求，使他同要求建立某种关系［$\$ \diamond D$］；这里用上次我向你们解释的小菱形符号表示这项关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他者可以说不再应答。这里，大A不再应答——这句话用别的缩写也很有名。

在主体层面，地平线上趋向产生的，是主体同自身要求的这种对峙，是把主体送回自身要求；要求采取一些相对于主体可以说具有“包围性”的能指形式，而主体本人会成为这些能指的符号。正是在他者不回应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分析中勾勒出这些东西；因为从一开始，分析家首先无非作为言说场所出现，是一只倾听而不回应的耳朵。分析家归根到底会促使主体脱离并对立于某种经验向你们表明、作为底纹显现在其话语中的东西，也就是这些要求形式。它们以我们所谓“肛门期”“口腔期”等阶段的形式向我们显现——你们愿意怎样称呼都可以；但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谈到这些阶段时是什么意思？毕竟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体并没有在面前逐渐返回婴儿状态！我们不是在施行瑜伽师的法术。

照那样说，我们应当看到主体逆时间而上，最终缩成产生他的那粒种子！这里涉及的是能指。我们所谓“口腔期”“肛门期”，指的是主体怎样表述自己的要求：他的能指出现在其话语中——这里取最广意义，包括神经症在我们面前临现的全部方式——，而这些能指形成于其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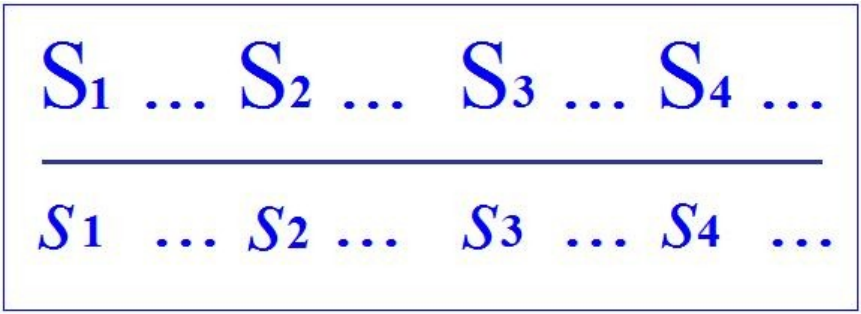
在较近或较早的阶段，正是这些能指帮助他表述自己的要求。

换言之，所谓固着，例如某种口腔性或其他形式的能指——以及你们已经学会阐明的一切细微差别——继续保持优势。这就是它的含义。某些能指系统保持了特殊重要性，这被称为退行。主体的话语一旦敞开，就重新触及这些能指；仅仅作为言说，即使没有特别要求什么，它也会在要求的维度中浮现。正因如此，

整个视角都逆向敞开于主体从最初、最稚嫩的童年起生活于其中的东西，即要求的处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处理这种退行；整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回应它，或者说明当我们不回应时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才是值得达到的目标。

顺带提醒你们：话语退行中所牵涉的能指，必须被我们看作处在话语本身的结构中；况且，我们始终正是在这两条线上发现它们：

- 能指序列；
- 始终按照能指链法则产生的意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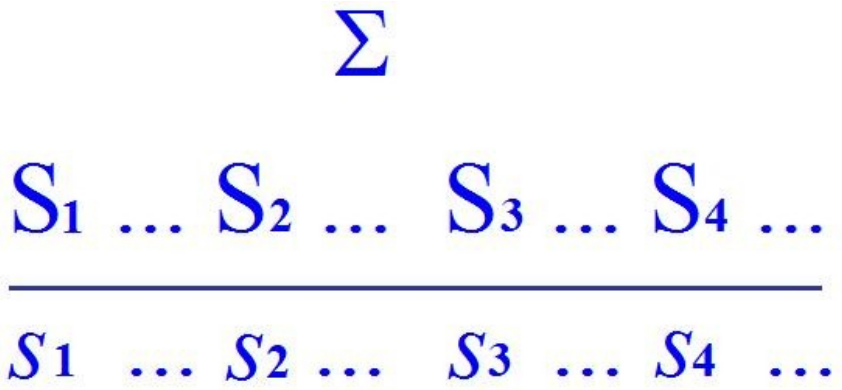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愿意，这两件事通过对能指序列的预期而彼此等价：每一条能指链都在面前开启自身完成的地平线；与此同时，当那个可以说使句子加倍的能指项自然到来以后，又通过回溯产生效应。因此，在所指层面发生的东西始终具有这种可以说回溯性的功能。

在$S_1$开始时，$S_2$已经勾勒出来；只有当$S_2$对$S_1$产生回溯作用时，它才完成。从能指到意指始终存在某种错位。正是这一点赋予一切意指——

由于它并非一种自然的意指，并不与主体那里需要之实例在一瞬间形成的草图相连——一种本质上换喻性的东西由此产生，也就是说，它始终同那种把能指链自身维系起来、并使之成为能指链的东西相连：这些联结、这些结点……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暂且可以为了区别而把它们称作某个Σ［西格玛］，也就是能指链之外的那个彼岸；我们试图把意指还原到这条能指链之中。



……这些恰恰就是我们在主体与要求的对峙中发现的能指，也就是在把他的话语还原为这些基本能指时发现的能指。凡是向我们唤起某种东西的材料中，我们都在底层辨认出这种还原；而这也正是我们经验的根基，是我们得以在主体的一切行为以及他向我们表达这些行为的方式中，重新发现同一些结构法则的根据。

有时，它甚至见于节奏切分，见于主体在动作层面衔接话语的方式；因为一次口吃、一次咿呀含混，或任何一种我曾在别处所说的言语磕绊，对我们来说都可能意指某种东西，而那从根本上属于要求的能指这一秩序——比如口腔性的或肛门性的欠缺。

由此，我们现在顺带已经可以构想什么呢？

问题确实正在这里。由“我最友善的同事”，也就是拉加什主持的一个小型研究组，曾带着惊讶发现这一点；这种惊讶必定源于某种持久的误解——

……这种误解使得凡是我们在法语中看到“本能”一词的地方——当人们回查德文原文时，这对该小组来说是个意外——都找不到别的词，只有Trieb，Trieb，也就是我们译作“驱力”的那个词。

说实在的，“驱力”这个译法反而使事情更晦暗。英语用的是drive；至于法语，鉴于Trieb的真正含义，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译它的词。

我会说，应当选用一个科学词汇，比如趋性（tropisme）。这个词专门用来指那些被视为不可抗拒、又不能还原为物理—化学吸引的因素，

也就是它们在动物行为中所施加的那类吸引。这样一个词恰好可以让我们驱除——

“本能”一词中总或多或少带有的目的论色彩。我会说，我们在弗洛伊德的Trieb概念中遇到的，归根结底也确属这一秩序。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用法语的“牵引（attirance）”来译它；我刚才谈到趋性时用过这个词。

不过要加上一项限定：这里所涉及的是某种把人类主体置于对某物的必然依赖之中的东西。我不能说人类不受那种晦暗的、群居形式的牵引支配，例如有机体朝向某种气候要素或其他性质的要素所受的牵引；但显然，我们这些人在分析所要求我们探索的领域里所关心的，并不在这里，

我们的兴趣并不是在这里展开的，

而是在那种自然使我们谈到“口腔期”“肛门期”“生殖器期”等等的东西中展开。

那么，我们看见了什么？在分析理论中，确实有某种必然性、某种关系，

它把主体置于从属、依赖、组织和牵引的关系中——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一些能指。这些能指取自哪里？取自他自身若干器官构成的音域、构成的能指库。说一个成年主体仍保留着“口腔性”或“肛门性”固着，无非就是说，他依赖于什么？依赖于某种想象性关系。

但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进一步衔接出来的是：这一点被提升到了能指的功能。倘若它没有作为能指被孤立、被僵化，它就不可能在主体那里产生它实际具有的那种经济作用，

理由非常简单：意象本身始终只同需要的激起或满足相联系；这点甚至——

我在适当场合从不忘记指出——

只要纯粹而简单地涉及需要，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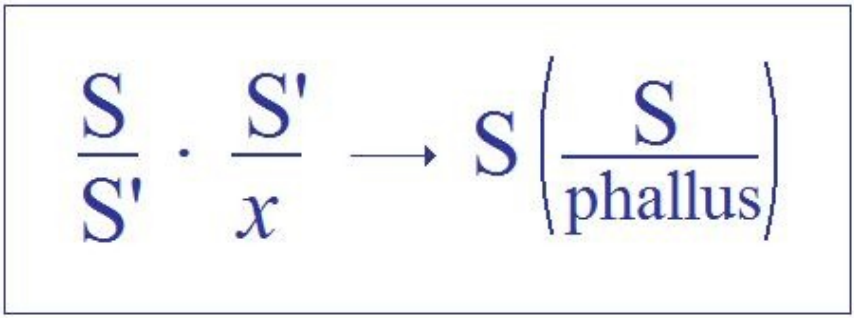
如果主体可以说脱离这些意象原有的文本而依附于它们——在并非食物问题之处依附于“口腔性”意象，在并非排泄物问题之处依附于“肛门性”意象——那么毕竟是因为这些意象取得了另一种功能。这里所涉及的是能指功能。驱力本身正是一种便于运用的概念表达；它对我们有效，是因为它表达了主体对某个能指的这种依赖。

重要的是这一点：作为要求彼岸而被遇见的主体欲望，既使主体对于我们的要求变得晦暗，也把他自己的话语确立为某种对我们的结构绝对必要、却在某些方面又令我们无法穿透的东西，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无意识话语。

因此，作为其条件的这一欲望，本身又服从某种能指效应的存在；从今年年初——我是说从一月起——我便以父亲隐喻之名向你们说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只要地平线上出现了父之名，而父之名自身是能

指链的支撑、是由能指链建立的秩序的支撑，那么事情才成立。唯有当这个隐喻建立起来时——这个隐喻所替代的是：

- 原初欲望，
- 晦暗的欲望，
- 幽暗的欲望，也就是母亲的欲望所代表的欲望，
- 某种起初对主体完全封闭的东西；而它之所以能够不再封闭，唯有凭借隐喻的公式。这个公式，我已经用两个能指之间的关系向你们符号化过；其中一个能指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父之名置于母亲的欲望之上［S/S'］，而母亲的欲望又置于它自身的符号化之上［S'/x］。

它作为所指所获得的规定，是由一种隐喻效应产生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父之名缺失之处，恰恰就不会产生这种隐喻效应：我无法使那种本应把x——也就是母亲的欲望——确切指认为阳具能指的东西显现出来［S(S/阳具)］。这正是精神病中发生的事，因为父之名遭到拒

斥；我是说，它成为一种原初拒斥（Verwerfung）的对象，没有进入能指循环。

也正因此，大他者的欲望——特别是母亲的欲望——没有在其中得到符号化。

如果我们要在这张图式上表现精神病的位置，这一点会使我们非常确切地说：这个欲望本身——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人人都知道，即使精神病患者的母亲也有欲望，尽管这并不总是那么确定——至少肯定没有在主体的系统中得到符号化。正因为它没有得到符号化，我们才得以看见我们实际看见的东西，

即对精神病主体而言，大他者的话语丝毫不会进入他的无意识。

大他者不停地对他说话——大他者作为言语的场所。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你或我；它大致意味着作为知觉场呈现给他的全部事物的总和。而这个场自然会向他谈论我们。随手举一个刚浮现在记忆里的著名例子：昨晚［……］提到，在谵妄中，一辆汽车的红色可能意味着他是不朽的。

一切都在对他说话，因为那种本应把大他者送回其应在之处——也就是送进主体无意识——的符号组织，在他那里丝毫没有实现。

因此可以说，大他者说话的方式与那种最初、最原始的言语——也就是要求——完全同质。正因为如此，一切都发出声音；对于神经症主体而言位于无意识中的“它在说话”，在精神病主体那里却位于外部。“它在说话”，而且“它大声说话”，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没有什么值

得惊讶。如果大他者是言语的场所，那么“它在说话”的地方正是那里，声音也从四面八方回荡。

当然，我们在精神病爆发之点遇见了它的极端情形；正如我一向向你们表述的，凡被拒斥（Verwerfung）的、被排除于符号界之外的东西，都会在实在界中重新出现。这里所涉及的这个实在，恰恰就是幻觉，也就是正在说话的大他者。当然，“它在说话”始终发生在大他者之中，但在这里它取得了实在的形式。精神病主体对此毫不怀疑：是大他者在对他说话，并且借助所有能指对他说话。

在人的世界里，只要弯下腰，便可以用铲子把这些能指一铲一铲捡起来。海报等等，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带着鲜明的能指性质。这种脱落、解体的程度会随精神病状态而有大有小。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以及弗洛伊德向我们表述为精神病组织和衔接自身的东西，恰恰都是为了补偿那个组织化位置上的缺失——我是说，从大他者欲望的能指结构向下展开的那个位置。

因为，精神病较为良性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除了——当然，在解体的极端状态中——一种纯粹的大他者话语之外，还能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以某种意指的形式加以切分。正如两年前我向你们展示的，那是某些极为奇特的言语分解；由于这里呈现给我们的结构本身——当时我还无法向你们展示这一点——它们必然显现为关于代码的讯息之代码：从A返回的东西，随后就是主体为使大他者的话语活起来所能动用的一切。

你们还记得施雷伯和他的基础语言：给予他的每一个词，其自身都包含一种定义，而这一定义随着这个词本身的结尾到来。这是一种关于代码的讯息之代码。反过来，还有这些句子：

- “事情是怎样……”
- “你只须……”
- “或许他会愿意……”；而且，“他会愿意”在这个句子里都已经是多余的。

但只有这些，也就是一系列只指向代码中与传信者有关之物的讯息——代码中的那些虚词、人称代词、助动词，标示着传信者的位置。这与这张图严格对应。我不想铺陈太多；你们会在我即将发表的精神病论文中看到这一点[注2]，我在那里把两年前的课程同今年向你们所讲的东西略作了综合。

> [注2] 雅克·拉康：《论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D'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载《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第4期，1958年；又见《文集》（Écrits），第531页。

我现在不想坚持这一点；在这方面，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像嫉妒妄想这样的东西——弗洛伊德本人把它表述为对主体的否定——显然正是如此。“我爱他”里的他，与其说是同性恋对象，不如说是相似者主体，也就是说，当然是作为相似者而具有同性性质的主体。弗洛伊德说：“爱他的不是我，而是她。”

这意味着什么？嫉妒妄想阻挡了言语和解释那种纯粹的放任爆发，而它试图恢复、重建的，恰恰就是大他者的欲望。

嫉妒妄想的结构，正是把某种欲望归于大他者；这种欲望是在想象界中略作勾勒的、属于主体自己的那种欲望。它被归于大他者："他爱的不是我——主体、情敌——而是我的配偶。"作为精神病主体，我试图在大他者中设立这个欲望；它恰好就是我没有获得的那项根本功能、根本关系，

- 因为我是精神病主体，
- 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那个赋予大他者欲望以原初能指的根本隐喻。这个能指叫作阳具能指；现在，我们将结合对这位女病人所做的事情，看看人们如何运用它。

不过，如果承认这个阳具能指相对于我们有时看到发挥同源作用的各种其他客体来说，是根本的、并且可以说享有优先地位，事情仍会颇为晦暗。例如，人们已经在阳具能指与排泄物能指之间、在阳具能指与乳房能指——更准确地说，是乳房的末端、一切哺育的对象——之间建立了等价关系。这些等价确实存在，也就是说，阳具能指向各种等价关系开放。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它的特权，我们可能很难察觉。

显而易见，是某种东西使它相对于另一项东西占据特定位置；后者

——

在个体与物种的关系中承担最高层级的功能，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生殖器期"。

当然如此；但正因为这样，它比其他客体更特别地依赖一种意指功能。因为其他客体——母亲的乳房，或者身体中以粪块形式呈现、可

能使主体遭遇某种根本丧失的那一部分——作为客体，在某种程度上都已在外部被给予。

可以说，它们是爱情交换中的货币；为了充当媒介，它们当然需要进入能指状态，但这终究有些像宝贝币——某些遥远部落恰好拿来充当交换物的贝壳。这毕竟已经属于自然秩序。

请注意，对于阳具，事情毕竟不完全相同。因为阳具在其真实的有机形式中，也就是阴茎，或者女人身上与之对应的东西，若要让主体把它变成一个客体，并且以幻想的或其他方式变成一个可以脱离的客体，所需要的加工毕竟远多于那些预先确定的客体。

我们无论怎样强调阉割情结或阴茎嫉羡（Penisneid）所包含的谜都不过分。这里所涉及的，毕竟确确实实是身体上的某种东西；然而，并没有什么东西使它比任何肢体——手臂或腿，甚至鼻子或耳朵——受到更多威胁。归根结底，这个要素在自身身体上起初不过是一个快感点。

主体最初就是这样发现它的。手淫的自身情欲活动确实在主体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但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这个器官本身尚未恰好卷入能指游戏，卷入——

父亲的约束，卷入母亲或父亲的禁止，这种活动自身就根本不会引发那样的灾难。

换言之，正因为这个器官最初对主体来说——只要主体仅同自身发生关系——无非是自身身体的一个快感点，它才肯定比那些在主体先前的要求中取得能指作用的其他要素更不容易脱落。

这个要素、他身体上的这个点、他同自身的有机关系，比其他任何要素都更必须被纳入一条隐喻链，特别是被纳入所谓父亲隐喻，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才能成为一个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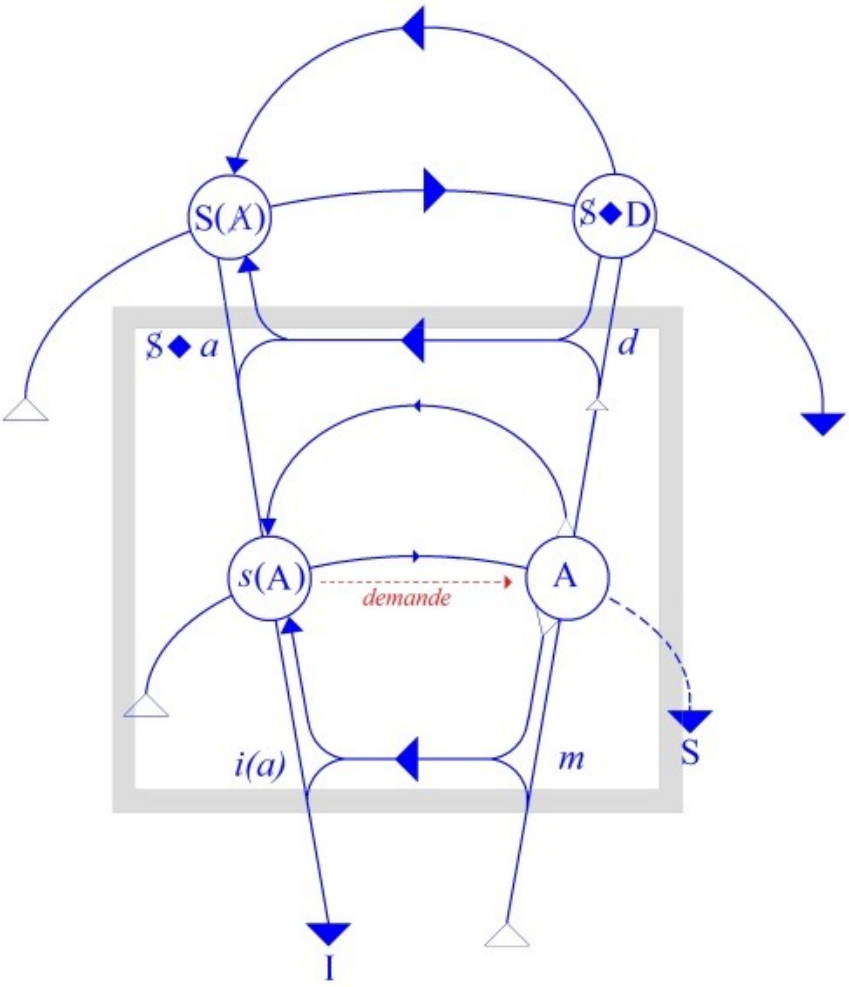
- 它由此成为主体同大他者的大他者之关系的一个完全享有特权的能指，
- 也由此成为无意识中完全居于中心的一个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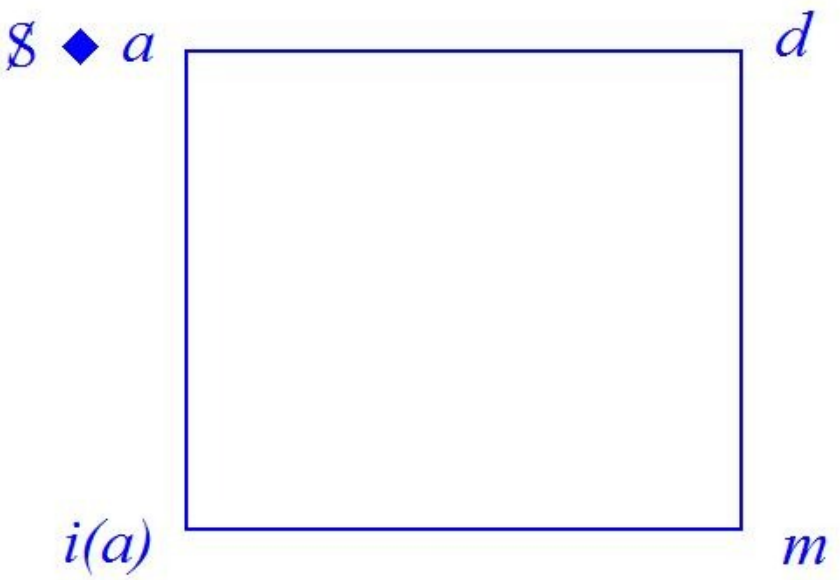
我们也由此把握到，分析围绕这个问题向我们开启的整个维度，相对于此前表述的一切，恰恰是某种崭新而完全出人意料的东西。如果我可以真正说清此处的意思，这恰好向我们表明：所涉之物起初不过是一个器官，而主体同它的关系却绝非天真无邪。不要忘记——

在与我们相近的猴类那里，你们只须到万塞讷动物园某个平台四周的小沟边走一趟，便会看见那群善良而勇猛的狒狒及其同类，整天如何心安理得地摆弄着鲜艳发亮的生殖器，丝毫不在乎邻居会怎样看；偶尔，它们还会彼此帮助，共享集体欢乐。我们若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这份安然上，可就错了。

你们毕竟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隔着怎样一个世界：一边，是某种体态多少直立的动物同垂在腹下之物的关系；另一边，是在人类这里，阳具——原初就是阳具、作为标记就是阳具——根本上成为膜拜对象。自远古起，它便因此与某种东西相联：使勃起本身成为一个能指的东西。它也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在非常古老的文化中，竖石之所以在人类共同体的集结中拥有全部能指作用和全部影响，绝不是没有缘故的。

因此，阳具的这一作用至关重要。它上升并涌现到能指地位——这种涌现当然不是原初的，而是依赖于另一种东西；任何把大他者欲望本身安置在某处的可能性，都将取决于阳具的这种隐喻性涌现，因为主体必须在大他者的欲望中找到自己欲望的位置。主体的欲望同大他者欲望相遇时所发生的种种偶然事故，恰好都发生在这个内部；因为主体必须在大他者欲望的层面上意指自己的欲望。十分自然，我们正会在那里看见阳具能指发挥作用。我们在这里给欲望的定义立下了四个方位点；就在这些点前面……


S(A)
$◆D
$◆a
d
s(A)
demande
A
i(a)
m
S
I




……我们将看到，主体必须展开什么……

主体被置于神经症主体所处的那些非典型的、异常的、有缺陷的、病理性的条件中，但终究仍处在一个完整的星座里，而不像精神病主体那样处在一个残缺的星座里。

我们已经说过，强迫症主体是在与大他者欲望的这种关系中，首先、原初地遇到驱力去融合的人。他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最初的出路、起始的出路——

也就是将制约他此后一切困难的出路——会是：这个大他者的欲望遭到取消。

如果我们充分赋予刚才所言以完整含义，这意味着什么？取消大他者的欲望，不等于因为父亲、父之名的能指隐喻行动匮乏、有缺陷，而无法把握大他者的欲望。

另一方面，在一种或多或少带有妄想性质的实在中，大他者的欲望已经被设立、得到符号化，甚至已经——

由阳具得到符号化，但它本身又遭到否定。强迫症主体与自身欲望的原初关系，建立在对大他者欲望的否定之上。Verneinung这个术语在这里适用；弗洛伊德恰恰向我们展示了它的两面：

- 这个欲望得到了衔接和符号化，
- 但其次，它又被加上了“不”这个符号。

这正是强迫症主体所面对的东西，是他位置的根基，也是他必须以替补和补偿公式来回应的位置。我在这里没有说什么新东西，只是加以运用：所有作者都提出过强迫症形成的三项结构：

- 取消，
- 隔离，
- 防御反应。

我正在重新为你们衔接的，正是这些。

请只须注意这一点：若要在主体层面谈论对任何东西的取消，所涉就必须是能指，因为非能指的东西根本无从取消。在动物层面上，我们

找不到丝毫可构想的取消痕迹；如果在那里发现了类似现象，我们就会说，那里出现了符号形成的萌芽。

但“取消”一词并不只是我曾在谈到抹除一条痕迹时所说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把某个基本的能指之物置于一道括号之下，括号里写着“此物不存在”。然而，正是在说“此物不存在”时，它仍把此物设立为能指。从根本上说，问题始终在能指：如果强迫症主体不得不取消如此之多的东西，那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得到表述的东西。

得到表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很清楚，那是一项要求，只不过是一项死亡要求。人人都知道，一项死亡要求——尤其在它很早出现时——会恰好摧毁大他者，首先摧毁大他者的欲望；当然，它在摧毁大他者的同时，也一并摧毁了主体自身得以衔接的一切。因此，主体更加必须把话语的不同部分隔离开来：有些部分能够保存，有些则必须绝对抹去和取消，否则主体本人也会一并遭到摧毁。

主体正陷在这种永不停歇的“是或不是”游戏中：他必须分离、筛选自己的言语乃至自己的要求之中哪些东西会摧毁他，哪些东西能保存他；还必须筛选哪些东西对于保存大他者本身绝对必要，因为大他者本身只存在于能指衔接的层面。

强迫症主体不断陷在这个矛盾中；你们也知道——

他始终忙于什么：恰恰忙于维持大他者，维持大他者的存续，以抵挡——

那些比任何人都更令他忙碌的语言表述；这些表述恰恰被设立在那里，以支撑大他者，支撑那个永远面临危险、随时可能在死亡要求之

下倒下和消亡的大他者；而这个大他者却又是他本人作为主体得以维持的根本条件。

如果这个大他者本身真的遭到取消，他本人就不可能继续作为主体存续。然而：

- 如果某种东西在能指层面上显得格外受到取消，也就是说，如果标示大他者欲望本身之位置的东西——即阳具——受到取消，
- 如果我上次向你们谈过、用来定位强迫症主体欲望的$d/(0)$，等价于对阳具的取消，那么我们很容易感到，一切确实都会围绕着同这个能指关系最为紧密的东西展开。

我正在向你们说明的，正是出现在以下两者之间的分界：

- 一种前后一贯的方法，它会把阳具作为能指的这一功能考虑在内；
- 另一种方法因为没有澄清这项功能，只能在主体那里阳具能指实际参与其中的某物周围摸索。

……差别正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费心阅读我指出的那篇论文，这也会成为你们的黄金规则，尽管这可能迫使你们大费周章——不过风险也许——

也没有那么大——向大学出版社索取那一期刊物。

这条规则可以让你们辨别：这种治疗操作以某种方式完成的事情，同另一种事情究竟有何不同。关键在于：一个主体同自身欲望之间已经完成的、完整的关系，在其基础和前提中包含什么？我已经告诉你

们：人类主体为了把自己承担为人类主体而不只是动物，也为了承担自己的生殖器欲望，必须把阳具能指的功能实现为自身欲望的根本能指。

正因为阳具能指处在这个回路中，处在主体无意识衔接的回路中，

人类主体才即使在性交时也能够是人。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主体偶尔不能像动物一样性交；那甚至是某种在一切人类主体希望的最深处微微摇曳的理想。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经常实现；有些人夸口说自己已经做到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们，不过这并不重要。对我们而言，经验已经很简单地向我们表明：它服从更大得多的困难，

而这些困难都是能指性的困难。

这也向你们解释了，例如，人们围绕以下问题不断产生的歧义：

- “在某一时刻，主体抵达的是生殖器阶段还是阳具阶段？”
- “儿童在潜伏期之前抵达生殖器阶段了吗，还是仅仅抵达了阳具阶段？”

  问题一直围绕这里打转。如果人们察觉，“阳具阶段”有时恰恰只意味着“抵达生殖器欲望的意指层面”，事情也许就不会那么晦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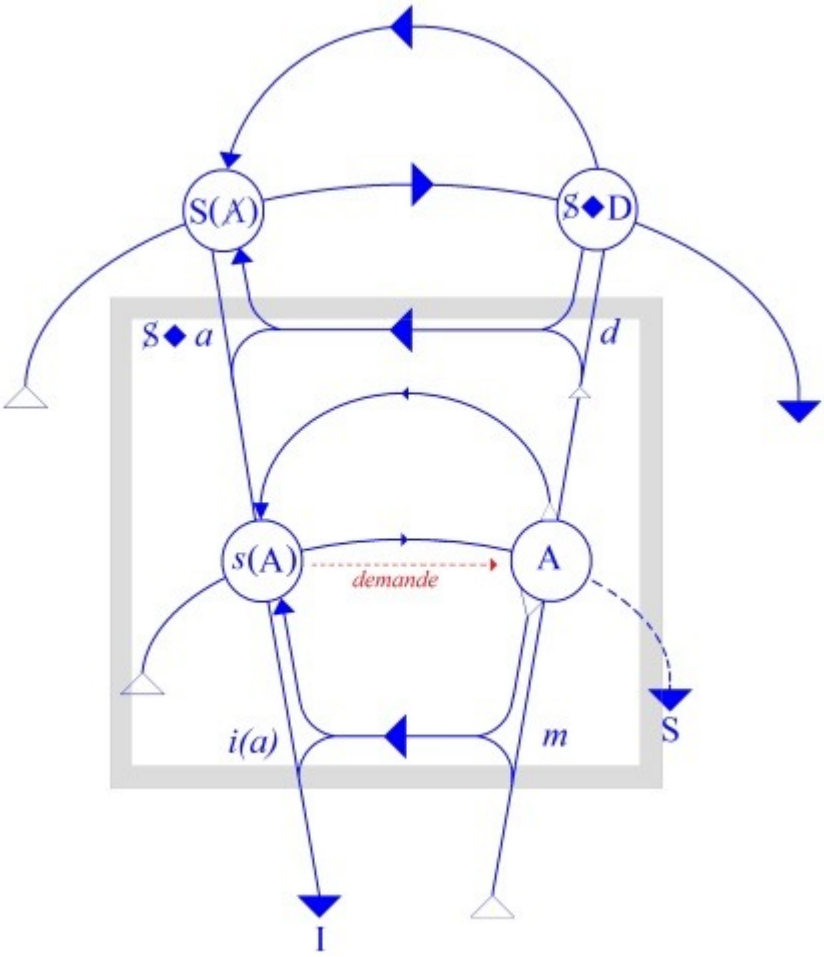
这两件事并不相同。最初，当人们说儿童只能抵达阳具阶段时，所说的很可能是一件真实的事；当然，关于自身情欲活动能否确切称作生殖器性的活动，人们仍可争论。归根结底，这也是真的。不过，至少对我们而言，真正重要并具有根本影响的，并不是自身情欲活动在生理上具有多少生殖器性质——它看来的确代表生理演化的第一次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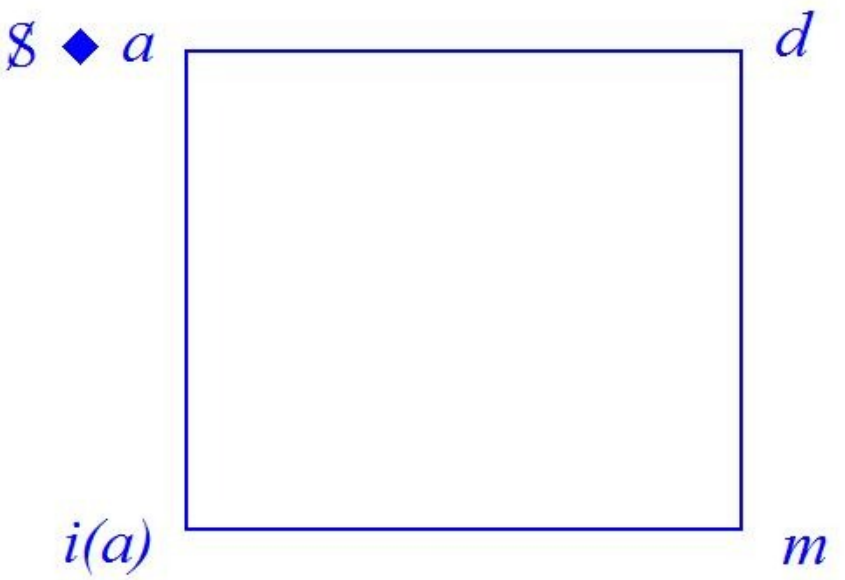
——而是它在阳具层面上的结构化；这才对神经症的后续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归根结底，所涉是什么？如果我告诉过你们的事情是真的，也就是说，在无意识层面上必须实现某种可以说等价于充实言说的东西——话语在大他者［A］的场所衔接，并作为一个所指［s(A)］返回主体，同时牵涉主体本身的自我［m］，也就是主体相对于小他者意象［i(a)］对自身所作的具体定位——那么，无意识衔接的任何完成都无非意味着这一点：这个回路从主体同自身要求的对峙出发，被表述为一个作为欲望得到衔接的、完整的、令主体满意的欲望；主体与这个欲望相同一，

而这个欲望最终抵达回路中的某个位置，恰好就是大他者的位置：

- 作为受到语言标记的人，
- 作为受到阉割情结自身戏剧标记的人，
- 作为真正的另一个我自己。


S(A)
S◆D
S◆a
d
s(A)
demande
A
i(a)
m
S
I




主体来到那里；我不会说他在那里把自己表述为“我与阳具相同一”，也不是“我就是阳具”，恰恰相反，而是：“我就在阳具在能指链、在能指衔接中占据的位置上。”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当到来）”的意义正在这里。只要主体被卷入能指的这一运动，他就必须终于理解：他很早便与之对峙的那个欲望能指，那个使母亲这一完整客体从他那里被抽离的阳具，他并不是它。但由于这个阳具占据某个位置，他又服从一种必然性：主体终于实现自己并不是阳具。从这里、也只有从这

里出发，他才能接受那个在各处都受到深刻质疑的过程，也就是弄清：

- 他是否拥有它，
- 而且当他拥有它时，是否接受拥有它；当他不拥有它时，是否接受不拥有它。

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在能指链底层的衔接中，在对主体同阳具之关系的澄清中——主体不是阳具，却必须来到阳具的位置——我们才可以构想一种理想的完成，正如弗洛伊德在“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中所表述的完成。

这正是我们确定干预与技术方向的必要条件；它将成为我明年研讨班的对象，我会把研讨班确切地称为《欲望及其解释》。

怎样才能抵达那里？哪些方向与指导原则能让我们看见通往这项最终讯息的路径？弗洛伊德的公式以其前苏格拉底式的铭文笔法，正是在这项讯息中得到衔接。

这将是我们明年试图衔接的对象。

一切不同于此的事情，一切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都是神经症——

或者演化中的任何其他异常形式——自发实现的东西：

- 神经症在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形中实现的东西；
- 同样，在癔症主体那里，处于深刻不确定状态的欲望位置，被她通过某种迂回固定下来；她描画这条迂回，是以那种使她能够定位自身自我的东西为模型。

癔症主体同一切主体一样，非常清楚，只有通过某种迂回，并且只要她相对于小他者意象把自己固定下来，她才能找到自身自我的位置，也就是欲望的位置。

可以说，她在更高层面上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取得这个位置：她必须同大他者［A］和大他者的所指［s(A)］分离、从那里绕开，从而把自己安置在某种理想类型、某个她与之认同的意象之中。同样是通过类似迂回——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朵拉才认同于K先生。如果主体是女人，她便由此找到那个自己力图定位的欲望之位置，也就是：一个阳痿的男人怎样可能欲望一个女人。朵拉的情形正是如此。

对强迫症主体而言，办法相同；不过，癔症主体是在理想、在认同的面具这一层面上试图定位其位置的困难，强迫症主体却反而把自己安置在可称为自身自我的要塞之处，试图从那里找到自身欲望的位置。正因如此，我才说，他也会在某处——全部经验都使我们知道这一点——建造我在别处谈过的那些著名的沃邦式防御工事。一个始终面临毁灭威胁的欲望就盘踞在这类堡垒中；强迫症主体以自身自我为模型建造它们，当然也是相对于小他者意象来建造。

同小他者意象的这种关系，确切地说就是在同小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找到这个阳具能指；它因为被纳入一项否定，始终面临毁灭威胁。例如，你们可以在我这里提及的那位作者的每一个病例报告中看见这一点：任何强迫症主体，无论男女，在其历史中的某个时刻都会出现对小他者——带小写a的小他者——的这种认同；那可以是一个相似者、伙伴、年龄稍长的兄弟，或同龄同伴。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主体眼中享有一种威望：他们比主体更有男子气概，是有力量的人。这里，阳具并非以其能指的、符号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想象的形式出现；它在一个比主体自身更强的意象、一个力量意象中充当想象性补充。

这不是我作出的表述；你们会在我引用的那篇论文中看见它得到明确表述。

这位作者把我引用的这些术语本身放在了醒目位置。那些对这些主体的经验给他们带来启发的人自己也承认，这是某种在功能上完全根本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重音落在小他者意象上，因为：

- 在想象层面上——这一次确实是在想象的意义上——阳具形式在其中得到强调和凸显；

- 在这里取得价值和功能的，不再是大他者欲望的符号化，而是那种想象性的威望、气派和优先地位关系；我们已经标示过它在自恋关系层面上的功能。

这正是强迫症状本身以及强迫症主体的历史中发生的东西，也正是它标示出——

主体本身在幻想中同这个作为其相似者的想象性小他者之关系所取得的特殊功能。

以下这项区分……

- 大写A的大他者之在场，
- 与小写a的小他者之在场……

这项区分在病例本身的演变中清晰可见。如果你们仔细阅读所涉那位女人的病例，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变化：从治疗开始时——

她不能说话，到后来她不愿说话。

因为一开始，被分析者同分析家的关系是在言语层面建立的；在这一层面上，她拒绝自己，分析家也非常清楚地察觉到她拒绝自己。他虽然不是这样表述的，但她的要求正因如此只能是一项死亡要求。当然，后来发生了别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分析家也确实察觉到其中存在差别：关系改善了，但她仍然不说话——现在，她是不愿说话。两者的差别在于：

一个人不愿说话，是因为大写A的大他者在场。

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如果她不能说话，那是因为来到这个大写A的大他者位置上的，恰好是分析家想尽办法使之亲临的小写a的小他者。

他想尽办法使小写a的小他者亲临。为什么？因为他终究循着事物留下的踪迹追索，并从主体带来的内容中看清了阳具幻想在其中所占的位置。当然，主体正是以此进行防御；分析家不断向她灌输，说她想成

为一个男人。这要看人们怎样理解。的确，在想象层面上，主体实际上把这个阳具变成了一个乳房；

男人的状态——作为拥有阳具、并且只因为拥有阳具的状态——代表着某种力量要素。真正需要弄清的，恰恰是她为什么如此需要这一参照，以及为什么如此需要恰好作为力量要素的阳具。

另一方面，她完全真诚地绝对否认自己有丝毫成为男人的欲望。但人们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我的意思是，人们例如用“攻击性”乃至“阉割男人的欲望”这类粗略术语来解释一些衔接复杂得多的事情；如果我们遵循正在尝试勾勒的路线，就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衔接这些事情。

治疗的全部演变和治疗的引导方式——解释与暗示之间的全部歧义正发生在这里——反而倾向于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指定这个术语，

姑且不采用别的说法；而且可以说，没有人怀疑那是另一回事。

作者本人在表述自己的行动时，已经相当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介入的是一位仁慈的母亲，是一个远比主体此前打过交道的那个小他者更加友善的小他者。按照作者本人在别处使用的公式，以大致相当于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说法，他对主体说：

>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这个阳具，你可以信赖作为男人的我；把它吸收进去吧，我准许你这样做。这个阳具会给你力量与活力，它会替你解决作为强迫症主体的一切困难。”

事实上，治疗结束时被当作结果给出的，逐字说来就是这一点：没有任何一种强迫症状真正消退；它们只是被承受着，却不再伴有任何罪疚感。

这与我正在告诉你们的内容严格吻合：这原本就应当是——

这种干预方式的正常结果。

反过来，正如我告诉你们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治疗以这样一件事结束：在治疗把女病人留在那个位置以后，她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分析家那里。这个行动的确相当惊人，因为据说，主体一生都对这个儿子怀着一种神圣的恐惧；从上下文、从分析家为此形成的视角和意象中，我们感到，她同这个儿子之间始终存在一个问题。这至少是我们可以说的。

那么，治疗结束时把这个儿子交给分析家，不正可以说是一个标记吗？它就像一次行动呈现（acting out），标示出恰好被错过的东西。

也就是说，正在这个中介点上，阳具完全不同于力量的配件；它真正是这样一种手段、这样一种中介：男人与女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借助它，在能指层面上得到符号化。

至于这个孩子，分析经验——我是说弗洛伊德对女人与父亲之关系的表述——不是已经向我们展示，要求父亲象征性赠予阳具的欲望，同

后来前来取代阳具的孩子之间存在等价吗？正因为这个孩子占据同一个位置……

- 这个位置没有在治疗中得到处理，
- 没有得到澄清；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位置……

正因为如此，主体才以一种违背自身意愿、当然也无意识，却又同分析中某种东西遭到错过时出现的行动呈现完全相同的方式表明：本应实现的是另一种东西。

治疗最终导致那种力量、善意的陶醉，导致近乎躁狂的陶醉；凡以想象性认同结束的治疗，这种陶醉通常都是其标志。归根结底，这是什么？

无非是这样一种办法：通过暗示性的赞许，让强迫症防御机制中原已存在的东西更加便利，并把它推向最终结论。可以说，解决办法来自一个如今成为好母亲的人的额外赞许——这位母亲允许主体把阳具吸收进去。

对于神经症的解决，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这样一种东西？它只不过在最后一项上设立了构成神经症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只是一个比其他症状更为成功、从其他症状中脱离出来的症状。

我认为，我们不能对此感到完全满意。我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就这项治疗说尽了一切可以说的东西。

今天，时间再一次追上了我们。至少到下次以前，我会从病例中选出三四个点，让我刚才试图向你们衔接的内容更加清楚、更加突出。随

后，我们会用几句话为今年的无意识的形成物作结，总结这一年走过的回路。

此后，我们只须等待明年，再投入一个新的阶段。

# 第28课 · 1958年7月2日

我们来到今年研讨班的终点；我把这一年置于无意识的形成物这个标题之下。现在，你们或许至少可以看出“形成物”这个标题何以恰当：形式、关系，或许还有拓扑学。我当初有自己的理由，不愿一开始就用这些词惊吓你们的耳朵。

我想，如果应当留下某种东西，作为一步、一级台阶——更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可以踩上去、让我们明年登上更高一级台阶的落脚点——那就是向你们表明：无意识机制确切构成了弗洛伊德经验和发现的基础；若只考虑那些被当作某种成熟进程之对象的紧张，而这个进程又在前生殖器与生殖器的扇面中展开，我们便无法衔接任何真正属于无意识机制的东西。这是一方面。

同样，我们也不能只考虑认同关系——这些关系在弗洛伊德著作的进程中表面上如此向我们呈现，我强调“表面上”——如果人们想把这种关系还原成某种——

人物集合，仿佛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角色；例如“母亲”“父亲”这些项会走到前台，或许再补上几个别的角色。

我想展示的是：无论在这种欲望固着的进程中，

还是在另一方面那种确实走到我们分析经验与关切最前台的主体间性中，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相对于某种东西来定位，就无法作出任何衔接；这个东西就是能指关系不仅施加于人的欲望、而且施加于主体本身的条件与必然关系。

正因如此，这一整年，我一直试图让你们熟悉这张“小图”。一段时间以来，我认为适宜把它投入使用，以支撑我的经验，区分一些东西。例如，且以这个随处可见的能指为例——它随处可见是有理由的：因为每当问题所涉并非随便某种意指，而是这样一种意指时，它就不可能不受到直接或间接的牵涉；这种意指明确由能指关系施加给有机体的条件所产生，而那个活的有机体已经成为言语的支撑、猎物，乃至牺牲品，它的名字就是人。

今天，我将重新谈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把你们带到阳具能指在一个确定病例中的这种——我愿称之为——多重在场的边缘。这个病例仍是同一个，就是最近几次课一直占据我们的病例。我只想指出，区分阳具能指在主体那里出现的不同位置，极其重要。

毫无疑问，说“在女性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中，意识到阴茎嫉羡至关重要”，说的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因为，如果在一次强迫性神经症分析中——无论病人是否为女性，乃至在任何神经症分析中——从来没有遇见阳具，那才真是非常奇怪。人们也许可以把分析强行推向某个方向，也就是所谓《今日精神分析》[注1]所表述的方向：把移情的幻想产物还原成所谓“如此简单的现实”，也就是分析情境——那里有两个人，当然同这些幻想毫无关系。

> [注1] 《今日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d’aujourd’hui），S. 纳赫特主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

等到人们把事情完全还原成这张图式时，或许就能在分析的解释中彻底不再需要阳具。但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到那里，因为这一切都只是一些不完整的表述；说实话，没有任何分析会按照那本书的图式进行。

显然，我们必须同这个阳具能指打交道；而说“意识到它是解决强迫性神经症的关键”，自然并没有说出多少东西。

因为一切当然都取决于：人们怎样解释它、定位它，以及在它出现的——

不同点上怎样理解它。而且，它在各个出现点上也不发挥同源的功能：这一切绝不能被还原成阴茎嫉羡，仿佛问题只是同男性竞争；然而，这个病例最后终究正是这样表述的，把病人同丈夫、同分析家以及同一般他人的关系都归入这种竞争，尽管病例本身已经证明这项说法不实。显然，阳具并非只从这个角度出现。它出现在多个点上。

当然，我们无意对这个病例作穷尽分析——它本来也被明确说成一项尚未结束的分析；另一方面，我们掌握的材料虽然不完整，却毕竟相当确实，足以让我们形成一个准确观念。我们就尝试做这件事。我首先想向你们作几点评论，由此为你们开启——

我们所使用的这张图的另一些性质。

这份病例报告中出现了一种东西：病人的强迫观念——例如宗教性的强迫观念——伴随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强迫性神经症中如此鲜明地出现罪疚感，可以说构成一种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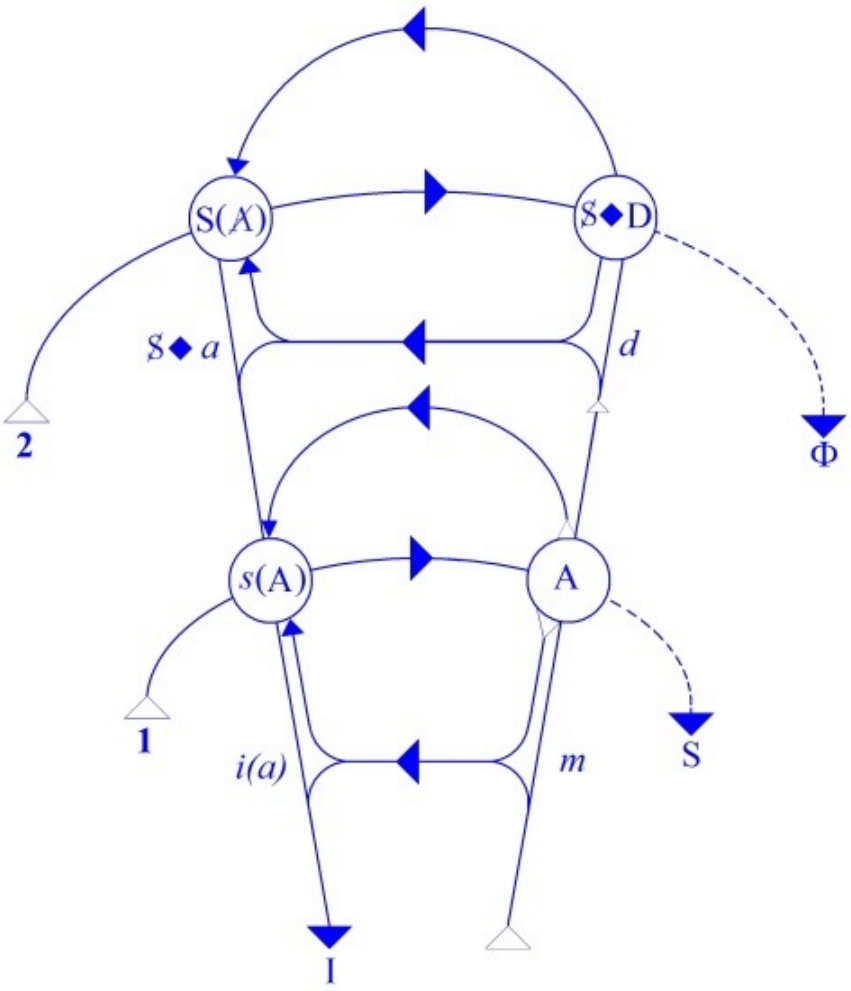
因为主体似乎完全可以把强加给自己的寄生性思想——事实上他也相应地这样做——看成某种对自己而言陌生的东西；他与其说是其责任人，不如说是其受害者。这也许会让我们尝试围绕这种罪疚感衔接出某些东西。

总之，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几乎只谈“超我”这个词；它在这里仿佛把一切都覆盖了。我们实在不能说，它由此澄清了多少东西。因为说实话，只要你们仔细观察，并十分确切地考察“超我作为一种形成物，比人们最初设想的古老得多、原始得多”这个观念带来了什么，就会看见——

人们起初确实认为，可以把超我看作两个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相应产生的造物；直截了当地说，正如人们曾写过的，它是俄狄浦斯情结中那个被视为最具禁止作用的人物，也就是父亲形象的内摄。你们知道，全部经验都迫使我们表明，还存在一个更古老的超我。你们会看见，某种从一些方面迫使我们承认这种更古老起源的东西，并非无关于：

- 一方面的内摄效应，
- 另一方面的禁止效应。

但我们还是尽量仔细观察。这里有一例强迫性神经症；如同面对任何神经症，我们首先必须使什么显现出来？由于我们并非催眠师，不是通过暗示治疗，我们便可以说是在更远处的某一点同主体约定会面。




就在这里由第二条线、上方那条线［2］表示的点上——如果你们愿意，它是能指衔接的地平线——主体由此同自身的要求对峙；正如上次我向你们详细说明的。

当我们谈到退行与相继认同彼此交替的过程时，它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东西。这两者之所以交替，是因为主体在退行中每遇到一次认同，都会在退行的道路上停住。整个退行归根结底都写在那项回溯性的开启中：只要主体简单地衔接自己的言语，这项开启便向他打开；也就是说，只要言语使一切积欠与全部历史浮现，直至这项要求的起源——主体作为言说者的全部生命都嵌入了这项要求。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而且只须重新找到人们围绕强迫性神经症一向表述的东西，就会发现：强迫性神经症有一种根本形式，存在于这项要求中，存在于主体一切要求的地平线上。恰恰最为阻碍他衔接——

这项要求的，是经验教你们称作“攻击性”的东西；它日益把我们引向对所谓“死亡愿望”的考察和把握。

强迫症主体的要求撞上、碎裂、分散并失去衔接的最初困难、重大困难——

也就是促使一切防御积聚起来的困难——首先见于严重强迫症主体经常旷日持久的沉默；在分析过程中，你们有时费尽力气也无法克服这种沉默。我在这里提起它，是因为作为我依据的病例恰好向我们提到这一点：这项要求正是一项死亡要求。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点绝对明摆着，在整份病例中反复出现，却从未得到确切衔接。仿佛它只是某种紧张的自然表达；然而，死亡要求同衔接困难本身之间的关系，就潜藏在这项紧张的底层。衔接困难明明也在同几页、只隔几行的地方得到标注，却从未受到任何突出。

然而，这不正是某种要求我们停下来考察的东西吗？如果这项要求是一项死亡要求，如果它勾勒出强迫症主体要求的地平线，

那是因为，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教导我们的，主体同大他者的最初关系，本质上由这个矛盾构成：一项要求被送向一切所依赖的大他者，

但它最终抵达的地平线——其原因在这个时刻仍挂在问号的衣钩上……

因为我们不应匆忙；稍后会看到，为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构想这一点。

同梅兰妮·克莱因夫人一起谈论“原初攻击驱力”，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从那里出发，我们就在这个婴儿身上读出某种原初的恶意；萨德侯爵向我们强调，这个婴儿最初的动作，归根结底就是——如果他能够——咬噬并撕碎母亲的乳房。

诚然，欲望问题在其根本倒错中的这项衔接，确实把我们带回“神圣侯爵”的地平线，而且并非徒然。你们知道，在他的时代，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以如此强烈而尖锐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的人：

欲望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究竟存在怎样一种根本的“和谐”或“不和谐”？这构成了一种激情追问的底层，而这项追问同整个所谓的启蒙运动（Aufklärung）哲学绝对不可分离。它承载着当时全部［……］文学。在较早的研讨班——我想到最初几次研讨班——中，我曾以此为

支点，指出一种类比；明年谈到欲望时，我还会回到这项类比：最初的追问与对界限的追问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这既涉及：

- 它的哲学明晰性［参见Aufklärung］，
- 也涉及伴随它的一切，涉及作为其绝对不可或缺之相关项的全部文学色情主题。

……因此，我们并不知道这项死亡要求来自哪里。在断言它从最原初的本能、从一种转而反对自身的自然中涌现以前，让我们先把它定位在它实际所在之处：我不会说它在那里得到衔接，而会说，它在那里阻止主体要求的一切衔接。它阻碍强迫症主体的话语——无论他独自面对自己，还是刚开始分析、处在本案分析家向我们描述的那种无所适从中。也就是，被分析者在分析开始时仿佛无法说话；这种不可能只转化为指责，甚至侮辱，乃至铺陈和说出一切阻碍女病人同医生说话的东西：

“我很了解医生，知道他们私下会嘲笑自己的病人［……］您的学问比我多［……］一个女人不可能同男人说话［……］”［《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50年，第221页。］

这是一场洪水。它只表明，言语活动一出现，衔接上的困难也相应涌现。仅仅进入分析治疗的场域这一事实，便已经包含一项要求；无论如何，任何东西一旦能在地平线上唤起这项要求的底层，立即呈现出来的就是这里这种困难。

如果这项死亡要求位于我们安置它的地方，也就是言语的这一地平线，位于构成言语的一切可能衔接之底层的牵连中；如果正是它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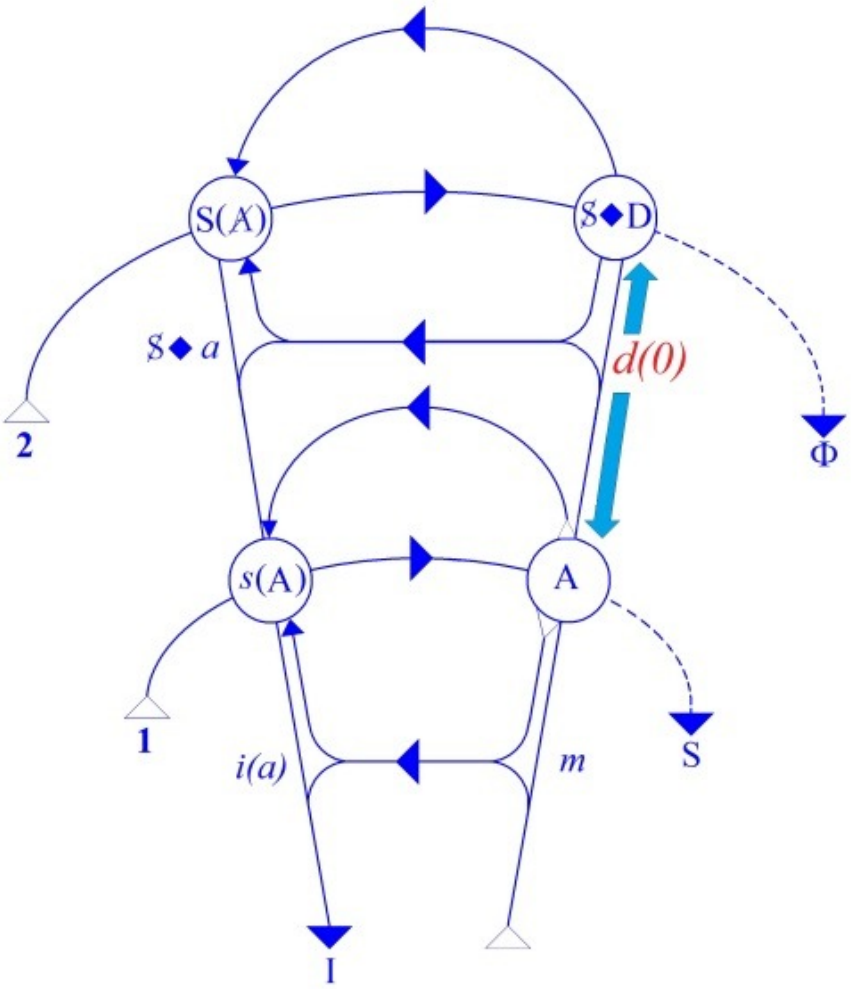
阻碍，那么我想，这张图式也许会更加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们也可以作出下面这项逻辑衔接，但思想不能没有几次——

悬置或停顿。倘若死亡要求对强迫症主体而言代表这样一种死胡同，由此产生人们不恰当地称作矛盾情感的东西——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摇摆或跷跷板运动，强迫症主体在两个尽头之间被来回抛送，仿佛陷入一条无法退出的死胡同；倘若这项死亡要求确实如图式所示，必须在大他者的场所、在大他者的话语中得到表述，

- 那就不只是因为某段涉及任何事物的历史，例如母亲因某种受挫而成为这项死亡愿望的对象；

- 根本上并且从内部来说，死亡要求之所以涉及这个大他者，是因为大他者是要求的场所；因此，死亡要求意味着要求之死。

在强迫症主体那里——也就是在依照能指衔接法则组织起来的主体那里——死亡要求若不同时带来我们在此称作要求之死的那种毁灭，就无法维持。它注定陷入这种无休止的摇摆：它的衔接刚刚形成草图，这项衔接就熄灭了。这正是强迫症主体的位置难以得到衔接的根本原因。


S(A)
S◆D
S◆a
d(0)
2
Φ
s(A)
A
1
i(a)
m
S
I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在以下两者之间：

- 强迫症主体同自身要求的关系［S ◊ D］，
- 以及他如此恐慌地需要、但也维持着他的大他者之存续［A］——没有这种存续，他就会成为强迫症主体以外的某种东西——

我们发现了这个自身已经受到取消、位置却被维持的欲望［d(0)］。我们以一项否定（Verneinung）刻画这个欲望，因为它得到了表达，却采取否定形式；在分析中，我们也确实看见它以这种形式出现。

当被分析者告诉我们："倒不是说我在想某件这样的或那样的事情"，并向我们衔接出一个针对我们的攻击性、不赞同或贬低性欲望时，他实际显现的确实是自身的欲望；但他只能这样显现它——这正是有关否定（Verneinung）的经验给予我们的事实——也就是在遭到否认的底色上显现它。

可是，既然这种形式已经遭到否认，它为何仍然相应伴随着一种罪疚感？

它归根结底不是被否认了吗？

我相信，我们的图式可以让我们在这里作出一些日后仍会用到的区分。随着我们有关超我这一审级的经验不断扩展，围绕超我作用产生了不少晦暗；我认为它们最根本地源于这样一点：就罪疚而言，应当区分主体同法则的关系，与罪疚本身的诞生——罪疚的诞生并不需要任何对这项法则的参照。这正是分析经验带给我们的事实。

换言之，自圣保罗的话向我们表述以来，“罪”同法则之关系的辩证法中那一步可以说“天真”的推论，是：“法则造就罪”。由此似乎会得出——我曾有一段时间引用老卡拉马佐夫的话并对此加以强调——“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被允许”。

但经验带给我们的事实完全清楚——只有分析才能把它带给我们，这自然也是最为奇异的事情之一：人根本不需要参照上帝，也不需要参照上帝的法则，就会真正浸泡在罪疚之中。甚至似乎可以作出相反的表述：“如果上帝死了——正如人们所说——那么任何事情都不再被允许。”我过去已经讲过这一切。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尝试理解并衔接这种在神经症主体生活中以“罪疚感”之名涌现的关系？让我们回到分析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最初几步。弗洛伊德最早在哪个问题上使它显现为根本之物，使它关涉主体的一项根本主体性表现？是在俄狄浦斯情结问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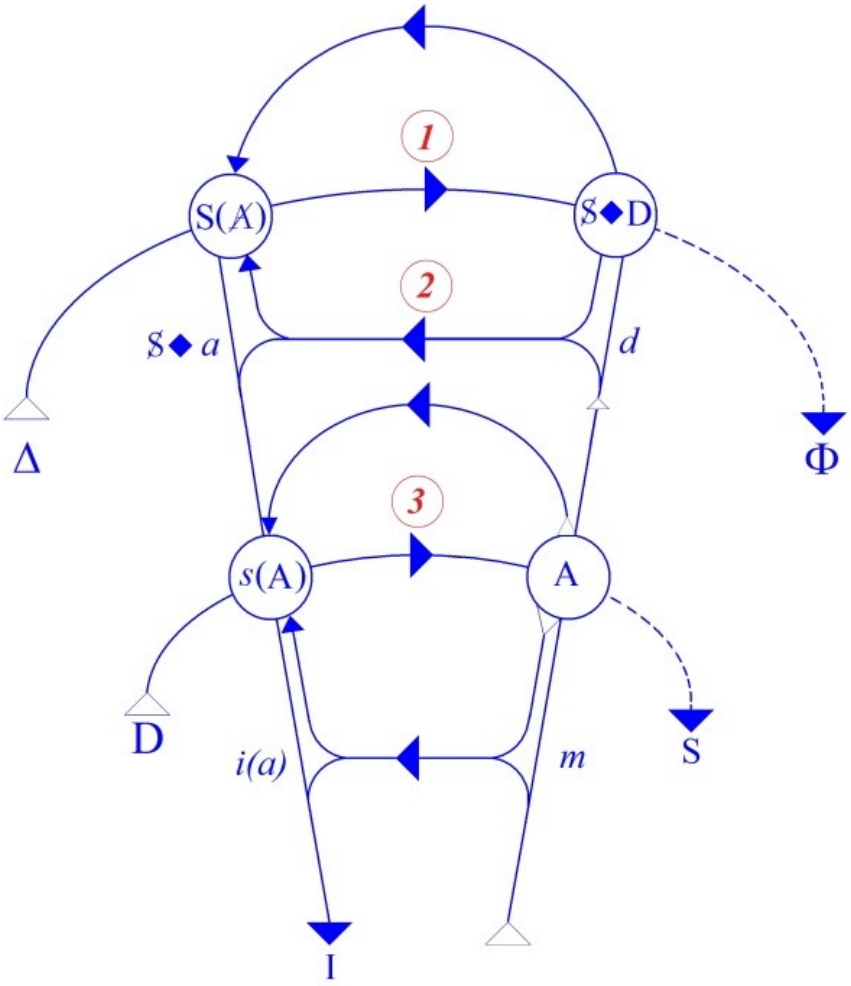
十分确切地说，只要分析的内容使什么向我们涌现出来？

- 一项并非随便什么欲望、此前一直深深隐藏的欲望——对母亲的欲望——的关系；
- 它同什么发生关系？同一个父亲人物的介入；这个父亲在对俄狄浦斯情结最初的把握中，作为毁灭者涌现。

而这位父亲，特别以阉割幻想最初给出的那些情结的形式介入……

这同样是分析的发现；分析以前，人们对此毫无猜测。我相信，今年我已经向你们衔接了它同一种必然不可思议性之间的联系……

若非阳具确切发挥这样的作用，这项发现便不可思议：阳具被提升至意指，作为能指来意指一个意象，一个享有特权、关乎生命的意象，也就是阳具意象。但在这里，它取得这样一种东西的功能：标记禁止击中欲望时的那种影响和冲击［$\underset{\rightarrow}{\ }$ d(0)］。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区分与这里图示的1、2、3严格对应的三个阶段——我们经验中一切涉及超我的东西都必须在这些阶段中得到衔接——那么我们会说：在这条地平线上，也就是在神经症主体那里恰恰没有得到表述的那条线上——他之所以是神经症主体，正因为如此——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命令。你们可以随意称呼它，偶尔称作十诫又有何不可？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十诫很可能就是——

作为言语法则的那些诫命；从十诫不再得到遵守的时刻起，各种失序便开始进入言语的运作。

让我们在这里采用它们的任意一种形式。所涉是死亡要求；显然，正是“不可杀人”处在地平线上，使之成为一出戏剧。但你们也看得出，命令之所以实际产生冲击，并不是因为某种作为回应占据此处、用以惩罚杀人者的东西。

十分确切地说，是因为死亡要求——出于同大他者对人所具有的结构相关的原因——等价于要求之死。这就是命令的层面。这个命令层面确实存在，而且存在得如此充分，以至于它会涌现，独自涌现出来。

不要忘记，如果你们阅读弗洛伊德为那例强迫症主体——鼠人——所作的笔记，他会告诉你们……我说的是《标准版》刊载的补编；这份非常精彩的补充让我们在笔记中看见若干年代顺序的要素，至今仍极值得了解……他会告诉你们，主体最先作为强迫内容向他谈到的，是自己所收到的命令。

你们知道，主体所收到的这些命令有多么重要：

“你要在某个日期以前通过考试……”

或者：

“他说，如果我收到这样一道命令，会发生什么：‘你要割断自己的喉咙’？”

你们也知道，当这道命令浮现在他脑海时，他陷入了怎样的恐慌：“你要割断那个老太太的喉咙。”当时，正是这位老太太把他的女友留在远离他的地方。我们还看见这些命令出现在另一种语境中，而且在精神病主体那里表现得最为清楚；你们知道——

他们会收到这些命令，而对精神病主体进行分类时，一项牢固的判断点正是——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这些命令。总之，主体同——

命令之言语关系的地平线上，这项功能的自主性只能被我们视为根本性的东西。

因此，这项命令可以保持被遮蔽的状态。在我们的强迫症主体那里，它受到遮蔽、支离破碎，只以片段出现。

那么，我们要把罪疚放在哪里？按照拉帕利斯先生式的说法，罪疚就是一项“被感受为遭到禁止的”要求。说实话，我们通常很容易在这里感到——而我要说，“禁止”一词把一切都淹没了；要求这个观念仍遭回避，因为两者看似合在一起。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是否真的合一，并不确定。这里有一种东西，我请你们在现象学上记住它的根本维度；竟没有任何分析家——甚至任何现象学家——提到它，实在令人惊讶。这项要求为什么“被感受为遭到禁止的”？

如果它纯粹而简单地因为人们所谓“不准这样做”，就被感受为遭到禁止，那么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在临床中，我们怎样看见它在那个我们惯于说罪疚介入的点上出现？我们为了衔接这里所涉之物，已经作出一些区分；这些区分也许会帮助我们衔接所谓神经症性罪疚。它由什么构成？事实是，人们终究没有把它本身衔接出来，也没有把它变成一项判据。然而，把它变成判据至关重要。

要求“被感受为遭到禁止的”。这里涉及一项要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罪疚感，因为某项要求采取了这样的迫近方式——它与弥散焦虑截然不同，你们知道，后者同一项要求相差何等之大。当“被感受为遭到禁止的”要求召唤罪疚感涌现时，这项要求之所以“被感受为遭到禁止的”，是因为它杀死了欲望。

事情发生在欲望与要求的关系中：凡朝向对要求作出某种表述的东西，都会伴随一项动力、一种机制；我们在黑板上的这张小图里看见其特征和画出的线索。但恰恰因为它在这张小图里，主体才无法感受和确定它的动力，也无法在其动力中亲历它。

因为主体注定始终处在这些位置中的某一个，却无法同时处在所有位置上：这就是罪疚。在其中，禁止出现了；这一次，它不是作为一种表述出现，而是因为它击中欲望，使欲望消失，杀死欲望。于是事情清楚了：由于强迫症主体不得不在欲望的层面 [2] 打响自己的救赎之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主体自主性之战——凡在这个欲望层面出现的东西，即使采取遭到否认的形式，也都同这种罪疚相连。

在它下方，也就是第三层面，我们在这个场合会把它称作超我的层面；没有人会反对这项定位。我们一直追随的《精神分析评论》病例

不知为何把它称作“女性超我”。为什么是“女性”？让我们称它为“母亲的”超我。

毕竟，在同一语域的其他所有文本中，它通常都被视为母亲的超我。这里有一个病例本身固有的异常；由于所涉被认为是阴茎嫉羡，是某种关乎女人本身的东西，这种观念竟产生了一种强迫式执念。

在这个母亲的超我、这个原始超我、这个与梅兰妮·克莱因所说的原初超我效应相连的超我中，所涉当然是某种东西；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人们可以说把它放在同命令层面发生的事情、同罪疚置于同一视角、同一瞄准线上。你们看，归根结底，它同大他者的大他者相连。［“父之名”，言语场所的拱顶石］

在第一个大他者的层面上——只要它纯粹而简单地支撑着最初的要求，支撑着可以说正在涌现的要求，支撑着需要最初那些啼哭般的衔接；如今，人们如此强调的最初受挫正处在这一层面——我们在那里有什么？

我们在那里有被称作依赖的东西；的确，母亲的超我的一切都围绕所谓依赖得到衔接。在这里，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把它置于同一语域，而不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套两层结构，必定已经存在于那里。如果起初只有“婴儿”和“母亲”，如果关系是二元的，那就会完全不同于我们围绕命令关系、围绕罪疚关系所衔接的东西。十分确切地说，正因为所涉是能指，我们才必须承认，要求的这两个地平线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

我曾这样向你们解释：即使在最原始的要求——对乳房的要求，以及母亲乳房所代表的客体——背后，也存在要求本身造成的一项分裂，

因为要求既是对爱的要求，也是绝对要求。这项要求把大他者本身符号化，因此区分出：

- 作为真实客体的小他者，它能够给予某种满足；
- 与作为符号客体的大他者，它给予或者拒绝，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在场”或“缺席”。这构成一副母模：处在一切要求的地平线上的那些根本关系，将在其中结晶；这些关系一方面叫作爱，另一方面叫作恨，当然还有无知。

最初的依赖关系之所以同一种叫作失去爱的威胁相连，

而不只是同一种叫作饥饿或丧失母亲照料的威胁相连，正因如此，它才是某种——

自身已经同后来从言语法则的视角得到组织和衔接的东西同质的东西。这些法则从第一次要求起就已经在此迫临、潜在存在并预先形成。它们尚未完成、尚未得到衔接，正因如此，婴儿不会从第一次吃奶起就成为强迫症主体；但从第一次吃奶起，他完全可能开始制造那道裂隙：他将在拒绝进食中找到自己向母亲伙伴索要的爱之证明。

换言之，我们可能很早就看见神经性厌食的表现出现。

什么使强迫症主体的病例具有特殊性？强迫症主体恰好被悬置于一种很早形成的东西，悬置于要求关系的这个地平线，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首先衔接为死亡要求的东西。死亡要求本身并非纯粹而简单的致死倾向；它是一项得到衔接的要求。而且，正因为它得到衔接，所以——

- 它不会在同小他者的这个关系层面上产生，
- 它并非二元关系，
- 它越过小他者，瞄准他的存在，瞄准他得到符号化的存在。

也正因如此，主体才会在它返回时［A → γ］感受并亲历它：主体既然是言说主体，而且只因为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击中大他者时不击中自己；死亡要求就是要求之死。我将称为“阳具能指的种种变迁”的一切，都将定位在这项结构内部。因为说实在的，一旦知道怎样阅读，我们实际看见阳具能指在强迫症主体的现象学中每一点重新涌现时，就无法不陷入震惊与惊讶。若不从根本上把阳具当作“能指作用于生命体之影响的能指”，并在这里找到这项功能的证实，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让我们构想阳具能指在不同症状层面上的这种“多重在场”；因为生命体同言语发生关系以后——

就注定分裂成形形色色的能指效应。

我们发现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受到阴茎嫉羡（Penisneid）支配。那也可以；但为什么我们在病例报告中最先遇见的事情却涉及她的强迫观念？报告最先引用的一项，是她强迫性地害怕自己感染了梅毒；据说，这使她反对长子结婚，尽管并未奏效。关于这个儿子，我已经向你们大谈过他在整份病例进程中取得的意指。于是，事情归根结底如此简单：我们最好始终把奇迹和戏法本身当作奇迹和戏法来

注意；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偶尔也要让自己的惊讶能力重新发亮，擦去它上面的尘垢。

我们在男性强迫症主体那里看见什么？害怕受到感染，也害怕传染别人。

日常经验向我们表明，这种恐惧何等重要。男性强迫症主体通常很早就受到有关所谓性病危险的启蒙；人人都知道，在许多病例中，这会在他的心理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我不是说它恒常存在，但我们习惯把它解释成某种——

远远超出事情本身合理性的东西；一如既往，它在黑格尔那里也存在。

近来，多亏一些药物干预，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但强迫症主体面对自己的冲动行为在力比多秩序中可能产生的一切，仍会表现得非常受强迫。我们习惯把它看作什么？

也就是：攻击冲动透过这项力比多冲动显现出来；阳具可以说——

是一种危险之物。如果我们只坚持主体对阳具处在一种可以说自恋式要求关系中的观念，便会发现很难说明这一点。为什么？

恰恰因为病人在这个层面上对阳具的运用，严格等价于一个男人对它的运用：这个女人借助儿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危险的人。她在这个场合把儿子作为自己的某种延伸交出来；因此，任何阴茎嫉羡都没有阻挡她。她以这个儿子的形式拥有阳具，确实拥有这个阳具，因为她会在儿子身上凝结出与一个男性病人在这种场合形成的同一种强迫观念。

至于随后那些杀婴强迫观念，乃至投毒等强迫观念，我不准备在这里没完没了地谈下去。我们可以说，病例中很快就会有某种东西，以其全部作用前来证实我们围绕这个问题提出的看法。我把它读出来，因为值得一读：

“她对母亲抱怨得如此激烈，恰好证明她对母亲怀着深厚感情。”［第219页］

报告这样告诉我们；此前，它围绕一种真正的俄狄浦斯关系是否可能兜了几个圈子，所搬出的论据却同问题完全无关。

“她认为母亲出身于比父亲更高的社会环境，断定母亲更加聪明；尤其令她着迷的，是母亲的精力、性格、决断力和权威。”［第219页］

这是一个段落的前半部分；它试图让我们看见某种无可争议地存在的东西，也就是父母关系的失衡：在一位首先可能颇具男子气概的母亲面前，父亲处在一种我愿称之为受压迫乃至压抑的位置。人们由此解释，为什么主体可以说要求阳具属性以某种名义同她自己相连。

“母亲偶尔放松下来的时刻，会使她充满难以言表的欢乐。但迄今为止，从未出现任何明确性欲化的占有母亲之欲望。”［第219页］

没有任何类似东西的痕迹。看看报告怎样表述：

> “勒内只在施虐受虐层面上同母亲相连。母女联盟在这里以极端严格的方式运作；任何违背盟约的行为都会引发极端猛烈的运动，而直到近来，这项运动从未得到客体化。任何插入这项结合的人，都会成为死亡愿望的对象……”［第219页］

这一点确实很重要，而且你们不会只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发现它。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见这类强大的母女纽带在分析经验中发挥作用，我们都在这种结点处再次面对某种超出区分的东西——我愿说，是超出不同存在者之间肉身区分的东西。这里所表达的，恰好是我刚才所谓的歧义、矛盾情感：它使死亡要求与要求之死彼此等价；此外，它还向我们表明，死亡要求就在这里——我并没有说什么新东西，因为弗洛伊德在适当场合已经非常清楚地察觉到它——也就是梅兰妮·克莱因夫人——

试图为我们追溯到主体“原初攻击驱力”的那项死亡要求。

但病例向我们表明，死亡要求并不只是把主体同母亲联结起来的纽带；它是母亲本人的要求。正因为母亲把这项死亡要求带在自身之中——整份——

病例都向我们表明这一点——她才对那个不幸的父亲人物施行死亡要求。这位父亲是一名宪兵准尉；病人起初谈到他的善良与亲切，但他一生始终悲伤、抑郁、沉默寡言，既无法克服母亲的僵硬，也无法战胜妻子对初恋的依恋——尽管那只是一段柏拉图式爱情。他心怀嫉妒，只有在提出某项诉求时才打破沉默，却总会从这项诉求中败下阵来。

当然，没有人怀疑母亲同这件事有关。有人告诉我们，应当从所谓“阉割型母亲”的角度和形式来翻译这一切。但在这个场合，也许有必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并看见归根结底，对于这个男人，“死亡要求”远比“阉割”或“被剥夺所爱客体”更为贴切——母亲看来曾经正是这个所爱客体。

而他进入这种抑郁位置的开端，正是弗洛伊德教我们辨认的、由指向自身的死亡愿望所规定的开端。但它指向自身时，瞄准的是什么？一个受到爱、又已经失去的客体。总之，死亡要求的辩证法已经存在于上一代；体现它的是母亲吗？

正是这项死亡要求在这里没有受到任何东西中介——但不是在主体层面，因为如果它在主体层面没有受到任何东西中介，如果没有那道归根结底允许这项要求出现在言语的地平线、而不是以其直接性出现的俄狄浦斯地平线，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不会是强迫症主体，而会是精神病主体。

然而，在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中，这项死亡要求对主体而言丝毫没有受到中介；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母亲尊重父亲，证明母亲把父亲置于权威和法则支撑的位置。主体感受并看见施行于母亲与父亲之间的这项死亡要求，是直接施行、直接显现的；父亲借助悲伤、近乎耳聋和抑郁，把攻击转而指向自己。

它完全不同于另一种可能涉及的死亡要求——这种要求始终见于任何主体间辩证法，并在法庭上得到表达：检察官说，“我请求判处死刑”。他不是向所涉主体本人提出这项要求，而是向作为法官的第三者提出；这就是正常的俄狄浦斯位置。

于是，主体的阴茎嫉羡——或者所谓的阴茎嫉羡——就是在这种语境中被带来发挥作用。我们在这里以这件危险武器的形式看见它。这意味着什么？

它在这里只是危险的能指；在这项要求的语境中，每一次欲望的涌现都显现出这项危险。这种能指性质，我们甚至会在主体某些强迫观念的细节中看见。

她最初的一项强迫观念十分精彩：她害怕自己会把别针放进父母的床里。为什么？为了扎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

这是阳具能指出现的第一个层面。它在这里是什么？它是作为危险欲望、罪疚欲望的能指。我觉得，这并不是它在另一个时刻出现时所发挥的同一种功能。而且，它也没有以同一种形式出现；不过，凡是我向你们展示过它的地方，它毕竟都以意象形式完全清楚地出现。在这里，它受到遮蔽。

它处在症状中，从别处到来，是一项幻想干扰；也就是说，对作为分析家的我们而言，它暗示了自身作为幻想存在的位置。

但我觉得，当这个阳具以完全不同的功能出现时，事情也不相同；也就是对主体而言，它可以说“投射”在圣体意象的前方时。

我已经提过主体心中充斥的这类亵渎性强迫观念。宗教生活以一种深受改造、受到症状渗透的形式出现在强迫症主体那里；而且，它——尤其是圣事生活——同强迫症主体的症状形成一种奇特的契合，仿佛特别适合给这些症状提供一条它们如此轻易便能流入的道路和沟槽。这毕竟尤其因为在基督教中……例如，我对穆斯林的强迫症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值得看看他们如何处理；我的意思是，应当看看，伊斯兰教信仰本身的结构在适当场合会让什么宗教仪式介入强迫症现象学……当然，在基督教中，人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每当弗洛伊

德遇见一个具有基督教教养的强迫症主体——无论鼠人还是狼人——他都清楚表明了宗教在其演变和经济中的重要性……

……人们毕竟不能看不到，基督教借助自己的信条，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实际上令人惊异、大胆——至少可以这样说，甚至堪称冒险——的解决办法面前：它让一个“神—人”、一个取得肉身的位格来承担这项功能；因为他就是圣言，所以它恰恰让他承担能指的功能，而我们正说，能指作用于生命本身的行动就在这项功能中得到标记。

基督教的λόγος［logos］作为取得肉身的λόγος［logos］，为人与言语关系的谜给出了确切解答；取得肉身的上帝被称作圣言，绝非偶然。主体正是在这项道成肉身始终得到更新的符号层面上，使——

阳具能指出现，并对她来说取而代之。阳具能指本身当然不属于宗教语境；但如果我们所说的是真的，看见它出现在这个位置，我们终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但当主体看见它出现在这个位置时，可以肯定，它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于我们最初看见人们加以解释之处。我认为，在病例后面某个点上，把阳具能指的功能解释成与它此前介入的角度同质，完全是一种滥用。例如，在症状层面上，病例进展到更后期时，主体向分析家讲述了这个幻想：

“我梦见自己用脚把基督的头踩碎了，而那颗头很像您的头。”

可以肯定，在这个时刻，阳具的功能在这里所认同的并非——如人们认为应该说的——作为阳具持有者的分析家；恰恰是在移情的这个层面上——

在移情历史的这个点上，分析家被认同为阳具。他被认同为那个此刻恰好为主体体现能指效应的人，体现她同言语之关系的人；在这一时刻，她因为——

若干放松效应的作用，开始把这项关系更多地投射出来。

在这个时刻用阴茎嫉羡的同一种方式来解释它，恰恰会错过让病人同自身处境中最深之物发生关系的机会。也就是察觉这样一种或许在很久以前便由她建立的关系：

- 一方面，是某个x之物，它从根本上激起了针对大他者的这项死亡要求、要求之死；

- 另一方面，是她对不可容忍的竞争最初形成的知觉，是这种竞争最初向她显现的形式；在这个病例中，也就是母亲对那段遥远爱情的欲望——它使母亲既从丈夫身边、也从孩子身边分心。

无论如何，阳具在这里反复出现在这个位置——因为后面还给出了第二个例子——这个事实绝不应受到忽视。这个位置必须处在大他者的能指本身的层面：大他者在那里受到触及、遭到划杠［A］，并与大他者对主体取得过的最深意指相同一。

另一方面，阳具又在分析的另一个时刻出现；这个时刻略晚，因为当时已有许多从这种角度把阳具带到光下的解释介入。也就是在一些梦里，病人把自己实现为一个阳具性存在——这是最常见的梦之一，可以说，在大多数神经症中都能观察到——她看见自己的一只乳房被一个阳具取代，甚至看见一个阳具位于两只乳房之间。这是人们能够遇

见的最常见的梦中幻想之一。在这个场合，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同人们所谓“拥有阳具的男性认同欲望”完全是另一回事。

实际上，人们作出这样的推测：如果她看见自己的乳房变成阴茎，她是否把原初针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攻击性转移到了男人的阴茎上？这只是一项推理行动。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观察这些形式在其既有形态中的极端扩展——众所周知，这些形式本身可能根本上是多阳具的——我的意思是，只要阳具不止一个，可以说，我们几乎就面对一个完全根本的意象。以弗所的狄安娜已经充分向我们展示它：她的整个身体仿佛由那种流泻而下的乳房构成。



下面就是这位病人所看见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它紧接最初两次尝试之后，而且也被视为对它们的证实，因为分析家当时已经把鞋同阳具等同起来：

“我让鞋匠修理自己的鞋，随后登上一个饰有蓝、白、红三色灯笼的台子；台上只有男人——母亲在人群中，赞赏地看着我。”［第225页］

我们在这里可以满足于谈论阴茎嫉羡吗？显而易见，这里同阳具的关系属于另一种秩序。这个梦本身表明，它同一种展示关系相连；她并不是在那些拥有阳具的人面前展示——同她一起站在台上的那些男人，蓝、白、红三色灯笼几乎不言自明地向我们唤起各种多少淫秽的背景——她是在母亲面前展示自己。换言之，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上次谈到的那种补偿性幻想关系：毫无疑问是一种力量关系，但这项力量是相对于作为第三者的母亲而言。

这正是在主体同相似者意象、同这个小他者、同身体意象的关系中，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事情。需要研究的，恰恰是这项幻想关系在主体平衡中的功能。如果把它纯粹而简单地解释、等同于阳具在其他点上的功能和显现，那么可以说，这同样证明解释的定向缺少判据。

因为归根结底，这份病例中分析家的所有干预都趋向什么？

趋向让她更容易意识到某种所谓对阴茎的欠缺或怀念本身；分析家使她的幻想更容易得到出路，把她集中到这个幻想本身，把它视为一种力量不足的幻想，尽管大多数事实都反对这项解释。

分析家把合法的阳具还给病人或主体时，究竟做了什么？人们改变了阳具对她的意义。

我的意思是，人们所做的事情大致相当于教会她爱自己的强迫观念；因为实际上，这正是报告向我们给出的治疗总结：强迫观念没有减少，只是病人不再因它们感到罪疚。这项结果由某种干预造成；干预

根本上以幻想的经纬为中心，把这个幻想赋值为同男人竞争的幻想，而它又仅凭一项假设，被认为是从某种针对母亲、根本未被触及的攻击性转移而来。它最终导致这一点：经由分析家的授权操作，强迫观念的经纬同那项根本的死亡要求彼此脱离。

但我要说，以这种方式操作——也就是归根结底使她的强迫观念合法化，因为解释一旦准许幻想，人们就只能把强迫观念整体合法化——结果便是：生殖器关系的强迫性就这样得到完成。我的意思是，一旦主体学会爱自己的强迫观念本身，只要正是这些观念被投注了她所遭遇之事的完整意指，我们便会在病例结尾看见各种无疑极为令人兴奋的直觉发展出来。

请你们自行参看，因为时间太晚，今天无法为你们朗读。不过，这一切显然完全带有那种自恋性情感奔涌的风格；有些人曾强调，它是分析结束时出现的一种现象。况且，作者对它也没有太多幻想：

他写道：“正向移情变得明确，带有强烈前生殖器化的俄狄浦斯特征……”

作者本人正是在一种深刻未完成的语调上作出结论；我必须说，他对于人们所谓真正生殖器性的解决，对于这项分析的出路，也几乎不抱幻想。

但报告似乎完全没有看见，事情恰恰同——

解释方式本身、同一种最终瞄准削减要求而非根本澄清要求的解释聚焦方式紧密相关。这在今天更加自相矛盾，因为人们终究惯于表明，

例如，对攻击性本身作出解释十分重要。或许，正因为这个术语过于含混，实践者才无法总在其中辨清方向；而——

若在德语中用“死亡要求”这个术语有利地取代它，人们就必须抵达主体对要求作出衔接的这个层面。

最后，既然我刚才提到某种叫作“诫命”的东西，也谈到了基督教，我想请你们注意一条并非最不神秘的诫命。我们不能把它称作一项道德，因为说实在的，它不是一条道德诫命；它恰恰是一条以认同为基础的诫命。基督教的表述在一切诫命的地平线上，以如下措辞提出它：

“你要爱邻人如同爱你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停下来想过，这句话包含什么。它会引来各种——

相当惊人的反对意见。首先，那些美丽灵魂会高呼：

- “像爱你自己一样！”——而且还会进一步说：
- “为什么只像爱你自己一样？这也太少了！”

另一方面，更有经验的人会想：

- “可是，归根结底，人真的爱自己吗？”

经验向我们证明，我们对自己怀有最为矛盾、最为奇特的情感。归根结底，参照一个“你自己”，仿佛突然以某种视角把自私置于核心，并

使它成为爱的尺度、模数和典范。这毕竟是最为出人意料的事情之一。我认为，说实在的，这些反对意见可以说完全有效；我们很容易通过无法以第一人称回应这种呼唤，把它们体现出来。

从来没有人设想，面对“你要爱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可以用“我爱邻人如同爱我自己”来回应；因为到了这里，这项表述的薄弱显然暴露在所有人眼前。

事实上，我认为，有某种东西让我们能够停在这项表述面前，把它视为同我们关系极深、并以某种方式阐明了我在此所谓命令的地平线、言语的地平线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它必定发出的地方——也就是大他者的场所——衔接它，那么它就同“你就是杀死我的那个人”这一点对称而平行；我曾向你们表明，后一句潜藏在单纯处于最初要求层面的大他者立场之下[注]。“你要爱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形成了一个圆环；这个“你”使我们在“你自己”中只认出另一个“你”，也就是命令本身得到衔接的层面，而命令最终以“如同爱你自己”完成：

> [注] 法语原文为 Tu es celui qui me tues。关系从句中的动词 tues 采用第二人称形式，同开头直接受话的 tu 呼应；中文无法复现这一人称呼应，正文译出其直接指向。

“如同你自己：在言语层面上，你就是那个你在死亡要求中所恨的人；你恨他，是因为你不认识他。”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基督教诫命同那条在地平线上给予我们的诫令相接；弗洛伊德的指示“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当到来）”也在那里得到衔接。这仍然等同于另一种智慧以“你是”所表达的东西；主体最终必须以这个“你是”，完成自己在自身言语中真实而充实的承担：他必须在自己所在之处认出自己，就在这个言语的

地平线上。没有这道地平线，分析中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得到衔接，只会制造歧路与误认。

［1957—1958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物》结束］